

主编的话

批判理论的界限

——对法兰克福学派主导思想的反思

俞吾金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法兰克福学派是人数最多，也是最富于原创性和影响力的一个学派，其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施密特、霍耐特都是国际学术界知名的人物。法兰克福学派核心理论是批判理论，这一理论奠基于霍克海默于1937年出版的重要著作《传统的和批判的理论》。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研究者们已经做了大量的论述和评论，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本文的主旨是探索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界限，即究竟哪些内容是这一学派的成员们所共同回避或保持沉默的？目的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发展潜力做出合理的、客观的评估。

实践：理论的界限

“理论”是一个含义不明晰的概念，为便于探讨起见，我们在这里把它定义为一组体系化的、自洽的陈述。理论又可以被细分为以下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诉诸于实践的理论”，意即这种理论之所以被提出来，其目的就是为了付之实践活动；二是“与实践相分离的理论”，意即这种理论之所以被提出来，只是出于提出者的单纯理论上的兴趣，而完全与实践活动无涉。

众所周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灵魂把握真理的五种形式，其中的“实践智慧”与其他四种能力不同，它显示的正是人们在处理日常事务，尤其是政治和道德上的事务的能力。后来，康德进一步把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并强调实践理性比理论理性更重要。黑格尔也在《逻辑学》中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并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概念获得了基础性的、核心的地位，这充分体现在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论纲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如果说，在这条论纲中，马克思肯定了“改变世界”（实践）比“解释世界”（理论）更重要，那么，在第八条论纲中，他又进一步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②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即便是在“解释世界”的理论活动中，实践仍然起着基础性的、核心的作用。由此可见，把马克思的学说按他自己的想法称之为“实践唯物主义”是完全正确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在批判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右翼所倡导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本·阿格）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論。事实上，像马克思一样，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都亲身参加了当时的革命实践。这样看来，马克思、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的学说完全可以被称为是“诉诸于实践的理论”。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与上述理论不同，它应该从属于“与实践相分离的理论”。

平心而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也关注过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霍克海默认为：“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理论是关于某个主题的命题总汇；这些命题之间紧密相联，有几个是基本命题，其他命题由基本命题推出。与派生命题相比，基本原理的数目越少，理论就越完善。”^③他区分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传统理论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批判理论，认为前者使理论与实践相分离，后者则“把一切为实践态度提出的理论与它们所反映的社会阶层联系起来。”^④哈贝马斯在《理论与实践》（1963）中进一步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实践的意图拟定的社会理论”^⑤，并从三个不同的方向探索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甚至提出了“实践学”^⑥的新概念。

然而，无论是霍克海默、阿多诺，还是哈贝马斯，当他们的著作唤起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③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页。

④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0页。

⑤ 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⑥ 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派学生的思想热情，学生们走上街头，以实践活动的方式来对抗资本主义制度时，他们自己却退缩了。他们不但与任何政治性的实践活动相脱离，还与左派学生运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阿多诺甚至表示：“当我构造自己的理论模式时，我不能猜出人们想要用燃烧瓶去实现它。”^① 哈贝马斯则指责学生是“左派法西斯主义”。随后，他不得不为此而离开了法兰克福。^② 由此可见，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不但与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实践活动相脱离，甚至还是对立的。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成了法兰克福党派理论的界限。

革命：批判的界限

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以为自己继承了康德和马克思的批判传统，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也包含着对批判的界限和有效性的自觉意识，而这种自觉意识正是在马克思反思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唯心主义思想倾向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中，马克思明确地告诉我们：“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的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③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批判是一种意识或精神范围内的活动，尽管批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人们的意识，使他们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真相，但了解真相，并不等于已经从该社会中解放出来了。有鉴于此，马克思曾以嘲讽的口吻写道：“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宗教迷信的观念，那么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这位好汉就是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标本。”^④ 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单纯思想范围内的批判活动是无法消灭这些错误观念的，资本主义社会会由于其统治的需要而把这些观念不断地

① 马丁·杰：《阿多诺》，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② 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二版序，第6—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页。

复制出来。也就是说，要从根本上消灭这些错误的观念，就不得不推翻它们得以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而当人们这样做时，他们就不是在诉诸批判，而是在诉诸革命了，因而马克思指出：“……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①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对批判和革命的不同的社会功能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对于他来说，批判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不过是为革命做舆论上的准备罢了。

然而，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来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本身却成了目的。他们重视的只是他们在从事批判，至于批判是否触及了现实、是否会导致对社会的颠覆、是否会引发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不仅不是他们所关心的，而且是他们竭力加以回避的。尽管霍克海默在谈到批判理论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领域时说：“经济是灾难深重的首要原因，无论是理论的批判，还是实践的批判，都必须使自己首先致力于经济。”^②但这里所说的“实践的批判”，即革命始终只是一句空话。如果说，霍克海默借口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敢重新出版自己早期著作的话，那么，阿多诺则采取了所谓“冬眠战略”，拒绝对任何革命行动的参与。^③所有这些都表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只是纯粹思想领域里的“革命活动”，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革命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成了批判理论无法逾越的界限。

肯定：辩证法的界限

法兰克福学派的辩证法思想集中体现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1947）和阿多诺独著的《否定辩证法》（1966）中，是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传统的一个继承和发展。

很少有人注意到，黑格尔的方法论≠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逻辑学》第79节中，黑格尔告诉我们：“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方面：(a) 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b) 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 思辨的或肯定理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页。

②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35页。

③ 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二版序，第14页。

的方面。”^①也就是说，黑格尔的方法论是由三个不同的环节组成的，而“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通常被黑格尔简称为“辩证法”，不过是黑格尔方法论的第二个环节。事实上，在黑格尔的方法论中，第一、三两个环节都起着肯定的作用，只有第二个环节起着否定的作用。如果说，黑格尔方法论中的第三个环节所蕴含的肯定的方面有可能导致折衷主义（这通常被认作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弊端），那么，第一个环节所蕴含的肯定的方面对于遏制辩证法滑向虚无主义来说，却绝对是必要的。作为一个革命者，马克思只重视黑格尔方法论中的第二个环节——辩证法，因为对他来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②但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会导致虚无主义，因为他有自己追求的肯定性的目标，即作为资本主义的取代方案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该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③

然而，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所主张的“否定”却是绝对排斥肯定的否定。他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否定的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早在柏拉图之时，辩证法就意味着通过否定来达到某种肯定的东西；‘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形象后来成了一个简明的术语。本书试图使辩证法摆脱这些肯定的特性，同时又不削弱它的确定性。展开这个自相矛盾的标题，是它的一个目的。”^④

阿多诺之所以把自己的辩证法解释为绝对排斥任何肯定方面的否定辩证法，一是源自他对实证主义的敌对态度。实证主义的核心思想体现在“实证的”这个形容词上，而它同时也可解释为“肯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排斥肯定方面，也就是排斥实证主义。辩证法与实证主义的差别在于：前者既包括肯定的方面，又包括否定的方面，但后者只包括肯定的方面。因此，前者具有批判、否定资本主义的资源，后者却缺失这样的资源。尽管阿多诺与实证主义划清界限是正确的，但他的辩证法绝对地排斥肯定的方面显然是错误的。二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使阿多诺最终抛弃了事物的肯定方面得以存身的同一性：“奥斯维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⑤然而，阿多诺混淆了两个

①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2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页。

④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⑤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页。

不同的概念——同一性与同质性——之间的差别。他应该加以反对的是理论与现实的同质性关系，而不是它们的同一性关系。事实上，假如理论与现实之间缺乏同一性，那么阿多诺撰写自己的著作去影响现实就变得完全不可能了。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同一性：一方面，我们应该摆脱“以理论与现实的同质性为基础的理论现实的同一性（黑格尔坚持的正是这种同一性）”；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追求“以理论与现实的异质性为基础的理论现实的同一性（康德和马克思坚持的正是这种同一性）”。

正如黑格尔把怀疑主义理解为否定意义上的独断主义一样，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也可以被理解为否定意义上的实证主义。乍看起来，阿多诺拒斥任何肯定的方面，但在《启蒙辩证法》的新版前言中，他和霍克海默表示：“连进步也不放过的批判思想，今天要求支持所剩不多的自由，捍卫现实中的人道倾向，而不管它们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①也就是说，“自由”和“人道倾向”仍然是法兰克福学派追求的最低的肯定的方面。事实上，无论是马尔库塞从否定现代资本主义的意义上提出的“大拒绝”，还是哈贝马斯从肯定现代资本主义的意义上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韦梅尔的“坚持现代性”、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等，追求的共同目标都是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一步合理化，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颠覆资本主义社会，以共产主义社会取而代之。众所周知，辩证法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它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而一个缺乏明确的肯定性的社会取代方案的辩证法归根到底是苍白无力的，尽管它竭力使自己与实证主义对立起来，但它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更隐蔽的实证主义罢了。

总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框架内，批判、抵抗、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现象，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已经从事和目前正在继续从事的工作。不颠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大框架，这就是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总体上的界限，而这一界限也正是它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根本差异之所在。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仍然是富有潜力和影响力的，然而，它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抵抗归根到底类似于麦子对镰刀、婴儿对母腹的抵抗，这种抵抗除了导致资本主义的完善化以外，是不会有其他结果的。

作者：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①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报告
(2014)

总报告

汪行福

2013 年全球马克思主义形势喜忧参半，这可以从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的“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 130 周年：对中国《人民日报》的提问的回答”^①的编者按中看出。关于马克思社会和政治理论的重要性，编者按的回答是：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理论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描述，而且界定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并展望了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关于美国学界和公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编者按的回答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与新思想和新运动相结合，不能固步自封，排斥与其他思想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状态和影响问题，编者按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者热衷于精致的理论体系和内部问题，对当下社会面临的问题总是缺乏自信或犹豫不决，目前的急迫任务是把目光转向外部世界，重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中的领导地位。显然，《科学与社会》的编者按提出的看法具有普遍性，不只是适用于美国。

大致来说，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马克思热”还在持续，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政治学 and 经济学领域，而且在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① Editorial Perspectives on 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Karl Marx: Answer to Questions from Chinese People's Daily, *Science & Society*, Vol.77, No.4, October 2013, pp.451-458.

本文主要从六个方面讨论它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学术和政治活动

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公共领域仍然有重要影响，除“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处在停摆状态外，世界各地的大型马克思主义国际会议、活动周、暑期学院等仍在举办。

2013年的美国左翼论坛于6月7—9日在美国纽约佩斯大学召开，来自全球的4000多名马克思主义与左翼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参加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为生态—经济转型而动员”。自第一台蒸汽机发明以来，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在为人类带来丰富的物质和文化成果的同时，也带来了空前的生态危机和灾难。今天，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斗争与拯救人类的生态斗争已经交织在一起，为了拯救人类，需要反对资本主义，因而，主办方呼吁为了生态和经济转型立即行动起来。

2013年英国伦敦“马克思主义节”7月11—15日在伦敦召开，本次活动的主题是“解释动荡的世界”，活动持续5天，英国和世界各地有数千人参加，演讲者除我们熟悉的萨米尔·阿明、卡利尼柯斯等名家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者和左翼活动家。2013年活动的热点之一是“反债”运动。在美国经济危机暴发以来，欧洲许多国家陷入了公共债务危机，为应对危机，它们采取严格的紧缩政策。这一政策取向受到与会者的抗议，他们大声呼吁，“唯一办法是拒绝偿付不是我们自己的欠债！”最近希腊“反紧缩派”左翼政党选举获胜表明，反债运动已成为左翼政治的突破口。

2013年《历史唯物主义》杂志年会于11月7-10日在伦敦举行，主题是“世界工人阶级的形成”（Making the World Working Class）。此选题意在表明，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其中最重要的阶级关系。对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遗产，如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是其政治难题。面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全球化，需要与之对立的世界工人阶级的形成。年会选择这个主题还有一层考虑，2013年还是著名非裔哲学家詹姆斯（C.L.R James）的名作《黑人罗宾逊》出版70周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E.P Thompson）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出版50周年。这两部著作表明，工人阶级不只是被资本所构成，而且也能够自我构成，探讨当今

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自我构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任务。与往前一样，年会吸引了上千学者，他们就马克思经典作家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各种现实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

美国《重思马克思主义》杂志的第八届国际会议于11月19-22日在美国艾姆赫斯特的马萨诸塞州大学召开。该活动吸引了一千多名学者、社会活动家和青年学生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剩余、团结和充分性”，会议举办方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进入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萧条。“剩余”（surplus）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基本特征，“团结”（solidarity）代表着应对危机的方案，“充分性”（sufficiency）要求对资本主义的增长和紧缩、过度消费与生态灾难的两极性进行充分的研究。会议呼吁人们既研究当前的危机又发挥革命性的想象力，探索新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

瑞典斯德哥尔摩于10月19-20日召开了“马克思2013”，会议内容非常丰富，涉及资本主义危机、新自由主义批判、社会主义策略、女性主义、生态主义、马克思学等二十余个专题，其中一个专题是讨论最新出版的《资本论》瑞典版。该活动吸引了许多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参加，有望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思想交流的另一重要平台。同时，该年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多语，既有瑞典语，也有英语和德语等，为不同母语的人交流提供了条件。

除上述有全球影响的活动外，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于2013年举办了“人性记忆中的马克思”研讨会，法国于8月份7-25日召开了主题为“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解和改变当代世界”的暑期学校。澳大利亚于3月28-31日在墨尔本举办了“马克思主义2013”大会，会议设70个专题，涉及女性解放、帝国主义与中东问题、全球危机与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当今阶级斗争等问题。为纪念罗莎·卢森堡的著作《资本积累》出版100周年，俄罗斯学者于1月21-22日在基辅召开“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全球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维度”大会。同年4月13日，莫斯科公民论坛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95周年举办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国际会议。

拉丁美洲是马克思主义活跃的地区，2013年的活动有：第6届“批评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论坛”于10月10-12日在阿根廷的罗萨里奥大学召开，主题是“批评理论的现实”；墨西哥的第5届“面向21世纪马克思的著作全国论坛”于4月24-26日召开；巴西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国际论坛”于9月30日-10月4日举行，主题是“130年的马克思”；委内瑞拉从2013年10

月 30 日至 2014 年 2 月举办了题为“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工人阶级斗争与革命入门”的系列讲座和讨论会。”

上述活动表明，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仍然活跃，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政治活动并未沉寂，它不仅活跃于英法美德等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也活跃在全球其他地方。

二、回到马克思

马克思的著作始终是当代左翼和马克思主义者重要的思想资源，也为人们观察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经验提供了强有力的批判性视角和理论支撑。随着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在知识界和公共领域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内容是丰富的，第一，它被用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第二，它被用于探索后马克思主义；第三，它与各种左翼立场相结合形成多重马克思主义视角。

斯蒂芬·雷斯尼克和理查德·沃尔夫在合写的《马克思主义》^①一文中指出，当今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多元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作者倾向于后一种马克思主义，把消灭阶级剥削放回到左翼争取社会变革的广泛日程之中。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既要强调消除生产方式的私有制，又要积极从事增强工人力量的赋权斗争。

瑞兰·库柏在《2014 年马克思可以教给我们什么？》^②一文中指出，虽然马克思在美国政治领域已经被边缘化，但起码在三个领域他的思想对我们还有所教益。在收入分配领域，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将必然使大众贫困化，典型的资本主义政策将对富人的减税和取缔工会，让越来越多的社会保障依赖于工作，而不是公民资格，使金融和信用的权力越来越大，因而社会财富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虽然低估了民族主义、宗教、种族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但也意识到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不会自动地导致工人的激进化，失业者可能更倾向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在他看

① Stephen A. Resnick and Richard D. Wolff, *Marxism, Rethinking Marxism*, Volume 25, Number 2, April 2013, pp.152-162.

② Ryan Cooper, What Karl Marx can teach us in 2014, <http://theweek.com/authors/ryan-cooper>.

来，马克思的思想并非完美无缺，但足以打破资产阶级知识精英对资本主义的幻想，使我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缺陷。

凯文·安德森（Kevin B. Anderson）的著作《处于边缘的马克思》（2010）在 2013 年继续受到关注。大卫·诺曼·史密斯（David Norman Smith）^① 指出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使人们注意到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阶级、国家等核心主题上的贡献，也让我们认识到马克思对文化、族性以及地缘政治等“边缘”领域做出的贡献。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2011）虽然是一本大众读物，但芭芭拉·弗莱指出，它向世人表明，马克思不仅在于对资本主义做了深刻的批判，而且给人们提供了通向一个更好世界的最有效方案。^②

马切罗·穆斯托编辑的《今日马克思》^③ 指出，随着全球危机的出现，我们迎来了“马克思的复兴”（Marx renaissance）。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着理解和批判 21 世纪的富贵思想工具。该书分为二部分，第一部分包含着马克思思想对思考政治、经济、民族主义、族性问题、后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民主、解放、异化等问题的启示和价值，第二部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传播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复兴还有其他内容，关于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探索的意义，有伊冯·基尼奥的《回到马克思：为了后资本主义社会》^④ 和美国哲学家彼特·胡迪斯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理论之间关系的讨论有《马克思主义、东方主义和世界主义》^⑤；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有《阶级、过剩与劳动分工：后马克思主义探索》^⑥；对马克思的性别和家庭观的讨论，有《马克思论性别与家庭》^⑦ 关于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

① Marx at the Margins: On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Non-Western Societies, by Kevin B. Anderson, *Rethinking Marxism*, Vol. 25, No.1, January 2013, pp.130-133.

② *Science & Society*, Vol.77, No.2, April 2013, pp.259-261.

③ Marx for Today, edited by Marcello Musto, Routledge, 2013.

④ Yvon Quiniou, *Retour à Marx: pour une société post-capitaliste*, Buchet Chastel, Paris, 2013.

⑤ Gilbert Achcar, *Marxism, Orientalism, Cosmopolitanism*,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3.

⑥ / Michal Polák, *Class, Surplu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A Post-Marxian Explora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⑦ Heather Brown, *Marx on Gender and Family: A Critical Stud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ook Series*, Haymarket Books, 2013.

后无政府主义之间关系的讨论，有《无政府主义转向》^①；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传播和影响，有《当代西欧马克思主义指南》^②、《法国马克思主义导论》^③、《今日马克思》等。

总的来说，国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具有双重特征，一是把马克思从正统教中解放出来，使之与多个研究领域和思想相结合；另一方面重申马克思的批判和革命精神，为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探索提供资源。

三、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视角

2007年西方经济危机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它最严重的危机，它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并以失业高涨、收入下降、福利削减、财政紧缩等后果影响着劳动者和中产阶层的生活。针对当今资本主义危机及其社会经济灾难，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思想家从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其中突出的有以下方面：

1. 对新自由主义批判

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学者都看到，20世纪末资本主义经历了新自由主义的转型，它的特征是彻底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新自由主义释放的资本积累的盲目冲动是经济危机的根源，然而，新自由主义却依赖经济危机来强化它自身的逻辑，诊断和解释资本主义需要批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关于新自由主义及其危机，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吉拉德·杜梅尼尔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中提出三个判断：当代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它由资本家、管理者和大众阶级三个阶级构成（a tripolar class pattern）；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可以称为“金融霸权”阶段；在美国

① *The Anarchist Turn*, Jacob Blumenfeld, Chiara Bottci, Simon Critchley (ed), Plute Press, 2013.

② Peter Thomas,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an Marxism*, Continuum, 2013.

③ *L'introduction du marxisme en France: philosoviétisme et sciences humaines, 1920-1939*, Isabelle Gouarné, Rennes: PUR, 2013.

和欧洲这种社会秩序正陷入危机。^① 在“英美新自由主义：一种模式和一个帝国”中，他进一步指出，新自由主义首先应该被描述为由资产阶级及其金融制度霸权所统治的社会秩序，主要特征是，资本所有者支配公司管理者，公司治理完全以利润为动机，与西方战后体制相比，新自由主义重新回到了资本所有者的资本主义。保罗·罗伯茨在《放任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② 一书中指出，美国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有关。在全球化中，离岸生产加工和服务外包减少了美国本土就业机会，减少了消费者收入的增长，抑制了美国经济的基础，使得大量人口陷于债务问题，而放宽管制又使得收入和财富集中于更少的人手中，因此，资本主义危机是由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和两极分化造成的。德国沃尔夫冈·弗里兹·豪格在《资本主义+计算机？让马克思〈资本论〉工作：分析跨国高技术资本主义的大萧条》一文中，对当前危机分析中过于重视金融因素的作用表示不满，在他看来，按照马克思的方法，我们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和地理条件中，而不是在表面的货币世界中去寻找资本主义危机的答案。在他看来，当今资本主义有两大特征，一是跨国资本主义，二是高技术资本主义，这两个特征应该成为分析资本主义的核心因素。^③

大卫·哈维持之以恒地批判新自由主义，在最新推出的《17个矛盾和资本主义的终结》^④ 中对资本主义矛盾及其政治前景做了分析。该书首先分析了资本主义诸矛盾，哈维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分为根本矛盾、流动矛盾和危险矛盾三种类型，有些矛盾是可以克服的，有些矛盾对资本主义来说带有系统性和结构性，因而是无法克服的。他指出，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应该致力于创造一个比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更民主、更平等和更具参与性的世界，即使是资本主义的致命矛盾也不能保证它一定会灭亡，矛盾只是蕴含着革命的可能性，但其结局仍然取决于人们的斗争。哈维强调，马克思是一个革命的人道主义者，而不是

① Gérard Duménil, *Capitalism Today – A Marxist Perspective; Anglo-American Neoliberalism: A Model and An Empire*, <http://media.marx2013.com/2012/06/Marx2013-program-webb.pdf>.

② Paul Craig Roberts, *The Failure of Laissez Fair Capitalism*, Clarity Press, 2013.

③ Wolfgang Fritz Haug, *Capitalism + Computer = ? Putting Marx' Capital to Work: Analyzing the Great*.

④ *pression of Transnational High-Tech Capitalism*, <http://media.marx2013.com/2012/06/Marx2013-program-webb.pdf>.

④ David Harvey,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目的论式的决定论者。

劳尔·德尔戈多·怀斯在新自由主义批判中也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他认为，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不仅是经济危机，而且是文明危机，它毁灭了劳动者，也毁灭了自然。针对这一整体性的文明危机，作者提出一种基于南方立场的替代方案：“全球工人阶级在反对当前的帝国主义的攻击时不要采取纯防守的姿态，在这种反击中，全球劳工运动必须有策略，并与其他抵抗力量结成同盟，共享建立一个超越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最终超越资本主义的世界的愿景。”^①

关于新自由主义学说的性质，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在《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诞生》（2012年）中认为，新自由主义并不是资本家或其代理人有意识推行的“主宰计划”，而是20世纪中后期资产阶级为应付经济危机而采取的一套富有吸引力的技术性解决之道。^②但迈克尔·W.克卢恩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新自由主义产生于自20世纪80年代不是偶然的，当时英美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营造这样的舆论氛围：“国家是社会弊端的根源，自由市场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比政府做得好，过去的经济危机是国家干预的结果。”^③卢克恩认为，新旧自由主义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新自由主义倡导的社会前景完全由市场关系组织，这种思想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截然不同，后者倡导根植于文化社会组织、文明交流规则和国家管理经济的资本主义。”琼斯没有看到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性质，“我们有朝一日回顾战后时期，会把它看作一个意识形态斗争新形式兴起的时期。”^④这一评论对我们认清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参考价值。

新自由主义不仅是经济生活的消极力量，而且是消极的文化力量。J.D. 泰勒在《否定的资本主义：新自由时代的犬儒主义》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资本、金融、债务等匿名力量支配的时代，到处充斥着沮丧、贫困、环境恶化和不健康，“这是一个否定资本主义（negative capitalism）的时代，在其中，

① 劳尔·德尔戈多·怀斯：《移民与劳工问题：帝国主义、不平等发展和劳动力被迫转移》，王乙茹译，《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4期。

② Daniel Stedman Jones,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Hayek, Friedman,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 Politic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③ 迈克尔·W.克卢恩：《什么是新自由主义？》，《译品》2013年第2期。

④ 迈克尔·W.克卢恩：《什么是新自由主义？》，《译品》2013年第2期。

个人的和集体的能力和生活的质量都不断萎缩和被金融资本剥夺其力量。”^① 在这一社会中，人的生活不仅失去了能动性，而且失去了社会性。“在否定的资本主义时代，生命本身已经被否定和疏远了它的幸福和社会支持。放松伴随着罪恶。债务变成了社会和政治条件。”^② 与否定的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文化情感是犬儒主义。新自由时代的犬儒主义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消极被动的消费主义自我安慰，二是把社会矛盾引向移民或有色人种，表现为原子化的法西斯主义。为了抵制犬儒主义，作者主张一种“社会民主的反-政治”策略，这种策略不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常规性选举和议会制度，但更强调社会成员在地方层面的政治参与。他新社会民主主义策略概括为三个方面：每一个人都允许从事社会和政治活动；每个人都获得充分的教育、批判的思维和悲悯心；建构以质量取胜的独立的非赢利媒体。通过这三个方面，把人们从消极被动和盲目不仁的犬儒主义状态中解放出来，加强民主对否定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控制力。泰勒的理论相对温和，但他把对否定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对犬儒主义的文化批判结合起来，为新自由主义批判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秩序，而且是一种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发。瑞德伊卡·德赛在《地理政治经济学》^③ 中指出，当今地理政治经济学有三个与新自由主义相关的神话。一是市场神话，认为全球化是市场而不是国家在引导着世界，这一神话披着世界主义的外衣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做纯粹的经济主义解释。二是帝国神话，认为全球化瓦解了国家及其主权。三是美国霸权神话，认为美国是无私和仁慈的超级力量。作者认为，全球秩序是不平衡发展和不同力量相结合的产物，它需要从资产阶级国家的内在矛盾和有意识的活动来解释。新自由主义主宰的全球秩序既不公正，也不稳定，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就是证明。

由沃伦斯坦等人撰写的《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④ 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命运做了多角度的探讨。沃伦斯坦把 2008 年的经济危机视为“结构性危

① J. D. Taylor, *Negative Capitalism: Cynicism in the Neoliberal Era*, Zero Books, 2013, p.7

② J. D. Taylor, *Negative Capitalism: Cynicism in the Neoliberal Era*, Zero Books, 2013, p.10.

③ Radhika Desai, *Geopolitical Economy: After Us Hegemony, Globalization and Empire*, Pluto Press, London, 2013.

④ Immanuel Wallerstein with Randall Collins, Michael Mann, Georgi Derluigian and Craig Calhoun, *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机”，认为过去 500 年资本主义通过“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的作用保持着动态平衡，而未来的三、四十年中这两个周期都将结束并失灵。资本不可能无止境地积累，当前危机就是它走向最终衰亡的前兆。兰德尔·柯林斯认为，当前的危机意味着“中产阶级工种的终结”。传媒和技术资本主义虽然会创造新的高收入技术岗位，但大部分中产阶级都将面临结构性失业，这一趋势将中止中产阶级希望通过工资收入过上富裕生活的梦想。迈克尔·曼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危机是社会的全面危机，它将进入低增长、高失业的阶段，摆脱资本主义危机需要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

资本主义体系已经陷入危机，但僵而不死，社会学家科林·克劳奇在《新自由主义奇异的未死》^① 中进行了探讨，此书被誉为自凯恩斯以来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著作。在克劳奇看来，新自由主义僵而不死的奥秘在于它的特殊结构。表面上，新自由主义鼓吹自由竞争和市场机制，实际上则通过巨型大公司控制大众的生活。传统的政治理论往往只考虑市场与国家的两极化，却忘记了大公司的作用。大公司一方面通过其游说和资助来影响政治家和政党的政治议程，另一方面通过其垄断支配市场的运行。大公司不仅是国家与市场的中介，而且是国家与市场起作用的工具。克服新自由主义不能寄希望于取消大公司，也不能寄希望于回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我们应该把大公司拉回到政治辩论之中，让它受到社会公众领域的监督和民主的约束。

新自由资本主义主张自由市场和全球化，消除官僚等级制和民族国家壁垒对贸易自由的妨碍，但是，新自由主义体制并未实现其承诺，相反它产生了新的等级制。在对新等级制的分析中，西方学者提出了许多理论，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称为“世袭资本主义”或“遗产资本主义”。德国学者冯克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是重新封建化，工人阶级的孩子面临着无法超越的天花板，富裕的资产阶级忙着筑墙把自己封闭在“有门卫的社区”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诉诸的自我实现不仅成为了资产阶级利益自我辩护的工具，而且也瓦解了工人阶级的集体意志。因此，批判新自由主义需要挖掘其更深刻的根源。^②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体制及其历史命运

^① Colin Crouch, *The Strange Non-death of Neo-liberalism*, Wiley, 2013.

^② 阿尔布莱希特·冯·卢克：《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载《新社会》(Neue Gesellschaft) 2012 年第 3 期，译文见《国外社会科学动态》2014 年第 4 期。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它的探讨既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理论意义。马克思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批判和经济危机的诊断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充分证明了其理论生命力。

2. 生态危机批判

美国 2013 年左翼论坛的“为生态 - 经济转型而动员”的主题，代表着左翼思想家思考的一个重要方向。当今人类不仅遭遇经济危机和萧条，而且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和环境危机，如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环境恶化、旱灾蔓延、物种濒临灭绝等等。马克思主义在解释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它与经济危机之间联系上有独特的理论优势。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中，《每月评论》主编贝米拉·福斯特在生态危机批判上有多方面的贡献。在题为《马克思与自然普遍代谢中的断层》^①文章中，福斯特充分肯定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的意义，认为该理论在过去十五年间给生态危机的批判和生态社会主义的探索提供了理论依据。生态解放具有总体意义，它不仅是自然的解放，也是社会的解放，不仅是人类生产问题，而且是人类自由问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马克思 2013”大会上，他做了“马克思与自然普遍代谢中的断层和生态危机的发展”的报告，把马克思的生存代谢理论的意义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阐明我们星球面临的紧急状态，其次阐述了这种紧急状态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最后指出生态和社会革命的重要性。^②与此同时，在《走向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对话》^③一文，他对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做了阐述。在他看来，我们不能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替代，或一种更高级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把生态主义与唯物主义结合起来，把这种结合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和理论与实践、科学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法的本质内容。在 20 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这一有机联系断裂了，今天应该重新把它们恢复起来，并把它视为修复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宏大革命的一个部分。

① Marx and the Rift in the Universal Metabolism of Nature, *Monthly Review*, December 2013, pp.1-19.

②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 and the Rift in the “Universal Metabolism of Nature”: Capit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risis. <http://media.marx2013.com/2012/06/Marx2013-program-webb.pdf>.

③ Toward a Global Dialogue on Ecology and Marxism: A Brief Response to Chinese Scholars,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February 2013, pp.54-61.

生态危机的性质和根源是什么？2013年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生态与资本主义》杂志的编辑伊安·安格斯在《环境灾变论的神话》一文中对安迪·袁（Eddie Yuen）的《失败政治学已经失败》^①一文做了批评。安迪·袁的文章试图表明，过分强调生态危机的灾难性质，以便达到政治动员的目的，是一把双刃剑，因为生态灾难主义在激励人们行动的同时也可能涣散人们的斗争，使人们陷入绝望。伊安·安格斯认为，安迪·袁把生态问题政治化是片面的，容易淡化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在他看来，并非只有无政府式行动才是政治，揭露谎言和暴露真相也是政治。因此，他主张环境主义者应充分研究危机的客观性质和严重性。安迪·袁对安吉斯的批评做了回应，他认为，生态灾难与政治动员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安迪·袁的回应引发他们之间进一步讨论。^②与此同时，纽约大学教授萨姆·吉丁也加入讨论，在《环境与资本主义：对伊安·安吉斯的回应》中他指出，面对环境危机，最迫切的政治问题是如何形成社会反抗力量上有所作为。在环境主义中最重要的分歧不是那些认为环境崩溃即将来临与那些认为我们还能在比现在更丑陋和堕落世界中生存的观点之间的分歧，而是在那些相信废物循环利用、技术手段、市场刺激和绿色工作能够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与那些认为只有采取更激进的对资本主义本身构成挑战的观点之间的对立。^③吉丁在文章还指出，生态运动如果脱离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很容易接受渐进的市场办法。劳工运动无论有什么弱点，仍然是政治和经济改变的关键资源。我们必须把环境问题结合到更为广泛的社会主义纲领之中，因此，真正的对立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的激进性质与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改良斗争之间”的对立。^④安吉斯对吉丁做了回应。他认为，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事实，而对事实最有发言权的是科学，生态问题不能还原为政治问题。同时，他还指出，生态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性是客观利益的统一性，而

① Eddie Yuen, *The Politics of Failure Have Failed, Catastrophism: The Apocalyptic Politics of Collapse and Rebirth*, by Sasha Lilley, David McNally, Eddie Yuen, and James Davis, Oakland: PM Press, 2012.

② 相关材料见《气候与资本主义》网站的介绍。<http://climateandcapitalism.com/2013/12/02/yuen-angus-debate-environmental-catastrophism/>.

③ <http://climateandcapitalism.com/2014/07/28/environmental-catastrophism-sam-gindin-responds/>.

④ <http://climateandcapitalism.com/2014/07/28/environmental-catastrophism-sam-gindin-responds/>.

非主观立场上的一致性。用巴西生态学家亚历山大·柯斯塔的话说：“为避免资本主义给危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而战，就是为保障有人类尊严的生存状态而战……社会主义在一个烧焦的地球上是不可能的。”^①因此，生态主义者无论是否接受社会主义，客观上对社会主义是有利的。

安吉斯与安迪·袁和吉丁之间的争论意味深长，实际上，他们的争论反映了在生态危机上的两条路线。安吉斯的观点是生态主义政治观点。它认为，无论生态主义者做什么，只要对克服生态灾难有意义，生态斗争本质上就是政治斗争。而安迪·袁和吉丁则是政治生态主义观点，他们强调，除非我们能够把生态危机的批判转化为有效的政治动员，否则仅仅是生态批判并不能导向积极的立场，也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显然，这两种立场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实际上，生态问题既是一个客观事实问题，也是一个主体取向的政治问题，既是人类问题，也是阶级问题，两种话语必须辩证地结合起来。

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资本主义和生态灾难，值得重视的著作还有菲利普·克莱顿与贾斯丁·亨兹科尔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和生态灾难的替代选择》^②。该书试图结合起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老子的中国智慧、社会主义的遗产与生态主义的运动，对生态灾难进行诊断，给出替代资本主义和生态灾难的可持续发展方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似乎已经被抛给了少数学院式左派或怀旧的活动家之时，作者把我们带回到与它的相关性之中。”“有机马克思主义”不仅试图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生态内涵，而且强调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必要性。该书强调，生态危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和最严重的危机，它不仅挑战人类的生产，而且挑战生活方式和文明本身。生态灾难对社会主义来说并非完全消极的，它使人们意识到，只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才是唯一出路。

总的来说，生态批判对我们有多方面意义，其中包括：发掘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思想资源中包含的生态思想，丰富对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资源；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批判市场主义、技术主义等拯救危机的幻想；探索生态批判与资本主义批判、生态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的联系，为激进政治提供了新

① <http://climateandcapitalism.com/2014/07/30/real-environmental-problem-catastrophe-catastrophism/>.

② Philip Clayton, Justin Heinzekehr, *Organic Marxism: An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and Ecological Catastrophe*, Century Press, 2014.

的视角。

3. 债务资本主义批判

2007年金融危机的后遗症是一些国家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为应对债务危机，一些国家采取更为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严重地影响到公共福利和一般大众的生活。为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反危机措施，西方左翼建立了“反债联盟”，并发起“千禧年免债运动”。为对债务危机进行论断和批判，近年来西方兴起了对债务资本主义的研究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大卫·格雷伯的《债：第一个5000年》和拉扎雷图的《债务人的形成》两本著作。今天的许多讨论都是围绕着它们展开的。

格雷伯的《债》系统考察了五千年来债务形式的变化以及它与暴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债务是与金钱相联系的，格雷伯认为，货币并非是从物物交换中产生的，“我们所称之为虚拟货币的东西是最先出现的。……实物交换是硬币或纸币使用中的偶然的副产品：历史地说，实物交换主要是给那些无法接触到通货，因而以这个或那个理由习惯于现金交易的人使用的。”^① 债务产生于金钱交换，而金钱是富人的工具，物物交换与货币交换代表着不同的经济类型和阶级关系。大卫·格雷伯是一位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共产主义者。他认为，人类生活有三种道德原则，即交换、等级制和共产主义。这三者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在不同范围内起作用。但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原则已经完全才被前两者所取代了。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理想并不神秘，它就包含在人类的给予和帮助的实践中。作者提出“底线共产主义”（baseline communism）概念，其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债务资本主义是与底线共产主义完全对立的，市场和债务把人與人之间相互帮助关系异化为由金钱衡量的债务关系。

格雷伯的著作引起学者的广泛兴趣。罗宾·布莱克伯恩指出，最近发生的债务危机进一步加深了穷人与富人、债权人与债务人、金钱机器与人类生存和繁荣之间的冲突。人类生活本来就是由“给予”与“接受”的关系构成的，只是在新自由主义脱域（disembedded）的社会中，它们才会变成债务关系。债务经济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也是社会统治关系的中介，债权人是匿名的主体，他代替资本家执行逼债的丑恶勾当。债务关系是阶级斗争关系，少数资本家是债主，人民大众是债奴。格雷伯在书中提出的“我们是99%的人民！”

① 引自 Robin Blackburn: Finance for Anarchists, *New Left Review* 79, JAN/FEB 2013, p.141.

这一响亮口号对占领华尔街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杰弗瑞·阿提克也肯定《债》的核心观点：“债不是一种中立的社会制度，它首先是、也主要是一种允许行使权力的制度。债是等级制度的基础，因而也是很多社会结构的基础。”^①他认为，债务是一种异化和分裂的力量，它把我们的生活分成两部分：一边是“共产”家庭和小社区，其中责任表现为关怀和互助；一边是匿名的经济领域，责任表现为无情的权力和量化的债务。从人类学观点看，所有债务都是责任，但并非所有责任都是债务。在资本主义中，“债是一种定量的责任，以支付金钱（的方式）来履行。因此，债就有了一种特别的非人格化的性质。”^②非人格的、由法律强制做后盾的债务是充满暴力的，它经常迫使人放弃自由和家园，因此，抵抗债务常常成为人民起义起因。

2013年1月巴黎八大和巴黎高师联合举办的“希腊症状：债务、危机和左翼危机”讨论会，议题之一是讨论拉扎雷图2012年出版的《债务人的形成》。《债务人的形成》的核心观点是：“债务是对整个社会‘猎取’、‘吞噬’和‘榨取’的机器，是宏观经济规定和管理的工具，是收入再分配的机制。也是个人和集体主体的生产和‘管制’机器。”^③债务机器结合了权力、道德和经济，把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变成金融资本主义的“债务人”（indebted man），因此，债务人的形成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

《债务人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关注，斯塔沃拉卡克斯在对它的讨论基础上提出了“债务社会”概念。作者指出，尼采早就注意到债务的特殊社会支配功能，教会正是通过强化人们对上帝的负债感来实施社会控制的，信仰关系是一种债务关系。债务也体现在道德之中，通过负罪感，道德良心把人们塑造成社会信赖的人。债务社会是当今资本主义的特征，它把后民主制特征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后民主制”（post-democracy）概念源自朗西埃，它指一种保留民主外表，却剥夺人民实际参与权利的体制。斯塔沃拉卡克斯认为，西方社会在政治上早就进入了“后民主制”时代，战后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经济民主与政治后民主的共存。但是，自从债务危机暴发之后，西方在经济领域也进入了后民主时代，不仅人们在政治是无权的，经济上也是不自由的，消费成

① 杰弗瑞·阿提克：《财政悬崖和禧年免债运动》，《译品》2013年第1期。

② 杰弗瑞·阿提克：《财政悬崖和禧年免债运动》，《译品》2013年第1期。

③ Maurizio Lazzarati, *The Making of Indebted Man*, Semiotexte/MIT, Cambridge MA, 2012, p.29.

了“被规定的享乐”。新自由主义与债务社会有特殊关系：“不仅新自由主义从其开始就建立在债务的基础上，而且‘债务经济的权力阵营’（power bloc）还抓住最近金融危机的绝佳机会扩展和深化新自由主义政治的逻辑。”^①

沃特姆在讨论《债务人的形成》中进一步提出了“债务时代”概念^②。作者指出，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绝非是意料之外的结果，“债务就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的一架机器”，它不仅使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合理化，而且也是它的权力体制合理化的工具。作者同意《债务人的形成》的核心观点，金钱和债务的威力是巨大的，没有任何东西拥有像它们一样的创造或摧毁社会关系的威力。然而，沃特姆不认为债务社会是一个“没有未来的灾难性未来”。债权人不是上帝，不能阻止债务违约。拉扎雷图认为，债务是一种回溯性（retroactivity）的时间，它既侵凌了真正意义的时间连续性，又形成了虚假连续性。但沃特姆认为，债务是由现在向过去的回溯构成的，但不能保证其将来的偿还要求一定能实现。在债务中，意图与所是之间总是存在着赤字，设想一个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债务关系是可能的。

在近期的主权债务危机中，欧洲首当其冲。债务资本主义不仅引发对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新特征和社会控制的新形式的讨论，也引发了对债务危机的国际政治后果的关注。在有关最近的欧盟债务危机的讨论中，哈贝马斯的《欧盟危机：一个对策》^③、拉帕维塔斯（Costas Lapavitsas）的《欧盟区的危机》^④，从不同的左翼立场对债务危机之后欧盟的走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哈贝马斯认为，欧洲一些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对欧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由欧盟出面应对债务将产生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可营造欧盟成员国之间休戚与共的政治氛围，推动欧盟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限制新自由主义体制。欧盟是最先进的超国家民主试验，代表着自现代性开端以来对权力，包括国家权力，进行法律驯化的最新成果。应对危机欧盟应该采取“向前进”的方案，推动欧盟内部进一步联合。拉

① Yannis Stavrakakis, Society of Debt: Greece and the Future of Post-Democracy, *Radical philosophy*, 181, SEP/OCT, 2013, p.34.

② Simmon Morgan Wortham, Time of Debt: on The Nietzschean Origins of Lazzarato's Indebted Man, *Radical Philosophy*, 180, JULY/AUG, 2013.

③ Jürgen Habermas, *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Union*, Polity Press, 2012.

④ Costas Lapavitsas, *Crisis in the Eurozone*, Verso, 2013.

帕维塔斯则认为，欧盟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有缺陷，危机是由欧盟内部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不平衡造成的。欧盟采取的紧缩政策没有考虑债务危机国家的实际情况，严格的金融纪律和紧缩财政将导致各国为了提高竞争力而采取压低工资的“向下触底”（race to the bottom）竞赛，让危机造成的悲惨处境永久化。拉帕维塔斯提出“进步的退出”和“逃债”政策，既然边缘国家留在欧盟是没有希望的，它们就应该退出欧盟，由民主选举的政府管理经济，而不是让布鲁塞尔的官僚们决定自己的命运。

哈贝马斯与拉帕维塔斯的分歧是欧洲左翼内部两条路线的分歧，哈贝马斯坚持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它主张通过法律上层建筑的改革来克服危机，拉帕维塔斯倾向于激进左派的立场，认为欧元区的危机只有通过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才能克服。

四、社会批判哲学新视野

对经济和债务危机的批判不仅需要经济学视野，也需要哲学视野。朗西埃在一篇访谈中对此“危机”做了独到的分析。“危机”（crisis）原是一个医学概念，指疾病处在治疗的关键时期；后来，该词也指事物由于内在紊乱而处在极其严重的病态状态。今天的“危机”概念有两种理解方式：一是把危机理解为体系无法吸收的过剩物（an excess）；二是把危机视为事物陷入的病态状态。对危机概念的理解不同，对待它的方式也不同，前者把危机视为系统毁灭的征兆，因而往往希望加速危机进程使之尽早接近历史“翻转点”（tipping point），后者把危机视为事物的不正常状态，因而想尽办法使之痊愈和正常。把这两种观点运用于资本主义危机，也就构成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与资产阶级的改良立场。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要求我们促使危机向对自己利的方向发展。朗西埃说：“解放是为另一个世界做准备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按此去生活的方式。”^①埃西埃的文章对我们思考危机的政治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于资本主义有两种思考的方式，一种方式是强调历史主体的作用，把资本主义历史理解为无产阶级主体性与资本主义实体性的对抗；而另一种方式

^① Maria Kakogianni and Jacques Rancière, A precarious dialogue, *Radical Philosophy*, 181 (Sept/Oct 2013), p.21.

是把资本主义体系视为自主的实体，力图揭示其自我毁灭的客观逻辑。这两种不同立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辩证法理解的不同基础。布莱克在《反资本主义的哲学之根：历史、文化和辩证思想文集》^①中考察了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思考，值得关注。德国批判理论家阿尔弗雷德·佐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的《智力与体力劳动：认识论批判》^②近年来广受关注。雷特尔认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是作为一般价值形式的“现实抽象”，商品交换与其物的特殊性质无关，唯一重要的是它的抽象价值。这种抽象之所以是“现实的”，因为它与人的努力无关，也独立于人们的主观判断，而是实实在在地以交换价值形式存在的。现实抽象概念是重要的，它包含着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真正起源，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与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同构性，它们都依赖抽象理智规定，对前者来说是概念，对后者来说是货币。资本积累是一种恶无限，它把工人的活劳动还原为由价值衡量的劳动消耗，把主体的对象化结果变成统治自身的实体，因而资本主义异化是劳动主体性与劳动结果的实体性之间关系的颠倒。对反资本主义的哲学之根的思考还有其他观点。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在《马克思论黑格尔》^③中提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受到黑格尔的影响，它揭示了资本主义把劳动从自由的对象化形式变成了反主体的实体性力量。莫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就其实存而言只是一个虚假的主体，如果无产阶级除了作为革命者外，不是其他任何东西，那么无产阶级的存在只能由其非存在（not being）来构成，“只能通过废除自身来重写其主体性。”^④罗伯维茨（Michael Lebowitz）指出，劳动不仅是资本体系的一个要素，而且自身就是主体，“理解资本主义是一个使人畸形的倒错的社会，以及资本本身不过是剥削的结果还是不够了的。如果人民认为没有选择，他们最多只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进行斗争，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追求不可能的东西。”^⑤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认为，“马

① David Black,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Anti-Capitalism: Essays on History, Culture, and Dialectical Thought*, Lexington Books, Lanham MD, 2013.

②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77

③ Norman Levine, *Marx's Discourse with Hegel*,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④ David Black,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Anti-Capitalism: Essays on History, Culture, and Dialectical Thought*, Lexington Books, Lanham MD, 2013.p.72-3.

⑤ Michael Lebowitz, *The Socialist Alternativ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p.21.

马克思的资本概念的“心脏”，我相信是对资本拜物教的批判；从本体论上说，资本不过是‘虚假的主体’，‘虚假的自我运动的实体’，‘创造资本之外的资本’不过是对工资劳动的剥削。”^① 这些观点都强调，揭示劳动的主体性及其悖论性质是反资本主义的哲学基础，而恢复无产阶级主体性和实体性则是人类解放的基本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中，辩证法是不可缺少的理论工具。马克思的辩证法究竟是阶级对抗的主体辩证法，还是资本体系的结构和关系的客观辩证法，一直存而未决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概念》^② 中胡迪斯对这两种辩证法及其代表者做了精彩的分析。对主体（观）马克思主义来说，马克思思想的原创性在于指出资本是客观自主的主体，人是被资本吸纳和使用的客体，就此而言，马克思的《资本论》与黑格尔的《逻辑学》相似。黑格尔的《逻辑学》把世界逻辑化，再把逻辑主体化，马克思理论的“资本”也是如此，它把一切存在都变成资本的要素。在客观主义看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是解释资本主义体系和客观规律的纯粹理论，与阶级斗争和政治无关。客观主义又分为三个支派：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宇野弘藏（Uno Kozo）创立的“宇野学派”；由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和波斯顿等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社会理论派；由克里斯多夫·亚瑟、穆里、鲁特（Geert Reuten）、史密斯等人组成的“体系辩证法”。与客观主义相反，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从阶级斗争出发，把阶级关系作为资本主义的实体性内容，把无产阶级如何摆脱资本的奴役并获得自己的霸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和任务。虽然他们也承认资本的自我规定和自主性，但它强调，资本的客观逻辑必然遭遇到劳动的主观逻辑的限制和反抗，资本不是无限的万能的，在资本主义劳动及其集体活动中就包含着颠覆和限制资本自主性的主体力量。这一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意大利自治主义者马里翁·特隆蒂（Mario Tronti）和奈格里、英国开放的马克思主义（Opening Marxism）创立者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等人。在广义上，今天许多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也属于这个派别。对马克思理论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解释都有自己的盲点。胡迪斯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既是对资本主义客观矛盾和规律的解释，也是对后资本主义替代社会和无产阶级斗争

① Tony Smith, *Globalisation: A Systematic Marxist Account*,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09, p.181-182.

②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Haymarket Books, 2013.

的思考。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齐泽克在《绝对的反冲：朝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基础》^①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把拉康的精神分析与德国古典哲学结合起来，重新解释了辩证唯物主义概念。他认为，对唯心主义的克服不能退回前康德的朴素实在论立场，相反，我们应该把唯心主义彻底化，使之走向它的反面。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认知图式理论与拉康的象征理论都告诉我们，任何现实概念中都包含着无法根除的先验物，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资本逻辑作为先验之物先于我们一切的思想 and 行为，形塑了我们与世界发生关系的基本框架。资本的抽象性不是我们对社会实在的误认，它是像康德的“图式”一样先于我们的绝对，先验对现实的“反冲”是今天重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齐泽克的观点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否定的辩证法，它的特征即不强调概念自律或对立面的和解。在辩证法中，任何一个A都会造成一个反对自身的B，而理性总是与反叛（反对自身）相结合，在这种自身中存在的绝对反冲才是对本质的设定。本质不是自我封闭的，它总是被一个不是自身的非规定所规定。今天成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既不能越过康德的批判哲学直接回到存在自身，也不能停留在康德那里，而是需要从康德的先验主体转向黑格尔的分裂（disparity）主体。这种唯物主义不是传统唯物主义，也不是福柯式的话语唯物主义、德勒兹的新唯物主义，而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

齐泽克最近的哲学立场被概括为先验唯物主义哲学，约翰斯顿在《先验唯物主义的冒险：当代思想家间的对话》^②对它进行了系统的讨论。约翰斯顿认为，先验唯物主义意欲打通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唯心主义、精神分析、生命科学和当代哲学等思想资源，重新把握先验与经验、象征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等等之间关系，为激进政治的可能性提供新的解释，它的代表人物有齐泽克、巴迪欧、马拉布、米纳尔、哈格隆德、康利纳和班尼特等人。这一理论可称为双面一元论，即所有实在性中都包含着先验的假定性或构成性，客观性自始至终都与主观性立场有关，直接达到物自体是不可能的，通向物自身的路必然具有

① Slavoj Žižek, *Absolute Recoil: towards a New Founda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Verso, 2014.

② Adrian Johnston, *Adventures in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m: Dialogues with Contemporary Thinker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了主观性的间隙，而这一间隙处于“自为”（for us）和“自在”（in itself）之间。在先验唯物主义中也存在着分歧，其中，昆丁·梅拉苏（Quentin Meillassoux）与齐泽克的分歧具有代表性。梅拉苏是巴迪欧的学生，他反对当今哲学中占主流的后康德立场，即客体与主体的关联主义。思辨实在论是一种取向于客体的哲学，先验实在论认为存在着“前人类的实在”（pre-human reality），这与当今流行的怀疑论相反。怀疑论认为，一切性质和存在都是主观的，所谓的物的第一性质实际上与第二性质没有区别。梅拉苏与其老师巴迪欧一样相信，数学的真理是对独立于人的主观性的客观实在本身的知识。^①而齐泽克认为，人们不可能直接接触“前康德”的实在本身，离不开先验的图式和象征结构，我们就不可能把实在。精神总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中包含着精神，实体与主体是同在的。在先验唯物主义中，我们既不是自由选择主体，也不完全是由命运支配的客体，主体的存在受到客体的先验束缚，但主体与客体之间总是存在着断裂和不一致。正是这种主体与客体之间不可避免的断裂，构成了政治的可能性。

安德鲁·布赫瓦尔特的《辩证法、政治学与黑格尔实践哲学的当代价值》对黑格尔哲学的性质及其与马克思的思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他认为，黑格尔的思想不是对事实性存在的自鸣得意的概念表达，而是对历史已经达到的道德意识和主体性的重建式说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不是外在批判，而是内在批判。“不像与无政府主义、青年黑格尔派、康德和自然法理论家的乌托邦式批判，内在批判不是用异于理性的原则，而是用内在于现实本身的原则来评估现实。”^②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思想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别。他们都把概念与现实的关系作为哲学的核心问题。在黑格尔那里，哲学是把现实提升到概念的“翻译”过程，在马克思那里，哲学是概念下降到现实的“翻译”过程。马克思与黑格尔都强调社会批判的历史情境性，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同质性辩证法，强调现实应该趋同于概念，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异质性辩证法，但是，这两种辩证法不是对立的，“试图把思想与存在的异质性结合进理论框架，但是，这种

① Quentin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y*, trans. Ray Brassier, Continuum, 2008.

② Andrew Buchwalter, *Dialectics, Politics, and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Hegel's Practical Philosophy*, Routledge, 2012, p.50.

批判分析如果有意义的话也预设着存在与概念、理性与现实的同质性。”^① 布赫瓦尔特上述观点对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有重要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中，权力与资本的关系是一个核心问题，M. 马萨拉特对这个问题做了思考。^② 他认为，没有纯“逻辑的资本主义”，只有“历史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生存环境中包含自然的给予物、前资本主义结构的遗迹、既存现实中的权力潜能等三方面因素，而在其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前两种要素逐渐丧失了构成性影响，第三种要素变得越来越重要。资本主义自命其统治不是建立在以直接压迫，或暴力占有剩余产品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所有商品自由交换的基础上。但是，这种交换并非是平等的交换，而是以权力的垄断为前提的交换。作者把权力理解为一切为了实现自身的意志或利益而拥有的垄断社会资源的可能性和能力，包括对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制度权力与文化媒体的合法性权力的垄断。^③ 资本主义受制于两种相互对立的逻辑，权力逻辑遵循着垄断的逻辑，资本遵循着竞争的逻辑，权力的本性是追求稳定和秩序，而资本提本性是“破坏性创新”，因此，现代资本主义在结构上是矛盾的。大体上来说，近 30 年来资本逻辑越来越让位于了权力的逻辑，它构成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

《资本论》的哲学基础及其意义一直受到关注，柯林尼科斯在《解码资本：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命运》^④ 中指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思想就从实体存在论转变到了关系存在论，这一关系存在论构成了《资本论》对商品拜物教的基础。拜物教是把崇拜的对象视为抽象的形式，而不是具体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们崇拜的是物的经济形式或社会规定，破除拜物教需要从抽象的价值形式回到具体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对资本的揭秘在于，他揭示了资本主义一切价值形式都是物的抽象形式与具体关系之间的微妙平衡。关系本体论是《资本论》的基础，而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又为其他拜物教和意识形态提供理论范式。

① Andrew Buchwalter, *Dialectics, Politics, and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Hegel's Practical Philosophy*, Routledge, 2012, p.57.

② Mohssen Massarrat, Macht im Kapitalismus, in: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93, März 2013.

③ Vgl.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93, März 2013, S.59.

④ Alex Callinicos, *Deciphering Capital: Marx's Capital and its destiny*, Bookmarks Publications, 2014.

总的来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哲学领域还没有提出像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那样的突破性理论创新，但取得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思想和新理论。

五、政治经济批判新视野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资本作为一种抽象物对社会的统治越来越受到关注。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现实抽象”（real abstract）的研究及其方法论思考，对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在马克思的实验室中：〈大纲〉的批判诠释》^①文集中，罗伯托·芬奇（Roberto Fineschi）在《马克思资本概念抽象的四个层次》一文中提出，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有四个层次的抽象：零度抽象（zero level），简单循环中的抽象；第一层次抽象，资本作为普遍性（generality）的抽象；第二层面抽象，资本或作为特殊性（particularity）的抽象；最后的抽象，资本作为单一性（singularity）的抽象。到了最后的抽象层次，就达到了黑格尔所说的“具体普遍性”。马克思在自己的研究中充分参照了黑格尔的逻辑学，既探讨了资本主义的“现实抽象”，也把抽象作为把握资本主义结构和过程的思想工具。克里斯托夫·阿瑟在“抽象劳动的实际真理”一文中指出，马克思非常重视现代社会抽象统治的特征，而且把抽象劳动作为解释的基础。马克思从不认为商品的价值来源于抽象劳动，更不会说价值来源于具体劳动。马克思的“抽象劳动”不是具体劳动的概念抽象物，而是指一种抽象形式的实在。黑格尔曾把普遍性区分为具体普遍性和抽象普遍性，具体普遍性通过特殊性表现自身，而抽象普遍性则通过否定特殊性来遮盖其特殊性。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是具体普遍性，价值是抽象普遍性。资本主义社会是价值统治，而不是使用价值统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抽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基础。霍华德·恩格斯斯基兴（Howard Engelskirchen）在“《大纲》中的资本概念”一章中指出，“价值”、“资本一般”在马克思文本中具有双重性质，它们既是经济学范畴，又是社会本身的客观存在。政治经济学中抽象范畴不仅是一种观念形式存在的概念，而且是现实本身的真

^① Riccardo Bellofiore, Guido Starosta and Peter D. Thomas eds. *In Marx's Laboratory: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rundrisse*, Brill, 2013.

实的因果关系和社会过程。认识经济范畴的两重性非常重要，看不到具体事物中的抽象社会规定性会陷入见物不见人的抽象唯物主义，如果只看到抽象形式看不到物的内容就会陷入唯心主义。

在资本主义的一切抽象物中，货币是现代人的上帝，它最为重要。托尼·史密斯在《历史唯物主义》杂志上发表《〈大纲〉中的“一般智力”及其超越》^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标准不是钟表意义上的劳动时间，而是货币，所谓抽象劳动并非指具体劳动之外的劳动，而是指一切劳动都是由同质的、无差别的货币来衡量的。马克思的最重要贡献在于揭示了价值的形式规定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拜物教理论。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本体论优先地位，是支配一切的先验权力，而拜物教的秘密就在于把历史地产生的货币这一价值形式视为永恒和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定性。克里斯蒂安·洛茨在《资本主义的图式：时间，货币和抽象的文化》^②中把货币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比作“图式”在康德认识论中的地位。他指出，阿多诺看到了商品交换原则的作用，但没有看到货币的作用。其实，货币是资本主义的“太阳”，支撑整个社会，作为“现实的抽象”，货币不仅构成社会关系的意义框架，也构成过去与未来之间联系的社会视域。今天通过信用、债务和金融等抽象物，不仅人的想象和记忆日益被整合到货币的抽象关系之中，而且人类生活对抽象物的依赖性将会随着电子产业和脑科学的发展与日俱增，最终把人类欲望逼入只追求利润、增长和货币增长的单一渠道。

巴塔查里亚在《资本的谱系》^③一文中从另一角度研究了抽象统治问题。在他看来，商品拜物教和工资并非仅仅是一个表象和欺骗，还是一种构成性的在场。商品拜物教并非是隐藏了真实社会关系的虚幻形式，而是真实社会关系得以成为可能的构成性条件。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强调拜物教的否定和虚幻意义，没有把握商品、货币、资本、信用等抽象形式的构成性力量。如果看不到抽象物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构成意义，就看不清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

① Tony Smith, The 'General Intellect' in the Grundrisse and Beyo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13-4.

②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Lexington Books, Lanham MD, 2014.

③ Neeladri Bhattacharya, Lineages of Capit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13-4.

安瑟姆·杰普在《索恩·雷特尔和“现实抽象”的起源》^①一文中指出，雷特尔将“现实抽象”概念引入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深刻的，通过这一概念，他成功地解释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康德的先验范畴就是商品的抽象价值，自我意识的统一性就意味着货币的统一性，原初统觉类似于货币交换的综合功能，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等等。在雷特尔那里，资本主义与理性形而上学具有同谋关系，抽象范畴对资本主义的构成意义不是在类比意义上的，而是真实意义上的。但雷特尔的理论也有缺陷，他只承认真实的抽象在流通领域中的作用，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也是以真实的抽象为中介的。雷特尔把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形式对具体内容的统治误读为精神劳动对体力劳动统治的特殊形式，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抽象”的统治来源于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统治，而不是精神劳动对体力劳动的统治。杰普要求把雷特尔的工作再推进一步，以发现“真实抽象”中的资本主义特有的特征和对抗性矛盾。齐泽克说：“‘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裂缝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交换价值遵循着自身的逻辑疯狂跳动，全然不顾人的真实需求。”^②

“现实抽象”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我们不能像雷特尔那样仅仅着眼于对唯心论哲学进行认识论批判，还应该着眼于对当代现实进行社会批判；不能仅仅把研究限制在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释上，还应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抽象的新形式。

六、左翼政治学新视野

正如彼得·胡迪斯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概念》中所指出的，马克思的理论不仅是一种批判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解放理论。当今左翼政治学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和理论界限，其中，后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女性主义是三种最有影响的理论倾向。

① Anselm Jappe, 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 ‘Real Abstraction’: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13-3.

② Slavoj Žižek, *Less Than Nothing: Hegel and the Shadow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2, p.245.

1. 共产主义的“再命名”

当今激进左派思想家的一个共同主张是“共产主义复兴”。2013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希腊症状：债务、危机和左翼危机”讨论会，结合当前形势对“共产主义”理念及其和激进政治策略进行了探讨。

奈格里的文章标题是《民族左翼的终结到为了欧洲的颠覆运动》。^① 该文指出，1989年以来的左翼政治溃败意义深远，当今左翼状况令人堪忧，它们不仅已经放弃了阶级斗争，而且与新自由主义调情。发掘社会现实中的颠覆性力量需要重启斗争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矛盾进行阶级分析。奈格里认为，当今资本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利润主要不是依靠对劳动的直接剥削，而是依赖于金融控制攫取高额回报或租金；当今资本主义也是生命政治的资本主义，它主要不是占有有形的商品，而是占有知识和人的生命。在奈格里看来，当代资本主义有三大矛盾：一是金融系统的超越性与生产的自主性之间的矛盾；二是财产的公共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三是生命-资本(bio-capital)本身的矛盾。基于上述分析，奈格里主张恢复共产主义视角，把颠覆性斗争理解为共同物的政治(a politics of the common)。在当前形势下，这一政治包含着三组斗争策略：面对债务危机，左翼应该采取拒绝还债的策略；面对货币和金融等对社会的控制，左翼抵制货币和金融机制；为创造后资本主义未来，左翼主张共同体化(communization)，在公众参与和首创精神中建立起与共同物相符合的制度，实现自由平等交往条件下的团结。

阿兰·巴迪欧分析了我们时代左翼政治的无能。^② 在他看来，这种无能不是根源于群众的情性、缺乏勇气和对“必要的恶”的忍受，而是革命的理念和词汇的缺乏。虽然最近出现了占领华尔街、阿拉伯之春和希腊反政府抗议等激进运动，但并未产生出真正革命的语言和理念。与半个世纪前不同，“阶级斗争”、“总罢工”、“革命”、“秘密行动”、“人民专政”这些词汇都成了贬义词，“共产主义”也被当作“集权主义”的同义词。巴迪欧承认我们需要批评斯大林主义和苏联，“但这种批评必须是我们的，它应该培育我们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帮助它们进步，而不是走向某种郁闷的放弃，就像把历史的洗澡水与小孩一起倒掉一样。”为了使左翼摆脱“无能”状态，巴迪欧重申了“共产主义”和“人

① Antonio Negri, From the end of national Lefts to subversive movements for Europe, translated by Olivia Lucca Fraser, *Radical Philosophy*, SEP/OCT 2013, pp.26-32.

② Alan Badiou, Our Contemporary Impotence, *Radical Philosophy*, SEP/OCT 2013.

民”概念的革命和解放意义。

巴迪欧认为，共产主义概念今天具有四种含义：(1) 由于“自由”和“民主”在今天已经与私有财产紧紧地铆在一起，按照《共产党宣言》，必须彻底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在此是分析和批判现实的一个视角；(2) 按照马克思的解放理想，未来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私有财产和寡头统治是不必要的，共产主义在此是一个历史假设；(3) 资本主义统治是全球性的，反抗这种统治的革命政治也应该是世界性的。马克思说：“全世界的劳动者团结起来！”共产主义在此意味着一种政治组织原则；(4) 最后，真正的解放是完全摆脱财产权和等级制的限制的完全平等，共产主义意味着这样的目标和理想。显然，巴迪欧在此对共产主义概念的阐述超越了他以前的思考，更好地把握了“共产主义复兴”的意义。

与“共产主义”被污名化相似，在当今时代，“人民”往往被等同于“群氓”和“暴徒”。为了拯救左翼政治，除了要为“共产主义”正名外，还需要为“人民”正名。巴迪欧认为，人民有四种可能的意义：在种族意义上，人民与法西斯专制国家相联系；在国家和法律意义上，人民与西方议会民主国家相联系；在民族解放意义上，人民与民族国家的建立相联系；在平等主义解放政治意义上，人民与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系。在最后一种含义上，人民指任何被官方和主流体制排除在外的多余的人，因而，他们解放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的普遍解放。巴迪欧强调，真正意义的人民是不能由政党和国家来代表的，相反，作为共产主义的主体，人民的使命就是消灭国家和政党，凡是以人民的名义强化党与国家统治的观点，都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重新理解“人民”概念也是巴利巴尔的兴趣所在，他《如何解决“欧洲人民”的悖谬？》一文^①中对“欧洲人民”的悖谬性做了分析。最初“人民”概念有两个所指，一是“族群民族”(ethnic nation)；二是“公民民族”(civic nation)，它们分别对应于古希腊的 *ethnos* 和 *demos*。随着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出现，这一概念有了更多的含义：一是“公民共同体”；二是“民族”；三是“群众”；四是指具有共同命运和使命的理想集体。巴利巴尔认为，“欧洲人民”是悖论性的，欧盟有共同的法律，却没有与之对应的“欧洲人民”。欧洲面临的难题

^① Etienne Balibar, How can be the aporia of the 'European people' be resolved? *Radical Philosophy*, 181, SEP/OCT, 2013.

是，欧盟范围内并未出现一个政治参与意义上的集体的“欧洲人民”，而原有国家的公民权又由于欧盟的出现被削弱了。巴利巴尔认为，ethnos和demos之间关系不是互补的，而是对抗的，“因为demos事实上指的是‘公民共同体的建构’”。^①按照积极公民权衡量，欧盟是一个“不合法的合法性”机构。在这里，合法性不限于韦伯所说的合法性，即政权有能力贯彻自己的法律和政策，而且还包括人民是否拥有对一切与自己生活条件有关的决策施加有效影响的能力。按此标准，“欧洲人民”有名无实，这不是因为欧洲人民还不是一个族群民族，而是因为它还不是一个公民民族。欧洲问题的解决需要使欧盟从一个法律共同体转变为民主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

朗西埃近年来在思想界非常活跃，其中他提出的“后民主”（post-democracy）概念受到很大的关注。“后民主”概念最先是朗西埃在《政治的边缘》中提出的，它指一种“以民主的名义去取消民主”状态。朗西埃的理解与社会学家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相似。在《应付后民主》（2000年）中，克劳奇认为，“后民主”不同于前民主，虽然与前民主一样，后民主社会是非民主的集权的，但还保留了民主的形式。如何走出后民主困境？朗西埃主张区分“民主制”和“民主化”。民主制指一种体制，在此体制下我们可以在法律上谈论“公民共同体”意义上的“人民”（demos）统治，而民主化则指公民在政治参与中形成的积极公民权。依据上述分析，“后民主制”是一种只有没有民主化的民主制。朗西埃承认，即使是形式的民主也是意义的，民主制和民主化之间存在着语义循环，没有民主制不可能出现民主化，而没有民主化也没有真正的民主制。为解决这一悖论朗西埃诉诸辩证法。民主总是有一定的开端，但不停留在开端，“它是通过创造自己的主观和客观可能性，通过向前发展来定义自身的。”^②因此，民主制只能在民主化的不断努力中发展。

在共产主义理论热中，朱迪·迪恩的新著《共产主义的视域》^③也有自己的特色。她认为共产主义概念有6种可能的意义：苏联体制的名义；一种现实运动；人民的主权；共同品或公共物；彻底平等的理想；苏联式共产党。作为一

① Maria Kakogianni and Jacques Rancière: A precarious dialogue, *Radical philosophy*, 181, SEP/OCT, 2013. p.14.

② Etienne Balibar, How can be the aporia of the ‘European people’ be resolved? *Radical philosophy*, 181, SEP/OCT, 2013. p.17.

③ Jodi Dean: *Communist Horizon*,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2012.

种政治理念，共产主义要求实现“人民主权”，因此，恢复共产主义视域，就是要恢复人民主权在民主斗争中的核心地位。迪恩把当今资本主义称为“传媒资本主义”，它通过网络和传媒技术把形式的民主与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对人类的集体欲望和需要进行专政。左翼政治应该着眼于重构集体的欲望和想象，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其局限性，但它恢复了美国左派的活力，使表达和重构集体欲望成为一个现实的选择。《共产主义视域》是一部非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左派著作，它把共产主义解释为激进民主政治，用“我们其余人”与少数富人的斗争来取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朱莉·艾默斯（Jule Ehms）在该书的书评中所说：“《共产主义视域》值得向非马克思主义的左派——也许可以向占领运动的积极分子推荐。而对自己那些仍在追问‘为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人来说，在这本书里是找不到答案的。”^①

约翰·罗伯特的《共产主义的两个名字》是一篇系统讨论当今左翼共产主义话语的文章。在他看来，当今左派中虽然出现了“共产主义复兴”，但其内部存在着一系列分歧，其中包括在“哲学的共产主义”与“政治的共产主义”之间、“少数派共产主义”和“多数派共产主义”之间、“出离的共产主义”与“自我扬弃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分裂。如果看待共产主义在多维度上的两个名字，是一个有价值的选题。

共产主义话语的复兴可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如居塔里和奈格里的《像我们这样的共产主义者》、雅克-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的《非功效的共同体》都是那个时代的作品。新世纪的共产主义热是由巴迪欧领导的。共产主义复兴是对它的“再命名”。这一现象的出现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苏联式的“现实共产主义”不仅不能代表真正的共产主义，它在官僚、政党与人民之间造成了分裂，“当前与共产主义观念和遗产的再介入和再理论化极其强烈地意识到这种分裂是政治革新的条件。”^② 二是为了与自由民主派立场相区别，激进左派需要自己的政治标签，而共产主义概念由于其内涵的复杂性受到了欢迎。

然而，新的共产主义话语是内在分裂的。第一组分裂是“政治的共产主义”与“哲学的共产主义”的分裂。“哲学的共产主义”可追溯到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2008），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思辨左派”（post-Marxist specula-

^① <http://marxandphilosophy.org.uk/reviewofbooks/reviews/2014/980>.

^② John Robert, The two names of communism, *Radical philosophy*, 181, JAN/FEB, 2013, p.9.

tive left), 巴迪欧把共产主义定义为超历史的永恒的哲学假设, 认为共产主义概念只有退出历史状态, 作为思辨假设才能保持其纯粹性和彻底性。“政治的共产主义”以奈格里为代表, 他强调共产主义是彻底的阶级斗争立场和工人自治要求的表达, 共产主义作为现实的运动包含在后福特资本主义的历史现实之中。然而, 这种分裂是不幸: “为共产主义哲学之名而放弃共产主义政治之名就是放弃共产主义本身。依赖共产主义的哲学命名来更新政治是广泛的政治危机的症候。哲学必须允许共产主义在被命名为一种政治, 而政治有必要强调它作为政治的自主性。”^① 共产主义者面临着既保持其理念内涵的确定性又保持其现实性的任务。

第二组分裂是多数派共产主义巴迪欧式的“少数派的再命名”(minoritarian renaming) 和奈格里式“多数派”命名之间的分裂。巴迪欧并不依赖多数人的实践, 它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假设。奈格里认为, 工人阶级实践就是它再命名的条件, “正如马克思教导我们的, 共产主义直接产生于阶级对抗, 产生于拒绝工作和工作的组织。”相对于清教徒式的巴迪欧理论, 奈格里是一个乐观主义多数派。奈格里的立场表明, “共产主义再命名为一个政治名称由今天工人创造条件的。在这里没有必要重新发明‘政治与哲学的新关系’, 因为在系统意义上, 工人的劳动将为这项工作奠定基础。”^② 但是, 奈格里的理论也有自己的抽象化局限性, 他的工人阶级是独立于国家和政党的, 它只能产生出软弱无力和分散的反抗政治。

第三组分裂是“出离的马克思主义”(exit-communism) 与“自我扬弃的共产主义”的分裂。“出离的马克思主义”有巴迪欧、奈格里和法国“共产主义理论”派, 自我扬弃的共产主义则是更正统的观点。“出离的共产主义”持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t) 和后政党立场, 它要求共产主义与现实完全决裂, 拒绝与现实一切妥协。正如“共产主义理论”宣言所强调的: “阶级的同一性再也不能把自身建立在以工资和需求为基础的斗争基础上, 并把它们作为革命行为的序曲。无产阶级的同一性只能是这样的行动, 它在消灭一切使它从中分离出来的事物时的同时消灭自身。”与出离的共产主义立场相反, 自我扬弃的共产主义理论强调, 共产主义不能从外面引入某种原则或力量, 只能是无产阶

① John Robert, The two names of communism, *Radical philosophy*, 181, JAN/FEB, 2013, p. 10.

② John Robert, The two names of communism, *Radical philosophy*, 181, JAN/FEB, 2013, p. 12.

级对自己地位和生存状态的自我否定。正如艾斯泰安（Bruno Astarian）在《危机活动与共产化》（2011）中说：“只有一个危机的革命出路（exit），这就是无产阶级把它的反对资本的斗争提升到建立现实的实践情境的水平，此情境中取消阶级关系和克服价值和经济。”^①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新共产主义已经成为激进政治的标志性符号，但这些理论没有真正地解决好理论与实践、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革命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没有真正提出一个既具有规范吸引力又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共产主义理论。

激进左派的共产主义概念虽然与全球化以来的群众反抗斗争密切相关，但其理论和政治弱点是很明显的。理论上它依赖于后现代主义，政治上它依赖于无政府主义。正因为如此，激进政治学受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质疑。凯文·安德森在《抵抗还是解放：福柯、马克思和马尔库塞和现时刻》^②、《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后重思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等文章指出，激进政治学更多是一种抵抗的政治学，而不是解放的政治学。我们今天需要回到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立场，在社会生活中寻找体现黑格尔式具体普遍性的斗争力量和形式，在多元的社会运动与普遍的人类解放之间建立起辩证的联系。当今激进思想家流行的是福柯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它们把社会矛盾理解为无处不在的权力冲突，把政治斗争理解为无目标的反抗。然而，抵抗不等于解放。并非所有的抵抗性质上都是同样的，右派对国家的抵抗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抵抗。如果没有新的革命主体的成长、新的普遍解放的视野和人的观念的出现，即使是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活动也不具有解放的意义。

安德森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激进左派的批判对我们认识它的局限性有一定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反抗资本主义，而且要提供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更好社会，否则马克思主义就无法从反抗的政治学转变成解放的政治学。

2. 无政府主义

就政治立场而言，大部分激进思想家都是无政府主义，他们既不信任苏联式国家和政党，也不相信自由国家和议会制度。无政府主义有广泛的影响，有

① <http://libcom.org/library/crisis-activity-communisation-bruno-astarian>.

② Kevin Anderson, Resistance versus Emancipation: Foucault, Marcuse, Marx, and the Present Moment, *Logos: A Journal of Modern Society and Culture* 12:1 (Winter 2013).

学者指出，“至少在欧洲和美国，无政府主义现在已经获得了马克思在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运动中曾经的地位。作为核心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它是观念和灵感的来源，甚至对那些并不认为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来说，也会感到自己需要界定自己与它的关系。”^① 无政府主义的复兴既有理论原因也有政治原因。从理论上说，任何人类解放理想中都包含着无政府主义的因素，从实践上说，当今新社会运动，包括最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有无政府主义的特征。近年来，无政府主义者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无政府主义：理论与实践》、《没有上帝没有主人：无政府主义文选》、《无政府 - 工团主义：理论与实践》、《乔姆斯基论无政府主义》、《自由至上的无政府：反对国家》、《翻转的革命》。也有一些专门杂志问世，如《文化研究中的无政府主义发展》、《当代无政府主义研究》等。

无政府主义往往被看作政治思潮，在经济学上没有影响，但韦恩·普赖斯（Wayne Price）在《激进理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无政府主义导论》中试图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做无政府主义的介绍。普赖斯自称是“自由至上马克思主义”（libertarian Marxism），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各有所长，“就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而言，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好于其他理论，也包括无政府主义的经济思想。”但就后资本主义的社会愿景来说，无政府主义要优于马克思主义。^② 在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概念》一书的评论^③中，普赖斯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关心的是如何夺取政权，而不是建设的新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坚持，除非我们有更好的未来，否则不会轻易地打破现在。普赖斯同意胡迪斯的观点：我们时代需要我们发展出一种比马克思时代和马克思本人的更清晰和明确的资本主义替代理论。^④ 在完成这个任务中，无政府主义可以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帮助。无政府主义者对无国家、无货币的经济如何组织、社会如何运行有许多思考，它们可以结合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之中。

2011 年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召开了一次题为“无政府主义转向”的会

① *The Anarchist Turn*, Jacob Blumenfeld, Chiara Bottci, Simon Critchley (ed), Plute Press, 2013.

② Wayne Price, *The radical Theory: An Anarchist Introduction to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Oakland CA: AK Press, 2013, p.2.

③ Wayne Price,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Anarkismo.net, Nov. 18, 2013.

④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Chicago: Haymarket, 2013, p.215.

议，相关文章以同名著作的形式于2013年出版。该书的编者在“导言”中提出，无政府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回避的激进意识形态，如果说1870—1910年是无政府主义的第一波发展，今天则处在第二波发展之中。他们把2011年视为“无政府主义转向”年，这一年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在此运动之前，无政府主义被当作思想的丑闻，在此之后它已不再是贬义词了。无政府主义理论受到许多误解，它往往被等同于极端个人主义和唯我论。其实，无政府主义不是唯我论，只是强调社会共同体中个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无政府主义政治学是一种“友谊政治学”，友谊既不要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从属，也不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对抗。友谊是建立在平等和个人自主性基础上的团结。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不仅有共同基础，这就是对个人自由和自由联合体的强调，而且能相互纠正对方的弱点。阿尔贝托·托斯卡诺结合自己的经验谈到，“我的余生将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但是我们这代人找到的是通向它的错误道路。你们一代有责任发现一条不同的道路。”^① 无政府主义不能取代共产主义，但可以帮助它找到自身实现的更好方式。

无政府主义的核心特征是反国家主义，但是否任何情况下，国家都是反动的？著名的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在《巴勒斯坦、国家政治和无政府主义困境》中对此问题做了处理。表面上看，以色列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与巴勒斯坦人争取建立国家是对立的，前者是反国家的斗争，后者是为了国家而斗争。但以色列无政府主义有义务倾听和尊重巴勒斯坦为民族自决权而进行的斗争，即使这种斗争是要求建立国家。这一意味着无政府主义不是抽象的教条，应该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进行调整。

3. 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不仅是性别理论，也是一种政治立场。在女性主义理论家中，南希·弗雷泽是风头正健的理论家，她在2013年出版的《女性主义的财富：从国家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② 不仅当今女性主义困境做了独特的分析，而且对未来的出路提出自己的看法。弗雷泽认为，20世纪新左派运动兴起之际出现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追求女性的解放，而

① *The Anarchist Turn*, Jacob Blumenfeld, Chiara Bottci, Simon Critchley (ed), Plute Press, 2013, p.187.

② Nancy Fraser, *Fortunes of Feminism: From State-Managed capitalism to Neoliberal Crisis*, Verso, 2013.

且还与其他激进运动一起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特征提出质问。但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与后现代主义文化中，女性主义从解放政治转向了认同政治，这种转向在政治上是暧昧的。女性主义认同政治虽然也对现实秩序提出了质疑，但它的斗争已经与反对资本主义和更广泛的解放运动脱钩，陷入多元主义的万花筒之中。但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危机的到来，女性主义出现了重新激进化的迹象。今天的女性主义应该充分发掘早期女性解放运动的理想和潜在力量，与其他平等主义运动相呼应，也暗含着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新结合。弗雷泽的著作可以说是把再分配与承认关系的讨论推广到女性主义内部，代表着她的理论发展的另一里程碑。

《马克思论性别与家庭：一个批判性研究》^①既是一本文献学研究的著作，也是一部思想性著作，作者希瑟·布朗试图研究马克思本人对性别和家庭的思想，并把他与恩格斯的思想做了分析上的区分。布朗承认，尽管马克思作品没有完全清除掉男权主义痕迹，但在性别和家庭上还是提出了具有巨大价值的思想洞见。马克思的著作比恩格斯的著作更辩证地解释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在女性压迫和解放中的作用。在见证了妇女在巴黎公社这样重大事件中的作用后，马克思越来越支持了女人在工作场所、工会和共产国际中对平等的诉求。马克思对女性和家庭的研究大量地参照了当时人类学和历史学成果，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家庭的历史特性，并将性别视为变革和发展的主体，而非社会变化的消极被动的载体。马克思对性别和婚姻的辩证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它克服了激进女性主义的生物决定论，也避免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经济决定论。

女性主义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有广泛影响的交集性（Intersectionality）理论，“交集性”概念最先是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于1989年提出的，1990年美国社会学家科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把它引入到黑人妇女研究，从此以后影响广泛。交集性理论具有后现代特征，它强调每个族群或个体都是不一样的，有不同的族性、阶级、性别、性征等特征，影响妇女生活和地位的压迫、统治和歧视等体系之间是相互交错的，女性主义理论应该放弃任何一元论或同一性原则，关注多元因素或体系的交集性效果。科林斯对交

^① Heather Brown, *Marx on Gender and Family: A Critical Stud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ook Series, Haymarket Books, 2013.

集性理论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冲突。她本人的研究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在“黑人的政治经济学”（2000）一文中，她从消费种族主义、性别等级制、劳动市场中不利地位的交集性来把握黑人妇女的特殊经验，认为“独特的家庭/工作的连接（nexus）影响着黑人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模式”。

但是，爱娃·米切尔（Eve Mitchell）认为，交集性理论虽然扩大了女性主义研究的范围，但仍然依赖于资产阶级的认同政治学。在《对交叉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中她指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人类历史发展三要素，即需要满足手段的生产、需求自身的发展、人的再生产和他的需要的满足，为理解为妇女地位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基础。妇女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她总是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个妇女意味着某种特殊的事情；而且对2013年的一个女同性恋来说更是特殊的。”不论是父权制还是种族化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存在抽象的认同，也不存在抽象的交集性，因此，“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我们不能再依赖资产阶级理论去澄清今天的任务。对女性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为妇女而斗争也是为人类而斗争。”^①米切尔想建立独立于资产阶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女性观，但她的理论并没有真正超越交集性理论。妇女的现实地位总是由多重因素交互性作用造成的，交集性概念把握了这一特征。关键不是如何看待交集性概念本身，而在于以恰当的方式来运用这一概念，在具体的时空中把握各种要素的交叉关系。

七、艺术与政治

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领域之一，最近有一些有趣的话题：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悲剧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等等。

在当今左翼思想家中，朗西埃对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有独特的理解，2013年的中国行引发了一阵“朗旋风”，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生产》第8辑收录了他多篇文章，^②大致可以了解朗西埃的独特思路。朗西埃在美学上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一是把平等概念推广到感性和智力领

① Eve Mitchell, I am a Woman and a Human: A Marxist-Feminist Critique of Intersectionality Theory.

② 《生产》第8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

域，认为审美自由与平等是人类解放理想的重要内容；二是强调审美内在地与政治是统一的，在本雅明之后对审美辩证法提供了新的框架。朗西埃认为，审美不是乌托邦，而是异托邦，它异于日常生活或伦理秩序，又非处在现实的彼岸，艺术以审美的方式悬置了社会要求，为个性解放提供了真正的场域。

阿明和斯瑞夫特的《政治的艺术：左翼的新开场》^①也讨论了艺术对政治的意义。他指出，在左派的主流话语中，政治概念往往是狭隘的，只是实现公正和正义的工具。正是这种对政治的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解释使许多人远离政治。阿明和斯瑞夫特指出，政治并非仅仅是对策略和设计 and 手段的计算，它需要以试验的眼光、丰富的想象去构想更好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正如卡斯托里亚迪斯在《社会的想象建制》中所强调的。就培养政治想象和创造性而言，艺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社会历史层面，正是社会想象建构了主体行为的动机和需要，激励集体变革现实的行动以及自由和平等制度的建立。作者认为，有三种政治艺术特别重要，它们是鼓励发明、撬动组织和动员群众的艺术。成功的左派运动总是能够超越传统政治，并打开新的政治能动性。

贡国著名哲学家托斯卡诺的一篇讨论悲剧与政治关系的论文值得重视。克拉克 2012 年 (T.J.Clark) 在《新左翼评论》上发表了《献给没有未来的左翼》一文，^②把悲剧归结为人性的有限性：“我们知道，悲剧是对人性状态的悲观主义。它的主题是痛苦和灾难，人性中不断出现的暴力，暴力与法治和社会约束之间异乎寻常地难以调和。”这种观点把悲剧的出现归结为人性的暴力与法治状态的对立，归结为一个人类无法克服的形而上学处境问题。托斯卡诺在《悲剧中的政治》一文中^③强调，从黑格尔、马克思到 C.R.L. 詹姆斯、威廉斯，都反对把悲剧还原为人的理性或生存有限性的结果，而是认为悲剧内在于集体的政治行动结构之中。正如大卫·斯柯特 (David Scot) 在《现代性的被征用者》中所强调的，悲剧之于现代性的意义在于，我们不可设想一个外在于现代性矛盾的无矛盾的立场。在悲剧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悲剧与革命的关系。一些人虽然承认悲剧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但却从中得出否定革命的结论。大卫·斯柯特说：“政治观念的开明和伦理 - 政治行动应更少地依赖于革命的英雄主义

① Ash Amin and Nigel Thrift, *Arts of the Political: New Openings for the Left*.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② T.J.Clark, For a Left with No Future, *New Left Review*, 74, March-April, pp.53-57.

③ Albert Toscano, Politics in Tragic Key, *Radical Philosophy*, 180, JULY/AUG, 2013.

和它允诺开始的人类的新生，更多地依赖于对悖论性的反转——这种反转会败坏和挫败我们最珍爱的理想——的接受力。”^①但是，托斯卡诺强调，并非所有的矛盾和冲突都是悲剧性的，而悲剧又非都是消极的。悲剧产生于我们需要做出恰当的决定而又难以做出恰当决定的场合，用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布拉德雷（A.C.Bradley）的话说：“一个人开启了一项进程，却无法衡量和控制它，是悲剧的。”^②

托斯卡诺在文章中也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是悲剧性的：人类的解放需要生产力的发展，但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与生产关系发生冲突，社会的进步总是通过悲剧性的冲突和革命实现的。在卢卡奇的美学思想中，悲剧占据核心地位。在他的早期思想中，人类生活之所以是悲剧在于，历史是人创造的，但却是在人所意愿条件下创造的，由此，“卢卡奇以一种总体的方式展示了行为意图的主观世界和行为结果的客观世界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对立。”^③卢卡奇把悲剧理解为现代性的特征，个人相对于匿名的抽象的交换原则只是退回到毫无意义的内在性之中，悲剧意味着“不可能的伦理生活”。

托斯卡诺认为，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现代悲剧的哲学母体。对于旁观者来说，法国革命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解放，又是无所顾忌的暴力释放。它一方面是追求难以满足的纯粹化逻辑，另一方面又是一种自噬式的“对真实界的激情”。因此，革命将导致悲剧，而悲剧将终结革命。但是，对参与者来说，革命虽然是沉重的，但却是悲壮的。威廉斯在《现代悲剧》中曾说：“我是以一种悲剧的视角来看待革命的。”^④革命之所以是悲剧的在于，它不能不改变社会的基础，而这个过程又是漫长的，并与它反对的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革命成功之时往是也是社会失望之时，因此，悲剧包含着革命的艰巨性中。托斯卡诺不同意恩格斯把悲剧归结为革命阶级的不成熟，他认为革命本身就是悲剧的，革命离不开总体性的视野，而“模棱两可、二律背反和悖论是与总体性的渴望联系在一起的。缺少总体性解放的视野，就不存在悲剧思想”。^⑤

① David Scot, *Conscripts of Modernity: The Tragedy of Colonial Enlightenment*,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NC, 2004.p.190.

② 引自 Albert Toscano, Politics in Tragic Key, *Radical Philosophy*, 180, JULY/AUG, 2013, p.28.

③ Michael Löwy, *Georg Lukacs: From Romanticism to Bolshevism*. Trans. Patrick Chandler. London: NLB,1979, p.104.

④ Raymond Williams, *Modern Tragedy*, Verso, London, 1979, p.75.

⑤ Albert Toscano, Politics in Tragic Key, *Radical Philosophy*, 180, JULY/AUG, 2013, p.32.

托斯卡诺认为，不仅政治是悲剧的，而且悲剧也是政治的。悲剧概念的核心是行为和冲突，而不是痛苦与不幸。悲剧的冲突是无法和解的，矛盾的解决需要革命的跳跃（leap）。正因为如此，最典型的现代悲剧都以革命为背景。悲剧是灾难，但不仅仅是灾难。灾难有两个方面，否定意义上的灾难显现为有权者对无权者的蹂躏、摧残和否定，它给我们带来只是恐怖，最多是引起我们的反叛；灾难的肯定方面在于它是我们的和解情感的来源，包含着和解和建构。巴迪欧在《主体理论》中指出，“悲剧的可能的现代性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主体理论问题。”^①在巴迪欧看来，悲剧的情景不是灾难，而是确立裂缝对秩序回归的抵制。

悲剧的消失是可悲的，没有悲剧的时代是一个沉沦的时代。威廉斯说：“在我们时代唯一充分的意识是面对现实的无序。唯一充分的行动上就是以终结它的方式参与到无序之中。”^②“思考这一新秩序的悲剧，连同资本主义矛盾和它的过渡的悲剧，是任何想探究现实与观念之间紧密关系的政治思想的一项任务。”^③认识到政治的悲剧之维是有意义的，一方面它提高了我们对历史非确定性的意识，另一方面提高了革命可能带来的代价的伦理敏感性。

迈克·洛威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派，他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隐蔽的浪漫因素”。在《论改变世界：政治哲学文集，从马克思到本雅明》^④中，他对卢卡奇、葛兰西、韦伯、马尔库塞、本雅明、布洛赫、托洛茨基、列宁、卢森堡等人的美学和政治思想进行了研究。在他看来，相信历史的铁的规律、劳动和技术的物化、中心化和权威化等观点是危险的，苏联是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反题，它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革命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精神。洛威把自己的研究称为“作为政治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在他那里，政治学不能混淆于对权力和国家的研究，它应该是对城邦（polis）中人类共同生活的可能性和条件的研究。为了把握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的联系，洛威从韦伯那里借用了“有选择的亲缘性”（elective affinity）概念。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与解放神学、历史唯物主义与韦伯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都存

① Albert Toscano, Politics in Tragic Key, *Radical Philosophy*, 180, JULY/AUG, 2013, p.32.

② Raymond Williams, *Modern Tragedy*, Verso, London, 1979, p.81.

③ Albert Toscano, Politics in Tragic Key, *Radical Philosophy*, 180, JULY/AUG, 2013, p.32.

④ Michael Löwy, *On Changing the World: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Marx to Benjamin, Haymark*, Chicago, 2013.

在着“有选择的亲缘性”。在本雅明思想中也存在着韦伯与马克思之间的亲缘性，资本主义是一种宗教崇拜，用资本的规律取代上帝的法律，实际上是把罪责和债务逻辑植入人们的心灵。因此，马克思与韦伯在一定机缘下是可以结合的。思想的嬗变是很奇怪的，韦伯理论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理论，但却成为卢卡奇、本雅明、布洛赫等人的思想来源。洛威强调弥赛亚对阿多诺、本雅明、布洛赫、马尔库塞等人的意义，弥赛亚是过去投向未来的希望之光，革命是资本主义灾难的中止。洛威的著作让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浪漫主义线索。

但与洛威相反，《象征的历险：后马克思主义与激进民主》^①对马克思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布莱克曼指出，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衰退深刻地改变了西欧激进左派的思想风格。为了与主流民主理论调和，后马克思理论家开始拒绝革命、放弃阶级，诉诸于更为碎片化的社会行动模式。他们反对历史决定论和表象主义，强调社会与政治的构建性作用，把政治理解为象征性的符号游戏。这一动向可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从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转向。对浪漫主义及其政治化，黑格尔和马克思是持批评态度的，而后马克思主义者却因为其歧义性和模糊性而大加赞赏。布莱克曼把后马克思主义视为长达二百年来浪漫主义暧昧传统的最亲表现。激进思想家卡斯托亚迪斯、莱福德、墨菲、齐泽克等人虽然试图通过象征概念在艺术与政治、想象与现实、差异与民主之间建立起积极的联系，但他们对现实的分析是非唯物主义的，政治取向是非民主的。以齐泽克为例，他的理论是一种“基督教—布尔什维克主义”（Christian-bolshevism），这种理论混合着对革命的末世论期待和戏剧性翻转局势的领袖的美化，很容易把左翼政治引向危险的方向。

应该承认，艺术与审美是马克思主义解放理想和革命政治话语的重要内容，但没有理性和道德的豁免权，再崇高的艺术、再神圣的审美情感，如果不能有助于自由与民主，就应该被拒绝。

作者：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哲学学院教授

① Warren Breckman, *Adventures of the Symbolic: Post-Marxism and Radical Democra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发展报告
(2014)

美国

林 晖 汪功伟

《科学与社会》杂志在2013年的10月号上刊登了题为“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130周年：对中国《人民日报》的提问的回答”^①的编者按。编者按对于《人民日报》列出的5个问题中的3个进行了回答：（1）卡尔·马克思的生平、社会和政治理论对于今日世界有什么影响和重要性？对此，编者按回答到，由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引发了一阵对于马克思的兴趣。人们从他的书中看到，他所写下的东西似乎在描述今天的世界，描述我们当下的经验。然而，马克思所做的工作绝不仅仅是单纯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他还跨出至关重要的两步：首先，他界定了尽管缓慢但必然出现的挑战资本主义力量的主体——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其次，他展望了后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其基础是在资本主义下发展起来的，包括先进生产力，以及体现在工人阶级中的集体性传统、教育和个性化。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工人阶级就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对于今日世界而言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反映在报纸和媒体的层面上，而是要体现在工人阶级行动的多个领域之中。（2）近些年来，在全世

^① Editorial Perspectives on 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Karl Mark: Answers to Questions from China People's Daily, *Science & Society*, Vol.77, No.4, October 2013, pp.451-458.

界，在美国，在学者、学生和一般公众中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哪些变化？编者按的回应是，对于个人的经验和某些客观真理要加以区分。就编者的立场而言，马克思主义者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是必须与新思想和新运动相结合才能得到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不同的相互竞争的思想的实质，而不是仅仅凭标签来接受或拒绝它们。其实，这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9 世纪 50 年代之后发展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理论。(3) 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什么新的发现，马克思主义对于当前的社会科学和政治实践有何贡献？编者按回答到，在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研究的焦点转向了内部。马克思主义者们发表了越来越多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精致的理论体系，但与此同时，对于用马克思主义来考察当下社会却总是缺乏自信或犹豫不决。不应该丧失批判的目光，目前的急迫任务在于再次将我们的研究转向外部世界，再次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的社会科学和政治实践中的领导地位。

2013 年，美国的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最为关注的问题，除了进一步发掘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批判之外，还涉及经济危机、环境和资源、阶级和剥削、资本和生产效率、社会主义策略、工会与工会运动，等等。下面将从七个方面介绍 2013 年度美国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们所主要关注和研究的一些问题。

一、左翼论坛：为生态—经济转型而动员

2013 年度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仍旧是一年一度的左翼论坛。本届左翼论坛于 6 月 7 日至 9 日在美国纽约佩斯大学召开，主题是“为生态—经济转型而动员”。来自全球的 4000 多名左翼学者、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左翼社会活动家、艺术家齐聚一堂，参加了这一论坛的近 350 场专题讨论会和相关活动。

本届左翼论坛的主题为“为生态—经济转型而动员”。自第一台蒸汽机发明以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资本主义图景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常态，资本主义活动所释放出的变革力量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世界的景观。在为人类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带来丰富产品的同时，资本主义同时带来了空前的风险和危机。本届左翼论坛的宣传海报以一连串短小精悍又发人深省的语句对此做出了描述：“地球与人类处于危急中。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

旱灾蔓延，物种濒临灭绝，这些都是由非持续性的发展和对地球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的。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持续性经济危机用近乎天文数字般的失业率、削减的收入和残酷的财政紧缩措施打击了全世界的劳动者。”与马克思的分析一脉相承，主办方认为，上述彼此呼应的两种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对于增长的无限追求所具有的破坏性本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主办方呼吁：“我们要立刻动员！”

危机同时伴随着曙光，而为人类的未来投下希望之光的，正是在世界各地涌动着的反资本主义和民主抵抗的新型政治力量。按照主办方的说法，我们有理由怀有这种希望，因为“谁是地球的所有者”这个问题正逐渐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对于该问题日益清醒的自我意识将推动左翼抵抗运动走向愈益广泛的联合，左翼论坛本身的包容性对此也提供了旁证：参加本届左翼论坛的人士包括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进步知识分子、学院派人士、公民自由意志论者、环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工联主义者、黑人族群和拉丁族群的自由战士、女性主义者、反战活动家、学生以及与失业、抵押品赎回权丧失、住房不足、学校衰败等进行抗争的人们。数以千计的与会者中既包括诸如诺姆·乔姆斯基这样的学院派异见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也包括诸如奥利弗·斯通这样的曾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的知名导演，还包括诸如玻利维亚副总统阿尔瓦多·加西亚·连纳亚这样的政界人士。

左翼论坛历来的宗旨是将批判新自由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立场联系在一起，试图寻求有别于既定秩序的激进选择。对于上述左翼人士而言，左翼论坛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互相沟通、团结行动的共享空间。而对于2013年的左翼论坛而言，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的联合背景、风起云涌的政治局势，这些则意味着下述若干值得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出现：发生在拉美、美国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斗争所具有的参与式民主、共同体构建和非资本主义等性质能否扩展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运动能否抵挡并破坏新自由主义国家精英与公司资本的共谋？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否做出除了日益残酷的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其他选择？

本届左翼论坛开幕式的发言人为来自纽约城市大学的克里斯蒂安·帕伦蒂（Christian Parenti）、绿党代表吉尔·斯坦（Jill Stein）和来自耶鲁大学的世界体系理论创始人伊曼纽·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从本届论坛近350场圆桌会议、专题讨论和其他相关活动的情况来看，为期三天的讨论涵括了众多的主题，这些主题跨越了不同的维度和论域，涉及到情形各异的国家

地区，其中包括：艺术，文化与日常生活，经济，教育，环境，媒体，种族，宗教，性别与性经验，政治与社会运动，政治经济与当前危机，劳动，监狱 - 工业综合体，食品，住房，健康，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与理论，国际关系，非洲，环加勒比海地区，中国，欧洲，印度，拉美，中东，东南亚，美国政治以及其他相关主题。其中主要的热点问题包括：

1. 政治动员：对象与目标

对于与会者而言，本届论坛的总标题事实上蕴含着这样的问题：“需要动员谁？动员起来做什么？”换言之，也即政治动员的对象与目标到底是什么。围绕这个核心问题又衍生出一系列相关的论题，诸如知识分子的角色、社会大众的意识、社会运动的策略、运动面临的挑战与困境、政治动员的形式等等。在本届论坛中，与这些主题相关的研讨包括：“建立合作型联盟，为激进学者和社会运动之间的政治统一而斗争”，“人民真的需要‘被提升的意识’吗？对于左翼动员的意义”，“制造新自由主义酷儿：阶级、种族和同志民族主义”，“之后的5年，更强劲的5年：从抵抗走向革命需要些什么？”，“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第500年：组织、欲望、共产主义”，“解放之后：权力的承诺与危险”，“动物解放与社会正义”，“反公司的行动主义和进步政策的变迁”，“变革的阻力：政府压制与白人至上主义”，“阶级与历史意识：左派对历史知识的使用和滥用”，“畅想全球运动：参与型社会国际组织（IOPS）是如何与无政府主义、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国际妇女人权相交融的”，“从唐人街到中国：通过组织的方式建立草根团结”，“全球化革命：历史、理论和实践的新视角”，“从等级制到网络：工会和非政府组织能够实现横向水平化吗？”，等等。

2. 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

战争、核灾难、石油泄漏、飓风、大气污染、有毒物质排放等环境公害为生活在21世纪的全世界人口带来了挥之不去的梦魇。因有毒物质和极端生态灾难而造成的疾病与残疾成为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斗争对象，无论身在何处。发生于2011年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于2012年的飓风“桑迪”以及其他所谓的“自然灾害”使得左翼人士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重要性。那么，在面对诸如全球变暖这样的大规模生态危机时，看似束手无策的人们能否介入现实并改变现实？随着环境恶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反资本主义的思想、行动与组织是否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又具有何种特点、何种面貌？对于自身在解决气候变迁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威胁时所遭遇的失

败，左翼对此又要做出怎样的反思？围绕着上述以及其他相关的问题，本届论坛组织了大量的研讨，譬如：“生态危机与环境疾病的灾难”，“迎战生态变迁：桑迪和福山时代的二十世纪能源”，“生态社会主义：来到你我身边”，“失败的策略：就左翼对气候变迁和经济危机的回应而展开的批判性对话”，“资本主义与国家：对环境、社会保险和经济的考察”，“气候正义：新兴运动所面临的挑战和前景”，“离开化石燃料——投资我们的星球”，“生态资本主义与‘绿色经济’的神话”，“环境种族灭绝：政治和公共健康”，“非政府环保组织与阶级战争：劫掠公有物”，“从绿色新政到全球变迁：绿色工作，去军事化和经济重建”，“我们如何在地球上生活：从经济的视角看”，“人道的发展途径与资本主义式发展的对比”，“帝国主义与生态”，“本土化我们的范式：重建神圣的可持续性”，“存在生态上可持续的他种选择吗？下一个体系中的民族、计划和市场”，“对化石燃料的疯狂榨取：我们起而反抗，我们怎样反抗”，“为城市的灵魂而斗阵：构建都市的国际前景”，等等。

3. 次贷危机后的政治经济变革

2013年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的第五个年头。期间的结构性调整措施在美国已经造成了新的政治经济情势，并导致了本世纪最富有意义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公司抗议活动。2008年的金融危机似乎是资本主义积累的转折点，而寻求经济体制的变革历来是左翼人士所关切的核心问题，那么，对于次贷危机之后的全球政治经济情势而言，全球资本主义将何去何从？是否会出现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合作模式？它们又具有怎样的政治内蕴？这些问题自然构成了本届论坛的关注点，与此相关的研讨包括：“制造全球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危机：五年之后”，“构建工人合作与进步社会运动之间的策略性联盟”，“碳的价值理论：新千年的历史唯物主义”，“激进思考的复兴和共产主义问题”，“资本主义的秘密支柱——土地控制和债务—货币：奴役我们的两个体系，以及我们如何对此做出改变”，“经济合作的艺术”，“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策略”，“缩减金融资本：为什么？怎么做？”，“重造美洲的城市：知识，技术，空间实践”，“通过参与型预算重建民主”，“马克思的革命政治学：从蒲鲁东批判到哥达纲领批判”，“工业发展局（IDAs）：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举措下的行动主义机遇”，“畅想社会主义美国的生活”，“生物资本主义：关于身体、生物学和科学的批判性视角”，“异端的责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等等。

4. 劳工运动的发展前景

2011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的口号是：“我们代表社会的99%，我们不再忍受那1%的贪婪与腐败。”“99%”的劳工运动一方面以新的政治经济情势为背景；另一方面又推动着政治经济变革走向深入，其中蕴含的巨大政治能量可能会引领我们最终超越资本主义。那么，劳工运动发展的最新特点是什么？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劳工运动各自具有怎样的表现？劳动本身又拥有哪些新的形式？这些问题也构成了本届论坛内容的其中一部分，与此相关的研讨有：“经济正义的基础：低工资劳动者，前进！”，“‘占领你的工作场所’集会：组织一场新的劳工运动”，“论农场工人的斗争和今日的农业”，“衰退，种族主义和美国劳工阶级的变迁”，“反击：芝加哥教师工会的胜利及其对劳工运动的经验教训”，“食品相关产业中的团结研究”，“食品运动的激进潜能：可持续性，正义和健康”，“红绿交融：只有击败资本主义才能阻止生态灭绝”，“妇女，工作和女性主义的未来”，“女性主义劳工运动是/将会是怎样的？”，“走向绿色的工会：通往能源民主的新框架”，“后亚当·斯密资本主义”，“有别于移民改革的激进选择”，“不要更多的老师，不要更多的书本：学生—劳工的获胜策略做出反击”，“同伴组织：孕育下一场劳动反叛”，“走向网络的劳动：劳动形式、价值与‘生活本身’之中的技术变迁”，等等。

5.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左翼思想和运动最重要的理论资源，但左翼思想和运动所借助的理论资源并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因而，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左翼思想之间的关系也是与会者密切关注的领域。与此相关的专题研讨包括：“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其哲学的缺陷、边缘还是必需？”，“马克思主义和关于自我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危机：要赢得的世界”，“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敌人抑或盟友？”，“辩证唯物主义与新物理学”，“国家理论及其实践取向”，“关于单向度社会的理论，气候崩溃的幽灵，以及社会变迁的前景”，“战斗青年运动和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和战争时代中相互竞争的女性主义诉求”，“当代毛泽东思想以及激进政治学”，“没有马克思的革命？卢梭及其左翼追随者”，“出走：打破监狱和父权制：罗素·马龙·萧茨的生平与时代”，“存在于过去的新世界：在今天运用无政府主义史”，“激进的根基：北美的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为灾难而组织起来——失控的全球变暖 and 共同体赋权的策略”，“非政府组织，发展，以及问责制的难题”，等等。

本届论坛也围绕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社会运动的发展召开了相关的专题研讨。论坛于2013年6月9日落幕，闭幕式以全体成员会议的形式展开。在这场会议中，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家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德国反体系理论家塔奇奥·缪勒（Tadzio Mueller）以及玻利维亚副总统阿尔瓦多·加西亚·连纳亚（Alvaro Garcia Linera）对本届论坛做了总结性的评论。

二、2013年部分著作简介

1.《防止恶政：陪审团，集会，选举》（*Securities Against Misrule: Juries, Assemblies, Elec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作者：乔·埃尔斯特（Jon Elster），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罗伯特·莫顿社会科学”大学讲座教授。

这部著作提出了某种关于集体决策的规范性理论，这一理论受到了杰瑞米·边沁的启发，但不包括他的功利主义哲学。我们常常会认为，假设我们知道什么是良好结果并且知道何种制度能够保障其实现。埃尔斯特则否定了这两种假设。该书的核心观点在于：在设计民主制度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地降低私利、激情、偏见和偏好对于决策者的影响，顺其自然。任何机制都无法保障可以被单独界定的良好结果，也无法保证可靠地选出决策者。该书考察了集体决策理论，尤其是社会选择理论，还详细阐述和讨论了边沁的观点，并且讨论了陪审团、集会的构成，以及选举制度的发展。该书设计大量的案例研究和历史事件，从修昔底德和普鲁塔克直到今天。同时，该书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法学的研究之上的。

纽约大学的伯纳德·马宁（Bernard Manin）教授评论到，乔·埃尔斯特的著作提供了某种关于制度设计的全面理论，即应用于集会、陪审团和许多其他方面的制度。这一理论是简洁有力的：在组织协调各部分的过程中，目标无法促成最好的结果，但却可以为做出良好决策而清除障碍。埃尔斯特界定了这类障碍：自利、激情、偏见以及偏好，同时也描述了将这些障碍的影响降至最低的手段。这部精彩的著作将成为我们关于制度讨论的重要参考。

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阿德里安·沃缪勒（Adrian Vermeule）教授则评论到：关于集体决策的规范理论存在着两个问题：过度的数学抽象，以及过度的狭隘

主义。埃尔斯特的这部著作，综合了各种研究路径的优势，同时又避免了它们的缺陷，这要求对于制度决策的历史拥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同时对于社会科学有广泛的把握。这部著作的成功之处在于：既有细密的理论研究，又有生动而具体的案例分析。这是一部任何想研究制度设计的人所必须参照的不可或缺文献。

2.《阿尔都塞和他的同时代者：哲学的永恒战争》(Althusser and His Contemporaries: Philosophy's Perpetual War, Post-Contemporary Interventions,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2013)

作者：沃伦·蒙塔格 (Warren Montag) 洛杉矶西方学院英语及比较文学教授。

《阿尔都塞和他的同时代者》一书，改变并且扩大了我们对于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路易·阿尔都塞和法国哲学的理解。自 1990 年阿尔都塞去世之后，他在不同时期留下的数千页的未出版手稿被公之于众。通过对阿尔都塞遗著和未出版手稿、讲义、通信以及批注的细致研究，沃伦·蒙塔格彻底重新评估了阿尔都塞的哲学研究。蒙塔格提出，这位理论家的研究与他的同时代者们是紧密相关的，尤其是与福柯、德里达、德勒兹以及拉康的思想联系最为密切。蒙塔格把阿尔都塞的哲学看做是与他的同行们的哲学的一系列遭遇，他认为，阿尔都塞的主要哲学交锋是围绕着下面三个主题展开的：结构、主体，开端与终结。通过对阿尔都塞对于其同时代者的解读的阅读，蒙塔格重新阐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和 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思想中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那些非凡的时刻。

巴黎第十大学的艾蒂安·巴里巴尔 (Étienne Balibar) 教授对这部作品的评论是：沃伦·蒙塔格再构了阿尔都塞在政治和哲学的危险地带的旅程，向我们展示了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引人入胜的学术轨迹，同时也阐明了他与“法国理论”的主要作品之间的相互作用。蒙塔格的解释纠正了许多传统的对阿尔都塞的解释。《阿尔都塞和他的同时代者》一书，是一部独立的哲学创作作品，这部作品对于我称之为否定的末世论的东西进行了勾勒，而这种否定的末世论无疑是阿尔都塞留下的最令人激动的“侥幸的”遗产。

3. 《女性主义的财富：从国家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Fortunes of Feminism: From State-Managed capitalism to Neoliberal Crisis*, Verson, 2013)

作者：南希·弗雷泽 (Nancy Fraser)，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与政治教授。

南希·弗雷泽的这部新著追溯了 20 世纪 70 年代后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并且展望了某种激进的、平等主义的女性主义思想和行动的新阶段的到来。在新左派风行一时之际，“第二波”女性主义起而争取女性解放，并且与其他激进运动一起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特质提出质问。但是，女性主义随后所陷入的身份认同政治，却标志着其理想活力的衰退，并且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相关。在此书中，弗雷泽预言了女性主义运动的某种复兴。她指出，某种复兴了的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应该能够回应全球性经济危机。在争取经济民主化的斗争中，女性主义应该充分发掘早期女性解放运动的理想和潜在力量，成为一股能与其他平等主义运动相呼应力量。

法兰克福大学的阿克塞尔·霍耐特 (Axel Honneth) 教授评论到，南希·弗雷泽是属于批判理论传统并且能够在 21 世纪赎回批判理论的历史遗产的为数不多的思想家之一。

伦敦大学的琳妮·西格尔 (Lynne Segal) 教授评论到，南希·弗雷泽试图使我们回复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无畏精神。她分析了根除剥削和压迫这一目标的实现的可能性，并且就如何组织和调动女性主义的潜在活力用以对抗新自由主义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得出了令人激动的结论。

4. 《马克思论性别与家庭：一个批判性研究》(*Marx on Gender and Family: A Critical Stud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ook Series, Haymarket Books, 2013)

作者：希瑟·布朗 (Heather Brown)，西菲尔德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希瑟·布朗的这部著作是仅有的一部研究马克思关于性别与家庭的观点的著作，该书按照 21 世纪的关注点对上述主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尽管马克思在他本人的著述中所表现出来的男性至上主义常常是超出这个词汇本身的含义的，但布朗的相关研究却能提供新的解读角度。布朗在书中详细考察了马克思关于性别问题的著述，以及在 1879—1882 年的笔记中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与性别的论述，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论点。

巴里·希利 (Barry Healy) 在《国际社会主义复兴》杂志中撰文评论到，

毫无疑问，这部精彩而涉及面广泛的著作作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新一波女性主义提供了基础，并且为那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去重新评估他们的思想观念开辟了某种途径。

5.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指南》(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Volume 2, Verso, 2013)

作者：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纽约市立大学教授。

自20世纪20年代大萧条之后规模最大的经济危机并没有真正结束的迹象，而马克思的著作仍然是我们在今天理解这个导致衰退的循环性危机的关键。近40年来，大卫·哈维讲授《资本论》，并撰写与之相关的论著，是世界上研究马克思思想的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在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研究和近期的一系列相关讲座的基础之上，大卫·哈维将他的关注点转向了《资本论》第二卷。他撰写这部著作的目的就在于将他对于《资本论》的深刻理解传达给更多的读者，用那些吸引人的却常被忽视的文本来引导读者们。他对于《资本论》第一卷的解读主要关注的是生产问题，而第二卷则关注资本是如何循环的，是如何通过购买和出售来实现价值的。对于每一位试图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获得更为充分理解的读者而言，这部著作都是不可或缺的。

加拿大学者娜奥米·克莱因 (Naomi Klein) 评论到，大卫·哈维在他的研究领域内激发了一场革新，并且激励了一代激进知识分子。

埃德温·希斯科特 (Edwin Heathcote) 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评论到，哈维这部著作表达的是其一贯的左翼知识分子立场。

理查德·森尼特 (Richard Sennett) 则评论到，哈维是一名持激进立场的学者，他的著作中毫无新闻业的陈词滥调，而是充满了事实和审慎思考。

6. 《卡尔·马克思：作为教育家的革命者》(Karl Marx: The Revolutionary as Educator, Springer, 2013)

作者：罗宾·斯莫尔 (Robin Small)，奥克兰大学教育哲学教授。

《卡尔·马克思：作为教育家的革命者》一书将马克思作为一名激进的教育思想家来介绍。该书描述了马克思自己的求学和受教育情况，从而让我们看到他对于教育问题的兴趣是与他自己的相关经验密不可分的。斯莫尔对于马克思思想中的教育主题做了如下阐述：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的角色，教育对于人类发展的贡献，以及未来社会中教育的特征。斯莫尔把这些主题置于历史情境之中加以考察，并且与对于教育政策的公开论证相联系。该书作者认为，马克

思通过他的研究将教育界定为工人阶级前景的关键因素。这一许诺为他的涉及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作品增添了新的维度。马克思对于教育的讨论是与他作为理论家的和政治活动家的特质相匹配的，教育主题为他的许多重要观点提供了进行某种批判性应用的可能。该书作者还考察了马克思关于英国工厂学校的著述，他使用的文献源自学校督学的相关报告，源自他那个时代的教育运动，这些运动导致了现代公共教育体系的建立。该书的最后一章涉及马克思对于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的思考，同时也表明了这些思考实际上与 21 世纪同样有关。

7. 《放任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 (*The Failure of Laissez Fair Capitalism*, Clarity Press, 2013)

作者：保罗·罗伯茨 (Paul Craig Roberts)，乔治敦大学政治经济教授。

《放任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一书对 21 世纪正处于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之中的经济学理论和媒体阐释而言，都是重大的挑战。由于离岸生产加工和专业服务工作，美国的企业抑制了消费者收入的增长，抑制了美国经济的基础，使得大量人口陷于债务问题。放宽管制会使得收入和财富集中于更少的人手中，金融性企业则“大而不倒”，从市场约束中解脱金融企业，强迫美国和欧洲的纳税人负担银行的损失。一旦经济学家们拒绝将自然资源的消耗算作成本，而企业将它们的生产活动施于环境之时，环境的破坏便会加速。通过阅读，这部著作的读者会明白是什么使得西方世界会最终屈服。

迈克哈德森 (Michael Hudson) 评论到，保罗·罗伯茨以他独特的方式描绘了关于自由市场的修辞模式是如何勾勒出令人震惊的资产剥离的可怕后果的，这种资产剥离过程则是通过私人银行以及由它们控制的政府的支持完成的。

约翰内斯·马鲁舒兹克 (Johannes Maruschzik) 在该书的德译本序言中写道：毫无疑问，这部基于经验的、充满理论性挑战的著作是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8. 《象征的历险：后马克思主义与激进民主》 (*Adventures of the Symbolic: Post-marxism and Radical Democra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作者：沃伦布莱克曼 (Warren Breckman)，宾夕法尼亚大学现代欧洲思想史教授。

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的衰退深刻地改变了西欧激进思想的风格和实质。为了建立更为健康的民主理论与民主行动的形式，许多重要的理论家开始拒绝革命，放弃阶级而诉诸于更为碎片化的社会行动模式。他们承认社会与政治的构建性作用，他们试图选择“象征”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外来彻底改造左翼思想。追随梅洛-庞蒂的辩证法冒险——这一思想在 20 世纪中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重新评估——沃伦布莱克曼批判性地重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后果中那些值得深思的经验。关于象征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动态的和复杂的，它不可思议地回应了早期德国浪漫主义的思想，而后者第一次推进了关于象征主义和象征域的概念。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公开批评过浪漫主义的非现实性和含糊性姿态，而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则对由浪漫主义首次认识到的歧义性和悖论的丰富的潜在可能性充满激赏。布里克曼勾勒出了当代思想家们关于象征的不同观点，深入考察了他们试图协调激进的、民主的政治主体与某种政治的努力，这种政治对于社会的理解并不以唯物主义的理解为准则。通过对于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科内利乌斯·卡斯托利亚迪斯、克劳德·莱福德、马塞尔·戈舍、尚塔尔·墨菲以及斯拉沃热·齐泽克的解读，布莱克曼将这些重要的理论家置于两百年的欧洲思想传统之中，并且扩展了他们与当前的政治行动主义之间的关联。

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的马丁·杰（Martin Jay）教授评论到，这是一部适合于不同读者的著作，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法国理论的爱好者、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文化中象征的角色感兴趣的人文学者，同时这部著作也无疑将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典范性文本。

康奈尔大学历史系的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教授则评论到，布莱克曼的作品对于象征概念的使用、滥用以及废弃等问题提供了一个颇具权威性的考察。他在书中的分析是审慎而多维度的，并且特别关注了后马克思主义、“语言转向”以及类似梅洛-庞蒂、阿尔都塞、鲍德里亚、卡斯托利亚迪斯、莱福德、列维-斯特劳斯、拉康、戈舍、拉克劳、墨菲以及齐泽克这些人。布莱克曼对于这些理论家的思想的阐释并没有限于仅仅描述，而是与他们展开对话，并将这种对话带入现实的政治问题情境之中。

三、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危机与反思

随着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日益深化其对我们生活世界的负面影响，美国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形态以及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入。2013年《科学与社会》、《重思马克思主义》、《批判》、《每月评论》以及《外交事务》等刊物组织了一系列文章继续展开对这一焦点问题的讨论。

来自金斯顿大学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教授斯蒂法诺·阿尼奥莱托（Stefano Agnoletto）在《科学与社会》2013年10月号上发表了题为《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病理性的还是修复性的？》^①的论文，从全新的角度讨论了周期性危机这一传统话题。阿尼奥莱托认为，自从最近一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见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出乎意料的复兴，这些理论对于更深入地理解当前危机背后的现象做出了部分的努力。由于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为当前的危机提供了更好的解释，故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能够在公共辩论中取得一种恰当的霸权地位。一种“关于周期性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可以建立在如下观念之上：周期性危机并不被视为市场机制的病症，而是其运行方式的自然结果。把危机理解为资本主义增长中的结构性因素，这能够增加我们对于现实的知识。进一步说，关于危机的文献资料包含着不同的要素：实物的与金融的、一般的与偶然的、周期性的/循环的与长期的/系统性的；而如若对这些要素做出综合，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洞见——危机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积累随随便便的搅扰，而是必要的修复手段——则是必需的。

《每月评论》2013年4月号上刊登了经济学者迈克·亨利希（Michael Heinrich）的论文《危机理论，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以及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研究》^②，该文是他于2014年出版的《马克思与资本主义危机：解释与干预》一书中的部分内容。亨利希在本文中探讨了作为经济学家的卡尔·马克思关于1865年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是如何发展的。根据他的

① Periodic Crises in Capitalism: Pathological or Restorative? *Science & Society* October 2013, Vol.77, No.4, pp.459-485.

② Crisis Theory, the Law of the Tendency of Profit Rate to Fall, and Marx's Studies in the 1870s,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April 2013, pp.15-31.

观点，马克思的信件，以及他的某些不太知名的草稿能够阐明其经济思想的变化，而他主要作品的多个版本并没有把这种变化反映出来。本文尤其关注了马克思关于信用的思想和利润率趋于下降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的。其他的主题包括剩余价值、经济崩盘、竞争和生产力。

来自波特兰刘易斯与克拉克学院经济系的马丁·哈特-兰兹伯格 (Martin Hart-Landsberg) 在《每月评论》2013年10月号上发表了题为《得自冰岛的教训，资本主义，危机和抵抗》^① 的论文。哈特-兰兹伯格在论文中探讨了始于2008年10月的冰岛经济危机，并且分别论述了资本主义阶级动力学与新自由主义问题、增长与危机、抵抗、国家干预与复兴、金融政策、货币政策、住房政策、社会政策、改革的限度、冰岛经验的教训等问题，涉及的主题包括自由化和私有化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中扮演的角色，资本主义内部的阶级动态作为1944年后精英控制冰岛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一个方面，以及冰岛主要银行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等等。

《重思马克思主义》2013年10月号上则刊登了一组纪念朱莉·格雷汉姆 (Julie Graham) 的专题文章，题为《后资本主义遭遇阶级与共同体》。^② 该专题的编者艾斯拉·埃德姆 (Esra Erdem) 来自柏林的艾利斯-萨罗曼应用技术大学，他为本组专题撰写了导言《后资本主义遭遇阶级与共同体》。在导言中，埃德姆指出，朱莉·格雷汉姆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地理学家，长期以来也是《重思马克思主义》集体中的成员。埃德姆在文中介绍了为纪念朱莉·格雷汉姆而出版的专题论文集集中第一部分的一些稿件。该专题论文集尤其关注格雷汉姆和她的同事凯瑟琳·吉布森 (Katherine Gibson) 对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做出的重要贡献，以此表明她们的工作是如何以特定的方式持续性地启发当下学界的。该文还介绍了“吉布森-格雷汉姆”批判左翼理论和政治中存在的“资本中心主义”，并且讨论了她们对经济多样性的构想是过程导向的、也是跨学科的。她们以合乎伦理的方式将共同体和经济联系起来，这些都被认为是对本专题所收录的其余四篇论文有所启示的理论要点。

此专题刊登了来自厄勒姆学院经济学与和平研究系的乔纳森·狄斯金

① Lessons from Iceland: Capitalism, Crisis, and Resistance,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October 2013, pp.26-44.

② Symposium in Memory of Juie Graham: Postcapitalism encounters with Class and Community, *Rethinking Marxism*, Volume 25, Number4, October 2013, pp.463-533.

(Jonathan Diskin) 的论文《主体性如何带领我们穿过阶级，抵达共同体经济》。狄斯金认为，朱莉·格雷汉姆曾做出了非常大胆的思想探索，而狄斯金关注的则是这一工作得以可能的方式，即把阶级置于“共同体经济”这个更加广阔的场域内，从而改变了阶级分析的坐标。这一面向探究、知识和社会活动的崭新场域是主体与经济表象汇合的地方，它是经济主体性的领域；在其中，我们实施着经济，而经济也置身于我们之中。这一新的问题域由阶级分析而得以可能，但它也对作为“切入点”的阶级提出了一些挑战，这些挑战既是针对关于经济的知识的，也是针对作为政治行动之目标的共产主义这一构想的。狄斯金的论文即是探寻这些联系，并考察它们所指明的出路。

该专题的另一篇论文出自丹佛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乔治·德马迪诺 (George DeMartino) 之手，题为《对失控世界的伦理性经济参与》。在论文中，德马迪诺指出，在面对一个人们希望加以改变的世界时，有些理论分析会把自己表现得完备无缺，而政治规划则常常是建立在这种理论分析之上的。这种说法对右翼和左翼的很多规划都适用。相反，朱莉·格雷汉姆则对这种完备性观念表示拒绝。她的拒绝实质上使得学院实践的伦理维度变得更为复杂了，而这对一些想要提倡某些关乎经济解放和正义的规划的学者来说尤为如此。此外，就我们如何对一个失控的世界做出伦理性的参与而言，吉布森-格雷汉姆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愿景。这种实践是基于神学家沙朗·韦尔奇 (Sharon Welch) 所谓的“风险伦理”的，而非基于“控制伦理”。

第三篇文章的作者是来自格林菲尔德大学的列奥·黄 (Leo Hwang)，标题是《重新思考创造性经济：利用参与式行动研究发展艺术家和艺匠的共同体经济》。作者认为，艺术家和艺匠在创造性经济的可持续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参与式行动研究发端于吉布森-格雷汉姆和詹妮·卡梅隆 (Jenny Cameron) 的工作，以及朱莉·格雷汉姆在先锋谷对共同体经济所做的研究。“重新思考创造性经济”这一项目运用参与式行动研究，论证了一种合作性的研究方法何以能够把通过剥削艺术家和艺匠而取得的发展重新用作在经济上受到挑战的共同体灵丹妙药，用作一种有助于建立后资本主义环境的工具。这个项目提供了一个有利于茁壮成长的文化环境，在其中，创造性的表达受到珍视与接纳，对多种经济的坦率包容使得一种得到改善的生活质量在可能性与现实性两方面都得到提高。因此，这将会有利于更广阔的共同体，而这些也是对艺术家和艺匠的特殊才能与策略加以提倡的重要方式。

来自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伊桑·米勒（Ethan Miller）为专题撰写了题为《共同体经济：指向激进民主经济组织的本体论、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论文。米勒认为，吉布森－格雷汉姆的“共同体经济”观念并不是为一种单一的后资本主义政治命名，而是一种将许多不同的元素融为一体的多价的术语。发展一种极端民主的方法，从而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去构想我们的生活，这是一种在今天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尝试；其中之一便是可以通过对上述那些不同的元素加以区分、探索它们的联系和张力而得到澄清和强化。在该文中，米勒对吉布森－格雷汉姆的“共同体经济”所做的解读像是借助于一个棱镜，折射出三个组成部分——本体论、伦理学与政治学。而且，由于“共同体经济”和“凝聚力经济”是对当前的激进民主经济组织的表达，因此作者通过对这两者的比较性探索，把上述三者置于沟通彼此的某种对话之中。建立非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是一项复杂的伦理和政治的工作，而共同体经济理论则是一组参与和加强这一工作的概念工具；通过对上述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与互补关系做出一番梳理，作者希望能对共同体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

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和保罗·巴兰（Paul Baran）是美国著名左翼期刊《每月评论》的创始人，他们合著的《垄断资本》一书是二战后西方世界最重要并且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之一。2013年该刊物出版了主题为“垄断资本”与“传播”的7月和8月号^①。

在本专辑中，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合写的文章题为《垄断资本的文化机构》。在该文中，福斯特与麦克切斯尼指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大部分民族和国家中的媒体都已经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支配性的作用。左翼也越来越关注传媒在实现社会变革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在过去的40年间，“传播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果斐然的研究领域。这种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播媒体本身的资本主义结构以及它是如何创造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产品的。两位作者认为，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的《垄断资本》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研究了这一主题，尤其是没有最终完成的论文化的相关章节“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品质：文化和传播”已涉及到文化、传播和心理健康等

^①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Jul/Aug 2013, Vol.65, Issue 3.

问题。两位作者考察了布莱希特、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机构的概念，考察了米尔斯、汤普森和威廉姆斯关于文化机构的观点，并且讨论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与文化和媒体的批判，最后还介绍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至今的新左翼对于传播的态度。

该专辑还刊发了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的那篇未发表论文《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品质：文化和传播》。他们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图书出版和广播电视传播这两个领域对于社会的文化品质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力。这两大产业的商品化程度极高，文化产品的数量急剧增加，质量则在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文化并没能培养和完善心智、趣味和行为举止，反而带来了心智的恶俗化、趣味的低下以及行为举止的粗鄙。就图书出版，斯威齐和巴兰在该文分别中讨论了作为衡量社会文化水平的指标的图书的数量和质量、图书产业发展的内在困境；就广播电视，他们讨论了广播电视产业的高度垄断和谎言充斥的现状，并且指出人们越来越认清了社会文化机构所传达的内容的虚假性，而这导致了虚无感以及犬儒主义的蔓延。社会文化应当承担的责任是采取知性说服、审美表述或是道德诉求等形式来提升人们对于现实的理解能力，并且拓宽人们的视野，发展人们自身的潜质。

本专辑还刊登了另两位已故学者的文章。其中一篇选自著名学院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①一书，题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播》。米利班德在该文中讨论的主题包括：大众传媒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新闻报纸的政治保守主义和反工会观点，以及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新闻客观性问题，等等。另一篇则是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传播中存在的其他选择》，该文最初是由费边社出版的一部手册，作为系列丛书“六十年的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涉及的主题包括市场体制对英国大众传媒的影响，新闻报纸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以及读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在新闻的经济健全程度中所具有的重要性，等等。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为本专辑贡献的另一篇文章是其著作《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阐明》的第二版导言部分的内容。该文同时也是对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的著作《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

①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Merlin Press, 2009.

序》所做的回应。福斯特在文中所讨论的主题包括：经济停滞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关系，巴兰和斯威齐的著作《垄断资本》所引起的争论，关于哈利·布劳韦尔（Harry Braver）的著作《劳动与垄断资本》所论述的马克思经济学中劳动和金融资本之间的关系，当代帝国主义向金融垄断的转型，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等等。

《科学与社会》2013年7月号上题为《大衰退与美国资本主义的状况》^①的文章的作者是来自德国卡塞尔大学社会科学系的玛利亚·伊凡诺娃（Maria N.Ivanova）。伊凡诺娃在文中提出，2007年夏始于美国抵押贷款市场与证券市场的恐慌与随之而来的准萧条，触发了对“国家回归”的某种广泛期待，当然这种期待最终落空了。公共政策并没有再次启用可将金融重新导向公共利益的受监管资本主义，反而向财政紧缩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那些相信国家有能力保护资本主义不受自己（再次）侵犯的人并没有看到，大衰退并不只是经济下滑，也是一次积累性的危机，这次危机的多个维度均涉及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总体性，换言之，经济危机同时也意味着国家政策的危机和制度本身的危机。作者分别讨论了美国经验的特性，资本、国家与规范社会的永恒梦想，此次危机与大萧条为什么不同以及如何不同，美国社会的前景，等等。

四、阶级、剥削、生产效率与社会主义策略

阶级、剥削、生产效率与社会主义策略这类问题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关注的主题。在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持续加深的情形下，美国左翼学者重新拾起了这些话题，并且试图通过对新的社会现实的分析考察来重新发掘这些主题的丰富内涵，为走出经济危机和制度性困境探求新的路径。

2013年1月号的《科学与社会》上刊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的萨拉·默翰德西（Salar Mohandesi）的文章，题为《阶级意识抑或阶级构成？》^②。默翰德西的文章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阶级或许是最为核心的概念。但同时，阶级概念也是最为模棱两可的概念之一。造成理解这一概念的困难，部分

①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the State of American Capitalism, *Science & Society* October 2013, Vol.77, No.3, pp.294-314.

② Class Consciousness or Class Composition? *Science & Society*, Vol77, No.1, January 2013, pp.72-97.

源于马克思创造性地既用这个概念指称经济范畴，又指称政治主体。这两种界定之间的张力对于下述两个模型而言具有核心的意义，而这两个模型在历史上又被卓有成效地用来解决这个张力：一个是关于阶级意识的模型，另一个则是关于阶级构成的模型。后者最终成为两者之中更富有成果的模型，虽然最近对于该模型的一些使用，已隐然非常接近于对阶级意识的竞争性模型的某些优点的重新评估了。此外，默翰德西还讨论了意大利独立知识分子塞吉奥·博洛尼亚（Sergio Bologna）论述阶级构成的相关著述。

《科学与社会》2013年10月号上还发表了西班牙圣·路易大学的伦佐·洛兰迪（Renzo Llorente）的论文《马克思的“普遍阶级”概念：一种复兴》。^①洛兰迪认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无产阶级构成了“普遍阶级”，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与社会的一般利益是相等同的，所以在维护和追求其自身的利益时，这个阶级也在维护和追求社会整体的利益。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们常常否定“普遍阶级”的观念，但这个概念事实上既是可行的，又是可以得到辩护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声明的那样：普遍阶级的解放将会导致摆脱一切压迫、支配和剥削的“普遍解放”。这后一个声明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中两个不同论据的支持。第一个论据关注的是从消灭资本主义中得到的、将会有益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好处；第二个论据则强调阶级分化和阶级分层是如何使得其他非阶级的支配、压迫和剥削形式得以可能的。作者分别考察了“普遍阶级”概念、“普遍性”的模棱两可、作为人类普遍解放主体的无产阶级等问题，并提出了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在理论上迫切需要得到阐明的东西。

同一刊物在2013年的7月号上还刊登了来自赖斯大学英语系的金佰利·迈瑟拉洛（Kimberly Macellaro）的书评，评论的是约翰·马什（John Marsh）的《被解散的阶级：为什么我们无法教授或学会如何告别不平等》。^②迈瑟拉洛在文中指出，马什的著作提出的是一个日益严峻的教育问题，尤其是针对当前大量的学院教育无法解决民众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马什在书中要批评的观点即所谓的“教育即答案”，这其实是指我们可以通过对教育的考察

① Marx's Concept of "Universal Class": A Rehabilitation *Science & Society* Vol77, No.4, October 2013, pp.536-560.

② Class Dismissed: Why We Cannot Teach or Learn Our Way Out of Inequality by John Mars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Science & Society* Vol77, No.3, July 2013, pp.431-433.

来弄清造成高失业率和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迈瑟拉洛认为,《被解散的阶级》一书的亮点在于其中对教育理论和教育政策的历史起源的讨论;另一处重点则是严肃地对待关于“教育机会”的讨论,并将这类讨论视作某种意识形态,还解释了为什么它会被左翼和右翼广泛接受。此外,马什对于“教育即答案”的批判,还在于批判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社会阶级,但他本人也并没有把阶级彻底理解为某种社会生产关系;相反,他强化了某种对于阶级的通行的、误导性的理解,即将阶级理解为某种收入档次,从而将问题框定为“收入的不平等”。

2013年3月号的《每月评论》刊登了来自弗蒙特大学弗雷德·马格多夫(Fred Magdoff)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共同撰写的《阶级战争和劳动份额的下降》。^①该文指出,美国的工人处境十分艰难,许多数据显示,尽管失业率已经从最高点止升并且回落到7.9%,但是其中许多人的工作并非全职而是兼职,放弃寻找工作的人数在增加,有近14.4%的劳动力需要全职工作。此外,两位作者还对支付给美国工人的工资和奖金处于下滑或停滞状态做出了探讨,并且注意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劳动份额因始于2008年的经济衰退而下降。与之相关的主题还包括兼职和临时雇佣比例的上升,工人阶级雇员的工资相对于监督和管理人员的下降,以及阶级战争的概念。本文也探讨了持续的失业、收入的再分配以及工会成员数量的下降。在文章最后,两位作者引用了公共电视记者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的话:“我们的商业和政治阶级亏欠我们的更多,毕竟是他们在20年前宣布了阶级战争,他们赢了,他们占了上风。”压低工资和高失业率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现实。

除了阶级问题,剥削的种种形式以及引起剥削的机制问题依旧没有离开美国左翼的批判目光。来自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州立大学经济系的阿勒克桑德尔·布兹加林(Aleksandr V. Buzgalin)和安德鲁·高加诺夫(Andrey I. Kologanov)在《科学与社会》2013年10月号上刊登了他们合作撰写的文章,题为《剖析二十一世纪的剥削:从对剩余价值的传统榨取到对创造性活动的榨取》^②。两

① Class War and Labor's Declining Shares,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March 2013, pp.1-11.

② The Anatomy of Twenty-First Century Exploitation: From Traditional Extraction of Surplus Value to Exploitation of Creative Activity, *Science & Society* Vol77, No.4, October 2013, pp.486-511.

位作者认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具有的四个历史—逻辑“层次”，它们的互相融合构成了现代剥削体系的前提：(1) 雇佣劳动的“经典”机制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攫取；(2) 垄断（超额）利润与金融利润的攫取；(3) 对一部分剩余价值有偏向的社会再分配，以及资本的“扩散”；(4) 与创造性活动相关的剥削关系和对智力租金的攫取，这点特别针对于当前阶段。对创造性活动的剥削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发展而言是最重要的资源。资本主义对于（创造性工人的）智力活动的剥削与“经典”剥削迥然相异。这里的区别涉及到：(1) 对智力租金而非对非剩余价值的攫取；(2) 对人类存在（而不仅仅是他/她的劳动力）的剥削，其条件是(3) 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进一步说，对任何创造性工人个体的剥削同时也是对人类文化整体的剥削，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创造性劳动总是处于与人类文化的对话关系之中。

同期的《科学与社会》上还刊发了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商学院的詹姆斯·瑞弗里（James Reveley）的题为《剥削之网：社会媒体的批判性研究中对马克思的误用》^①的论文。文章指出，有学者认为，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而言，社会媒体的用户受到了剥削；但他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范畴错误。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与保罗·雷伊（Paul Rey）的著作即为一例；作为该论点最重要的两位支持者，他们将社交媒体描述为内在地具有剥削性的。但他们过于匆忙地用“剥削”来分析人们对社会媒体的使用，这种语词的乱用对价值论和解放政治学都有着负面的影响。此外，追随着达拉斯·斯麦思（Dallas Smythe）的作品所确立然而却不幸被忽略了的先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应当从社交媒体影响劳动力价值的的能力入手。从这一出发点出发便可以发现，由雇佣工人对社会媒体的私人使用而导致的剥削增长仅仅作为次一级的结果间接地发生着。进一步说，如果社交媒体在加强组织方面的潜力能够使阶级力量对比向着对劳动有利的方向倾斜，因而就能限制剥削的增长，从而对劳动者有利。

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下，剥削的形式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但土地掠夺仍是种种形式的剥削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每月评论》2013年11

^① The Exploitative Web: Misuses of Marx in Critical Social Media Studies, *Science & Society* Vol77, No.4, October 2013, pp.512-535.

月号上刊登了弗雷德·迈格多夫的文章《二十一世纪的土地掠夺》。^① 迈格多夫认为，土地掠夺，不论是起源于国际跨国公司或是私人投资企业，但都是处于资本主义的核心。各个主权财富基金如今也在这方面新闻不断。比如，2013年7月，哥伦比亚驻美国大使引咎辞职，因为在他的参与和帮助下美国嘉吉公司利用空壳公司囤积了13万英亩的土地。迈格多夫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对土地的剥夺情况，并特别讨论了土地商品化这一现象，这些现象包括：原始积累和针对英国农业土地的圈地运动，棉花种植主在19世纪的强力掠夺，因帝国主义入侵和殖民者定居而导致的原住民迁移，经济掠夺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农业，以及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政策的影响。在文章最后，迈格多夫还指出了21世纪土地掠夺的新趋势，这些趋势包括：(1) 有利于全球性资本的新的国际贸易协定（比如WTO和NAFTA等）；(2) 南半球向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3) 全球金融化和富裕国家投资总部的增长；(4) 在某些地区频繁的干旱与洪水造成粮食产量的下降，因此需要进口大量粮食，这造成了食品价格的提升；比如2008年的粮食危机以及对于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造成的威胁。(5) 欧美国家试图用绿色生物能源来替代传统的液体能源，从而激发了玉米、大豆和棕榈油市场。(6) 重要农业地区蓄水层中的地表水资源的大量消耗，这种消耗远远大于雨水的补充。

对于社会主义的策略、形式和规划的讨论也是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的问题。《重思马克思主义》2013年7月号的“再马克思”栏目，刊登了贝迪托·罗德里格斯·德·莫赖斯·奈托（Benedito Rodrigues de Moraes-Neto）的题为《论劳动过程与生产效率：对社会主义计划的探讨》^②的论文。该文分析了从制造业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假设性过渡。从这种分析出发，作者试图论证，根据马克思的命题，在机器领域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必要的；在制造业内，在生产效率和劳动活动的人性化之间取得平衡是可能的。作者还明确指出，由于泰勒主义—福特主义的本质可被理解为对制造业体系的重新发明，这种最初的假想便以某种方式取得了历史性意义。而苏联在实施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泰勒主义—福特主义的广泛吸收使得自身困囿于上述的平衡，

① Twenty-First Century Land Grabs,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November 2013, pp.1-18.

② On the Labor Process and Productive Efficiency: Discussing the Socialist Project, *Rethinking Marxism*, Vol.25, No.3, July 2013, pp.434-441.

并充斥着泰勒主义—福特主义内在的平庸。作者认为，由小规模工人完成的高效率生产过程，必然使得工人们的工作强度大为提升，工人对于生产的参与程度完全是由劳动活动的内容所决定的。而社会主义计划将终止泰勒主义—福特主义的内在平庸。

《每月评论》2013年4月号上则刊登了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一篇题为《马克思、卡莱茨基与社会主义策略》^①的文章，讨论了利润挤压论、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斯基和卡尔·马克思关于工资、资本主义和经济停滞之间的关系所持有的观点，以及社会主义策略问题。福斯特认为，所谓的“利润挤压”（profit-squeeze）理论，是指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中劳方力量增强，并实现充分就业，而充分就业则引起工资上涨，这会造成对利润空间的挤压，进而导致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福斯特指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工资挤压利润的现象是特殊环境下的产物，比如19世纪早期的铁路修造高潮，这一现象是短暂的，因为尽管货币工资水平的普遍升高会导致利润下降现象的出现，但是资本家完全可以通过增加刚性需求来提高商品价格，从而弥补利润的损失。卡莱茨基在他的《阶级斗争与国民收入分配》一文中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指出利润挤压说是错误的。他认为，由于短时期内的工资上涨并不会对投资和消费的规模产生影响，因此，工资普遍上涨事实上并不会引起利润向工资的急剧转移。卡莱茨基还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在于价格垄断和产能过剩，从长期发展来看，当经济接近充分就业时所形成的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利润规模，将会反哺预期利润。而实现充分就业则必须通过增加政府投资和收入再分配来完成，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就曾说过：“卡莱茨基把通货膨胀看作是一种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

此外，福斯特还指出，卡莱茨基看到了资产阶级会通过政府干预来反对长期的充分就业，甚至制定了“停滞政策”来反对解决失业问题，甚至以牺牲利润为代价来增加产业后备军，最终通过增加失业来挤压工人的工资并对工人增加控制。福斯特认为，卡莱茨基的理论冲破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原理的框架，并坚持只有夺取被资产阶级掌控的社会权力才能真正改变工人处境的观点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① Marx, Kalecki, and Socialist Strategy,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April 2013, pp.1-14.

五、工会与工会运动

工会和工会运动时传统左翼和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的发展策略，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会组织以及工会运动的发展空间一度受到极大的限制，但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化，美国的左翼和马克思主义再次看到了复兴这一运动的希望，尤其是行业工会被寄予了较大的希望。

《重思马克思主义》2013年1月号上组织了一个专题^①，讨论约翰杰学院经济系的凯瑟琳·穆德（Cathrine P.Mulder）撰写的《工会与阶级改造：以百老汇音乐家为例》^②一书。本专题共有4篇文章，专题的组织者为来自西密西根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文森特·里昂·卡洛（Vincent Lyon-Callo）。文森特教授同时也为本专题提供了题为《专业人士，艺术家与工会：阶级改造的推动者？》的文章。文森特在文中指出，30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重建，美国的生活中的许多重大方面已经得到了改变。持续增长的经济不平等、私营部门工会工人百分比的急剧下降、政府信用的下降，以及安全感的丧失，但这些变化还没有真正影响到工作人口的生活质量。但是近年来，紧缩政策已经被当作立法干预的手段，它对于工会还能否继续作为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工人的代言人造成了困难。文森特认为，穆德在《工会与阶级改造》一书中，使用了民族志方法，对一些百老汇职业音乐家的工作生活进行了分析，显然，这些具有特殊技艺的艺术家的就业上的困难与许多职业的雇员所面临的挑战是类似的，他们也把自己看作是有一技之长的员工。工会在这种状况下必然面临重大挑战。如果缺乏工作稳定性是体制性的，如果缺乏工作稳定性会导致参加集体性工作的能力/欲望的下降，因为参加集体性工作就意味着你必须与他人竞争有限的就业岗位，而这一点有与音乐家们感觉自己比其他劳动者更有专业技术，那么，这些职业的、具有较高专业技术的劳动者又怎么能够作为一个阶级而展开行动，以改变遭受阶级剥削的状况？

① Symposium: Unions and Class Transformation: The Case of the Broadway Musicians, edited by Vincent Lyon-Callo, *Rethinking Marxism*, Volume 25, Number 1, January 2013, pp.99-120.

② Cathrine P.Mulder, *Unions and Class Transformations: The Case of the Broadway Musicians*, Routledge, 2009.

本专题的第二篇文章的撰稿者为奥克兰大学社会学系的格雷厄姆·卡萨诺 (Graham Cassano)，文章的题目是《文化工业中的劳动与“误认”》。卡萨诺指出，穆德的研究是以某个处于罢工之中的工会为个案做出的；在穆德看来，唯有再次专注于对剥削的激进批判，才能拯救处在困境之中的工会运动。当她在百老汇音乐家的斗争中看到为工会活动提供新基础的可能性时，她在书中以极强的说服力指出，一系列社会与文化过程持续制造出了一组活跃的专业幻象，这种幻象干扰着劳动斗争和阶级变迁。尽管穆德从未能解决这些矛盾，但她承认了文化工人的独特地位、以及这种地位通常蕴含的职业“误认”的诸种形式，这种承认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驱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她的工作为存在于某一行业的工人之中的阶级剥削提供了一幅完全马克思式的绘图。

本专辑的第三篇文章的题目是《如果阶级改造能够在那儿发生，它就能发生……》，作者大卫·布伦南 (David Brennan) 来自宾州兰卡斯特的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经济系。布伦南在文中认为，穆德的《工会与阶级转变：以百老汇音乐家为例》将新马克思式的阶级分析应用到了百老汇音乐家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上。而他本人则试图与作者的分析中一些关键性要素做出批判性的交锋。穆德的这本书充满了有趣的细节，它们涉及到音乐会组织的方式、复杂的契约安排以及乐池中的音乐家所面临的工作条件。穆德采用了阶级分析法，并提出了一个有利于工会成员的阶级变迁策略，这种分析可以作为未来阶级理论研究的卓越典范。此外，布伦南还指出，穆德将读者们从历史上的工会招新大厅带到了现代管弦乐团的乐池；她描述了百老汇的演出产品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描述了音乐家们在今天所面临的挑战。穆德运用新马克思主义分析 (NMCA) 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对于工会成员的阶级转变而言是一种极为深刻、极富洞察力的策略。

第四篇文章的作者便是《工会与阶级改造》一书的作者凯瑟琳·穆德，这是对前面三位作者论文的回答，她的回应性文章的题目为《工会对资本的抵制与阶级改变的潜力》。穆德认为，在她的这本书出版以后，她仍然保持着批判的态度，并继续思考工会在与资本主义战斗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得益于三位研讨会参与者富有洞见的评论，她将在在此陈述一些新的 / 经过修正的观点。在这本书里，她认为音乐家工会能够有助于百老汇音乐家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阶级改造得以发生。但是，由于工会内部具有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

百老汇音乐家的“圈子”又具有排他性，因而可能存在着比她先前所认为的更为强大的困难阻碍着阶级改造的发生。穆德认为，这本书所描述的只是一小批精英，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具备出色技艺的劳动者，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模式就不能被应用于其他的背景之中。虽然有很多困难，但在帮助工会改善百老汇音乐家的工作环境和其他各种待遇方面，这本书仍然提供了启发。

2013年6月号的《每月评论》，则以“教育与工会运动”为主题，刊登了讨论2012年芝加哥教师工会（CTU）罢工运动的6篇论文。首先是伊利诺伊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的埃里克·葛斯丁（Eric Gutstein）和教育政策系的宝琳娜·李普曼（Pauline Lipman）共同撰写的文章，题为《芝加哥教师工会的复兴与反霸权教育运动的可能性》^①。在文章中，两位作者以芝加哥教师工会为主题，对2012年芝加哥教师工会成员的罢工运动以及它在芝加哥市内更广阔的反霸权教育运动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给予了特别关注。根据他们的观点，芝加哥教育工会的罢工证明了社会运动联合主义的力量的壮大，并且这一运动也从某种角度进一步反映了为抵制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而做出的努力。该文还就关于芝加哥市长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和芝加哥公立学校（CPS）之政策的细节进行了阐述。

该专辑的第2篇文章题为《创立一种社会联合的新模式》^②，作者是芝加哥某高中的罗伯特·巴特利特（Robert Bartleet）。巴特利特认为，芝加哥教师工会在2012年9月罢工行动的成功是对于当前教育改革中的私有化和教育企业化的强有力打击。他在文章中详细考察了位于芝加哥市基层教育工作者核心小组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将芝加哥教师工会的领导模式分析为社会联合主义的一种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芝加哥教师工会2012年发动的罢工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它能够通过发展和表达一种对于教育的共同愿景，从而在社区内建立起联盟。此外，该文还讨论了有关于罢工运动中家长们的支持、芝加哥市长拉姆·伊曼纽尔试图延长教学日的提议，以及工会改革小组“积极行动的芝加哥教师”，等等。在文章最后，巴特利特说到，如果其他的工会也想复

① The Rebirth of the Chicago Teachers Union and Possibilities for a Counter-Hegemonic Education Movement,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June 2013, pp.1-10.

② Creating a New Model of a Social Union,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June 2013, pp.12-23.

制芝加哥的成功模式，那么它们还需要考虑如何真正在联盟内部建立起某种民主机制，不管怎么说，2012年的斗争是社会联合主义的新类型，尽管不成熟，但却为其他斗争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第3篇文章来自罗达·雷·古铁雷斯 (Rhoda Rae Gutierrez)，题为《击败新自由主义式的谴责游戏：教师与家长的团结与2012芝加哥教师的斗争》^①。古铁雷斯在文中探讨了家长与教师之间的合作和团结在发生于2012年芝加哥市的芝加哥教师工会罢工中所发挥的作用，该文还特别描述了作者以家长和行动主义者的身份积极支持芝加哥教师工会的经历。根据作者的观点，家长与教师之间的团结挫败了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者试图划分社区并谴责教师和家長落后的教育水准等做法。该文涉及的其他主题包括学校的关闭，教室的大小，以及芝加哥市长拉姆·伊曼纽尔的反应，等等。

第4篇文章题为《芝加哥教师罢工及其超越》^②，作者是以大卫·开普兰 (David Kaplan) 为笔名的芝加哥教师工会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该文分析了2012年芝加哥教师工会掀起的罢工运动，并特别关注了这次罢工对未来隶属于教育改革和社会正义运动范畴的行动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文章还详细阐述了芝加哥教师工会就组织方式、社会阶级和社会正义所进行的策略选择的相关细节。此外，作者还批判了对公立教育的新自由主义立场，并建议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应当与学校、社区和教师工会合作，为建立受到民主化管理的、致力于开发人类潜能的公立教育系统而努力。该文的其他的主题包括以“基层教育工作者核心小组”而闻名的教师小组，斗争精神，以及家长和学生在教育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等等。

专辑的第5篇文章是《当“老师们想要学生们需要的”：协调教师工作与教师联合主义之间的张力》^③，作者洛伊斯·维纳 (Lois Weiner) 是新泽西城市大学的教育学教授，同时也是《新政治》杂志的编委。在文章中，维纳讨论了教师作为工作者所拥有的权利与他们对学生所肩负的社会及政治责任之间的关

① Beating the NeoLiberal Blame Game: Teachers and Parent Solidarity and the 2102 Chicago Teacher's Strike,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June 2013, pp.24-31.

② The Chicago Teacher's Strike and Beyond: Strategic Consideration,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June 2013, pp.33-46.

③ When "Teachers Want What Children Need": Reconciling Tensions in Teachers' Work and Teacher Unionism,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June 2013, pp.47-56.

系。根据作者的观点，通过聚焦关乎社会正义的工会行动主义，并传达出对于民主的、高质量的教育所持有的共同愿景，教师工会能够避免在上述两种义务之间发生剧烈冲突。文章还详细考察了工会组织的服务和社会运动模式之间关系的相关细节。该文涉及的其他主题还包括新自由主义，美国教师联合会，以及种族压迫，等等。

本专辑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左翼商业观察》杂志的编辑道格·汉伍德(Doug Henwood)和专栏作家丽萨·菲特斯通(Liza Featherstone)共同撰写的，题为《学校市场化》^①。在文章中，两位作者探讨了美国公立学校的市场化趋向，并且特别考察了政府特许学校的生存状态。按照作者的观点，政府特许学校对精英改革者的吸引力在于，它们依赖于私营机构，因此较少地使用公共资源，而这表明，政府特许学校运动可以被部分地加以利用，以降低教师工会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并进而削减教师工资。该文还分析了学校财政、以及贫穷在教育结果中所扮演的角色、芬兰公立教育系统、政府特许学校中的教师流动率，以及2001年提出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等等。在文章最后，两位作者指出，尽管很难用某一个口号来概括这次追求正义的教师运动，但是芝加哥教师工会主席凯伦·刘易斯(Karen Lewis)的话仍然是掷地有声的：他们说每个孩子都应该有选择，但我们说每个孩子都应该有保障！“选择”是市场的语言，而“保障”才是社会正义的声音。

除了关注美国国内的工会与工会运动，国际工会运动的历史，尤其是各个国际工会之间的合作或分歧关系的历史，也是美国左翼关注的主题。《科学与社会》2013年7月号上刊登了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管理与定量方法系的维克多·G·丹维纳兹(Victor G. Devinatz)撰写的文章《国际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冷战解冻？1967至1977年间的国际工会联合会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②在文章中，丹维纳兹认为，在世界工会联合会(WFTU)的西方诸分支机构指出了与马歇尔计划主要的政策分歧之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ICFTU)于1949年从前者脱离出来。在这一组织发展的第一个20年间，国际自由工会联

① Marketizing Education,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June 2013, pp.58-70.

② A Cold War Thaw in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Class Movement?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 1967-1977, *Science & Society*, Volume 77, No.3, July 2013, pp.342-371.

合会拒绝与世界工会联合会之间进行一切形式的合作，宣称世界工联提倡的是一种政治上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而它首要的功能就是宣传苏联的政策。作者认为，世界工联的多元性质涵盖了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各类变种，这至少可以追溯到 1965 年 10 月，因而国际自由工联的立场是不明智的。进一步说，甚至当世界工联秘书处谴责 1968 年 8 月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国际自由工联仍然拒绝合作。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至晚期，国际自由工联和世界工联之间关系曾有过小范围的解冻，这种解冻与国际自由工联改善与共产党领导的世界工联的关系有关，但这种解冻至多是实验性的，微不足道，并没产生什么实质性的结果。丹维纳兹的相关讨论还涉及 20 世纪初的国际工会组织、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形成史、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在处理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工会的关系时的立场，等等。

六、环境、气候与资源

左翼始终坚持将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解读与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病症联系在一起。21 世纪以来，随着环境、气候以及资源问题的日趋严重，美国左翼学者对于造成生态问题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批判也进一步深入。《每月评论》杂志是这一批判的主要代表和主要阵地，这种批判是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理论立场的。

《每月评论》2013 年 12 月号上刊登了两篇讨论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文章，作者分别是该杂志的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来自土耳其安卡拉的毕尔肯大学的丹尼尔·约翰逊（Daniel Johnson）。福斯特的文章题为《马克思与自然普遍代谢中的断层》^①。福斯特指出，在过去的 15 年间，对于马克思的“代谢断层”理论的再次发现，给予了左翼以强有力的依据以对自然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展开批判，是资本的积累导致了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我们要发展的一个更具有内在协调性的生态世界，与此同时，“代谢断层”论也要求超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分裂。福斯特强调，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对于在 21 世纪探讨生态危机和灾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如果我们还试图将人类从由

^① Marx and the Rift in the Universal Metabolism of Nature,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December 2013, pp.1-19.

资本主义的无情的创造性破坏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灾难的边缘挽救回来的话，那么社会的革命性重建的潜在条件，其范围和愿望必须是普遍性的，必须包括全球和全人类。总而言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代谢将始终是一个问题，它是一个关于人类生产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于人类自由的问题。

约翰逊的文章题为《温斯坦利的生态学》。^① 该文探讨了英国 17 世纪由行动主义者杰拉德·温斯坦利 (Gerrard Winstanley) 所领导的社会运动，即掘地派运动，或曰“真正的平等派”运动。约翰逊在文章中特别关注了掘地派哲学对 21 世纪关于环境问题和消费主义的社会运动所具有的重要性。根据约翰逊的观点，在彼时彼地，掘地派强调土地的使用，倡导共同享用资源、而非奢侈浪费的私人消费，因而是独树一帜的；温斯坦利的《自由的法律》一书表明了他的哲学中的激进民主因素，比如他对于全体国家公民进行非宗教教育的呼吁。以温斯坦利为代表的革命思想，是根源于某种激进的生态观点，关注的是通过正当的集体劳动和分享知识实现自我解放。就此而言，掘地派的思想资源对于今天的生态学理论和实践而言都是极为有益的。

福斯特的另一篇讨论资本主义和生态危机的文章刊登在了《每月评论》2013 年 10 月号上，题为《空前的危机》。^② 福斯特在文中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灾难等方面入手讨论了“危机”这一概念。他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正面对着巨大的历史性挑战，不仅遭遇到自大萧条以来的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大萧条，而且被更大的整个星球所面临的灾难所笼罩，这向我们提出了物种，也包括人类自身能否长期生存的严峻问题。对于今日世界而言，最为紧迫的就是建立起对于不断深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僵局与日益加剧的生态威胁之间关联性的了解，后者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副产品。福斯特之所以使用“空前的危机”一词，是因为今天经济矛盾与生态矛盾已经合流，社会的整个物质条件遭到了破坏，因而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向新的生产方式过渡的问题。这一空前的危机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历史上的那些普通的发展危机。福斯特在文中考察了经济层面的危机、生态层面的危机、划时代的革命、马克思意义上的“垄断资本主义”、马克思经济学对理解环境退化的重要性，以及工人阶级

① Winstanley's Ecology: The English Digger Today,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December 2013, pp.20-31.

② Epochal Crisis,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October 2013, pp.1-12.

和环保运动之间潜在的政治联盟等问题。

《每月评论》2013年9月号上刊登的涉及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文章有两篇，其中一篇是《“环境灾变说”的神话》^①，作者伊安·安格斯（Ian Angus）是网络杂志《环境与资本主义》的编辑，也是《人口过剩？人口、移民与环境危机》（Haymarket, 2011）一书的作者。安格斯指出，从2010年10月到2012年4月，在索马里有超过25万人，其中包括13万3千名儿童，死于由于干旱引发的饥荒。有数百万人仅仅依靠食品救济存活。英国气象中心的科学家们评估到，是由于人类活动引发的环境变迁导致了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作者批评了对生态危机的环境灾变论神话，并特别详尽地考察了人类行为对气候变迁影响的范围和内涵。在文章最后，作者指出，需要我们做的还有许多，但第一步是说出真相，说出我们所面临的危机的真相，说出造成这一危机的原因的真相，说出阻止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方法。在谎言盛行的时代，说出真话本身就是一种革命行动。

另一篇题为《化石燃料战》^②，作者是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福斯特指出，仅仅几年之前，不少政府部门、企业以及能源分析者们还都在讨论“廉价石油的终结”和“石油峰值”问题，他们都认为传统原油的持续短缺是由于已知资源的耗尽。而另一些气候科学家们则把传统原油峰值的到来看作是稳定地球气候的一线希望。而在今天，随着某种基于非传统的化石燃料生产的新能源革命的到来，上述一切都急剧改变了。围绕这一主题，福斯特文章中讨论了2013年的化石燃料开发、作为气候变迁之原因的化石燃料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作为化石燃料提炼方法的水力压裂法、美国和加拿大反对建造用以运输来自亚伯达地区的沥青砂的基石输油管线，以及资本主义与作为常规原油替代品的其他能源资源之间的关系，等等。

《每月评论》2013年2月号上则刊登了2篇涉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主题的文章。《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意味着什么？》^③的撰写者是来自中国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的王治河等几位作者。几位作者指出，福斯特的著作《反资本主义

① The Myth of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ism',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September 2013, pp.15-28.

② The Fossil Fuels War,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September 2013, pp.1-13.

③ What does Ecological Marxism Mean for China?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 for John Bellamy Foster,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February 2013, pp.47-53.

的生态学》和《马克思的生态学》在中国具有很大的影响，并且介绍了中国学者对福斯特著作的反应和他们所持的观点。王治河本人曾在2012年2月号的《每月评论》上发表了《中国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文，指出了中国近20年来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的急剧提升，有不少中国学者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在新时代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要资源。在中国提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多重意义，包括实践上的、政治上的和理论上的理由，它们包括：中国所面临的紧迫的环境问题、政府倡导的生态文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之间共有的特点，以及对于中国的环保运动的支持。几位作者还认为，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此次大会关于创建提高能源与资源效率的生态文明的提议，也增强了中国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文章最后，他们提出，中国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相遇，对于唤醒人们的批判精神和唤醒人们对于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关注都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对于唤醒长期以来被置之不理的中国传统的人与自然合一的意识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如果缺乏开放的心态，任何创建生态文明的蓝图都只是空中楼阁。

福斯特在《走向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对话》^①一文对中国学者的观点做了回应，这一回应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中国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前一方面内容，福斯特指出，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替代品，或是看作某种更高级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严重的错误。相反，马克思已经概要性地描绘出了如何将生态与唯物主义的结合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他所提倡的理论与实践、科学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法的本质部分。然而，在20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中的生态学要素被丢失了。今天，我们应该修复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断裂，并把这一修复工作看作是指向修复社会与自然之间断裂的更伟大的革命运动的一个部分。就第二方面的内容而言，福斯特提出，中国自1979年起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与此同时也陷入了对于自然资源的强制性开发，并且依赖利益驱动来刺激投资。但今天情况发生了转变，我们看到了中国所发生的倡导改善生态的

① Toward a Global Dialogue on Ecology and Marxism: A Brief Response to Chinese Scholars,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February 2013, pp.54-61.

运动，比如新农村改造运动。中国在今天所要面临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现代中国社会体系所特有的生态的、社会裂隙的问题。

同一期的《每月评论》上，还刊登了福斯特撰写的另一篇讨论气候变迁问题的文章，题为《詹姆斯·汉森和气候变迁的退出战略》。^① 该文讨论的主题是气候科学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戈达德太空研究所总管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所提出的“气候变迁的退出战略”。作者回顾了所谓的“气候悬崖”（Climate Cliff），科学家用这一概念指称那种认为全球平均温度上升 2 摄氏度将会导致不可逆转之气候变迁的理论。此外，福斯特还讨论了汉森战略的不同方面，包括试图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维持在 2 摄氏度以下的目标，等等。

《每月评论》2013 年 1 月号上发表了弗雷德·迈格多夫（Fred Magdoff）撰写的《全球性资源耗竭》^② 一文，讨论了资源耗竭和全球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迈格多夫在文章中认为，环境学家和科学家们常常提出造成环境问题的两个不同端口：资源与排放。因此，限制经济增长的环境要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原始的物质 / 自然资源的短缺，这是一个耗竭问题；缺少对于工业排放物的充分提取和利用，导致它们对于环境的污染。今天，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更多地转向了排放、气候变迁、海洋酸化、有毒物质的生产，等等。目前有一种说法认为可再生的资源应当替代那些为文明所必需的不可再生资源，但是，即使这个观点能够成立，也只能解决资源短缺问题，不能解决污染排放问题。与此同时，该文还讨论了其他问题，如因对那些日益稀缺的矿物的进一步开采而导致的环境退化，地下蓄水层本质上的不可再生性，政府和私营投资人对土地的长期租赁，生物燃料的生产，外国投资人对非洲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资本主义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等等。

七、回到马克思

马克思的著作始终是当代左翼和马克思主义者重要的思想资源，同时也

① James Hansen and the Climate Change Exit Strategy,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February 2013, pp.1-18.

② Global Resource Depletion: Is Population the Problem?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January 2013, pp.13-28.

为他们观察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经验提供了强有力的批判性视角和理论支撑。

《科学与社会》2013年10月号上刊登了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学术》^①的文章，作者是挪威奥斯陆大学的尤尔根·桑德默斯（Jorgen Sandemose）。该文是对同一杂志在2012年10月号上刊登的一篇由斯派洛·拉帕塔西奥拉斯（Spyros Lapatsioras）和约翰·米利奥斯（John Milios）共同撰写的文章《从〈资本论〉到〈大纲〉的货币概念》^②的回应，那篇文章的主题是比较马克思《资本论》（1867）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中的货币理论。按照拉帕塔西奥拉斯和米利奥斯的看法，马克思的这两部重要作品在建构货币概念的方式上存在着重大差异，在论证这一概念的方式上也存在着差异，在《大纲》中，货币被设想成某种“符号”，并且是通过商品的双重存在而得以论证的符号；而在《资本论》中，货币则被看作是某种自发生成的、在流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桑德默斯指出，上述的观点源自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的著作《马克思〈资本论〉的发生史》（1969）。在此书中，罗斯多尔斯基批评了《大纲》草稿中的货币章节。他主要反对的是马克思的这样一个论点，即交换价值之所以可以被转化为一个独立的商品，只是因为某种特殊的商品获得了代表和象征其他所有商品的特权。按照桑德默斯看法，罗斯多尔斯基的错误恰恰在于他想当然地认为，马克思将直接产品交换主题化了，并且这无疑与货币的起源有相关性，与此同时马克思更喜欢将此描述为流通以及商品的两重性。此外，罗斯多尔斯基的错误还在于预设了《大纲》中论述货币的章节是以传统的体系性的方式、从最基本的观念建构起来的。最后，桑德默斯提出，所有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作者，首先要做的都应该是从马克思留下的文本入手，重新仔细审视我们对它们的理解，而不至于因阶级成见而误入歧途。

《重思马克思主义》2013年4月号上的“关键词”栏目刊登了马萨诸塞阿默斯特大学经济系的斯蒂芬·雷斯尼克（Stephen A. Resnick）和理查德·沃尔

① Grundrisse, Capital, and Marxist Scholarship, *Science & Society* October 2013, Vol.77, No.4, pp.561-567.

② The Notion of Money from Grundrisse to capital *Science & Society*, Vol.76, No.4, October 2012, pp21-545. 该文介绍可参见《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3），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

夫 (Richard D. Wolff) 撰写的《马克思主义》^①一文。在文章中,两位作者把两种不同种类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比较和对比,一种是传统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种则是多元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该文试图全面地评估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为左翼的历史和今天反资本主义斗争带来的理论后果和政治后果。作者则倾向于多元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把消除阶级剥削(凭借“剩余劳动”等术语而被构想)放回到左翼争取社会变革的日程表之中。此外,两位作者还试图在文章中说明,为什么多元决定论对重组剩余的生产和分配(消灭剥削)投入的关注,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消除生产方式的私有制和/或赋权于工人投入的关注是不同的。他们得出的结论同样也表明了,多元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以及如何能够推动社会的重构,以此取得一种新型的阶级民主。

同一期的《重思马克思主义》上还刊登了另外4篇相关的文章。首先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克里斯蒂安·洛茨 (Christian Lotz) 的文章《物化是通过商品形式还是通过技术?从霍耐特回到海德格尔与马克思》。^②洛茨指出,霍耐特近期将物化重新构想为(1)心理上的和(2)非经济的。^③洛茨在简要地批评了这种做法以后,从马克思的视角概述了物化这一问题,而这也为他在海德格尔和马克思之间设立的对峙做出了准备。在洛茨看来,真正的问题在于,物化到底是科技(洛茨称之为“因果形式”)的结果还是“商品形式”的结果。他站在与海德格尔相对立的立场之上,声称马克思的“商品形式”这一概念并不是建立在主体性之上的,而且,海德格尔式的本体论也无法解释他对现代现象的描述中所蕴含的、“座架”和资本主义结构之间的联系。正因如此,洛茨试图打开的是一条通向被称为“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研究路径。

来自希腊帕特拉斯大学哲学系的瓦希利斯·格洛里奥斯 (Vasilis Grollios) 的文章题为《马克思视域内的民主和商品拜物教:对安东尼奥·卡拉里与大卫·鲁奇奥的回应》。^④格洛里奥斯认为,卡拉里和鲁奇奥在《社会主义再思考:

① *Marxism, Rethinking Marxism*, Volume 25, Number2, April 2013, pp.152-162.

② Reification through Commodity Form or Technology? From Honneth back to Heidegger and Marx, *Rethinking Marxism*, Volume 25, Number2, April 2013, pp.184-200.

③ Alex Honneth, *Alienation: A Recognition-Theoretic View*, Oxford University, 2008.

④ Democracy and Commodity Fetishism in Marx: A Response to Antonio Callari and David Ruccio, *Rethinking Marxism*, Volume 25, Number2, April 2013, pp.273-278.

共同体、民主与社会主体》^①一文中对马克思视域内的民主做出了阿尔都塞式阐释，而他的理解则源自于批判理论。在这篇回应文章中，格洛里奥斯将上述两者对立起来，并且认为卡拉里和鲁奇奥的阿尔都塞式的理论所具有的非唯物主义和非辩证的特点使他们无法将形式（资本）和内容（我们做的事情）之间的辩证关系凸显出来，而这种辩证关系正是分析民主和拜物教时所应当遵循的根据。安东尼奥·卡拉里与大卫·鲁奇奥则以题为《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主体化：一个辩驳》^②的文章对格洛里奥斯做出了回应。他们主要辩护的观点是：重新思考主体化的问题与唯物主义的一致性，而这对于探讨从资本主义过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而言也是必要的。

此外，凯瑟琳·穆德尔（Catherine P. Mulder）发表的文章是《这是你生命中的时刻：动画电影中的马克思主义》^③。穆德尔在该文中讨论了教师如何在课堂中运用流行的动画电影为进步的马克思主义话题作例证。该文还特别分析了《虫子的一生》这部由迪斯尼公司和皮克斯联合制作的电影。这部电影突出了阶级革命、剥削、集体行动、团结和工人独创性等问题。虽然较短，但作为一部生动的而富有创造性的电影，《虫子的一生》充满了经济与社会公正的议题，学生们在他们的课堂讨论和论文中对此也做出了精彩的回应。大众文化中的许多作品都能够帮助学生接触到一些进步的和/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概念，而上述电影仅为其中的一例。

《重思马克思主义》2013年1月号上，则刊登了大卫·诺曼·史密斯（David Norman Smith）对于凯文·安德森（Kevin B. Anderson）的著作《处于边缘的马克思》（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0）的评论，题为《处于边缘的马克思：论民族主义，族群性与非西方社会》^④。史密斯指出，马克思对一个资本在其中取得了支配地位的、文化多元的世界所持有的看法，无论是从文化的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得出的观察，都尚未得到完整的展现。资本的“新陈代谢”

① Rethinking socialism: Community, democracy, and social agency, *Rethinking Marxism* 22 (3): 403-419.

② Marxism, Materialism, and Subjectification: A Rejoinder, *Rethinking Marxism*, Volume 25, Number 2, April 2013, pp.279-283.

③ It's the Time of Your Life: Marxism in Animated Films, *Rethinking Marxism*, Volume 25, Number 2, April 2013, pp.284-292.

④ Marx at the Margins: On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Non-Western Societies, by Kevin B. Anderson, *Rethinking Marxism*, Volume 25, Number 1, January 2013, pp.130-133.

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领域中的问题，在原则上得到了确定，并且，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它们是通过生产方式的表述而获得确定的。但《处于边缘的马克思》一书是第一本在两个关键性的层面上深入探讨这一问题的著作：参照马克思对前现代和非西方社会的看法，并参照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里的民族独立斗争（尤其是波兰和爱尔兰）。此外，作者也探索了马克思对促发美国 1861 至 1864 年内战的支持奴隶制运动所持有的观点。

《科学与社会》2013 年 4 月号上刊登了罗格斯大学英语文学系的芭芭拉·弗莱 (Barbara Foley) 对于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的书评。^① 弗莱认为，伊格尔顿在书中抓住了当下的经济危机对于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老生常谈的话题提出了质疑，这些话题包括：马克思主义失败了、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至少在近些年失去了它们不言而喻的真理性。尽管不是没有缺点，但弗莱认为，对于任何想要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或左翼的人而言，伊格尔顿的书提供了方便。弗莱认为，尽管伊格尔顿在书中时不时将马克思描绘成一名进化论者而不是一名革命家，但是如果将读者的分歧先放在一边，那么伊格尔顿这部作品的很强的思想性和说服力来说明下面这点：为什么马克思提供了通向一个更好世界的最有效的方案。

作者：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教授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① Why Marx Was Right, by Terry Eagleton, New Haven, Connecticut/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Science & Society* Vol.77, No.2, April 2013, pp.259-261.

德 国

周爱民 王凤才

像往年一样，2013年德国以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主办了许多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发表了不少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这些学术会议和学术论著问题涉猎广泛，思想观点新颖——或者直接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有关思想，例如，什么是货币？共产主义内涵究竟是什么？究竟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等等；或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当今资本主义进行剖析，例如，马克思主义与能源、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与危机，等等。其中，理论性讨论的代表性成果有：《阅读〈资本论〉，但如何阅读？》（W.F. 豪克）、《共产党宣言》（165周年）反思，等等。（2）兼顾理论问题与现实关怀的学术活动有：“马克思—秋季学校”第六期，主题是《资本论》第1—3卷关于货币问题的论述，目的是廓清马克思著作中的“国民经济学最后之谜”，这方面的主要文献有：《资本主义中的矛盾性正义：哲学—经济学批判》（E. 特莱普托）^①等。（3）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问题而主办的学术会议，主要有：“我们生活在何种资本主义之中？”（柏林，2013.11.30）；“家乡、人民、民族国家、超民族性、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进步与反动中的现实和意识形态”（法兰

^① Elmar Treptow, *Die widersprüchliche Gerechtigkeit im Kapitalismus. Eine philosophisch-ökonomische Kritik*, Weidler-Verlag, Berlin 2012.

克福 /M, 2013.11.9) ;“能源政治: 利益和必需品”(博特罗普, 2013.6.15) 等。在这些学术会议中, 极具现实意义的学术报告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关注能源政治?”(O. 伽贝尔斯)、“绿色资本主义和其他幻象”(B. 克尔恩)、“风险资本主义: 走向贫困社会之路”(W. 泽普曼) 等。在这里, 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 2013 年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进行分析。

一、如何阅读《资本论》?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马克思的《资本论》再度受到了追捧, 在德国甚至出现了“阅读《资本论》”活动。但一个主要质疑就是: 社会主义国家在 20 世纪末失败, 不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方面的重大失败吗? 实践的失败不足以说明理论本身存在重大问题吗? 德国学者认为, 揭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深刻性与实践方面的无能, 是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矛盾之处。

针对上述质疑, W.F. 豪克认为这种说法是幼稚的。在《阅读〈资本论〉, 但如何阅读?》(2013) 中, W.F. 豪克指出,《资本论》“包含了无法被超越的基础, 这个基础奠定了对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分析。资本主义在全球化中越占据统治地位, 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就越迫切地提上议程。《资本论》的分析对象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结构形式和运动形式。”^① 因而, W.F. 豪克在书中给自己提出了两个任务: 一是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之中去; 二是深入到实践导向的《资本论》读物的追问之中去。^② 他认为, 一方面尽管人们已经觉察到, 资本主义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和自然的生活基础, 但这仅仅是臆断、仅仅是意见的表达, 尚未上升到真知层面。W.F 豪克强调, 只有当人们认真阅读《资本论》, 并通过《资本论》切入自身的世界之中时, 人们才能够真正了解资本主义。另一方面, 人们对《资本论》的研读是异常困难的, 甚至会时常误读它。于是, 这就产生了如何阅读《资本论》的迫切问题。

① Wolfgang Fritz Haug, *Das “Kaptial” lesen. Aber wie? Materialien zur Philosophie und Epistemologie der marxischen Kapitalismuskritik*, Berliner Beiträge zur kritischen Theorie, Bd.16, Hamburg 2013, S.89.

② Wolfgang Fritz Haug, *Das “Kaptial” lesen. Aber wie? Materialien zur Philosophie und Epistemologie der marxischen Kapitalismuskritik*, Berliner Beiträge zur kritischen Theorie, Bd.16, Hamburg 2013, S.201.

从结构上看,《阅读〈资本论〉,但如何阅读?》分为三个部分:问题(第1—2章);批判(第3—8章);重构(第9—12章)。这三个标题“分别标明了各自的主要方面,每个方面同时也包含了其他两方面内容”^①。在整部著作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方法论问题。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仅仅运用了逻辑方法,持这种观点的有“马克思—新读物”(Neue Marx-Lektüre)^②的学者们,其中H.赖希尔特(Helmut Reichelt)、H-G.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M.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等人接受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形成的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理解方式。该方式的主要之点是对价值形式理论的描述,以区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③W.F.豪克不赞同这些作者的观点,认为他们曲解了马克思主要著作中的思想。在W.F.豪克的这部著作中,引人深入思考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拯救性批判,而非毁灭性批判。针对“马克思—新读物”的目标,即抹掉政党取向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W.F.豪克认为,这种做法是不现实的,同时也暴露了自我相对化的缺乏。在他看来,这种做法不仅是傲慢的,而且是片面的。它们常常是一些纯粹的断言,部分是严苛的指责: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曲解了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并且认为只有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终结后,发现“真正马克思”的时刻才会到来。从总体上看,20世纪的马克思解读仅仅是对已经确立的政治的辩护。W.F.豪克反驳了这种指控,并要求历史地、批判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所有传统马克思主义。因而,W.F.豪克主张用一种拯救性批判代替毁灭性批判。所谓拯救性批判,就是指接受那些具有保留价值的东西,完善那些未完善的,抛弃那些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

第二,阅读《资本论》应当从第一章开始。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曾经说过,《资本论》的前三章过于难读,人们阅读《资本论》应当直接从第四章“货币

① Wolfgang Fritz Haug, *Das "Kaptial" lesen. Aber wie? Materialien zur Philosophie und Epistemologie der marxischen Kapitalismuskritik*, Berliner Beiträge zur kritischen Theorie, Bd.16, Hamburg 2013S.12.

② Vgl.HelmutReichelt, *Neue Marx-Lektüre. Zur Kritik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Logik*, Hamburg2008; Hans-Georg Backhaus, *Dialektik der Wertform. Untersuchungen zur Marxschen Ökonomiekritik*, Freiburg i. Br. 1997; Michael Heinrich,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 Eine Einführung*, Schmetterling Verlag, 3. Auflage 2005.

③ http://de.wikipedia.org/wiki/Neue_Marx-Lekt%C3%BCre.

转化为资本”开始。W.F. 豪克针锋相对地提出：开端不能被跳过。当人们不能推出货币的形式，他们对“货币转化为资本”章肯定也一窍不通。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只是特别发展了的、特有的商品生产形式。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首要条件是“产品首先是商品，由此才必须展现为货币”^①。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和研究才开始于商品和货币，而不是始于资本主义之特殊的同时也是必要的东西。

第三，既非逻辑的又非历史的辩证法。“马克思—新读物”的作者们断言，《资本论》中的叙述方法仅仅是逻辑方法，它与资本主义实际发展毫无关系。对他们来说，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是完全对立的。W.F. 豪克反对这种解读，认为把马克思的方法称为逻辑方法是“双重误解”。^② 一是对历史方法的否定并非就是逻辑方法；二是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抛弃了理论的生产方式，即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演。实际上，既非逻辑方法也非历史方法，而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贯穿于《资本论》全书。W.F. 豪克指出，马克思很少使用“分析的”、“概念的”或者“理论的”方法，从未使用过“逻辑的”方法。“毫无疑问，马克思关注概念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依据事物本身的发展”^③。因而，人们应该根据“费尔巴哈提纲”的思想来阅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果必要的话，则根据它来进行重构。根据“费尔巴哈提纲”第八条：一切神秘的东西“都能够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逻辑方法是次要的。这样，W.F. 豪克也反对恩格斯的尝试，即试图把逻辑方法“变成与历史唯物主义设想相兼容”，^④ 因为这种尝试似乎完全低估了逻辑方法对于历史分析的意义。逻辑的东西不仅仅是“概念物”，它们还是现实因素的因果联系，是内在的、决定性的东西，是它们在思想中的反映。因此，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因素不是不可通约的而是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了辩证的统一

① Vgl. MEW Bd. 26.2, S.502.

② Wolfgang Fritz Haug, *Das "Kaptial" lesen. Aber wie? Materialien zur Philosophie und Epistemologie der marxischen Kapitalismuskritik*, Berliner Beiträge zur kritischen Theorie, Bd.16, Hamburg 2013S.30f.

③ Wolfgang Fritz Haug, *Das "Kaptial" lesen. Aber wie? Materialien zur Philosophie und Epistemologie der marxischen Kapitalismuskritik*, Berliner Beiträge zur kritischen Theorie, Bd.16, Hamburg 2013S.131.

④ Vgl. Friedrich Engels, *Karl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 MEW Bd.13, S.474f.

整体。

当然，W.F. 豪克对其他问题的讨论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同样重要。例如，关于价值形式分析、货币价值论、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下降等问题。正如评论者 K. 米勒所言，W.F. 豪克的这部著作是对“马克思—新读物”的解读和观点有迹可寻的批判，同时也能够有助于人们理解《资本论》和资本主义世界。^①

另外，德国学者继续主办“马克思—秋季学校”（第六期，2013.10.25—27）^②。在此研讨班上，讨论者从《资本论》所有 3 卷中挑选出相关片段讨论货币问题。货币支配世界、时间就是金钱——这是人们的日常理解。那么，什么是货币（金钱）？针对这个“国民经济学最后之谜”，只有几个经济学家进行了描述；马克思声称自己解决了这个谜，即人们用货币反映钱袋中的社会关系。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讨论者认为，在“货币”（Geld）这个简单的概念背后，也许隐藏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范畴。马克思以货币为线索，阐发了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价值形式分析出发，他讨论了货币作为交换手段或流通手段的功能，以及货币的资本形式（《资本论》第 1 卷）、经济周期（《资本论》第 2 卷）、信贷与虚拟资本形式（《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与资产阶级货币理论完全不同，后者将货币功能阐发为现实的。由此可见，讨论者是通过阅读和讨论《资本论》而获得马克思如何理解货币功能的。当然，他们也讨论了马克思的货币批判的现实性问题。

二、若没恩格斯，能有《共产党宣言》吗？

2013 年，正值《共产党宣言》发表 165 周年，《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组织了专栏文章进行纪念。^③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该杂志还特地刊发了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据编辑说，该文本之所以被全文刊发，因为它难于被理解，但对现代工人运动和《共产党宣言》的形成史来说，又是很重要的文本。^④ 在恩格斯文章前面，是 E. 考普夫 (Eike Kopf) 的纪念文章《若没恩格斯，

① Vgl.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96, Dezember 2013, S.113.

② <http://marxherbstschule.net/10/>.

③ Vgl.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93, März 2013, S.8-48.

④ Vgl.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93, März 2013, S.22.

能有〈共产党宣言〉吗?》^①。编辑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为了提醒读者,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贡献也很重要。因而,不要把《共产党宣言》仅仅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

在《若没恩格斯,能有〈共产党宣言〉吗?》一文中,E.考普夫从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前史、缘由、准备工作和作者排序变化等方面,详细阐明了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出版的重要性。

首先,从恩格斯思想发展历程看,E.考普夫指出,恩格斯早在《在爱北斐特的演说》^②的第一篇、《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③和《德国现状》^④中,就已经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对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

其次,E.考普夫认为,恩格斯的《共产党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为《共产党宣言》的创作提供了直接的素材;《共产党宣言》中的许多思想是对它们的进一步扩充和改写。这从马克思遗留下的一个笔记中可以得到证明。

该笔记写在马克思准备“劳动工资”演讲的笔记本封面上。^⑤E.考普夫猜测,它是马克思在伦敦参加第二届共产主义者同盟大会时得到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之后形成的。因为马克思的笔记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中第24个问题“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有什么区别”明显相关。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把社会主义者分成三类:(1)封建宗法社会的拥护者,即封建社会主义者;(2)现今社会的拥护者,即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3)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或者是还不够了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无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在上述笔记中,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者做了进一步区分:(1)反动的社会主义者——封建和宗法小资产阶级;(2)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3)德国哲学社会主义者;(4)批判的、乌托邦的文学体系——欧文、卡贝、魏特林、傅立叶、圣西门和巴贝夫;(5)直接的政党文学;(6)共产主义文学。这个划分与《共产党宣言》中的划分大致相似。此外,E.考普夫还仔细比较了《共产党宣言》与恩格斯本人撰写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中类

① Eike Kopf, Hätte es ohne Engels das „Manifest“ gegeben? in: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93, März 2013.

② Friedrich Engels, *Zwei Reden in Elberfeld*. in: MEW Bd. 2, S. 537-557.

③ Friedrich Engels, *Das Fest der Nationen in London*. in: MEW Bd. 2, S.611-624.

④ Friedrich Engels, *Der Status quo in Deutschland*. in: MEW Bd. 4, S. 40-57.

⑤ IISG Amsterdam, Marx-Engels-Nachlass, A22; Vgl.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Frankfurt am Main 1927ff. (nachfolgend: MEGA¹), /Bd.6, S.449-499.

似的思想。^①在此基础上, E. 考普夫指出, 通过这些比较至少可以表明, 恩格斯曾经主要拟就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节, 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思想。

最后, E. 考普夫还特地考察了《共产党宣言》作者排序变化问题。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 马克思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及《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问题, 他认为是“恩格斯和我共同创作的《共产党宣言》.....”^②。在1867年的《资本论》第一卷第479页“近代工业”一节, 马克思所引用的《共产党宣言》版本也是把恩格斯放在首位。^③但到1872年的新版《共产党宣言》“前言”中, 作者排序最终变成了马克思在前、恩格斯在后。这种排序一直延续下来。

三、马克思主义与危机分析

柏林批判理论研究所第17届国际学术会议(埃斯林根, 2013.5.30-6.2)。^④这次以“马克思主义与大危机”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吸引了来自多个国家的80余位代表。正如会议主题所昭示的那样, 这是一场历史性会议。一方面, 对近年来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探讨; 另一方面, 又对今日马克思主义与批判性思维的危机趋向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在这次国际会议上, 马克思主义成为主题不仅表现在有三场马克思主义专题研讨会, 同时人们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概念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例如, 法国经济学家 G. 杜梅尼尔 (Gerard Duménil) 提出, 当今资本主义形态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 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的福特主义式的联盟破裂。与此相对, 意大利经济学家 G. 喀什迪 (Guglielmo Carchedi) 借助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的规律性来分析危机。尽管实证和数字材料已经很充分了, 但仍然不清楚的是, 为什么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危机。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① Vgl.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93, März 2013, S.16-19.

② Karl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stes Heft. Vorwort. in: MEGA². /Bd.2, S.100.

③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ster Band. Hamburg 1867, S.479.

④ Vgl.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93, März 2013, S.174-176.

除了用政治—经济原因来分析当今危机之外，这次国际会议的下述尝试也是极具特色的。它试图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局限性和当今社会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如今已经不再能够与社会斗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诚如德国马克思学家 W.F. 豪克 (Wolfgang Fritz Haug) 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融合了工人运动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观点。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当今形式仅仅是批判性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丧失了与工人运动的有机结合。由于忽视了积极参与到社会现实浪潮中去，马克思主义已经退化成为一种消极的辩证法。当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反思绝没有穷尽。在补充报告中，德国社会学家 F. 豪克 (Frigga Haug) 试图把性别关系分析纳入马克思主义之中。她认为，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在生产领域中隐藏的剥削活动。这种活动促进了社会再生产，并且大部分是由女性完成。因此，她主张必须利用概念的工具来共同思考家庭中对女性劳动的剥削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对剩余产品的榨取问题。

就像该会议所阐明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性思维只有反思自身，并反思行动和思想的社会历史条件，才能重新获得生命力。因而，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和马克思主义危机，该会议提出了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如何从概念层面多维度、综合性理解当前危机的各个视角。这些问题将在下一届会议得到讨论。

“批判的激情，批判理论视角”学术会议 (吉森, 2013.1.18-19)^① 也值得关注。该会议以“当代批判的社会理论诸问题”为主题，认为讨论这些问题的“现实性和必然性”不仅源自于 2012 年各种危机的戏剧性变化，也源自于这样的事实：批判性思维和介入性思维在公共话语中没有找到自己的明确位置。

关于如何对当今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研究，S. 布克尔 (Sonja Buckel) 主张一种“跨部门的资本主义分析”，并把这种分析理解为从错综复杂的社会支配关系 (如资本关系、性别关系、种族关系和新殖民主义等) 出发，对具体政治及其跨部门影响进行分析。在 S. 布克尔看来，资本关系是分析的核心，因为它覆盖了所有其他支配关系，通过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能够揭示那些支配关系，而且还能提供有针对性的解释。同时，S. 布克尔也意识到，资本关系不能够被视为“表现的总体”，因而不能将所有支配关系还原为资本关系；相反，

^① Vgl.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93, März 2013, S.197-190.

这些关系构成了资本关系的历史前提。R. 耶给 (Rahel Jaeggi) 的报告主要涉及社会哲学和社会学的互补性不足。她认为,一方面,社会哲学中“规范主义”(Normativismus) 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社会学反规范主义地将规范还原为权力工具。如何克服社会学从物质方面把批判转入“乱斗”,需要加强规范的研究,从物质主义—实践哲学方面把它们理解为功能因素,以便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化及其内在危机的条件。R. 阿茨米勒 (Roland Atzmüller) 在关于危机的分析中,阐明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危机与意识形态危机。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持续贯彻导致了其霸权方案的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中产阶级的腐蚀”;小资产阶级构成性条件的变化,则表现在担忧社会地位和不安全感加剧,越来越倾向于“反国家和反市场经济方向”,并且动摇了对绩效社会的信仰。根据 Ch. 莱施 (Christine Resch) 的观点,在危机中批判的知识分子缺席的主要原因在于,批判的知识分子在公共媒体中出镜率低。作者认为,批判的内容在当前“压制宽容”条件下虽无关紧要,但是人们至少能够希望它们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与之相应,U. 比特林迈尔 (Uwe Bittlingmayer) 认为今日批判的社会理论之不足有着所谓的“知识社会”的背景。“知识社会”其实是“反教育的社会”,一方面教育成为商品,另一方面也是布尔迪厄意义上的教育资本(即关于偶然的事物如此这般存在的有用知识)和统治工具。他援引了阿多尔诺的观点,认为从规范和批判意义上说“教化”(Bildung) 概念既不是教条,也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对人们已经拥有的批判能力的教育,是社会批判的工具。在会议总结时,德国批判理论家 A. 黛米洛维克 (Alex Demirovic) 再次强调“积极乌托邦”的意义,积极的乌托邦不是抽象的乌托邦,即不是在其中不存在任何社会矛盾,而是人们应当解决那些他们在历史中碰到的问题,并展现与当前现实不一样的前景的可能性。

四、知识分子的分化与中间阶级的萎缩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法兰克福 /M 马克思主义研究所”(IMSF) 就对联邦德国社会阶级结构变化问题进行过探讨。该研究所对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大量分析甚至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定位,即赋予工人阶级和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联盟以重要意义。不过,随着时代变迁,人们需要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中对阶级和知识分子进行分析。这种变化要求,在“今日阶级分析与

知识分子”学术研讨会（法兰克福，2013.4.20）^①上鲜明地表现出来。该主题清楚地表达了会议的目的：试图在当今的历史背景中，重新审视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联盟问题。这次会议极富成效，《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还开辟专栏发表了相关成果。

第一，从追求普遍解放到追求中产阶级地位。2011年，世界各地爆发了规模庞大、影响广泛的反资本主义的示威游行和暴力抗议活动。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体现，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J.E. 斯蒂格利茨甚至将它们与1848年欧洲革命和1968年造反运动相提并论^②；而1848年革命和1968年学生运动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们各自标志着历史新时代的开启。这足以显示出，2011年抗议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学者心目中的重要性。

然而，在德国政治学家F. 德佩（Frank Deppe）看来，过分夸大这些抗议活动的解放性质，进而诉诸20世纪工人解放运动的经验，只会遮蔽人们对这些反资本主义浪潮的正确理解。在《社会动荡的新时期？》一文中，F. 德佩对这些抗议活动的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他认为，这些抗议活动与以往的工人阶级反抗运动具有明显区别。从席卷北非各国的“阿拉伯之春”活动，到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从德国的“占领法兰克福”运动，到巴西的“热带之春”活动，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运动的主要参与者都是城市中的中产阶级青年，他们是这些抗议活动的主导者和生力军。

例如，北非各国，尤其是突尼斯，抗议活动的活跃分子都是年轻的待业或无业人员，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大部分来源于市郊并居住在市郊，与左派政治组织没有密切联系。在这里，老左派（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支持。在欧洲，情况也大致相似。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依赖工薪生活的中产阶级迅速膨胀。持续扩大的工薪中产阶级，同时体现出高等学校学生人数的快速增长。这些学生大部分成长在富裕的家庭中，并且深受上一代人（如在1968年学生运动、70年代新社会运动中活跃的人）的影响。他们对未来的财富和生活质量期望值较高，但政治意识淡薄，在他们的视阈里，“社会主义”是伴随着长期物质匮乏而形成的压制自由的社会制度。

^① Vgl.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94, Juni 2013, S.188-191.

^② Joseph E. Stiglitz, *Preis der Ungleichheit. Wie die Spaltung der Gesellschaft unsere Zukunft bedroht*, München 2012, S.9.

他们向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崇尚个人能力。因而，正如 G. 瑟尔鲍姆所指出的那样，“20 世纪的工人阶级将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取代普遍解放方案的将是普遍追求中产阶级地位”^①。或者说，工薪中产阶级的崛起可能就是 21 世纪的本质特征之一。

实际上，对于各国抗议运动的观念重构，仍然可以被进一步细分。F. 德佩强调，“中产阶级”还可以被细分为两部分：成功的上层人士（这些人已经融入主流社会中）和底层的“降级者”（包括潜在的降级者）。这些抗议活动中的大多数中产阶级青年就属于后者。要么是出于对“降级者”社会地位的不满，要么是出于对将遭受降级的恐惧，他们才自发地走上了街头。因而，从总体上来看，作为抗议活动中的领导力量，工人阶级的中心地位已经下降。

面对这些新的变化，F. 德佩指出，当务之急是如何整合在反抗资本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各种力量？换言之，在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的视角中，在反资本主义策略中，如何整合那些反对统治秩序的力量？他断言，针对这些新变化、面对这些新情况，人们不能再诉诸 20 世纪工人运动的经验。

第二，知识分子的分化。德国社会学家 D. 鲍里斯 (Dieter Boris) 对德国社会结构的分析，进一步确证了 F. 德佩的断言，即工人阶级已经逐步丧失了中心地位。^② 为了阐明今日德国社会结构变化对知识分子分化的影响，(1) D. 鲍里斯概述了德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七大趋向，即各个领域服务部门快速发展；教育水平和从业资格水的稳步提升；女性劳动领域继续拓展；工资水平两极分化差距拉大；劳动领域“苦难化趋向” (Prekarisierungstendenzen) 增大；收入和能力不对等分配继续扩大；全球化继续发展——这七个方面互为关联、相互影响。(2) D. 鲍里斯具体分析了每种趋向的发展状况。其中，对知识分子分化具有重要影响的趋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伴随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传统制造业工人数量急剧下降。据统计，服务业工人在所有行业人数中的比重由 45% (1970) 跃升到了 73.5% (2010) ^③；另一方面是工薪阶层内部的两极分化趋向。(3) D. 鲍里斯据此将所有知识分子划分为三个阶层：高级管理者、依

① Göran Therborn, *Class in the 21st Century*, in: *New Left Review*, 78, November-December 2012, p.6.

② Dieter Boris, *Langfristige Trends der Sozialstrukturentwicklung als Hintergrund der Interligenzanalyse*, in: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96, Dezember 2013, S.19-25.

③ Vgl. Datenreport 2011. Ein Sozialbericht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onn, S.103.

赖工薪的研究者、自由职业者，各个阶层的比例在 1990—2007 年间都增长了一至两个百分点。尽管知识分子阶层普遍享有较高社会地位，但苦难化趋向也是逐步增强。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之间，广大知识分子中“降级恐惧者”（Abstiegsängste）的比例从 30% 攀升至 50%。此外，追求高质量生活的压力逐步增大，但没有相应地增加跻身于高质量生活的机会。在许多部门，甚至在大多数脑力劳动行业中，晋升之路被阻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甚至或多或少地有降级的威胁，“对于中产阶级来说，降级威胁与晋升受阻相连”。^① 总之，在传统产业工人阶级地位和作用下降的同时，尽管受过高等教育的职工数量急剧增加，但他们是否能够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仍然悬而未决。

第三，中间阶层的萎缩。德国经济学家 J. 比朔夫和 B. 米勒在合著的《当今的阶级：社会中间阶层的萎缩》中，批判了广为流传的“社会中间阶层”概念。根据民意调查显示，截至 2010 年，德国西部地区（原联邦德国地区）约有 62% 的民众把自身定位于“社会中间阶层”，德国东部地区（原民主德国地区）的比例要少许多，但也达到了 51%。^② “社会中间阶层”持有这样的精英主义观念：不是凭借出身或遗产，而是凭借个人能力获得相应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这种能力，特别是受教育而获得的能力，首先与市场相挂钩，其次也应当成为所有其他社会领域衡量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准绳。收入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则通常被归咎为效率竞争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市场经济”其实就是绩效社会。绩效与“中间阶层”紧密相连。中间阶层的收入主要依赖于自身劳动；上层的收入依赖于遗产、利息、管理等；而底层则依赖于社会救济。

然而，J. 比朔夫和 B. 米勒认为，在当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谓的“社会中间阶层”仅仅是一个幻象。尽管他们并未完全否定当前多数人的自我定位，认为这种定位曾经具有真实的社会基础。的确，“社会中间阶层”的界定，与职业、收入和文化程度密不可分。“二战”后，德国实体经济腾飞，曾经为“社会中间阶层”形成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以新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的金融市场建立和拓展，实体经济积累失去了原有的动力。与经济成果相比，真实的资本投资减少，但虚拟资本投资却占据主导地位。这就导

① Vgl.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96, Dezember, 2013, S.25.

② Vgl.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96, Dezember, 2013, S.28.

致有组织的工资劳动体系的解体，社会不同阶层收入差距的继续拉大，而收入差距的拉大会损害人们固有的精英主义观念。例如，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前，就约有 73% 的德国公民认为现有的经济关系是不公正的。^① 其次，他们进一步指出，20 世纪 80—90 年代，联邦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并没有向新的社会中层阶级许诺应有的保障方案，从而导致中层阶级内部政治冷漠现象越来越严重。再就是，他们还认为，今天即使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也并不必然就会保证一个稳定的中间阶层地位。所有这些共同导致了社会中层阶级的不断萎缩。

五、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

除 E. 考普夫的专门纪念文章外，《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还刊发了其他文章，如《资本主义中的权力》。^② 在该文中，M. 马萨拉特（Mohssen Massarrat）强调，为了阐明资本主义的战略转型，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是一项重要的科学任务和政治任务。在他看来，并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完全符合内在经济规律的“逻辑的资本主义”（Logischer Kapitalismus），资本主义永远是“历史的资本主义”（Historischer Kapitalismus），它总是被打上历史环境的烙印。历史环境可以被区分为三个要素：自然的给予物、前资本主义结构的遗迹、已经生发出的权力潜能。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前两种要素逐渐丧失了构成性影响，而第三种要素对今天以及未来的改革和战略转型起着关键性作用。

M. 马萨拉特对资本主义进行逻辑的和历史的划分，是为了从方法论意义上揭示权力作为历史范畴有着自身的逻辑和生命力，它独立于资本主义经济而存在。然而，在所有的经济学流派中，却盛行着一个严重的误解：经济学意义上的合规律性就能够有效地阐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对此，M. 马萨拉特指出，对经济学的绝对化完全阻碍了人们对权力的洞察，即权力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决定性杠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分配过程不论在国家内部还是在国际层面都隐藏着权力关系，如果不考虑到这种权力关系，分配关系就无法被人们充分

① Vgl.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96, Dezember, 2013, S.33.

② Mohssen Massarrat, Macht im Kapitalismus, in :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93, März 2013.

认识。

为了进一步论证上述观点，M. 马萨拉特对权力理论传统进行了简要的梳理。被广泛接受的权力定义可以追溯至 M. 韦伯。在韦伯那里，“‘权力’(Macht)是指在共同体的行动中，或在其他参与者的反对中，个人或许多人能够贯彻自身意志的机会”。^① M. 马萨拉特认为，韦伯的定义只注意到权力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忽视了权力的社会起源，包括权力膨胀的推动力。在他看来，尽管 M. 曼在《权力的历史》中对权力现象进行了仔细划分，整合了马克思和 M. 韦伯传统中权力的三个要素——阶级、地位、政党，并进一步将政党划分政治的和军事的，但这样的权力理论对于分析资本主义复杂的分配和再分配还是不够的。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权力理论中，权力和统治长期被视为相同的概念，权力理论就是统治理论。统治理论又或多或少地被纳入唯物主义国家理论中。在这种诠释传统中，国家作为最高权力机构仅仅是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不过，马克思并没有撰写过关于国家的著作，他关于国家的讨论只是零散地出现在与法国革命相关的政论性文章中。^② 恩格斯和列宁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恩格斯和列宁来说，国家不是中立的，而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阶级统治的工具。列宁甚至将这种统治关系称为阶级专政。在列宁那里，阶级专政不仅对于阶级社会是必需的，而且对于旨在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来说也是必需的。尽管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会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它们必须具有相同的本质特征，即无产阶级专政。^③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建立在直接压迫和暴力占有剩余产品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所有商品自由交换的基础上。那么，这种新型关系将会对国家产生怎样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究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还是各个阶级之间的中介和中立的机构？它究竟要满足哪些功能？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没有给出答案，在他逝世后近百年中，也鲜被提及。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才涌现一批根据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来阐发国家理论的学者，较为著名的是 J. 埃瑟尔

① 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n : Max Weber-Studienausgabe, Band I/22,1-5 + I/23, Mohr Siebeck Tuebingen 1976, 2009, S.78.

② Vgl.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93, März 2013, S.51.

③ Vgl. Lenin, *Staat und Revolution*, in: *Ausgewählte Werke*, Dietz Verlag Berlin, 1972, Kapitel 2.

(Josef Esser)。M. 马萨拉特认为，J. 埃瑟尔对国家理论的贡献在于：在国家分析问题上，他第一次区分了逻辑分析方法与历史分析方法，并使前者成为后者的前提。就像马克思从商品出发分析资本那样，J. 埃瑟尔也从分析商品形式出发分析资本主义政治。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拥有者是自由平等的法律主体，否则社会便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力商品处于支配关系中，即资本总是占有劳动力的剩余劳动。这样，资本主义国家就处于双重关系中，即商品拥有者之间的自由交换关系，以及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支配关系。为了长久维持这种不对称关系，它需要一种外在于经济的“暴力”(Gewalt)。

那么，J. 埃瑟尔的国家理论与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又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这种国家不采取前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即作为统治阶级私人机构的形式？J. 埃瑟尔的回答是：如果那样的话，经济之外的暴力功能将严重受损，因为“当一个或几个商品拥有者垄断了用来维护商品生产的暴力时，为了有利于暴力垄断者，所有人的自由平等将会被消除，商品等价物的等价关系将会被摧毁。这就证明了一种必然性，即暴力功能必须被外在于商品交换的机构所垄断”^①。因此，J. 埃瑟尔强调，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必须分离，国家和资本必须分离。

J. 埃瑟尔对逻辑的资本主义的勾勒，为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形式提供了基本的概念工具。尽管他很清楚，对国家的逻辑推演必须延伸到对国家的历史的具体分析，“这种历史的具体化，即把历史过程中具体的再生产过程描述为在世界市场中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相互中介的统一体，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前提，这种理论奠基于经验之上”^②，但他并没有实现这样的要求。

在分析传统国家理论基础上，M. 马萨拉特提出了一种唯物主义的权力理论。与传统权力理论不同，他并没有把资本主义与权力等同，而是把资本与权力分开，认为这两者遵循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在他看来，权力是指“人们为了实现自身意志或利益……而拥有垄断社会资源的可能性和能力”。^③ 垄断同时

① Josef Esser, Einführung in die materialistische Staatsanalyse,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1975, S.156f.

② Vgl.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93, März 2013, S.58.

③ Vgl.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93, März 2013, S.59.

意味着排斥，即对他人占有同样资源的排斥。M. 马萨拉特区分了权力的三种来源：（1）首要的来源是指对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它不仅是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也是所有社会形式和生产方式的社会基础。在产品生产和社会服务如何在社会团体中被分配的问题上，它也起着决定性的杠杆作用。（2）次要的来源主要是制度层面，即国家的、军事的、全球体系的、父权制的、非法的、整合的权力等层面。（3）文化和媒体的合法性权力。但无论如何，权力总是遵循垄断逻辑，主要目的是维护现存关系。垄断是一种状态，它通过权力（包括军事权力）来维护自身，权力与垄断不可能分离。对于垄断者来说，他缺少的是社会合法性，因此处于永恒的危险中，即被排斥出去的人随时可能取代垄断者的地位。这又导致垄断者只能不断地增强权力，即通过权力的积累来克服合法性的缺陷。因而，垄断积累与合法性降低之间的张力，就是唯物主义权力理论的核心。与权力逻辑相反，资本遵循竞争逻辑，即“创新性毁灭”逻辑。毁灭与创新是资本积累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两个基本因素。由于创新总是伴随着毁灭，因此资本积累不是无限的增长过程。实际上，每个资本积累时期会逐渐变成资本毁灭时期。

从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的比较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不能简单地把资本主义和权力划等号。在 M. 马萨拉特的分析中，纯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反对权力影响的，它是权力积累的对立面。因为在他看来，资本积累并不会导致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也不会直接导致极权的帝国主义。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因素如何产生的呢？M. 马萨拉特的回答显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以资本家对生产工具的私人占有为基础，商品的价值被分为工资和利润；而分配和再分配机制既受国家层面，也受国际层面影响，既受可以被观察到的因素，也有无法被观察的因素影响。例如，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过去 30 年间工人工资增长率的普遍下降是由下列因素造成的：在同一时期，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的权力关系趋向不利于雇佣劳动者的方向发展。

六、资本主义与矛盾性正义

德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尤其是分析近年来经济危机的著作并不鲜见。2013 年出版的著作中，德国哲学家 E. 特莱普托（Elmar Treptow）《资本主义中的矛盾性正义：哲学—经济学批判》一书，尤其值得

一提。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很少出现“正义”（Gerechtigkeit）概念。例如，在马克思讨论正义问题的经典文本《哥达纲领批判》中，“正义”概念仅仅出现过一次；^①而且，马克思曾经明确声称自己的学说是关于社会的科学，而不是关于道德的说教。^②当然，马克思著作中常常充满着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困、压迫和不自由等现象的道德谴责。针对这种似乎矛盾的状况，英美学界发起了关于“马克思是否将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为非正义社会？”大讨论；^③与英语世界相比，德语世界的相关研究可谓冷冷清清。不过，《资本主义中的矛盾性正义：哲学—经济学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尽管该书并非专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

在该书第一部分中，E. 特莱普托运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阐发了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拥有不同身份的人参与到市场中，全部被抽象地当作平等的个体；但不平等因素仍然潜藏其中：在市场上，商品按照价值规律，准确来说按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交换，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同，生产力水平高的企业将占优势，由此形成财富差距是必然的。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在这里，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家似乎是平等的契约双方，但由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不得不依靠长时间劳动以获取工资，资本家却攫取了剩余价值。在资本家眼里，这种不平等并不是什么非正义；社会正义就是资本增长所要求的与合法的东西。因而作者断言，资本主义中的“正义”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来的资本集中，也不可避免危机所造成的后果——失业、通货膨胀和破产。如果国家在当今危机中力挺大企业和银行而让小企业倒闭的话，那么就只会加剧资本集中过程和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都不算非正义，它们指涉的是另一种社会正义。在涉及理论史的第二部分中，E. 特莱普托主要讨论了A. 斯密、黑格尔、尼采、马克思，认为他们共同阐发了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正义的重要理论。第三部分主要批判当今典型的有关正义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关系普遍化，并把这种关系确立为永恒的制度。但在作者

① Vgl.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95, September 2013, S.184.

② A. W. Wood, *Karl Marx*, Routledge 2004, p.127.

③ Norman Geras, “The Controversy About Marx and Justice”, in: *New Left Review*, No.150, (March/April 1985), pp. 47-85.

看来，当资本主义制度被永恒化时，其不平等方面也就被牢牢确立了。

就像评论者 R. 耶林 (Reinhard Jellen) 所指出的那样，E. 特莱普托分析的精彩之处在于：“他不是站在超历史的立场上指责这种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关系，而只是想表明，这种不平等关系与资产阶级的正义概念完全一致”。^① 因为这种不平等关系建立在契约平等基础上，目标是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收益。一旦某种特定的关系通过契约双方协商，并通过合同固定下来，那么，对这种关系的遵循就是正义的。所谓“非正义”就是对此执行的方法，违反了上述关系。

七、民族国家抑或超越民族国家

2013 年，德国社会学家 W. 施特雷克^② 出版了《被购买的时间：民主资本主义被延缓了的危机》一书。该书是在“法兰克福 /M 阿多尔诺讲座 2012”基础上扩充而成的。在这里，W. 施特雷克试图分析近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转变的缘由。在详实资料的基础上，作者从宏观层面勾勒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工业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脉络，并给出了精到的理论阐释，除此之外，该著作也对今日金融危机进行了详细诊断。

除“导言”和“结语”外，该书主体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首先解释了金融—财政—增长危机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分别阐释为银行危机、国家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第二部分聚焦于国家金融危机及其原因和后果；第三部分讨论作为政治组织的“债务国家” (Schuldensstaat) 到“化短期债务为长期贷款国家” (Konsolidierungsstaat) 的过渡。

第一，W. 施特雷克试图将自己的观点与 60—70 年代的批判理论相衔接。他接受了阿多尔诺、哈贝马斯等人的“后期资本主义”概念，但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相反，他断定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关系并不朝向有利于民主的方向发展，而是朝向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方向迈进。在 W. 施特雷克看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低估了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盛行程度，也忽视了资本的作用。实际上，20 世纪 70—80 年代，并非大众放弃了对战后资本主义的追随，

^① Vgl.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95, September 2013, S.185.

^② W. 施特雷克 (Wolfgang Streeck, 1946—)，德国科隆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普朗克社会研究所荣休所长。

而是资本越来越脱离“福利市场经济的制度化框架”^①。例如，市场自由化程度提高，市场内外向扩张加大，国家核心工业私有化，等等。

诚然，批判理论没有充分考虑到资本对民主的强大腐蚀作用，但它勾勒的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张力却仍然具有现实性。W. 施特雷克完全赞同这个判断，并进一步强调说，资本主义明显存在着危机，这必须通过“被购买的时间”来免除，就是说，政府试图通过抢先获得未来才能拥有的资源来满足公民的社会政治需求。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作者列举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政府为避免经济危机而相继采取的三个重大措施：（1）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当刺激通货膨胀率；（2）增加国家债务；（3）促进私人消费支出。这些举措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但总是会带来新的失败。W. 施特雷克指出，通货膨胀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工会地位的下降和结构性、持续性失业的开始，国家财政支出不断削减和公民的社会权利被损害。^② 例如，20世纪90年代，国家负债额成为公共舆论的焦点。政府与议会已经意识到，必须筹集更多资金用于还本付息。由此，他们的政治影响范围便会越来越小。与此同时，在美国、英国和北约国家，债权人或市场开始怀疑国家是否能够履行其金融义务？是否可能降低负债率？从实际情况可以看到，社会福利和政府开支被迫持续消减，资本市场在进一步地走向自由化。

第二，强调国家公民与市场公民之间冲突的不可和解性。国家公民是指由国家组织起来的能够参与政治生活和享有公民权的人。在定期选举中，公民们能够为决策做出自己的贡献；通过他们缴纳的税收，也使得国家能够履行自身的任务。与之相反，当国家缺乏税收，必须依赖金融市场才能履行自身的职责时，市场公民就形成了。市场公民是主要通过签署合同协议与一个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国际群体。他们按照诚信原则行事，目的是成功地赚取利润；并作为债权人，要求自己具有相对于国家的债务偿还优先权。与这两种公民相对应的是社会正义和市场正义：社会正义是国家公民所要求的社会公平、福利、安全保障等；市场正义则是市场公民所要求的纯粹的资本利润增长。

在过去几十年中，相对国家公民，市场公民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这

① Wolfgang Streeck, *Gekaufte Zeit. Die vertagte Krise des demokratischen Kapitalismus*, Frankfurt/M.:Suhrkamp 2013, S. 44.

② Wolfgang Streeck, *Gekaufte Zeit. Die vertagte Krise des demokratischen Kapitalismus*, Frankfurt/M.:Suhrkamp 2013, S. 77.

主要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由于长年负债，国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国家主权由此受到了限制；债权人利益在危机中要比国家公民利益更加重要；面对金融市场，负债国家必须时刻使自身显得值得信赖，即它有能力履行其金融义务；资本的跨国组织力比国家的组织力更易被高估。W. 施特雷克指出，市场公民地位提高又进一步导致了“经济的去民主化”^①。例如，“债务刹车”（Schuldenbremse）被写入德国宪法，欧盟机构对德国经济、社会、政治的监控和干预越来越多。因此，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民主与资本主义将渐行渐远。

第三，走向“化短期债务为长期贷款国家”之路。随着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以及民族国家行为可能性的耗尽，一条“化短期债务为长期贷款国家”的路径在 20 世纪 90 年代逐步显露出来。这条路径被 W. 施特雷克视为对“去民族国家化”（Denationalisierung）和自由化的制度性回答。在此背景下，欧洲各国形成了一个不太透明的“多层面治理”（Mehrebenengovernance）政体，即欧盟。它使得国家行政人员能够更大程度地被整合进欧盟委员会中，同时加强他们在本民族国家中的地位。这些行政人员要执行的条规几乎都与财政政策和社会政策有关。在执行这些条规时，他们常常会触犯到国内政治反对派或者干脆忽略政治反对派的反对。此外，欧盟也会通过威胁性制裁来增强自身实施措施的能力。这样，国家政治力量关系逻辑及其国家决策形成过程，将由此蒙上跨国市场与市场自由化的阴影。作为重要行动者的欧洲法院将在此过程中凸显出来。

与此同时，在国内经济政治生活中出现了财政整顿和国家重建，财政整顿几乎全部集中在削减支出和减少社会福利方面。受此影响的多数人是那些低收入因而不得不高度依赖国家提供服务岗位的人。尽管国家进行了财政整顿，但金融市场压力是持久的，特别是国家债务仍然庞大的国家。W. 施特雷克猜测，上述过程最终会导致民族国家的藩篱被拆除，国家干预市场的可能性进一步被限制，直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命运将完全受跨国市场的金融资本掌控，而非受这些国家中已有的社会正义原则支配。

那么，是否还存在出路呢？W. 施特雷克的回答相当激进，认为若要扭转当今颓势，需要一个“毁灭性的反对”。因为一切建设性的努力都会导致政

^① Wolfgang Streeck, *Gekaufte Zeit. Die vertagte Krise des demokratischen Kapitalismus*, Frankfurt/M.: Suhrkamp 2013, S. 147.

府努力去清偿已有债务，虽然清偿已有的债务也是必须的，但只是治标不治本。^①所谓“毁灭性的反对”就是要废除欧盟的统一货币。W. 施特雷克断言，废除统一货币将会促进欧洲各国和平相处，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差异。只有这样，各个民族国家才能自主地采用自己的货币政策，为自身经济发展规划适当的框架条件。因为 W. 施特雷克坚信，民主化进程不是通过逐步的同质化，而是通过“差异承认”之路才能够达到。^②

W. 施特雷克的分析和激进策略，引发了德国媒体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例如，在《民主或资本主义?》一文中，哈贝马斯对之进行了反驳。^③

第一，哈贝马斯批评了 W. 施特雷克给出的治疗方案。哈贝马斯说，(1) 考虑到民族国家的历史演变，即从民族国家控制领土和市场到民族国家被嵌入全球化市场之中，代表着全球化的进步方面，它使民族国家自身权力部分地被驯服，成共同玩家之一。基于此观点，W. 施特雷克坚持再次返回民族国家的主张是非常令人惊讶的。(2) 哈贝马斯认为当今世界社会是高度相互依赖的，这样一个世界社会对于政治治理的要求，最好应当通过日益错综复杂的国际组织进行调节。所谓“民族国家对外治理”的不对称关系，远远不能够解决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社会所产生的问题。因为世界社会问题从体制层面对民族国家产生的压力与日俱增，但世界社会在政治层面仍然停留在无政府状态。从这个思路出发，人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对 2008 年金融危机所做出的最初反应，即 G8 匆忙将金砖国家和其他国家纳入磋商之中。但另一方面，首次伦敦 G20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并没有产生结果，相反却暴露了一个缺陷，即在经济相互依赖的社会中，政治分裂只能削弱国家合作的能力。因而，如果恢复国家之间的民族堡垒，这一缺陷将会进一步加剧。(3) 民族国家的政治决策能力不足以逃脱快速膨胀但又功能紊乱的银行业的控制。当国家需要将银行部门与实体经济需求挂钩，并削减银行部门规模以达到功能上需要的规模时，如果国家之间不能联合以形成一个超越民族国家实体，而仅仅依靠国际条约，就无法应对这一挑

① Wolfgang Streeck, *Gekaufte Zeit. Die vertagte Krise des demokratischen Kapitalismus*, Frankfurt/M.:Suhrkamp 2013, S. 218.

② Wolfgang Streeck, *Gekaufte Zeit. Die vertagte Krise des demokratischen Kapitalismus*, Frankfurt/M.:Suhrkamp 2013, S. 245.

③ Jürgen Habermas, „Demokratie oder Kapitalismus?“, i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5/2013, S.59-70.

战。因而，欧洲货币组织成员国所面临的任务是将不可逆转的全球化市场带回统一到统一的政治影响力范围之内。目前，他们的危机政策事实上局限于仅仅依赖专家治理的临时措施，如果没有形成跨越国家边界的市民社会对他们施加压力，布鲁塞尔的执行机构就缺乏能力和动机，以一种社会可持续的方式管理不受控制的市场。

第二，哈贝马斯进一步批评了 W. 施特雷克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诊断。哈贝马斯指出，W. 施特雷克的分析框架包括三个行为主体：国家、经济、公民；分析的主题是：国家是否以及如何两个相互冲突的要求之间实现平衡？这两个要求分别是利润渴望和社会正义；分析的内容是：强调资本优先性而非社会正义诉求的新自由主义战略能够延缓危机，但代价是社会不满的聚集。哈贝马斯认为，W. 施特雷克的分析是基于行为理论而非经济系统的规律性，因而他的叙述在理论上并不支持任何危机预期。相反，在 W. 施特雷克框架下，危机预期应当因历史条件和偶然的权力积聚而异。当然，W. 施特雷克并不是保守主义者，他仍然赋予危机趋势不可避免性，并完全根据资本家商业利益来说明危机动力机制。然而，W. 施特雷克观点存在着缺陷，具体来说：一是忽略了政治的主动性；二是无法充分说明抛弃欧盟方案的原因；三是低估了宪法规范的有效性与既有民主的复杂性，诸如制度、规则等所具有的齿轮效应。这也表明，只有通过包括财政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在内的制度框架，才能充当处理欧洲货币联盟结构性缺陷的必要前提。

第三，哈贝马斯逐一反驳 W. 施特雷克对是否存在符合欧洲条件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民主形式的质疑。W. 施特雷克质疑这种政治体系的可行性和可取性，并给出了四个理由支撑自己的观点。(1) 质疑区域经济项目的有效性，是因为欧洲商业文化的历史异质性。在此，W. 施特雷克给出了原民主德国和意大利两个案例来支撑其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两个案例虽然提醒人们，在通过有针对性的项目促进落后地区发展时，应考虑到短中期的时间维度，但是，就欧洲经济治理需要应对的管制问题而言，这两个案例并不具有代表性。(2) 讨论了诸如比利时、西班牙这种不完美的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问题。W. 施特雷克认为，鉴于区域的多样性，整合问题在一个民族国家内已经很难驾驭，在大的欧洲层面将更难实现。哈贝马斯指出，一方面，复杂的民族国家历史会留下冲突的裂痕，但冲突往往发生在遇到经济危机和历史动乱之时。有一部分人感到不安全、害怕失去已有的地位，这部分人往往会诉诸于一定的身份地位（可以

是民族、语言、地区甚至部落)。另一方面,这种身份地位往往是被构建出来的,而不是可以阻碍融合的历史事实。身份地位构建的退化往往说明,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未能提供充分的社会安全保障。欧洲区域和民族的社会文化多样性是欧洲与世界其他洲的区别,而不是成为阻碍欧洲整合的壁垒。(3)不仅怀疑政治联盟的可行性和稳定性,而且还怀疑这种政治联盟的可取性。W.施特雷克认为北方吸收进南方的经济文化将会意味着相应的生活形式同质化。哈贝马斯提醒,不应该忽略民主的政治决策进程和与市场相一致的决策进程之间的区别。(4)W.施特雷克强调,宪法民主的平等主义色彩只能在民族国家的领土界限内实现,否则少数人文化将会不可避免地多数文化所击败。哈贝马斯指出,首先民族意识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被塑造出来的结果。其次国际法与现代国家体系是一种互补关系,因而现代国家的根本转变肯定要反映在国际法中。“二战”后,欧洲民族国家发生了变化,这也使得欧洲层面上法律制订更加迫切需要充分的民主合法化。W.施特雷克担心超越民族国家的民主平等,会使基于地缘相近性的身份共同体受益,而有损少数群体利益。哈贝马斯相信,制度创新可以避免这类现象。

总之,哈贝马斯认为,W.施特雷克担心会出现压制的集权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认为欧盟将会不可避免地成为欧洲联邦共和国。哈贝马斯强调,联邦国家模型是错误的,跨民族国家的民主政治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允许共享的治理)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条件。这种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主要基于欧洲人作为国家公民和欧洲公民的双重角色。

哈贝马斯与W.施特雷克的争论越来越受到德国政界和文化界的关注;而且,随着《被购买的时间:民主资本主义被延缓了的危机》、《民主或资本主义?》被译成意大利文,这个争论也迅速扩散至意大利。^①

八、共产主义历史与社会主义现实

2013年,德国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和实践史的著作并不多。其中,可圈可点的是Th.贝格曼(Theodor Bergmann)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结构问题:歧途、批判、创新》一书。就像Th.贝格曼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该书是

^① <http://www.resetdoc.org/story/00000022360>。

长期生活的结晶，是改革之后在诸多社会主义国家多次学习之旅的结果，是作者本人和来自不同国家，并信仰社会主义的朋友多次交谈的结果。该书试图“对共产主义的世界运动做出积极的回顾，同时也不忽略偏差、错误和罪过”^①。当然，该书并不研究欧洲各国和美国共产党的衰落，而是聚焦于掌权的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Th. 贝格曼一书关注的焦点是对客观的既定事实的认定、主观行为的理解以及对策略性决策失误原因和可能的替代性方案的探索。

首先，Th. 贝格曼勾勒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全景图——从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到苏联的“肃反”，从“希特勒与斯大林的结盟”，到“东方集团”（Ostblock）的解体。在本书开篇，Th. 贝格曼意味深长地引用了列宁曾经写给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告诫，“如果你们都不驱逐那些特别善变之人，只排挤那些聪明之士，只喜欢那些顺从的蠢人，那么你们将必定葬送党的事业”。^②在 Th. 贝格曼看来，曾经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和失败，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客观方面来看，共产主义运动的先天缺陷在于弱小国家的共产党全部围绕着唯一强大的苏联共产党的指挥棒转，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和物质上都依赖于莫斯科。随着 1946 苏联红军开始向东欧国家输送革命，该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依赖与从属关系进一步上升到两国关系层面。而最重要的主观因素则是斯大林及其由他领导的整个官僚集团的胜利。

其次，在本书中，Th. 贝格曼还特别关注中国的改革历程。Th. 贝格曼曾多次来到中国，并与许多中国学者探讨过中国的改革问题。因而，他的论述显得有根有据、客观公允。Th. 贝格曼认为，相对于苏联共产党高层，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更具有领导一个泱泱大国的才能和智慧。在这里，他特别强调对中国社会现实直接产生过影响的四次大讨论。这四次大讨论分别是：经济问题、党的历史成就及其过错、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没落、社会主义民主。^③这些讨论使得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更加彻底。Th. 贝格曼认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之所以成功，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之所以失败的主要原

① Theodor Bergmann, *Strukturprobleme der kommunistischen Bewegung. Irrwege-Kritik-Erneuerung*, VSA: Verlag, Hamburg 2012. S.7.

② Vgl. Theodor Bergmann, *Strukturprobleme der kommunistischen Bewegung. Irrwege-Kritik-Erneuerung*, VSA: Verlag, Hamburg 2012. S.9.

③ Theodor Bergmann, *Strukturprobleme der kommunistischen Bewegung. Irrwege-Kritik-Erneuerung*, VSA: Verlag, Hamburg 2012. S.62.

因之一；与此同时，Th. 贝格曼也讨论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风波，并认为这场风波主要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即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斗争的产物。他强调，中国的改革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在改革中所碰到的难题也一定能够解决。最后，Th. 贝格曼还讨论了古巴、越南和朝鲜的改革。可惜由于材料的缺乏，他的讨论并未充分展开。

由此可见，2013 年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继续稳步前行，同时也精彩纷呈，既有针对理论问题而出版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也有兼顾理论问题和现实关怀的学术会议和学术论著问世，还有针对理论和现实问题而主办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报告。在这些探讨中，理论反思与现实关怀并重、成就与问题同在。

作者：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法 国

一、2013 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概况

2013 年法国左翼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获得了多方面的成果。

从著作上来说，比较重要的主题包括：(1) 马克思思想整体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奥里维耶·代肯的《向马克思学习哲学思考》^① 和尼古拉·汤德莱尔的《卡尔·马克思：我是谁》^②；(2) 资本主义批判，代表性成果有吕克·费里的《马克思与共产主义假设：改变世界》^③、伊凡·吉尼乌的《回到马克思》^④、安德雷·梅山的《从斯密到马克思：两种资本主义研究路径》^⑤、史蒂芬·阿贝

① Olivier Dekens, *Apprendre à Philosopher avec Marx*, Ellipses Marketing, 2013.

② Nicolas Tandler, *Karl Marx - Qui suis-je ?*, Pardès, 2013.

③ Luc Ferry, *Marx et l'hypothèse communiste : transformer le monde*, Le Figaro Editions, 2013.

④ Yvon Quiniou, *Retour à Marx : Pour une société post-capitaliste*, Buchet Chastel, 2013.

⑤ André Mesin, *De Smith à Marx : Deux approches du capitalisme*, Editions L' Harmattan, 2013.

尔的《对新资本主义的思考：生活、资本与异化》^①；(3)以马克思主义为视角进行现实问题研究，代表性成果有纳沃克·多美尼克的《一个关于欧盟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②、阿迈迪·阿里·迪恩格的《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和非洲问题》^③；(4)马克思与精神分析理论的对话，代表性成果是让·米歇尔·帕尔米耶的《威廉姆·赖希：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之间的性革命》^④以及一些哲学家和一些精神分析专家参与撰写的《马克思与拉康：革命行为与分析行为——塞里希会议论文集》^⑤；(5)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皮埃尔·吕什的《论晚期卢卡奇思想》^⑥、皮埃尔·吕什和亚当·塔卡合著的《格奥尔格·卢卡奇的现实性》^⑦、阿尔诺·穆恩斯特的《生态主义的生态乌托邦：从恩斯特·布洛赫的具体乌托邦到社会主义生态学》^⑧，麦克·洛威的著作《铁笼：马克斯·韦伯与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⑨在广义上也属于这一类著作；(6)左翼思想视域下的后结构主义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有纪尧姆·希贝尔坦·布朗的《德勒兹与伽塔里思想中的政治与国家》^⑩、阿兰·巴迪欧的《德勒兹：存在的喧嚣》^⑪，另外在2013年英国华威大学教授约哈纳·恩杰穆勒关于后结构主义的著作《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拉康、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和索莱尔斯语境中的主体的声音》^⑫被译为法语，也壮大了后结构主义研究的声势。

-
- ① Stéphane Haber, *Penser le néo-capitalisme : vie, capital et aliénation*, Les Prairies Ordinaires, 2013.
- ② Nowak Dominique, *Une analyse marxiste de la crise de l'Union européenne*, Publibook, 2013.
- ③ Amady Aly Dieng, *Hegel, Marx, Engels et les problèmes de l'Afrique noire*, L' Harmattan, 14 mai 2013.
- ④ Jean-Michel Palmier, *Wilhelm Reich. La révolution sexuelle entre Marx et Freud*, Esprit Du Temp, 2013.
- ⑤ Silvia Lippi, Patrick Landman (Collectif), *Marx, Lacan: l'acte révolutionnaire et l'acte analytique: Colloque de Cerisy*, Erès, 2013.
- ⑥ Pierre Rusch, *L'oeuvre-monde: Essai sur la pensée du dernier Lukacs*, Klincksieck, 2013.
- ⑦ Pierre Rusch & Adam Takacs, *L'actualité de Georges Lukacs*, Archives Karéline, 2013.
- ⑧ Arno Münster, *Utopie Écologie Ecosocialisme de l'Utopie Concrete d'Ernst Bloch a l'Écologie Socialiste*, L' Harmattan (24 juin 2013) .
- ⑨ Michael Löwy, *La cage d'acier: Max Weber et le marxisme wébérien*, Stock, 2013.
- ⑩ Guillaume Sibertin-Blanc, *Politique et Etat chez Deleuze et Guattari*, PUF 2013.
- ⑪ Alain Badiou, *Deleuze: La clameur de l'Être*, Fayard, 2013.
- ⑫ Johannes Angermülle, *Analyse du discours poststructuraliste : Les voix du sujet dans le langage chez Lacan, Althusser, Foucault, Derrida, Sollers*, Rosine Inspektor (Traduction) , Lambert-Lucas, 2013.

法国左翼理论刊物在 2013 年普遍关注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下的西方社会政治话语的走向。著名的学术期刊《今日马克思》组织了关于“世界历史”和“民粹主义与反民粹主义”的讨论^①；《政治理性》第 52 期和《戏剧 / 大众》第 207 期都将注意力放在自由主义问题上，前者的主题是“米歇尔·福柯与新自由主义”，后者的主题则是“戏剧与新自由主义”^②；素以观点犀利著称的《反潮流》第 16 期和第 17 期的主题分别是“法国左翼：危机与挑战”和“2013 年：什么样的左翼？”^③；《生态与政治》第 46 期关注的问题是“今日的政治生态学”^④。

2013 年法国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报告丰富多彩。巴黎一大思想史研究中心举办的“马克思在 21 世纪”系列讲座已举办多年，在法国思想界有着非常大的影响，2013 年该系列讲座的主题包括“马克思：我们时代的思想家”、“马克思与艺术”、“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世界”、“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德里达对马克思的解读”、“马克思主义与开放历史的书写”、“马克思、政治与历史”、“重读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 - 哲学手稿》”、“费尔巴哈与马克思”、“对启蒙思想家的马克思主义解读”、“为何及如何重读《资本论》？”、“《资本论》手稿研究”、“马克思与当代正义理论”等。西巴黎大学索菲亚保尔研究中心 (Laboratoire Sophiapol) 作为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重镇，也组织了众多研讨会和讨论班，其中包括“当代的统治概念”、“社会主义与教育”、“社会主义与财产”、“政治生态学”、“布尔迪厄与规训问题”、“福柯与政治”讨论班，“权力、劳动与情感”研讨会，“马克思与新国际主义”辩论会等。

本报告将重点反映 2013 年法国马克思主义左翼学界在“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世界体系问题研究”和“民粹主义问题研究”三个方面的成果。

① Actuel Marx 2013- n° 53 Hisoire globale/PUF (19 avril 2013); *Actuel Marx* 2013- n° 54 Populisme, contre-populisme/PUF.

② *Raisons politiques*, N° 52, Novembre 2013: Les néolibéralismes de Michel Foucault/ Le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16 décembre 2013); *Théâtre/Public*, N° 207, Janvier-mars : Théâtre et néo-libéralisme/Éditions Théâtrales.

③ *ContreTemps*, N° 16 : La gauche en France : Crises et défis/Éditions Syllepse (24 janvier 2013); *ContreTemps*, N° 17 : Quelle (s) gauche (s) en 2013 ?

④ *Ecologie et Politique*, N° 46/2013: Les écologies politiques aujourd' hui: Tome 4, Amérique latine.

二、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

伊冯·吉尼乌在其著作《回到马克思》中，针对欧洲资本主义体系面临的全面危机，再次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根据吉尼乌的解释，“回到马克思”这个口号的意思，并非简单地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也不是要“原教旨地”回到马克思的思想，而是以马克思的基本思想立场即资本主义批判作为审视当代世界的根本出发点。在吉尼乌看来，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人类现实经验中经历了许多挫折，但在当今仍然是与新自由主义争夺思想霸权最主要的精神资源，其重要的理论力量在于，论证了共产主义只有基于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具有历史的可能性。不过吉尼乌所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并非仅仅指物质生产方面的充分发展，更是指民主形式的充分发展。吉尼乌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意义和价值只有在当代才真正凸显出来，从这个概念在当代思想中重新引起关注（像巴迪欧和齐泽克等都曾就共产主义问题发表过富有影响力的见解）就能看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到来就像黑格尔辩证法所规定的绝对精神那样具有本体论的必然性，毋宁说，共产主义乃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道德律令，它着眼于前人类的利益，为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敞开了可能性。

欧里维耶·代肯在其著作《向马克思学习哲学思考》中概括了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的三个思想贡献。代肯认为，马克思的第一个思想贡献是思考哲学概念的独特方式。马克思在使用他的概念时，往往突破了理论和实践、理智和感知、抽象和具体之间的对立。马克思并不否认这些对立方面之间的区别，但也没打算将它们综合在一起，更没想过要消除其中的矛盾。在马克思那里，哲学就是概念中的（而非对于概念的使用之中的）理论实践。像“意识形态”这样的概念，如果从科学的意义上看不是一个理论性的概念，而是一个作为理论—实践概念的“现实的反思性表达”。而哲学一般乃是现实对于自身的双重性质的阐述，而非某种双重现实的理性表达。在代肯看来，“人本身”这一体现了马克思思想本体论深度的概念，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抽象是由于这里没有个体性，而具体则是由于这一概念与“物质关系”紧密相连，而“现实”正是以这种“人”的概念为基础的作为社会关系的人的关系。马克思所表述的这些概念的力量就在于，这些仿佛是马克思创造出来的概念其实是“现实”本

身的形式。代肯认为，马克思的第二个理论贡献，就是通过在《资本论》中所提出的概念全体，建构了一个社会现实分析的框架，这个分析框架不仅能够指明这种社会现实的异化模式，也能够理解异化的经济根源。《资本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这一切大白于天下。马克思在该著作中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呈现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缺陷，这种呈现本身虽不足以颠覆这种生产方式本身，但对这一系统的偶然性的意识本身毫无疑问是使该系统有可能被瓦解的第一步。代肯认为，马克思思想的第三个贡献在于其对历史的解释。代肯将马克思的历史观称为“历史之诗”，意思是马克思从共产主义的高度出发揭示当下生活的意义，而这种历史观增加了人类内心的希望。如果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理解为共产主义而进行斗争的话，那么这一斗争显然将关于人的理论、关于社会的思想、经济学和关于未来的诗联结在一起，而这一斗争所带来的革命既是人的解放，也是社会性的显现，更是现实本身的现实化。

斯蒂芬·阿贝尔和弗雷德里克·蒙费朗在文章《一个无尽的资本主义？论皮埃尔·达尔多和克里斯蒂安·拉瓦尔的著作〈马克思，名卡尔〉》^①中，分析了伽里玛出版社于2012年推出的《马克思，名卡尔》一书中所强调的“矛盾的马克思”的观念。《马克思，名卡尔》将马克思的思想视为由两部分不同的要素组合：一方面，马克思描述了一幅凄凉的图景，即，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体系，具有不断复制自身和无限扩展自己的霸权的能力；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提出了一个聚焦于以解放为目标的工人阶级意志的问题。阿贝尔和蒙费朗探讨了这样一种解释的内在困难，并试图证明，马克思思想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让·维乌拉克在题为“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革命和去神秘化”^②的文章中认为，马克思毕生理论工作的目标，是从科学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批判。他是在古典经济学的领域之内进行这一工作的，因为他承认该领域的科学性。所谓科学性，是指个体服从普遍和必然的规律。科学的经济学研究将所有对立面都归于仅仅处于乌托邦的地位。马克思的全部批判奠基基于一个基础理论，这一基础本体论将生活着的个体行动者的主体性活动重新界定为现实的根源，因此将理论领域理解为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体现。马克思以此方式强调

① Stéphane Haber, Frédéric Monferrand, «Un capitalisme infini? À propos de Marx, prénom: Karl, de Pierre Dardot et Christian Laval».

② Jean Vioulac, « Révolution et démystification dans la pensée de Karl Marx ».

了理论逻辑特有的神秘化倾向，不过他同时也揭示了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机器的“平庸地发生的、真实而非想像的神秘化”，这种神秘化过程创造了价值的“变化多端的形式”。这解释了何以不论从理论的还是实践的观点看革命都可以被界定为去神秘化。

安德烈·托塞尔在他的文章《社会冲突与认同冲突之间的民主》^①中将社会冲突与认同冲突区分开来。对于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的理解，不能离开资本主义和劳动的对立。这一冲突形式的根源在于对一般确定之物（生活、工作和语言等等）的确认，其中包括了一种普遍主义的维度，即对全球资本主义统治和霸权普遍性的质疑。而认同冲突则是以对于与某些曾被否定、或被控制并围绕“我们”和“他们”的对立而被组织起来的从属形式有关的、某些确定之物的承认为基础的，其目标是获得对这些同一性之中的必然之物的认同。托塞尔认为，二者的这种紧张关系应当重新被考察，而不是仅仅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陈旧的二元论模式来审视它们。资本主义的纯逻辑总是在人类学差异的辩证法之中被考察并在这种辩证法中被确定的。这些人类学差异是无法被一劳永逸地抹平的，它们总是与对于生活、工作和语言的确认有关。因而，用政治术语来说，我们必须避免这些冲突中的任何一种出现“独立化”。我们必须考察的是这种从一者到另一者的无穷运动。

让-克里斯托夫·昂饶在题为《重思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②的文章中，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当代各种无政府主义思潮都不仅忽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而且也忽视在无政府主义传统中形成的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话语。昂饶对此倾向进行了批判，他强调这种批判话语与当代的关联，同时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在对所有统治形式的彻底批判中所做的贡献，并因而提醒人们重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无论是对于历史哲学、政治的地位、组织的作用，还是将无产阶级作为唯一的革命主体的假设的批判）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其中有许多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其说针对马克思本人，不如说针对的是第二国际思想家们，这些批评与我们的当代条件仍然具有内在的关系。进一步说，这些批评的另一面是企图超越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两个传统各自的片面之处。于是，马克思

① André Tosel, «La démocratie entre conflit social et conflit identitaire».

② Jean-Christophe Angaut, « Retour sur les critiques anarchistes du marxisme ».

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冲突的最重要遗产就是自我解放的问题。

樊尚·乌庸在题为《重置马克思：对米歇尔·昂利和雅克·德里达的交叉阅读》^①中试图引入德里达的视角来理解米歇尔·昂利对于马克思的阅读。米歇尔·昂利在对马克思的阅读中对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遇到的危机所揭示的危险提出了警告：无论是在现存的所谓共产主义，还是在一个技术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个体都会出离自身成为异化的抽象物而与个体本身相对立。昂利由此认为，这两种社会形式都是摧毁生命的社会形式。马克思主义所遇到的危机源自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错误的把握，二是经济现实被错误地赋予了客观现实的地位。而资本主义的危机则源于技术获得了优先性并因而一方面排斥了活劳动，另一方面剥夺了工人的生命。乌庸认为，米歇尔·昂利的这一解释在于要求将马克思“回置”于生活。昂利将生活理解为全部存在和现实的基础。乌庸引入了德里达的解构策略，探讨了这一“重置”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这一重置的意义。在乌庸看来，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已不再可能仅仅通过将马克思重置入一个被设想为“无害”的生活概念而实现。

艾玛努埃尔·雷诺在其文章《杜威、胡克与毛泽东：马克思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关系》^②中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两种思潮之间的亲缘关系。雷诺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各自的演进历程使人们今天很难想像二者之间曾一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对这种关系的忽视导致人们低估了杜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亲缘性以及杜威在美国经过胡克、在中国经过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影响。雷诺强调，杜威经由毛泽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影响更加隐蔽和不为人所知。在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他首先接受的是实用主义，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深受那个时代诸多实用主义主题的影响，如教育对于政治的作用、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的工具主义和多元主义理解，“探究”观念的重要性等等。在对此有所认识之后，我们方可认识到20世纪并非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并因此能够重新审视我们继承20世纪的遗产的方式。

① Vincent Houillon, « Restitution de Marx. Lectures croisées de Michel Henry et Jacques Derrida ».

② Emmanuel Renault, « Dewey, Hook et Mao : quelques affinités entre marxisme et pragmatisme ».

三、世界体系问题研究

在伊曼纽尔·华勒斯坦和史蒂芬·阿贝尔的一场对话^①中，华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正处在一种结构性的危机之中，这一危机并不仅仅体现为一些数据的下滑，更体现为这个系统作为系统已经严重偏离了均衡状态。这样就有了两种选择，而当前的政治斗争就是针对最终选择哪一个作为无数行动者在无数瞬间进行的无数微观行动的一个结果而展开的。结果会怎样不可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二者之中会有一个肯定最终会占据上风。华勒斯坦追溯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作的一般方式，还探讨了资本积累从最高峰到逐渐衰减（这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根源）的过程。华勒斯坦还分析了历史体系的两种主要的循环性节奏即康德拉捷夫曲线(Kondratieff Cycles)和霸权曲线(Hegemonic Cycles)起作用的方式，探讨了它们逐渐靠近的趋势之无法扭转的原因。华勒斯坦还分析了1968年的“世界革命”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保持其地缘文化的系统能力的影响，以及保守右派和激进左派逐渐摆脱“自由主义中心”的束缚而分别独立运作的趋势。

巴里·吉尔斯在题为《世界体系理论：对世界历史、全球化和世界危机的分析》^②的文章中，对他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共同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概念和所做的历史解释。吉尔斯在文中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华勒斯坦世界体系做了对比。吉尔斯批评了后二者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他试图提供一种非欧洲中心主义的分析。吉尔斯和弗兰克的世界体系分析试图保留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要素，包括其批判纬度，同时提出了一个回应现实世界历史背景中的世界发展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既包括近代以来的“全球化”和全球历史的进程，也包括过去数千年的世界历史发展史。

伊夫·大卫·于高在题为《资本主义诞生于何时何地？罗伯特·布列那、伊曼纽尔·华勒斯坦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著作中对于范围的概念和所提

① «Une crise globale qui attend encore sa resolution. Un entretien de Stephane Haber avec Immanuel Wallerstein».

② Barry K. Gills, «La théorie du système monde : Analyse de l' histoire mondiale, de la mondialisation et de la crise mondiale».

出的问题》^①的文章中，对当代几种有代表性的世界体系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诞生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的观点进行了比较。于高指出，按照一般对马克思的阅读，成熟条件应当包括一种以雇佣劳动为代表的特殊生产关系和产生于工业革命并处于一种特殊状态的生产要素，而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在 18 世纪下半叶的英国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诞生；但为了解释诸如非洲和南美洲国家 20 世纪 70 年代的持续低速发展或亚洲经济自 20 世纪 90 年代的持续快速发展这样的现象，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在更广阔的时空视野之下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行了审视。华勒斯坦引入了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 的“世界经济”概念，将资本主义的诞生时间定为 16 世纪初，地点确定为包括整个欧洲及其附属地区在内的被两极化为中心和边缘的不平等的生产和交换的广大区域。而弗兰克则进一步扩展了这个模型，认为关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可以追溯到古代积累体系的出现，而该体系的中心几乎始终在亚洲。

雅克·比岱在题为《面对世界历史的马克思主义》^②的文章中，对“世界体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在比岱看来，“世界体系”理论对于世界历史的描述，与马克思的历史观非但不冲突，甚至更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在当代语境中，“世界体系”理论所提出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也事实上起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与政治行动进行整合的作用。但比岱认为，从根本上说，“世界体系”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具有颠覆作用的，因为前者在不断追问“谁会是下一个霸主”的问题的过程中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最终理论与实践目标，即资本主义和阶级统治的终结的问题意识本身。比岱认为，马克思通过对于连续性的“生产方式”的分析，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这一讨论明显是线性的并具有目的论的色彩，而这些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固有特征在“世界理论”体系中不复存在，因为后一理论不再将人类历史视作不断走向作为现代性的完成的“解放”，而是以一种循环的方式理解历史。持“世界体系”立场的理论家们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后者忽视了或未能实现某种“地理学”构建，但在比岱看来，这一批判并未能触及根本问题。在比岱看来，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在于他的基础性概念“生产方式”的抽象性。比岱认为，“世界体系”理论中关于位置的概念（比如“中心”，“边缘”

① Yves-David Hugo, «Où et quand le capitalisme est-il né ? Conceptualisations et jeux d'échelle chez Robert Brenner, Immanuel Wallerstein et André Gunder Frank».

② Jacques Bidet, «Le marxisme face à l'histoire globale».

等)都是以具体的方式界定的,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概念,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形式化关系,则是以抽象的方式提出的,即从全部区域性所指(référent territorial)中抽象而得到——这种形式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把握历史现象,特别是当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能力大为减弱。但比岱同时也认为,“世界体系”理论尽管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有所修正,但并未完全满足观察时代的要求,因为现代性并非仅仅是由世界体系造就的,而是世界体系和阶级结构共同的产物。比岱这里所说的“阶级结构”,主要被理解为一种民族国家内部制度——当代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趋势,就在于这种原本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制度逐渐越出国家界限,而推动“世界-国家”的生成。这种人类生活状态不是一种“后现代”状态,而是以“世界体系”和“世界-国家”的混融为特征的“终极现代性”(ultimodernité)。

皮埃尔·夏尔波尼耶在题为《产出与战利品: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审视》^①的文章中,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即资本主义与其成长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来审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夏尔波尼耶提出一个概念:作为一种与自然的关系的形式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如果哲学经常假设现代性的特征是自然之物与社会之物的分离,那么西欧的经济发展史无疑可作为一个独特的佐证。商品的逻辑总是倾向于将资本主义与界定它的环境的关系隐藏起来。处于宏大的工业革命进程中的众多人口与所需要的巨大自然资源之间存在着某种时空断裂,这种断裂一直持续到今天,而这使我们能够理解何以在当代的经济活动和支撑它的自然消耗之间存在着如此严重的分离。

菲利普·鲍亚尔在题为《古代世界体系与统治、共同演进和抵抗:以17世纪之前东非海岸为例》^②的文章中,探讨了古代世界作为一个以印度洋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边缘的东非斯瓦西里(Swahili)的命运。鲍亚尔分析了非洲东海岸(连同其大陆腹地)与阿拉伯、波斯以及印度“核心”(其特点一方面是剥削、奴隶制、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控制,另一方面是知识、纺织品、著作和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之间的关系。鲍亚尔以此为出发点重新探讨了劳动分工、交换价值、货币、资本等问题。他强调了东非的反应能力和创造力,认为

① Pierre Charbonnier, «Le rendement et le butin.Regard écologique sur L'histoire du capitalisme».

② Philippe Beaujard, «Systèmes-mondes anciens. Processus de domination, de co-évolution et de résistance. L'exemple de la côte est-africaine avant le XVIIe siècle».

这些能力之受到阻碍，乃是由于该地区距离世界体系的中心过于遥远，并且没有农业发展的潜力，因为未能形成人口的飞跃和力量的提升。

菲利普·诺莱尔在其文章《从世界历史棱镜看资本主义的出现》^①中，试图探讨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具体开端问题。构成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背景的关键因素，如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军事技术等，都来自亚洲，而这些因素有时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这是否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在欧洲之外也发挥了作用？华勒斯坦将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资本主义的生成时间定在欧洲霸权出现的时候；弗兰克和吉尔斯假设资本主义已存在数千年了；而对布罗代尔来说，资本主义的生成与海洋贸易垄断的出现密不可分。诺莱尔区分了“积极商业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和“资本主义”三个概念。以此为基础，他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模型，其基础是商业逻辑与国家或领土逻辑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相互作用最终使得散播的商业资本走向现代的集中的资本主义。

四、民粹主义问题研究

埃蒂安·巴里巴尔在《欧洲：国家的虚弱与民粹主义问题》^②一文中讨论了“民粹主义”这一概念与欧洲经济危机背景下的排外抗议运动之间的关联。巴里巴尔提醒人们不要将当前欧洲局势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政治和道德危机作简单而轻率的对比，但同时也承认不能完全回避这种对比。巴里巴尔还指出了时下欧洲国家主义复苏的两个根源：一是欧盟无法抵御自身的多元主义以及在反对功利主义的普遍化过程中形成的民族和文化的多元性，二是20世纪在民族框架内形成的“社会国家”的坍塌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欧洲的重建已经迫在眉睫，但其前提是直接回应上述两个问题。

塞巴斯蒂安·巴罗在其文章《政治偏见与人民：关于拉丁美洲民粹主义的一些注解》^③中探讨了当前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巴罗指出，在最近拉丁美洲的政治现象中，民粹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多角度的研究，这些研究尽管角度多样，但绝大多数关于民粹主义本质的解释都是以对

① Philippe Norel, « L' émergence du capitalisme au prisme de l' histoire globale ».

② Etienne Balibar, « Europe : l' impuissance des nations et la question « populiste ».

③ Sebastian Barros, « Le préjugé politique et le peuple. Note sur les populismes latino-américains ».

于民众的类似的代表为基础的。而进一步说，这些代表的基础是一种偏颇的政治观点，这种观点倾向于将民粹主义理解为由一位克里斯玛型的和有权威的领袖所左右的异质性大众的共同体，这位领袖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政治生活“极化”。这种偏见的结果，导致民粹主义被视为多元主义和自由民主体制的调和性的威胁。巴罗解释了这种解释的缺陷，认为要避免这种理解，只有改变政治视角，将两者理解为都是创造大众认同的过程，并接受来自下层的对于共同体的民粹主义的代表。

热拉尔·布拉在题为《居于理性和影响之间的人民：关于一个现代政治的概念》^①的文章中，对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的“人民”进行了思考。他认为“人民”是在一个冲突性的领域中被引入的含混概念，在这个领域中各种彼此竞争的力量都试图在斗争中掌握“人民”，因而赋予它一种只有在与其他因素的对立中才能得到理解的意义。这样一种含混的概念可被视为共和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对立的观念根源。布拉认为，“人民”一词作为一个现代政治概念，最早是由米拉波在1789年6月的混乱局面中提出来的。黑格尔也曾试图在现代政治的语境中使这一概念变为一个哲学概念，但他并没有成功，最后他抛弃了这一概念，转而使用“国家”概念。但布拉认为，这并不表明“人民”是一个失败的概念，因为在米拉波所设计的这个概念中，内在包含着一个动人的维度，即多数人的统一。

让·克劳德·布尔丹在其文章《马克思与流氓无产者》^②中分析了马克思的“流氓无产者”一词。乍看上去，似乎是一个颇为激烈的概念，因为它所表达的是对一个处于流通领域、主要从事服务业的社会阶层的轻蔑甚至侮辱。但布尔丹在研究了这一问题之后指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对于马克思来说，“流氓无产者”其实并非一个概念。这个词所指称的是1848年6月的镇压以及“拉萨尔派”在革命中的失败所引出的无产阶级的参与问题。这个词并不指称一个“阶级”，其用法毋宁在于确定一种在所有社会等级中都明显存在的行为方式：投机钻营、通过各种卑劣的手段获取财富。布尔丹认为，马克思之所以将“流氓无产者”和对它的道德评价联系在一起，乃是源自黑格尔的贫困概念（“社会问题”）。马克思1844年对“非人”的需求和无产者中的投机行为

① Gérard Bras, « Le peuple entre raison et affects. À propos d' un concept de la politique moderne ».

② Jean-Claude Bourdin, « Marx et le lumpenprolétariat ».

的分析表明，作为无产者中的无产者，流氓无产者是无产者的消极因素所造成的，因此无产者和流氓无产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革命的主体性，而后者则不具有。

伊达·多米尼加尼在题为《后俄狄浦斯民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民主：意大利的例子》^①的文章中，分析了当代民粹主义之压过官方的改良主义的原因和意义。多米尼加尼分析了前后相续的三种民粹主义的形式，指出居后的民粹主义形式相较于居前的形式都增加了新的沟通工具和口号（主要是针对政治“阶层”的腐败进行批判）。这些民粹主义形式在政党政治持续陷入危机的背景下不断利用改良主义左翼的结构性弱点进行宣传。多米尼加尼通过对拉克劳著名的“人民的话语建构”理论进行批评性讨论，描绘了从服从法律的欲望主体的逻辑向消费个体的逻辑过渡的本体论的和政治的转变，伴随着这一转变的，是政治领导方式从克里斯玛型向“越度”型转变（像贝卢斯科尼和格里洛〈Grillo〉都属于这种“越度型领导人”），这种领导人更善于利用远程图像和控制互联网上的“平等主义”讨论。这种带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从代议民主向政治的媒介化的转变是不可逆的，应当进行现实主义的评价。

波阿文图拉·德·苏萨·桑托斯在《查韦斯：遗产于挑战》^②一文中探讨了“查韦斯革命”成就及其所面临的挑战。它的成就包括财富的重新分配、反帝国主义的地区整合策略，以及促进民众参与的各种机制的建设等等。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军事权力与文官集团的关系协调和如何保持其经济模式的稳定性的问题。不过其所面对的最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在没有一个克里斯玛型权威的支撑的情况下、在民主化进程和“社会主义转型”中保持大众参与的程度。

纪尧姆·希贝尔坦-布朗在题为《从民主的幻像到人民的虚构：少数人的民粹主义》^③的文章中，对当代民粹主义进行了批判。希贝尔坦-布朗的出发点并非产生了某种现实效力的民粹主义，而是“民粹主义”这一含混的观念或概念。在他看来，当代民粹主义观念表现为自相矛盾的“反民众的国家民粹主义”。在此视野下，希贝尔坦-布朗重读了德乐兹和伽塔里对于通过“大多数人达成一致”而对“治理形式”造成影响的所谓“后民主的”和“后政治的”

① Ida Dominijanni, «Populisme post-cædipien et démocratie néo-libérale. Le cas italien».

②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Chávez: l'héritage, les défis».

③ Guillaume Sibertin Blanc, «Du simulacre démocratique à la fabulation du peuple: le populisme minoritaire».

矛盾过程所进行的分析，而这又使希贝尔坦—布朗得以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考察“少数策略”这一术语。这个术语所表达的是由欧洲在当代情景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对于民粹主义的批判这一任务只有通过民粹主义这一概念的内在政治化来实现，也就是说，通过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要求，将权利关系进行追问的成熟的政治形式加以重新思考来实现——民粹主义自身处于对这种权利关系的追问之中，而这种追问又提出了“民粹主义的民主化”问题，这一问题可以在一种不再能通过对民粹主义这一观念的纯粹外部批判来把握的情景中从内部瓦解“民粹主义”这一概念。

雅尼·斯塔夫拉卡齐斯在题为《人民，民粹主义和反民粹主义：欧洲危机阴影下的希腊政治话语》^①一文中认为，当前国际政治话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民粹主义现象的再度兴起，但这种民粹主义并非旧的民粹主义的简单重复，而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就是，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围绕“民粹主义”展开复杂的语言游戏和政治重组，这一点在已受到全面危机的冲击但还没有实现制度变革的欧洲主流政治领域尤其突出。不过，上述危机也催生出大量新型的“反民粹主义”话语。因此，如果说在拉丁美洲，左翼的民粹主义成为反对贯彻“华盛顿共识”的工具，美国的“占领运动”将大众要求引入了公共辩论的话，那么在欧洲，对于危机的回应则未能成功地引入真正的大众因素，而是选择了“后民主”的（如果不是权威主义的话）的路向。希腊正处于这些进展的最前沿，该国近年来发生的事情体现了民主和欧洲的未来所遭遇到的威胁。而这又构成了某种形式的民粹主义在欧洲受到广泛欢迎的甚至是被广泛期待的一个原因。

① Yannis Stavrakakis, «Peuple, populisme et anti-populisme: le discours politique grec à l'ombre de la crise européenne».

英 国

鲁绍臣

正如第十届英国《历史唯物主义》杂志年会所指出的，资本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阶级之间的关系。2013年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当代资本与阶级关系的变化关注。本报告将围绕英国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与问题，《资本论》的当代意义和解读模式为主线，从英国相关的学术会议和公共活动、抽象统治与当代资本主义、体系辩证法与资本的客观逻辑、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对抗辩证法、意识形态理论等五个方面入手，重点介绍过去一年来英语世界的主要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诊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

一、“马克思主义节”和“《历史唯物主义》年会”

英国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的两大活动，即“马克思主义节”与“《历史唯物主义》年会”仍在进行。“马克思主义节”由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举办，每年一次，为期一周。“马克思主义节2014”如期进行，开幕式共有900人参加，在该活动的一周内，举办了数百场专题会议和各种活动。今年的演讲嘉宾主要是政治活动家和政党领袖，关注的主题是债务危机和紧缩政策的社会影响。来自“全英格兰反房产税联盟”的Marion Nisbet最先发言，她介绍了自己从一个

家庭妇女成为社会活动者的转变经历。来自西班牙的 Mireia Gargallo 讲述了西班牙政府的紧缩性削减政策给 600 万失业者带来的影响。他告诉听众：“唯一的办法是拒绝偿付不是我们自己的欠债！” Len McCluskey 也呼吁：“不要房产税！不要福利缩减！”这些发言表明，反债运动已经成为左翼政治的新的焦点。2013 年“马克思主义节”出现一些令人堪忧的情况。与以往情况不同，2013 年参会和演讲的嘉宾中很少有我们熟悉的知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翼知识分子。另外，会议组织者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日益受到质疑。2013 年伦敦大学不再像往年一样把学生活动中心（Union）出借给马克思主义节，一批女性主义者发表声明，认为 SWP 已经成了一个腐败、专制和歧视女性的组织。女性在活动中受到性骚扰和暴力，而 SWP 不仅掩盖真相，而且阻止各种批判的声音。“马克思主义节”的影响力已出现了疲软和颓势。

2013 年《历史唯物主义》杂志年会于 11 月 7-10 日在伦敦举行，年会的主题是“世界工人阶级的形成”（Making the World Working Class），会议重申了马克思的名言：“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①，其中最重要的阶级关系。分析阶级结构已经是一个复杂的任务，而如何转换和超越现有的资本主义关系更是马克思思想遗产的核心和困难所在。2013 年年会以纪念非裔著名哲学家詹姆士（C.L.R James, 1901-1989）的《黑人罗宾逊》出版 70 周年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E.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出版 50 周年为标志。会议组织者认为，在当今时代有必要铭记汤普森的教诲：工人阶级不只是被资本所构成，而且也在日常的行动和政治动荡中形成自身。同时也应该关注詹姆士的遗产，重视对种族和帝国主义语境中国际分工的研究，看到“黑人的雅各宾”的革命能动性以及其他被忽视的抵抗力量。

2013 年年会与往年一样有几十个专题会议，从参会论文和主题发言中可以看出，在生产中作为被动因素的劳动力与在政治斗争中作为积极因素的工人共同规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文化突变和政治转型。在题为“马克思理论中的概念：时间、机械和国家”^②的小组讨论中，马蒂诺（Jonathan Martineau）等就“资本主义的价值——占用和钟表时间：时间异化和资本主义时间的辩证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22 页。

② Concepts in Marxist Theory: Time, Machinery and the State.

法”^① 诸议题展开了讨论。在题为“政治经济学中的批判视角”^② 的小组讨论中，克莱特科 (Michael Krätke) 做了题为“阅读资本——如何能不阅读《资本论》?”^③ 的发言。穆里 (Patrick Murray) 等人做了“关于价值和资本的五个常见概念错误”^④ 的发言，它们分别是：1. 价值是功用性的；2. 价值是使用价值；3. 价值是交换价值；4. 资本就是资源；5. 资本主义社会受工具理性支配。在他看来，这五种解读资本的方式都忘记了资本首先是工人劳动的成果，它依赖于工人的活生生的生命与劳动，因此，资本不仅是物，而且是阶级关系。

大致来说，“马克思主义节”仍然是英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政治活动，而《历史唯物主义》杂志的年会仍然是英国乃至整个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范围和重大问题进行跨学科交流的重要思想平台和各种新观点的渠道。

二、形式规定性与抽象统治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资本作为一种抽象物对社会的统治越来越受到关注。在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是第一个发现了现代社会的“抽象统治”特征的哲学家，正如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黑格尔最先“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存在物的关系，把作为异己存在物的自身的实现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⑤ 在这里，黑格尔实际上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对抽象的统治 (rule of abstract) 的讨论具有重要意义，抽象统治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而且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之为人的形而上学基础。下面介绍有关这方面讨论的一些成果。

在托马斯等人编著的《马克思的实验室：〈大纲〉的批判诠释》^⑥ 一书中，

① Capitalist Value - appropriation and Clock Time: Temporal Alienation and the Dialectics of Capitalist Time.

② Critical Perspectives in Political Economy.

③ Reading Capital - How not to Read “Capital” .

④ Five Common Conceptual Mistakes about Value and Capital.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7 页。

⑥ Riccardo Bellofiore, Guido Starosta and Peter D. Thomas eds. *In Marx's Laboratory: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rundrisse*, Brill, 2013.

有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抽象统治有不少讨论。卡雷拉 (Juan Inigo Carrera) 在《方法：从〈大纲〉到〈资本论〉》^① 一文中通过考证发现，马克思早在 1857 年就已发现范畴的抽象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马克思强调，他的方法并非是从概念出发，也不是从旧唯物主义的直观的具体出发的，而是从抽象到具体、具体到抽象的双向过程。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②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仅仅完成了从具体的表象到抽象的规定的转变，而马克思还要求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构成一个思想的具体，通过这一方法论思考把握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构成现代资本主义的形而上学前提和基础，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真实的意识形态和秘密所在。

在该书的第三部分，恩格尔斯基兴 (Howard Engelskirchen) 的《〈大纲〉中的资本概念》^③ 一文也认为，作为因果规定性的“价值”、“资本一般”之类的形式规定性实际上是一个毫不含糊的因果过程和因果动因，这种动因是洛克式经验主义所无法把握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资本一般”既是形式的规定又是内在的、实质的规定，它们既是经济学范畴，又是社会本身的客观存在。形式规定性的这种强制性可以从马克思的大量描述看出。马克思认为，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而“资本——而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在恩格尔斯基兴看来，不管是实证主义者、诠释学派还是后现代主义者都未能真正深入到马克思所开创的对形式规定性的因果性与实在性的深入研究之中。这种研究的缺失使得传统哲学要么只看到物，要么只看到理论与概念，无法把握资本主义通过其抽象的价值、资本、货币等抽象形式实施其统治这一根本特征。

马克思对抽象统治的批判有丰富的内容，既涉及到对抽象主义方法论的批判，也涉及到对资本主义抽象现实的批判。早在 1845 年，马克思、恩格斯就要求我们要反抗词句的统治 (let us revolt against this rule of concepts)，而费尔巴哈仍然停留在概念抽象的人的阶段。但马克思对抽象统治的批判中更重要

① Method: From the *Grundrisse* to *Capital*, Riccardo Bellofiore, Guido Starosta and Peter D. Thomas eds. In *Marx's Laboratory: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rundrisse*, Brill, 2013.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 页。

③ The Concept of Capital in the *Grundrisse*, Riccardo Bellofiore, Guido Starosta and Peter D. Thomas eds. In *Marx's Laboratory: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rundrisse*, Brill, 2013.

的内容是指出这种统治形式的历史性特征。在《大纲》中马克思说：“价值这个经济学概念在古代人那里没有出现过。价值只是在揭露欺诈行为等等时才在法律上区别于价格。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的最抽象的表现。”^① 同样，资本、货币等范畴也是如此。

柯林尼科斯在《解码资本：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命运》^②一书中亦指出，对抽象性的理解要从价值论出发才能实现。在该书的导言中，作者明确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回来了”，要了解资本主义就需要理解马克思对抽象统治及其对主体影响的批判。柯林尼科斯明确认为，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就开始了从实体主义向关系存在论的转变。这一“关系存在论”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能够对资本主义的拜物教做出深刻的批判。拜物教不论是以何种形式出现，总是把崇拜物视为抽象的形式，而不是具体的关系。柯林尼科斯认为，资本作为价值，它对物质的存在方式即资本的使用价值是毫不关心的。“这些物质要素不会使资本成为资本。”^③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描述成古典劳动价值理论，尤其是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继续和完善，以及与之相关的剥削理论最近几十年来一直遭到广泛的质疑和挑战。这些学者不再认为价值应被定义为商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剩余价值也不应被定义为劳动者在获得与其劳动力价值相当的工资后被剥削阶级所占有的劳动量。他们将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解为历史上的特定社会关系，即建立在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劳动产品所采用的特殊形式。强调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和货币的分析，尤其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的分析，而所有“古典”方法都将其忽视了。

柯林尼科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们崇拜的是物的经济形式规定或社会规定，而这些本来是社会历史的形式却被拜物教式地表现为它们本身内部所固有的自然属性。要破除这种拜物教就需要从抽象的价值形式回到具体的社会关系。资本作为价值形式，实际上是社会关系，而在所有的关系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剥削关系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又是最重要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一种微妙的平衡，既非将价值还原为具体化的劳动，也没有将其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9页。

② Alex Callinicos, *Deciphering Capital: Marx's Capital and its destiny*, Bookmarks Publications, 2014.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

解进交换之中。”^① 在这里，所谓的“微妙”（delicate）平衡是指抽象劳动概念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存在着循环往复的关系。基于这种关系对实体的优先性，作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强调主体对关系的优先性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作者认为，奈格里在《马克思超越马克思》中将资本关系还原为了主体间（社会劳动与社会资本）的力量关系，在《帝国》中用空间的位移来代替社会政治的转换，是一种对马克思的远离。当代激进政治对资本的抵抗可以说是外在于资本关系的，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呈现的是革命主体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关联。

在对价值形态与社会特征的关系上，海里希的《马克思〈资本论〉三卷导论》^② 也值得一提。它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最大的错误在于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实体主义误读，只强调劳动与价值的关联，没有看到价值形式的重要性，这样，实际是把马克思主义还原成了李嘉图主义。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价值的形式化，劳动的生产采取了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生产形式。

克里斯托夫·J亚瑟在《抽象劳动的实践之真》^③ 一文中也对这个问题做了讨论。在他看来，马克思在早期就反复思考过“劳动”这一概念的本质，并意识到它在现代社会的双重规定性，而其中最重要的规定性是其“抽象”的规定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了他的“抽象劳动”这一概念。在他看来，马克思从未说过价值来源于抽象劳动，更不会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认为价值是具体劳动的凝聚。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劳动并非对具体劳动的概念抽象，而是指一种无差别的形式实在。黑格尔曾把普遍性区分为具体的普遍性和抽象的普遍性，具体的普遍性通过各种不同的特殊性来表达自身，而抽象的普遍性否定特殊性并且遮盖其他的特殊性。在亚瑟看来，马克思的使用价值具有黑格尔所说的具体普遍性的特征，而他的价值则是一种纯粹的抽象普遍性。这种抽象的普遍性非但不是来自于具体的劳动，而且是资本对具体劳动的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和统摄。因此，马克思的抽象劳动不是指概念意义上的抽象，

① Alex Callinicos, *Deciphering Capital: Marx's Capital and its destiny*, Bookmarks Publications, 2014, p89

② Michael Heinric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ree volumes of Karl Marx's Capital*, New York, 2012, p.49

③ Christopher J. Arthur, The Practical Truth of Abstract Labour, Riccardo Bellofiore, Guido Starosta and Peter D. Thomas eds. *In Marx's Laboratory: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rundrisse*, Brill, 2013.

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的抽象。在亚瑟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总是从属于价值增殖的抽象劳动的，而具体劳动仅仅是指资本为了更大的增殖而进行的科层布局和分工，并不存在所谓的活劳动。总之，在亚瑟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只存在承载着资本时间的物质劳动。作者进而分析了拜物特征 (fetish-character) 和拜物教的关系。就前者来说，当某物获得了由社会形式赋予的客观权力，此物就获得了它的拜物特征。这里的拜物特征不是一种思想的规定性，而是一种现实的形式规定性，有着“抽象的物质性”。而拜物教则是一种误认，当人类活动的现实规定性在社会意识中被认为是自然规定性的时候，拜物教产生了。在马克思那里，商品具有拜物特征，因为价值作为抽象劳动形式是有“客观有效性”的存在，不仅仅是错误的认识。类似的分析也适用于拜金主义，金钱作为抽象的价值载体，本身具有拜物特征，当把金钱拥有的社会权力属性理解为金钱本身的自然属性时，就产生了金钱主义拜物教。

穆里在《无可避免的危机：反思巴克豪斯和〈大纲〉中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发展》^①一文中强调，马克思、恩格斯从未简单地重视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本身，他们关心的是财富及其再生产的社会形式和目的。但是，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强调一直遭到忽视和误读，而最近几十年来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新辩证法派的解读改变了这一局面。这一改变可追溯到巴克豪斯写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论价值形式的辩证法”一文。在穆里看来，价值的社会形式并不是具体财富生产的结果和对它的抽象，恰恰相反，其决定着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或者说是其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

在《历史唯物主义》2013 年第 4 期上，史密斯发表了题为《〈大纲〉中的“一般智力”及其超越》的文章。作者认为，“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ual)一词来源于马克思的《大纲》中的“机器片断”(fragments on machine)，这个文本被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维尔诺 (Paolo Virno) 等人大力阐发，认为我们应该从交换返回到生产，以便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真正贡献。但他们同时也抛弃从钟表时间出发的传统劳动价值论，认为“一般智力”才是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的关键所在。与维尔诺类似，韦尔切洛内 (Carlo Vercellone) 也认为，马克思的时

^① Unavoidable Crises: Reflections on Backhau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Value-Form Theory in the Grundrisse; Riccardo Bellofiore, Guido Starosta and Peter D. Thomas eds. *In Marx's Laboratory: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rundrisse*, Brill, 2013.

间价值理论的前提是直接劳动被钟表时间所衡量，时钟时间为社会财富提供了适当的衡量标准。而当代日益重要的创造性的劳动使得时钟时间不再能够衡量劳动的经济价值，因为商品的价值不再能够由内化于其中的钟表时间所衡量，而主要是由社会的科学技术所代表的一般智力以及个人的创造性劳动创造。因此，我们必须提出一套从劳动的时间价值理论向知识价值理论过渡的方案，将人考虑为首要的固定资本，这一解释路径不同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但是，在史密斯看来，他们这样做就彻底拒绝或背叛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了。史密斯认为，维尔诺他们的错误在于混淆了价值与财富，或者说价值与使用价值，他们不过是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现代翻版。他们似乎假定，价值是由内化于产品的直接劳动时间的同质单位所决定，而今日的状况又使首要的生产力从劳动时间变成了一般智力，如果是这样，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确实不再能够解释今日的状况。然而这种理解是片面的。马克思从来没有相信过资本主义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时期价值是用简单劳动来衡量财富的，马克思不仅强调自然力的贡献，“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①而且也强调科学技术的贡献。史密斯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极为复杂而有争议的，但其核心方面是强调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劳动直接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形式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是劳动时间，而是货币为价值提供了唯一客观的社会标准。生产环节中的价值是抽象劳动，它由同质的、无差别商品属性（货币）所中介，一般化的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体系最明显的特征。在史密斯看来，马克思的最重大贡献在于提出了形式规定性和拜物教的理论。货币和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工具或流通手段，而且是一种具有本体论优先地位的形式规定性，影响着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意向与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长……生产者在什么程度上依赖于交换，看来，交换也在什么程度上不依赖于生产者，作为产品的产品和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之间的鸿沟也在什么程度上加深。货币没有造成这些对立和矛盾；而是这些矛盾和对立的发展造成了货币的似乎先验的权力。”^②正是对形式规定性的强调，马克思也发现了资本主义拜物教的秘密，即将货币作为一般价值的尺度这一历史属性视为永恒和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定性。总之，在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密斯看来，维尔诺等人虽然做了不少有益的创新，但却也严重低估了形式规定性和拜物教的强大性。

巴塔查里亚在题为《资本的谱系》^①一文中从另一角度研究了抽象统治问题。在他看来，商品拜物教和工资形式并非仅仅是一个表象和欺骗，按照苏联哲学家鲁宾（Isaak Rubin）的说法，它还是一种构成性的在场。物与物之间商品拜物教的幻象形式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其隐藏了真实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它也使得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得以成为可能的条件。在这样的意义上，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所需要的必然的和构成性的在场。比如，如果没有“平等”的交换形式，雇主和劳动者之间、商品所有者之间关系便无法建立起来。以往那些试图揭开拜物教的幻象以把握藏于其后的真实本质的努力往往不自觉地贬低了形式的构成性权力，并且在形式与本质之间再次形成不应有的二元区隔，从而看不到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最重大的差别。马克思早就指出，前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人对人的直接统治之上的，而资本主义是通过物的中介而实行的抽象统治。但是，“无人统治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统治；无疑，在某些特定的情势下，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最残酷、最暴虐的统治形式。”^②

在《资本主义的图式：时间，货币和抽象的文化》^③一书中，洛茨认为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功能与康德式图式在传统观念论中的地位一样重要，它们都意味着无差别的抽象一般统治着差异的具体的对象世界。就如马克思所说：“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一般购买力，所以任何东西都可以购买，任何东西都可以转化为货币……一切东西可以为换取货币而让渡，那么一切东西也可以通过货币而取得……正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样。”^④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同意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的诊断：资本主义是抽象交换体系控制一切的社会。但作者也指出，阿多诺对抽象统治的批判还仅停留于交换价值的作用上面，没有认识到另一个社会物质范畴，即货币的作用。作者认为社会物质的图式化并非由文化工业，而是由货币所驱动的。货币作为资本主义的价值形式，是所有社会

① Neeladri Bhattacharya, *Lineages of Capit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13-4.

② [美] 汉娜·阿伦特：《公领域与私人领域》，载《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72 页。

③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Lexington Books, Lanham MD, 2014.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68 页。

关系得以组织起来的真正“太阳”，承担着支撑整个社会的本体论角色。货币是一种现实的抽象（real abstraction），对它的批判不仅是拜物教意识的批判，也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抽象化的过程是一个在真实社会世界的真实过程，它有如一辆撞翻你的车一样的本体论的严格性。”^① 作者对哈贝马斯主张的批判理论的“规范”转向也持批评态度，认为它陷入了观念论和保守派的窠臼。作为社会物质图式的资本主义图式不能再仅仅被理解为认识论或精神的图式，货币及其流动形式为进入社会实在提供了可能性。换句话说，货币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意义化和框架化，它是现代生活的现实普遍性，是我们日益臣服于它的真实力量，也是构成了人类过去与未来之间联系的社会视域（social horizons）。通过信用、债务和金融，个体的想象力和记忆也日益被整合进并且依赖于资本主义的世界，这种整合性和依赖性与随着电子工业事件和脑科学的发展而与日俱增，它将使得人类欲望的渠道日益单一化为利润、增长和货币。就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而言，它已构成一个完整的解释和批判系统：1. 货币是可以购买任何东西的等价物；2. 货币构成了异化和外在的权力，将个体变成自利的个体；3. 货币具有将“物”的一切属性商品化的力量；4. 货币将一切转化为工具性的存在；5. 货币具有暴力性；6. 货币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新神圣物，新的上帝。上述六个方面构成了《资本主义图式》一书的论述主线，而关于抽象统治的另一篇重要文章则是发表在《历史唯物主义》2013年第1期上题为《索恩·雷特尔和“真实抽象”的起源：生产的批判还是流通的批判》^② 的文章。杰普在文中认为，雷特尔将“真实的抽象”（real abstraction）这一概念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无疑是深刻的。通过这一概念，雷特尔对启蒙的知识和思想形式进行了唯物主义的诠释，将没有内容的形式范畴与有内容的资本主义形式对接起来。在这里，康德用来综合经验的先验概念就被诠释为商品形式的表达，自我意识的统一性就意味着货币的统一性，原初统觉的综合则等同于货币交换的综合功能。雷特尔不仅揭示了康德的先验哲学背后的经验基础，而且还指出，康德的哲学提供的抽象范畴对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构成意义，作为具体内容的无差别的货币等价交换与建立在计算理性基础之上的科学知识是类

① Lukacs, Georg. 1978. *The Ontology of Social Being: 2. Marx*.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Merlin Press.p.40.

② Anselm Jappe, 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 ‘Real Abstraction’: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13-3.

似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黑格尔的《逻辑学》指称为“精神的货币”。货币与黑格尔范畴的共同特征是对具体内容漠不关心，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就是理性。雷特尔的研究为我们很好地呈现了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同谋关系，即“理性”与“资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支柱意义。资本的扩张与理性形而上学对存在者的统治与谋划是一体两面的“姻亲”关系。资本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本质，而形而上学具有资本的架构性。而这种双重的现实只有马克思才真正懂得：人们一方面受“头脑造物”——观念的统治，另一方面更受“双手造物”——资本的统治，而作为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工商精神则是二者的合体。雷特尔对“现实的抽象”范畴的解释是独到和重要的，它超越和颠覆了把真实等同于物质、抽象等同精神的传统观点，使我们看到，“真实的抽象”不仅是真实的存在，而且还是资本主义社会起作用的真实的权力。但是，雷特尔的理论也有局限性：第一，他认为真实的抽象仅仅源于流通领域的商品的抽象集体化，而把生产视为人与自然之间中立和外在的新陈代谢过程。第二，雷特尔把形式对内容的统治误读为自古以来的精神劳动对体力劳动的统治。这两个方面的局限性使雷特尔把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当作黑格尔的概念拜物教而加以拒绝。他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一开始就意识到并非只有思想或非物质劳动才有抽象性，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本身就是抽象劳动，而且这种劳动形式构成了资本主义一切现实抽象的真正根源。为了克服这些局限性，雷特尔的工作需要再往前推进一步，发现被真实抽象概念所遮盖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对抗的核心。其实，在阿多诺向霍克海默引荐雷特尔时，霍克海默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过雷特尔这方面的缺陷。当代激进思想家也力图克服雷特尔思想的缺陷，齐泽克就指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裂缝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交换价值遵循着自身的逻辑疯狂跳动，全然不顾人的真实需求。”^①重要的不是去发现资本主义交换形式中的观念论的哲学根源，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现实根源。

① Slavoj Žižek, *Less Than Nothing: Hegel and the Shadow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2, p245.

三、体系辩证法与资本的客观逻辑

列宁曾认为黑格尔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主要来源，并且警告读不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会懂得马克思的《资本论》，葛兰西也曾将马克思的哲学称之为“黑格尔加李嘉图”；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认为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的体系，保留了他的辩证方法。但阿尔都塞完全否认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传承关系，并试图通过“认识论的断裂”将马克思从黑格尔的阴影中解救出来。上述种种观点使得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持续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肖恩·塞耶斯曾将其大致归为三类：一是完全抛弃辩证法的观点，公然宣称用非辩证法的观点去重构马克思主义。二是认为辩证法和矛盾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三是认为只有抛弃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限制在人文领域，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才能被发现。

对《资本论》的当代辩证法解读或逻辑解读作了最为清晰介绍的，要数胡迪斯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概念》^①一书。作者在书中梳理了数十年来的相关研究，并将其归纳为两大哲学思潮：一派认为马克思的主要原创性在于他将资本视为一种自主的力量并且拥有自我的生命力，从而将人类主体的行动和意志都全部吸附进去，从这一视角来看，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对逻辑的描述是一致的。资本就像黑格尔的《逻辑学》中的概念一样，拥有对任何事物的无差别的本体属性并且在任何事物之外自我运动着。他们因此不仅将资本视为马克思的研究主题（subject），同时还将资本视为现代社会的主体（Subject）。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可称为是客观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将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视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分析和准确理解的最好方式，而资本在这里是一种完全具有自我规定性和自主性的存在。而在客观主义解释中又可以分为三派，它们分别是：日本的宇野弘藏（Uno Kozo）及其追随者，比如关根（Thomas Sekine）、奥尔布里顿（Robert Albritton）等；深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和波斯顿；“体系辩证法”派的鼓吹者，比如亚瑟·穆里·鲁特（Geert Reuten）、史密斯等人。另一全然不同的学派则致力于理解人的主体性力量如何摆脱资本的

^①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Haymarket Books, 2013.

奴役以获得控制性的霸权，他们虽然强调资本的自我规定和自主的特性，但更强调资本在劳动那里必然持续遭受到的限度与障碍。作者将这一派的学者称之为主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强调致力于发掘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颠覆和限制资本逻辑的主体性的人类力量，这些学者主要有特隆蒂（Mario Tronti）、霍洛威（John Holloway）和奈格里等人。我们先介绍客观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下一节将讨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主义解释。

胡迪斯分析指出，宇野弘藏将资本视为自足（self-contained）的逻辑体系，宇野弘藏在《政治经济学的原则：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①一书中强调，资本作为社会历史的现实存在与资本逻辑之间存在着非同质性，现实的资本主义总是非完美和非绝对的，而资本逻辑描述的是理想的状态下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关系。马克思旨在致力于呈现最一般的商品生产体系，这个体系的主角是资本，而不是作为主体的我们。从这种纯粹而抽象的资本逻辑研究中，我们才能够理解到统治使用价值的价值生产为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第一要务，为什么最有效的资本是全力致力于最高利润率的资本，为什么对利润的渴求资本的绝对观念和绝对精神。

按照宇野弘藏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客观主义理解，马克思关心的是纯粹的理想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规律，而非是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纯粹的尚未存在也永远不会存在的标准的资本主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在从事某种思想实验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纯粹自我调节的市场和无政府的商品生产之上的，在其中人们只受市场力量的控制和导向。他还认为，不仅主体而且历史也不是马克思的思想中心。如果作为资本逻辑核心的不受管制的市场、无政府主义的竞争和私有财产的绝对性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那么现实的世界历史并不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平台。基于此，宇野弘藏批评了对马克思理论的异化劳动诠释，在他看来，异化劳动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关键特征。正如其学派的成员关根所说的：“马克思所写的是一部关于资本而不是关于劳动或生产的伟大著作。”劳动和及其斗争形式并不是资本逻辑的内在特性。但胡迪斯认为，这种解释似乎与马克思的本人的研究是有出入的，因为马克思认为资本并不仅仅是生产的工具，还是一种抽

① Uno, Kozo: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of a Purely Capitalist Society*. Translated from the Japanese by Thomas T. Sekine. Brighton, Atlantic Highlands/New Jersey 1980.

象和无差别的劳动。就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从所有存在中抽象出来的抽象，它造成了所有的自然、精神和社会劳动差异的消失。人类的存在日益变成一种抽象活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也再次论述了劳动的双重特性：具体的特殊的劳动和无差别的抽象劳动，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实质和资本自我扩张的价值，具体劳动则与使用价值的生产以及劳动者的生活相联系，在这里，劳动的双重性最终会打破资本辩证法的逻辑。

客观主义的另一流派以“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巴克豪斯为代表。他认为马克思考察的是资本的普遍形式，即现代社会的决定性力量不是现实的资本家而是资本，资本在现代社会具有像黑格尔的绝对主体概念一样的生命力。而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忽视了马克思所强调的那种一般性、集体性或社会性的力量的自主性及异化性的存在。社会资本作为一个自主性的总体和真实性的主体既从个人的祸福中抽象出来，又对个体的生存状况“漠不关心”甚至形成统治。资本在这样的描述中成为了主体或者自我-关系（self-relation）的存在。巴克豪斯认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这一特性是理解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关键，因此，《资本论》并不是黑格尔主义成份最少的著作，而恰恰是黑格尔主义的经典性代表作，甚至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更具黑格尔主义的色彩。巴克豪斯和宇野弘藏的最大差异在于什么是资本逻辑的核心，后者认为是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而前者认为是劳动的社会形式，即劳动的抽象化，并认为抽象劳动是理解资本的关键所在。

胡迪斯认为波斯顿的《时间、劳动和社会统治：马克思批判理论的一个再诠释》^①是继巴克豪斯之后这一流派的代表性著作。波斯顿受“异端”的马克思主义者鲁宾和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的深刻影响，他在该书中认为，抽象劳动是资本主义具有全局规定性的核心概念，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才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双重特性。后者是无差别的劳动或劳动一般，具体劳动不断地被抽象劳动吸纳，变得同质化、单一化、重复化和流程化。抽象劳动是价值生产的基础，也是资本主义最大的特征。而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过于关注分配而非劳动的异化模式，并以为只要国有化和计划化就可以改变资本主义了。其实，只要一个社会存在着抽象劳动，其性质就仍

^① Moishe 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另一错误在于将工人阶级视为社会转型的主体，但波斯顿认为，现代社会的主体不是人而是资本。工人被抽象劳动牢牢把控，不可能成为解放的主体。关于资本主义如何灭亡问题，波斯顿认为只能诉诸于资本主义本身的核心矛盾，即财富与价值的矛盾。生产力的发展导致财富的增加和单位价值的缩水，这成为资本家最棘手的问题。这导致资本疯狂地追求技术创新，完全不管人类和环境的代价。但波斯顿并没有就这一矛盾和灾难的最终结果做出回答，他的分析思路带有明显的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的悲观主义成份。

胡迪斯认为，波斯顿的分析是建立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之上的，即黑格尔的自我指涉的绝对主体之上的，即《资本论》是黑格尔的观念的具体体现。马克思明确指出的价值是主体、自动的主体、统治的主体等等就是证据。但是波斯顿忘记了马克思是在讨论流通环节的时候才这样论述的，一旦我们进入劳动过程，就会发现这种神秘性消解了。资本只有依赖活劳动才能存活，在这里，宣称自我运动的资本主体便会遭遇自己的限度。就如马克思在《大纲》中所说的那样：“流通本身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理。流通的要素先于流通而存在，而不是由流通本身创造出来的。商品必须不断地从外面重新投入流通，就像燃料被投入火中一样。否则，流通就会失去作用而消失。”^①因此，如果超出流通过程的环节来看的话，资本在马克思那里绝对不可能是自我运动的实体或主体。波斯顿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过于注重流通环节而忽视了生产的形式，他试图将激进理论转向对当代社会生产关系的彻底批判。但是，虽然他反对将生产关系视为流通过程的反映，他却先验性地给予了流通环节以自足的地位。虽然他正确地强调仅仅通过废除市场并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只看到抽象劳动和异化劳动，也使自己走进了新的思想僵局，没有给出超越资本主义的真实可能性和力量所在。

第三派客观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体系辩证法”派或“新辩证法”派。它是继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分析马克思主义之后在英语世界流行的独树一帜的学派。其中最著名的理论家是克里斯多夫·亚瑟，他的代表作有：《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1993）、《体系辩证法》（1998）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8页。Marx [1857-8], *Outline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ough Draft of 1857-58)*,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ume 28, New York: p. 186.

及《新辩证法和马克思的〈资本论〉》^①。除亚瑟外，这一学派还包括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穆里等。他们将自己的立场概括为“新辩证法”，以区别于专注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旧辩证法。“新辩证法”不再关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将来，而是关注黑格尔逻辑学对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影响。由于他们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给定的社会系统，而不是历史的过程，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应该被视为体系辩证法，而不是历史辩证法。在亚瑟看来，很多学者都因为混淆了历史辩证法和体系辩证法而未能抓住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历史辩证法处理的是实际社会系统的兴亡之变，而体系辩证法处理的则是给定的整体并且展示其如何再生产自身。前者考虑的是历史因果链，而后者只考虑系统性因素。

亚瑟认为对体系辩证法产生误读的第一人是恩格斯，他将商品形式和价值形式从简单到一般的发展理解为从小范围的商品生产到更为复杂的发达工业社会的历史发展，而没有看到这其中存在的断裂，因此可以说《资本论》与历史发展无关，它是对给定的社会现实的系统性描述，而不是对一个社会现实的产生与灭亡的历史性描述。它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整体，资本主义的历史只有从系统和资本抽象逻辑的制高点才能予以把握，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解剖是猴的解剖的钥匙。而急于从抽象到具体，或者从系统到历史的过渡势必会导致对《资本论》理解的困难。虽然亚瑟认为，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观念论者，但他们之间具有相似之处，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是货币经济，黑格尔则发现了“抽象的内在性”。货币的纯粹性正是黑格尔逻辑的“道成肉身”，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应被视为黑格尔绝对概念的化身（avatar）。亚瑟拒绝把劳动的抽象社会形式作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认为劳动和价值之间不存在同构性关系：并不是抽象劳动构成了货币与资本，相反，是货币化或者说交换关系使得劳动变得抽象化，因此，只有完成对资本的形式规定性的理解才能深入到劳动生产之中去，否则就可能只能看到资本主义的表面现象。

莫斯利（Fred Moseley）、史密斯主编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逻辑：一个再检视》^②也从《逻辑学》与《资本论》的关系入手，讨论马克思和

① Christopher John Arthur,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4.

② *Marx's Capital and Hegel's Logic: A Re-examination*: Author (s): Fred Moseley and Tony Smith, Brill, 2014.

黑格尔在之间的继承、批判甚至对立的关系。他们认为，马克思正是借助黑格尔的逻辑学才彻底推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利润逻辑。史密斯与平卡德（Terry Pinkard）、皮平（Robert Pippin）一样主张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解释：世界的客观规定性之所以可以被我们的思想所理解在于我们的思想就寓于世界之中，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世界在于思之本质规定性与世界的本质规定之间是同构的，并且思之本质规定性控制着世界。

芬奇（Roberto Fineschi）也在该书中把黑格尔解释为实在主义者，不过在他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不是将逻辑规定外在地运用于客观现实，而是把现实奠基于规定性内容的自我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即是一种特定的客观逻辑。米尼（Mark Meaney）认为绝对精神不是外在的力量，相反是给定的客观现实的内在统一原则，客观现实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实际上并未真正颠倒了黑格尔，而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表达，将资本主义视为独立的有机整体是这一理论表达的逻辑结果。

贝洛菲尔（Riccardo Bellofiore）在该书中认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并进行自我增殖的特征与黑格尔的主体概念极为类似。虽然贝洛菲尔并未因此将资本局限于交换领域来加以说明，而是认为资本只有在生产的环节中完成对劳动的统治才能生产剩余价值，但资本要想真的获得利润就必须变成自身的实在才能完成自我增殖的可能。换言之，其是必须成为具有客观实在性的主体。

与前面数位对黑格尔哲学做唯物论或实在论的解释不同，卡拉雷（Juan Ligo Carrera）、卡利加里斯（Gaston Caligaris）、斯塔洛斯塔（Guido Starosta）等人坚持认为黑格尔是彻底的观念论者，因为其起点是纯粹的思的形式——纯存在。由于黑格尔的整个逻辑必然是观念主义的，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就发生了改变，黑格尔的逻辑必须被真实的物质形式——商品——所替代。对马克思来说，商品是真实的物质形式，而非纯粹的思的形式，是资本主义的真实形式自我发展的重要一环节（商品——货币——资本）。斯塔洛斯塔批评了史密斯将黑格尔唯物主义化的做法，认为研究资本主义的最好方法是将真实形式的自我发展直接进行理论化，而不是间接地通过纯粹的思之形式来完成。

以上各派对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及与黑格尔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都强调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辩证法思想中的意义，这对于我们重新思考辩证法、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中主体与结构等问题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四、资本主义矛盾与对抗的辩证法

前面我们讨论了对辩证法的客观主义理解，现在我们讨论立足于资本主义矛盾和抵抗的辩证法派。与强调抽象性和社会形式、价值形式的统治不同，有大批学者从阶级关系、社会矛盾和主体反抗的视角来研究马克思哲学。《历史唯物主义》2013年第3期题为《马克思原初计划的变化及其原因》对体系辩证法做了批判性的讨论。库恩（Rick Kuhn）在文中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内在而系统的，它是认知当代资本主义最为经典的著作。按照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的研究，《资本论》写作计划之所以从原来的6部变成4部，对土地和工资劳动部分的放弃表明，马克思日益集中于对系统抽象性的分析，这种抽象性的分析是奠基于将复杂的资本主义过程与基础性的资本关系结合起来之上的，而不是仅仅停留于抽象形式上面。因此，马克思能够发现被资本关系遮盖的“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①，而古典经济学家和黑格尔则只停留于抽象而不能深入到具体。马克思曾经说：“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②黑格尔之所以陷入幻觉，在于他单方面地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往后，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式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③如果这样，则会忽视抵抗、统治和斗争的政治纬度。

胡迪斯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概念》^④一中认为，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operaismo/workerism）认为，工人与资本之间的对抗是资本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构成部分，就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只有“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④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Haymarket Books, 2013.

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① 资本的形成和增殖绝不是由于商品的“交换”和“流通”，而是在于商品的“生产”，即工人的劳动，“劳动转化为资本……只有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才得到实现”。^② 资本只有通过占有他人的劳动才能使自身的价值增殖，劳动才是使资本发酵的酵母。

特隆蒂 1964 年就明确指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先讨论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次才讨论工人的斗争。其实应该把这个过程颠倒过来，只有理解工人阶级的劳动和斗争，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资本主义形态的每一次变化和发展，都是对劳动者抵抗的回应。因此，表面上是资本控制着社会，实际上，资本永远只是被动的 (reactive)，而非主动的力量。与新辩证法派将资本视为自我规定与自我扩张的主体不同，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在扩大价值和对抗价值生产的抵抗中从来就是内在地不稳定和对抗性的，即资本不是主体而是关系性的存在。马克思研究的目标始终是社会对抗的现实性和规定性，而不是无人身的资本逻辑。与客观主义强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性功能不同，自治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事业首先视为政治的事业。奈格里说：“利润和工资将继续存在，但它们的存在仅仅是权力关系调节后的结果……假如劳动力市场变得完全政治化运作的话。”^③ 霍洛威也认为，阶级关系并非寄身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关系的构成性本身。

对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奈格里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主要从前康德的斯宾诺莎那里而来，霍洛威则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顶点是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奈格里认为，《大纲》是马克思革命思想的巅峰之作，而《资本论》存在着经济学还原和客观主义倾向，因为它将主体性和对抗性消解到了客观性之中。马克思的天才之处在于通过货币拜物教的分析发现了隐藏在背后的社会劳动关系，货币等价性的背后恰恰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之间的对抗性，抽象劳动永远得依靠活劳动。因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范畴内部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工人阶级在持续的斗争中不断创造着价值。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所有范畴都是两面性和内在对抗性的。因此，除非劳动扩张，否则资本不可能自行扩张，假如作为主体的资本构成重要的一面的话，另一面必然是劳动同样成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68 页。

③ Negri,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pp. 224–225.

主体。

同奈格里等人注重资本主义的对抗性和矛盾一样，托姆巴佐斯的《马克思的时间：〈资本论〉中的时间范畴》^①具有类似的思想倾向。他认为，《资本论》在某种程度上是逻辑三段论的社会化：《资本论》第一卷讨论的是线性、抽象的时间，其时间是同质的，因而是可计算和衡量的，这种时间通常被视为“生产时间”。第二卷讨论的主题则是循环时间，循环时间关注的是价值的流通与周转。最后，第三卷讨论的是资本的有机时间，即循环时间和生产时间的统一。在该书的作者看来，每种经济在根本的意义上都是时间的经济，每种经济的组织都是时间的组织。就如马克思说：“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正像在单个人的场合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②。注重《资本论》中的形式规定性的研究其实是只注意到第一卷的抽象时间，没有看到其他的时间形态，因而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性质和核心思想的误解。

《资本论》第一卷的时间不同于经验性的时间，它是“真实的抽象”，代表着一个自主的无人身的社会理性，是包含了形式与内容的实在，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形式所具有社会的内在必然性。但是，时间又不仅仅是劳动时间，以价值为例，价值不仅仅是被时间所规定过的劳动，而且有其自身内在性的逻辑，或者说是矛盾，价值也受到流通时间的影响，而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又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总体和矛盾内容，使得资本主义既是完整的又是开放的总体。在这个总体中，社会时间与个体之间虽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通过创造剩余时间的方式，社会时间还是可以为个体的解放提供可能性。一旦剩余时间不再能被转化为资本，那么资本主义就走到了自身的尽头。在这样的复杂体中，即使是最简单的商品就不仅仅是一种关系性存在，更不是物，而是复杂而矛盾的经济世界，其中包含着开端与终结、质与量的有机结合。按照这种理解，资本主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从量转变为联结和关系，为了实现自身，又不得不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同质性中再次

① Stavros Tombazos, *Time in Marx: The Categories of Time in Marx's Capital*, Haymarket Books, 2015.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转换为差异，这种内在矛盾使得资本成为商品与流通的双重统一。马克思就意识到时间中包含着资本主义矛盾：“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 = 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 = 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 = 剩余价值的减少 = 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① 因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就不能被简单地界定为劳动价值论。具体来说，由于资本的直接目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因此资本就采用一切技艺和科学的手段，来增加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却又使得“可自由支配的时间”（disposable time）和“剩余劳动时间”（surplus labor time）的冲突变得日益明显与严重。于是，我们看到资本常常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解为时间的辩证法，把人的解放理解为时间的解放，这些结论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问题是，如果财富的尺度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谁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是科学技术、理性还是工人阶级自身？是普遍性的主体还是日益积累的弥塞亚力量？作者没有像奈格里那样信任工人的自主性，而是把它交给了历史自身来回答。在托姆巴佐斯看来，如果矛盾规定着历史的变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只能是一种内在性的批判，其超越也只能是一种内在性的超越。

同样，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逻辑：一个再检视》^② 中，汉泽尔（Hanzel）也认为把资本视为自我增殖的主体是错的。此观点不过是由于只关注交换与流通才会产生出来的幻象。其实，资本自身并不生产剩余价值，因此也不是自我增殖的主体，资本只有依靠在生产中剥削和吮吸活劳动才能实现增殖。马克思并不把资本视为主体，他强调单单描述流通环节中现象是不能把握资本的全部内容，而一旦进入到生产领域，马上就会遇到工人阶级及其劳动这一对抗的因素。

穆里同样反对将资本视为黑格尔的主体，在他看来，马克思综合了黑格尔的概念逻辑和本质逻辑，概念逻辑主要用来解释表现为自我增殖的主体的资本，而本质逻辑则揭示资本并非真正的自我增殖，将资本的利息视为自我增殖是一种拜物教的幻象。资本表面的自我增殖主体只是对黑格尔概念逻辑的粗陋模仿，因为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在于对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但穆里又认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页。

② *Marx's Capital and Hegel's Logic: A Re-examination*: Author (s): Fred Moseley and Tony Smith, Brill, 2014.

黑格尔的辩证法帮助马克思推翻了李嘉图的利润理论，揭示了利润只能是剩余价值。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体系辩证法框架，但却做了根本性的修正，从根本上说，马克思运用的是被黑格尔拒绝的本质逻辑。

从上述对自治论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无法摆脱自己的矛盾，因为资本作为死劳动必须依赖于活劳动，资本与劳动的有关关系不仅是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政治关系，劳动与资本都想追求自我价值的维持，而两者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这就决定着资本主义无法消除其矛盾和对它的反抗。

卢卡奇的《尾随主义和辩证法》^①最近继续在西方受到关注和讨论，齐泽克在该书的导言中提出，卢卡奇不应被理解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始祖，而应该被视为“列宁主义的终极哲学家”。在题为《乔治·卢卡奇的哲学的列宁主义和东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②一文中，弗拉基亚支持齐泽克的这一观点。但与齐泽克不同的是，弗拉基亚对卢卡奇的列宁主义持批评的态度。作者指出，通常人们认为卢卡奇的贡献在于用韦伯的棱镜来阅读马克思对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分析。在生产过程中，商品拜物教在客观形式和主观立场上都成为了工人日常生活不可避免的实在。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分享着同样的物化生命，或者说，社会存在的客观实在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来说是一样的。只有党的中介，无产阶级才会产生与资产阶级不一样的对总体性的渴望，从而从量化逻辑中解放出来。但在作者看来，卢卡奇忽略了工人的真实的生命过程和真实的经验，即在韦伯式的棱镜中被忽略掉的工人的被剥削的经验。生产劳动中的关系并非只有工人与机器的关系，而且包括了工人和雇主的关系和亲身被剥削的经验。对这些经验的疏忽必然会否定工人内在自我解放的任何可能性，从而转向求助于列宁主义政党。作者认为，我们需要看到商品拜物教具有客观和主观的双重特性，否则就不能洞见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垮台的可能性。

对辩证法展开讨论的另一核心文本是伯克特的《卢卡奇论科学：悲剧中的新行动》^③。该文本也讨论了卢卡奇的《尾随主义与辩证法》。伯克特认为，对

① Georg Lukacs, Slavoj Žižek, Esther Leslie, *A Defence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 Verso, 2000.

② Joseph Fracchia, *The Philosophical Leninism and Eastern 'Western Marxism' of Georg Lukac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13-1.

③ Paul Burket, *Lukács on Science: A New Act in the Traged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13-3.

“自然辩证法”的拒斥长期以来是区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特征，但在《尾随主义与辩证法》一书中，卢卡奇并未完全否认自然客观性的存在。卢卡奇确实认为，现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是与自然的直接关系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受到社会行动及其结果的影响。但是卢卡奇认为人与自然的交换关系存在着双重的规定性：独立于人的自然的规定性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规定性。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也是被社会所中介和规定过的，即我们熟悉的“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忽视这一点将其视为客观的存在将会导致拜物教。但是，尽管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赋予了社会中介性以极高的重视，却又仍然承认自然有其自身规定性的一面，并且明确指认自然先在于社会是自明的，而他的工作恰恰是要揭示这种客观性被社会所扭曲的程度。卢卡奇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自然的关系要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双重规定性来理解。就使用价值而言，自然是独立于人并且和人形成互动的客观存在。而就交换价值来说，自然则是被社会的经济结构所规定和控制的质料对象。就后者而言，我们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是被社会所中介过的，我们关于自然的意识或者说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是被社会存在所决定的。而布哈林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观是资产阶级的自我欺骗，它未能意识到所有的经济和社会现象都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对虚假客观性的强调导致的只能是拜物教。

但伯克特也指出，卢卡奇虽然阐述了自然与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但对自然科学采取的不是辩证和实践的方法，而是静观的态度，因而未能达到将观念（社会之维）与实证之维进行辩证思考的高度，也就不能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然科学形成内在批判。对卢卡奇来说，似乎这两者只是一枚硬币的非辩证的两面，这种二元论的视角无法真正思考社会的经验结构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关系之间的辩证互动。并且他未能将工具理性与科学的批判置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来阐发，而是将其置于不易觉察的类的原则和基础之上，他在对实证主义方式展开批判的同时，却不小心滑落进了观念主义的泥潭。卢卡奇从未真正地触及到自然科学的内在逻辑，就如葛兰西所评价的那样，卢卡奇将辩证法视为历史的而不是自然的，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但是，如果说将人类史同样理解为自然史的话，那么辩证法就应该同样包括自然在内。实际上，他在反对技术决定论的时候陷入了它的对立面的观念论的窠臼之中了。作者认为，我们只有从双向辩证的视角出发才能理解马克思的下述论断：“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

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①

2014年齐泽克又出版了一本新著：《绝对的反冲：朝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基础》^②，为其近年来主张的先验唯物主义做了进一步的阐述。齐泽克认为，不管是科学的自然主义还是德勒兹的新唯物主义，都未能直面当前的现代世界。唯物主义对先验论的克服不能是退回到前康德的朴素实在论立场，反而应该使之彻底化。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能够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当代哲学。在书中，齐泽克认为当代的唯物主义一定要达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水平，而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基础。“辩证”（*dialektika*）在古希腊并不是指普遍性的观念，而是指辩证的符号或政治事件。它意味着，任何一个A都会造成一个反对自身的B，而理性总是与反叛（反对自身）相结合。齐泽克用黑格尔的“反思的规定性”（*reflected determination*）来解释辩证法。反思的规定性意味着，只有在自身之中又构成对自身的反冲，才是本质的设定（*positedness of essence*）。本质不是自我封闭的，它在规定自身基础的同时，总是被一个非规定所规定，而它的规定性仅仅是它的被规定性的扬弃。因此，被规定性就只能是自我扬弃，是其自身的否定和自我同一性的本质。^③在反思的关系性之中，每一个规定都被其对立面所中介过，同一总是被差异所中介，现象总是被本质所中介，对立与差异总是先行来自于他者。而自我扬弃的可能性，又使得本质不可能是纯粹由外在的他者直接所规定的，其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关系结。因此，规定自身就是“在自身之内的对自身绝对性的反冲”。其间隙性，或者不和谐性总是动态性地被插入在了绝对的内在性之中，从而为内在性的被超越提供了可能。因此，齐泽克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为普遍的内在本体论原则注入了超越性的反冲间隙，因此也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真正继承了黑格尔思在面

① Marx and Engels 1976, p. 34. See also Marx 1964, p. 143: ‘One basis for life and another basis for science *is a priori* a lie Natural science will in time incorporate itself into the science of man, just as the science of man will incorporate into itself natural science: there will be *one science*.’

② Slavoj Žižek, *Absolute Recoil Towards a New Founda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2014.

③ G. W. F. Hegel, *Science of Logic*, Atlantic Heights: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89, p.444.

朝客体性时的思辨性态度。辩证唯物主义需要三个阶段才能完成这一系统性的展示：从康德的先验主义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或者说从先验的关联主义走向绝对之思；第二步则是辩证意味着对立面的一致性；第三部是黑格尔超越黑格尔，走向“比无更少”（less than nothing）的唯物主义。

齐泽克在该书的第一部分批评了以阿尔都塞和巴迪欧为代表的非先验的唯物主义主体性理论。在讨论了先验主体的不可缺失性之后，齐泽克从康德的先验主体转向了黑格尔的作为实体核心深处的异质性（disparity）主体。接着齐泽克认为，一种用黑格尔来超越黑格尔的辩证唯物主义在于发现了否定之否定的矛盾性，将“关系的不存在”（there is no relationship）的实在性倒转为“存在的非关系性”（there is a non-relationship）的实在性，从而将黑格尔从思辨理性的辩证法中解救出来。经过这样改造过的唯物主义就不再是还原论的粗俗唯物主义，不可能是希钦斯或道金斯式的谴责和攻击一切宗教的新无神论，亦不是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的唯物主义”（福柯式分析话语的物质性实践）或德勒兹的新唯物主义（泛心论的物活论），而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真正的唯物主义不会重返观念论，而是一种“没有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或者说其实体之质已被消解于纯粹形式关系之中的唯物主义。在这样的唯物主义中，目的论失去了唯物主义线性因果的属性，变成了调节性的观念，而非实在性的构成，这种目的论概念类似于康德。对康德来说，我们的目的性观念总是内在于我们的感知之中，但却不是客观实在的内在构成要素。同时，在这样的唯物主义中，客观性概念也获得了新的意义。黑格尔在《小逻辑》的开篇便讨论了三种客观性：一是朴素实在论的客观性，其假定了思之规定性与存在的规定性的重合性。这种形而上学是无思之矛盾的，其相信反映是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二是经验主义的怀疑论；三是先验主义的不可知论。齐泽克比较欣赏的是将主观性穿透在客观性之中的辩证法，其中又分为思辨的客观辩证法和唯物的客观辩证法，前者似乎能达到最高的维度，而后者总是被反思的反转所倒置。辩证法的疯狂舞蹈让一切“实体的都化成了空气”。辩证法也就有永恒的战斗性，它将摧毁自身的存在根据。

齐泽克在书中还讨论了作为主体的资本，以及黑格尔未能超出自身时代的缺陷。齐泽克承认资本的抽象性并非是社会实在本身的误认，因为其本身就是社会实在本身，规定着物质和社会过程的结构。整个国家和社会都被资本的思辨舞蹈所决定和主导。其强烈的利润追求推动着无差别的社会实在不断前

行。资本的动力不再来自于个体之恶或自我保存的理性，而是纯粹的客观性、系统性和匿名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价值不再是商品多样的实体性纽带，它早已从被动的交易中介转换成了整个过程的“行动因素”（active factor）；它不仅规制商品的关系，还规制私人的关系和生命的过程；它自行设定自身的他者，并进一步克服所存在的差异性，即扬弃自身的物质条件而不断进行着自发性的扩张。用黑格尔的语言来说，它设定着自身的前提。这是马克思借助黑格尔来阐述的资本的逻辑。在齐泽克看来，在今天要成为一名唯物主义者，就只能将观念论推到极致，使其最终自己反对自己。就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①

最后是历史性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本体论，一种社会存在的形而上学，是辩证法在社会领域运用的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坚持认为人类的集体实践是实在得以产生的无法超越的先验视域，甚至就此而言，我们无法谈论纯粹的自然规律。用卢卡奇的话来说，自然是一个历史范畴，集体的实践总是已经先行规制了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亦是先验的哲学家。对他而言，历史性总是先验之维，不存在纯粹实体（ontic）性的事件。事件总是存在的绽出，总是新世界（意义已包含在实体之内了）的诞生。灾难就不可能是纯粹生态性的，而与我们家园之根（home-roots）的毁灭有关，可以说灾难总是本体论的事件。技术对世界的座架总是与我们将世界作为持存的质料有关。但辩证法的诡秘在于，对世界的座架最终会反过来成为对自身的座架。不过在齐泽克看来，海德格尔的问题在于将对世界实体的座架与对人的座架等同起来，没有看到这个架构本身存在着裂缝，因而没有看到反对自身的否定性。

在齐泽克看来，彻底回到实在论，就是把“真实界”理解为对抗性、矛盾和障碍。实在是无法进入的，它是不可能性和必然性，纯粹抽象的普遍性是不可能达到的，每个普遍性都已经是被特殊的内容所多元决定了的。当然，特殊的内容是有层次性的，某个特殊的内容会提供一种普遍性的光。总的来说，齐泽克这本书延续了他前几本书的思想，这就是通过综合总体和普遍的不可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性与黑格尔辩证法所强调的否定，构成一个新的左翼政治哲学。

齐泽克最近的哲学立场被概括为先验唯物主义哲学，关于这一立场的特殊性以及在今日西方激进哲学中的地位，约翰斯顿在《先验唯物主义的冒险：当代思想家间的对话》^①做了讨论。英语世界新近出现了一种思辨的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先验唯物主义与此思潮相关。在作者看来，西方自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尔以来，科学与宗教、精神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就一直处于断线的不稳定状态，而这之间的关系在今天又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而所谓先验唯物主义的理论旨在就此提供一个新的方案，将德国观念论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哲学，以及生命科学和当代哲学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在这本书中被归入先验唯物主义的哲学家有齐泽克、巴迪欧、马拉布、米纳尔、哈格隆德、康利纳和班尼特等人。约翰斯顿在前言中称“先验的唯物主义”为双面的一元论。正如齐泽克在2012年的新书《比无更少》中所说，先验唯物主义认为所有的实在性都具有先验的假定性或构成性，即从始至终都与主观的立场有关。就如康德所言，直达物自体是不可能的，对物的把握必须将先验的关联性铭刻进物自身，通向物自身的路必然具有了主观性的间隙。而这一间隙处于“为我们”（for us）和“物自体”（in itself）之间：即实在本身已然铭刻了思之主观性。与梅拉苏（Quentin Meillassoux）试图“触碰实在”的前康德幻象不同，齐泽克主张一种非关系性的存在，即并非不存在物质实在的东西，而同时物质实在又不是全部。精神总是自然的一部分。用黑格尔的后斯宾诺莎的话来说，实体与主体总是同在的，是一种先验的绝对内在性。自然化的主体性并非仅仅是自然的意象或者观念，而是绝对内在于自然内部的，如果我们将自然理解为人化的自然，或者历史生成的，劳动结果的自然的话，这一点就更加的清晰明了。

大卫·哈维也加入了对资本矛盾性的研究之中，他在新书《十七个矛盾和资本主义的终结》^②中，先从两方面考察了矛盾一词的流变史：一是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那里，矛盾意味着两个不能同时为真的陈述，比如“所有黑鸟都是黑的”与“所有的黑鸟都是白的”。二是描述在一个特定的局势、过程或事

① Adrian Johnston, *Adventures in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m: Dialogues with Contemporary Thinker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② David Harvey,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件中，两个对立的势力同时出现。比如事业和家庭、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矛盾冲突。对于多数人来说，会尽可能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与稳定，但很多时候会变得极为棘手和紧张。而对商业来说，有组织的生产与日常生活之间同样存在着矛盾冲突，却又相互渗透和支撑以至于无法看出矛盾。而局势的一旦恶化，这种被掩盖的矛盾就会凸显。今天资本主义已经陷入了危机，通过对它的分析可以更全面地把握资本主义的矛盾。

哈维通过一系列的实证事例，比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土地用来种粮食还是种树林来烧炭的矛盾就通过煤的发现而得以解决，来证明矛盾并非总是坏事，矛盾甚至是“发明之母”。不过旧矛盾的解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新的矛盾，比如煤炭的燃烧与大气环境的矛盾等。资本主义的矛盾往往通过一系列的创新加以解决，也往往因创新引发一系列的新的矛盾。哈维首先认为最重要的矛盾是实在与表象的矛盾。马克思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①。哈维认为我们有必要穿过拜物教的外观并且识别困扰资本的矛盾，通过深入世界的内在之中，方能在世界的内部爆破世界。

哈维在前言中接着指出，就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辩护论者不去研究在灾难中爆发出来的对抗因素究竟何在，却满足于否认灾难本身……顽固地坚持说，如果生产按照教科书上说的那样发展，事情就决不会弄到危机的地步。所以，辩护论就在于……不顾对立而坚持统一。”^②哈维在书中讨论了十七对矛盾关系：比如包括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劳动的社会价值及其货币表征；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国家；私人使用与公共财富；资本与劳动；作为过程与物的资本；关系与生产的矛盾联合等在内的基础矛盾。包括劳动分工；竞争的集中与分散；空间生产的不平衡发展；财富与收入的错位等在内的动态矛盾。包括资本与自然、人性的反抗；普遍的异化在内的危险矛盾。哈维最后指出，虽然自己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道主义者，但是传统人道主义致命的缺陷是没有将自身内在化的善意理解与同样内在化的矛盾冲突结合起来，最明显的例子便是自由与统治的矛盾关系。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人道主义者往往与外在的宗教教义及权威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哈维呼吁一种革命的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67页。

道主义以代替宗教和资本主义的自由的人道主义。革命的人道主义历史上就主张同时将理论与政治的实践结合起来，它拒绝任何不变和给定的人性本质并促使我们不断思考怎样的人才是更好的。唯有从革命的人道主义视角出发，我们才能将马克思的《资本论》与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机结合起来。

哈维在2010年完成《〈资本论〉卷一指南》之后，2013年又出版了《〈资本论〉卷二指南》。在该书前言中哈维指出，马克思在《大纲》中就指出资本只有作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的统一”中才得到理解，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的统一，就如商品一样是一个矛盾性的统一：它将两种根本不同的对立内在化为一起了，忽视这种矛盾性就将只看到资本问题而忽视劳动问题，就像讨论性别时只讨论男性而忘记女性一样。而李嘉图不理解现代危机的原因正在于不理解现代社会中蕴含着的矛盾性。正如许多学者以为《资本论》第一章似乎只讨论价值的抽象性，其实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指出，如果物品没有了有用性，就不可能有价值。在论述了“流通”环节对于理解《资本论》的重要性后，哈维重点分析了卷中的几组概念，比如：交换的特殊性，供给和需求；竞争的强制性的规则；分配的特殊性；消费的个别性等等。这样的安排是为了回应新自由主义的自我辩护和展现资本的过程特征。与此同时，哈维对《〈资本论〉卷一指南》做了修订。在该书中，我们能发现哈维对辩证法的重视。在他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既不是套用，也不是完全与之相反或对立，而是将之批判化和革命化。哈维强调资本主义的运动化和过程，比如，他并不简单讨论劳动，而是讨论劳动过程，他提出，资本的流通过程一旦停止，商品的价值就将消失，资本主义整个体系都将垮台。在哈维看来，马克思的很多概念都是关系的（relations）转换性的活动，不是单方面的原则。那些自称“不说胡话”（no-bullshit）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缺陷是拒斥了辩证法，把马克思的基于过程和关系的论证还原成一系列的命题或者因果模式。

对资本与主体的关系进行考察也包括罗顿的《资本的心甘情愿的奴隶：斯宾诺莎和马克思论欲望》^①。作者认为，马克思借助斯宾诺莎的人类学思想，将资本的剥削与雇佣视为一个捕获和再形塑欲望的过程。从而揭穿了资本主义个体自律和自我决定的幻象，同时又保留了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自由的可能。《资本的心甘情愿的奴隶》一书是对资本主义的大胆再诠释，它揭示了

① Frederic Lordon, *Willing Slaves Of Capital: Spinoza And Marx On Desire*, Verso, 2014.

资本主义统治逻辑的另一维度，即欲望的专政，这一现象在当代工人工作模式中有着经验性的基础。

四、意识形态理论的新观念

齐泽克在《绝对的反冲：朝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基础》^①把意识形态理论的重新思考作为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在对意识形态的重新解释中，齐泽克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进行了批判和发展。

在齐泽克看来，阿尔都塞是意识形态二元论的始作俑者，即他在意识形态的感性经验与维持这种感性经验的物质机器与实践，也就是在外在的（作为物质实践的仪式）和内在的（在被质询中自我认同）之间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尽管阿尔都塞跟随帕斯卡尔为两者之间搭建了桥梁：与外在的仪式一道，内在的信念就会随之而来。但这两个纬度之间仍然是相互外在的，他们的关系仍然存在视差：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通道或桥梁。唯一直接相通的，可能只有喜剧演员，他们似乎既相信他们所演的角色又知道他们仅仅在演戏，因此，他在扮演了外在的行为同时又成为内在信念的相信者。因此，当阿尔都塞认为自己发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忽视的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支撑时，如军队、司法、教育机构等等，他却忽视了象征性的重要性。有如佩里·安德森对“缺席的在场”（presence-absence）的概念所阐明的，武装力量或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通常是以无形或幕后的方式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的，甚至通常是不可见的，在这个意义上，物质性同样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撑。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机器理论只强调了意识形态需要物质性机器和实践的支撑，没有看到，物质性机器也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撑，不应该简单地用一方去否定另一方，而应该意识到它们是关系性的存在。另外，齐泽克同时借助康德来批评阿尔都塞。在康德那里，人无论如何都存在非反身的自发性，总是允许个体将抽象的道德和法律规范“图式化”，并且成为他们自身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变成真诚性和内在性的存在。齐泽克由此总结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双重失败：一、未能识别大他者的非物质的“物质性”，即阿多诺他们所强调的真实的抽象性；二、未能抓住质询

^① Slavoj Žižek, *Absolute Recoil Towards a New Founda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2014.

的复杂性或者说双面性，即主体对主体化和象征性同一性的先在性。总之，主体的实在不可能完全是意识形态实践的产物，它还有非物质性的大他者的成份，并且，自我感知的自由性也并非完全必然是幻象，而是一种先验的在先性。齐泽克认为，这种先验性立场的坚持也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区分开来的最终标准。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雷曼的《意识形态诸理论》^①一书值得关注的。他在书中重构了不同学派的意识形态理论，从马克思到阿多诺、霍克海默，从葛兰西到斯图亚特·霍尔，从阿尔都塞到福柯，从巴迪欧到豪格，他让他们之间相互对话，并且也让他们对当今高科技的资本主义现实进行彼此对话。在他看来，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似乎让三位一体的新自由主义的神圣意识形态——取消管制、私有化和自由贸易——彻底失去了信誉，但后来一系列的再转向与导向，又让民众失去了愤怒和不信任的目标。该书旨在通过一系列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析，以便更好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倒置、位移和转移敌人的手法。他认为现代的意识形态理论大致可以看到三种原型：1. 阿尔都塞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贡献：意识形态不能再被还原为“经济主义”或“阶级主义”者眼中的经济现象；2. 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将意识形态理论理解为需要被批判的虚假或倒转的意识；3. 从马克斯·韦伯以来从统治和自我调整的视角出发将合法性理论（Legitimacy-theories）在社会技艺的意义上置于意识形态整合的中心地位。

但是当今意识形态理论与上述三种原型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后者已经无法真正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了，这需要进一步追问意识形态的社会构成和无意识机制，即关注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它作为机器装备、思想、仪式和实践形式的存在。但这种“物质性”又不能简单解释为经济的表达，经济条件和意识形态位置之间总不是直接等同的，即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客观利益和主观解释之间存在着位差（discrepancy）或折射（refraction）。意识形态批判的重点在于揭示人民自愿臣服于统治的异化形式，以限制自身已经获得的客观可能性的情形。在作者看来，从这一视角出发，如果人们以更为糟糕的劳动条件为代价接受道德和家庭价值的话，传统马克思主义将意识形态理论理解为虚假和倒置的意识并非没有道理。

^① Jan Rehmann, *Theories of Ideology: The Powers of Alienation and Subjection*, Brill, 2013.

当然，像霍尔这样的学者并不同意从意识形态内容的真假性的传统视角来研究意识形态，他们主张从有效性与意旨性出发来讨论，即有效的意识形态总是致力于将破碎与对抗世界团结化、亲密化、可靠化，这便是马克思将宗教描述为“无情世界的感情”的真正原因。这也是传统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今意识形态理论的重大差别，前者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的倒置和人民鸦片，而后者旨在探究意识形态领域的力量关系与效果。真正的意识形态批判就在于不只是揭示现象的矛盾性，还要理解和说明这些现象产生的必然性，真正理解它的社会历史的内在构成，并重构其规定的否定性，从而实现批判与理论的有机结合。在讨论了各流派的意识形态理论之后，作者认为建立于20世纪的70-80年代的意识形态理论需要进一步更新，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也难以应对高科技的资本主义发展了。类（para）监狱系统的网络和新技术监控的发展，改变了原来暴力国家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明确界限，也改变了共识意识形态与多元和离散状态之间的关系，这使得晚期福柯关于治理的研究变得十分重要。

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竞争，布伦南在《为什么不能是资本主义》^①一书中明确站在资本主义一边。该书的标题就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明显是要回应G.A.柯恩的著作《为什么不是社会主义》（2009）。在他看来，绝大部分的经济学家正如亚当·斯密一样认为人性是自私的，我们所有的交换活动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因此现实的资本主义会比社会主义运作得更好。布伦南的辩护的新颖之处在于，资本主义的辩护如需完全依赖于人性自私的假设。柯恩能人认为，如果人们不处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下，而是处在像朋友一起郊外旅游的环境下，人们都变得善良而慷慨，那么社会主义就能运作得非常好。换言之，如果我们是圣徒，那么我们将是社会主义者。布伦南认为，资本主义并不存在道德瑕疵，即使我们道德完美，资本主义仍然是在现实意义上运作得最好的体系。甚至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仍然是提升相互合作、社会正义、和谐和繁荣的最好方式。社会主义者寻求占据道德至高点，从而试图表明理想的社会主义比现实的资本主义更加优越。如果论及理想，那么理想的资本主义比理想的社会主义更加让人可欲，因此资本主义可以说在每个层面都全面胜过社会主义。

从本报告介绍的内容可以看出，英语世界中马克思主义仍然活跃，他们

^① Jason Brennan, *Why Not Capitalism?* Routledge, New York, 2014.

不仅致力于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进行新的解释，而且开始致力于建立新的哲学体系，并对一系列新的问题进行探索。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俄罗斯

户晓坤

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其民族的历史命运和社会现实有着深刻关联，通过马克思主义探索俄罗斯民族的复兴道路，这一研究路向从马克思主义最初在俄国传播、以及俄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就已经奠定下来，形成了独特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实践传统。如何使俄罗斯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目标定向，在某种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罗斯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张力突显出来，无论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诠释，还是对俄罗斯社会改革路径的探索，都能发现试图调和或解决这一理论与现实之间冲突的努力，从而使后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批判苏联模式与回应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了其独特的实践路向。

一、2013年马克思主义学术会议

2013年1月21-22日，为纪念罗莎·卢森堡的著作《资本积累》出版100周年，在基辅召开了国际科学与实践会议“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全球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维度”。会议主题包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限制”；“政治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批判”；“《资本积累》中罗莎·卢森堡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20世纪初与当代社会经济思想的理

论基础与帝国主义概念”；“马克思的资本与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列宁与罗莎·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世界历史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命运”；“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体系的分析视阈中的苏联崩溃原因”；“罗莎·卢森堡的遗产与左翼女权主义的全球化前景”；“什么将取代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罗莎·卢森堡的理论遗产与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现代管理问题”。

2013年4月13日，莫斯科公民论坛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95周年举办了国际会议“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莫斯科公民论坛是由政治团体“新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基金创办，旨在反思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突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条件的道路和方案。本次会议围绕作为科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核心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其政治目的在于团结俄罗斯的工人运动。会议的一个突出主题在于探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化劳动的特点及趋势，分析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及其结构变化，分析指出，“中间阶层”、“创意劳动”使传统工人阶级的界限日益模糊，但是资本与劳动二元主体对立的社会关系格局从而改变，当代工人阶级的组织构成与智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使其更加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与知识分子混合成为积极的左派，即新的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工人阶级以及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是空洞而缺乏现实基础的。因此，应该坚持阶级斗争的原则、步骤和方法，实现工人在经济活动中对生产与分配的参与管理与控制，进而实现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将工人阶级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新的社会基础，是克服资本主义回归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条件。

2013年4月20—21日由全俄公共组织“社会主义方向的俄罗斯科学家”举办了国际科学会议“现代俄罗斯：社会哲学审视的经验”。本次会议邀请国内知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从多学科视角，探索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政治领域等发生的重大变革，本次会议围绕六个主题进行。主题一“从苏联过渡到后苏联时代的文明选择”；主题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到折中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欧洲共产主义运动”、“道德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唯心主义的对话”、“自由主义：作为市场变革的哲学基础”、“现代宗教与科学”等专题探讨；主题三“产权制度和现代的俄罗斯社会”，包括“所有制关系：激进的经济变革的核心问题”、“经济发展的创新战略与策略：评价与结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神话还是现实”、“俄罗斯经济现

代化：历史与现代性”、“俄罗斯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俄罗斯的特殊性还是国际关联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危机的克服”等专题讨论；主题四“俄罗斯联邦的社会政治领域”，包括“公民社会的发展问题”、“现代俄罗斯多党制的政党谱系”、“现代俄罗斯社会的社会分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俄罗斯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冲突及其克服”、“现代俄罗斯民族冲突：起源、方法和解决方案”、“打击犯罪和腐败斗争：真实或假象？”等专题问题的探讨；主题五“俄罗斯：未来文明发展前景”；主题六“全方位视角的现代俄罗斯”。

二、2013 年马克思主义代表性著作

2013 年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发展、社会主义道路与当代俄罗斯民族复兴、后苏联时代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意义的阐释。左翼学者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著作，包括 A.A. 科瓦列夫《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征》、C.H. 马列耶夫《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及其对它的批判》、E.H. 乌利金娜《价格制定与马克思主义》、戈洛夫列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性》、M.И. 沃耶伊科夫《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是否拥有一席之地？》、B.A. 布达林《苏联经验和 21 世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征》、И.И. 斯克瓦索夫 - 斯捷潘诺夫《商业资本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再版了俄国著名经济学家杜冈 - 巴拉诺夫斯基的《合作社的社会基础》、考茨基《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爱尔福特大会纲领的解读》、波哈特《资本的积累》。在社会主义与俄罗斯民族复兴问题领域出版了多部研究著作，包括 C. 科列姆廖夫《世界社会主义：人类发展的唯一保障》、B.A. 阿秋科夫斯基等《现代共产主义理论的最初状态》、И.Г. 阿布拉姆索《资本主义修复和社会主义改造》、A.T. 卡拉别利尼科夫《寄生性——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A.И. 苏别达《21 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源头和问题》、M.И. 沃耶伊科夫《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西方和俄国——纪念赫尔岑诞辰 200 周年》等；后苏联时代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意义阐释的著作包括：让克·阿达利《卡尔·马克思：世界精神》、C.И. 卢达科夫《青年——关于马克思主义（致那些想变得聪明的人）》、E. H. 戈拉斯莫夫《马克思主义和美国式全球化在现代世界的挑战》、C.И. 杜尼克《马克思反对苏联：新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历史

经验的批判解释》、H.K. 戈利戈利耶夫《马克思主义：系统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实践的尝试》、Л.С. 费利波夫《21世纪和遥远未来的列宁主义 - 马克思主义》、Б.Ф. 斯拉文《通往自由之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解放的理论和实践》、B. 达洛达夫《怎么办？当代社会状况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出版了关于列宁生平和思想的系列研究著作，包括 H.K. 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我的丈夫——列宁》、Д.А. 沃科戈诺夫《列宁：恐怖的献身者》、Л.Ф. 赫洛彼娜《列宁的莫斯科故居在乌里扬诺夫斯基的庄园》、M.Г. 施杰因《乌里扬诺夫和列宁的家族领袖秘密》、B.T. 洛戈诺夫《弗拉基米尔·列宁：在可能的边缘》、A.B. 布兹加林《俄国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等。

著名政治学家和专栏作家斯拉文是近年来俄罗斯学界比较活跃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政治上持有一种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观点，本年度他出版了由他主编的《社会主义和俄罗斯》、《通往自由之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两部著作，其中汇集了当代左翼学者在社会主义研究领域的多篇论文。《社会主义与俄罗斯》是一部围绕俄罗斯社会主义道路现实性问题而展开的论战性著作，^① 全书包括五大主题：第一部从哲学和历史角度研究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尤其强调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的多元化道路，以及新社会主义与老社会主义的区别，并探索了社会主义的新模式。斯拉文认为，理解当代社会主义应该首先去理解旧社会主义，直面并澄清列宁逝世后社会主义在公众心目中备受质疑的三个尖锐问题，即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化以及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之间的界限。第二部分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学者们试图探索当代俄罗斯的第三条发展道路，其本质问题关涉到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区别。这个问题在共产主义运动史由来已久，有学者尝试为当代俄罗斯设计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具体方案，认为其建立在自由民主和工人自治的基础上。但也有学者认为，在资本作为全部社会生活之根本原则的前提下第三条道路是不可能的，必须使社会公共生活各个领域劳动的支配地位超越资本的权力。第三部分以历史的逻辑分析十月革命以来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比较苏联与当代俄罗斯在政治图景、社会结构、经济状况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差异，探索未来的

① Славин Б.Ф. (Ред.). Дорога к свободе: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Марксизм о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е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2013.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俄罗斯究竟需要怎样的社会经济政策。第四部涉及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以及俄罗斯与人类未来发展的新思维和新战略。第五部分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研究，涉及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斯大林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现代性语境中的托洛茨基等。

在《通往自由之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① 布兹加林、斯拉文、科尔加诺夫等左翼学者以后苏联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讨论了自由的社会哲学维度，揭示了当代俄罗斯政治领域中左翼、右翼以及新法西斯主义极权势力之间的对抗与博弈，力图澄清“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展示和证明社会主义与自由基本上完全相同的概念，并立足于后工业时代探索当代社会主义理论超越苏联模式与现代资本主义的未来战略与可行性策略，以及如何在互联网和社会网络化时代构建民主体制，促进公民权力与自由。其中包括“决定论与自由：经济决定论的唯物主义与以人为本的唯物主义”、“社会创造力和自由”、“真正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诞生”、“苏联历史：自由选择限制”、“当代资本主义：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斗争”、“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的疾病：过去和现在的阴影”、“美国自由和民主：俄罗斯左翼阵线之路”、“21世纪社会主义的新解释”、“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实际的挑战：对齐泽克的批评”等多篇论文。

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至今仍然最具争议性，不论是抹黑还是粉饰俄国革命与苏维埃制度的时代，革命本身都被附加了神秘的色彩。雷斯科夫《伟大的俄国革命：1905-1922》一书是近年来关于俄国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历史及性质的最为详实和全面的研究著作，包括九部分 87 章节内容。^② 在本书中，雷斯科夫力图跳出已有观念和意识形态对革命性质的道德评价，以新的革命理论框架阐释苏维埃的历史性生成。他区分了对历史事件和行动者的道德评价与科学解释，以社会各阶层和要素之间在利益以及思想上的冲突，再现革命进程的矛盾运动和内在逻辑；通过阐释学方法尝试呈现在这场社会和政治爆发性革命中的胜利和失败共存的逻辑。第一部分“革命的主要问题”涉及俄国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及其当时的复杂矛盾，在这里，雷斯科夫特别强调土地问题是俄国革命和性质走向的关键；第二部分“革命的意识形态”呈现了当时活跃的社会

① Воейков М.И. (Ред.). Либерализм и социализм: Запад и Россия: К 2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А.И.Герцена 2013.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② Лысков.Д.Ю. Велик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05--1922. 2013.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自由主义、经济主义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现实中的矛盾斗争和力量消长，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在其中诞生的特殊样态；第三部分“革命的前夜”中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粮食危机，这场危机的解决措施和矛盾演化成为革命的导火线；从第四部分到第八部分，讨论了革命各阶段苏维埃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以及在矛盾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社会现实的历史性结合，核心问题就是列宁对俄国道路的探索、采取的策略及其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最后一部分从财务、交通、分配等方面详实的叙述战时共产主义的历史过程。

经济学家 Ю. А. 别林克的《苏联崩溃的十大原因》是反思苏联解体的一部重要著作。^① 他将苏联解体的原因概括为：在列宁和斯大林之后缺乏有能力的领导人；苏联共产党的毁灭是崩溃的起点；分离主义导致威胁转变为现实；超限度经济发展模式引发的问题；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教条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停滞；在经济竞争与失败中召唤了资本主义；拒绝采用中国的经验；未能实现国家的有效整合；戈尔巴乔夫追随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西方和俄罗斯：纪念赫尔岑诞生 200 周年》一书集结了舒宾、斯拉文、舍甫琴科、布兹加林等多位当代左翼学者关于赫尔岑思想的研究论文。^② 其中包括了《苏联解体后的思想：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赫尔岑与无政府主义：从历史经验到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历史经验中的自治与所有权思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中的自由思想》、《如何在资本主义的薄弱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俄罗斯社会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方法作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等研究论文。学者们基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探索了赫尔岑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在俄罗斯的历史作用，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及其西方思想对俄罗斯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影响与对抗，村社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历史影响等具有当代意义的研究主题。

《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的优先性》（第 1 卷：从危机到社会发展转向）汇聚了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以及俄罗斯科学院等著名学者在古典政治经济

① Белик Ю.А. Десять причин краха СССР 2013.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② Воейков, Михаил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Либерализм и социализм: Запад и Россия к 2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А. И. Герцена, Москва 2013.

学复兴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① 学者们认为，20世纪俄罗斯开启的两次社会转型与其政治经济观念具有重要关联，导致了政治结构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研究政治与经济在历史背景、国家类型以及意识形态转型中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对于俄罗斯而言有着超出纯粹经济学研究的现实意义。本书包括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学者们强调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旨在研究现代性经济政策以应对社会各领域中的新挑战，尤其是社会保障、科学教育以及环境问题。其中包括《一般经济危机理论：未来政治经济学的挑战》、《现代政治经济学：经济自由和社会正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等研究论文；第二部分涉及政治经济学从危机到复兴的当代价值，包括《现代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替代》、《社会经济转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多样性和替代性经济：特殊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对传统争议的全新解读》等研究论文，学者们试图在新旧理论体系的交织和更替中，重新定位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第三部分旨在基于全球化以及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研究未来的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应对新的实践挑战，包括《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理论：从研究内容到为错误的形式辩护》、《成本和价值：综合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路径》、《政治经济学在现代世界中的实用功能》、《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主义方针的内涵与意义》等研究论文。第四部分关于二十一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方法及教学问题。

在20世纪左翼社会思想和政治史研究方面，俄罗斯学界翻译出版了《反对弗朗哥，反对斯大林：在西班牙内战和革命期间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1939）》，索拉诺作为西班牙内战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在本书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西班牙内战和革命期间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② 索拉诺指出，西班牙统一工人党同时在两个方面展开独立的革命运动：反对外部的弗朗哥法西斯主义，在左翼阵线内部反对斯大林主义。这部著作除了记录上述重要历史事件，还旨在澄清和还原历史的真相，即斯大林极权主义之下西班牙左翼阵营残酷的内部斗争。当时的西班牙存在着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

① Бузгалин А.В., Воейков М.И., Мамедов О.Ю., Рязанов В.Т. (Ред.). Политэкономия: социальные приоритеты. 2013.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② Против Франко, против Сталина: Рабочая партия марксистского единства (ПОУМ) в испан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1936-1939). Пер. с фр. 2013.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及其意识形态，两者之间的对立和抗衡由来已久。内战期间，西班牙左翼党派效仿苏联，成立秘密警察组织和监狱，不但以武力打击无政府主义力量，而且肃清内部政治异己者。当时安德烈·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袖，与共产国际持不同立场，他反对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支持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1936年纲领中指出，西班牙共产党并非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政党，而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正式支部。但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斯大林派指控为法西斯主义并取缔，安德烈·宁等数位领导人遭逮捕和杀害。索拉诺认为，记录这一段历史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揭露和批判斯大林极权主义，20世纪欧洲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失败迫使我们在今天重新反思社会主义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所导致的“中心”与“外围”以及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和矛盾日益加剧，新工人阶层、劳工运动、工会和左翼政治力量崛起，对斯大林主义的经验教训与对资本主义新趋势的批判，需要重新回到真正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需要将批判性思维与社会主义政治立场、道德观念作为新工人阶层的思想武器，进而推动世界的革命性变革。

科尔加诺夫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的失败：俄罗斯市场化改革的性质和后果》一书中，从政治观念与经济结构、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角度切入，探索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进程中俄罗斯市场化改革的性质、后果及其根源。^①多数左翼学者认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直接接受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全面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使整个国家陷入严重危机，经济领域中的自由主义与政治上的垄断寡头统治相结合，导致了俄罗斯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而产生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在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冲突从苏联时期延续至今，当局者在政治观念及其意识形态方面无批判地接受了自由主义，抽象地按照西方模式构建了一套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但是，就俄罗斯而言，由于缺乏其功能发挥的社会环境、价值观以及社会心理的基础，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和经济改革并未使其真正走上现代化之路。对于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未来出路，学者们认为需要重新回到制定经济政策所依据的政治观念和价值体系这一基本前提，基于经济因素所依赖的更广泛的社会因

① Колганов А.И. (Ред.). Политэкономия провала: Природа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рыночных “реформ” в России 2013.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素，确立社会各领域发展的优先性，并将以教育、文化为基础的创造性经济作为优先战略。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阐释

在布兹加林、科尔加诺夫等左翼学者的推动下，开启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阐释的新路向，在俄罗斯学界掀起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复兴的研究热潮，引起了经济学、政治学等多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与讨论，2013年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最为突出的研究领域即“新政治经济学”。其一方面是近十年来俄罗斯左翼学者研究成果的积累，而另一方面，这一研究路向的性质也日益清晰和明确下来，新政治经济学力图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基本范畴的基础上，建构区别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并构成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改良策略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研究主题的引领下，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同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矛盾、俄罗斯21世纪社会主义道路等社会现实问题勾连在一起，凝聚并整合了俄罗斯左翼学者的力量与共识。重构经济学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文本、方法论，反思苏联时期政治经济领域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性质和后果，探讨列宁、罗莎·卢森堡、杜冈-巴拉诺夫等学者的经济理论及其对苏联的影响，成为本年度的研究重点。

以资本主义批判、俄罗斯民族复兴为旨归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立足于经济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变革和经济政策实践，学者们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学科范式本身遭遇到了危机，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于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深刻变化，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系统性危机已经失去了解释及防止破坏性结果的能力。新政治经济学在与作为实证科学的经济学划清界限，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同时，关注经济关系产生的诸多社会因素，在经济政策方面坚持社正义与公平原则，追求“社会、人与环境”的整体性协调发展，通过重构经济学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当下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危机。正如涅克别洛夫在《一般经济理论的危机：未来的政治经济学》中所指出的，^①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所遭遇

① А.Некипелов.Кризис обще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вызов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будущего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1,2013.

的困境充分暴露了当代经济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危机与缺陷，基于各种精致的数理模型和分析工具的一般经济理论丧失了完整性，经济学理论日益僵化和碎片化。因此，走出当前经济危机需要构建经济理论的新模式，即恢复对经济前景完整性的宏观把握和对现实的有效回应。涅克别洛夫认为，目前很多经济学家致力于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它并非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范畴，而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整体性变革：首先，政治经济学方法需要克服个人和社会选择的冲突问题，突显政治与经济理论有机结合的重要性；其次，政治经济理论不仅研究经济体制和制度，而且探索其形成、发展和转型的社会基础及其历史条件，因此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新政治经济学的使命建立在对以往教条式经济框架进行批判基础上，以寻求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

尽管学者们认为，创建一门综合性的政治经济学，以便洞察主要的经济关系及其经济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对于急剧社会变迁中的俄罗斯而言又是迫切的。20世纪俄罗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经历了两次深刻的经济转型，政治因素（意识形态）与经济结构、调节机制之间的历史性纠缠尚未厘清，当今大多数的政治家信奉去管制化的自由市场，成为制约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潜在障碍。因此，在学者们看来，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需要理论和方法的自觉，需要厘清经济、政治、历史背景、国家类型以及意识形态等要素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于新经济学学科范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沃耶伊科夫的《经济理论，社会民主和俄罗斯的历史经验》一文围绕如下问题展开：对于当今俄罗斯而言应该建构什么样的经济社会理论，以此为基础推动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有效政策和最佳方法又是什么？^①沃耶伊科夫认为，虽然以美国新古典自由主义范式为主导的现代经济学占据了所有的大学和教程，但是其根本不适合俄罗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资本主义实验有着惨痛的教训：制造业的崩溃；科学和技术退化；经济发展依靠原材料；资本外逃；国内投资下降；持续失业；社会经济不平等增强；人口缩减；犯罪增加；普遍的腐败。与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数字相比较，20世纪20年代苏联时期的混合经济

^① М. Воейко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социаль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Росси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1, 2013.

取得了成功。格林伯格、布兹加林等经济学家一再指出，新古典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已经失败和破产，虽然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必然性，但由于俄罗斯民族的地理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俄罗斯更需要建立政府规划和调控下的社会导向型混合经济模式。

沃耶伊科夫指出，现代经济学越来越倾向于仅仅研究纯粹物质生产、交换过程，无法构成经济政策形成的价值及信念基础。新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试图在更为宽泛的社会背景下来理解某一个经济体的功能，包括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政治因素）。如果淡化经济学的政治学维度，在现实的经济政策中就会缺失干预过程。政治经济学作为影响着国家经济政策形成的理论研究和概念分析，应当以日常经验和民族传统作为现实基础，在不同程度上承认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和其他社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将这些影响因素纳入它的分析框架。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先进阶级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的经济思想，加强对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非市场领域的国家支持，这些政治利益表达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意味着市场原则向社会价值的妥协，以及集体和个人自由、市场和计划调控、人权和社会保障的高度衔接。

格林伯格在文章《现代政治经济学：经济自由与社会正义》中指出，^① 在过去一个世纪主要基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商品交易关系广泛渗透到所有人类活动领域，自由市场的边界无条件扩张至经济、社会生活甚至精神领域，乔治·索罗斯将其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仅经济，而且社会和文化领域也被“市场交易关系”前提预设所规定。由于 20 世纪 70 年代国家再分配过程对于投资活动的阻断导致了经济滞涨，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被妖魔化，英美等国家放弃凯恩斯主义恢复了早期资本主义残酷的曼彻斯特传统，反对国家干预、削减社会福利、维护企业利润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长期经济增长，然而这一经济增长是以社会矛盾和冲突累加为代价的。由于政治家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中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经济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影响，自由市场的价值优先性作为无批判的意识形态，构成了经济政策的信念基础，在经济实践中导致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冲突，两

① Р. Гринберг.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вобода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1, 2013.

极分化严重危害到社会伦理秩序，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取代了同情和团结，造成了社会分裂和冷漠。俄罗斯需要转向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和正义不是相互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重新界定国家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地位，即参与而非粗暴干预，国家作为平等的市场参与者，致力于实现特殊的社会公共利益，其活动应受到理性行为的规范，作为独立市场主体致力于形成新的市场均衡，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社会效用函数。如果公共利益仅仅被看作个人利益的总和，国家在社会结构中将被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但是，如果国家作为公民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民主控制和授权代表，能够在经济过程中承担重要角色。

布兹加林在《作为自由和效率前提的正义》中回应了格林贝格的上述主张。^① 由于市场化原则对于民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过度渗透和控制，全球经济和福利国家陷入整体性危机。俄罗斯正处于转型的十字路口，基于社会化发展的混合经济模式能否以及如何成为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的替代方案，是近年来学者们讨论最为激烈的问题。布兹加林指出，无批判地将市场化原则及其意识形态扩张到一切领域，就会将人们禁锢在自由、效率与社会正义的二元对立之中，而两者是可以进行统一的。建构新经济模式首要问题在于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和边界，将社会正义作为民主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根本原则。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成熟公民社会（基于“积极自由”的公民主体能够在公共生活中自觉地发展基层民主，进行自我管理和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才能将社会正义确立为经济自由和效率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前提。需要在经济发展、民主政治中突出社会本位，将新的非市场化规范和原则，即社会正义纳入市场经济的运行，提高国家社会化的程度，通过积极的社会监管和公民参与降低政府行政管理的成本，抑制政府腐败和官僚主义。布兹加林同样认识到，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策略所立足的广泛的社会平等的财富再分配和福利政策遇到瓶颈，需要将经济政策的重点从分配和再分配转向生产领域，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和创新能力。社会正义原则的确立对于在激烈的转型中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具有积极的稳定作用，对于创造力的激励作用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中已经被证实。社会正义作为自由和效率的前提，构成了社会民主主义新经济模式的根本原则，意味着在社会化程度的充分发展的前提下，优先增

① А. Бузгалин.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как предпосылка свободы и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над книгой Р. С. Гринберга.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1, 2013.

加大对教育、科学、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的投入，培养公民意识和参与能力，提高劳动主体的创造能力。

伊利亚·费拉朵夫在《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一文中认为，19世纪中期以来的经济学很少涉及，甚至回避如下基本问题：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对经济思想的影响；价值观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实证的”和“规范的”经济理论之间的区别，经济事实和价值评价之间的关系，等等。^①19世纪晚期社会科学要求摆脱价值判断，马克斯·韦伯主张事实和价值之间的根本区别，既然在社会科学中无法通过实然获得应然，从而确立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要求，但是，同时我们要看到，韦伯并不认为经验科学可以完全脱离价值判断。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作为实证科学的典范却把韦伯的观点发展到极端，正如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所指出的，实证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不依赖于任何道德立场或价值判断……它致力于‘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其目的是建立对未来趋势进行预测系统。正是在自然主义思维的规范下，经济学将获得经济活动“规律”作为根本任务，将抽象的概念体系作为推导、规范经济现实并对社会生活进行意识形态指引和控制的必然路径，以经济学逻辑上的正确性作为实际行动上道德正当性的基础，进而成为为现实辩护的一元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然而，在实践中，隐藏的规范性前提又使经济学家们潜移默化地过渡到价值判断，例如，在描述性判断形式中使用诸如“不平等”、“自由”、“正义”、“贫困”、“剥削”等概念，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同意实证经济学的理念，但没有看到，客观的描述和价值评价之间的边界在实体经济中仍然互相渗透，经济学家们无法摆脱为现有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制度进行辩护或批评的职能。正如韦伯指出，现代经济学明显包含了特定目的，但它却又极力宣称“价值中立”，因此是“伪道德中立”的。在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方法论中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伦理维度，他们认为，对经济范畴进行适当的价值评价和判断是必要的。

伊利亚·费拉朵夫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在经济学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的判断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以社会批判的立场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虚幻”或“虚假”，如商品拜物教作为虚幻的意识形态是

① Илья Филатов. Идеологии и ценности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науке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1, 2013.

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政治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的科学，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表达，因此其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描述和解释，却无法揭示和批判导致资本主义体系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瓦解和崩溃的内在社会矛盾。然而在现代经济学文献中，意识形态通常被理解为一个整体的、逻辑连贯的思想体系，或表达特定社会经济制度性质和结构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通常变相地融合在对经济事实的陈述中。意识形态无法被实验所检验或者证明，它通过对思想范式的渗透（库恩）或核心概念的定义（拉卡托斯），共同形成了经济分析的框架。在 19 世纪经济理论的发展中，我们还能够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的作用，其中的理论、方法和思想元素是紧密结合的。譬如，由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条件的特殊性，形成了英国、法国和德国在经济学上不同的理论表达。英格兰的政治经济学体现为自由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和市场竞争、交换理论的思想，法国由于现代化的滞后，产生了社会建构主义意识形态，德国为了快速现代化则发展出一套国家调控理论、国家保护主义理论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

然而，上述情况在 20 世纪发生了显著改变，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其建立在信息的完全对称和个人选择理性最大化的思想预设基础之上，但是这一前提在现实中却是完全扭曲的和虚假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在同左翼经济学的对抗中发展起来的，作为经济政策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信念支撑，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作为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更为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具有同源性。现代主流经济学依然刻意地强调其客观性和科学性而否定本身所潜含的这种意识形态，从而无法深入地挖掘这种现象的理论根源，而基本上只是停留在表象的解释上。因此，现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将经济理论的意识形态背景最大程度地净化，而是承认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并批判性地分析新古典主义、新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等经济学派思想观念及经济政策背后隐遁的价值观，进而重新构建为社会改革提供理论支撑的经济学体系。

阿利斯塔特·科瓦列夫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变异与重建》中，^①对俄罗斯新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了性质判断。阿利斯塔特·科瓦列夫认

① Аристарх Ковалев. Об извращении и возрождении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1, 2013.

为，新政治经济学力图与现代主流经济学划清界限，将自身置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激进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间，虽然新政治经济学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方法论基础进行重构，然而却放弃了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而形成的批判立场，因此，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其自身构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进行社会改良的理论基础，主要的重点转移到市场经济体制、政策等具体问题方面，特别是如何不通过休克疗法进行市场化，如何从市场原教旨主义转向国家经济宏观调控，市场和非市场领域之间边界的厘清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新政治经济学是对 20 年前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再次尝试，如维护市场均衡和市场自我调节，加强国家和有关国家对这种非市场领域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公众支持，扩大中产阶层等。但是科瓦列夫认为，新政治经济学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而是同样具有过渡性质。

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道路之争

虽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很多左翼学者基于俄罗斯民族的特异性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改革的失败认为，目前俄罗斯仍处于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外围”的边缘状态，学者们致力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新特点、新趋势，尤其关注俄罗斯 20 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在其不同发展道路问题上各思潮的争论，探索能否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开拓第三条道路。

卢斯朗·扎拉索夫《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或落后？》一文连载于 2013 年《抉择》1-3 期。^① 文章指出，经过二十多年改革，俄罗斯甚至仍然无法恢复苏联时期所达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大多数人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俄罗斯已经耗尽了社会革命的力量，只能以和平的、渐进的发展模式，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进行过渡。因此经济学家们呼吁政府采取“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扎拉索夫认为，基于俄国革命的历史传统和苏联解体后的现实状况分析，这种和平的、渐进的过渡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已经

① Руслан Дзарас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апитализм: развитие или насаждение отсталост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1, №2, №3, 2013.

预见到了在通往资本主义道路中所存在的问题，即资本主义在俄罗斯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创造着自己的国内市场，而俄罗斯不过是被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化的一个环节，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如孟什维克所希望的，成为社会民主革命的“领头羊”，布尔什维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充分认识到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可能性。而马克思在晚年受到俄国民粹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品的影响，开始质疑历史发展的线性路径，思考发达资本主义和落后国家之间的差异性，虽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展开成为潜在趋势，落后国家的自然历史进程会被打破，但是却无法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同质化的社会发展模式。基于马克思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的分析方法，更多当代学者指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均衡性和不稳定性，即通过对外部（欠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和控制来维持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发达国家）资本积累的实现，使得有计划的市场经济难以实现。

扎拉索夫认为，自由主义的神话将资本主义的胜利归功于其所拥有的内在活力和创造力，甚至新教伦理等宗教因素，但恰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指出的，西方赢得世界的原因并非是它的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势，而是对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有组织暴力，全球范围内的暴力扩张是欧洲工业革命取得成功的基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垄断结构和全球扩张正是通过制造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即后来所谓第三世界）的欠发达状态来维持的，即扶植与宗主国“典型”和“纯粹”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截然不同、在很多方面甚至恰好相反的殖民地依附性资本主义。按照弗兰克在 60 年代基于拉丁美洲发展模式所提出的依附理论，依附性意味着屈从或从属的不平等的权利关系，这种特殊的、不平衡的“发展”形式只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而这种其结果是通过价值的转移，促进了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发展或发达，同时导致了边缘地区的欠发达。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被殖民化的历史深刻地导致了当地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农民丧失土地，被驱逐到城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廉价劳动力，在当地培养买办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兰克将拉美等统治阶级称为“流氓资产阶级”，并且指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在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原始积累，作为初级积累对于体系中心部分资本积累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而在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尖锐矛盾，19 世纪亚洲欠发达国家在发展模式上似乎都陷入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同质化的路径依赖，甚至包括俄罗斯在内都表现为，自身的农业经济迅速破坏，经

济主要依赖于国外投资和能源出口，俄罗斯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发达国家占据和控制着高附加值产业，俄罗斯就像大多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则只能提供低价值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和能源，因而高度依赖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经济政策层面，都没有走上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独立道路。

В.Г. 费多托娃等学者在《俄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和什么样的资本主义?》一文中，通过对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范畴及体系的研究，探索俄罗斯为什么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后一直无法摆脱困境及其现代化悖论。^① В.Г. 费多托娃指出，布罗代尔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在广阔的时空中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发展的长时段进程，提出了物质生活、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三层分野的结构，同时划定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界限，即处于日常物质生活巨大实体上的市场经济，作为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通过交换把愈来愈多的人和地区纳入统一的经济活动之中，造成分工和专业化。虽然市场经济以公平竞争、透明正规的自由交易为基础，它构成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但是，市场经济与资本逻辑之间不能等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是垄断，资本占有者通过制造和利用其垄断地位，占据社会经济活动的顶层，通过一系列的非经济手段，或是政治法律手段达到独占、操纵市场，攫取垄断利润的目的。В.Г. 费多托娃认为，布罗代尔并非从政治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及其经济运动，而是从经济活动的地理和商业纽带出发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的活动空间，即经济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资本主义以其强大的经济活力超越了不同国家的领域和文化，将自身立足于开发国际资源、获得资本增殖潜力，进而构成了“核心 - 边缘”的有机整体，体现了经济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剥削关系。

В.Г. 费多托娃指出，布罗代尔对于资本主义的上述分析，对于研究俄罗斯的现代化及其资本主义模式具有重要意义。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量存在物质生活之中，包括人口、技术、文化与市场等，但是，由于俄罗斯独特的历史进程和地缘状况，在其物质生活中并没有充分形成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因素。在布罗代尔所勾勒的资本主义历史图景中，自由、公平交易的市场经济是

① Федотова В.Г., Колпаков В.А., Федотова Н.Н. Кака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и какой капитализм нужны России?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Науки №6, 2013.

资本主义产生的基础，但是，对于俄罗斯而言，全面私有化改革在一个更加自由的空间中释放出了“非正规经济”，其作为一种掠夺性、暴力性的获利方式建立在寡头政治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资本主义直接产生于在苏联计划经济孔隙中的“非正规经济”，或称“影子经济”，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通过行贿、官商勾结等非正规方式以超低价控制国有企业，违法、犯罪和腐败等非法行为成为垄断寡头获得利润的最为有效的手段，维系市场经济公平、透明的法律基础以及其现代经济管理模式无从建立。在俄罗斯改革之初，人们认为非正规经济是由苏联体制所固有的特征和缺陷引起的，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所进行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可以消除这些缺陷。因此，它采取了新货币主义的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改革方案，通过激进的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直接开启俄罗斯式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之路，但是，由于俄罗斯既缺乏制度层面必要的法律保障和长远规划，也缺乏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民间心理基础，结果导致了非正规经济的泛滥。苏联时期的非正规经济与全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新自由主义正转化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不仅使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广受质疑，而且使俄罗斯在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日益成为边缘化的经济体。

21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系统之间在社会经济层面的意识形态争论并没有停止，然而市场和计划能否成为划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标准？B.Г.费多托娃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模型包括两种“理想类型”：一方面，完全的国家“集权主义”经济，而另一方面是完全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西方国家经济体更多采取了混合经济模式，这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策方面不断寻找市场和国家的最佳平衡。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却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推向发展中国家，这种模式今天已经变得声名狼藉了，因此俄罗斯需要摆脱市场与计划、自由与集权的二元对立，探索新的经济发展道路。

在《界定社会主义的概念》一文中^①，别林斯基批判性地分析了社会主义通行的定义。他指出，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俄罗斯的危机表现为这一概念的模糊、滥用和争议。传统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其

① Беленький В. X. Как определить социализм? Философ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Выпуск №1(69)/2013.

任务包括对生产进行社会化的组织，社会财富进行公平分配，对国家进行系统的公共管理，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重组劳资关系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然而，这些观念是抽象、空洞的，并没有抓住社会主义的本质，也背离了马克思确立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辩证思维和方法。

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运动过程 and 方向，对它的概念界定应该是辩证的、系统的。别林斯基认为，对社会主义需要在“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过渡进程中理论和实践的挑战”三个维度进行动态分析：通过批判作为社会主义对立面的资本主义，确定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通过分析作为社会主义最高阶段的共产主义，突出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通过回应理论和实践中的困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确立现实的政治目标和解决方案。别林斯基认为，列宁对于社会主义界定正是基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对立统一的辩证逻辑，从而使社会主义理论超越了抽象的概念和范畴具有了现实基础，使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对立转向统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社会生活急剧转变的时候，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要估计到各种过渡的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者应怎样进行斗争，怎样设想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并不是最困难的问题，最困难的是怎样实际地从旧的、习惯了的、大家都熟悉的资本主义向新的、还没有产生的、没有牢固基础的社会主义过渡。列宁为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确立实际的政治目标，提出创造性解决方案，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向国家资本主义进行过渡，施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向社会主义过渡两个阶段，从而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别林斯基认为，我们在今天需要从以下要素出发，澄清对社会主义的混乱阐释：建立列宁的方法论原则；总结 20 世纪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析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展开的客观历史进程；把握资本主义在 21 世纪新特征；吸取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经验；坚定世界范围社会主义胜利的是可能的；分析在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在上述基础性研究工作的前提下，还需要在现实中努力寻求超越传统社会主义的多样性道路。别林斯基进而指出，社会主义的具体化定义只有在设计过程中完成，改进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化方案在现实中各有不同；在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重要本质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发展生产力向社会主义过渡，确定新的文明发展前景；将人的自由自觉发展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价值。

基于社会民主主义立场，斯拉文将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因素相调和，在反思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发展道路，并认为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必须严格区分社会主义理想的科学内涵和实践中的历史形态。^① 斯拉文指出，当代俄罗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使民众转向了追求自由、正义、团结、平等和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俄罗斯人对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持消极的否定态度，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代表也不得不转向寻求“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本质”和“社会民主思想”的优势。在这一具有时代迫切性的主题下，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及其道路的争论就变得更为激烈。对此学者们的态度基本有三种：第一，强调必须严格符合社会主义特征；第二，更具普遍性的观点认为，可以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进行调和，比如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第三，以普适的、一般的文明价值观取代社会的阶级性质，对未来的社会主义进行最新解释。但是，上述各种观点并没有给出一个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面的完整的图景，也没有解决市场社会主义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平衡问题、公共和私人财产、效率和正义、自由和权力、独裁和民主、国家和自治等有争议性的问题。斯拉文认为，上述分歧产生的原因在于，人们无法理解支撑左翼历史乐观主义信念的基础，不了解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及其哲学基础和科学性，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解体的原因，没有建立起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的未来趋势以及现代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只有澄清上述根本性问题，基于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和批判，才能吸引新一代俄罗斯人的价值和理想转向左翼阵线。

斯拉文认为，新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平行发展，产生了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尚未涵盖的新现象，也无法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解决政治以及阶级冲突。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市场、货币、交换形式的多样性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创造性地使用，如何使用及限制其范围则是关键问题。斯拉文主张将人类共同的普适价值观，如社会正义、公平能够作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尺度和标准，在生产人民生活必需品和为居民服务的领域实现有竞争力的经济和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使各种所有制包括集体的、国家的、私人的、混合的所有制

① Славин Б.Ф. (Ред.). Дорога к свободе: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Марксизм о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е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2013.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形式都能平等、有效地发挥作用。斯拉文认为，新社会主义道路是现实的，我们今天的情境和任务在列宁的时代就以新经济政策的方式实现了，因此，如何改善和调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是目前的转变社会主义思路的重要出发点。

亚历山大·韦伯对托尼·朱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及其当代意义进行了深入研究。^①20世纪70年代之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落入到左派与右派的形式主义争论之中。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欧洲问题专家托尼·朱特晚年试图跳出左右之间的简单争论，他对于美国社会、新自由主义和经济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并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替代方案。他的思想引起了俄罗斯学界的广泛共鸣。亚历山大·韦伯指出，托尼·朱特对于资本主义的判断，首先是把它作为生活方式和时代本质，而非仅仅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或经济形式。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将因过度的极端自由化而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在自由市场的极权恐怖和社会主义的功能性障碍之间，拯救西方民主困境的只能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大优点恰恰就是它的非纯粹性和妥协性，社会民主主义“意味着接受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主义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以内，迄今为止一直受到忽略的大部分人口的利益现在将会得到解决”，通过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国家市场调控，以及民众自由民主热情保障社会的公正和平等。托尼·朱特也深刻地思考了目前社会民主主义者们的行动方向，即整个欧美的左翼力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老左翼的主体是诉诸社会革命的激进道路的无产阶级，而社会民主主义者作为相信社会公平、公正以及市场监管的温和民主派，应该通过重塑公共对话，引导民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

罗伯特·叶夫则洛夫在《罗莎·卢森堡的遗产——反对权威主义（俄国的经验）》中，基于俄国经验讨论了罗莎·卢森堡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当代意义。在卢森堡的民主思想中，民主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民主，在上述根本原则下，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组织策略的批评、对于苏维埃政策的批评和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强烈呼吁，触及到了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就无产阶级的组织原则而言，罗莎·卢森堡认为，在沙俄专制统治下为了整合分散的社会民主党的战斗力，应该采取集中制，但是集中主义并没有完全贯彻无产阶级政党组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Вебер.Размышления Тони Джадта о тревогах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织形式的历史内容，对于社会民主党内部集中化程度及其性质需要作深入研究。因此罗莎·卢森堡反对列宁的“极端集中主义”和“无情的集中主义”，因为在列宁的政党组织方式下，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罗莎·卢森堡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运动，是历史上第一个直接由阶级群众自己独立进行的政治运动，因此它所需要的集中制，毫无疑问应当是由无产阶级大众自觉自愿实行的集中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的集中制应该是一种“自我集中制”，只有党内树立了这种在政治上拥有活动自由的精神，并且能把这种精神同对运动的坚持原则和敏锐观察结合起来，党内民主才能得到保证。俄国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在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展和工人自治的基础上，才能够避免重蹈中央集权社会主义的覆辙。追求直接民主是不现实的，而应当首先谋求建立有严格的制度保障的程序民主。

达维特·拉伊布曼希望人们在后资本主义时代重新思考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性理论，尤其是回到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立场。^①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与资本是互相规定的，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新的社会阶段(社会主义)是对前一阶段(资本主义)“规定性的否定”，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作为量的积累，只有通过阶段性的发展才能够实现社会性质和结构的过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者个人的自由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限制，但是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已经从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转化为构成国家的现实主体。基于马克思在这一理论中的辩证态度，达维特·拉伊布曼认为，过渡的具体的政治或者经济形式是多样化的，但也是不稳定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基础是“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不能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界限，或者做出策略上的妥协，需要在根本上将政治权力转移到劳动者手中。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不稳定的矛盾集合体，彼此最终无法兼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现实版，这种为了经济增长效率做出的调和、折中和妥协有时是必要的，但如果社会主义的主

① Дэвид Лайбман. Зрел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труктура,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переходные периоды.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1, 2013.

导地位被降低为国家中央计划（调节市场关系）的经济职能层面，仅从经济改革的一维向度去发展社会主义将是危险的。在中国和古巴两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差异上，前者认为提高经济效率和活力具有优先性，后者则坚持公制作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中国的问题表现为社会的两极分化和不稳定性，而古巴则不得不面对官僚主义和经济效率低下的状况。因此，中央自上而下的规划和与市场力量的长期共存是初级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经济结构。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应对两者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即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力问题，克服混合经济模式所可能导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不稳定性将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达维特·拉伊布曼认为，成熟社会主义的特点应该是协调而非规划，意味着自由人的联合体成为社会组织生产的基础，在这一阶段将形成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协调发展。

达维特·艾施杰因在《无产阶级辩证法和劳动者利益的优先性》一文中，探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问题，尤其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革命过渡或革命转变的一种持续状态或形式，是否可以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在达维特·艾施杰因看来，马克思的专政概念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第一，谁的利益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第二，阶级统治实质上建立在国家暴力的基础上，由此产生了“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将暴力革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形式，一方面由于当时当大部分国家还处于资产阶级专制统治之下，民主制度尚不完善，另一方面则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暴力革命成为瓦解和推翻旧制度的典型形势。但是在巴黎公社运动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也承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多种形式。在巴黎公社、苏维埃社会主义以及欧洲工人运动的详实历史资料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达维特·艾施杰因指出，在国家性质上过度强调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不但会缩小社会统治的阶级基础，而且会使社会主义滑向“独裁”和“极权主义”的危险边缘。当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国家政权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应该是实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民主的性质必须超越对某一个阶级的专政，专政必须建立在充分的人民民主的基础上，维护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是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坚持劳动者利益优先性的原则。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政治机构和政权组织方式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政治垄断，而是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这意味着劳动者的权益在与企业的利益的冲突中，应当优先确保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和

社会福利，保障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共同增长。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就此而言，劳动者利益优先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基本前提。

五、后苏联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虽然苏维埃政权的崩溃导致马克思主义受到来自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诸多批评，但是在 21 世纪的头十年俄罗斯左翼学者毅然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左翼学者重视对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研究，尤其是官方和学者的出版物及档案材料，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学者们认为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从积极方面评价苏联的历史经验。

С.И. 杜特尼克、В.М. 卡姆涅夫两位学者认为，后苏联时代马克思主义复兴的迫切任务在于，一方面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源寻求苏联解体的原因，另一方面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信息革命、全球化以及超国家的官僚机构等近十年来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变化。后苏联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同苏联马克思主义之间划定原则性的界限，揭示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两位学者在《后苏联马克思主义：思想特点和发展前景》一文中，从拜占庭式宗教文化和西方科学主义传统两个方面，讨论了苏联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①

С.И. 杜特尼克与 В.М. 卡姆涅夫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做了深入的批判分析。他们认为，这一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俄罗斯民族非常具体的现实问题：它首先恢复了人的社会权利，对于复杂的世界观问题进行了解释，具有西方哲学意义上科学主义和社会批判的方法论意义，并通过规范性知识利用政治权威声明马克思主义及其世界观的真理性。在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历史土壤中所形成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近乎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成为神秘而难以捉摸的历史和哲学现象，它允许一定程度的思想自由，同时却保持严格的外部意识形态的限制。对于苏联时期人们的思想状况而言，中世纪的拜占庭文化同时成为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力组织原则，政府作为绝对的外在权威，被视为能够安排世界和社会生活的绝对力量，哲学作为客观真理是无法通过个人的沉思获得的，

① Дудник С.И., Камнев В.М.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марксизм: идейное своеобраз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Науки №8, 2013.

只能由权力机构进行规定。苏联时期的社会文化状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东正教伦理的独特融合，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哲学传统中形成的独特的哲学思想、社会活动，却成为了苏联人民行为的强制性道德准则。这种结合以某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方式作为思想基础和道德信念，支撑了苏联追求西方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历史进程。对于后苏联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而言，必须重新面对和思考俄罗斯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

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其依循自然科学所建立起来的科学主义范式，即通过精确的、标准的科学方法来认识 and 解决社会以及个人生活的全部问题，基于自然本体论和还原论思维，将社会历史进程作为自然辩证法的衍生物。然而，自然作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基础，正是通过人的对象性活动被纳入主客体关系中，成为历史活动领域中独特的社会现实，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站在了科学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对立面。苏联解体后，左翼学者将寻求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摆脱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困境，诉诸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两位学者认为，后苏联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应在最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做出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性反思与超越。

《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是 20 世纪 20 年代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主办的捍卫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哲学和社会经济理论杂志，在革命思想传播和与唯心主义哲学传统的理论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E. H. 马托夫尼科娃通过描述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及其思想争论，批判地考察了苏联时代新闻传播的状况以及新闻学的特点。^① 马托夫尼科娃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被列宁赋予战斗的唯物主义刊物的任务，其目的在于同当时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宗教思想进行斗争，宣传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在悬而未决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以及逻辑学等哲学问题上展开广泛争论，根据社会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成果发展和丰富了辩证法，以科学主义和唯物主义作为瓦解宗教神学的理论武器，力图在苏联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基础。马托夫尼科娃认为，唯物主义与宗教神学之间的思想斗争，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首先是个人生活主题的抉择，为了在青年工人群体中建立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论基础，苏联时期的新闻传播无情地忽略了个人的生活体验、

① Мотовникова Е.Н.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 – "Мысль": герменевтическая коллизия 1922 г.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Науки* №11, 2013.

俄罗斯的思想文化传统以及言论自由。在以理论刊物为阵地对宗教哲学传统和有神论信仰的批判和斗争中，基于科学主义的历史进步的乐观信念，以及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经济理论，并没有真正在逻辑上瓦解宗教信仰的心理基础和情感基础，就其传播责任与功能定位而言，成为集权主义的统治工具。

B.B. 马赫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十九世纪俄国唯物主义》中，^① 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进而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逻辑和历史脉络，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俄国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虽然彼此独立，但是它们的发展却并联在一起，在同一方向上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能够绕开资本主义或利用资本主义的某些成分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努力正是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发展客观历史条件的分析。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作为19世纪最重要思潮及革命组织的民粹主义及其村社社会主义受到批判，但是B.B. 马赫宁认为，民粹主义作为农民民主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在俄国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深刻地受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虽然其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但是却和马克思主义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即对于社会现实和历史进程的辩证思考，对于俄国社会及后来的俄国革命和建设进程都有着难以预料的影响。

B.B. 马赫宁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过程，尤其是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以及普列汉诺夫等革命知识分子在立场转换中的思想冲突和心路历程，即如何从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对立中走出来，接受马克思主义最终转向俄国民主主义思想，他们在俄国民粹主义基础上，根据俄国的社会现实和革命需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B.B. 马赫宁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最接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家，通过经济学的研究分析，他提出社会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人类社会历史的存在基础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政治理论甚而全部哲学学说，都是在它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规定下形成的，并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变革生产关系”的必然规律得出“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科学论断。19世纪40年代初，别林斯基曾受到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接受了关于现实的合理性的哲学思想，并因此导致其在精神上“与现实和解”。但是，在否定了黑格尔之后，别林斯基转

① Сухов А. Д. “Философия марксизма и рус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XIX в”, Философ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Выпуск №2(70)/2013.

向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从“与现实和解”转向与现实决裂，完全抛弃了斯拉夫派把俄国宗法制理想化和西欧派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立场，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成为革命的民主派。在分析俄国民主主义思想发展的基础上，B.B. 马赫宁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俄国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在根本上都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客观必然性的把握。

亚历山大·维别勒在《稳定发展的模式和马克思的现实性》一文中，系统研究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及其物质变换思想。^① 亚历山大·维别勒指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人的物质生产性活动，即人以自身的相互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自然被视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人与自然首先表现为一种生态关系，与此同时，它还必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换劳动，实现个别劳动之间的社会的物质变换，进而结成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这一过程在本质上也就体现出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统一。为了满足普遍性的物质需要，将消极的自然力和物质通过积极的人类劳动转化为物质生产的对象和手段，是自然界被人化和人被自然化的过程，马克思将自然界内部、人与自然之间、社会系统内部的物质变换过程置入社会经济活动系统中。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自然力和物质转化为劳动工具和手段，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即今天所谓的自然资本，而另一方面，针对人类活动产生了对外部环境的破坏性影响，马克思设想了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条件，使人们充分占有自然资源，才能够避免人口与资源之间的裂缝。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对劳动力、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等权力的延伸和控制，导致了人类以占有财富为目的的生存方式与自然社会整体发展的冲突。这里的自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不仅仅指自然资源，也包括在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所增加的人的自然力，即人的属性的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似乎保持了乐观的态度，认为通过建构生产者联合的社会，从而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进行系统性调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发达国家通过形成“消费社会”状况扩张了资本对自然力的剥削程度。资本与劳动联合对于自然资源的控制，导致了人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的内在冲突。物质财富和经济增长是人类福祉的关键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更不应被视为目的本身，同样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Вебер Модель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Маркса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 2013.

重要的还有社会和环境因素，如教育、卫生、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甚至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等自然景观。亚历山大·维别勒认为，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思想的现实性就在于，迫使人们重新反思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的增长导致了世界发展趋势的波动性，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状况造成了对自然资源重新瓜分和占有，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掩盖下，自然资源作为商品成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资源从贫穷的国家流向富裕的国家，在低-中等收入国家造成的自然资源的耗竭，而在高收入国家的“过度消费”是资源耗竭的主要原因。各国政府尤其应该对这一迫切现实有充分的认识，特别是对于俄罗斯而言，经济发展的重心应该向人力资本转移，而不是依赖自然资源的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化状况。

奥尔洛娃和瓦西里耶夫两位学者致力于在后苏联时代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构成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发展。^① 奥尔洛娃和瓦西里耶夫指出，经济学作为现代知性科学以抽象的普遍形式为研究对象，无法在思维中再现社会历史的总体事实和生成过程。不同于以经济范畴、形式规定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科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运用辩证法综合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经验科学。上述原则性的差别体现为，马克思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论去研究资本社会的经济事实，一方面运用思维的形式掌握现实的具体，将其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因此需要从简单、抽象的思维形式上升为丰富的、现实的具体，从而在精神中综合为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现实；马克思与一般经济学家研究经济事实的前提是有本质差别的，经济学家以普遍的、抽象的人性为前提，而马克思将“现实的个人”作为研究起点，强调人的社会的存在方式和历史的生成过程，通过劳动建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两位学者在比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一般经济学的基础上指出，前者作为经济学的哲学主题在根本上研究的是经济形态与人的发展问题，因此，如何实现资本主义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渡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必然旨归。

基于宏大的现代性背景，穆斯托对于 20 世纪以来的“异化”主题以及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意义进行了深入研究，主张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关于

① Неомарксизм на фоне марксизма *Философ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Выпуск №2(70)/2013.

异化状况的时代主题。^① 穆斯托指出，黑格尔通过异化概念展现了绝对精神“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生成过程，构成了自我意识证实自己本质力量、完成自我复归的一个必然环节；费尔巴哈则将异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在基督教神学中的自我投射；涂尔干的“失范”概念意味着社会分工所导致的社会凝聚力危机；韦伯则将其描述为资本主义精神、官僚制和工具理性；卢卡奇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所普遍存在的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替代，并称之为“物化”。上述学者对于异化主题的不同阐释角度，揭示了从传统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转型及其表现形式，甚至后现代视域中德波的景观社会、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都可以纳入这样一个广泛的主题之下。但是与上述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状况的描述不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具有重要的建构和转型意义。1932年出版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使学者们能够重新讨论异化理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马克思将异化从哲学、宗教以及政治和社会交往领域拓展至资本主义的经济领域，表明经济活动是理解和克服其他领域异化状况的更为基础性和本源性的领域。不同于黑格尔，马克思将异化运用于一种特殊经济现象的框架内，即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二元对立及其互相转化。两者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是巨大的，与黑格尔在本体论层面表达抽象的精神劳动相反，马克思将异化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在异化过程中将自身转变为资本、工资以及货币等等，进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直接诉诸于“价值”、“利润”、“资本”等经济范畴中所包含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其运作方式，揭示资本主义异化的特征。异化劳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在劳动转化为劳动力商品后，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分别作为劳动的量与质的分离，抽象劳动或者积累起来的财富一般对具体劳动的支配关系。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更高级社会的物质基础条件，财富的积累与对劳动的剥削构成了其制度内生的矛盾对立，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异化和异化的扬弃是同一条道路。

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民族历史命运之间的独特关联，如何在21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重新树立民众对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基础的信念，成为当代俄罗斯左翼学者为自身所赋予的使命。这种努力体现在对苏联模式的澄清和

① Марчелло Мусто. Еще раз о марксовской концепции отчуждения.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3, 2013.

批判，以及对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阐释。而俄罗斯在重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后，在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所积累起来的一系列内在矛盾，又为学者们提出了迫切的现实问题，因此，在学者内部围绕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道路之争展开了深入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现实道路成为争论的核心，基于对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现实关切，新政治经济学成为凝聚左翼学者共识的独特研究领域，在马克思经典社会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分歧方面，体现了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在张力和特殊矛盾。

作者：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日 本

张利军

2013年对于日本而言，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经济，乃至对外关系，较之从前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首先，就政治层面来说，2012年12月16日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在480个议席中取得过半数的294席，加上盟友公明党的31席，议席总数达到325席，超过三分之二，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再度成为日本首相。2013年7月22日，日本参议院选举投票揭晓，自民党大获全胜，这使得安倍巩固了长期执政的基础。其次，从经济角度来看，2013年10月1日，安倍宣布从2014年起将消费税从5%提高到8%，以保证资金来源，支持日本公共财政。另一方面，安倍新内阁自2012年底组阁以来，加速推出以“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货币政策、有力的经济增长战略”为三大支柱的“安倍经济学”。这个名词迅速窜红，引起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普遍批评。最后，从对外关系来看，201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5周年，中日两国政府都没有举办纪念仪式。由2012年9月日方“钓鱼岛国有化”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使得中日关系持续恶化，陷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同时，12月26日，安倍在执政一周年之际参拜靖国神社，再一次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日关系可谓“政冷经凉”。本年度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在此背景下开展的。

一、学术出版

1. 学术成果

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关于书籍及论文相关检索得到的数据为基准，其中分别以“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作为关键词检索有关著作和论文，可以发现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比较有生命力，且具有鲜明的特色：

(1) 作为一个东方国家，正如往年的报告中所提到的，日本参与 MEGA2 的编辑虽然具有偶然性，但是事实证明日本学者的水平丝毫不亚于欧美国家，从最初尝试性编辑第一卷，到如今参与了其中七卷的编辑工作，这足以说明国际 MEGA2 编委会对日本学者编辑成果的满意和认可。而且，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参与 MEGA2 的编辑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例如，大村泉的《已版新 MEGA 的出处、索引、关联文献的数字化》(1995)、《新 MEGA 与〈资本论〉的形成》(1998)、早坂启造的《〈资本论〉第二卷的撰写与新 MEGA》(2004) 等著作，以及《〈资本论〉第 2 卷历史考证版的意义——恩格斯的编辑稿与 MEGA2 第二部分第 12、13 卷》、《新 MEGA 的问题及意义》、《新 MEGA 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广松涉的根本问题》、《新 MEGA 第四部分第 19 卷及其编辑》、《新 MEGA 第二部分第 14 卷到 15 卷》、《新 MEGA 的数字化》等共约 70 余篇论文，刊载了日本学者在 MEGA2 编辑中的研究成果。

(2) 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队伍和成果数量比较稳定，在本年度也没有较大的变化。无论是专著的数量和论文的数量，变化幅度不大，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每年大约为 50 部左右，论文数量每年约为数百篇，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团体所公布的会员人数来看，无论是经济理论学会会员，还是全国唯物论研究协会、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等相关学术团体的人数并无明显变化。

2. 主要杂志

(1) 作为日本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杂志，《前卫》在宣传日本共产党的理念、方针和政策的同时，也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本年度的“特集”栏目下刊载论文 143 篇、“论点”栏目 21 篇、“生活聚焦”12 篇、“文化专题”36 篇、“媒体时评”24 篇、“新书架”11 篇和“读书”4 篇。其中特集的主要关注点如下：“改革自民党式的政治与日本共产党的跃进”、“节能型社会的转折”、“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与安倍政府的弱点”、“创

造条件、采取对策，与国民一起阻止安倍政府的失控”、“自民党放弃专守防卫，图谋海外行驶武力”、“美军基地的强化”、“发挥日本共产党的国民作用，迈向参议院和东京都议会选举的胜利”、“第二届安倍政府与政治和政党的现状”、“与安倍政府正面对决”等。从这些主题中可以发现，《前卫》的主要关注点是日本共产党的政策和政治主张，包括对日本政治运行的看法、社会保障、教育、少子化、高龄化、对日本外交的政策主张等，而且与选举密切相关。作者多为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两院议员及党所属的党员等。该杂志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主要是刊登了不破哲三先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相关讲座内容。

(2) 作为日本共产党主办的另一重要理论刊物，《经济》与《前卫》浓厚的政党政策性倾向不同，该杂志的学术性色彩更强，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刊载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本年度“特集”栏目下刊载论文154篇、“世界与日本”栏目25篇、“书评”31篇、“新刊介绍”60篇、“随想”10篇、“心窗”12篇、“读者来信”7篇和“专栏”6篇。从关注主题来看，主要有“安倍经济学批判”、“安倍经济学的失控与破绽”、“破坏社会保障的安倍经济学”、“亚洲与日本”、“世界经济动向”、“质问育儿保护政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建言”等。^①其中有三期的主题都是与“安倍经济学”相关，可见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其关注程度。

(3) 《社会主义》是日本左翼力量发表观点和评判时局的重要平台之一，主要的撰稿人仍然是来自与社民党关系密切的各工会领导人、学者、社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员或其支持者。2013年度主要关注点如下：“核电站与工人”、“安倍政府一年回顾”、“安倍经济学与TPP”、“经济增长战略与工人”、“2013年春季罢工斗争与问题”、“参议院选举的争论点与政策问题”、“质问安倍经济学与政治”、“2013年如何进行春季罢工斗争”等。^②从这些主题可以看出，该杂志主要关注日本的工人运动，尤其是罢工斗争。

(4) 《经济理论》与《经济科学通讯》

作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最大的学会，经济理论学会的机关志《经济理论》(季刊)，本年度出版的4期主题分别为“欧洲资本主义模式的未来”、“大地震灾害、核电站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美国资本主义在世界史中的位置：

^① 参照『经济』(2013年1—12期)，新日本出版社。

^② 参照『社会主义』(2013年1—12期)，社会主义协会。

后冷战时代 20 年回溯”、“和谐社会的诸形态”，共刊载论文 27 篇、书评 25 篇、书评回复 8 篇和 3 篇研究报告。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的机关志《经济科学通讯》（季刊）在本年度关注的主题有“福利国家与马克思主义”、“从福岛核危机看人类的安全、发达后的保障与合作”、“福利国家·劳动·性别平等”、“雇佣劳动的流动化”等。^①

同样作为一个东方国家，我们一直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人数规模表示敬佩，对在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有这样一支队伍表示赞许。究其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仅仅从上面马克思主义杂志所关注的主题不难发现，日本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国，主要原因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关注的工人运动、社会贫富差距、就业、性别平等、环境问题、工人薪金、福利、教育、低保等均是广大普通国民所关注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解读和对策建议则会引起社会关注和共鸣，进而推动政府不断去完善相关政策。正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这种关注，尤其是对弱势群体和社会不公平的关注，增加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生命力。

二、关注焦点

从上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本年度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关注焦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参与 MEGA² 编辑及其相关研究

本年度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参与 MEGA² 的编辑和研究情况，可以从法政大学名誉教授大谷禎之介和一桥大学教授平子友长编著的《从马克思手稿的精华部分读马克思——MEGA² 第四部分的编辑与所收录的手稿研究》一书中略知一二。正如往年的报告中所提到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参与编辑的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²）共有 7 卷。其中，第二部分的第 11 卷（《资本论》部分手稿）已经于 2008 年编辑完成并出版。此前，MEGA² 第二部分第 12 卷 2005 年秋出版，第 13 卷 2008 年 9 月出版。以大谷禎之介教授为首的日本学者又承担了第四部分的第 14、17、18、19 卷的编辑工作，其中第 17、18 两卷

^① 参照『経済理論』（2013 年 1—4 号），経済理論学会編；『経済科学通信』（第 131—134 号），基礎経済科学研究所編。

被置于第四部分的优先编辑位置。该书主要分析的是第四部分的整体编辑情况，尤其是第 18 卷的相关情况。

本书由六部分 12 章以及两个附录构成，第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MEGA² 第四部分的意义及所收录的各卷次编辑进展”、第二部分为“从手稿与草稿看马克思对知识的深入探究”、第三部分为“从手稿看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第四部分为“从手稿看马克思对历史的研究”、第五部分为“从手稿看马克思对自然的研究”和第六部分为“从手稿看马克思对日本的分析”，两个附录分别是 MEGA² 第四部分各卷收录的马克思的手稿和 MEGA² 第四部分第 18 卷的目录。^①来自立教大学的副教授佐佐木隆治、北海学园大学教授森下隆美、大东文化大学教授竹永进、札幌学院大学副教授浅川雅巳、千叶商科大学名誉教授天野光则、原国际马克思恩格斯财团 (IMES) 秘书长、阿姆斯特丹社会史国际研究所研究员约根·罗扬 (Jürgen Rojahn)、国际 MEGA² 编委会委员施帕尔 (Dr. Richard Sperl 等参与了撰写。从这些标题可以看出，本书主要向读者展示了 MEGA² 第四部分在整体中的意义、所收录各卷的编辑情况以及马克思本人关于经济学、自然、历史和日本研究的概况和意义。该书着重介绍了第四部分第 18 卷的编辑情况，该卷主要收录了马克思在 1864 年 2 月到 1870 年 6 月期间的手稿。当时马克思一边担任第一国际的领导工作，一边完成了《资本论》全三卷草稿的撰写，并出版了第一卷。马克思为撰写第二、三卷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农业、化学、地质学、矿物学等，马克思关于这些资料的大量笔记在本书中均有介绍。本书还发现，传统观点认为马克思在论及日本时，其依据是英国第一任驻日本公使阿兰库克 (Alcock) 的《大君之都》(1863 年在伦敦出版，为作者在 1859 年至 1862 年在日本的见闻录，涉及日本的自然、地理、语言、宗教、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生活习惯和美术工艺等内容) 一书。而事实上马克思在提到日本的时候所依据的资料还有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男爵 (Justus Freiherr von Liebig, 1803—1873, 德国近代化学家) 所著的《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第七版。此外，1850 年跟随以奥伊伦堡伯爵 (Friedrich Albrecht Graf Eulenburg) 为团长的普鲁士使日团到访日本的马洛博士 (近代德国农业专家) 的《日本农业报告》(Annalen der

①『マルクス抜粋ノートからマルクスを読む：MEGA 第 4 部門の編集と所収ノートの研究』，大谷禎之介、平子友長編，桜井書店，2013 年 10 月。

Preuss. Landwirtschaft, Jan. 1862)。

本年度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马克思手稿方面的研究，还有关东学院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渡边宪政先生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电子版与广松涉版的对比研究。渡边宪政教授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所著《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电子版，为了重现原文的写作过程，将写作时的举例和改稿过程中进行的修正、增删加以区别，将底稿（左栏）的写作过程和修改稿（左右两栏）的写作过程分成两个部分。以草稿各页的左栏和右栏的标记为准进行区分（左栏黑色，右栏蓝色），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迹也能够根据字体辨别（马克思是 Arial 字体，恩格斯是 Times New Roman 字体）。《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电子版由底稿（左栏）、恩格斯的改订稿和马克思的改订稿三部分（layer）构成，各部分中左栏和右栏的文件均附有行数标识。最后，将各部分放在一个文件显示，这意味着同一张页面上，都有与照片版所显示的原文本同样的内容，以同时呈现三种手稿的方式将当时的写作过程基本如实再现出来。

通过该电子版，作者进一步指出，迄今为止广为人知的广松版的文本，不仅没有充分利用过去发行的 MEGA Proband[1972] 的解读，而且还和原文本大相径庭。特别是马克思所参与进行的理论、编集方面的工作，仅从以上所展示的页面来看，就可以知道涉及数量巨大，但广松版未能让人看到这一工作过程。以今天的视角来看，不得不说，广松版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来说是有所欠缺的。

2.“安倍经济学”

2012 年 12 月 26 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再次组阁，出任日本第 96 任首相。新一届安倍政府面临的最大执政问题是走出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状态。自从 1989 年日本经济泡沫危机发生以来，日本国内关于经济低迷先后有“失去的 10 年”、“失去的 20 年”等说法。经济泡沫危机发生后，历届政府都将恢复经济发展作为执政的核心问题，但是均未取得较大进展。安倍晋三重新执政后，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欧美许多国家普遍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下，采取了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内容包括：（1）大幅度放松金融管制，修改《日本银行法》，修正了有关条文，要求日本中央银行大幅发行货币，以每年 60 万—70 万亿日元的速度增加基础货币，直至实现 2% 的通胀目标，促进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实行大幅度日元贬值政策，促进日本对外出口，拉动国内经济增长。（2）灵活的财政政策，扩大公共投资。2013 年度

内阁的扩大公共投资预算为 20 万亿日元，主要是针对 2011 年日本大地震后震区的重建以及防止类似灾害发生的建设、老化公路的修复、学校的抗震建设等。(3) 实行结构改革，确立强有力的经济增长战略。

对于安倍内阁的经济刺激政策，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左翼政党普遍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这种经济政策具有不可持续性，其扩大公共投资的同时削减了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领域的支出，这种经济刺激政策的实质是为了保护大资本家、大财阀的利益。例如，日本首都大学东京经营学系名誉教授、日本 MEGA2 编委会委员宫川彰先生指出，从作为安倍经济学三支利刃之一的扩大公共投资的支出领域来看，2013 年度的补充预算中主要是公共事业费增加 15.6%、灾后重建费增加 16.1%、军费增加 0.8%，同时增加了核电站的出口补贴。但是，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诸如生活救助方面和医疗救助方面减少 671 亿日元、公务员工资降低 7.8%、教育支出减少 0.8%。宫川彰教授进一步指出，安倍政府 2% 的通胀目标使物价增长，普通国民的收入并没有增加，而安倍内阁却声称，只要经济增长了，出口增加了，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杠杆将经济增长的利益惠及全体国民。但实际上，自民党的代表是大企业、大财团、大资本家利益阶层，这些大资本家向自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政治捐款。因此，安倍经济学并不是特别的经济政策，仍是“二战”结束以来自民党维护大资本家政策的延续。

日本共产党所主办的杂志《经济》在本年度中有三期的主题都与批判“安倍经济学”有关，分别是第 7 期“安倍经济学批判”、第 8 期“安倍经济学的失控与破绽”、第 11 期“破坏社会保障的安倍经济学”。社民党所属的社会主义协会主办的《社会主义》杂志在本年度共有两期的主题是安倍经济学，分别是第 4 期和第 8 期，主题为“质问安倍经济学及其政治”、“安倍经济学与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之思考”。左翼政党反对安倍经济学的主要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一致，认为安倍经济学的目的是扩大日本大型制造业的出口，主要对大企业和大财团有利；而其主张的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是左翼政党反对的重点之一，他们认为安倍经济学是在牺牲普通国民的利益并导致社会财富的更加不均匀，继而引起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世界范围来看，就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研究而言，日本对中国研究的历史之悠久、范围之广泛、内容之深刻、成果之丰硕或许是绝无仅有的。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日经济交流的日益密切，尤其是 20 世纪苏东剧变后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日本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日益升温，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关注热点。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性质问题一直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持续不断的讨论主题。本年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出版了三部专著，分别是神戸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加藤弘之所著的《暧昧的制度：中国式资本主义》、日本拓殖大学校长渡边利夫和大桥英夫合著的《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市场还是政府？》、加藤弘之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员渡边真理子和日本专修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大桥英夫三人合著的《21 世纪的中国经济篇：国家资本主义的光与影》。

从上述著作的题目来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识基本反映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的普遍认识，而且这种认识受到了日本国内关于中国的“威权发展主义体制”认识的影响。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虽然仍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角度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多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中国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不再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而走向资本主义，其主要观点包括“国家资本主义”、“新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等。上述三部著作都是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展开论述的。

加藤弘之教授在《暧昧的制度：中国式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金融危机以来，在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低迷，而新兴国家经济发展较快的背景下，中国的 GDP 跃居世界第二位；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的国有经济发展较快而民营经济却动力不足。在“国进民退”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体系并没有妨碍经济的持续增长，一时“中国模式”流行起来。究竟能否将中国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模式来效仿，还是资本主义又出现了新的发展模式？作者在提出这样的疑问后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认为有三方面的特征：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以财政和金融政策为杠杆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统一国内市场的确立，这与欧美的资本主义并无差异，可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另一形态。作者将中国资本主义的特征总结为四点：（1）没有规则的激烈的竞争。在各种领域，中国存在比自由资本主义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各种经济形态和经济主体在缺乏严格规制的环境中展开激烈竞争。（2）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混合经济体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要比欧美国家高很多。不仅国有企业，而且对经济的整体运行，政府的管制也比较多。（3）存在竞争关系的地方

政府和官僚。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竞争关系，而竞争主体就是地方官僚，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的官员晋升的机会往往比较多。为了得到较快的晋升，地方官僚比较积极推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4)党的官僚和领导层日益集团化。地方政府和官员为了本地区经济发展和得到晋升，往往形成各种利益诱导，容易带来腐败和渎职。加藤弘之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建立在中国广阔的领土和规模巨大的人口基础之上，并且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独特体制，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照搬。^①

渡边利夫和大桥英夫在《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市场还是政府?》一书中指出，虽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但依然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这是由被称为“中国模式”的独特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所决定的，即依靠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等公共部门的经济发展体制。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腐败蔓延、群体性抗议运动不断发展，这都将影响到被称为“中国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能否持续，更不用谈是否被发展中国家复制。^②

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田中修引用英国《经济人》杂志在2012年7月21日的文章指出，中国、俄罗斯和巴西是当今世界上国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与传统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从规模、发展速度和资本运营手法方面均与传统资本主义有较大差别。他认为，中国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是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修正而已。^③

三、学术活动

1. 经济理论学会第61届年会

经济理论学会作为日本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和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学术组织，其年度学术大会一般在秋季举行。2013年10月5、6日，学会在日本专修大学（生田校区）召开了第61届年会，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如何看待世界经济的地壳变动”。

2012年的学会干事会议对本届年会的主题做了如下解释：“2008年金融危

① 『「曖昧な制度」としての中国型資本主義』，加藤弘之著，NTT出版，2013年9月。

② 『ステート・キャピタリズムとしての中国：市場か政府か』，渡辺利夫著，21世紀政策研究所／監修，大橋英夫／編，勁草書房，2013年7月。

③ 田中修，「中国：国家資本主義という仮説」，『ファイナンス』，2013年7月。

机爆发后，欧美的金融业受到沉重打击，各国纷纷向银行注入公共资本，为阻止经济萎缩而扩大财政支出，财政赤字引发政治斗争，日本作为发达国家的一员，中央银行也放松了管制。与此相对，金砖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却在金融危机后保持了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成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引擎，但是2012年底以来，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放慢了。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中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61，这也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可见，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并非平稳，因此，如何看待今后的经济发展，成为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本届年会共设20个专场讨论会和一个大会主会场。大会第一天举行了13个专场的讨论，其中第一个专场与大会主题讨论有关，专场主题为“21世纪前半期的世界展望与资本主义”。立正大学的五味久寿和田中裕之、信州大学的吉村信之分别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转折与世界的构成”、“当代制造业与21世纪前半期的展望——从大量生产体系到全球网络体系的转变”、“21世纪的资本主义原理问题”。此外，其他13个专场的主题分别是“日本大地震与灾后重建”、“劳动价值论与服务论”、“经济增长论”、“劳动、消费和孩子”、“区域通货的可行性”、“世界经济危机及之后的世界”、“当代资本主义的动向”、“福利国家”。按照惯例，本次年会仍设置了英文专场，为在日本工作和学习的英文背景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提供方便，共有三场，第一天举行了两场，主题分别是“中国和印度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未来”和“世界经济危机”。

大会第二天举行的专场讨论有“东亚地区经济”、“再生产、积累和危机”、“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和方法”、“生产体系与金融体系”、“企业和公司治理”等，英文专场的主题为“劳动与资本”。下午，年会举行了主题报告讨论会，来自日本鹿儿岛国际大学的八尾信光、信州大学岩崎彻也和国土馆大学的平川均分别做了“从长期经济统计看21世纪的世界经济”、“石油与汽车产业结构的经济衰退”、“世界经济结构的转折与新兴经济”。^①

与往年的年会相比，从会议的形式和主题的广泛性方面来看，与以往相差无几，但仍具有以下两方面特点：(1)会议的专场数量有所缩小，做研究报告的人数有所增加。2011年的年会设立了21个专场，2012年设立了22个专场，本年度设立了20个专场讨论会，有所减少，但变化并不很大。从做研究报告

① 经济理论学会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jspe.gr.jp>，2014年11月20日访问。

的人数上来看，上一年度为 51 人，而本年度为 54 人，人数有所增加。(2) 从参加者的身份来看，日本学者的变化不大，多来自日本全国各大学，这些来源地没有呈现明显的地域特征，但从英文专场的参加者来看，本年度的外国学者有所减少。有来自爱沙尼亚、巴西、中国、尼日利亚、印度、美国、韩国和葡萄牙共 11 名在日本工作的外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与会并发言，与上一届的 17 人有所减少，约占发言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2. 全国唯物论研究协会第 36 届年会

2013 年 10 月 19、20 日，日本全国唯物论研究协会第 36 届年会在岐阜大学柳户校区举行。来自立教大学、日本福祉大学、一桥大学、中京大学、名古屋艺术大学、关东学院大学、北九州市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京都大学、立命馆大学、东京大学、法政大学、名古屋大学、北海学园大学、大阪学院大学等 19 所大学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本届年会与往届相同，会议第一天上午进行的是北欧分会、性别分会和环境分会的分组讨论。“关于环境哲学的一个尝试——以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为媒介”、“北欧福利社会中的文化与哲学的作用——以挪威为例”等研究报告受到了较多的关注。下午召开了全体大会，主题为“动摇社会的基础——从运动与思想的现状看”。来自一桥大学的特别研究员蓑轮明子和关东学院大学的渡边宪正分别做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家族、女性的现状与女性女权主义的问题”、“自由民权论的思想结构——动摇社会的基础”的研究报告。第二天上午为自由发言时间，没有设置主题。下午设置了三个专场，主题分别是“媒体的社会责任”、“二战后日本社会与朝鲜”和“二战后日本的民众与思想”。^①除了会议的主题和地点区别外，无论从会议的形式，还是从会议的规模来看，本届年会与往届均没有较大区别。

3. 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第 36 届年会

2013 年 9 月 14、15 日，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第 36 届年会在京都府立大学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有两个，分别是“基本收入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福利国家·劳动·性别平等”，本届年会共分 8 个专场讨论会和两个共同讨论会。会议第一天进行了四场专场讨论会，主题分别是“基本收入与家庭”、“亚

^① 参见日本全国唯物论研究协会主页：<http://www.zenkokuyuiken.jp/>，2014 年 11 月 20 日访问。

当·斯密与当代”、“参议院选举后与变化的亚洲”，会议主办方设置了一个自由讨论会场，并未确定主题。大会第一天还举行了第一个主题的共同讨论会，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伊藤诚先生做了题为“基本收入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题演讲，立命馆大学的森田真史先生和松尾匡教授分别做了“基本收入的功能与规范”、“基本收入在现代经济学中的位置”的演讲。

会议第二天上午举行了四个专场的讨论，主要的关注点是“工会运动存在的问题”、“灾害问题与复兴过程”、“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的机关杂志《经济科学通讯》的发展”等。来自日本相关的工会组织领导人参加了会议，例如，京都“总评”副议长马场隆雄担任会议的主持人，而来自日本“全劳联”的组织局局长斋藤宽生做了“全劳联组织扩大和强化的现状及问题”的报告，京都建筑业工会的书记次长村濑宏典做了“建设产业的民主化与京都建筑业工会的新问题”的报告。下午，大会举行了本届年会的第二场共同讨论会，即“福利国家·劳动·性别平等”，来自日本“自治劳联”的原中央副委员长川西玲子做了“公共劳动部门的非正规化与性别平等”、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所长原伸子做了“福利国家的变迁与家族政策的主流化：以性别平等为视角”、京都府立大学的中岛正雄做了“以男女平等为目的的《劳动法》所面临的问题”的主题演讲。^①

从本届年会的相关研究报告来看，普遍非常重视日本的工会运动。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邀请了日本全国范围的工会“总评”和“自治劳联”的相关负责人与会，另外，还有来自京都的地方工会的负责人与参会人员交流了日本工会运动所面临的问题，可见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对日本工会运动的重视。

除了这些主要由大学、学会和科研机构学者组织的学术活动外，日本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大众化和普及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共产党长期坚持不懈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与传播，机关报《赤旗》是日本各政党中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足见其对日本共产党的政策宣传和科学社会主义传播方面发挥的作用。除了上述机关杂志《前卫》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杂志《经济》外，日本共产党主办的《女性广场》、《学习月刊》、《议会与自治体》等在本年

^① 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主页：<http://kisoken.org/wordpress00/?cat=3>，2014年11月12日访问。

度依然发挥着各自的宣传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共产党还举办了各种学习组织，向普通工人和一般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其中《资本论》学习会较有代表性，分布于日本各都道府县，这其中尤其以东京《资本论》学习会成就最大。该学习会从1967年开始讲授以《资本论》为中心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至今已47年，先后有7000余人参加了学习，而且东京《资本论》学习会还成为日本全国各地《资本论》学习会的佼佼者，为其他各地的《资本论》学习会培养了很多人才。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附属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是日共的理论研究机构，其学术研究不容忽视。现任所长为原日共书记、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委员会会议长不破哲三先生，是日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旗手。本年度不破哲三先生共出版了三部专著，分别是《古典教室第1卷：〈工资、价格和利润〉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古典教室第2卷：〈从空想到科学〉》、《古典教室第3卷：〈法兰西阶级斗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理论史》，三部著作仍由新日本出版社出版。书中的内容是，不破哲三先生近几年以《前卫》为平台，以讲座为形式的研究。同时，不破哲三先生在本年度还以“斯大林秘史”为题，在《前卫》2013年第2—12期连载发表对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社会变化、对外关系以及共产国际的相关研究。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

拉丁美洲

袁东振

本报告主要介绍 2013-2014 年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动态，着重分析拉美“21 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动向，重点介绍阿尔瓦罗·加西亚·利内拉（Álvaro García Linera）及其社会主义思想。

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动态

从总体上看，2013—2014 年度拉美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延续了以往的基本特点：关注拉美及世界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重点，重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该地区左翼和进步社会运动的声援。然而，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对该地区的影响不断显现的背景下，拉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又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即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们的思想在拉美地区重新受到广泛重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世界的解释能力、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有效性，以及社会变革的主张，使其成为各种学术、社会和政治讨论的重要议题。2013-2014 年，拉美地区主要国家陆续召开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讨会，本节将对这些研讨活动做简要介绍。

一、哥伦比亚“第 8 届马克思依然还活着国际研讨会”

2014 年 5 月 14-16 日，“第 8 届马克思依然还活着国际研讨会”在哥伦比

亚国立大学召开。该国际研讨会迄今已举办 8 届，成为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学术论坛。除哥伦比亚本国学者外，每次会议都有来自拉美其他国家的学者、研究人员、伦理学家、政治家参加。每次会议都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对最新理论和政治发展的研讨作为重要内容，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出发对世界、地区和拉美国家的政治变动、发展进程进行研究探讨和解释。

2014 年的第 8 届研讨会来自哥伦比亚、玻利维亚、阿根廷、古巴、巴西和墨西哥的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参会。会议共有九个单元，第一单元是“帝国的地缘政治、人民政府和制宪进程”，主要内容涉及拉美地区地缘政治的构建、帝国主义的控制和人民的选择、关于拉美发展道路的争论、进步的人民政府兴衰的结构性根源，替代资本主义的制宪进程等。第二单元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民主和社会主义”，主要内容包括：人权、民主和社会主义、贡塞德对马克思主义现状的解释^①、建设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第三单元是“新自由主义与社会生活的商品化”。第四单元是“拉美的制宪权力与民主问题”，主要讨论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等左翼执政国家的制宪改革、委内瑞拉的 21 世纪社会主义与制宪权力问题、拉美的游击队组织与社会运动的关联性等。第五单元是“农业资本主义生产与社会冲突”，主要内容有资本主义积累的空间、农业经济与农业产业之间的矛盾问题、社会冲突背景下土地制度的变化、土地争端与社区发展的形式。第六单元是“民族国家、新自由主义和一体化的争论”。第七单元是“社会运动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第八单元是“拉美国家的宪法改革问题”。第九单元是“政治、革命和人民政权建设问题”，主要内容有资本主义危机与人民政权建设、妇女在历史和革命中的作用、复兴列宁主义的主要动向等。

二、智利的“第 3 届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论坛

2014 年 10 月 16-17 日，“第 3 届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论坛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该论坛初始于 2011 年，当时只是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此后论坛的影响力不断扩大。2012 年论坛的主办方扩大到智利大学等 9 家知名学术机构和智库，除了智利本土学者外，还有秘鲁、巴西、墨西哥、加拿大、委内瑞拉等国的学者和政治家参会。论坛的目的是思考和探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拉美当前背景下以及在应对资本主义危机方面的有效性。该论坛的举办增强了智利在拉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地位和学术影响力。“第 3 届 21 世纪的马

^① 贡塞德 (Daniel Bensaid, 1946-2010) 是法国哲学家，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袖。

克思主义”论坛由智利大学、Arcis 大学等主办，除了学者外，还有工会组织领导人与会。论坛的主要议题有四个，分别是：纪念“第一国际”暨历史的联系与现实的挑战，国家、政权与民主，对发展、危机和资本问题的探讨，社会主义与解放。

三、阿根廷“批评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论坛”

阿根廷一直是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阵地，其中“批评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论坛”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品牌。该国际论坛自 2003 年以来至今已连续举办七届，论坛的最初目的是为 20 世纪知识界几次最重要的争论提供一个再度思考的机会；从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美学、人类学等各种视角，为进一步探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的各种问题提供了一个平台；对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特性进行反思，推动建立拥有人的尊严的社会秩序。目前该论坛已经成为阿根廷和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学术活动。2013 年 10 月和 2014 年 8 月，第 6 届和第 7 届“批评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论坛”相继举办。

2013 年 10 月 10-12 日，第 6 届“论坛”在罗萨里奥大学召开，主题是“批评理论的现实”，共 6 个单元。第一单元是“艺术与文化批评”，主要内容有：马里奥·佩德罗萨 (Mário Pedrosa) 的抽象艺术论^①，认识论、美学与教育：本雅明对教育的贡献，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重新认识弗洛伊德对阿多诺的影响，弗洛姆的社会性格论^②，马尔库塞关于技术和解放的思想。第二单元是“经济与批评理论”，内容有资本的结构危机与后现代非理性主义、互联网的个性化与文化产业的重新定义、曼德尔 (Ernest Mandel) 对经济危机和非人化的阐释^③、增长不足是人类和道德的后果等。第三单元是“性别、批评理论和解放”，主要问题涉及性别与革命：新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的新难题、墨西哥的女性移民和劳动等。第四单元是“政治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内容涉及本雅明对现代性的贡献，本雅明思想的神学维度，人民权力与革命主体的构建，福

① 佩德罗萨 (1900—1981)，巴西文学艺术评论家，政治家，巴西“现代艺术学派”的开创者。

② 弗洛姆 (1900—1980)，德国心理和精神分析专家，社会学家，人类哲学家，社会民主党人，与“法兰克福学派”联系密切。

③ 曼德尔 (1923—1995)，荷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柯治理性理论及对政府主权模式的批判^①，现实暴力中的批评思想，主体性与政治，国家、民主与反抗：对2013年巴西社会抗议活动的反思、马克思与梅扎罗斯(István Mészáros)关于国家、资本与人类解放的思想^②、对青年马克思关于政治解放思想中局限性的反思、历史与本雅明思想中的社会转型、对权利哲学批判中的哲学、历史和政治问题等。第五单元是“精神分析与批评理论”，内容有：霍克海默与心理学在对人类行为进行历史解释过程中的作用^③、批评理论中的心理分析和社会化的概念、资本主义话语权理论、弗洛姆关于社会性格作用的思想、马尔库塞著作中技术和解放的思想。第六单元是“批评理论、评估与总结”，涉及统治形式的非理性问题、本雅明的《现实性》、阿甘本、迪迪·休伯曼(Georges Didi-Huberman)与时间性问题^④、知识与劳动、批评理论最近发展中的内部矛盾、从启蒙辩证法到否定辩证法：阿多诺思想的蜕变等。

除上述6个单元外，还有三个中心单元(Paneles Centrales)：“心理分析中的冲突概念”、“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面向后殖民时代的女性主义”。

2014年8月4-6日，第7届“论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召开，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暴力”，由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罗萨里奥大学、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大学等主办。论坛的议题有10个：对暴力的批评与理论反思、暴力与阶级斗争、经济暴力问题、心理学、心理分析与暴力、性别暴力问题、环境暴力、文学与艺术中的暴力、教育与暴力、媒体的暴力与媒体中的暴力、劳动世界的暴力问题。

四、墨西哥“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著作全国论坛”和“卡尔·马克思自由讲坛”

墨西哥是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阵地之一。2013-2014年的主要活动包括：1.“面向21世纪马克思的著作全国论坛”召开。该论坛2006年

① 福柯(1926-1984)是法国哲学家、思想史专家、社会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学家，他的理论强调权力和知识间的关系，以及在社会体制中它们是如何被应用的问题，被称为是“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

② 梅萨罗什(1930-)是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去意大利土伦工作，后定居英国，曾在约克大学和苏塞克斯大学任教，与“布达佩斯学派”联系密切。

③ 霍克海默尔(1895-1973)是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④ 阿甘本(1942-)是意大利哲学家，休伯曼(1953-)是法国哲学家和艺术史学家。

由墨西哥格雷罗自治大学创办，至今已召开5届。2013年4月24-26日，第5届论坛召开。但关于此次论坛具体情况的公开信息较少。2.“卡尔·马克思自由讲坛”举办。2014年3月开始，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哲学语言系和政治学系同时举办“卡尔·马克思自由讲坛”，讲坛主题是“拉美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争论与21世纪的现实”，共分五个部分，各部分的议题如下：列宁与托洛茨基：殖民主义、反帝主义与民族解放斗争 - 从第三国际的议题到拉丁美洲的著作；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印第安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 关于后自由主义政府和进步政府的争论；雷维尔塔斯（José Revueltas）：一篇关于没有领导的无产阶级的论文——墨西哥1910年革命和革命政府^①；拉美马克思主义人物以及其遗产的现实影响。

五、巴西“2013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国际论坛”召开

“2013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国际论坛”于当年9月30日-10月4日举行，主办方是巴西弗鲁米嫩塞（Fluminense）联邦大学^②，除巴西学者外，有来自阿根廷、英国、加拿大、法国以及美国的学者与会。此次国际论坛的主题是“130年之后的马克思”，对1883年马克思逝世以来130年间马克思遗产的影响进行分析和研讨。议题包括以下10个方面：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构建、马克思与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思想的历史性特征、马克思和人力资源培训、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与文化思想、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与国家、马克思与

① 马利亚特吉（1894-1930）是秘鲁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秘鲁共产党创始人，拉美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雷维尔塔斯（1914-1976）是墨西哥作家、政治活动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② 2003年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建立了跨学科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NIEP），中心成员主要是从事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社会服务和建筑等领域的教师和研究人員。建立中心的目的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跨学科的视角，进行理论、文化和政治研究工作。中心研究的范围既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也包括20世纪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主要思想家，特别是葛兰西、卢卡奇和汤普森（Thompson）等人的著作和思想。定期举办研讨会是中心的重要活动，起初研讨活动仅限于巴西学界，2011年以后范围不断扩展，发展成重要的国际性会议。2011年首次以论坛形式举办，主题是“理论与实践”，来自全国各地280名学者与会，举办了54场圆桌会议，提交论文190篇。2012年论坛的主题是“历史主体和社会阶层”。2013年的论坛是首次国际性论坛。

社会转型、马克思主义和拉丁美洲、马克思关于自然的概念。

六、委内瑞拉“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工人阶级斗争与革命入门”系列讲座和讨论会

从2013年10月30日至2014年2月，委内瑞拉举办题为“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工人阶级斗争与革命入门”的系列讲座和讨论会。负责人是玻利瓦尔大学的萨瑟兰（Manuel Sutherland）教授。该系列活动由委内瑞拉文化部通过Celarg基金会、工人培训与研究中心（CIFO）、拉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会（ALEM）举办，是具有官方背景的活动。讲座和研讨会共分13个单元，每周三下午4-6点进行，对参加80%以上活动者颁发证书。活动的目的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意识。活动的举办者认为，培养工人阶级的意识非常重要，“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历史的废墟上建设的，需要工人阶级科学地理解世界政治经济的运行，要认识到自己是历史的主体，是剥削的受害人。在承认自己是历史主体的目标内，必须开展反对经济和政治异化的斗争，这决定着民众部门历史目标的实现程度”^①。

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动向

委内瑞拉是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大本营，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则是拉美社会主义的主要旗手。2013年查韦斯病逝，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损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拉美社会主义的其他倡导者们注重将社会主义理念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主张，并以不同方式继续推进拉美社会主义的实践。

一、“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难度有所加大

查韦斯病逝加大了“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不确定性。2013年3月查韦斯总统病逝，委内瑞拉进入“后查韦斯时代”。查韦斯是“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主要旗手，是委内瑞拉现行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缔造者和推动者。他在1999年就任总统后，彻底否定新自由主义，谋求建立替代发展模式，推动和实施激进的政治经济变革，力图走上一条独立的发展道路，解决根深蒂固的

^① En Fundación Celarg desde el miércoles 30 de octubre de 2013 Abordarán en seminario la “Historia del socialismo científico”, <http://www.celarg.org.ve/Espanol/seminario>.

贫困问题和摆脱对外部的依附。“拉美 21 世纪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主要特点是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面干预，强调国家干预对于实现财富公平分配的根本作用。因此，委内瑞拉政府严格控制了国家石油公司（PDVSA）和石油业，实施大规模国有化，实行严厉价格和外汇管制，自由支配大笔预算外资金。查韦斯去世无疑加大了委内瑞拉和拉美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践的不确定性。

“拉美 21 世纪社会主义”实践遇到新难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 社会不满情绪加大。2014 年 2 月以后，委内瑞拉爆发近年来最大规模社会抗议活动，抗议活动持续两个多月，造成 40 多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加剧了社会和政局动荡，增加了未来出现政治动荡和政策多变的风险。2. 经济和社会形势持续恶化。2013 年以来，由于国际油价回落和世界经济不景气，致使委内瑞拉经济增长低迷，2013 年仅增长 1.2%，远低于 6% 的预期目标，也低于拉美平均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 年委经济增长将陷入负增长。在经济增长率急剧下滑的同时，通货膨胀和生活用品供应不足问题日益严重。2013 年通货膨胀率达到 56%，居拉美国家之首；2014 年将进一步攀升，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供应极度短缺。与此同时，委内瑞拉社会治安状况进一步恶化，谋杀和绑架犯罪率均创历史最高纪录，政府难以遏制日益严重的暴力和犯罪现象，各社会阶层缺乏安全感。3. 执政党执政难度增加。早在查韦斯执政期间，委内瑞拉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弊端就已经显现，产业结构单一，生产性投资不足，财政赤字持续攀升，持续国有化政策造成企业生产率普遍偏低，国内食品和生活用品供应紧张，公共开支多集中于庞大的福利计划，经济的结构性风险极高。查韦斯的接班人尼古拉斯·马杜罗执政后，政府被迫出台一系列调控措施，例如宣布本币贬值、放松外汇管制、提高职工工资标准等，以期缓解高通胀的影响，进而平抑民怨。然而这些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部分民众对马杜罗政府执政能力产生不满和怀疑。

“拉美 21 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受到的掣肘增多。长期以来，查韦斯政府推行的国有化、土地改革、建立合作社和社区委员会、国家干预经济、21 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瓦尔美洲联盟、加勒比石油计划等一系列内外政策措施在国内引起较大争议，遭到中上层利益集团、传统政党、天主教会等保守势力的批评和反对。查韦斯逝世后，反对派与政府的对抗进一步加重，双方的分歧短期内难以消除，这势必加大 21 世纪社会主义实施的难度。

二、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尽管委内瑞拉国内形势趋于严峻，但马杜罗政府依然继续积极推进21世纪社会主义的进程。

首先，重申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2013年4月马杜罗作为查韦斯的接班人执政后，反复强调“继续进行21世纪玻利瓦尔社会主义建设，用社会主义替代毁灭性和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2014年7月，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三大”确认，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生产的经济，强调没有社会主义，就不能保持委内瑞拉的独立和主权，并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民主，民主就是社会主义”的命题。会议确认了党的反资本主义性质，以及用社会主义替代“贪婪的帝国主义”的信念，重申建立21世纪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历史性的、英雄的伟业，并将对党政干部进行社会主义培训作为一项紧迫任务。

其次，继续实行查韦斯时期的基本政策。执政党“三大”顺利完成党内最高领导层换届，马杜罗接替查韦斯担任党主席。委内瑞拉政府和执政党基本秉承查韦斯的执政理念，保持了在政治、经济、社会政策方面的连续性，宣布继续全面执行查韦斯制定的“2013-2019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计划”，全面落实该计划所确定的经济、社会、科技、文教和外交等各方面的目标。

三、厄瓜多尔提出“现代社会主义”的主张

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是“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另一位重要推动者。他在2014年8月提出了“拉美现代社会主义”的主张，进一步丰富了其先前倡导的“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思想^①。他在论及所谓现代社会主义时提出以下主要观点：第一，新自由主义已在拉美遭到惨重失败。“尽管它在某些媒体的共谋下想重返拉美，但人们不会上当受骗”^②。他指出，还有不少人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方案或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坚信市场是最有效和最公正的，认为所有活动应是按照自愿交换和追求更大利益的原则进行。但科雷亚认为，自由主义的结果通常会很糟糕，因为个人的志向是一回事，而集体的意志又是另一回事。第二，社会主义是解决拉美发展道路上结构性问题的唯一道路。他认为，对于拉美这样存在高度不平等的大陆，“没有比社会主义更好的

① “Rafael Correa apuesta por socialismo moderno para América Latina”, 20 de agosto de 2014, <http://www.holapolitica.com/>.

② “Rafael Correa apuesta por socialismo moderno para América Latina”, 20 de agosto de 2014, <http://www.holapolitica.com/>.

选择了”。第三，“现代社会主义”是把市场和国家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他指出，“新自由主义的错误是相信个人可以解决一切，传统社会主义的错误是认为国家可以解决一切，但我认为，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个人对发展至关重要，社会对发展也至关重要；过度的个人主义会摧毁社会，而过度的国家主义会摧毁个性。个人和国家对发展来说都是必要的，这就是现代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需要集体的行动。第四，经济增长应与社会发展相结合。他强调，仅有经济增长并不足以获得社会发展，应该改变经济增长仅对一部分人有利而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悖论，使所有人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

四、玻利维亚积极推进“美好社会主义”

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是拉美社会主义的另一个积极倡导者和拥护者。近年来他在其社群社会主义主张的基础上，又提出“美好社会主义”的主张。莫拉莱斯关于“美好社会主义”的主张如下：第一，否定资本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既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是一种希望，而且资本主义自身也不愿意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案或希望。他重申，“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不应该允许资本主义带来更多的危机”^①。第二，主张制定应对资本主义的新方案。他号召全世界的社会运动团结起来，寻求应对资本主义的方案，制定解救地球的新议程，制定新的生活规则。他提出，新世纪应该成为人民的世纪，没有等级，没有寡头统治，没有君主制度，是一个各国人民平等的时代。第三，美好社会主义的特点。他认为美好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主张，以美好生活为基础，其特点是“美好生活”而不是“最好的生活”，是共享而不是竞争，不是充满激烈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而是寻求与地球和谐共处的社会主义，是以尊严和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第四，主张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社会和国际责任。他呼吁发达国家不要将资源用于战争、干涉和建立军事基地，不要将资源用于杀戮，而是用于拯救生命；主张由富国支付生态债务。第五，主张建立与世界银行不同的世界金融体系。他提出，应与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革命的国家 and 反帝的国家一起建立“南方银行”，以对抗世界银行。第六，主张求同存异，加强团结。莫拉莱斯认为，“我们可能会有分歧，但如果我们认识到了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团结”，因为“如果我们处于分裂状态，

^① “Rafael Correa apuesta por socialismo moderno para América Latina”, 20 de agosto de 2014, <http://www.holapolitica.com/>.

我们就很难前进”^①。

2014年8月，玻利维亚外交部长戴维·乔克万卡（David Choquehuanca）在“圣保罗论坛”峰会期间对“美好社会主义”做了细致解读，提出了其内在的身份特征、美好生活、均衡和宇宙价值四个特征^②。

身份特征（Identidad）。乔克万卡指出，在外来的欧洲人到来之前，我们已经均衡地生活在这个大陆，没有把我们分开的边界，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有自己的身份特征，我们不是罗马人或拉丁人，我们为希望、团结、和谐而劳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后，我们被分裂，我们的大陆被肢解，开始有了利己主义。为了重新回到均衡、互补和共识的道路，为了回归本来的身份特征，我们必须为团结而努力，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身份特征。身份特征是我们开始建设新社会的基石，因为我们不仅希望建立一个新社会，我们不仅关心人类自身，我们还准备建设新的生活。

美好生活（Vivir bien）。美好生活包括很多方面。美好生活不仅包括民主的深化，而且超越了多数民主的范畴。为了实现美好生活，不仅仅需要多数人的统治，而是需要所有人的统治。民主中存在“服从”这个词汇，即多数人让少数人服从，或者少数人被迫服从多数人。服从他人不是美好生活，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协商一致来进行决策，“我们必须负责任地解决分歧”。

均衡（Equilibrio）。均衡至关重要，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均衡的社会，为美好生活而斗争就是为均衡生活而斗争。为了寻求均衡，我们必须捍卫人民的尊严，我们必须为社会的身份特征而工作。我们不仅为人权、为尊严、为均衡、为共识、为身份特征而奋斗，还要为宇宙权利而奋斗，要捍卫“地球母亲”的权利。

宇宙价值（Cosmo-ser）。我们希望重回我们的传统，重回我们具有身份特征的均衡之路、互补之路和共识之路；我们高度评价我们的起源，要恢复我们的文化和音乐。我们不仅要恢复我们的文化资源，还要恢复我们的哲学、美食，恢复我们那些被拒绝和遭鄙视的一切；他强调这一恢复的任务要从土著人开始。

① Evo Morales propuso un nuevo socialismo para vivir bien, <http://viacampesina.org/es/index>.

② Equipo de comunicación de la CLOC/Vía Campesina : El vivir bien un socialismo por la vida, <http://www.semanariovoz.com/2014/09/10/>.

利内拉及其社会主义思想

阿尔瓦罗·加西亚·利内拉（Álvaro García Linera），1962年10月出生，是拉美地区主要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一，现任玻利维亚副总统。从年轻时代起，利内拉就受康德、黑格尔、葛兰西、尼采、马克思、列宁等人思想的影响。1981-1985年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学习数学。20世纪90年代因与玻利维亚印第安人游击队组织有牵连，以颠覆和恐怖主义的罪名被捕，被判预防性监禁5年，1997年获释。服刑期间开始学习社会学，出狱后获得该专业毕业证书。随后开始在大学教授社会学课程，并担任新闻评论员，积极为南美地区工会和印第安人运动提供帮助和支持。2005、2009和2014年与莫拉莱斯搭档参加大选，2006年1月起任副总统至今。利内拉被称作是“辩证本质主义”者，是玻利维亚左翼政府主要的理论家，是政治战略的主要制定者，是政府政策的主要解释者。他长期从事与玻利维亚印第安人和劳动阶级事业有关的工作，主要著作有《工人阶级状况》、《社会运动的社会学》、《亚马逊地缘政治：世袭庄园主的权力与资本主义积累》、《国家危机和人民政权》等。利内拉关于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和主张如下。

一、主张建立一个没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

利内拉于2013年在玻利维亚召开的“反帝峰会”上，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开创“社群社会主义”的前景。他认为资本主义是慢性自杀，如果能产生利润，它就有能力进行杀戮和毁灭，资本主义不在乎森林的消失，只在乎获取财富。他认为“玻利维亚是不同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前景的新希望，这种前景就是社群社会主义，是印第安和农民的美好生活，这种生活在殖民地时期遭到剥夺，现在又重新回归。他强调，社会主义方案的国际主义新特点给美国带来了不快，因为“我们想到的是全世界，因为敌人是共同的，所以我们要团结”^①。他还在多个场合强调，为了战胜帝国主义，就应该建设社群社会主义，用社群社会主义战胜帝国

① Cumbre Antiimperialista: “García Linera propuso un mundo sin capitalismo ni imperialismo”, <http://www.telam.com.ar/notas/201307/27089>.

主义^①。

二、革命的方法是建立民主

利内拉从纯粹的政治理论出发来观察现实社会，提出“没有希望和没有信仰的民主是失败的民主，是僵化和停滞的民主。在严格意义上，这根本不是民主”^②。他认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发生变化，变成了“掠夺性资本主义”，用征用（expropiación）即通过对公共空间、生态、水源、祖先的知识、森林和自然资源的占领实现积累，征用是通过征收公共财富并将其转化为私有财产的一种积累，而这就是自由主义的逻辑。他认为“我们需要恢复民主的概念”，拉美左翼一直维护民主的旗帜、正义的旗帜、平等的旗帜和参与的旗帜；为此我们必须放弃“体制的概念”（concepción institucional），因为民主超越了体制，民主不仅仅是投票和选举议会；民主是一种价值，是认识世界的组织原则，是容忍、多元化、自由。他还强调，民主是实践，是集体的行动，是对公共管理日益增长的参与；“如果有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就有了民主”。他认为，在拉美“建立民主是革命的方法”。“我们已经丢弃陈旧的民主，在拉美地区革命政府取得了胜利，出现了过渡和民主的丰富，民主被理解为参与、激进化和社区”^③。

三、主张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

2014年5月在玻利维亚召开的“77国集团”峰会上，利内拉表示，希望峰会成为通向新的全球化的一种途径。所谓新的全球化是一种前景广阔和具有一体化特征的全球化，它应由被世界列强所认为的“边缘国家”来设计。当前的世界以市场为中心联系起来，是垂直的体系，这种状况应该改变。“现代世界体系不是水平的舞台而是垂直的舞台，各国不是以兄弟般友好的方式、和谐和均衡的方式联系和交流的”，这种现代世界体系的“现实是虚伪和耸人听闻的”。利内拉认为，在这个垂直的舞台上，存在着从世界化或全球化进程一开始就拥有较大影响力、统治力和决策能力较强的国家，存在着处于中间地位的

① Nelson Peredo, “García Linera: Para vencer al imperio debemos construir el socialismo comunitario”, Los Tiempos Digital, 31 de julio de 2013, <http://www.lostiempos.com/diario/actualidad/nacional/>.

② El Vicepresidente de Bolivia imparte una lección magistral a los dirigentes de la izquierda europea, <http://www.publico.es/internacional/489157/>.

③ Vicepresidente inaugura Foro de Sao Paulo y compara el neoliberalismo con un “arcaísmo” <http://www.la-razon.com/index>.

国家，以及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这些边缘国家是征服、控制的目标，是向“世界中心”输送初级产品的来源地。为此，他号召追求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要充分考虑所谓边缘人民、考虑那些拥有传统、农民和手工业经济国家的话语权、需求、希望和能力，他号召学者们探讨实现新全球化的方式和途径^①。

四、新自由主义是可以被战胜的，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已经过时

2014年4月在法国一个叫“马克思空间”（Espacios Marx）的组织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利内拉对欧洲政治力量对比状况做了分析，认为新自由主义在欧洲占统治地位：“最近30年现代和社会主义的左翼执行了右翼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共产主义左翼生存空间缩小甚至处于边缘化状态，自主的左翼在日常生活的广阔空间里展开不懈斗争，而右翼却在独享对国家事务的垄断，对全体欧洲人民的生活条件造成打击”^②。他对当前欧洲大陆人民所承担的如此保守的局势表达了看法。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成为当前欧洲社会的灵魂，而在历史上曾十分荣耀的自我组织、工会运动以及普遍论思想遭到暂时失败。“这是精神和道德的失败，是左翼自我定义的选择前景的落空，因而是更可怕的失败，因为这种失败深入到人们的精神之中”。他呼吁欧洲的左翼重新确立自己的目标，在“理论和实践上重新开始斗争，汲取教训，轻装前进。我们需要面向未来的、没有负担的左翼。新一代既不应在前辈严重的错误中窒息，也不能对这些错误一无所知”。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左翼和革命者的首要任务是从新自由主义中走出来，打破新自由主义制度是自然的、不可战胜的、没有界限和其他选择的观念。“为了建设替代社会的前景（共产主义），既没有特殊的模式，也没有唯一的方案，更没有必须模仿和遵守的清规戒律”^③。

尽管利内拉认为新自由主义在欧洲占优势，但确信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已经过时。他在2014年圣保罗论坛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拉丁美洲，15年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圣经，但现在正被丢弃”，新自由主义及其信仰在拉美

① G77 debatirá reforma de la ONU; García plantea otra globalización, <http://www.la-razon.com/index>.

② VP boliviano: “El neoliberalismo no es invencible, tiene fisuras”, <http://www.contrainjerencia.com/>.

③ VP boliviano: “El neoliberalismo no es invencible, tiene fisuras”, <http://www.contrainjerencia.com/>.

地区斗争和反抗不断扩展面前已经坍塌，形势已经发生变化^①。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已经过时，谈论新自由主义越来越像说一件过时的东西，“就好像在说侏罗纪公园一样。新自由主义是一个过时的东西，我们正把它扔进历史的垃圾箱”^②。

在解释新自由主义的掠夺本质时，利内拉同意社会理论家哈维（David Harvey）的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方式，基本特征是剥夺农民、抢占社区资源、将公共资源私有化、把生态等同于知识产权、把自然界商品化。他指出，认识这些问题以及列宁的立场，是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意志”。他以玻利维亚为例指出，在实行了多年的新自由主义政府的统治后，2005年工会部门、劳动者、农民、土著人和城市部门的联合把一个土著人莫拉莱斯推上总统职位，因此，“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它是有裂痕的”^③。

五、“社群社会主义”和“美好社会主义”是玻利维亚的未来前景

利内拉是玻利维亚社群社会主义和美好社会主义的主要阐释者，认为玻利维亚政府所推动的社群社会主义是一种未来，是一种在当代必须建立的社会类型，是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野蛮、苦难和毁灭相对立的发展前景^④。他认为，当今世界充满不公平和过度不平等，因此社群社会主义的唯一目的是建立公正、平等和美好生活的社会^⑤。在2013年“反帝峰会”上，他明确提出玻利维亚的最终目标是社群社会主义，并强调建设新社会的方式应该是和平和民主的。

利内拉强调社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他认为资本主义造成了不负责任的死亡和贫困。他以玻利维亚为例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群社会主义

① Vicepresidente inaugura Foro de Sao Paulo y compara el neoliberalismo con un “arcaísmo”, <http://www.la-razon.com/index>.

② “El Jurásico neoliberal quedó atrás”, <http://www.informatico.com/29-08-2014/>.

③ VP boliviano: “El neoliberalismo no es invencible, tiene fisuras”, <http://www.contrainjerencia.com>.

④ El vicepresidente, Álvaro García Linera, explica las bases del socialismo comunitario, <http://bloguerosrevolucion.ning.com/profiles/blogs/>.

⑤ 玻利维亚驻77国集团代表罗加（Cristel Roca）曾对美好社会主义中的“美好生活”做出解释，认为是指尊重自然资源、尊重环境、尊重地球妈妈、尊重发展；强调“国内生产总值不重要，福利的积累才重要”。参见，“G77 debatirá reforma de la ONU; García plantea otra globalización”, <http://www.la-razon.com/index>.

的区别。他指出，资本主义没有建立真正的和谐国家（Estado Orgánico Real），而是朋党国家（Estado de Camarilla），少数部门和统治者建立了权力政治，对土著人、劳动者和妇女被排除在外毫不关心。他认为，这是次等国家（Estado de Pacotilla）和表面国家（Estado Aparente），没有努力去代表或关注所有人。与此相反，社群社会主义是要建立代表所有人的“真正国家”（Estado Real）。他指出，社群社会主义（它也可以有其他的名字）建立在社区以及与资本主义斗争了 500 年的土著人民潜力和自身经验的基础上。

利内拉承认建设社群社会主义既是一种需要，又是长期的过程。他表示，“不知道这一进程会持续多久，也不清楚会遇到怎样的和多少艰难险阻，但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那就是不能走回头路，因为走回头路无异于自杀，那就是宣布自然和人类的消亡。为了生存的需要，我们有义务建设一个社群社会主义”^①。他认为社群社会主义的进程将持续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但其巩固将取决于穷人、中间阶层以及社会所有部门的斗争。

利内拉认为玻利维亚处于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和社群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他引用马克思、卢森堡和列宁的观点来论述玻利维亚经济的特点，用马克思解释资本主义，用卢森堡解释新自由主义，用列宁来说明玻利维亚当前的经济进程。“我愿意用列宁主义的概念来解释玻利维亚向社会主义和社群制度的过渡”^②。他认为，在玻利维亚，资本主义和社群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和联系是以“多民族国家”^③的形式来实现的，这是一个各种社会运动的统治，它有两个基本支柱（dos pilares fundamentales），一个是土著农民社区，另一个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他认为，这两个支柱应该在保证向社群社会主义民主过渡经验和结果的基础上，将所有社会部门、中间阶层、企业家等团结起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① El vicepresidente, Álvaro García Linera, explica las bases del socialismo comunitario, <http://bloguerosrevolucion.ning.com/profiles/blogs/>.

② Redacción Central, “Bolivia transita hacia economía socialista”, Los Tiempos, 4 de abril de 2014, <http://www.lostiempos.com/diario/actualidad/>.

③ 2009 年 3 月莫拉莱斯总统签署最高法令，将原国名“玻利维亚共和国”改为“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以体现其独特的多民族国家特性。

意大利

李凯旋

同往年相似的是，意大利 2013 年度关于葛兰西思想、历史等方面的研究依然十分活跃。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但不乏深度。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激进左翼政党和组织创办的《马克思二十一》已经成为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交流当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剖析意大利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探讨左翼的困境与出路的最重要平台之一。

一、活跃的葛兰西研究

2013 年系葛兰西逝世 70 周年，本年度意大利各大葛兰西研究机构纪念这位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活动相当丰富，关于葛兰西研究的新著作与论述也颇为丰富。

1. 主题多样的纪念活动

葛兰西基金会研究所（Fondazione Istituto Gramsci）^① 和葛兰西国际协会

① 国内多把该机构译作葛兰西学院或葛兰西研究院，遗漏了其意大利文名称中“Fondazione”，即“基金会”一词。笔者在 2013 年 4 月与该机构主要负责人西尔维奥·彭斯（Silvio Pons）教授沟通后，了解到其基金会性质不宜被忽视。因此，在今年的报告中对该机构的中文名称做出调整，以期能更准确反映该机构的性质与功能。

意大利分会 (IGS Italia) 是意大利推动葛兰西思想研究及其在全世界传播的最主要机构之一。该机构下设一图书馆, 藏有葛兰西著作和关于葛兰西研究的著述, 每年举办数场关于葛兰西 (但不限于此) 的小型研讨会或新著推介会。2013 年, 自然也不例外。2 月 18 日, 该机构举办了葛兰西国际协会意大利分会主席圭多·里郭利 (Guido Liguore) 2012 年新著《受争议的葛兰西——诠释、争论与争议 (1922-2012)》^① 的推介会; 3 月 22 日、4 月 13 日和 15 日, 与比克陀尼亚文化协会 (Associazione culturale Bictonia) 联合举办了三场纪念葛兰西的研讨会; 3 月 22—23 日, 与法国巴黎加布里埃尔·佩里基金会 (Fondation Gabriel Péri di Pantin) 和巴黎第一大学的现代思想体系历史中心联合举办了“葛兰西之复兴”的国际会议, 主要讨论葛兰西思想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影响, 以及意法两国共产主义的交叉史; 9 月 6-7 日, 与安东尼奥·葛兰西博物馆和国际葛兰西协会一起组织了“葛兰西研究国际学校”; 3 月 27 日和 9 月 27 日, 与比萨高等师范学院举办了“意大利七八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研讨会; 10 月 4 日, 与葛兰西国际协会一起举办了“葛兰西在法国”的研讨会; 10 月 31 日, 葛兰西基金会研究所与意大利安东尼奥·葛兰西国家协会 (Associazione Nazionale Antonio Gramsci) 联合举办了“葛兰西与 20 世纪”的展览。11 月 11 日至 15 日, 与阿根廷国家图书馆、国立撒米恩托将军大学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General Sarmiento)、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化研究所和国立科尔多瓦大学联合举办了“葛兰西研究在阿根廷”的文化周活动。2013 年 12 月 18 日, 与路易吉·斯图尔左 (Luigi Sturzo) 基金会举办了“路易吉·斯图尔左 - 安东尼奥·葛兰西与意大利南方”的小型研讨会暨该活动的同名图书推介会。

葛兰西国际协会意大利分会在 2013 年主办了几场关于葛兰西研究的专题研讨会: 3 月份的主题是论“《狱中札记》的历史”, 学者发言的题目有《葛兰西: 1930 年 5 月至 11 月》、《哲学笔记: 唯物主义与理想主义——札记 4》、《札记 4——杂集》、《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地狱〉第十歌”》; 6 月的研讨会以“近期解读葛兰西的角度与问题”为主题, 学者发言的题目有《葛兰西与陶里亚蒂关系的解读》、《后共产主义文化中的葛兰西》等; 9 月专题研讨会的主题是“葛兰西 1924-1926 与‘南方问题’”, 10 月的专题研讨会以纪念巴西的葛兰西著作研究与翻译家卡洛斯·尼尔森·科蒂尼奥 (Carlos Nelson Coutinho) 为主题。

^① 该书已在 2013 年度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中得以详细介绍。

2. 对葛兰西的解读与争论

2013年,关于葛兰西及其思想的著作主要有:《葛兰西和2000年:关于网络时代的意大利左翼》^①,《〈札记〉之谜:葛兰西逝后对其手稿的追索》^②和《葛兰西的教育思想》^③,《背叛:葛兰西和陶里亚蒂与被否定的真相》^④。本年度关于葛兰西的论文内容与主题都十分丰富,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黑格尔和葛兰西哲学中的异化与去异化》^⑤,《现代性的批判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史学家葛兰西》^⑥,《葛兰西狱中笔记有多少?》^⑦,《葛兰西在智利》^⑧,《论葛兰西的复苏:在列宁、布哈林与李嘉图之间》^⑨,《从民族的-大众的到全球的-民粹的》^⑩,《狱中的葛兰西与意大利海外政治》^⑪,《坎佛拉“异端共产主义”话语下的葛兰西与陶里亚蒂》^⑫,《在传记与文献学之间:葛兰西的意大利之复兴》^⑬。

葛兰西和陶里亚蒂都是意共的创始人,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传记作家和历史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葛兰西与意共的关系以及与陶里亚蒂关系中的“阴暗面”,也早已不是新闻,但《背叛:葛兰西和陶里亚蒂与被否

-
- ① Roby Guerra, *Gramsci e il 2000: per una sinistra italiana nell'era diinternet*, La carmelina, 2013.
 - ② Franco Lo Piparo, *L'enigma del quaderno. La caccia ai manoscritti dopo la morte di Gramsci*, Donzelli, 2013.
 - ③ Riccardo Pagano, *Il pensiero pedagogico di Antonio Gramsci*, Monduzzi, 2013.
 - ④ Canali Mauro, *Il tradimento. Gramsci, Togliatti e la verità negata*, Marsilio, 2013.
 - ⑤ Emiliano Alessandrini, *Alienazione e disalienazione della filosofia in Hegel e in Gramsci*, in “Giornale Critico di Storia delle Idee”, 9, 2013, pp.147-161.
 - ⑥ Alberto Burgio, *Critica e crisi della modernità. Gramsci storico della società borghese*, in “Giornale critico della filosofia italiana”, settembre-dicembre 2012, pp. 678-713.
 - ⑦ Ruggero Giacomini, *Ma quanti erano i quaderni del carcere di Gramsci?*, in “Storia e problemi contemporanei”, 62, gennaio 2013.
 - ⑧ Antonino Infranca, Gramsci in Cile, in “Critica Marxista”, 1, 2013.
 - ⑨ Vincenzo Orsomarso, *Sulla ripresa gramsciana: Tra Lenin, Bucharin e Ricardo*, in “Slavia”, 1, 2013, pp. 95- 115.
 - ⑩ Giuseppe Prestipino, *Dal nazionale-popolare al globale populista*, in “Critica Marxista”, 2, 2013, pp. 63-70.
 - ⑪ Angelo Rossi, *Gramsci in carcere e 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in “Critica Marxista”, 1, 2013, pp. 48-58.
 - ⑫ Alessandro Roveri, *Gramsci e Togliatti secondo il “comunista eretico” Canfora*, in “Il Ponte”, 1, gennaio 2013, pp. 73-86.
 - ⑬ Gianpasquale Santomassimo, Bruno Bongiovanni, Francesca Chiarotto, *Tra biografia e filologia: la renaissance italiana di Gramsci*, in “Passato e Presente”, 89, 2013.

定的真相》依然引起了很多关注，甚至招致了不少质疑与批评。作者马乌里奥·卡纳里 (Maurio Canali) 的主旨是强调陶里亚蒂背叛了葛兰西。作者认为，在 1926 年 10 月，陶里亚蒂就从政治上背叛了葛兰西：他违背了葛兰西向苏共多数派提交某份文件的意愿，并同时批评葛氏的某些政治方式；在此后的数年中接受了斯大林的规则；在“二战”后初期，对将要出版的葛氏著述进行了大量的审查和篡改活动。最大的背叛是 1928 年 2 月以来多次意图阻挠葛兰西重获自由。卡纳里从保存在梵蒂冈档案馆从未公开出版的资料中，翻出了塔蒂亚娜·舒希特 (Tatiana Schucht) 1925 年从莫斯科寄给葛兰西的信件和其他未公开出版的文件，以证明在 1927 年的最后几个月已经有意达成释放葛兰西与特拉齐尼的协议，但 30 年代末苏联出现了针对葛兰西的敌意行为——主要是指来自陶里亚蒂的敌意，从而阻挠了葛兰西重新获得自由。葛兰西国际协会意大利分会网站刊发了两篇质疑和批评该著作的文章。罗马大学教授耐里奥·纳尔迪 (Nerio Naldi) 撰文《卡纳里论葛兰西与陶里亚蒂：一段预设的历史》^① 对其其中的一些原始资料的诠释提出了质疑。例如，纳尔迪认为书中这段引文：“对于他（葛兰西）在世时在罗马进行交换的问题，波将金 (Potemkin) 得知，尽管德聂伯罗夫 (Dneprov) 领事认为有进行交换的条件（1934 年），但是并没有得到相关指示”^② 表明，苏联方面在意图阻碍葛兰西重获自由上负有责任，而不是陶里亚蒂。

国际葛兰西协会意大利分会还刊发了陶里亚蒂研究方面的学者弗朗切斯卡·奇亚罗托 (Francesca Chiarotto) 的文章《陶里亚蒂与葛兰西关系的解读》^③。奇亚罗托认为，在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垮台后，即所谓的“民主自由的世界对社会主义模式”的胜利，或曰“历史的终结”之后，对陶里亚蒂和葛兰西关系的种种解读开始出现。意大利共产党人“死亡”之后，又以“民主党

① Nerio Naldi, *Canali su Gramsci e Togliatti: una storia preconçetta*, http://www.igsitalia.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34:mauro-canali-il-tradimento-gramsci-togliatti-e-la-verita-negata-&catid=43:recensioni&Itemid=70, 上网时间, 2014 年 8 月 19 日。

② Canali Mauro, *Il tradimento. Gramsci, Togliatti e la verit  negata*, Marsilio, 2013, pp245-246.

③ Francesca Chiarotto, *Le letture del rapporto Gramsci-Togliatti*, <http://www.igsitalia.org/Francesca%20Chiarotto%20-%20Lecture%20del%20rapporto%20Gramsci-Togliatti.pdf>, 上网时间, 2014 年 8 月 20 日。

人”，“自由主义者”，或者“改革者”的面目重生。意共曾经拥有的优良传统与激情已荡然无存。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对整个意共历史传统的攻击。意大利不乏反陶里亚蒂和反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而关于陶里亚蒂破坏葛兰西重获自由以及两者关系破裂的著述大多来自这些自由主义者之手。奇亚罗托赞同葛兰西基金会研究所主席朱塞佩·瓦卡（Giuseppe Vacca）的分析。陶里亚蒂破坏葛兰西重获自由是不是符合他自己的利益？虽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但基于对事实的构建，人们得到的答案应该是这样的：陶里亚蒂不需要蓄意破坏葛兰西重获自由。事实上，唯一有能力帮助葛兰西出狱的行为者是苏联政府，而它从来就没有真正要救葛兰西出狱的意图。把葛兰西羁押在监狱的是墨索里尼，而让葛兰西获得自由并不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同时，奇亚罗托又引用了劳尔·莫尔邓迪（Raul Mordenti）的观点，葛兰西重获自由的运动，在当时已经成为反法西斯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1934年几乎与墨索里尼政府达成了葛兰西有条件获释的妥协，但是，反法西斯运动却对外交途径解决该问题的可能性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3. 后共产主义文化中的葛兰西^①

2012年国际葛兰西协会意大利分会主席圭多·里郭利（Guido Liguore）的新作《受争议的葛兰西——诠释、争论与争议（1922-2012）》^②，梳理了葛兰西思想的发展历程，在意大利思想界再次掀起了关于葛兰西及其思想的深度探讨。国际葛兰西协会意大利分会，在其官网发布了葛兰西研究方面的学者莱奥纳多·帕吉（Leonardo Paggi）在该协会2013年6月研讨会上所作的长篇报告——《后共产主义文化中的葛兰西》。

在意大利共和国的历史上，对葛兰西思想遗产的整理及其诠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7年至70年代中期，无论是葛兰西笔记的公开出版还是以主题为序的《狱中札记》版本的出现，对葛兰西思想遗产整理的主要目的与意义都是纪念性的；第二阶段始于70年代，这是对葛兰西思想的诠释发

① 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来自莱奥纳多·帕吉在2013年6月葛兰西国际协会意大利分会上的发言，原文请参见Leonardo Paggi, *Gramsci nella cultura del post-comunismo*, <http://www.igsitalia.org/Leonardo%20Paggi%20-%20Gramsci%20nella%20cultura%20del%20post-comunismo.pdf>。

② Guido Liguori, *Gramsci conteso, Interpretazioni, dibattiti e polemiche. 1922-2012*. Editori Riuniti - University press, 2012.

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二战”后，由于陶里亚蒂大力推动葛兰西作品的出版，意大利左翼和欧洲左翼都获得了复兴，葛兰西的政治思想也得到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葛兰西一度被左翼思想界和政党奉为“西方的革命理论家”。帕吉认为，《狱中札记》强调了政治历史的各类大范畴，突出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复杂性，以及多种共识性组织在这一社会中所起到的不容忽视的作用。葛兰西笔记中的文化运动，所表达出的改良意义大于革命的意义，或者说并没有指向革命。这是一种经典的改良运动，把不断增长的谈判力量用于提高社会保护的水平——如意大利到1969年至1975年才真正实施了重要改革，接近了欧洲高水准的福利国家制度。帕吉认为，葛兰西对自己所提出的运动在政治理论领域的吸引力与文化合法性的解读，令人意想不到地置于欧洲社会民主文化背景之下。而后者在1945年后已经更加温和，深深植根于20世纪的欧洲历史中且完全不同不同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葛兰西政治传统在意大利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与20世纪西方的民主政治变迁，以及各种资本主义力量的博弈相联系。意共与葛兰西同一时期的另一位杰出领导人陶里亚蒂说过，“民主的自由，在工人阶级、人民群众和中间群体，以及知识分子中已经相当地稳固且广泛了，他们能够成功地捍卫他们实践与理想的立场。因此，认为民主自由是一成不变的，甚至奉为教规，一系列不变的规则，一旦修正便不再改变的想法都是错误的。”^①可见，这段话重点不在于对民主自由的重新定义，而在于其所强调的“新背景下的新内容”。所以，在1950年代，陶里亚蒂所提出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式道路”本身，被视为是对葛兰西思想的一种革新，虽然有人认为是背叛。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意大利思想界开始了对葛兰西思想的辛辣批评，似乎要彻底颠覆左翼在前二十年所塑造的革命家葛兰西形象。正如里郭利所言，1978年到1986年，是“葛兰西思想之光”在意大利熄灭的一段时期，其思想的方方面面都被贴上了“专政”的标签，以至于在1986年的意共《团结报》刊发了意大利工人运动历史和意共党史专家保罗·斯皮里亚诺（Paolo Spriano）的文章：《安东尼奥·葛兰西真的存在过吗？》。但这不是一个文化的个案，而是由于当时意大利文化的时尚或曰品味，在整个国家政治和经济发生

^① P. Togliatti, *Nella democrazia e nella pace verso il socialismo*, Roma, Editori Riuniti, 1963, p.96.

剧烈动荡的情况下，都发生了变化。1976年至1979年的选举，使得意大利政治文化从根上被重新书写了。虽然意共在选举中获得了较高的支持，推动了政府机构和经济的改革，这一进程实际上突出的是一种后共产主义文化，而这一文化在此后的十年中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获得了更多的认可。

帕吉所指的后共产主义文化，其实主要是对葛兰西思想中民主概念的重新界定。诺贝尔托·鲍比奥就被帕吉认为是在后共产主义语境下重新定义民主自由的重要思想家。鲍比奥认为，民主包括：（1）一套整体的规则（所谓的游戏规则）允许大部分公民最广泛和最安全的参与政治决策，不论是以直接的形式还是以间接的形式；^①（2）轮流执政的制度存在，使得“反对派不仅存在，而且可以发挥作用，这种作用可以成为新一届政府的能力或财富”。^②在鲍比奥看来，问题不在于谁执政，而在于如何执政；不在于主体是谁，关键是制度。但是，这些学者的所谓后共产主义话语下的民主自由，很难让人想起当年意共在意大利共和国立宪时，对代议式民主进行的理性批判。换句话说，帕吉认为葛兰西的时代与当今自由主义时代在政治取向上已经相距已很远了。

二、马克思主义研究相关成果

相对而言，2013年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没有上一年度那么活跃，但是也不乏有深度有影响力的著作。

洛佩兹·安吉丽娜（Lopez Angelina）在2013年出版了《社会学与马克思——一场五十年代的争论》^③，该书主要呈现了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意大利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一场争论。在20世纪50年代的意大利，正统左翼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在下列政治文化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大争论：从重新定义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到知识分子在党的制度面前的作用；从文化的随波逐流到科学审美，从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到克罗齐唯心主义传统的反社会学偏

① N. Bobbio, *Compromesso e alternanza nel sistema politico italiano. Saggi su "MondOperaio", 1975-1989*. Con una introduzione di Carmine Donzelli e una postfazione di Luciano Cafagna, Roma, Donzelli Editore, 2006, p.30.

② Ibidem, p.127.

③ Lopez Angelina, *Sociologia e marxismo. Un dibattito degli anni Cinquanta*, Nuova Cultura, 2013, Roma.

见。归根到底，在一种深刻的社会转型中，出现了对意大利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去本土化和科学化的紧迫要求。这一场辩论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学在意大利的诞生而引发的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挑战，虽然这种挑战的后果也许不那么直接明显，但却是深刻地影响了左翼文化的演进。通过借助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路径（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本书作者考察了这场辩论的一些最基本的分歧点，尤其涉及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重构了“马克思主义批评者”们的立场，并肯定他们的重大创新性贡献。

2013年，迪·马西奥·卡尔洛（Di Mascio Carlo）的新著《帕舒卡尼斯与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判》^①出版。这是一部献给前苏联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法学家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的著作。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考察了帕舒卡尼斯的《法的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1924）。帕舒卡尼斯的这部作品成为界定法律的结构性的首次有机理论尝试。该著认为，我们应该在生产系统组织中，而不是在纯粹形式的范围去揭示资产阶级法律的构成，资产阶级的法律构成不是偶然的，它本质上是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与运转。按照这个视角，“法律，作为生产性关系的构成因素，不再像被传统理论那样视为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上层结构，其自身就是一种结构，已经内嵌于资本主义社会化之中，完全是社会本身所固有的”。无疑，这其中包含了帕舒卡尼斯的“异端式”创新的独特贡献。

万祖利·马克（Vanzulli Marco）在2013年新著《马克思主义与理想主义——拉布里奥拉，克罗齐，詹蒂莱和葛兰西研究》^②中，对拉布里奥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拉布里奥拉的关系以及葛兰西的政治理论进行了剖析。一般而言，在意大利对拉布里奥拉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克罗齐和詹蒂莱对马克思和拉布里奥拉的诠释，以及与葛兰西的政治理论之间的关系。对拉布里奥拉作品的解释与对葛兰西《狱中札记》的解读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些人以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连续性之名断定拉布里奥拉、克罗齐、詹蒂莱和葛兰西同属一个历史范畴，这种观点没有说服力。拉布里奥拉被视为一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起点”，不可与克罗齐和葛兰西的思想进行简单地比较。的确，《狱中札记》是对马克思遗产的意大利式解读，但在这

^① Di Mascio Carlo, *Pasukanis e la critica marxista del diritto Borghese*, Phasar, 2013, Roma.

^② Vanzulli Marco, *Il marxismo e l'idealismo. Studi su Labriola, Croce, Gentile, Gramsci*, Aracne, 2013, Roma.

一解读中是否也存在着某种遗失？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论文集《未来的宗谱学——颠覆现在的七堂课》^①是一部关于研究意大利工人主义的著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重读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主义，被世界公认为是激进与批判思想的里程碑。然而，若要彻头彻尾地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把握概念与确定历史范畴是十分必要的。实验的自由和缺乏记忆的尼采颂词，只有在使马基雅维利主义回归原则时才能产生结果，而且在其中方法与颠覆性实践合二为一。本书所收入的文章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倾向。在该书中，阿德利诺·乍尼尼（Adelino Zanini）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引介；桑德罗·齐尼奥拉（Sandro Chignola）对国家与宪法进行了研究；安东尼奥·奈格里回顾了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各种运动的历史；克里斯坦·马拉奇（Christian Marazzi）分析了货币与金融资本的问题；爱丽莎·德尔·雷（Alisa Del Re）概述了女权批评话语下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塞尔吉奥·博洛尼亚（Sergio Bologna）解释了阶级构成范畴的意义；费德里科·奇奇（Federico Chicchi）和萨尔瓦托雷·科米奴（Salvatore Cominu）对调查与研究的工具进行了分析。总之，该论文集对有意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研究的学者和研究人员有较大价值。此外，博尔博内（Borbone G.）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与形而上学——雷塞克·诺瓦克和认知方法论派》^②也是2013年出版的影响较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

三、意大利激进左翼的系列理论主张^③

在2013年的议会选举中，意大利激进左翼联盟又未能达到进入议会的门槛。面对苏东剧变以来最深重的生存危机，激进左翼政党于9月底联合召开了一场全国代表大会，就金融危机的爆发与欧盟的紧缩政策、危机以来的意大利

① Roggero G. e Zanini A., *Genealogie del futuro. Sette lezioni per sovvertire il presente*, Ombre Corte, 2013.

② Borbone G., *Scienza, marxismo e metafisica. Leszek Nowak e la scuola metodologica di Poznac*, Limina Mentis, 2013, Roma.

③ 本文第三部分主要参考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和激进左翼学者主办的杂志《马克思二十一》（Marx XXI）。在2013年第2期中，《马克思二十一》集中刊发了意大利重建共和共产党人对危机的看法，对意大利经济社会形势和政治力量现状的判断，两党与欧盟关系方面的政治纲领，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等。

经济和政治形势，以及激进左翼的现状与前景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讨。

1. 论欧盟及其紧缩政策

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框架中运行的欧盟，在德国政府和德国资本的主导下有意地选择把私人金融投机活动的危机转化为公共债务危机，通过资本集中与在单个国家内部和欧洲国家间制造深刻的社会断层，恶化了危机的形势，拉大了欧洲各经济体在结构上的差距。这一选择也是对欧洲劳工运动、福利国家和民主的攻击。欧洲一体化的每一步深入都意味着欧盟进一步的去民主化和技术官僚化。面对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实施紧缩政策的欧盟，意大利激进左翼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认为，改变现在的欧洲要从改变这些把市场和利润置于社会之上，以及规范着欧盟运行的条约开始，这些条约有着反民主和新自由主义的特征。虽然现在的欧盟不是一个好的共同体，打破与其之间的紧密联系却并不意味着要孤立自己并退出欧盟和欧元区，相反，遭到危机沉重打击的南欧诸国应该在欧盟内结成联盟，不再单方面地一味遵守现行条约，而应争取到更多的自主权，以迫使欧盟核心国改变现行经济政策并再次修约。

2. 论意大利的去民主化与政治形势

意大利激进左翼认为，危机爆发以来，意大利强化了共和国总统的权威，削弱了议会的权力。贝卢斯科尼政府辞职，并非由于议会的不信任投票，而是意大利总统做出的决定——这是对意大利和欧盟大资本家们战略利益的诠释，也是意大利国内与欧盟强权达成共识的结果，当然也得到了美国的认可。他们认为当时的意大利议会，贝卢斯科尼内阁和意大利各政党都没有能力克服危机，从而授权前任欧盟委员会委员蒙蒂组建由技术官僚构成的内阁。

与此同时，意大利中左翼的路线，却包含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声称反政党政治的五星运动在意大利政坛异军突起。共产党人认为五星运动在意大利的兴起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①，与当前的经济危机也密切相关。近二十年来贝卢斯科尼主义给意大利社会带来的去意识形态化

① 早在二战后意大利就有了反政党政治和反意识形态的“否定一切主义”的思潮。20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在进行反传统政党——天民党、社会党和意共（左民党）——腐败行为的“净手运动”时，这一思潮形成了一股社会运动，并推动了意大利1993年的全民公投投票取消了对政党的财政资助。在当前的资本主义选举体制中，这对于经费捉襟见肘的激进左翼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与部分政治阶层日益增长的腐败，交织在一起，为反政党政治思潮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经济危机和紧缩政策给意大利广大劳动者和最贫困阶层以沉重的打击，他们再也无法忍受那些享有特权却无力解决当前危机的政党。就在这一背景下，五星运动抓住民众的反现行政治体制的心理和改变现状的强烈需求，获得了高达 25% 的支持。激进左翼认为，五星运动的崛起，恰恰说明了意大利传统政治力量和左翼的无能。在意大利民众对政府应对危机措施日益不满时，意大利左翼和共产党人却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和分裂，公信力下降，没有能力提出可信的替代现行紧缩政策的方案。

3. 论左翼的困境与复兴之路

金融危机爆发后，意大利最主要的激进左翼力量——共产党组织，陷入了更大的生存困境，主要表现为组织力量萎缩，思想意识过于多元化，经费捉襟见肘。对此困境，激进左翼从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两方面进行解释。从客观方面说，社会结构的变迁，即工人运动和当今工人阶级的碎片化，使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阶级基础陷入了危机；意大利政治选举制度的变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入使得激进左翼进入议会并发挥影响力变得十分困难；意大利政治价值观体系的改变，反共产主义思潮的流行，工会的衰弱，也令意大利共产党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联系基础都大大萎缩。就主观原因而言，由于意大利激进左翼在面对政府强力推行的紧缩政策时，没能像其他国家的左翼一样组织起大规模的工会运动，号召民众进行抗议活动，反而表现出无力感，认为无法找到改变现状的出路。意大利激进左翼对自身的组织能力和影响力缺乏信心，未能以相当的远见卓识去驾驭危机之中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为弱势群体勾勒出一个可信的共同未来，抓住潜藏在危机乱象中的政治机遇。

但是，激进左翼和共产主义政党组织的存在，对于弱势群体来说是很有必要的。他们存在的意义在于使人们在资本主义矛盾的视野下去看待政治矛盾和社会冲突，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全球视野和迈向社会主义的立场，才是解决当今资本主义时代矛盾的完整且恒久的解决之道。

对于左翼的复兴，意大利激进左翼中的政党组织都寄希望于重建左翼统一阵线之上。认为首先应建立统一的左翼阵线，以保护劳工利益的工联主义为基础，囊括所有的反资本主义、反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和所有的民主和左翼力量。其次，关于左翼统一阵线的具体斗争计划，应在引入其他公共干预经济的计划来替代欧洲央行的紧缩政策基础上，维护宪法的权威，推动对当前规范着

欧盟运行的条约的讨论和修改。总之，当前激进左翼组织除了在选举中的简单联合之外，很有可能在左翼统一战线中走向更具有实际内容的联合，但是否能真正将意识形态多样化的反新自由主义、反紧缩政策的力量凝聚起来，进而带来意大利激进左翼的复兴，仍不得而知。

（作者：李凯旋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西班牙



2014年6月，在位近四十年的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宣布退位，新国王费利佩六世继任。当前西班牙宏观经济形势虽有所好转，但仍面临着经济危机修复期的诸多挑战，如内外债居高不下，实体经济复苏乏力，就业市场形势堪忧，等等。在紧缩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双重打击下，西班牙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持续下滑，降至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且低于欧盟均值^①，西班牙劳工的就业和生活境遇更是不堪重负。

2013年—2014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们依然活跃于论坛、研讨会、出版物及网站等各种学术平台和大众媒介。从经典中寻求精神慰藉，从历史中寻找时代出口，依然是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者的关切所在，尤其是“西班牙民主共和历史的进步意义与当代价值”、“20世纪批判思想的回顾与反思”等议题，得到了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者及左翼力量的高度关注与讨论。

一、主要活动

2013年—2014年，西班牙共产党旗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联合西班牙各

^① <http://es.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06/20140600635860.shtml>.

地左翼党派、工会、文化基金会及教研机构等，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和讨论活动。

（一）“西班牙历史学、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和解：从佛朗哥主义到现实”研讨会^①

2014年11月27日-28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历史部在马德里大学信息科学系召开“西班牙的历史学、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和解：从佛朗哥主义到现实”研讨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历史部负责人何塞·贡梅兹·阿伦（José Gómez Alén）主持了会议，马德里大学讲坛（Cátedra UCM）、多明戈·马拉贡基金会（Fundación Domingo Malagón）、记忆论坛（Foro por la Memoria）、“历史记忆20”等机构协办了此次会议，百余位社科学者及著名历史学家霍塞普·冯塔纳（Josep Fontana）与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以下方面。

1.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审思

会议主办方认为，佛朗哥政权末期至西班牙民主过渡时期，西班牙史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得到了长足发展。该会旨在回顾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梳理马克思主义与西班牙史学研究延绵复杂的历史关系。与会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西班牙一代知识分子、学生和历史学家最终达成了政治和解，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佛朗哥专政的结束和西班牙民主化进程。但是，当前历史学的研究令人堪忧。20世纪后20年，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似乎终结了一切替代模式的可能性，并确立了冷战赢家的意识形态霸权，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的史学界则试图探寻后现代主义的分析工具。当前，马克思主义对危机的历史反思还远远不够，亟需加强对社会现实的分析和转型的指导，从而打破欧美学者垄断理论建构和政策建议的既有格局。

在有关“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讨论中，马德里大学的多明戈·普拉西多（Domingo Placido）、西班牙国家远程教育大学（UNED）的卡洛斯·马丁内茨·肖（Carlos Martínez Shaw）、圣地亚哥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卡洛斯·巴洛斯（Carlos Barros）、马德里大学胡安·特里亚斯（Juan Trias）分别就古希腊罗马时代、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封建主义问题和过渡阶段等议题进行了发言。阿利坎特大学的何塞·安东尼奥·皮盖拉斯（José Antonio Piqueras）和萨拉戈萨大学的卡洛斯·佛卡德（Carlos Forcadell）分别就“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

^①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882.

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工人阶级”进行了发言。在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历史与未来”的讨论中，格拉纳达大学的特蕾萨·奥尔特加（Teresa Ortega）、奥维耶多大学的弗朗西斯科·恩里塞（Francisco Erice）认为，近年来史学界在探寻 21 世纪理论研究新范式的同时，也在试图重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萨拉戈萨大学的何塞·路易斯·莱德斯玛（José Luis Ledesma）和瓦伦西亚大学的胡利亚·桑茨（Julián Sanz）则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视角探究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至弗朗哥政权末期的政治和解问题。最后，庞培法布拉大学的霍赛普·冯塔纳教授做了题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历史解读”的讲演，他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便致力于将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引入西班牙。^①

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

从弗朗哥政权末期到西班牙民主过渡时期，部分西班牙经济学家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力图从历史维度发展和创新理论框架。新自由主义霸权成就了新古典主义思想和实证主义范式的复归，而左翼力量则更为看重制度主义思想和后现代主义视角，从而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缺失与摒弃。与会者认为，当前的危机凸显了现有理论框架在解释西班牙经济现实方面的苍白乏力，应重启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在社会经济现实讨论中的作用。

会议回顾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的西班牙经济境况与问题，与会者认为只有深入研究西班牙上世纪 70 年代初的危机、弗朗哥政权终结后西班牙经济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才能深刻理解西班牙当前经济危机的特征及缘由。艾伯特·莱斯（Albert Recio）认为，在讨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时，更应关注其曾经的半封建特征，对最先进和最腐朽的经济成分进行区分，对其政治含义进行剖析，从而更好地理解同期的社会政治变迁及其变革方案。一些与会者认为，弗朗哥政权代表着腐朽寡头势力的利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催生了跨阶级的广泛结盟，建立了新欧洲的混合经济模式。另一些与会者则认为，弗朗哥政权是一种与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相契合的独裁模式，是资本主义垄断模式的变种，带有激进主义的色彩，掌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绝大部分资源，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绝大多数主张反资本主义的政治道路。

与会者还对西班牙资本主义的构成、主体及权力机制进行了热议。与会

^① José Gómez Alén, *Para una reflexión sobre historiografía y marxismo*, <http://www.mundoo-brero.es/pl.php?id=4359>, 25/11/2014.

者认为，当前经济研究多偏重微观领域和具体案例，虽然概念复杂却鲜有从社会现实出发、从社会结构入手的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左翼学界也存在类似的负面倾向，从而导致其宪政主张与经济纲领的脱节。与会者认为，左翼力量应积极推进对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与讨论，若缺乏对西班牙资本主义发展史及其主要生产关系的研究，就无从推进对当代西班牙资本主义特征的研究。从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与发展，人类社会在几百年间经历了依附性过渡到外围资本主义建立的历史进程，外国资本与本国寄生阶层勾结进而构筑权力核心的游戏规则在今天依然适用，只是形式发生了改变。萨拉曼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布拉纳（Francisco Javier Braña）及其年轻的团队，从历史与结构层面对西班牙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①

（二）“西班牙马略卡岛工人运动史”研讨会

2014年11月21至22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历史部与巴利阿里群岛西班牙劳工联盟（UGT）、巴利阿里群岛西班牙工人委员会（CCOO）工会^②、马略卡记忆协会（Memòria de Mallorca）、埃米里·达德基金会（Emili Darde Fundació）、巴利阿里大学史学与艺术理论系在西班牙的马略卡岛“帕尔马人民之家”联合召开了“马略卡岛工人运动史”研讨会，近20位左翼学者及活动家与会。会议负责人霍赛普（Josep Quetglas）表示，与会各界通过对马约卡岛工人运动史的回顾与总结，进一步认识到了该省及整个西班牙工人运动面临的历史与现实困境，并探讨了当地工会组织与左翼力量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与策略。

（三）“从葛兰西认识马克思”公开课与讨论会^③

2014年1月25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思想部与埃布罗米兰达共青团、卡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共产党在埃布罗米兰达市联合主办了“从葛兰西认识马克思”的公开课与讨论会，萨拉曼卡大学历史学家古斯塔沃·埃尔南德

① Eddy Sánchez Iglesias, *La recuperación del marxismo y el debate económico en España*, <http://blogs.publico.es/la-soledad-del-corredor-de-fondo/2014/11/27/la-recuperacion-del-marxismo-y-el-debate-economico-en-espana/>.

② 西班牙劳工联盟（UGT）和西班牙工人委员会（CCOO），为西班牙国内最大的两个全国性工会组织。

③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877.

兹·桑切兹 (Gustavo Hernández Sánchez) 与萨拉曼卡主教大学哲学与人类学教授何塞·萨里翁·安达卢斯 (José Sarrión Andaluz) 分别就“葛兰西实践哲学”与“葛兰西与当代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主题讲演。

(四) “塞维利亚的共产主义运动史”研讨会^①

2014年3月6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历史部与塞维利亚大学当代史学系在塞维利亚大学地理与历史系联合举办了“塞维利亚的共产主义运动史”研讨会。会议就“塞维利亚共产主义的起源”、“塞维利亚第二共和国时期的西班牙共产党”、“塞维利亚CCOO工会组建过程中的西班牙共产党”、“安达利西亚的召唤:联合左翼的建立”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五) “大学、科学与研究:欧洲的抵抗与替代”国际研讨会^②

2014年1月31日至2月1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科技部在马德里科学研究高级委员会(CSIC)旗下的“学生之家”(Residencia de Estudiantes)^③召开“大学、科学与研究:欧洲的抵抗与替代”国际研讨会。法国左派阵线(MEP, Front de Gauche)、“改变欧洲”(Transform! Europe)、公民欧洲基金会(FEC, Fundación por la Europa de los Ciudadanos)、巴塞罗那替代协会(Fundació l'Alternativa)等机构的代表与会。

会议认为,对欧洲左翼而言,下轮欧洲选举是直面欧盟新自由主义科研与大学管理体制严重后果的关键时刻,欧洲人民应建立全民抵抗意识,推进整个欧洲替代道路与方案的探索。会议根据欧盟诸国的调研报告,对博洛尼亚改革^④

①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878.

②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879.

③ 学生之家(Residencia de Estudiantes),马德里著名文化中心之一,20世纪上半叶西班牙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汇集的文化胜地,是战时欧洲科学与艺术交流的重要场所。

④ 博洛尼亚改革即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计划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是29个欧洲国家于1999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提出的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整合欧盟的高教资源,打通教育体制。“博洛尼亚进程”的发起者和参与国家希望,到2010年,欧洲“博洛尼亚进程”签约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毕业生的毕业证书和成绩,都将获得其他签约国家的承认,大学毕业生可以毫无障碍地在其他欧洲国家申请学习硕士阶段的课程或者寻找就业机会,实现欧洲高教和科技一体化,建成欧洲高等教育区,为欧洲一体化进程做出贡献。

的后果进行了分析。会议还评述了“里斯本战略”^①和“欧洲2020战略”^②对欧盟科研政策的影响及其反对声浪，并提出了有利于科学、社会和民主的替代方案。

改革公立大学是西班牙人民党政府任期内的主要目标之一，其主要内容包括反对教研活动完全从属于市场代理人的短视需求、反对教研机构模仿企业管理模式、反对大学丧失自主权、反对公共财政越来越向利润率增长和私有资源竞争倾斜。为推进“博洛尼亚进程”，近年来的公立大学改革推出了一系列伤害学生、研究人员、教师和行政后勤人员利益的财政和劳动力政策。这一现象并非西班牙独有，欧盟各国的公立大学均面临来自欧盟决策层的类似压力与问题。会议认为，左翼应深入分析当前欧盟战略设计对大学体制危机的系统影响，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设性方案。

（六）西班牙共产党（PCE）举办2014年共产党节系列活动^③

2014年9月19日至21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政治部在马德里举办西班牙共产党2014年共产党节系列活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埃迪·桑切兹·伊格莱西亚斯（Eddy Sánchez Iglesias）及研究会各分部负责人出席了活动。共产党节期间，西班牙共产党及旗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举办了“支持公投的公民大会”推介会、《改变危机中的欧洲：政治与社会融合》新书推介会、“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复杂的一年”研讨会、“改变女性还是改变科学：纪念居里夫人”研讨会、《第三共和国：西班牙需要的未来社会》新书推介会、“团结经济与民主市场：经济民主化的合作社经验”报告会、“践踏人权与南方国家的抵抗”研讨会、《反对欧元系统的欧洲》新书推介会、《大学该怎么办》新书推介会、“建立大众传媒的替代网络”报告会、“争夺能源主权：反对寡头的人民权力”研讨会、《劳动权模式与法律文化》新书推介会、“反新自由主义斗争的法律工具”

① 欧盟于2000年制定的“里斯本战略”旨在使欧盟10年内成为“以知识为基础的、世界上最有活力和竞争力的经济体”。该战略就发展、就业、科研、教育、社会福利、社会稳定等事务制定了28个主目标和120个次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目标是就业率和科研投入。

② 2010年夏，欧盟通过了“2020战略”，以替代“里斯本战略”。作为欧洲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战略，该战略旨在使欧盟经济实现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灵巧增长”，以提高资源效应、提倡“绿色”、强化竞争力为内容的“可持续增长”，以扩大就业、促进社会融合的“包容性增长”。

③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883.

研讨会、“乌克兰的反法西斯斗争”报告会、《捍卫公共权益》新书推介会、《西班牙制造》新书推介会、“反对欧盟 - 美国贸易与投资协定的原因”研讨会、“从危机的牺牲者到变革的主角”报告会、“民主革命的共识：宪法进程”研讨会、“劳工冲突与工会纷争”、《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变革：兼谈西班牙与委内瑞拉劳工改革的比较》新书推介会、“纪念《共产党宣言》出版 150 周年特别版本”推介会等多场活动。

（七）“城市霸权与冲突：城市记忆”研讨会^①

2014 年 3 月 18 日、19 日和 26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城市规划与住房部与多明戈·马拉贡基金会、马德里大学，在马德里马尔克斯·德巴尔西亚（Marqués de Valdecilla）历史图书馆联合召开了“城市霸权与冲突：城市记忆”研讨会。

会议包括“城市抵抗：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权利”、“重建城市：探寻出路”、“恢复城市：走向新霸权”三个分议题。与会学者分别就“城市权”、“小梵蒂冈”、“城市的不动产”、“街区的脆弱性”、“公共住房”、“住房新视角”、“记忆与城市霸权”、“影像与城市艺术”、“占主导的象征性空间”、“城市农业”、“民主记忆与城市”等主题做了发言。与会者认为，城市化进程造成了新的社会分化与城市公民权的陷落，“是否拥有住房”、“拥有怎样的住房”造成了新的社会隔离机制，城市街区的规划与分布服务于经济利益，沦为资本主义的金融工具。为赢得社会权利、捍卫边缘群体的权益，必须动员大众，共同阻止有损于城市化公平正义的项目。

（八）“城市绅士化（gentrificación）^② 问题”研讨会^③

2014 年 10 月 23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城市规划与住房部在马德里 Dalc6. C 书店举办了“城市绅士化问题”研讨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城市讨论俱乐部（Club de Debates Urbanos）、城市观察（Observatorio Metropolitano）等机构的代表及马德里大学城市社会学教授参加了研讨会。与会者认为，尽管城市在形式上是中立的，但是，大都市各街区间不平衡的运动、迁移和重组既蕴藏着一定的社会规律，更体现着一定的社会经济功能，现代政治、文化

①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880.

② 绅士化（Gentrification）又译中产阶层化，即旧街区在重建后地价及租金上升，因此从低收入人群居住地转变为精英聚居区的城市空间重组现象。

③ http://www.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884.

和经济制度在城市变迁和重建中担负着重要的作用，“城市绅士化问题”研究旨在厘清城市、资本与危机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人口绝大多数分摊城市绅士化进程中的不平等与失衡。

二、主要著作

2013—2014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涌现出了一批从历史哲学等跨学科视角诠释人类发展困境和出路的理论著作，并对新自由主义及其替代选择进行了多维论述和深度探讨。

（一）《贸易的敌人：所有制的道德史（二）》（2013）^①

《贸易的敌人：所有制的道德史（二）》的作者安东尼奥·埃斯科塔多（Antonio Escotado, 1941）是西班牙著名散文家、西班牙国家远程教育大学法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翻译了大量霍布斯、牛顿和杰弗逊的著作，入选《20世纪思想家辞典》（共70位思想家）。埃斯科塔多是西班牙著名毒品问题专家，著有《毒品史（1989年—1999年）》。作为《贸易敌人：私有制思想史》（2008）的姊妹篇，埃斯科塔多撰写的《贸易敌人：所有制道德史（二）》涵盖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多领域的研究范畴。埃斯科塔多将所有制置于人类文明史的大背景下，以社会主义的诞生和马克思为主要研究对象和出发点，通过严谨的分析和详实的论据，探讨了所有制起源与发展，并试图探究私有制向共同所有制回归的可能性。埃斯科塔多计划以三部曲的方式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与发展，目前的这部二卷本加入了经济史的视角与细节，融入了工会、大企业、所有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历史演进研究，并进行了北美、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俄罗斯等国的案例研究。

（二）《怀疑大师：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2015）^②

《怀疑大师：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一书的作者弗朗塞斯·托拉巴（Francesc Torralba, 1967）是哲学与神学教授，西班牙巴塞罗那拉曼·鲁尔（Ramon Llull）大学当代哲学史与哲学人类学教授，曾被罗马天主教教宗本笃

^① Antonio Escotado, *Los Enemigos Del Comercio: Una Historia Moral De La Propiedad Ii*, S.L.U. Espasa Libros, 2013.

^② Francesc Torralba, *Los maestros de la sospecha: Marx, Nietzsche, Freud*, Fragmentos (Book 22), Fragmenta Editorial, February 1, 2015.

十六世任命为教廷主教文化理事会顾问，著有《听的艺术》、《有神与无神》、《精神智慧》、《孩童的精神智慧》、《生活的意义》、《喧嚣世界中的安宁》等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和宗教学著作。弗朗塞斯·托拉巴认为，人类思想史上值得铭记的思想大师往往对人类的思考方式具有颠覆性影响，大师们的怀疑精神对思考历史、上帝、人类和自由的关系大有裨益，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撼动了西方文明秩序的支柱，是西方思想地震的震中，人类的思维方式从此超越了过去。弗朗塞斯·托拉巴清晰严谨地阐述了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对宗教和人类学的批判，并指出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思想净化了上帝的形象和宗教体验，使人类得以挣脱神学思想的束缚，重新审视和怀疑自己的信仰。^①

（三）《五十位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2013）^②

《五十位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汇集了20世纪在社会批判理论和解放神学领域卓有贡献的50位知识分子。该书作者胡安·何塞·塔玛约（Juan José Tamayo, 1946）系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神学与宗教学系主任，西班牙宗教学学会、神学与解放世界论坛委员会成员，拉美及欧洲多家主流杂志的神学、社会科学及宗教学专栏作家，欧洲解放神学和宗教学的重要人物。胡安·何塞·塔玛约认为，知识分子是勇于挑战现有秩序、推进人类思想进步的革命者，他们为变革社会而思考，为理想中的社会而奔波。该书汇集的五十位知识分子中包括了“二战”后德国最具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西班牙哲学家玛丽亚·萨姆布拉诺（María Zambrano）、现代主义先锋主义神学家卡尔·拉内（Karl Rahner）、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德国神学家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宗教学家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哲学家何塞·路易斯（José Luis L. Aranguren）等。

① <http://www.fragmenta.cat/es/fragmentos/cataleg/fragmentos/245167>.

② Juan José Tamayo, *Cincuenta intelectuales para una conciencia crítica* (2013), Colección: Fragmentos Volumen: 20, FRAGMENTA, septiembre del 2013. <http://www.casa-delibro.com/libro-cincuenta-intelectuales-para-una-conciencia/9788492416776/2197442>

（四）《今日〈启示录〉》（2014）^①

《今日〈启示录〉》试从《圣经》文本的视角反思当今全球危机的源起与发展。该书作者韦森特·瓦杜（Vicente Verdú）是西班牙作家、记者和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基金会成员，曾任西班牙多家主流媒体的专栏撰稿人和主编，多次获西班牙媒体新闻奖。韦森特·瓦杜（Vicente Verdú, 1942）认为，与美国危机相比，欧洲危机堪称悲剧，马克思笔下的商品拜物教如今成了反基督教的商品，危机当前，人类应该反省超越自我承受能力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神话的破灭堪比撒旦到来时的不安与恐惧，人类生活在不确定中，价值在改变，劳动者的生存境况与情绪陷入不稳定中，人类应从圣胡安的经典《启示录》中反思今天的危机，寻求未来的出路。

（五）《现代性与资本主义》（2013）^②

《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作者何塞·路易斯·莫内莱奥·佩雷斯（Jose Luis Monereo Perez）认为，现代性与资本主义虽有关联，但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进程。在现代性的传统中，各种共存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改造方案均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源头，但却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因此现代性进程本身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和模糊性。在马克思的影响下，韦伯考虑到了经济因素，但却对思想如何转化为历史动能颇费思量，韦伯的批判性思想及研究在当下依然有效。在全球化时代，需要对韦伯的理性化理论进行修正，韦伯思想囿于西方世界的具体情境，高估了法律作为现代社会理性化主因的作用。而在当前的背景下，自由主义的政治与法律范式日益消解，在无序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权力已超出了民主的掌控。

（六）《当代政治理论与制度（一）：社会主义（民主的马克思主义 - 社会主义）》（2014）^③

《当代政治理论与制度（一）：社会主义（民主的马克思主义 - 社会主义）》的作者西格弗莱多·席勒·德·卢克（Sigfredo Hillers de Luque, 1934）是西

① Vicente Verdú, *Apocalipsis Now*, Peninsula, 2014. <http://www.casadellibro.com/libro-apocalipsis-now/9788499423418/2299503>.

② Jose Luis Monereo Perez, *Modernidad Y Capitalismo (El Viejo Topo)*, Intervencion Cultural, Barcelona, 2013.

③ Sigfredo Hillers de Luque, *Doctrinas y regímenes políticos contemporáneos: I / 1. El Socialismo (Socialismo marxista-Socialismo democrático)*, Palibrio, March 13, 2014.

班牙马德里大学法学教授、社会学家，西班牙学生工联主义阵线（FES）创始人之一，1977年创建西班牙独立长枪党组织，1984年退出政治活动，其著作对西班牙长枪党的后继者影响深远。该书的意图是为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主义平反，强调它们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者。作者认为，作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之一，社会主义占据了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重要舞台，第二国际并未消解，相反越来越多的政党开始主张社会主义，尽管在某些国家儒家思想也十分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作为战胜国，凭借其强大的宣传机器，试图说服世人，真正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而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是玫瑰色的、温和的社会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作者认为，这是苏联炮制的神话之一。作者认为，尽管苏联将恩格斯视为马克思思想无可争议的诠释者，但却贬低了马克思最偏爱的追随者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斯坦等人的贡献。在恩格斯的领导下，正是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在1891年的爱尔福特大会上力排众议，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德国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德国与奥地利是欧洲国家中社会主义政党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且最信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国家，并发起了社会主义国际。在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坚持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未能得到社会主义国际的承认。考茨基先后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和《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作为回应，列宁撰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且没有使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命名布尔什维克党，而采用了“共产党”。德国社会主义党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起就采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名称，西班牙社会主义党的创始人巴布罗·伊格莱西亚曾在其著作中称考茨基为大师。^①

（七）《历史与元史学：历史进程中的辩证意义》（2014）^②

《历史与元史学：历史进程中的辩证意义》一书的作者胡安·克鲁兹·克鲁兹（Juan Cruz Cruz）是西班牙纳瓦拉大学历史与哲学系教授，纳瓦拉大学哲学杂志《哲学年鉴》主编，著有《智慧与理性》、《时间的自由》、《反思的野

① http://www.amazon.com/Doctrinas-reg%C3%ADmenes-pol%C3%ADticos-contempor%C3%AIneos-marxista-Socialismo/dp/1463369654/ref=sr_1_12?s=books&ie=UTF8&qid=1419043417&sr=1-12&keywords=marx.

② Juan Cruz Cruz, *Historia y metahistoria: Sobre el sentido dialéctico del curso histórico*, Amazon Digital Services, Inc., December 9, 2014. <http://www.amazon.com/Historia-meta-historia-sentido-dial%C3%A9ctico-hist%C3%B3rico-ebook/dp/B00QTZO4NY>.

蛮》、《雅各宾派的存在与历史虚无主义》、《费希特的意识与绝对》和《新柏拉图主义与神秘》等。^①

该书认为，对历史意义的追问源自古希腊时代，后人进一步发展了对该问题的回答。圣奥古斯丁从神学角度，将历史进程描述为线性的、不可重复的、暴露于众神之域的过程。19世纪的黑格尔、马克思与尼采从哲学角度对这一神学论述给予了回应，使人类的辩证史学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在讨论历史进程的普遍终点时，哲学家们对私人 and 公共部门、家庭与社会间的紧张关系及可能趋势给予了重点关切。胡安·克鲁兹的著作对历史哲学最重要的范畴给予了批判性诠释，如家庭（亚里士多德、赫尔德）、社会（卢梭、康德和费希特）、国家（黑格尔）等客观表述的历史、伦理与政治意义，还对马克思著作中“劳动”概念的人类学意义进行了阐释。

三、代表性论文

从2013年年中至2014年底，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旗下的电子刊物《社会经济指标》持续了发布了十余期“西班牙劳工冲突指数”简讯，该刊通过对西班牙全境月度工会活动和工人运动的统计，反映了西班牙劳工运动的最新动向与特点。此外，《社会经济指标》还发表了《2014年初的西班牙劳工市场》、《西班牙青年就业处境》、《危机中的西班牙青年劳动者》、《衰退终结与就业市场的复苏》等近十篇专题调研报告。^②

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历史部分别于2014年1月和7月刊发了两期电子刊物，该刊物旨在继承霍布斯鲍姆“人民阵线”立场和知识分子精神，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创新打造理论平台。该刊创办人认为，正如马克思否认黑格尔是“死狗”，马克思主义理应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和后现代主义怀疑论中，担纲思想战的重要角色。^③ 第二期刊物围绕西班牙皇室的王位更迭，探讨了

① http://www.amazon.com/Historia-metahistoria-sentido-dial%C3%A9ctico-hist%C3%B3rico-ebook/dp/B00QTZO4NY/ref=sr_1_19?s=books&ie=UTF8&qid=1419040249&sr=1-19&keywords=marx.

② http://www.fim.org.es/02_01.php?pagina=0&titulo_categoria=&id_categoria=19.

③ http://www.fim.org.es/02_02.php?id_publicacion=350.

新时期公民及历史学家捍卫自由平等、争取社会解放的责任问题。^①

2014年年中，西班牙卡洛斯国王的退位与更迭再次引发了西班牙左翼对君主立宪制的讨伐和共和国道路的倡议。西班牙共产党特召开了“首届共和国大会”，并由“共和运动和历史记忆”秘书处发布了《西班牙共产党的共和国替代道路》^②一文，对西班牙共产党主张的第三共和国道路进行了详尽论述。全文共分“共和国主张”、“为什么”、“什么是共和国”、“如何实现第三共和国”四个部分。西班牙共产党认为，如不开启宪政进程，西班牙就无法实现第三共和国的理想，实质宪政与形式宪政的区别就在于权力能否得到有效执行与制约，宪政的核心在于公民成为政治的第一主角，目前在西班牙走共和国道路仍面临诸多挑战，西班牙人对内战时期第二共和国的历史仍无法释怀，君主制与共和制能否共处共融仍有待实践。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① http://www.fim.org.es/02_02.php?id_publicacion=353.

② <http://www.pce.es/descarga/3republica.pdf>.

东欧报告

赵司空

2012—2013年，东欧社会抗议运动频发，左翼参与其间，并做出了自己的反思。该报告对发生在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的左翼活动进行介绍。除了社会抗议运动，东欧学者对中国与俄罗斯、后苏联国家民主问题的评价等，都将构成该报告的组成部分。

一、左翼活动

1. 保加利亚^①

2013年1月，保加利亚人由于电费的大幅上涨而被震惊，加上那个冬天尤其寒冷，所以出现了许多穷人无力支付电费的情况。Mariya Ivancheva 分析说，对此的反应是富有煽动性的：老年人中上升的自杀率和伤亡者，在失业的工人阶级的七件自焚事件中达到顶峰。账单和伤亡者催化了2013年冬天开始的社会动员。示威者大多是普通的保加利亚人：中年男女、有孩子的年轻父亲和学生，也有许多右翼极端主义的足球流氓。运用不同的抗议旗号，他们都质

^① Mariya Ivancheva, *The wave of protests, 2012-2013, in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IV467, December 2013.

疑高能源价格、平庸的生活水平和公然的腐败。

保加利亚此次抗议运动的结果是，在2013年抗议者与警察发生冲突之后，GERB的中右翼政府辞职了，被保加利亚社会党（Bulgarian Socialist Party, BSP）、权利与自由运动（Movement for Rights and Liberties, DPS，代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少数民族）和极右翼党 Ataka 领导的类似的新自由主义政府所取代。Mariya Ivancheva 说，虽然社会民主主义者、以种族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者和右翼极端主义政党的联合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真正的矛盾体，但是它却完全符合保加利亚过去23年转型中政治联合的传统程序：所谓代表不同政治力量的政党围绕全球权力者和地方资本家精英的利益而集中在一起。

2. 斯洛文尼亚^①

2012年与2013年之交，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席卷了斯洛文尼亚。其结果之一是催生了一个新生的斯洛文尼亚左翼政党“民主社会主义的创制”（The Initiative for Democratic Socialism, IDS），该政党试图突破街头抗议运动的自发性，为严肃地挑战统治阶级提供一个组织的平台。民主社会主义的创制以草根运动为基础，它并不屈膝于资本的利益，而是对资本展开不妥协的斗争。该组织和意识形态吸引了大量的草根运动和积极的个人，并且有着共存的空间。该组织的创始人 Anej Korsika 说，在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和波斯尼亚都有一系列的抗议。这些抗议在工人阶级日益恶化的生活条件下有着共同的特征，但是这些异议却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被表达出来。在斯洛文尼亚，抗议运动的主题是与腐败作斗争。在波斯尼亚，抗议可能是南斯拉夫解体以来的公民社会的最重要成果。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第一次讨论阶级而不是种族分裂。在保加利亚，抗议运动的主要特征是错误的信念，即欧盟能够提供理想的变化。

一方面，Anej Korsika 的分析反映了东欧左翼活动的参与者对东欧社会抗议运动的具体见解，另一方面，不论是保加利亚还是斯洛文尼亚的社会抗议运动，都对失败的东欧新资本主义及其新自由主义策略提出了挑战。东欧左翼在近年的频繁活动，说明资本主义面临着严重危机，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只是一个发端。

^① *The fight for socialism in Slovenia: an interview with Anej Korsika*, 1 September, 2014. <http://www.criticatac.ro/lefteast/fight-for-socialism-slovenia-interview-anej-korsika/>.

3. 匈牙利^①

2013年9月7日，布达佩斯举办了首届匈牙利泛-左翼节日，标题为“泛左翼‘这是足够的’(YA BASTA!) 节日”，副标题为“人民的欧洲——社会的欧洲和社会的匈牙利!”。该节日由 Transform Network 组织，欧洲左翼党 (European Left Party) 资助。匈牙利的联合组织者有：ATTAC 匈牙利、匈牙利工人党 2006 (Hungarian Workers Party 2006)、Le Monde Diplomatique Hungarian – (Magyar Diplo)、左翼绿党 (Green Left Party)。参加的组织大约 25 个，人数大约 1000 人。

该活动连续举行了三场小组讨论：其一，欧盟的未来——如何将欧盟转变为一个社会的联盟？参加小组讨论的有 Peter Szigeti, Gyula Hegyi, Gabor Scheiring, Ferenc Istvanffy, Judith Morva。他们一致同意，欧盟应该扩大社会预算以处理失业并减缓社会问题。其中，Peter Szigeti 强调，我们可以在一个更加社会的欧洲创建一个更加社会的匈牙利。资产阶级民主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竞争是需要的。其二，匈牙利的社会情境——现实情境是什么以及如何走出这种情境？其三，匈牙利国内外的新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灾难性的社会情境导致新法西斯主义、新霍尔蒂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治组织和运动的兴起。

匈牙利工人党 2006 的领导人 Attila Vajnai 对匈牙利通讯社 (Hungarian News Agency, MTI) 说，欧洲左翼的标语是使欧洲变得更加社会化。欧洲左翼也应该出现在匈牙利，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匈牙利经历的危机现象，即养老金的价值降低、外汇贷款问题、越来越多的儿童饥荒，不单是匈牙利的问题。这种社会危机几乎在整个欧洲都出现了。鉴于此，欧洲左翼的目标应该是找出对整个欧洲大陆都可行的解决方案。欧盟基金的一个重要部分应该用来阻止大批人滑向贫穷。

4. Ivan Krastev 的评价^②

Ivan Krastev 说，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我们目睹了遍及全球的抗议运动的爆发。但是他认为，这次新的革命政治浪潮是一种没有意识形态或规划的革命。抗议未能提出政治替代方案，只不过是一种道德愤慨的爆发。许多抗议者都是公开反制度的并且对市场和政府都不信任。他们宣扬一种无代表的参与

① Benyik Mátyás, *REPORT on the 1st Hungarian Pan-Leftist Festival*, 13th September, 2013. <http://www.attac.hu/2013/09/report-on-the-1st-hungarian-pan-leftist-festival/>.

② Ivan Krastev, *The global politics of protest*, in *Eurozine*, 2014-08-18.

(particip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这些抗议运动忽视建立政党，不信任主流媒体，拒绝承认任何具体的领导，排斥所有正式的组织，相反信赖网络和地方集会，支持集体讨论和决策。由于对作为规则的制度的不信任，所以抗议者一般对夺权也没有兴趣。政府只是“他们”，不论由谁掌管都一样。抗议者将对共同体的真诚期盼与坚韧的个人主义结合在一起。他们用宗教的术语来描述自身的政治激进主义，强调在街上的行动体验如何激起了灵魂的革命和心灵的变化。对反抗者而言，谁赢得选举或者谁管理政府不再重要，不仅因为他们不想成为那个政府，而且因为一旦人们意识到自身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他们就计划重返大街。他指出，当欧洲人流行将如今的全球抗议浪潮与1848年革命相比较时，今天的抗议是对1848年政治议程的否定。1848年的革命为普遍的选举权和代表制而战斗，它们标志着公民投票者的兴起。如今的抗议是对代表制民主的反抗，它们标志着公民投票者的幻灭。

尽管Ivan Krastev的分析不是专门针对东欧社会抗议运动的，但显然东欧也被包括在他评析的对象范围内。不过，如果我们回到斯洛文尼亚的例子上来，就会发现，尽管Ivan Krastev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斯洛文尼亚的左翼抗议者却在试图避免Ivan Krastev所指出的问题，例如“民主社会主义的创制”的创立，就是力图为来自草根的左翼建立稳固的平台。

二、后苏联国家的新媒体与民主

Natalya Ryabinska指出，2011-2012年的阿拉伯革命，新技术在动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使得科学家们再次谈论网络的自由化潜能，以及它在半民主的或威权主义转型政权中日益增长的作用。这个观点有它自己的热烈支持者（例如Ronda Hauben和Peter Golding）以及反对者（或者至少是怀疑者）。例如，Evgeny Morozov在他的书*The Net Delusion: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中说，在后苏联国家，网络不是被政治自由化而是被维持威权主义政权所成功地利用。争论远未结束，Natalya Ryabinska本人则努力理解网络如何在一段具体的时期，在具体国家中影响政治和社会，他将目标锁定在后苏联（非波罗的海）国家。^①

① Natalya Ryabinska, *New media and democracy in post-Soviet countries*, in *Eurozine*, 2013-10-09.

Natalya Ryabinska 说，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的数据，个人使用网络的百分比，2012 年阿塞拜疆是 54.2%，俄罗斯是 53.27%，格鲁吉亚是 45.5%。这与 2006 年的法国（47.93%）或西班牙（50.37%）具有可比性。另一方面，但由于技术或经济原因，后苏联国家的网络普及还不平衡。例如，在俄罗斯，莫斯科人使用网络比农村人多 3.6 倍。在阿塞拜疆，有些地区的网络使用者抱怨网速太慢。在乌兹别克斯坦，上网的费用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在大多数后苏联国家，网络是生活在“部分自由”或“不自由”的媒体中的人们，可以找到政府试图掩盖的信息的地方，也是他们可以听到反对派政客的声音的地方，而这些是在主流媒体中看不到或者很难看到的。这些信息和新闻主要是由独立网络媒体和独立传统媒体的网络版提供的，在乌克兰，例如 Ukrainska Pravda 的新闻网站，格鲁吉亚的 Netgazeti，白俄罗斯的 Belorusskiy partizan，以及俄罗斯的 Novaya gazeta 的网络版，都向读者提供独立新闻杂志。其他重要消息来源和实事分析是由博客、社会网络、国内外非政府组织的网站，以及西方主要媒体（BBC，Radio Free Europe）的网站提供的。在后苏联国家，与电视观众的规模相比，网络媒体的观众数量仍然是相当少，在那里，电视仍然是绝大多数公民的信息来源。不过，这些网络媒体却有相当的影响力。在乌克兰，2005 年，在 Ukrainska Pravda 出版对前总统亚努科维奇（Viktor Yushchenko）的儿子的过度奢侈生活的调查之后一个月，总统的支持率就下降了将近 15%。毫无疑问，重要的作用是由这个事实所扮演的，即这个主题是由许多传统媒体，包括一些电视台所挑选的。在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之后，乌克兰的民主发展出现了重要的后退，当局“切断了负面消息从网络流向电视”，正如 Ukrainska Pravda 的知名调查记者 Sergey Leshchenko 所言。

Natalya Ryabinska 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即新媒体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新媒体将在什么程度上，以什么方式来影响政治，这仍将值得关注和

三、如何看待中国

1. 中国比俄罗斯更民主吗

保加利亚政治科学家、索菲亚“自由战略中心”（Board of the Centre for

Liberal Strategies) 的董事局主席、维也纳“人类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Human Science) 的终身研究员 Ivan Krastev 撰文《中国比俄罗斯更加民主吗》。他指出, 权力交接、倾听群众、对异见者的容忍、精英的招募和实验, 所有这些方面的事实都说明, 中国比俄罗斯更加民主, 并认为中国的决策毫无疑问也更加优越。^①

Ivan Krastev 说, 今天的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裕和自由, 但是这两个国家都不满足最低限度的民主定义, 即具有不确定结果的竞争选举。如果比较中国和俄罗斯, 中国则比俄罗斯更加民主, Ivan Krastev 列举了五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 权力交接。俄罗斯有选举, 但是没有权力交接。在后共产主义的二十年里, 总统没有在一次选举中失败: 选举的作用不是保证权力的交接, 而是避免它。在中国, 反对派也没有获胜的机会, 但另一方面, 中国的领导者没有人在权力的位置上超过十年, 十年之后, 自动选出新的党的领导人和国家主席。换句话说, 在俄罗斯体制中, 选举被用作使缺乏交接变得合法化的手段, 而中国共产党的制度结构则发展出允许权力交接的要素。尽管这仍然是非竞争的体制, 但中国人懂得, 领导者必须有限定的任期, 否则就会有问题。中国的体制, 建立在集体领导的原则之上, 阻止了个人化威权主义的出现, 并且提供了比俄罗斯更多的制衡。与俄罗斯不同, 中国没有被继承的幽灵所萦绕: 中国共产党确保了一种明确的继承程序。

其二, 倾听民众。Ivan Krastev 说, 根据定义, 非民主的政权有内置的倾听问题。监控和投票决不能取代在自由和竞争性选举中呈现出来的来自人民的信息。民主选举不仅是选举领导人的一个选项, 而且是评估人民站在哪里的直接方法。然而, 当涉及到“倾听人民”时,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事实是, 中国政府没有将劳动者的反抗犯罪化。劳动者的冲突, 通常是直接反对地方领导者或公司领导者, 没有被党视作危险的。所以每年就会有成百上千的罢工, 这成为可靠信息的重要来源。当人们参加直接反抗时, 比纯粹的民意调查的价值要大得多, 不仅因为它们是不可见的, 而且因为它们也提供了机会以考验地方领导者解决冲突的能力。在俄罗斯所谓的民主制度中, 你看不到罢工, 因为在劳动者问题上进行反抗的代价非常高。俄罗斯的操纵选举对于判

^① Ivan Krastev, *Is China more democratic than Russia?* in *Eurozine*, 2013-08-13.

断人们的情绪以及地方领导者解决冲突的能力都是非常虚弱的检验。

其三，对反对者和异见者的容忍。在俄罗斯，对有组织的反对者显然有更多的容忍。你可以注册一个党，可以上街抗议，甚至可以叫普京辞职。在这方面，中国的政权显然要严厉得多。但是当克里姆林宫广泛容忍反对者的同时，却并不倾听它。克里姆林宫在政策问题上不考虑异见者，政府官员并不提出反对者所主张的政策。中国的体制尽管更多的是经典威权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但是它的决策过程更有质量，比俄罗斯的更有包容性。在俄罗斯，甚至当精英内部有分歧时，许多人只是在经济分歧的层面解释它们。在中国集体领导的情况下，观点的分析事实上被看作是合法的。在中国，忠诚检验只有在共产党做出决策时才发生，而在俄罗斯，一旦总统提出建议时忠诚检验就开始了。一种普遍的乐观主义的感觉和正在上升的权力也似乎使得中国在政策立场上对异见者更加宽容。

其四，精英的招募。在政府和领先企业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人从哪里来？Ivan Krastev 指出，Russkiy Reporter 在 2011 年底做的一项研究揭示了许多有趣的事实。首先，绝大多数的俄罗斯精英都去过两所大学中的一所。第二，占据前 300 名位置的人没有一个是来自俄罗斯远东来的。第三，影响精英圈子的成员资格的最重要因素是，在普京先生成为总统之前就认识他。简言之，俄罗斯被一个朋友圈子统治着。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精英系统：这其中的许多人没有适当的职业，结果却进入了统治者集团。中国共产党不是这样运作的。它尽最大的努力创造出不同的社会分层，并且努力使这个体制是由精英合理地管理着。如果你足够愤世嫉俗，如果你想做得好，如果你想赚钱，共产党都向你敞开大门。共产党的功能就像招募精英并且实质社会化的媒介，并且中国的领导在确保区域性代表和为党的干部提供不同经历的机会上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其五，实验。俄罗斯和中国在政治的实验性实践上有差异。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围绕着在不同区域实行不同模式的实验而组织起来。俄罗斯却不是这样，在俄罗斯，实验在根本上是一个污秽的词语。他们在努力建立一个统治政府时，不会进行实验的过程。

最后，这一切意味着什么？Ivan Krastev 说，从前你根据制度来衡量民主，现在你也需要根据制度的功能来问这个问题。它们看起来是民主吗？民主可能是假装的吗？俄罗斯有民主的外表，但是在这个外表下，所有类型的非民主的

实践都在盛行。中国是另外一个国家——威权主义的并且毫无疑问也是严厉的。但是由于这个体制的压力，不同的观点都潜藏在它的转型之下，并且这个国家参与到世界舞台中，它的政治实践而不是正式体制可能更加展现出开放的姿态。一个政权的自我纠错能力和公共责任担当处于民主优势的核心。现在克里姆林宫的许多人认为过度的民主化应该为这个新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负责。许多人嫉妒“真正的”中国式威权主义。但事实却是，在许多实践上，中国比俄罗斯更加民主，它的决策毫无疑问更优越。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当中国忙于能力建设时，俄罗斯似乎忙于掩盖其无能。当西方评论人试图使这些新的威权主义者的不同行为具有意义时，应该建议他们看到形式化的制度设计之外的东西。

2. 民主的重点是法治和善治

爱沙尼亚的法律学者、法学教授 Rein Müllerson 对 Ivan Krastev 的文章做出了回应。在回应中，Rein Müllerson 指出，以西方的自由 - 民主标准来比较中国和俄罗斯，显示了这个普遍标准的不足，真正重要的是法治和善治 (good governance)。^①

Rein Müllerson 认为，Ivan Krastev 的文章背后有一个范式，即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福山的（在他的历史终结论的意义上）推理错误。他以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为基础，即整个世界和每个国家都朝向同一个方向，通往自由民主的不可避免的胜利。基本的假设是，一个社会越民主，社会就越好；越符合西方自由民主的理想，社会就越先进。如果在许多方面这个假设是正确的话，那么在其他情况下，它可能反映了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依此行事，将会有负面的后果。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就体现了这种普遍标准的不足。

Rein Müllerson 说，Ivan Krastev 一方面说中国比俄罗斯在实质上更加民主，但另一方面又说这两个国家都没有满足最低限度的民主定义，这是矛盾的。中国和俄罗斯是非常不同的社会。因此，可以说，“最低限度的民主定义”与中国无关。欧洲的自由民主标准可能原则上也应该适用于俄罗斯，但是它们却并不完全足以衡量中国的进步或者评价中国政治上的表现。虽然中国很可能并不比俄罗斯更加民主，尤其是当人们用西方自由民主的标准来衡量时，但是中国显然得到了更好的治理，并且在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取得了无与伦

^① Rein Müllerson, *There's more than one road to the promised land, Russia might be more democratic but China is better governed*, in *Eurozine*, 2013-08-13.

比的进步：尽管有许多问题，但是中国人对于未来要比其他许多国家的人都要乐观。的确，中国在诸如精英招募和权力交接模式上比俄罗斯做得好，但这些与民主无关。这些是建立在中国儒家遗产基础之上的精英治理的要素。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仅与俄罗斯不同，而且与美国和欧洲的自由民主不同。这不是说，根据他们各自的治理体系，中国比美国好或者美国比中国好。这只是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尽管他们各自的效果可以比较，但是美国试图模仿中国或者中国试图模仿美国都是错误的。只能是互相借鉴有利的要素。因此，将俄罗斯的社会与政治体制与中国的比较，并没有多大意义。

在 Rein Müllerson 看来，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更加普遍的衡量政府的标准，那么它不应该是民主而毋宁是治理或治理能力。简言之，这个标准应该是善治 (good governance)。在这方面，中国的确走在俄罗斯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前面。这个预言似乎相当合理。当然，善治并不反对民主。相反，在许多社会，民主是善治社会的一个重要要素或特征。但是效率、稳定性和法治是更加重要的特征，它们是比“最低限度的民主体义”提供了更加实质性的标准。这一点也很重要，即在西方，法治在民主之前并且使民主可持续。今天，我们在许多非西方社会看到，输入的肤浅的民主特征衍生出了扭曲的，甚至是丑陋的形式，却并没有导致法治的出现。所以，没有法治、有效治理和社会稳定性作为基础，形式的民主制度（这是相对容易引进的）不仅只是形式的而且也不可持久。中国的民主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

从 Ivan Krastev 和 Rein Müllerson 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要走自己的道路，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制度建设迫切需要合理的理论支撑和意识形态支撑，而在这点上，我们也要走自己的道路。

四、梅扎罗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问题的评价

Eleonora de Lucena 对梅扎罗斯 (István Mészáros) 做了一个访谈，在此次访谈中，他们谈到了卢卡奇和马克思主义，谈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回归的预测，也谈到了中国。^①

① Eleonora de Lucena, *Barbarism on the Horizon: An Interview with István Mészáros*, <http://mrzine.monthlyreview.org/2013/meszaros311213.html>.

1. 卢卡奇和马克思主义再评价

梅扎罗斯曾是卢卡奇的学生，也是 22 年的老朋友。他在访谈中说，卢卡奇三部伟大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青年黑格尔》（1948）和《理性的毁灭》（1954）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尤其提到，1919 年卢卡奇在一篇文章中警告说，当无产阶级转而对它自己实行专政时，共产主义运动将面临巨大的危险。卢卡奇的这个警告具有预言性。

梅扎罗斯认为，在今天和在 20 世纪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斗士，显而易见而又令人痛苦的区别在于，第三国际的重要政党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发生了内爆。在西方，只有一些非常小的共产党还对原来的原则保持着信仰。不过，梅扎罗斯补充说，政党是对变化着的需要做出反应的历史产物，马克思就是在主要政党建立之前积极活动的；关于未来，如果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话，有些非常有效的政府也可能会重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不一定以特定的组织形式出现，事实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检视这些政党为什么在东西方都会发生内爆，以及历史的失败如何能够在实际的历史发展中得到修复。从马克思开始，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具有自我批判的精神。现今，自我批判仍然重要。

2. 评价新自由主义终结和马克思主义回归的预测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出现了关于新自由主义终结和马克思主义回归的预测，梅扎罗斯认为，不论哪个方向的结论，我们都应该慎重对待。戈尔巴乔夫政府的倒台并没有解决苏联的任何问题，福山提出的毫无意义的“历史终结论”幻想同样如此。将马克思的《资本论》放在时髦的咖啡桌上，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了显摆，这种变化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现在正在全球扩张。我们所经历的正在加重的危机是不可否认的，它招致了全球反对。但是找到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需要对恰当的策略做出详细阐释，也需要相应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要能够和岌岌可危的重大问题相匹配。在某种意义上，保守主义无疑拥有了更多支持者，因为不变化总是比变化要容易得多，但问题依然存在：已被接受的真的就是站得住脚的吗？从长期有效性来看，现有的进程决不能保障最好的结果。

3. 对现今历史时期的分析

梅扎罗斯认为，说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这种说法令人困惑。资本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体系的有限阶段。正是资本体系构成了真实的世界体系，

超越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历史可持续性。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再生产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对作为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力做经济的提取。然而，也有其他方式来确保资本积累，例如已为人知的模式，即对剩余劳动力做政治的提取，这是过去苏联所做的。在此意义上，注意到过去传统的周期性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的常态）与资本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作为整体危机，界定了现今的历史时期）之间的重要差别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努力强调我们的结构性危机——大概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自那以后此危机不断加深——需要结构性变化，以找到可行的持续的解决方案的原因。这显然不能以保守的“最小抵抗路线”来完成。

4.21 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和事件

梅扎罗斯说，21 世纪刚刚开始，还有许多惊喜等着我们。但现在要说出三位 21 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的话，他将说出 2013 年 3 月逝世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而菲德尔·卡斯特拉在 21 世纪的头五年也很活跃。在保守主义一方，梅扎罗斯会毫不犹豫地說出戴高乐将军，当然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而迄今为止最令人惊奇的事件很可能是中国成功地追赶上美国经济的速度，现在正在到达那个点，即被认为只需要几年时间就会追上美国成为“世界发动机”。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和经济的年增长律，很久以前就可预见这一天会到来。但是许多专家将它发生的时间往未来推迟了几十年。然而，仅仅因为中国的财务平衡表远比美国的要健康，就想象中国会对资本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具有免疫力，这未免非常幼稚。甚至中国的剩余——万亿美元——也可能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动荡中一夜之间蒸发。结构性危机，就其本质而言，注定会影响整个人类。没有国家可以宣称对其具有免疫力，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在生产领域取得的成就，包括减少贫穷，是不朽的。但是未来仍然有很多的问题。首先：如果不承受通过向生态环境索取巨大资源的不可弥补的损失，这些生产性成就可以持续多久？并且，工作人口的最低工资保障水平与高度特权者的财富之间的极度不平等可以被接受多久？没有实质的平等，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也是如此。

2013 年，东欧左翼研究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对近年来东欧爆发的社会抗议运动进行分析。其二，理论关注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金融危机导致的贫穷、失业，以及与之相关的政府腐败，甚至对私有制提出了抗议和挑战；另一方面关注民主是否受到侵害。其三，中国逐渐成为东欧左翼研

究的关注点，这与中国的日益强大有关，也与中国政治体制异于西方和东欧有关。同时，对中国的研究也成为东欧学者反思东欧社会的一个切入点。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前沿问题和流派研究

从民族左翼的终结到为欧洲而兴的 颠覆性运动^①

——安东尼奥·奈格里 / 文 王金林 / 译——

当我们谈论市场的全球化时，我们也谈论一种强加在民族国家主权之上的限制。在西欧，民族左翼运动与政党的基本错误一向是它们未能明白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现象。

直至苏联覆灭，美国的领导成功地把那些属于西方同盟（尤其是北约）国家的民族特性同经典帝国主义的连续性——谨慎而又明显一致地——联合起来，引领它们一起反对“现实的社会主义”。1989年以来，随着苏维埃阵营的覆灭，美国的“硬实力”逐渐被市场的“软实力”取而代之：商业与货币的自由征服了旧的权力工具（军队和国际警察），并且金融权力和公众舆论的权威管理决定了一个领域，在其中，从现在起将采取那些支持市场政策的新自由主义行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层面把自己强力地组织起来了：今天它正按照自身利益操纵着当前经济与社会危机，并能大概指望一个光辉的未来……新自由主义政治基础的一种民主而和平转变在全球层面上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只要不发生革命性断裂，情况就是如此。

① 译自 *From the end of national Lefts to subversive movements for Europe* by Antonio Negri, translated by Olivia Lucca Fraser, *Radical Philosophy*, SEP/OCT 2013, pp.26-32.

与这一切平行而动，自 1989 年以来，左翼政治力量的溃败意义深远。不仅左翼教条力量，以假定忠诚于旧意识形态形式的名义，已宣布放弃对阶级斗争作任何理解，如阶级斗争存在于一个被全球化和生产方式变化所深刻改造了的世界中那样——，而且一种新潮流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在试图考量形势的新奇性时，也冒着同新自由主义公开结盟的危险。

欧洲大陆的统一化进程，和欧洲宪法辩论在其中开展的那些制度，已以一种例示方式证明了左翼的空洞性与政治阳痿——既以托尼·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版本（其方向迅疾被等同于那种以新自由主义方式政治地构建欧洲的明确意志），也以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形式，即那些群体，它们在拒斥欧洲制度的统一与发展的背后，隐藏了自己之无能建立新自由主义的替代者。要这样做，它们本当不得不愿意质疑民族国家、国际公共法律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行政体系。整体而言，这些力量的失败是巨大的。

倘若我们希望恢复辩论，那么我们必须追问：什么理论与政治条件可能使我们能够在颠覆性地建立一个统一欧洲的现实领域中，去重新开启一种斗争的视角。

矛盾

金融的和 / 或生命政治的 (biopolitical) 资本主义在于什么？在于把社会——或更准确地说，生活本身——吸纳在资本的统治之下。市场如何施加控制于社会结构呢？我当然不能在这一点上消磨时间：我将仅限于说，这种力量通过日益重要地使用货币控制而运作，其目标是金融回报或租金的积累。后者依据深化与强化剥削机器的模式来重组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这种深化与强化有时达到变成一种真正新的，用马克思术语来说，原始积累形式的程度。寻求最大增殖的金融市场，一方面偏向“为了人的人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man for man”）产业，也就是说，福利、都市生产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另一方面，偏向资源开采与能源产业、农业企业和广泛而言一切涉及自然的产业。

当今许多运动正寻求的“共同品”（the ‘commons’）之第一个定义可以悖论性地存在于这一点：对整个资本主义占有范围作共产主义逆转。我感兴趣的是研究各种矛盾，它们出现在新自由派予以攻击的——经常有点混乱的——那

个领域中，那些因各种运动而凸显的矛盾。这类矛盾难以克服，并且权力倾向于这样来处理它们：通过一种偏离一切正常性的治理形式，通过一种长期建立起来的和旨在重塑整个社会的例外政府（a government of exception）。所论的这些矛盾可指认如下：

1. 第一个矛盾涉及生产，并存在于这一事实中：金融资本主义代表最抽象与最超然的权力形式，然而悖论性地，正是这种资本主义形式本身以一种全然物质的方式，贯注整个生活。生命的“物化”与主体的“异化”被强加在认知性（cognitive）劳动力量身上，带着一种生产性控制（a productive control），这种控制作为一种金融力量似已变得绝对超越（transcendent）。认知性劳动力量，——它被迫生产剩余价值正好到它是认知性、非物质性、创造性和并非即刻可消费的这种程度——，事实上自在地（in itself）是生产性的，以一种自主的方式。金融的超越性对生产的自主性：这是第一个矛盾。

就生产本质上基于“社会合作”（在无论什么领域：信息服务、看护等）而论，资本的增殖并不单纯遭遇大量“可变资本”，而是遭遇今天自在地代表一部分“固定资本”的无产阶级的抵抗与自主性。确实，生产的新社会平等和生产的认知性特征已把工人改造为“机器性的主体”（machinic subjects）^①，这类主体具有一种“相对”却永久的能力，能够自主地组织他们自己劳动的社会资源。此处的矛盾不能不让我们觉得显而易见。

2. 第二个矛盾涉及财产。私有财产（如从法学观点规定它的那样）趋向于被迫愈来愈受制于租金形式。今天，租金本质上通过发生在金融资本和 / 或不动产资本的服务中的货币流通过程而产生，甚至从工业服务中发生的增殖过程中产生。

但是当（私有）物品以服务形式出现时，当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上通过服

① 本处采用奈格里一向倚重的《千高原》中译本的译法。该书把 *machinique*（即 *machinic*）译作“机器性的”（参见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2010年版，第3页）。有必要指出，*machinic* 含有机-机械的双重性（organic-mechanical duality）。顺便一提，该术语在德勒兹与加塔利那里极其重要，如：“We define social formations by machinic processes and not by *modes of production* (these on the contrary depend on the processes)”（*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435. Trans.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在此，社会形态不再以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来规定，而是以“机器性过程”来规定，并且在唯物史观中一向处于基础性位置的生产方式在此被视为“依赖于”机器性过程。

务业而自我增殖时，私有财产趋向于细分或限定那些传统上用来把私有财产特征描绘为“持有行为”（act of possession）的特点，并且私有财产表现为构成服务并使服务有生产性的一种社会合作产品。对老板而言，问题变成（在社会组织中）赋予私有财产以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这种基本功能问题。如果财产被日益社会化，它如何能被迫受制于私有控制呢？

资本家以典型的虚伪回应这个问题：这是公共权威操心之事。但在后工业社会，阶级关系的公共中介变得日益困难——这确实是这场危机如此清楚地证明了的一点。主权当然已被私有化了（我们可以说，被金融资本主义世袭了），但悖论是，只要私有财产越来越多地把自己呈现为服务之使用，而不再呈现为物品之持有，那么它就以一种绝对同时的方式瓦解了。“公共主权”（public sovereign）不再同公司、工会或集体劳动组织作斗争（它们，让我们顺便注意，把自己表现为私人主体），而是在一种构成与再构成的永久状态中，在既物质性又认知性的生产中，同主体性的合作与社会流动作斗争。概言之，公共主权遭遇到我们所称的“共同品”。

我们这里用“共同品”（the ‘common’）所理解的，涉及认识到这一事实：生产今天以一种日益合作的方式发生。这种合作确实被金融资本直接控制，但它也由认知性劳动力量的各种新角色直接实施，这就是说，由曾被称为“工人阶级”的相同社会力量直接实施。我必须再次强调：当我们说到认知性劳动力量时，我们确实是在谈论 1968 年以来一直在出现的生产的一种新性质，增殖过程的一张新面孔，和劳动的一种新组织；但我们也在谈论物质生产本身某些日益核心的方面——不管外观如何，合作性劳动和甚至引入各种非物质性的、计算的或语言学的因素，目前在物质生产本身中都正变得愈来愈广泛。

因而存在一种日益加剧的公共产品之“私有世袭化”，它在利用并加强私有财产意识形态之际摧毁公共财产制度。从这一结合中涌现出当前无休止的螺旋式运动：尝试通过例外秩序管理公众，这种例外性陷入败坏，和例外权力破坏共同品。

“公共主权”目前只以一种悖论性方式存在，并趋向在“共同品”面前隐蔽自身，——不过，共同品却出现在代表增殖之心脏的社会生产和合作过程中。这种共同品正是被金融力量与全球市场直接捕获之物：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hic Rhodus, hic Salta）。

3. 第三个矛盾涉及生命 - 资本（bio-capital），在其建立同工人身体的关系

范围内。这里，在下述范围内对质或对抗以一种绝对清晰的方式出现了：资本（在其后工业阶段，在认知性生产已变成霸权性的时代）直接把人的身体投入生产，——那些不再仅仅是商品化劳动的身体，那些被改造为生产知识掌握者和机器性操作者（machinic operators）的身体。

如今，在新的生产过程中，这些身体，恰恰因其被日益专业化，已获得一种相对自主性。同样，机器性劳动力量的抵抗和斗争悖论性地回应资本主义对为了人——这就是说为了活机器式的“人”——的人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man for man）的剥削要求。金融资本所利用和它所寻求统治的，恰恰是这一转变。

确实，一旦工人重新占有有一部分“固定资本”，并把她自己呈现（1）——以一种多变且时常混乱方式——为在增殖过程内合作的行动者，呈现为“不稳定的主体”，同时也把她自己呈现；（2）为资本增殖过程中的“自主的主体”，恰恰在此刻，相关于资本的劳动功能之总体颠倒就发生了。工人不再仅仅是资本用来征服自然，这就是，用俗话来讲，生产商品的工具。这是因为，在认知性和合作性劳动中，工人——她从此将其生产工具吸收进她自身中并且从一种人类学观点看已改变形态——重新征服“使用价值”，以一种“机器性”（machinic）方式行动，自主于且对立资本，带着一种趋于日益完整的自主性和对立性。正是在建构这种机器性工人的这一客观趋势和实际装置之间，发生了一种新形式的阶级斗争——一种我们此后将界定为生命政治（biopolitical）的形式。

在资本发展中，我尝试阐明的这三种矛盾或悖论保持开放。它们是矛盾，而且这些矛盾被当前危机进一步加剧。结果，抵抗愈强，权力的复辟（由作为资本器官的国家来进行）愈猛，暴力的使用将愈坚决。每一种抵抗因而都被诅咒为反-权力（counter-power）的非法实施，每一次起义示威都被视为只不过是毁灭或掠夺的一个环节。而且，——这是一种附加的神秘化——，甚至当资本及其国家所造成的暴力登峰造极之际，它们却必定把自己呈现为必要且中性的力量。今天，暴力的巅峰因而被呈现为那些以单纯“技术”为特征的工具或器官的工作。我们要牢记马格丽特·撒切尔所作的声明：“没有任何替代方案”。

货 币

倘若这就是在新自由主义稳定计划及其危机当中的当下政治建构，那么很清楚各种抵抗运动就不得不表达它们的义愤、它们的拒绝、它们的反抗。因而出现了一种建立新制度的欲望，它可能符合合作性生产的社会力量。因此让我们返回我刚才所试图陈述的矛盾运作于其间的那些领域。

1. 在遭遇生产悖论中的关键在于，在越来越清晰、日益增多地重新占有社会生产过程中所雇佣的固定资本，恰好对抗金融资本所启动的增殖 - 捕获 - 私有化 (valorization-capture-privatization) 操作激增之际，返回到共产主义规划的一个旧观点，即工人与无产阶级的“自我增殖”(self-valorization) 观点。重新占有固定资本意味着建立“共同品”——一种被组织起来反对生活之资本主义占有的共同品，一种被理解为公民的和政治的“运用”或风俗的发展、并被理解为一种“从下面”进行民主而自主管理的能力的共同品。夺回知识与税收是目标，该目标首先界定认知性无产阶级 (the cognitive proletariat)。这个目标，以与下述情况完全相同的方式，从一开始就是政治的：反对削减相对工资的斗争——罗莎·卢森堡所谓“反对劳动力之商品性质，即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斗争”——对产业工人来说是政治的。再次引用卢森堡，“反对相对工资下降的斗争不再是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斗争，而是对这种经济的一种革命性、颠覆性的攻击；它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在意大利所拥有的经验，譬如，在有关最近公决——尤其是有关水管理问题——的战斗性鼓动中所拥有的经验，应当被再次抓住、研究并重演，以便重新占有这种被称为“共同产品”(common goods) 的新法律角色。

2. 让我们现在返回“财产悖论”(“paradox of property”)。倘若诸运动想要反对或超越私有财产，那么它们将绝对需要把自己沉浸于这个主要由各种服务和社会网络构成的矛盾环境中，该环境今天构造着生产性合作。与此同时，这是把自己同时地既放“在”公共权力制度“中”又“反对”公共权力制度的问题。两条主要线路因而相互交错：第一条应当反对那些正面对着重占斗争 (the struggles for reappropriation) 的公共权力之压迫性——惰性但激烈的——功能；第二条应当反对货币的角色和力量。

在第一个领域，打破新自由主义治理——譬如，在我们在所谓“技术专家治国论政府”那里所遇版本中——的能力是绝对根本的。我已经强调了这种有关这类政府的特性描述是一种神秘化的程度。但是我们也经常讨论是否可能想象出现某种“双重权力”（“dual power”），从诸运动关于公共治理问题发动的对抗出发；并且目前整个问题都仍未解决。然而，我怀疑它能以一种纯粹抽象的方式获得解决，外在于斗争的维度。正是在这一点上，恰恰有关围绕共同品使用主题（the theme of the uses of the commons）展开的斗争的强度，我们应当提出建议，一个涉及新制度原则、新权利和新合法性的建议：共同品，普遍收入，债务与资不抵债之拒绝，男人与女人的运动自由，知识的合作性实施，共同福利（Commonfare），和我们的通货之重点。我将在我的结论中回到所有这些观点上来。

让我们现在来谈我们的第二个主题：依据诸运动来挑战通货或货币问题。显然，即使通货作为衡量与交换手段难以根除，但仍有可能摧毁其下述能力：货币成为一种损害真正生产者的利益，构造社会劳动分工和雇主力量积累的工具。我们必须抗议欧洲央银的独立性：欧洲央行应当被征服以服从于“为了人并由人来生产人”（“to produce man for and by man”）这种需要，并被迫服从一种重新规定社会生命政治平衡的战略计划。问题更多地不是区别“储蓄银行”与“投资银行”问题，而是把储蓄与投资导向会确保为了人的人的生产那种平衡。这是经验最为丰富的政治运动正在发动的战斗。它存在于——没有意识形态忏悔的迟疑或行动——抗议与破坏生命权力的货币治理中；这就是，存在于无论何时有可能，就引进以激进民主方式表达的、从下而来的各种抗议和决裂中。我们必须从追问一种“共同通货”（common currency）能够是什么开始，并形成这样的假设：它应当确保社会再生产，每个公民所需的收入量，并支持那些构成生产性多众（multitude）劳动分工的结构本身的合作形式。

3. 让我现在返回最后一个“悖论”，把生命资本（bio-capital）与工人身体连接在一起的悖论。不消除资本家，就不能消解这个矛盾。资本家只要想获取利润，就免不了要剥削工人，并且，没有活劳动，无论是生产还是财富都不能继续有效。

因此这是政治领域之所在。从资本权力方面来看，它是就不可判定者（undecidables）所必须做出的各种决策的领域，带着人们在徒步涉水中总会碰到的某种不确定性，一条悬浮于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之间的横道。另一方面，这个领域

是由非凡而强大的机器 - 身体 (machine-bodies) 的总和构成的, 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对所有这些身体而言, 参与政治意味着“制度性地”建构民众, 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说, 把各类单一体 (singularities) 从其孤独中解脱出来并把他们设置于, 安顿于, 民众中——简言之: 把民众的社会经验改造成政治制度。^①

这是为何当前运动, 以一种日益激烈的方式, 要求我们超越 18、19 和 20 世纪宪政的现代性模型的原因——即那种一旦革命阶段结束, 就消除任何创建性力量 (constituent power) 痕迹的宪政模型^②。

以一种更加务实的方式, 我们今天必须确认相反观点: 这种创建性力量不能被封闭在 [限制性] 力量 ([constituted] power)^③ 之大一 (One) 的重建中。人们起义并非为了夺取政权, 而是为了维持反 - 权力过程的开放性, 为了反抗资本主义机器从未停止发明的捕获装置。斗争的经验教导我们说, 政治代表制总是通过进入危机而终止: 被卷入主权机制, 并经过我们极其熟悉的魔法般与腐臭的选举炼金术而被净化, 这种政治代表制从来不配工人阶级社会构成之不断更新的真理与财富。

自从 2011 年春天以来, 每一场运动都表达了渴望一种冲突性的“反 - 民主” (counter-democracy), 其间贯穿着抗议与示威、抵抗与义愤——因为我们不再能消化“规范的”宪政! 这些运动宣布它们要求生命政治的民主宪法, 这些宪法并未通过玩弄合法性与司法形式而立即把自己改造成压迫机制, 而是反而能通过“共同货币” (common money) 投资来工作, 以便不断再平衡社会关系, 并把穷人置于富人位置上——总之, 创造为人服务之人 (man in the service of man) 所想象的一种新的生活。

在此我们必须一清二楚地确认: 不管每位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说了些什么, 生产率增长都将只能实现于一个自由而平等的社会, 一个“拒绝工作”的

① 原文如下: For all of these bodies, to engage in politics means to constitute the multitude ‘institutionally’, which is to say in a way that wrenches the singularities from their solitude and situates them, installs them, in the multitude-in short: transforming the social experience of the multitude into a *political institution*. 此句中“which is to say in a way that wrenches……”语法似不通, 疑有疏漏, 现依据语境勉强译之。

② constituent power 在法学中通译为“制宪权”, 但在奈格里理论体系中却不能一概照此翻译, 否则难免不通。

③ constituted power 在法学中通译为“宪定权”, 但在此语境中显然不合适。方括号号为英译者所加。

社会——倘若我们以“工作”来理解它迄今为止所代表的东西：奴隶劳动，雇佣劳动。我们必须把劳动从它一向被封闭于其间的各种历史形式中解放出来。

斗 争

这场危机进展得愈深，诸运动愈成熟，人们就会愈发感觉到某种决定性的东西正在工人意识中产生出来。宣布 20 世纪已经结束，这是陈词滥调，尤其是当该措词被用来消除下述记忆时：有关工人斗争令人敬畏的经验与试验和建立新社会的尝试的贯穿那个世纪的记忆。这些尝试已然失败——不是一夜之间，而是精确地说，在一个世纪的进程中——，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它们的潜力已被穷尽。恰恰相反，“老鼯鼠”继续挖掘着希望。那么，我们必须恢复社会主义经验吗？是的，不过条件是我们把它嵌入一种新理论，置入一种新战略……这乃是诸新运动当下之所为。

让我们现在把我们的注意力返回到那些在危机中并为反危机而战的运动之所为。这是我们能够从事下述活动的唯一方式：进行一项有关正在这一语境中出现的主体化过程的研究，并试图理解哪些条件允许——哪些条件阻碍——一种共同品政治（a politics of the common）。

首先，那种在欧洲层面上所提出的对宪政改革的系统性依赖必定在此扮演着阻碍的角色。相反，诸运动感兴趣的是追问，什么政治行动能发挥作用，从而有利于那种同一种新的颠覆性与共产主义的计划相适合的主体化过程。

因此，当我们检视诸运动时，我们能够指出第一组的行动，这些行动可被聚集在一个共享标签之下：资不抵债（insolvency）。这些偏向公民收入而反对债务的斗争从事围绕相对工资的旧斗争，并在质疑劳动计量（the measurement of labour）范围内变成革命性的斗争。在相同领域，我们发现旨在建立一种“不稳定罢工”（precarious strike）理论与实践的整个实验和事业系列：这是理解哪些斗争能够在新的社会剥削条件下——从被强加于工人头上的不稳定性条件出发——“伤害”老板的问题。那些占取空间、地方、剧院、社会中心和空地，并把它们改造为组织场所的斗争完全属于这个系列，像那些试图阻碍商品 - 交换物流的斗争所做的那样，这种物流从未像今天一样对社会积累过程如此核心。那些阻止“公共利益大计划”的斗争也一样，——这些计划没有任何公共性可言，除了它们施加于文明与生态平衡上的巨大破坏性力量之外，

并且它们仅仅被用来方便腐败和私人赢利。

然而，更典范的——若有可能——是那些首创精神，它们成功地重占和 / 或共有化 (reappropriating and/or mutualizing) 对福利、教育、住房政策等等的基本纽带的管理。在此情况下，通过不仅把货币数量而且把社会平等也整合进工资中这种方式，斗争围绕着工人直接和 / 或间接工资而进行。

我们的斗争所处的第二个领域是废除 (deposition) 领域。这是取消资本主义控制渠道的问题。在新自由主义下，社会与法律的混乱已被视为正常。我们要通过把治理从诉讼环节改造为反 - 权力环节而自己承担起这种混乱：这是每一种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应当尝试去做的事情。我们在拉丁美洲看到各种革命运动的例子，这些运动现在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构造并最终主宰它们政府的议程。在欧洲重复这种经验颇为不易，但至少必须进行尝试，而不相信这种决裂能力可能被巩固在一种牢固的反 - 权力机制的形式中。在此，废除工作就创建性维度 (constituent dimension) 而言仍然突出。

有人会反驳说，这些运动徒劳无益，也许甚至会有危险，因为骚乱与动荡并不创造制度。但是，如果这些话语——当它们不是公开挑衅性的时候——暗中声称动乱与骚动不能创造制度，那么它们就并不诚实：再说一遍，这一切今天事实上并未发生，这仅仅是因为：仍然是废除工作才是预备性与主导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创造制度。

这些探讨与斗争的领域主要被指认在城市层面，在大都市中。过去劳动组织集中化工作落在工厂头上，而今天承担这一任务的正是大都市：正是大都市把合作性劳动——不管是否是认知性的——网络集中化，并通过它所给予的联系，提高了生产与斗争的张力与聚合的程度。所以，在大都市领域，我们在组织过程中发现愈来愈多的偶遇场所，战斗场所，物质与非物质劳动组织场所，劳动与非劳动场所，一种文化与各种文化场所（尤其归因于移民）——概言之：斗争在其中被组织、一般智力 (the general intellect) 产品在其中被重占的各种场所。那么，有可能开始建立各种自我管辖制度吗——这些制度可能使一种“新的相互性” (new mutuality) 的诸形式发挥作用，并让新的社会保护形式去对抗这场危机最猛烈的效果？在许多情况下，这是确实已经发生之事。而且，沿着这些我们可以规定为“密集的” (intensive) (这就是说，转向社会组织的内部) 开端因素，我们也必须试验一种“扩张的” (expansive) 装置，一种广泛的开端：只有许多欧洲国家各种动员的串联与接合才能对我们今天正

经历的危机政治产生一种实际而持续的效果。

最后，共有化（communization）。这是创建性首创精神发挥功效之所在。譬如，在意大利，诸运动试图沿此方向前进。从公有（the public）到共同品（the commons）：这条道路是确认有权使用共同品的权利之路，是努力实现当下萦绕于工人心头的追求共同品欲望之路。共有化意在建立新的共同品制度，尤其是“共同通货”制度，该通货将允许公民在完全自由条件下且带着对团结的尊重，进行生产。

在这一切之后，替代方案似乎显而易见。一方面有被捕获的生命—价值（bio-value），资本从整个社会榨取的价值，也有完全依据社会剥削来理解的生命—价值的货币形式，生命—价值的结构化。另一方面有革命尝试，要把劳动力量的潜能从资本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并把平等设定为一个自由条件。

在设想所有这一切因素尤其是那些涉及通货的因素中，我们已回到了我们由之出发的那个问题：有关欧洲，该做些什么？或更准确地说，诸运动关于欧洲应当如何行动？对我来说似乎绝对清楚的是，欧盟必不可少，不可逆转。一条在全球化中间缺乏大陆维度的政治道路是不可能的。有时诸运动本身似乎并不明白这一点。因而有必要建立新的团结模型，新的联结计划，它们能够聚集起来并跨越许多分散地域之间的差异——在此我并非仅仅想到旧的民族国家，而是想到当前诸运动的迥然不同的历史。斗争的紧迫性有此要求，尤其是在创建性力量主题变得核心之际。要完成这个议程，我们因而必须发展一种正在进行的研究调查或规划，一项消除了不断提供给我们的制度性欧洲的日历与选战的议程。今天这场讨论的关键无疑在于——在正是欧洲央行在当今欧洲以自己的方式把冬宫具体化的范围内——采取反对欧洲央行的行动。

译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三重运动？

——剖析波兰尼之后的危机政治学

南希·弗雷泽 / 文 彭玉峰 / 译

在许多方面，今天的危机很像 20 世纪 30 年代的那一场，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变》中对后者进行了描述。^① 就像那时一样，目前（1）一种无情的推动市场扩展和去监管化的力量在到处肆虐——破坏数十亿人的生机；造成家庭紧张，共同体削弱和团结的破坏；在全球范围内破坏生态和掠夺自然。（2）商品化自然、劳动和货币的尝试正在使社会和经济变得不稳——我们看到了生物技术，碳补偿，当然还有财政衍生物领域内的非法交易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它影响的是儿童关爱、教育和老年人福利。（3）结果是多向度的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和财政的，也是生态的和社会的。

另外，目前的危机似乎与波兰尼所分析的那一次拥有一个相同的特有的深层结构逻辑。它们都源自一个共同的动力，波兰尼称之为“虚拟商品化”（fictitious commodification）。在我们和他的时代，自由市场主义者试图将商品

① Nancy Fraser, A Triple? Parsing the Politics of Crisis after Polanyi, *New Left Review*, 81, MAY/JUNE, 2013. 本文更早的一个版本作为“卢森堡讲演”于 2012 年 11 月 22 日发表于柏林。我非常感谢来自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伯恩施坦基金会（柏林），人文科学研究会（巴登·洪堡）和“正义促进”高级研究中心（法兰克福）的支持。布莱尔·泰勒对本文也有贡献。——作者注

生产的所有必要前提都商品化。他们试图把劳动、自然和货币转变成“自我调节”的市场上可供销售的物品，即建议将这些生产和交换的基本要件与其他东西一样都视为商品。然而，事实上这一计划是自相矛盾的。就像一只咬住自己尾巴的老虎，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像他们的先辈那样，威胁说要侵蚀资本主义所依赖的那些必要支撑。这两次尝试的后果完全是可预测的：一方面是经济系统，另一方面是自然和社会的大规模的动乱。

鉴于这些结构上的相似性，许多目前危机的分析者回到波兰尼的代表作，或者把当前时代称为“第二次大转变”或“大转变的回归”^①便不足为奇。不过，当前的局势在一个关键方面区别于20世纪30年代那次：虽有结构上的相似性，但政治上的应对却明显不同。在20世纪的上半期，围绕着危机形成了一个波兰尼称为“双重运动”的社会斗争。正如他所见，政党和社会运动选择与一方或另一方联合。一方是支持市场去监管化和扩展商品化的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另一方是包括城市工人和农村地主、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内的的基础更广泛、跨阶级的战线，他们寻求保障社会以使之免于被市场所蹂躏。随着危机的加深，“社会保障”派胜出。在背景各异的新政下的美国、斯大林的苏联、法西斯下的欧洲以及战后的社会民主化中，政治阶级至少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让劳动、自然和货币在市场上自我调节会破坏社会。需要用政治监管来拯救它。

然而在今天，这一共识不存在了。至少在拉丁美洲和中国以外，政治精英都或明或暗的是新自由主义者。他们第一和首要的工作是保护投资者，几乎所有人（包括自称为社会民主党的人）都要求紧缩和削减赤字，而不管这些政策对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威胁。同时，流行的反抗运动没能联合于一个团结一致的方案，即便有激烈但短暂的运动，例如占领（华尔街）和“愤怒日”，但他们的反抗总体上缺乏纲领性的内容。而渐进式的社会运动显然维持的时间更长且组织得更好，但他们受零碎化所困扰而没能够形成一个连贯的反新自由主义计划。总之，我们缺乏一场波兰尼意义上的双重运动。^②因而，结果是一种

① 类似解释的数量相当庞大。例如 Michale Burawoy, 'A Sociology for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6, 2000, pp. 693-95 等。

② 针对今天许多的波兰尼主义者的过分乐观主义的有益的修正，参见 Michale Burawoy, 'From Pollyanna: The False Optimism of Global Labour Studies', *Global Labour Journal*, vol. 1, no. 2, 2010, pp. 301-13.

古怪的分裂。今天的危机似乎沿着波兰尼式的结构逻辑，即立足于虚拟商品化这一动力，但其却没有展现出一种以双重运动为特征的波兰尼式的政治逻辑。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分裂？我们怎样能最好地解释 21 世纪的显然是非波兰尼式的政治生态，且怎样评价目前的局势？为什么今天的政治精英没能支持一种监管性的计划，它旨在将（不牵涉社会和自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从失控的市场的破坏中拯救出来。为什么社会运动没有团结于一个反霸权的计划，其目的是保卫受威胁的生计、破裂的共同体和濒危的人类栖息地。原因是政治错误——领导力的失败、分析的缺陷或判断的失误吗？或者，目前政治斗争的态势在某些方面代表了对波兰尼所处情境的进步？抑或是它反映了对双重运动观念的薄弱处的来之不易的洞见？在下文中，我打算分两步来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我会评价一些被广泛引用来解释为何目前的政治生态背离于波兰尼的分析的假说。接下来，我将提出一种我认为能更好地阐述当前局势的替代性假说。这一假说要求我们修正波兰尼的双重运动观念，以在一定程度上能更好地澄清 21 世纪中社会转变的解放前景。

一、领导力的失败？

让我们从提问开始：为什么在 21 世纪没有双重运动？尽管存在明显有利的结构性条件，为什么没有旨在使社会和自然免于新自由主义之害的反霸权计划？为什么我们时代的政治阶级把公共政策制定权让给中央银行高管，又为什么他们的队伍中包含如此少的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更不用说社会主义者），而不愿意支持社会连带主义者的方案？为什么没有新的新政拥护者（贸易联合主义者、失业而生活不稳定的工人；女权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广泛联合？为什么没有“流行战线”坚持要求虚拟商品化应该付出代价，承受代价的将不是社会，也不是沦为污水坑的自然，而是那些贪婪积聚资本而加深危机的人？为什么如“愤怒日”和“占领”运动等创造性的反抗没能取得任何连贯的、持久的政治表达，这一表达能够对那些“财产罪犯”（富兰克林·罗斯福语）以及听从其吩咐的政府形成可信的挑战。

有一些解释被给出。其中最简单的是将双重运动的缺席归因为政治领导力的失败。这一假说肯定吸引了那些追踪美国总统大选的人。令许多人失望的

是，贝拉克·奥巴马被证明不愿意或不能够明确提出一种针对罗姆尼和莱恩的无耻的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性方案。例如，在2012年10月3日的总统辩论中，主持人向现任总统提出了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你对政府角色的看法与罗姆尼区别在哪？总统没能给出一个声音洪亮的回答，从他的肢体语言和语气中反映的犹豫以及回答时的窘迫都显出其回答的失败；可能需要一个精神分析师来填平这一失败。他说：“我当然认为有区别。联邦政府的首要角色是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但我也相信政府有能力——联邦政府有能力——去协助机会的开发并创造各层级的机会，且创造出美国人能赖以成功的框架……美国的精神是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以及人们能出来开创一段生意这一事实……但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所认为的，有一些事情我们一起来能做的更好……因为我们想要给所有美国人提供这些机会的门路，因为如果所有美国人都得到机会，我们都能变得更好。”^①

我们可以对比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6年连任竞选中的演讲，他大胆嘲弄了身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对手。从文字副本来欣赏富兰克林的演讲是不公平的——（体会不到）他在嘲笑对手的明显是错误的信念时的自信的讽刺和明显的乐趣：“让我来提醒你和提醒这个国家，光说不练是一种轻松的逃避。我们当然相信以下东西——我们相信社会保障，我们相信要帮助失业人员，我们相信拯救家庭。在胸前画个十字并发誓，我们相信所有这些。但我们不喜欢现政府完成这些事务的方式。请将这些事务交给我们。我们会全部做完，我们做的会更多，我们做的会更好，最重要的是，完成这些任务将不会造成任何人的任何损失。”^②

以上对比反映出领导力失败假说具有真实的解释力。一个克里斯玛式的人物确实能对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如果是由罗斯福而非奥巴马来主导，今天的双重运动的前景必将改善。然而，这并未能充分解释为什么在目前局势中没有双重运动。个人的缺点确实是一个原因。但奥巴马的不足并不是绝无仅有的。我们需要解释的是广泛的行为模式——精英中的政治凯恩斯主义者的全盘垮台。我们面对的是整个统治阶层的失败，他们没能制定出任何严肃的尝试来阻止即将发生的危机；因而不能局限在以个人心理为中心的假说。

① 参见2012年10月3日的总统辩论，来自YouTube，从1:09:25到1:10:35。

② 参见罗斯福：“让我来提醒你…（1936）”，来自YouTube。

二、劳动和金融化

所以，让我们转到一个更深层的解释，它关注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特征中发生的一次根本转变。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是从福特主义的积累制（依赖于工业生产）向后福特主义的积累制（由金融所主导）的转换。在波兰尼时代的福特主义资本主义中，劳动占据了中心地位，因为对劳动的剥削构成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主要动力。工业劳动者拥有相当大的势力：集中便利的组织和撤回劳动的威胁是一件强有力的武器。有组织的劳动构成一个有广泛基础的人民阵线的支柱，并作为调节资本主义并使社会免于放任主义所导致的分裂后果的先锋力量。^① 因而在结构上，工业资本主义为双重运动中的“保障派”提供了现成的选民和政治基础。

当下的资本主义的情形却是根本不同的。在目前的情形中，如有可能，资本主义宁愿绕开有风险的生产行业。通过简化积累循环，投资者在货币和新金融产品（它能使风险商品化）的买入和卖出中寻找利润——因而避免依赖于劳动，而劳动的地位又由于新技术而进一步削弱。因此，这必然导致劳动缺乏其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拥有的那种影响力。制造业转移到了半外围地区，工会成员急剧下降，罢工武器失去了其大部分力量（至少在北方世界）。同样重要的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理所当然的阶级分立结束了，它由于另一种似乎更突出的分立而变得模糊，即越来越少的工作稳定阶层与不断膨胀的不稳定无产者间的分立。在这种情形下，有组织的劳动不再能够替社会发言。在一些人看来，它保卫的是少数人的特权，他们享受了少量的社会保障而更广大的群体则没有享受到。

因而，由于结构上的原因，劳动在 21 世纪不能为双重运动中的“保障派”提供支柱。其它常见的继承者也不能：不稳定无产者或“多众”（multitude）具有数量上的优势，但其状况并不有助于通向组织化；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拥有资本所需要保留的东西。年轻人、农民、消费者、女人，不再是新阶级的符号工作者（后来以黑客和网络强盗的伪装出现）都尝试过却体现出其政治

^① Beverly Silver, *Forces of Labor*, Cambridge 2003; Goran Therborn, 'Class in the 21st Century', *NLR* 78, Nov-Dec 2012, pp. 5-29.

重要性上的不足。总之，金融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形成了通向波兰尼式政治动力的强大结构性障碍。它本质上产生不了能作为反霸权的先锋的同一的社会力量，更不用说任何指定的“掘墓者”了。

从生产向金融转换的假说提供了一些洞见，即当前时代阻止双重运动产生的那些有影响力的条件。但其未能捕捉到所有政治可能性的谱系。首先，这一路径没有考虑北方世界以外地区的劳动前景。其次，它没有超过官方的经济体系而面向社会生产的更广大领域，后者目前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一个主要阵地——在全球范围内围绕着教育、健康保险、住房、水源、污染、食物和社区生活的斗争。再次，金融化假说片面强调阶级关系作为政治斗争的唯一或主要基地，而没有关注目前作为动员的主要基础的阶层关系——可谓是当前抗争的主要话语的承认政治，即围绕着两性（gender）、性别（sexuality）、宗教、人种 / 种族和民族的有组织的斗争。最后，这一假说错失了纷繁的政治画面——居于结构和机构之间的声明发表的文法学；社会主体赖以体验、理解和评价社会条件的社会虚拟物。

三、框架（framing）危机

第三个假说关注的是自 1930 年代以来发生的另一个结构性转变。这一次发生转变的危机起作用的范围——因而转变中的框架需要加以解释。具体来说，重要的转变是从 20 世纪的危机剧情（国家术语下的框架，即需要领土国家采取行动）到 21 世纪的危机剧情（国家框架被削弱，但并未产生合理的替代者）。^① 在波兰尼的时代，现代领土国家无疑是社会保障的主要舞台和主体。双重运动中的保障计划的内容因而是清晰的：为了掌控国家经济，政府需要动员国家的财力，从而需要控制国家的货币。富兰克林在 1933 年当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实际上就是使美国脱离金本位制。这一行动使得与新政相关的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全部计划和纲领得以可能。并且，“二战”之后，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保障继续在国家框架内得以展开：把保障机构设定为政府，掌控的目标是国家经济；国家政策采用的手段有财政的、货币的和工业的；有资格受保障的

^① 关于国家框架的削弱，参见 Fraser, ‘Reframing Justi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NLR 36, Nov-Dec 2005, pp. 69-88。

范围包括全体国民。同样重要的是，构想出的民族共同体提供了一种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它使得保障计划在政治上可行，并能获得广泛的支持。^①

然而在今天，国家框架不再是理所当然。从“二战”的废墟中，美国引领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它立足于旨在将国际自由贸易与国家层面的政府监管相联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但这一妥协性形式在二三十年内就崩溃了。到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正越来越成为一个食利者国家；固定汇率体系漏洞百出，资本投资于国外，产生巨额主权债务，美国丧失了对其货币的控制且无力掌控其经济。另外，弱国家也失去了驾驭发展的能力，如果它确实曾做到过的话。由于长时期的殖民征服，加上独立后的其他手段的帝国主义掠夺，后殖民地国家从未拥有与那些核心国家相等的保障能力，这种不一致后来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政策而恶化。同时，作为一个经济和货币联盟而非相应的政治和财政整合而建设的欧洲，因没能创造一种更广泛的、欧洲范围内的平等，弱化了其成员国的保障能力从而没能跨越这一峡谷。证据在今天到处都是：希腊沦为被保护国；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被布鲁塞尔所统治；甚至在德国和法国，中央银行高层也给国内政策设限。结果是社会保障计划不再能在国家框架中被设想。既然眼下没有可供替代的选择，这一计划似乎就失去了其可信性。因而我们缺少双重运动的另一个关键前提。

“框架”假说为在 21 世纪发起一个反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的行动所具有的难度提供了真正的洞见。它关注国家在社会保障领域行动时的缺陷，其主要存在于诸如法国的排外运动和希腊的金色黎明运动等反历史的、倒退的形式中。但这一假说没能解释更广泛的、跨国家的方案的不足。为什么没有针对紧缩（政策）的全欧洲范围的运动？如果全世界的资本家组织起来去扩展市场的范围并使市场从国家控制中解脱出来，那为什么社会保障派没有组织一场对应的同等规模的运动。简而言之，前面所论述的所有假说都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对前三者的简单结合也不行：即便成功的阐述了心理、金融化和全球化，我们仍

① 当然，这一框架也是个“无框架”，因为它不包括那些有资格却“无国家”保障的外围国家；这些外围国家的市场陷入危险，他们的劳动力确保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社会供应。关于“无框架”，参见 Fraser, ‘Marketization, Social Protection, Emancipation: Toward a Neo-Polanyian Conception of Capitalist Crisis’, in Craig Calhoun and Georgi Derluguian, eds, *Business as Usual: The Root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Meltdown*, New York 2011, pp. 137-58.

没能抓住那偏离了波兰尼的论述的特有的政治动力。我们仍然想知道：为什么“社会”没有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以保护自己免于经济之害？为什么 21 世纪没有双重运动？

四、解放：消失的第三维

当一个问题顽强地抵抗持续的讯问，便值得我们去思考它是否被错误的提出。当我们问为什么 21 世纪没有双重运动，我们重复了一个熟悉的反事实的提法——为什么在资本主义核心的先进工业国家中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在此处问题是清楚的：我们因为关注缺席的而忽略了现存的。不过，通过对《大转变》出版后数十年间真实存在的社会斗争的文法检测，我们是否能设想以一个更开放式的方式来重新提出我们的询问？

有鉴于此，让我们考察社会斗争的庞大阵列，它们都没有在双重运动的规划中占据任何位置。我思考的是那场爆发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且在随后几年迅速蔓延到世界范围的解放运动：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战运动、新左派运动、第二波女权主义、LGBT^① 自由运动、多元文化主义等等。这些运动通常关注承认胜过重新分配，因而对战后时代在福利型和发展型国家中制度化的社会保障形式高度不满。通过向在社会规定中编码的文化规范投以苛刻的目光，他们揭示了不公平的社会等级和社会排他性。例如，新左翼揭露了官僚组织形式下的社会保障的压迫特征，它剥夺了社会受益人的权力，将市民变为雇员。反帝国主义和反战活动家批评第一世界中社会保障的国家框架，它建立在被排除在外的后殖民地人民的辛苦之上；因而，他们发现了“无框架”（mis-framing）保障的不公平性，即保障通常在（发达）国家内组织，而带来的风险却常常是跨国家的，前者与后者的作用范围不匹配。另外，女权主义者揭示了以家庭工资和男性主义视角下的工作和贡献为前提的保障的压迫特性，展示出被保护的只不过是男性统治的社会。LGBT 活动家揭开了以限制性的、异性恋规范上的家庭定义为立足点的公共规范具有的不公平特性。争取残疾人权利活动家揭露了以正常人为标准的机动力和能力下所建立的社会环境的排他性。多

^① 指 Lesbian（女同性恋），Gay（男同性恋），Bisexuals（双性恋），Transgender（跨性别者）的简称——译者注。

元文化主义者也揭示了社会保护的压迫性，它以多数人的宗教或民族文化的自我了解为条件而不利于少数人团体的成员，等等。

每一个运动都批评了拥有社会保障的伦理实体的一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永远地剥夺了“保障”这个术语的无辜性。意识到工资能够作为反对基于地位的统治的资源，这些运动自然而然对那些理想化保障而妖魔化市场的人高度警惕。由于需要反对保障的途径，他们最重要的目标不是保卫社会而是克服统治。然而，解放运动并不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尽管脱离了“社会”的行列，他们并不因此就成为“经济”派。认识到市场化带来的更多是功能重组而非统治的消除，他们本能地怀疑那些将自我调节的市场作为灵丹妙药兜售的人。他们对市场化的推进保持谨慎，在宽广的视野下认为契约自由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作为解放的手段。

大体上，战后的社会运动不符合双重运动的任何一极。她们不拥护市场化或社会保障，而是支持我称之为解放的第三维的政治计划。这一计划在波兰尼的论述中被遮蔽，它需要在我们澄清 21 世纪的社会斗争的文法学努力中被给予中心地位。因此，我建议通过不同的论述方式来分析目前的态势，我称之为三重运动。类似于波兰尼的论述，三重运动是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斗争的文法学的一个分析工具。不同于双重运动的是，它描述了市场化的拥护者、社会保障的信徒和解放派之间的三个面向的斗争。我在这里的目的不只是简单地强调包容性，毋宁说是要把握这三种彼此的计划相交汇和冲突的政治势力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三重运动展示了如下前景，每一种势力在原则上都能与其他二者中的任何一个相结盟以反对剩下的那个。

五、政治矛盾心理

提出三重运动就是要假设其三极中的每一极的内在矛盾心理。我们已经看到，与波兰尼所说的相反，社会保障常常是矛盾的，在从市场对共同体的分裂后果中解脱出来的同时，却造成了共同体内部及其之间的统治的确立。而其他两极也是如此。市场化可能确实有波兰尼所强调的那些消极后果。但正如马克思所肯定过的，它也能带来积极影响，即在它所要消解的保障作为压迫性力量的领域内——例如，当消费品市场被引进官僚机构控制的经济，或者当劳动力市场向那些被排斥的人们开放时。重要的是，解放也不能免于矛盾心理，因

为其产生的不只是解救而且包括现存的团结结构内部的张力。即便当解放克服了统治，它也可能导致社会保障的团结一致的伦理基础的消除，从而为市场化扫清道路。

看来每一极都既有其本身的目标又有导向矛盾心理的潜能，这又通过其与其他两极的相互作用而得到强化。因而，与波兰尼相反，市场化与社会保障间的冲突脱了解放就无法理解。而同样，保障与解放间随之而来的冲突离开居于二者间的新自由主义的力量也不能理解。因而能对解放运动做出一个类似的批判。如果波兰尼忽略了为解放而奋斗对市场化和社会保护间冲突的影响，则解放运动通常也忽视了市场化计划对其与保障主义力量间斗争的影响。

我们看到解放运动对战后压迫性的保障提出了挑战。在每种情况下，某个运动揭露了一种类型的统治并提出了解放的要求。然而，这些要求也是内在矛盾的——他们在原则上要么站在市场化一边要么站在社会保障一边。第一种情况下，即解放与市场化结盟，这侵蚀的将不仅是社会保障的压迫性向度也包括其团结基础。第二种情况下，即解放与社会保障结盟，这将使得伦理实体向加强保障转变而非保障被侵蚀。

事实上，所有这些运动都包含了保障主义和市场化倾向。在任一情况中，自由派被吸引到市场化的方向，而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派更愿意为了实现社会保障而结盟。然而，可以说，解放的矛盾心理在近些年得以消解而有助于市场化。由于未能充分理解自由市场力量的崛起，解放斗争中的主流已经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一个“危险的联合”，为一种新型的资本积累提供了一部分的“新精神”或克里斯玛式原理，美其名曰“灵活”、“相异者的友谊”或“从下层激发创造力”。^①结果是解放对压迫性保障的批判与新自由主义对保障自身的批判相联合。在三重运动的竞技场，解放与市场的力量相结合而夹击社会保障。

我们终于开始认识到 21 世纪政治游戏的真实状态。在目前的联盟中，有恃无恐的新自由主义派借用解放运动的权威来获取力量。它将自己塑造为一次起义，采用解放的声调以谴责社会保障对自由的束缚。同时，泄气的保障主义派努力去除其被解放运动所曝光的统治性这一污点。它萎靡不振、处于守势及

^① 关于女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危险联合，参见 Fraser, 'Feminism, Capitalism and the Cunning of History' and 'Feminist Ambivalence and Capitalist Crisis', both in Fraser, *Fortunes of Femi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2013。

缺乏坚定信仰，无法生成浪漫的、反霸权的愿景从而不能促进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行动。最后，解放派发现自己也身处险境。它在其他两极之间徘徊，它的主流不断地在中线间来回游荡，这条中线将以下两方面相分离：一方面是对压迫性保障的有力批判并使得劳动力市场路径的要求合法化；另一方面是非批判的信奉精英统治式的个人主义及私有化下的消费者主义。

六、重思危机政治学

通过澄清以上情况，三重运动强调了在建立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反霸权计划的努力中所面临的特有政治挑战。从剖析真实存在的斗争领域出发，它开始关注声明发表及社会虚拟物的文法学，它们居于政治行动者的反应与其所处情形之间。这种政治性的关注使得我们之前所考察的那三个假说更丰富和完整而非使之无效。最重要的是，它澄清了以下过程，即社会民主党精英的消沉，新自由主义被赋予权威后使其霸权得以可能，解放的力量的削弱和分散。同样重要的是，三重运动提出了对目前的政治斗争状况的一种后波兰尼式的评估。它暗示我们不需要哀悼双重运动的缺席。而无论解放的兴起使得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变得多么复杂，它都代表了一种进步。另外，回到对社会保障的等级式的、排他性的和共产主义式的理解已不可能，其清白已经被永远地击碎了，也确实应该如此。从今往后，离开了解放就没有保障。

同时，三重运动显示出有必要使解放计划复杂化。这一分析通过揭示后者的矛盾心理，指出在这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名称之下，并非所有解放都是好的。毋宁说，任何想靠冲动来克服统治的计划都在其与其他相交叉的计划（尤其是市场化和社会保障）的历史性抗衡中被塑造。打上了契约、精英统治及个人进步等幼稚信念色彩的解放计划将很容易扭曲为其他结果，这也是目前所发生的情况。然而，一个有效结合了对市场的大规模拒绝的解放计划则会把不可或缺的自由理念割让给自由市场主义者，这也将抛弃全世界的数十亿人，他们正确地认识到比被剥削更惨的是被视为没有剥削价值。总之，离开某种市场化与社会保障的新型综合就没有解放。

最后，三重运动为我们这些仍然忠实于解放的人提出了一个政治计划。我们可以下决心去断开我们与新自由主义的危险联合，并且与社会保障锻造出一个原则上新式的联盟。通过重新与三重运动的几方面的联盟，我们能综合以

下两种利益，即在反统治上的长期利益与团结和社会保障上同等重要的利益。同时，我们能从新自由主义收回消极自由及其带来的必不可少的利益，这一自由是后者所热衷的。随着对社会正义的更宽广的理解，这样一个计划就能立即对波兰尼的洞见表示敬意并且治疗其盲点。

译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新的群众？

——反抗的社会基础^①

戈兰·瑟博恩 / 文 郑端 / 译

[编者按] 近几年来，我们在印度、土耳其、巴西目睹了一个接一个的突发性群众冲突。从街头抗议满地开花的巴尔干地区——从萨格勒布、萨拉热窝、索菲亚，到上个月亚努科维奇被赶下台的乌克兰。吊诡的是，公众的愤怒并没怎么发生在受经济衰退打击的北方中心地带，而是发生在新资本主义第二世界和经济理应快速增长的金砖国家及新兴经济体之中。尽管实行了近乎挑衅的倒退紧缩政策和金融救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面对的群众反抗却十分弱小。对这一现象，理由的阐释和理解的升华仍有待时日。不过，答案肯定与此有关：1990年以来，工会工人这一历来与资本对立的群体逐渐被边缘化。那么在东方和南方^②，又是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和政治活动在起作用？在《新左翼评论》第78期中，戈兰·瑟博恩（Göran Therborn）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对全球阶级图景的调查，检验了发展中国家中“新兴中产阶级”的真实情况。在这期的内容当中，瑟博恩分析了以下六个从属阶级的反抗潜力：前资本主义的原住

① Göran Therborn, NEW MASSES? Social Bases of Resistance, *New Left Review* 85, January-February 2014.

② 文中多次出现了南方和北方，这是在全球意义上的一个区分，我们基本可以将其理解为南方的发展中国家和北方的发达国家的区分。——译者注

民和农民力量、“多余者”、工厂工人、工薪中产阶级。那么，在什么样情况下，这六大板块人群将实现联盟？正如土耳其和巴西针对公共空间和服务商品化的防御性的抗议活动，或者乌克兰、马格里布、马西利格对腐败，压迫性政权导致的群众不满一样。在巴西，公交车票上涨点燃了2013年6月的全国抗议。安德烈·辛纳（André Singer）探讨了这些抗议活动背后的社会政治局面，在街头找到了不同阶级的合流：下等社会阶层的年轻人和“新无产阶级”——据一位“免费搭车”运动的组织者描述，这是一个由“极大量”在电子商务工作、拥有大学文凭、以及被通胀冲击的中产阶级组成的抗议者群体。这些新抵抗运动的同志们能为这场斗争带来怎样的政治效应？此类运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90年代的另类全球化运动——那些席卷恰帕斯、西雅图、热那亚、阿雷格里港的运动，可可种植者运动和包围运动等在拉丁美洲的活动，以及二十一世纪早期的颜色革命（当中有些有西方大使馆的暗中支持）。但如同辛纳描述的，在巴西和其他地方的抵抗运动中，右翼和中间派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随着未来反抗浪潮的展开，勾勒出这些冲突矛盾的轮廓是接下来的一项中心任务。

若想要使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政治上有任何意义，就必须拥有或找到一个社会基础。从19世纪到20世纪，最明显的批判被称为“工人问题”，因为其群众基础可以在兴起的工业工人阶级中找到。这不仅是新兴的劳工组织和他们偶尔的自由主义同情者们的的问题，也是保守派的问题；甚至法西斯主义者——工人运动最暴力的敌人，也以此为模型来塑造他们的组织。工业工人将自己的中心地位一直保持到了70年代。在此过程中，在民族解放及反对帝国主义“依附发展”等议题的带动下，在反殖民运动的浪潮中，反资本主义斗争获得了更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然而，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北半球的去工业化停止了，逆转了工人运动的前进步伐。至此，生产力的社会化属性和私有制的冲突这一“宏大辩证”被悬置了。同时，与一度很有影响力的依附论相反，南方一些主导国家工业化的成功，大体上意味着亚非拉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在是可行的。那么，如今是否有哪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可以在功能上等同于20世纪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或者反殖民运动？显然，现在并没有可见的群众反资本主义阶层——在过去150年的背景下，这对资本主义来说是个十分新奇的情况。然而，如果我们不去寻找反资本主义运动，而去寻找那些有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运动的潜力的群众形态的

话，就能发现一些重要的社会力量。我们可以分辨出四种不同的类型。

来自边缘

第一种潜在的批判性社会力量是由那些抵抗大公司入侵的前资本主义群众组成。这里的主角是那些新近被赋权的（empowered）原住民们。在美洲安第斯山脉附近和印度，他们是重要的政治力量，但也出现在南半球大部分地方，并且开发了自己的国际网络。他们既缺少人数，也缺少资源，只能在自己的所在地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们的斗争可以与更大范围的反抗批判运动相链接（articulated）。现在，他们已经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玻利维亚，他们是其难以驾驭的执政联盟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印度，他们也处在大规模暴动的核心；在这两个例子中，他们都是被劳工运动传统中的组织者组织起来的——在玻利维亚是失业社会主义矿工转行的可可种植者们，在中印度则是毛主义的专业革命家们。后者近期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但他们并没有被击败或者消灭。在墨西哥，萨帕塔们仍然占领着恰帕斯的拉坎冬地区。但是，这种动员是矛盾的：在共产主义者统治的西孟加拉，农民们为了保卫自身的土地而反对工业发展计划，他们阻止了一次社会主义的转向并推动了一个右翼政权上台。

第二种潜在的批判性社会力量，很大程度上是超资本主义的批判力量，他们是由数百万失去土地的农民、非正式劳工和街头商贩组成；他们构成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很多地方数量巨大的贫民阶层（他们在发达国家的对应者可能是越来越多在就业网络以外的、被边缘化的年轻人，不管是本地人还是移民）。他们成为潜在地动摇资本主义的重要源泉。这些阶层积累的怒火和暴力经常是爆炸性的，有时会特别剧烈，小到暴乱抢劫，大到种族屠杀。然而，这些“全世界受苦的人”也被卷入到反对遣返和获取水源电力的斗争中；他们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以及在希腊、西班牙、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这些沿北地中海、黑海海岸国家发生的反紧缩反政府抗议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何种条件下，这些力量能够与某种可行的社会—经济替代选项相连接？显然，任何这样的批判性替代选项必须直接回答他们最基本的顾虑——他们的存在性集体身份和生存方式。为此，就必须发展出能够深入这些民众阶层的传播模型，产生有人格魅力的领导人，拥有广泛的人际和电子传播网络。由于城

市人口特别难以被组织起来，如果没有一个导火索事件，这些潜在的批判性力量就难以投入到行动中，而这导火索事件的性质却难以预计。

当然，即使已经在地理上被重新配置，资本主义薪酬工作的日常辩证法仍然存在。北方的剩余的工业工人阶级仍然太无力，难以对资本主义构成任何挑战；但紧缩和资本主义的攻势仍能点燃小范围的抗议。尤其在法国，2010年劳工组织威胁要妨碍石油供给，2012年炼钢工人则占领了厂房。中国、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新制造业工人也许拥有一个更佳立场来提出反资本主义需求，但是他们的立场被巨大的劳动力储备削弱，而且他们也已经在被更为碎片化的服务部门就业形式所替代。从尼日利亚到印度尼西亚，组建工党的反复尝试都失败了；过去30年来唯一成功的只有巴西劳工党。韩国和南非都有以工会为基础的重大劳工运动，但他们缺乏明确的政治诉求：南非工会被非洲民族会议的统治阴影所笼罩，韩国的运动则被鸡毛蒜皮的党派之争所破坏，在2012年末，一个组成统一左翼政党的完美计划被推翻。虽然南方的阶级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薪金上涨、从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原本极为恶劣的工作环境等等，但这些成就看似很难发展成一个更为系统化的挑战。特别在东亚，工业资本主义正在生产出更高层次的消费，这是缓慢发展的欧洲经济体经历了长得多的时间才达到的程度。的确，越南和中国的共产党执政意味着反资本主义的转向不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如果尝试的话，也是可行的。然而，如果此事要付诸实施，则需要停止经济增长，也需要有效的工人阶级动员来反对系统产生的巨大的不平等，而这威胁到了社会“和谐”或者社会凝聚力。这可以想象，但至少在中期看来可能性比较低。更有希望的也许是将关于住房、医疗、教育或者工作场所的斗争和社区斗争连接在一起。

白领群众

第四种潜在的批判性社会力量可能正在金融资本主义两极化的辩证法中产生出来。中产阶级，关键在于其包含了学生，在2011年的西班牙、希腊、阿拉伯马什雷克、智利的运动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同时，在北美和北欧相对较弱的占领抗议，以及2013年土耳其和巴西的抗议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抗议活动的爆发让中产阶级和广大年轻人走上街头，有时还有他们的父母，来反对腐败的、排外的、社会两极化的资本主义系统。虽然2011年两个

政权被推翻，他们却并没能动摇资本的权力 / 力量。然而，他们也许会被证明是后续上演剧情的最后演练。关于新中产阶级的讨论在过去十年里像雪崩一样愈演愈烈。在亚非拉国家，就其自身而言，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是必胜主义——而关于东欧的话语则通常更为谨慎，他们宣扬大众市场的来临，其主体是有偿还能力的消费者。不管正确与否，阶级话语总是在社会层面上有着显著的影响，而中产阶级话语的全球性激增是 2010 年值得注意的症状。大部分情况下，这并不指向某一种批判性的社会辩证法；恰恰相反，这通常是在为消费主义的胜利喝彩。工人阶级（这个字眼）正逐渐从中国和越南的文件中消失，而在德国为首的欧洲，一个“企业家社会”的理想取代了 20 世纪中期的“工薪阶层社会”的自我形象。政治评论家普遍将中产阶级看作“坚实”的经济和自由主义民主社会前途无量的基础。然而，一些深思熟虑的经济学家，特别在巴西，着重强调了“中产阶级性”的脆弱和其大多数人随时面临的贫困的风险。相比之下，美国盛行的语调则是对中产阶级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下降的担心。西欧并没有遵循同样的模式：相较美国或亚洲，哪怕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相比，中产阶级的概念在西欧一直比较被限制，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已经确定其话语的在场。在欧洲之外，中产阶级的新概念包括了从非常贫穷到非常富裕之间巨大的人群，而这里贫困线的标准经常设定在每天收入或支出 2 美元、4 美元或者 10 美元，而中产阶级的上限则仅仅排除了那 5% 或 10% 最有钱的人。

与产业工人阶级相对，“中产阶级”这个不规则的集合并不代表特定的生产关系，也不包含除了任意消费之外的特定的发展倾向。然而，不管如何定义，中产阶级——或者其中大部分——已经展示了其可以成为重要政治行动者的能力，它也随着产业无产阶级的削弱或去组织化而显得更为重要。南方崛起的中产阶级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因为他们在决定政治选项时变得十分关键。

恰恰因为中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定位模棱两可，所以他们的力量可以用在不同的方向，甚至完全相反的方向。被动员起来的中产阶级是智利皮诺切特政变背后的重要力量，而在 2002 年，委内瑞拉的中产阶级则无法推翻查韦斯政权，而 6 年后，曼谷富有的“黄衬衫”们则将泰国当局赶下台。如同二十世纪欧洲历史展现的那样，中产阶级不是民主的内在力量。但是，它也是推动民主变革的动力之一。比如在 80 年代，中产阶级同产业工人一起，在台湾和韩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1989 年的东欧也是如此。中产阶级在 2011 年的开罗和突尼斯是中心力量，在 2011 年到 2013 年的希腊、西班牙、智力和巴西则是群众

街头抗议的支持者。中产阶级政治的反复无常在埃及抗议的急转弯中展露无遗，从对民主的欢呼到对军队以及对异己的不断压制的谄媚，除了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中产阶级在实际上容忍了旧制度的复辟。

但是中产阶级也能够在竞选制度中展现他们的批判性介入。拥有和一个中等大小欧洲国家一样多的人口，墨西哥城在 2012 年选出了一位连续四任的左翼市长。这位成功的候选人，米格尔·曼塞拉，赢得了大约 64% 的选票，这意味着一个包罗广泛的民众集团。在印度，平民党（AAP）的轨迹仍尚未确定。平民党及其领导人阿尔温德·凯杰里瓦尔的叹为观止的前进步伐源于一个新奇的联盟，它将反贪污的中产阶级抗议者和获取水资源及其他公共服务等一系列能够造福更广泛阶层的提议连接在一起。这个新政党横扫了枝繁叶茂的新德里，以及十二个“表列种姓”选区中的九个，在 2013 年底掌控了首都政府——而仅仅 49 天后就匆匆下台，因为其在立法抑制贪污上的努力由于缺乏中央政府支持而被拖延。印度尼西亚一位改良主义候选人约科维，在 2013 年赢得了雅加达州长，面对地方机构和一个恶毒的宗教宗派主义的竞选运动——他选择的竞选伙伴是一位华人基督徒。他的纲领是扩大教育和医疗服务，同时推行“企业家精神的城市化”。在此，阶级联盟的力量和有效性，即他们为大众（popular mass）带来可见的进步的能力，仍然需要进一步检验。

批判性的主题

自从布雷克将其谴责为“黑暗的撒旦磨坊”以来，资本主义，特别是工业资本主义，一直是文化批判的主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系统无视这些批判而安然前行，但是“1968 年”将这种无忧无虑的状态画上了终止符。那一年所代表的运动并没有对资本主义造成太大震动，但对其社会关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首先，渐渐削弱父权制和厌女标记，视制度性的种族歧为非法，逐渐削弱差别和层级制——简单来说，提升生存的平等，特别是在欧洲和美洲。然而，这些文化变迁大部分都通过如下方式被先进资本主义所吸收，如高科技企业的非正式化、女性 CEO 的激增、同性恋权利和同性婚姻的主流化、“波西米亚式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形象等。

那些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批判的运动，要么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和规则，要么假设出另一种生活方式。就历史视角而言，关于限制的最重要

的论据着重强调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带来的对社会凝聚力的威胁。晚近的视角是环境问题，随着工业化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后果越来越无法控制。在新的选项当中，社会主义已经不那么相关，但是仍然能分辨出来一些不同的版本，（它们）更接近于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而非 20 世纪的工业社会主义。目前，至少在胚胎之中，可以分出两种这类的运动，它们都提供了一个在生活质量上优于资本主义的承诺。第一种运动，在德国得到较为清晰的表达，始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并重视“后发展”。第二个运动提供了一个地理——社会选项，其力量来源于非资本主义的南方。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两种运动。

首先，相对于他们前一个世纪的同仁来说，社会凝聚力对于今天的统治精英来说已经远非那么重要了。征兵大部分被雇佣兵所取代；大众媒体让国内选举变得“可控制”；流行的经济智慧相信，相比于发展的同一性来说，国际投资者感情更青睐经济增长。对于北方的精英们来说，凝聚力更有可能意味着，以“融合”之名让移民更好同化的压力。的确，欧盟官方对社会凝聚力有所担忧，但实际上它主要被视为一个资助贫穷地区发展计划的地理概念。在最近的危机当中，随着对南欧民众强制执行严苛的紧缩政策，官方并没有对社会排斥的上升有太多顾虑。显然，国家凝聚力不再被视为帝国权力的核心——就像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明治时期的日本开始自上而下的革命，以及从中国清朝到奥斯曼帝国进行的不那么成功的尝试，都将国家凝聚力看作是现代地缘政治力量的基础。在“二战”以后，发展有凝聚力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日本的民选统治者的目标，也是台湾和韩国的军队统治者的目标，结果是造就了这样一种工业社会，其经济不平等水平之低，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欧洲的福利国家。对于中国来说，社会凝聚力仍然是政治表现的一项决定性指标。

尽管如此，社会排斥，不平等和错位（dislocation）仍然是自下而上的批判的潜在的基础，就像过去几年不断复发的抗议活动所展示的那样。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完全被资本的逻辑所囊括；它仍然包括非资本主义的地方，包括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目前，资本主义下定决心要入侵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对所有（目前还是）公共的东西进行限制，有必要的话，甚至会将它们消除。这些入侵产生了一个个对应的保护公共的或者非商品化的领域的抵抗运动。最近这种类型的抗议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有所扩散：智利和拉丁美洲其他地方反对高等教育私有化的运动，土耳其反对伊斯坦布尔公共空间的商业化运动，以及瑞典的较为沉默但仍然十分广泛的对学校 and 救助服务市场化的

厌恶。

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和新自由主义对任何关于公共利益或社会责任的概念的削弱，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机会。甚至在那些以前拥有很强的公共服务风气（ethos）的国家（虽然现在这点是被斥责的），比如瑞典，可疑的公私商业协定已经变成地方病了。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越南，大规模的贪污是系统化的，在这些国家进行的反腐运动十分常见，但却效果不大。有时候程度会严重些，比如在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上明目张胆的洗劫之后，2011年由安纳哈扎尔发动的德利抗议，最终变为印度的平民党（AAP）。反对腐败和商业剥削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的防御性运动很有可能会增加，既因为群众的怒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因为现在的公民更为趋同，更有知识，也更易被社交媒体动员起来。2013年的土耳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然而，除非他们落入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政治配置当中，上述抗议，以及对负债和住房驱逐的抗议，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系统的范围之内。

环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20世纪80年代被组织成为社会运动，现在仍然具有很大分量。值得讨论的是，气候变化、城市污染、掠夺海洋和水资源的耗竭等生态问题的挑战，又重启了马克思式的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和现有私有财产关系的产生危机的性质，这种辩证法在北方由于南方的去工业化和金融资本主义的胜利而被悬置了。这种批判的影响大概会依赖于它是否能够发展出一种集体的管理责任，而又避免一种牺牲性的非增长的要求。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中国城市——包括北京，这点令人叹为观止——以及亚洲其他城市中心的灾难性的污染。在中国，污染也在毁坏大面积的可耕种土地。通过提出对公共管理的呼吁，环保主义可以与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金融的批判相连接。我们没怎么看到这种联盟提醒我们北大西洋左派的软弱——更不用说尚未受到质疑的中国对经济追赶的沉迷。

对消费主义的批判可以采取一种新时代的形式。“1968”是一个年轻人的运动——“别相信任何超过30岁的人”。在2011年地中海和智利的抗议中，或者2013年6月巴西的抗议热潮中，年轻人的父母通常都会加入他们。发生于二十一世纪伊始的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的巨大危机，产生了一系列充满活力的退休人员试图保卫他们的养老金的街头抗议。一种批判性的运动可以从欧洲和日本的老年人中产生出来，特别是经历过“1968”的那批人。这些抗议主要关注生活质量——宁静，安全，审美——而非经济增长和资本累积。但目前为

止这种潜力并没有很多实证的存在。也许除了在普拉塔地区和少数原住民们那里，它很难在日本和欧洲以外有很大推动力。消费主义仍然极有可能是具有原则性的文化动力。

全球南部对于北大西洋资本主义的批判，通过世界社会论坛（WSF）运动得到了清晰的表达，并在葡萄牙学者博阿文图拉·德·索萨·桑托斯的著作《南方的认识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这种批判很有可能会由于全球权力的地缘政治转移而获得更多的影响力；但也有可能遇到不限于北方精英的根深蒂固的抵抗。消费主义正在吸引南方广大的社会阶层，在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购物中心里对其顶礼膜拜。桑托斯等人开启了一个能够动摇北方的文化自大的批判空间。他们的问题是，他们主要处理北方的现代派信息中失落的東西。世界社会论坛运动将南方看作是大西洋资本主义的一面镜子，然而现在这面镜子也很有可能合并到北方的批判思想之中，而且也理应这样。

总 结

前资本主义群众，在为保持他们的领土和生存手段而斗争；“剩余”大众，被从资本主义正式就业的生产回路中排除出去；锈带和阳光带被剥削的生产工人；不断被金融企业的债务所拖累的新旧中产阶级，——他们组成了对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秩序进行现代批判的潜在的社会基础。若要取得进步，肯定需要他们之间的联盟，继而需要对他们各自的顾虑进行互相链接（interarticulation）。不管哪种方式，亚非拉新中产阶级的转向会是重要的决定因素。

在 19 世纪的欧美，崛起的中产阶级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先锋；而今却非如此。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早就夺取了这个角色。相反，中产阶级在这个极度两极化的社会中必须要表明立场，或者站在反对穷人的寡头一边，或者站在反对寡头的人民一边。任何对 21 世纪资本主义的可行的批判都必须获得大部分中产阶级的支持，通过表达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并在一个批判性的、平等主义的方向中结合起来。这需要尊重典型中产阶级的价值——努力工作，自力更生，理性和公平。需要被清晰表达的是他们关注的问题与大众对包容和平等的需求的兼容性，以及其与不计后果的金融精英、裙带资本主义以及贪污或极权政权的不兼容性。中产阶级——特别是他们中的工薪专业人员部分——也潜在地向资本主义文化批判开放，特别是环境和生活质量方面的顾虑。然而，考虑

到中产阶级政治的变化无常，任何进步的转向都需要动员前面提到的头两种大社会潮流中的大众力量：被入侵或者被驱逐的前资本主义群众，以及在生产空间中保护自己的工人。

译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对“马克思的正义观”的几种阐释方式的反思

——从伍德式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说起

林进平

[摘要] 不满足于伍德式的“马克思的正义观”——正义属于意识形态，正义在于合乎其所属的生产方式，英美学者提出了另外三种不同的诠释方式：(1) 马克思不仅有唯物史观上的正义观，而且有价值观上的正义观；(2) 马克思批评的是意识形态的正义，信奉的是非意识形态的正义；(3) 从人的需要的视角来探索马克思的正义观，乃至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这三种不同的诠释方式虽都具有各自的解释力，各有取舍和创新，但也各自存在着一些理论难点：第一种在正义问题上陷马克思于“似是而非”的理论境地；第二种指认马克思具有非意识形态的正义观缺乏有力的文本支持；第三种已有的论者语焉不详，文本支持也不是特别充足。不过，相比较来说，第三种却是富有理论前景的诠释方式，它不仅合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理路，而且创造性地吸纳了其他诠释方式的优点。

[关键词] 马克思 正义 道德 需要 历史唯物主义 意识形态

不满意于艾伦·伍德的“马克思的正义观”^①的论断，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②英美学者纷纷对“马克思的正义观”做出新的阐释。^③本文将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三种阐释方式做一述评和反思。

一、阐释“马克思的正义观”的三种方式

1. 马克思不仅有唯物史观上的正义观，而且有价值观上的正义观

持此观点的主要是那些认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为非正义的学者，这些学者主要有齐雅德·胡萨米、G.A. 柯亨、艾伦·布坎南和 R.G. 佩弗等人，胡萨米堪称此类观点的典型代表。胡萨米认为，伍德把马克思唯物史观意义上的正义观与价值观意义上的正义观混为一谈，或者说否认了作为价值观意义上的“马克思的正义观”。在他看来，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审视正义所形成的观点并不等于作为价值判断意义上的“马克思的正义观”。他认为，如果像伍德那样把马克思所说的“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就是正义的，不相适应的就是不正义的”理解为马克思的正义观，那马克思便成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资产阶级的辩护者，也自然得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论断。在他看来，理解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不仅要意识到正义受制于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且要意识到在同一生产方式之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对正义有着不同的理解，且

① 伍德关于“马克思的正义观”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三点：(1) 正义是意识形态，马克思不会以正义批判资本主义，也不会以正义来设想共产主义社会；(2) “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表述了马克思的正义观念，简言之，马克思的正义准则是：正义在于合乎其所对应的生产方式；(3) 依据马克思的正义准则，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因剥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见 Allen Wood. *Karl Marx*. 2nd edition. Routledge, 2004, pp.75、129、133-134、138-140，或参见艾伦·布坎南：《马克思与正义》，林进平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页。

② 艾伦·伍德：《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林进平译），载李惠斌、李义天主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4页。Allen Wood. *Karl Marx*. 2nd edition. Routledge, 2004, pp.129、138-140。

③ 这方面的文献除了可以参看诺曼·杰拉斯的《关于马克思和正义的争论》、《将马克思带向正义——批判与反驳》所提到的大量文献外，还可以参看托尼·G. 佩弗的《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和约翰·托伦斯的《马克思的观念理论》两书所附的大量文献（R. G. Peffer. *Marxism, mor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1990. pp.468-505; John Torrance. *Karl Marx's theory of idea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428-430）。

马克思自己不可能站在统治阶级的正义立场上，而只能站在被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其所信奉的正义观就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分配正义原则。^①

与胡萨米相似，柯亨、布坎南等人也认为马克思有意无意地持有一种价值观念意义上的正义观。柯亨强调要结合马克思的“发展命题”或“首要性命题”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② 包括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他认为，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力在解释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和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中是首要的解释因素，^③ 但马克思除了有“首要性命题”的思想，还有“发展命题”的思想。^④ 基于“发展命题”的思想，他认为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是一种巨大的进步，^⑤ 不仅在社会结构上，而且在正义、道德观念上都比资本主义进步。依据这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正义观念也必然会被社会主义的正义观念、共产主义社会的正义观念所超越。他认为有诸多迹象表明马克思持有一种基于“自我所有”的正义观，^⑥ 马克思以这一正义观批判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剥削侵犯了人的“自我所有”，是不正义的，^⑦ 又以这一正义观设想了共产主义社会。^⑧ 不过，他认为，马克思持有这一正义观却使其批判大打折扣，因他所持有的这一基于“自我所有”的正义观恰恰也是自由至上的自由主义者所持有的。^⑨ 直接地说，马克思所持有的正义观竟然也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正义观。与柯亨相似，艾伦·布坎南在其处女作《马克思与正义——对自由主义的激进批判》一书中，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运用了两种不同的批判：一是基于历

① 齐雅德·胡萨米：《马克思论分配正义》，林进平译，载李惠斌、李义天主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53页。

② 参看G.A.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

③ 参看G.A.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

④ 参看G.A.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在这一点上，塞耶斯关于马克思的“进步”思想的阐述也与柯亨相似，认为可以以资本主义之后的正义观批判资本主义。

⑤ G.A. 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李朝晖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页。

⑥ G.A. 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李朝晖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41-142、144-146页。

⑦ G.A. 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李朝晖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139页。

⑧ G.A. 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李朝晖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

⑨ 参看G.A. 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李朝晖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92页。

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包括对权利、正义等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在此批判中，形成了马克思关于权利、正义的认识；一是运用资产阶级的权利、正义观批判了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不正义的，在此批判中，马克思所持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正义观。

应该说，胡萨米、柯亨、布坎南等人的阐释非常合乎人们的常识和感觉，富有一定的解释力，不过，这样的解释路径也潜藏着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一方面对正义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剖析，揭示了正义的意识形态维度；另一方面马克思自己信奉的正义竟然也是具有资产阶级法权性质的正义，^①或者说，信奉的也依然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正义。那么，把马克思所信奉的正义置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剖析之下，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结果会怎么样呢？”当然，对于这样的问题，柯亨可以辩称说，这正是马克思自身的理论“缺陷”，是他所要克服的。不过，这样的“缺陷”与其说是马克思所具有的，不如说是那些认为马克思持有的一种自由主义正义观（或作为意识形态的正义观）的学者强加给马克思的，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如伍德、理查德·米勒等人所说，这些指证马克思具有资产阶级法权意义的正义观的论断都缺乏有力的文本支持。^②可见，马克思信奉的正义似乎不应该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正义。

2. 马克思批评的是意识形态的正义，信奉的是非意识形态的正义

假如说马克思信奉共产主义的正义，那这样的正义就是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正义，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说共产主义依然存在正义，那马克思所信奉的就是非意识形态的正义。这是卢克斯、尼尔森、佩弗、托伦斯等人采取的一条路径。不过，这种路径一开始就碰到了这样的难题：是否存在着作为意识形态的正义（或道德）与作为非意识形态的正义（或道德）的界分？卢克斯对此的答案是肯定的。在他看来，我们之所以会在“马克思与正义”问题上存在着似是而非的看法，就在

① 参看 G.A. 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李朝晖译，东方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 页。

② 艾伦·伍德：《马克思论权利与正义——对胡萨米的回复》，林进平译，载李惠斌、李义天主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9 页。

于我们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关于法权的道德与解放的道德的区分。^①在他看来，“一旦我们认识到它指责为意识形态和不合时宜的是法权的道德，而采纳为它自己的道德的是解放的道德，马克思主义对道德的态度中似是而非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②他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拒斥、批评正义，是因为它们“不仅仅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它固化阶级社会，掩盖阶级利益，并标榜能裁定竞争性的要求，限制自由，以普遍公正、客观互利的方式分配成本和利润。它还预先假定了一种关于使之得以产生的条件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是马克思主义所否定的。”^③马克思所持有的解放的道德则表现在他既批判乌托邦又走向乌托邦，不过由于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思想过于强调历史的必然性，且避免对未来做出预测，因此，隐含在马克思思想中解放的道德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挖掘。^④

尼尔森对正义、道德的辩护路径与卢克斯略有所不同。他一方面承认马克思认为正义、道德都是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试图证明不应一概地拒斥正义、道德。^⑤他的辩护是通过对比马克思所指的“意识形态”和“道德”^⑥两个概念的辨析来实现的。在他看来，尽管我们熟知马克思把道德批判为意识形态，但我们还是对马克思为何将道德批判为意识形态缺乏足够的理解。^⑦以他的观点，谈论道德既可以谈论道德的性质（或本质），也可以谈论道德的作用。马克思把道德批判为意识形态，主要是从道德社会学层面来展开的，批判它

① 同胡萨米、尼尔森等人一样，卢克斯把正义视为属于道德的范畴，并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的框架下来探讨“马克思与正义”的问题。在卢克斯这里，法权的道德相当于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法权在本质上都是意识形态的”），解放的道德相当于作为非意识形态的道德。参看史蒂文·卢克斯：《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袁聚录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8页。

② 史蒂文·卢克斯：《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袁聚录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③ 史蒂文·卢克斯：《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袁聚录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④ 史蒂文·卢克斯：《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袁聚录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5—57页。

⑤ 佩弗将其立场归为“道德是意识形态，但是不必被拒斥”的立场。R.G.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61页。

⑥ 尼尔森基本是把“马克思与正义”的关系置换为“马克思与道德”或“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的框架下来讨论的。

⑦ 凯·尼尔森：《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李义天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148页。

具有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功能等，而不是从认识论层面来批判道德的性质，^①而且，马克思把道德批判为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道德信念和评价信念也沦为意识形态。^②再者，即便道德如马克思所说的是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也不宜纯作贬义的理解。为此，他“倾向于将意识形态描述为一种关于理念、理论、信念、态度、规范和社会实践的体系，它们表现了阶级社会的特征，或是表现了在阶级社会中某个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的特征，并且，它们主要是为某个阶级（尤其是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或某个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尽管它们（至少常常）会把自己装扮成是对社会所有类似成员的利益的不偏不倚的回应。”^③他认为这样诠释意识形态不仅合乎马克思的本来思想，而且不致使马克思与列宁的意识形态论断产生冲突。^④不过，他虽然试图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演绎“意识形态”概念，但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本身反而缺乏准确的理解，忽视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与列宁的意识形态的一些异质性。简而言之，尼尔森的整个论证表现出从马克思拒斥道德为意识形态的批判中拯救出“道德”（尼尔森将“正义”归属于“道德”）的努力。为了在马克思批判正义、道德的框架中拯救出正义与道德，他使出浑身解数，从“道德是意识形态但是不必被拒斥”的辩护方式到“道德不是意识形态因此不必被拒斥”的两种辩护方式中都有他的理论身影。^⑤不过，就“道德不是意识形态因此不必被拒斥”的辩护来说，R.G. 佩弗的辩护更具有代表性。

佩弗在道德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上，不是试图阐述马克思关于道德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本来观念，而是试图阐述一种有别于马克思的观点：道德并不是一种否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⑥在他看来，在看待道德与否定意义的意识形态的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三种主要的立场：（1）道德是意识形态，因而必须拒斥；（2）道德是意识形态，但不必拒斥；（3）道德不是意识形态，因而不必拒

① 凯·尼尔森：《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李义天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8、154-156页。

② 凯·尼尔森：《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李义天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0-153页。

③ 凯·尼尔森：《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李义天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8页。

④ 凯·尼尔森：《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李义天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9页。

⑤ R.G. 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61页。

⑥ R.G. 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页。

斥。^①他认为，立场（2）是难以成立的，尽管尼尔森对它有过短暂的辩护。因为只有当意识形态是非批判性的意义，它上才可能成立。^②立场（1）则是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都持守的立场，^③而他将站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试图为立场（3）进行辩护。于是，他的整个论证也基本上是通过批驳立场（1）来确立的。在他看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可以表述如下：

（1）X 是意识形态的界定性特征，

（2）道德（即所有的道德观念、道德原则、道德理论、道德规范等）具有 X 的特征，所以，

（3）道德是意识形态。^④

他认为，不论是前提（1），还是前提（2）都是难以成立的。不论是把福伊尔（Feuer）的“虚假意识”，^⑤还是把艾伦·伍德所表述的意识形态的三个特征^⑥，或者其他学者所罗列的意识形态的特征，都难以理由充足地表明自身是意识形态的界定性特征。^⑦如果说有，也只是他自己界定的“妨碍人类福祉，或更为宽泛地说，妨碍人类生存条件的优化与改善”的特征，^⑧至于道德是否具有这些他所列举的特征，特别是具有他提到的“保守性”和“妨碍人类福祉”的特征，他都加以否认。^⑨在他看来，要否认立场（1），确立立场（3），只需

① R.G. 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59-260 页。

② R.G. 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60-261 页。

③ R.G. 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61 页。

④ R.G. 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61 页。

⑤ R.G. 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62 页。

⑥ R.G. 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64 页。

⑦ R.G. 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67-274 页。

⑧ R.G. 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74 页。

⑨ R.G. 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76-277 页。

要提出一个反例——他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中所阐述的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就够了。但遗憾的是，如果要使其论证具有真正的说服力，佩弗就必须确保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特征”是本于且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或是马克思主义所能接受的。但通观佩弗的论证之后，难以发现他所说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被他归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那些意识形态特征也未能有效地证明就是属于“马克思的”或“马克思主义的”。更要紧的是，他对此意识形态的特征的“分别处置”、“独立考虑”的方法也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界定意识形态的特征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阐述意识形态的特征一般都是“整体考虑”或“综合看待”的。而且，吊诡的是，他既以立场（1）“道德是意识形态，因而必须拒斥”为批驳的“靶子”，却又对“靶子”本身不甚理解——据他自己表述，他又无意于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做深层的研究^①——，因而他的批驳就难免“无的放矢”。因此，尽管枚举了诸多学者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的特征的理解，佩弗还是无法理由充足地通过批驳立场（1）来确立他的立场（3）。

可见，这种解释路径已经透露出对“马克思的正义观”质疑与反思，并试图走出马克思的理论框架，相对于第一种路径来说，此路径表现得更为大胆和不拘泥于马克思的文本。但是，假如诠释马克思的正义观可以不必拘泥于马克思的文本，那么选择马克思思想的内在理路来“建构”、“填补”马克思的正义观就是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比如，以马克思关于人性、人的需要的理论去建构马克思的正义观、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甚至采取与马克思既有的论述进行“对话”的方式来开展马克思的正义观或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的思考。以下介绍的怀特、米勒等人就选择了这样的思路。

3. 从人的需要的视角来探索马克思的正义观，乃至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②

以马克思关于人性、人的需要的理论去建构马克思的正义观、马克思主

① R.G. 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58页。

② 考虑到这样的探索路径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无法在马克思的文中找到直接的依据，只是正义的思维方式，沿着马克思所开拓的历史唯物主义路径，顺着马克思的内在理路去阐释和构建，且一些阐释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的个人观点，故在这里表述为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或马克思式的正义观可能更为合适。

义的正义观，对于这样的路径，^① 斯图亚特·怀特 (Stuart White, 1996)、大卫·米勒 (David Miller, 1999) 等学者都有过探索。怀特在《需要、劳动与马克思的正义概念》一文中就认为，“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著作中可以看出，马克思默认了以需要原则作为一种正义原则，且这一默认是基于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共产主义的正义原则，它也体现在《资本论》中。为了强化这一观点，我尝试在此对需要原则进行重构，并且利用这一重构，展示马克思对资本家掠夺工人的劳动产品的谴责，是如何基于一种关于收入权利和工作的关系的观点，这一观点不仅与需要原则相一致，还内在于需要原则之中。”^② 在怀特看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表述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就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它要求对资源和自由进行分配，以便平等地实现自我实现机制的机会平等以及核心福祉的平等。”^③ 在怀特对马克思的正义观的解释中，“自我实现”的需要被置于核心的地位，而生存需要虽也被提到，却只是一笔带过，至于生产需要却不为其所考虑。之后，戴维·米勒在其《社会正义原则》一书中，也从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观点阐发了他关于社会正义的观点。他发现，“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相比，‘社会正义’这一术语更容易得到自由主义者和进步分子的采用，这一事实很有趣。无疑，部分原因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声贬斥，他们相信谈论社会正义就是站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立场上。”^④ 而且，他也熟知马克思本人认为“每一种正义观念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理想化的表达，都是为确保默认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利益而服务的”。^⑤ 虽然《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表述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依马克思的本意并不宜作为正义原则来理解，^⑥ 但他还是试图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一原则阐释为马克思的正义原则，并对“需要”做了辨

① 这一路径可以参看 Fabian Schuppert. *Freedom, Recognition and Non-Domination: A Republican Theory of (Global) Justice*. Springer. 2014, pp64-68, 及 Bruce A. Arrigo. *Encyclopedia of criminal justice ethics*.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14, p.872、876 中的一个概述和提到的文献。

② 斯图亚特·怀特：《需要、劳动与马克思的正义概念》，林进平等译，载李惠斌、李义天主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16 页。

③ 斯图亚特·怀特：《需要、劳动与马克思的正义概念》，林进平等译，载李惠斌、李义天主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36 页。

④ 戴维·米勒：《社会正义原则》，应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 页。

⑤ 戴维·米勒：《社会正义原则》，应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4 页。

⑥ 戴维·米勒：《社会正义原则》，应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8 页。

析,阐明他“所指的是需要能够被当作是使得人们在他们的社会中过上一种最低限度是体面的生活的那些条件”。^①这一点使他能够把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等人对“基本需要”与“奢侈需要”的区分吸收进来,并在相当程度上也吸纳了马克思关于人的“生存需要”与“自我实现的需要”的思想,阐释了一种基于马克思的“需要”概念的正义观。不过,遗憾的是,由于米勒意不在于挖掘、阐发马克思的“需要”理论,而在于借用马克思的“需要”概念,阐发其自身的社会正义观念,他对马克思的“需要”的思想并没有太多的挖掘与阐发。像诸如“生存需要”、“生产需要”与“自我实现的需要”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在米勒的阐述当中是缺失的,因而,如果把米勒借助马克思的“需要”概念所阐发的社会正义观,理解为马克思的正义观,就显得相当勉强。

二、反思“马克思的正义观”的阐释方式

1. 对“正义在于合乎生产方式”或“正义在于合乎人的需要”的反思

在笔者看来,这两者的理论范式都是源于“正义在于合乎人性”,从表面上看,说“正义在于合乎人的需要”命题源于“正义在于合乎人性”命题多少是能让人信服的,马克思本人就认为,需要即人性,^②细加分析,也能发现二者之间的关联,即伍德式的“马克思的正义观”——正义在于合乎其所属的生产方式——与“正义在于合乎人性”有着深层的契合性和关联性。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正义”与“人性”、“劳动”的关联非常明显,因为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性就表现为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③因而,依据“正义在于合乎人性”的范式,也可以推演出正义在于合乎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这样的表述几乎逼近正义在于合乎生产或合乎生产方式的表达方式,但将人性理解为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毕竟带有浓厚的抽象人性论的痕迹,还未能摆脱传统哲学关于人性的形而上学的理解,特别是自

① 戴维·米勒:《社会正义原则》,应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4页。

③ 参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

斯密、黑格尔以来对人性的理解。^①而一旦把“人性——劳动”理解模式转换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现实的人——现实的生产”的理解模式,^②那么,“正义”与“人性”、“劳动”的潜在关联就转换为“正义”与“现实的人”、“现实的生产”的潜在关联。如果说“正义在于合乎人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则表现为“正义在于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表现为“正义在于合乎生产”。但此时“现实的生产”已经不同于之前的“抽象劳动”,而是一个包括生产前提、生产手段和生产本身的生产系统,^③正如伍德所说,“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个由诸多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因素组成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尽管人类的需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此过程中是决定性的,但它们彼此之间绝非孤立。在既定的历史阶段,这些相互依存的因素形成一个整体,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人类活动的复杂体系。这个受到历史条件约束的生产活动体系具备特有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形式,人们在这种生活中也获得特有的人类本质;该体系区别于先前在历史中出现的活动体系,也区别于它今后最终会成为的活动体系。这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社会整体,即被马克思称为‘生产方式’。”^④

“正义在于合乎生产方式”与黑格尔的“正义在于合乎理性”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对于法国大革命,黑格尔曾写道:“正义思想、正义概念立刻得到了公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正义思想现在就成了宪法的基础,今后一切都必须以它为依据。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说, Nus 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⑤对于黑格尔来说,理性支配着世界;而对于马克思来说,生产方式支配世界。^⑥不过,这种“置换”也潜藏着一些问

① “正义在于合乎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也可以进一步推演出“正义要合乎劳动权,合乎财产权”,或正义是立足于财产权的基础之上,假如按照这样的逻辑,那也可以得出类似于自由主义的论断:“没有财产权的地方就没有正义”。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页。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页。

④ 艾伦·伍德:《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林进平译,载李惠斌、李义天主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⑤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96—697页。

⑥ 参看艾伦·伍德:《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林进平译,载李惠斌、李义天主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11页。

题，如果说“正义在于合乎理性”还尚且能够成立的话，那“正义在于合乎生产方式”就需要加以理论诠释和限制。因为，在黑格尔等人的理论视野中，理性不仅与人性较为接近，而且本身就具有价值的正当性，但生产方式并不尽然地体现人性，或人性并不完全体现在生产方式中，而且，生产方式并不能如理性一样，本身就具有正当性。生产方式既可以表现为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生产方式，也可以表现为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生产方式。因而，当说“正义在于合乎生产方式”时，就要给以诸多限制和补充，至少必须表述为“正义在于合乎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生产方式”。^①

与之相似，“正义在于合乎人的需要”也可以说是源于“正义在于合乎人性”的范式，不仅如此，在“正义在于合乎生产方式”与“正义在于合乎人的需要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直接的关联。

在唯物主义者看来，生产的需要是人最为核心的需要，透过人的生产可以管窥人性，或者说从人的本质及其潜能在生产中的对象化来看待人性，人如何生产，人性就如何表现。因而，我们也可以从“正义”与“人性”、“人的需要”的关联来把握“正义”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并从中丰富对正义与“生产”的关系的理解。对此，我们不妨将它们之间的关联表述如下：

- (1) 正义在于合乎人性；
- (2) 人的需要即人性，或人性体现在人的需要之中；
- (3) 人的需要是一个体系，它包括生存需要、生产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生产需要是人的需要的核心，生存需要是人的基础，具有优先满足的地位，自我实现的需要则是人的需要的理想诉求，它引领了需要的方向。

根据(1)(2)，我们可以得出，正义在于合乎人的需要，而结合(3)，我们可以得出，正义在于合乎人的需要体系，即在于合乎人的生存需要、生产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在所要满足的这三种需要中，生产需要是最为核心和

① 顺着这样的一种路径，我们可以尝试给“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做出一种注解：在这个论述中的“生产方式”并不是指“现存的生产方式”，而是“现实的生产方式”，那马克思在这里的表述就可以转述为：只要与具有必然性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就是正义的，未能与具有必然性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就是不正义的。不过，由于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原本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生产方式也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失去必然性，原本的适应就会变为一种缺乏内在必然性的适应，而与一种具有新的历史必然性的生产方式不相适应，它就不再是正义的。

最为本质，生存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都可以从“生产”或“生产方式”中得到理解。比如，在人尚处于“人对人依赖”的生产方式中，“生存需要”是人的需要的最为集中的表现；在“人对物依赖”的生产方式中，“生产需要”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标识；在“人的自由状态”的生产方式之中，“生产”表征的是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考虑到人的存在状况在现代社会中是三种状态并存，正义就必须满足人的这三种状态的需要，其中，生存需要是基础性的需要，是具有优先性的需要，^①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的需要的理想诉求，而生产需要表现为人的一种常态的需要（或人的需要的核心表现）。因此，作为一个合乎人的需要的正义，马克思主义的正义如从“需要”的视角来看，就必须建立在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基础上，满足人的生产需要，并进一步实现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

基于这样的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是如伍德所说的在于以生产方式为旨归，在于合乎生产的需要，或正义在于实现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②这还不够完善，因为至少人的生存需要相较于生产需要和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来说更具有基础性和优先性。

考虑到生产需要已充分地体现在现代生产中，而罗尔斯的正义论也可以理解为表示了现代生产在正义上的诉求。因此，我们可以把隐含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阐释为如下的结构：

- (1) 首要原则：满足人的生存需要；
- (2) 基本原则：现代生产的正义原则；^③
- (3) 方向性原则：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④

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可能会有不少学者（包

① 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认同 R.G. 佩弗主张把“每个人的安全和生存权利必须得到尊重”置于“一种充分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和社会理论”的优先位置的观点。R.G. 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42 页。

② 参看斯图亚特·怀特的论述。斯图亚特·怀特：《需要、劳动与马克思的正义概念》，林进平等译，载李惠斌、李义天主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15—436 页。

③ 罗尔斯所表述的正义原则正是适应于现代社会生产的一种正义原则。

④ 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实现了正义的社会，它当然属于一个正义社会，但它已经不是一个需要正义规范来协调、规约的社会，因而，也是一个超越了“正义条件”的社会，也正是它具有超越“正义条件”的特性，它才成了指引处于追求正义的社会的方向。在这里，它体现了超越性。

括我自己)认为这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背离了马克思关于“自我实现”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但是,正如“现实的人”可以被理解为对人性的思考一样,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也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正义原则,因为尽管这与马克思自己的表述相悖,但就构建一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来说,我们已经不能拘泥于马克思的文本,而是必须言马克思所未尽言。

2. 对正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反思

在卢克斯、尼尔森、佩弗(也包括托伦斯)等人的思考中,马克思批评的是意识形态的正义,信奉的是非意识形态的正义,二者并没有冲突,或者说,马克思批判正义为意识形态不等于他没有信奉正义。他们的阐释尽管各有所不同,但都表现出一种试图通过回应马克思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正义的批判来“拯救正义”的努力;他们的论述,启发我们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乃至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如果说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意识形态,并视正义、道德为意识形态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在历史唯物主义受到质疑,像正义、道德这些意识形态被重新肯定的时代,毫无反思地接受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的结论,并视“正义”如废物,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因而,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正义、意识形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有必要。

尽管对“正义”、“道德”的拯救,既可以采取“正义是意识形态,但不必拒斥”的辩护方式,也可以采取“正义不是意识形态,因而不必拒斥”的辩护方式,但对笔者来说,较有理论解释力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这不仅是因为后者的立论与“正义是意识形态,因而必须拒斥”针锋相对,辩护力度极大地受制于它对其反题的理解和批驳,其所蕴含的理论创新性也极大地受制于这种对立的框架。相较来说,前者在解释上的自由度将大于前者,它并不受制于“正义是意识形态,因而必须拒斥”中的“意识形态”的理解,它不在于“俯就”意识形态的“旧观念”,而在于赋予意识形态以“新意”,从而通过拓展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来为“正义”、“道德”等意识形态形式争取“立身之地”,即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推演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藉此,也许有望提出一种新型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的关系,或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试想,假如意识形态是人类的一种宿命,人类只能选择某一种意识形态,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就有必要思考人类该如何对待作为意识形态的正义。这种路径的积极意义在于使

我们不要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已有的论断视为颠扑不灭的真理，不要将其视为教条，而是要把握其精神。

此外，有必要重新反思正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普遍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正义在于合乎生产方式”与“正义在于合乎人性”之间可以建立起某种联系。如果说“正义在于合乎生产方式”是“正义在于合乎人性”的现代体现，那么在这一表述之中，就既体现了历史主义，也体现了普遍主义。一方面，假如我们认为“正义在于合乎生产方式”源于“正义在于合乎人性”是其现代性的体现，那么我们就已经认可了这一命题对普遍主义的依赖。因为，当认同“正义在于合乎人性”的论断时，我们无疑已经采用了它的普遍主义预设，而且，当我们认为“正义在于合乎生产方式”具有普适性时，也就已经认可了普遍主义的一些真理。另一方面，“正义在于合乎生产方式”也体现了历史性，意味着在这一表述中，它以“社会生产方式”去把握人的本质，而这一点恰恰是现代社会的特性。这个特性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人类的一般特性，但对于其他一些学者来说，则仅仅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性。

3. 阐释“马克思的正义观”的限度：守护与创新之间

在对“马克思的正义观”的各种阐释中存在着这些倾向：为了阐释各自“自以为是”的“马克思的正义观”，作者们都不同程度地放弃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甚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特质——唯物史观。这使笔者不禁怀疑：放弃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论述，甚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这还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或者说，是否存在一种可以放弃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论述，甚或放弃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

也许我们可以离开文本，可以无视马克思、恩格斯的表述，按照“现存的需要”去言说，去构建我们“自以为是”的马克思的正义观，毕竟，正如卢卡奇所说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① 不过，话又说回来，假如我们所推出的“马克思的正义观”不仅缺乏马克思的文本依据，而且被剔除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与“辩证法”因素，不知是否还能称之为“马克思的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1页。

正义观”，抑或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

也许像一些学者所说的，我们不仅可以在思维方法上坚持马克思主义，还可以在理论的“价值诉求”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比如，柯亨就把平等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诉求，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就是一种平等主义的正义观。^① 不过，假如这种“价值诉求”是在漠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和漠视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推演而出的，那就不免令人犯疑：难道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诉求”并不存在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之中，难道这样的“价值诉求”竟然是与唯物史观不相容的？

当然，笔者不反对从马克思的“价值诉求”上去探讨某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也反对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并认为有必要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必要的反思，笔者所质疑的只是：那种既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又置唯物史观于不顾的所谓的“马克思的正义观”或“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马克思的正义观或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甚至是“马克思式的正义观”？

作者：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① 参看 G.A. 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李朝晖译，东方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1 页。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消失^①

芭芭拉·艾布斯坦 / 文 董慧 / 译

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两者如此紧密相关，以至于它们能够被视为有着两个不同名称的同一个视角，曾经对左翼有过相当大的影响。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及 60 年代早期，一个松散的国际网络知识分子发展并且推进了这一视角。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多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强调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展了这一概念，这部手稿最初是在 1927 年的莫斯科以俄文发表，之后，于 1932 年以德文发表；手稿的重要和核心部分首次以英文问世是在 1958—1959 年。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个流派，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发展有赖于这部著作的出现，但对于聚焦于异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诉求以及异化有可能被克服的社会愿景而言，同样也存在着政治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批判了西方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这一资本主义具有对消费的促进，物质主义以及政治上和文化上令人感到压抑的特点。甚至更尖锐一点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同样是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官方所认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抗议。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对西方和苏联社会的批判，

^① Barbara Epstein, On th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ist humanism, <http://www.international-marxisthumanist.org/articles/disappearance-socialist-humanism-barbara-epstein>

加入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西方和苏联发生着类似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宣称，在苏联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少数精英决策并获得利润，而大部分人则服务于这一体制。鉴于他们没有或很少具有话语权，他们被视为工具。苏联和西方政府衡量他们自身成功的标准是物质上的进步而不是人们的生活质量。苏联和西方社会都是以严格控制，整齐划一以及异议镇压为特征的（尽管在苏联对异议的镇压强度比西方更为强烈）。

尽管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与战后时期政治问题的相关性所推进的，但它的术语大部分上是哲学的，而且其主要关注点挑战了苏联权威所赞同的马克思主义。战后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者，批评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认为它解释历史发展的时候强调客观社会力量，而将人类意识、决策制定以及人类行动当作社会变化中几乎没有作用的剩余范畴。这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通常被称为“diamat”（辩证唯物主义的缩写），正如它的批评者所指出的，与官僚主义和专制社会是相一致的。客观力量，比如生产关系的发展，在社会变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科学的”，科学的意味着它是对现实客观的、清晰的反应的主张，表明分析最好留给与它们相关联的专家和官员，普通人的观点或愿望是微不足道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既是作为对一个理论化视角的呼唤出现的，这一理论化视角将会认识到，意识和外部现实之间相互影响的构成性关系，同时也是作为对一种社会主义的需要而出现的，这种社会主义将把人类需求置于中心位置，这些需求包括物质财富、在社会发展方向上有机会积极参与，以及自由的文化和政治表达。

在某种意义上，格奥尔格·卢卡奇是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虽然他自己从未这么认为。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于1923年首次出版，在对马克思著作中散落的引用进行仔细阅读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异化的分析，这种分析预见了对马克思对其多年之后被发现并且出版的经济哲学手稿中概念的全面发展。^①几十年之后，紧随1956年的匈

①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Merlin Press: London, 1971. Robert C. Tucker, in *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 (Transaction Publishers: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2001), 10-11, writes that an incomplete version of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was published in 1927, in Russian; a fuller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the original German, in 1932, also in Moscow.

牙利起义和布拉格之春，与这些行动有关的知识分子开始出版批判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它在苏联处于统治地位并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些知识分子包括，波兰的莱谢克·柯拉斯科夫斯基和亚当·沙夫，以及匈牙利卢卡奇的追随者们。

在南斯拉夫，1948年蒂托和斯大林关系的破裂，使得一群青年哲学家们批判在已经形成的南斯拉夫哲学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而且他们开始建构一种围绕异化概念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马克思主义中，他们对1844年手稿的解读发挥了主要作用。与苏联的决裂创造了得以开展的可能性空间；这些年青的哲学家，作为游击队员，参加了南斯拉夫反纳粹德国的保卫战和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毫无疑问支持了这项事业所必需的知识分子的独立。

到了60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开始在南斯拉夫哲学界成为主导，并且成为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中心。研究成员于1964年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期刊《实践》，期刊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另一种则针对外国读者，收录了英语、法语、德语以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文章。与实践派对异化问题的关注相对应的是对作为异化主要根源的官僚主义的批判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障碍。^①

1948年蒂托与苏联的决裂，以及随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反斯大林主义倾向，使得后来被称之为实践派的崛起成为可能，这推动了南斯拉夫独立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这条道路是建立在“自我管理”这一工人对自己工作场所的控制基础之上。实践学派成员支持南斯拉夫建构一种社会主义可替代形式的努力，并且集中批判苏联。但是在60年代的历程中，实践学派的成员开始意识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中的官僚主义问题，并且将批判转向这些问题。实践学派对社会主义的关注，或许并没有强调苏联独裁主义的主要根源，但它是对战后南斯拉夫一些问题的恰当批判。南斯拉夫共产党与实践学派之间的紧张一直持续发展，南斯拉夫政府于1974年关闭了《实践》的两种版本。实践学派的8名成员被开除。所有成员最终能够在其他地方谋得学术职位，但实践学派再也无法获得其影响地位。

① For a history of the Praxis School, see G. S. Sher, *Praxis: Marxist Criticism and Dissent in Socialist Yugoslav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实践学派对于对抗性行动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思潮都有一定影响。实践学派成员由学者组成，大多数成员来自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萨格勒布大学和其他地方。许多学生通过与实践团体共同学习而被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视角所吸引，特别是参加了几乎从1963到1974年的每年夏天，都会在克罗地亚海岸不远的一座岛上举行的科尔丘拉暑期学校，在那里，实践派成员和其他《实践》的作者们会进行讨论。实践学派吸收了国际学者，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对于这些讨论中的年长的参与者包括实践学派成员而言，他们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智的，但那些参与讨论的学生被政治活动和表达的限制所激怒，许多人渴望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视角与实践的反抗行动相结合。

1968年6月，贝尔格莱德大学发生了一起学生抗议运动，这场抗议最初是针对大学生的生活条件，但很快就拓展到对南斯拉夫政治参与限制的批评上。实践派的成员发表了一份支持声明，并且有一些人参与到抗议活动中。然而他们在抗议中最为重要的作用在于他们对于那些参与学生的思想的影响。实践学派的历史学者 Gerson S. Sher 写道，“许多实践观念的回声在学生的需求中可以听得到”。但他同时也指出，社会主义应该包括民众参与和持有异议的权利这一观点，并不是任何群体的特性。实践学派的视角与一种普遍观点即对于社会主义的支持与对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失望是结合在一起的相互交织。^①

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出现了，并且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中产生影响，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在大约同一时期，实践学派也在南斯拉夫产生了影响。虽然《实践》国际版本出版，科尔丘拉暑期学校几乎每年都举行会议，但是实践学派对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发展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实践学派成员出版的大多数刊物，大多数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因此无法被西方读者所接受。此外，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关切与南斯拉夫的不太一样。对于实践学派来说，核心问题是苏联独裁主义和它在南斯拉夫相对温和的对手。对于那些与实践学派所相对应的西方知识分子来说，核心问题则是冷战期间，发达资本主义情境下西方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

① For a history of the Praxis School, see G. S. Sher, *Praxis: Marxist Criticism and Dissent in Socialist Yugoslav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211).

在西方最先发展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视角的人是杜娜叶夫斯卡娅，她是一位与托洛茨基主义有渊源的有影响的活动家和知识分子。在她《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从 1776 至今》这本 1958 年出版的书中，她认为异化的概念是马克思著作的中心，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的构想必须遵循他对黑格尔研究的基础，尤其是关于超验的概念，从分裂中生发的统一。杜娜叶夫斯卡娅指出，马克思第一次将他的哲学称为“人道主义”，之后用“共产主义”这个词取代了它。^①

杜娜叶夫斯卡娅批判了在美国日益加剧的对劳动的剥削，对黑人的特殊压迫以及核战争的危险。她比大部分左翼知识分子要更早地批评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她同样也批评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除了将其列入同一类别，她批评了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使世界受到可能核毁灭的威胁，并且扬言如果这些发生的话他们将遭受最小的灾难。^② 杜娜叶夫斯卡娅的影响力，毫无疑问因为这些原因而受到限制：在美国仍处在麦卡锡主义统治之下的时候她明确要求革命，她与对于许多人来说，即使是站在左翼立场上都是模糊的革命倾向有关联，以及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开放意识过分乐观。

在英国和美国，“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两个术语被用来描述无异于学术和政治趋势的不同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强调《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一视角的根源以及马克思关于异化更普遍的著作，并且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则强调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或其他社会主义者——参与到对苏联社会主义批评和建构民主社会主义的努力中，对世界持不同异议的权力需要受到保护，自由表达需要得到鼓励。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 /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研究成果，像实践学派一样，趋向理论化和哲学化，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圈子比南斯拉夫同行们要更深入地参加社会活动。出于一种强调他们观点普世性特征的愿望，他们倾向于运用“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因此这就是将在这里使用的术语。

① R. Dun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from 1776 until Today*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Second Edition, 1964), p. 58.

② R. Dun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from 1776 until Today*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Second Edition, 1964), p. 290.

1956年，身为劳动历史学家和英国共产党成员的爱德华·汤普森与约翰萨维尔创建了《理性者》这样一份持不同党内政见的杂志，这份杂志把重点集中在对斯大林主义以及在苏联占主导地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之上。赫鲁晓夫在当年2月，公开承认斯大林的罪行并放弃斯大林主义，这一行为使得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员重新思考他们与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苏联对匈牙利三月起义的镇压加剧了这一危机。汤普森和萨维尔，包括很多其他人，离开了共产党；《理性者》更名为《新理性者》，成为将反对冷战和两个强国与对作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参与式民主的支持结合起来的新左翼政治的工具。

1957年，《新理性者》刊登了一篇E.P. 汤普森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一封给菲利士人的信》，这篇文章是一个号召，号召在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名义的国际左翼中反对斯大林主义。汤普森认为，这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用现实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需求、斗争及期盼取代了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抽象概念。他认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被植根于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所感染，即使是已经通过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而离开了结构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已经无法挑战盛行的教条主义，即关注对文化的分析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从现实的人类需要、思想以及行动开始，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道德基础，苏联社会主义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视为一个典范。汤普森认为，冷战和军备竞赛供养了美国和苏联的统治集团，同时在东方和西方造成了政治压迫。他认为，对冷战和自我维持的专制政权的反抗，不仅在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和平运动开始出现的西方社会的青年中酝酿着，而且也发生在苏联及其卫星国中。汤普森指出，这样一种反抗能够发展成为一种争取以人道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国际性的运动。^①

在美国，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发展起来，即法兰克福学派在希特勒上台之后重新迁回纽约。法兰克福学派的大部分成员把异化概念作为社会批判的核心，他们反对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赞同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从广义上讲，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员的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是对专制趋势的分析和

① E.P. Thompson, "Socialist Humanism: An Epistle to the Philistines," *The New Reasoner*, 1 (Summer 1957) : pp. 105-143

文化批判，而不是直接的政治问题。其中的两位成员，弗洛姆和赫伯特·马尔库塞，他们在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发展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尤其是弗洛姆，为推动作为国际知识倾向和政治行动框架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过程中付出了努力。

异化问题及其解决途径是弗洛姆研究的中心议题。在1955年出版的《健全的社会》中，他指出，与自然的分离是根本性的人类创伤，这分离制造了一种能够从消极意义上阐释的空虚感——通过对权力、财富和声望的追求，通过纠缠于支配和从属关系——或者从积极意义上阐释——通过对人类团结的追求和通过爱戴关心他人。弗洛姆认为，友爱和团结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但却因为资本主义而受挫败，他呼吁一个以合作和工人参与管理为基础的去中心化的社会主义社会。^①1961年，弗洛姆出版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这本书包含了大量来自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摘录，还包含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弗洛姆认为异化概念无论是对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还是青年马克思的研究来说都是中心概念，苏联代表着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概念的背离。^②

赫伯特·马尔库塞，像弗洛姆一样，关心的是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和产生这种异化的反对结构的根源。在1964出版的《单向度的人》中，他指出，社会繁荣和放松对社会行为的传统控制，破坏了之前既存的反抗动机，因此创造了一个高度异化的社会。他呼吁一种建立在人类对解放本能渴求上的“大拒绝”，他相信，这种大拒绝可能借由那些被边缘化的和被排斥的人来表达：那些因为种族、年轻人和激进知识分子而受到歧视的人。马尔库塞的观点反应了美国新左翼的敏感性，同时也帮助了对它的塑造。^③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从未演变成一种社会运动，也从未作为社会运动的视角被采用过。它仍然是左翼知识分子国际化网络的视角。尽管如此，有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著作仍产生了广泛影响，因为它们表达了许多人心中的担忧与愿望而引起共鸣，尤其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一种在英国和美国和平运动中普遍的敏感性，在这种敏感性中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者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美国和英国，希望结束军备竞赛的强烈公众情绪，导致了1957—1958年和平运动。

① E. Fromm, *The Sane Society* (Greenwich: Fawcett Premier Books, 1955) .

② E. Fromm,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61) .

③ H.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

在美国，埃里希·弗洛姆是“健全的核政策委员会”的共同创立者和杰出的活动家，这个委员会提出了核辐射的问题，并且动员人们抵制军备竞赛和冷战。在英国，早期的新左翼为“核裁军委员会”提供了一个左翼理智维度，这一维度敦促英国结束军备竞赛和脱离“100国委员会”，动员民众进行涉及数千人意图迫使英国脱离北约和采取不结盟的姿态非暴力反抗示威活动。汤普森和早期新左翼的其他知识分子，在基于一个道德的社会主义政治和对一个民主、平等、和平的世界的追求的背景下，与冷战做斗争。^①

对于许多投身于英国和美国和平运动中的活动家来说，反对冷战和军备竞赛是一个更宽广的政治视野的组成部分：对美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同盟国所扮演角色的批评，以及批评战后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合划一，系统化控制和物质主义。在这些运动中，没有引起几乎普遍共鸣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要素之一是社会主义。两种运动中相当多的活动家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好，但极少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尚在争论中的问题。许多人认为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是通向更好社会的主要障碍，他们不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进行选择与这些问题有关。尽管如此，早期英国新左翼是英国和平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智性思潮，汤普森是其中的领军人物。同样，在英国和平运动中还有其他的左翼群体，它们每一个都提出了自己对冷战原因和解决方法的分析。

在英国，早期的新左翼认为和平共存与民主、平等的世界前景是相联系的。在美国，和平运动中的支持者与早期民权运动有深的渊源，和平主义是民权运动中很重要的思潮。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者并不是和平主义者。不过，这两种思想有很多共同之处。和平主义者认为非暴力并不只是暴力的不在场，而将其看作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这种社会关系培育了自我实现、互相尊重和彼此合作，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团结观念有诸多相似之处。和平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两种视角，都把小规模社区的建设和这些社区中个体的权利放在首要位置。一些和平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比如贝亚-鲁斯汀，在和平运动和民权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社会主义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权运动中

① For an account of the Committee for a Sane Nuclear Policy during this period, see M. S. Katz, *Ban the Bomb: A History of SANE, the Committee for a Sane Nuclear Policy, 1957-85*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Chapters 1-4. On the history of CND and the role of the New Left within it see R. Taylor, *Against the Bomb: The British Peace Movement 1958-196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especially Chapter 7.

并不被人关注，甚至连一种思潮也谈不上。然而在其他方面，早期民权运动的前景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非常接近。早期民权运动建立在一个很深的政治道德观念之上。早期民权运动中的“至爱社区”的概念，离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对异化被扬弃社会的构想并不遥远。

埃里希·弗罗姆于1965年出版了一本文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一个国际研讨会》，这部文集收录了世界各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者撰写的文章。^①弗洛姆在前言明确表示，他希望这卷文集能够加强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并且能够增强他们对当时社会运动的影响力。但事实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出版是运动知名度的最高潮。在随后的几年中，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被其他左翼思想所掩盖。如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差不多被遗忘了。是什么导致这一视角的消失？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又失去了什么？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和美国的和平运动在响应1963年核试验禁止条约时急剧衰退，这个条约取缔地面核试验，平息公众对核辐射的担忧，更广泛地回应降低美国和苏联之间紧张局势。在1964年，学生激进主义者开始注意到美国正在组织一场对越南的战争，一个他们几乎之前没有听说过的地方。随着战争的升级，它变成了美国左翼运动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其他地方运动的主要关注点。在美国，把先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学生和其他年轻人纳入到积极而愤怒的反对中，使对越南战争的反对极大地扩展到左翼的不同层次上。战争的中心以及对战争的反抗，同样改变了激进主义的意义。反对美帝国主义代替了反对冷战和军备竞赛。和平共存从日程中消失了，而且需要被进一步推进或者至少要被诉诸于实践的，曾经被认为是民主观念的存储库的自由主义变成了敌人。人们认为右翼已经离开并且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从未被完全界定的革命，被一大批激进分子和在60年代末期被描述为“运动”的主要组织所采用，这些运动包括女权主义、黑人权利以及其他有色青年运动，还有反战运动。许多人指望着在被后来称为第三世界的革命中获得灵感，甚至把它当作可以在美国实现的样子。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初期的激进政治，启迪了许多激进人士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向。60年代的那场运动从总体上说，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特别是在种族、性别、黑权主义和激进女

^① Erich Fromm, ed., *Socialist Humanism: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New York: Doubleday, 1965) .

权主义方面,60年代晚期/70年代早期的运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此次运动所采用的激进主义概念,从总体上说,在诸多重要方面是不可行的。革命并不在议事日程,自由主义也并不没有成为主要问题。右翼正被动员去重新掌控美国政治。

在60年代,美国的左翼政治意义的改变(其他地方同样以不同方式发生),部分是因为越南战争以及它带给美国主导世界抱负的焦点,部分是因为中国对苏联国际左翼领导的挑战。在战后的几年,苏联的名声变的愈加狼籍。赫鲁晓夫1956年的批露摧毁了苏联在左翼和进步人士中的声誉。60年代的激进分子中,有许多人尊重共产主义运动的遗产,但几乎没有什么人指望苏联来获得灵感或领导。古巴和中国的革命似乎暗示着一种新的革命模式:一小群积极分子可以通过他们的纪律、决定和有能力对揭露那些掌权者的脆弱性进行一种干预,来发动一场革命。中国声称,和平共处的苏联政策实际上是修正主义,是阶级斗争中人道主义的替代品。中国将其对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能力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之上,即反帝国主义是当前的核心问题,苏联已经放弃了他的作用,第三世界正在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中国能够领导第三世界。

在美国,激进主义对于那些他们强调过的一些棘手问题(种族主义、不断升级的战争)所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强的挫败感,导致他们努力与自由主义者合作的想法破灭,他们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自由主义的掌权,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方式就是革命。1964年,在大西洋城举办的民主党大会中,表面上是民权运动盟友的自由民主党,不支持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民选代表获得席位的要求。在1968年的民主党大会中,当会议大厅外的反战示威者被警察殴打时,会议厅内的反战代表却保持沉默。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那些人正指挥着越南战争。美国人则享受这相对广泛的繁荣,新政中提出的改革和社会事业似乎变成了对压迫性社会系统的支持。许多进步人士得出以下结论,繁荣已变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永久特征,统治阶级已经认识到自由改革对于保持系统运转和阻止造反而言是必要的,体制内有意义的改变是不可能的,还有革命是必须的。问题是:哪些人会领导革命,革命将以何种方式进行。

到了60年代后期,运动具有不稳定性和相对自发性。特别是1969年,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运动失败之后,很少有一些持久的大型组织,大部分运动以小型团体和项目,以及个体参与示威和其他行动为中心。在混乱和快速

变化的运动政治舞台上，两个主导地位的趋势就是无政府主义（尽管这个术语在那个时候很少被使用）和毛主义或其他形式的第三世界主义。左翼无政府主义包括妇女运动，尤其是激进女权主义、受反文化影响的左翼激进分子，以及反战运动中一小股和平主义思潮。这一领域的人倾向于依照文化、私人生活和社会关系的转变来思考革命。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制度，并且把替代性机构的创立看作是改变的路径。

与此同时，被其追随者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主义 / 第三世界主义，很快成为反战运动中的主导趋势，同时在黑权主义和其他有色人种的运动中也颇具影响力。在这些运动中，很少有人阅读汉语或者了解很多关于中国的知识，而且对在美国青年人中促建盟友关系几乎不感兴趣的中国的领导，从来没有促进信息的交流。在美国激进主义者和西方其他人中确立起来的毛主义，受到了中国对苏联的挑战和文化大革命的激励，但它并不一定是建立在对中国事件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在美国激进主义者中，毛主义或者马克思列宁主义意味着这样一种观点，美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力量之间的斗争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世界冲突，反帝国主义斗争是由第三世界及其在西方的盟友国家领导的，尤其是年轻人和有色人种，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中国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领袖（第三世界主义的非毛主义形式把古巴，或者对于一些人来说，把阿尔巴尼亚当作领袖）。毛主义被进一步认为是毛派们义不容辞组织革命的责任，它不再需要已经面向革命的人群，但是能够或多或少地不顾及环境因素而通过充分自我规训、有奉献精神并且有经验的革命群体来实现。主流毛主义号召建立一种等级式的先锋政党来领导革命，但在法国一个反等级的毛主义组织，无产者左翼组织，主导着 70 年代早期的左翼，在美国，当许多活动者在从未加入过毛主义组织的情况下开始以毛主义或更为宽泛的第三世界主义术语来理解革命的时候，等级式的毛派组织仍然很少。^①

在 60 年代晚期和 70 年代早期的美国左翼中，毛主义成为更广泛、明确的革命性左翼派别的主导要素。在这样一个作为整体的派别中，毛主义和一个更广泛的由第三世界革命运动所激励的第三世界主义结合在一起，而且有时候试图模仿它们，而不去顾及这些社会和美国之间的差异。在左翼这一派别中，

^① On French Maoism see A. Belden Fields, *Trotskyism and Maoism: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stport: Praeger Press, 1988), Chapter 3.

只有相对较少的组织真正从事暴力活动，而许多却采用暴力的言辞。黑豹党在整个运动中赢得了尊重，这是通过他们的社区组织项目和战斗性结合以及乐意同白人一起工作来实现的。依赖作为权力象征的枪支，以及黑豹党内部的暴力文化，在使其他激进分子暴力话语合法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激进分子设想武装斗争以及也许在并不太遥远的未来的某一时刻能够占领国家。种族分离主义，最初由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提倡，同样也被运动中的毛主义/第三世界主义派所推进，被迫切的妇女运动所采用，并且很快被认为在整个运动中是激进组织的基本原则。^①

无政府主义运动派在许多问题上与毛派观点不一，特别是拒绝毛派所加入的，或者至少是思考的组织的等级形式。无政府主义者对占领国家或掌握国家政权不感兴趣。许多毛主义者渴望建立先锋政党，他们希望这种先锋政党能够领导革命；没有比这更远离无政府主义对政治的理解了。在60年代运动中繁荣起来的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总的来说对暴力是极其厌恶的。无政府主义者拒绝认同外国的想法，更不用说支持或跟随它了。无政府主义强调个人见证，并且倾向于一种道德的政治观念；相反，毛主义将自身描绘为战略性的和意志坚强的（然而它的实际战略可能是值得怀疑的），并且摆脱运动中其他领域的道德苛求。

尽管有这些差异，无政府主义者和毛主义在运动中关注许多共同的问题。虽然有明确的毛派组织存在，但毛主义在运动中的影响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毛主义与第三世界主义的混合的影响力，更多地基于第三世界革命的吸引力，特别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切·格瓦拉的个人魅力，而不是基于国内毛派组织的影响力。无政府主义在运动中也是一个宽广的文化思潮，不完全与任何一个组织相一致。此外，毛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彼此并不存在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毛主义的辩证法指向苏联和美国共产党，而不是无政府主义。对于激进主义者来说，采用一种视角而不需要思考自己正在跨越任何一条意识形态的界线是相对容易的事情。

无政府主义和毛主义在文化政治上有相同的取向，在他们看来改变人民思想，以及把社会作为整体来管理的思想，是重要的，即使不是重要的也是革

① Max Elbaum describes the Maoist or Marxist-Leninist current in the American left of the late sixties and early seventies in *Revolution in the Air: Sixties Radicals turn to Lenin, Mao and Che* (London: Verso, 2002), Part II.

命政治的组成部分。毛派政治文化的概念是基于中国文化大革命，但由于毛派和其他美国激进分子对中国实际上发生了什么知道得相对较少，因此很容易想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建立在争取民主和平等社会之上的普遍性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毛主义的文化视角分享了对无政府主义思潮极为重要的乌托邦主义的某些东西。无政府主义和毛派思潮对改革是革命的绊脚石持相同观点。毛主义者认为苏联修正主义是其主要目标，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看作是敌人，这种观点与无政府主义者和许多其他运动激进分子所持有的观点有重叠之处，即右翼已经不再是一个具有任何意义的问题了，自由主义已经取而代之成为执政的意识形态。毛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把被边缘化的，尤其是黑人和其他有色群体，当作革命的主要行动者，同时倾向于让他们反对大多数人。毛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如何建立一个大多数人的运动这样一个问题都不是很关心。无政府主义者关心的是参与式民主，也就是推动决策制定的大众性参与，但是他们蔑视选举政治。毛主义者对民主几乎不感兴趣：他们的革命概念围绕着由革命精英掌控，得到人民支持的领导权展开；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们对选举政治基本不感兴趣。无政府主义者和毛主义者把激进政治理解为一个极化差异的过程。两者都把妥协等同于出卖。

形成于 60 年代晚期的激进主义的概念，在那个时候是可以理解的。它表达了那一代人对于越战的愤怒，以及对不一样的社会和世界的乌托邦构想。在它繁荣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动员了一大批年轻人；温和的激进主义概念可能不会发挥同样的作用。但即使是在当时，这个激进主义的概念也是有缺陷的。暴力言论和实际的暴力威胁，迫使许多人特别是妇女退出了运动，并且对即时革命的期盼导致人们普遍感到失望。边缘化群体作为革命行动者的观点，使运动激进分子看不清存在问题的群体的复杂政治，也看不清楚他们不必然与年轻激进分子意见完全一致这样一个事实。自由主义作为主要敌人的观点，使得运动激进分子无法为 70 年代晚期右翼复兴作好充分准备。

今天很少有人会相信革命即将到来，很少有人提倡暴力革命，或呼吁占领国家。很少有人把第三世界（或是除拉丁美洲以外的南半球国家）看作是革命的主要源泉甚至看作是激进政治。尽管如此，60 年代晚期 /70 年代早期激进主义概念的某些方面仍然存在。改革和革命是相互敌对的观念，似乎已深深陷入到左翼话语之中，阻碍了对于什么形式的改革能够导致巨大改变这样的考虑。激进政治作为边缘人群特性的观点继续盛行着。对主流文化的批判依然是

左翼关注的焦点，这使得他们很难与那些认同那种文化某些方面的团体建立联盟。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的持续性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再也没有什么运动像 60 年代尤其是其后期出现的运动那样强劲。许多老左派们仍然依恋他们在年青时候试图引起的革命，并认为任何其他路径都是一种失败。除了后结构主义及其密切相关的思潮外，后现代主义在维持激进主义的概念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这个概念与 60 年代晚期 /70 年代早期的激进主义，特别是毛主义思潮非常接近，甚至受到它们很大影响。后结构主义在那个时候的巴黎出现，在其创立者参与大批毛主义左派的这样的背景下产生。^① 后结构主义维持了这样一种激进主义概念，即对自由主义的攻击，民主是一种隐蔽的控制形式，对边缘化人群的认同的赞颂，围绕边缘化和被排斥者叛乱的反抗，以及左翼把统一看作是和其他地方一样的压迫的理解。激进政治的这种理解已经具有深远影响，特别是在学术界，但在学界之外也是如此，并且促成了当前美国很少存在的左翼的边缘化。

我的目的并不是让任何人都相信，50 年代和 60 年代发展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为左翼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只是一系列视角，而非政治平台。此外，40 或 50 年之前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著作，要么遗漏了要么很少关注从那时起变得重要的问题。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者，并没有意识到环境问题。性别和性问题对于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者来说也不是优先关注的问题（马尔库塞是一个例外）；他们支持争取种族平等的运动，但在大多情况下，对于种族主义他们鲜有论及（弗朗茨·法农是一个例外）。在对于人本质的讨论中，他们以一种如今看起来夸张的方式将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然而，这些隔阂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而不是他们视角的基本局限性造成的。

我们需要一种政治视角，它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建构一种大众运动，寻找一种能够通向更广泛的社会改变并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我们需要一种包容的政治，这种政治尤为关注那些面临种族和其他歧视的人的需要，

① On the involvement of poststructuralists and other intellectuals in French Maoism,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ir thinking, see R. Wolin, *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the 1960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同时也关注阶级问题，并且为大多数人的需要说话。我们需要一种把暴力最小化的社会变革观念。在这种观念下，大多数人把任何提倡暴力的人都看作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对问题的解决。我们需要一种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这是一个有人想居住并且能够实现的社会。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能够说明这一切。如果我们不采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视角或是或者类似的视角的话，那么极有可能我们将根本不再拥有真正的左翼。

芭芭拉·艾布斯坦最近刚从加州大学圣克鲁斯意识发展史系退休。她目前正在写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书。她最近的一本著作是《明斯克贫民窟，1941—43：犹太人的反抗和苏联的国际主义》（加州大学出版社 2008）

译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马克思的性别和家庭观概要^{①②}

希斯·布朗 / 文 吴华眉 / 译

[摘要] 本文系希斯·布朗对其2013年出版的《马克思论性别和家庭：一种批判性的研究》一书结语的改写，该文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关于女性和家庭的文献和核心观点，特别是关于性别与分工、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关系的观点。文章也涉及到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家庭结构变迁和妇女压迫根源上的不同观点，认为马克思并非是一种经济决定论者，而是一个辩证的思想家，马克思不仅关心工人阶级妇女，而且关心包括资产阶级妇女在内的所有妇女的解放。最后文章扼要地讨论了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特别是对推进女性主义研究的意义。本文对理解马克思的性别观和家庭观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且对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许多女性主义学者的观点至多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含糊不清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之间的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争论之一。

卢卡奇、特雷尔·卡弗 (Terrell Carver) 和其他人的研究已表明了马克思

① Heather Brown, Marx on Gender and the Family: A Summary 载 Monthly Review, No.2, Volume 66, 2014/06

② 希斯·布朗 (Heather Brown) 是韦斯特菲尔德州立大学的政治学助理教授。本文是作者对其《马克思论性别和家庭：一种批判性的研究》(2013) 一书的结语的改写。

和恩格斯在辩证法以及许多其他问题上的区别。^①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性别和家庭方面观点的差异进行了探究。这与当前的争论尤其相关。因为在许多女性主义学者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她们对此进行了批判。然而，卢卡奇和卡弗共同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经济决定论的程度上存在重大差异。他们二人都认为恩格斯比马克思具有更多一元论和实证的倾向。杜娜叶夫斯卡娅 (Raya Dunayevskaya) 也指出，与马克思对两性关系更微妙的辩证理解相比，恩格斯立场中更具有一元论和决定论的本质。^② 当她指出这一点时，她是少数几个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性别的观点进行区分的人之一。

近年来，关于马克思论性别和家庭的作品极少被提及，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这些作品引起了许多争论。在许多情况下，马克思全部理论的要害被诸如南希·哈索克 (Nancy Hartsock)、海蒂·哈特曼 (Heidi Hartmann) 等女性主义学者融入了精神分析或其他形式的女性主义理论。^③ 尽管这些学者保留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解生产的起点，但她们将马克思的理论视为根本的性别盲 (gender blind)，认为要用它来理解性别关系还需要附加另外的理论。此外，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也在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到 80 年代作出了她们自己的贡献，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比如，玛格瑞特·本斯顿 (Margaret Benston)、达拉·考斯塔 (Mariarosa Dalla Costa)、西尔维·弗德里希 (Silvia Federici) 和维利·塞考伯 (Wally Secombe) 都试图重新评价家务劳动的价值。^④ 另外，莉丝·沃格尔 (Lise Vogel) 尝试超越

① 参见 Georg Luka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71), originally 1923; and Terrell Carver, *Marx & Engels: 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② Raya Dunayevskaya, *Rosa Luxemburg, Women's Liberation, and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originally 1981.

③ Heidi Hartman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in Linda Nicholson, ed, *The Second Wave: A Reader in Feminist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originally 1981; Nancy Hartsock, *Money, Sex, and Power: Toward A Fem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Longman, 1983) .

④ Margaret Benst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 Liberation," *Monthly Review* 21, no.4 (1969) :13-27, Mariarosa Dalla Costa and Selma James,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Brooklyn: Petroleuse Press, 1971) ; Silvia Federici, *Wages Against Housework* (Bristol: Falling Wall Press, 1975); Wally Secombe, "The Housewife and Her Labour under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 no.83 (1974) :3-24.

二元制的双重系统，以达到关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再生产的一元化的统一理解。^① 南希·豪尔姆斯特朗（Nancy Holmstrom）也表明了可以用马克思的理论来理解关于女人的本质的历史发展过程。^②

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双系统理论是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共同形式，它被许多 90 年代及其以后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是一项失败的方案。不管怎样，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失败很可能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声望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正如艾莉斯·杨（Iris Young）已经论证的，双系统理论是不恰当的，因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两个范畴建立于两个非常不同的社会理论之上：一个涉及社会的历史动力学，从根本上是社会的、经济的和科技的概念，而另一个建立在关于人性的静态心理学观点之上。^③ 由于这些巨大的差异这两种理论很难调和。尽管如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她们所认为的马克思的决定论、性别盲点范畴和以生殖为代价而强调生产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这为我们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来重新考察马克思的著作提供了一个起点——除了上文提及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的作品。

虽然马克思的作品含有维多利亚时代意识形态的元素，但其对性别和家庭问题的关注颇多。早在 1844 年，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就论证说女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总的来说可以用作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马克思当然不是第一个提出类似观点的人——这一想法的提出人们常常将其归功于沙利·傅立叶（Charles Fourier）——但对马克思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简单地要求男人改变女人的地位的口号，而事实上，它是马克思直接与其全部社会理论相联系所做的辩证论证。为了社会的发展能超出资本主义的形式，必须构建新的社会形式，这仅仅依赖于一个粗陋的、疏远的价值构想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必须能够将彼此视为因其自身而有价值，而不是其价值在于可以为另一个人提供价值。就这一点而言对女人尤为重要，因为她们在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社会中往往是作为边缘化的群体存在。由此，男人和女人势必发展到这样一个层

①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② Nancy Holmstrom, "A Marxist Theory of Women's Nature." *Ethics* 94, no. 3 (1984): 456-73.

③ Iris Young, "Socialist Feminism and the Limits of Dual Systems Theory." *Socialist Review* 10, nos. 2-3 (1980): 169-88.

次，即，一个人是因其所是而非因任何关于男人女人的抽象分类而具有价值。

此外，马克思似乎指向了作为一种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性别分类方向。虽然不可否认，马克思从未直接地做出这样的论断，但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对关于自然/社会二元论的传统的二元观点提供了一种强烈的批评和可行的替代方案。马克思的观点与将自然和社会视为两个明显不同实体的观点不同，那种观点认为自然和社会相互作用却不从根本改变自我和他者的本质，马克思则认为这两者是辩证相关的。当人与自然通过劳动相互作用时，人和自然都被改变了。这是因为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存在，而劳动过程为这种暂时的统一提供了手段。既然自然和社会不是静态的实体，马克思论证说不存在什么超历史的“自然”概念，相反，“自然”的概念只与特定的历史境遇相关。

尽管不应该在自然/文化的二元论和男人/女人的二元论之间做太紧密的比拟——这样做将导致我们寻求改变的这些分类的物化——但是，马克思显示出的关于自然/文化二元论的辩证思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劳动的性别分工的讨论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他们针对早期家庭中的劳动分工，指出那不是完全“自然的”现象。在他们关于家庭发展的简要讨论中，他们甚至指出建立在性别上的劳动分工仅仅对于非常落后的生产关系来说是“自然的”，因为在那里女人独特的生理特性使得她们很难去完成某些身体上要求很高的工作。这一观点暗示着女人在这些社会中所谓的劣势是可以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的。此外，既然考虑到社会因素，那么需要的就不仅是技术的发展，女人也必须付出努力改变她们的处境。

马克思在其早期作品中至少有另外两处讨论了女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问题。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批判了欧仁·苏（Eugene Sue）对于在《巴黎的秘密》中虚构的巴黎妓女玛丽花（Fleur de Marie）的说教式评论。在这部小说中，一个德国公爵把玛丽花从贫困和妓女的生活中“救出”，并交付给一个信教的妇人和一个教士照顾，他们都教导她，使她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伤风败俗。最终，玛丽花进入修道院并很快死去。

在这里，马克思对苏不加批判地接受天主教的社会训导进行了批评。这种社会训导只关注道德的抽象形式，而这种形式永远不能得到真实的实现。人类不是可以忽视其身体需要的单一精神存在物。这一点对于某些像玛丽花这样的人来说尤其具有意义，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言，玛丽花除了靠卖淫来维持生

计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然而，教士无视玛丽花没有任何真正的选择自由，而只顾向玛丽花表明她的道德堕落，并要求其感知这种罪行。由此，在这个文本中，马克思对工人阶级妇女给予了大量的同情，不仅如此，他还批判了基督教教义的片面性，认为该教义反对身体的纯形式，而抬高了精神的纯形式的地位。

此外，马克思没有将其对女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体处境的批判局限于工人阶级。在他 1846 年关于《珀歌论自杀》的书评 / 译文中，马克思指出了上层阶级中的家庭压迫。^① 在那篇文章中，马克思讨论了四个案例，其中有三个涉及了由于家庭压迫而引起的女性自杀。在其中一个案例中，一个已婚的女人自杀，至少部分原因是因为她好猜疑的丈夫将她关在家里面并对其进行身体虐待和性虐待。第二个案例涉及到一个订了婚的女人，她在未婚夫家里过了夜，回家之后被父母在大庭广众下羞辱之后，她跳水身亡。最后一个例子涉及到一个年轻女人，她在与姑父通奸后无力去堕胎而选择自杀。

在其中的两个例子中，马克思对珀歌文中特定的段落进行了强调并悄然加上自己的评论，对这些女人的困境表示出了极大的同情。此外，马克思还指出需要对资产阶级家庭进行彻底地转变，为此，他对珀歌如下的一段进行强调：“革命没有推翻所有的暴政。人们所批判的任意暴力的罪恶存在于家庭中，在那里引起了危机，类似于那些革命。”^② 以这种方式，马克思指出了在资产阶级的家庭形式是压迫性的，如果有更好的社会出现，必定会有重大改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回到对资产阶级家庭的批评。在那里，他们认为，建立于财产的控制和转让之上的资产阶级家庭基本上处于一种分裂解体状态。通向这种家庭形式的物质条件正在无产者中消失，因为无产阶级没有财产留给他们的孩子。无产阶级或许曾是勉强糊口的农民，但是当被多种手段剥夺了田地，被迫进入城市和工厂以维持生计，这不再可能。他们死后没有财产留给子女，有生之年对家庭劳动力没有自主权，父亲的权力大大减弱了，引向一个不同的家庭形式。然而，到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详细地讨论这种家庭形式解体之后将可能出现什么。

① Karl Marx, "Peuchet on Suicide", in Eric Plaut and Kevin Anderson, eds, *Marx on Suicid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9), originally 1846.

② Karl Marx, "Peuchet on Suicide", in Eric Plaut and Kevin Anderson, eds, *Marx on Suicid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9), originally 51.

尽管《资本论》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但其中仍有大量关于性别和家庭的讨论。其中马克思重返并具体化了他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描述的家庭的消灭【扬弃】。当机器被引入工厂，需要更少的体力劳动，女人和孩子也变成了工人中的重要类别。资本发现这些工人尤其有价值，因为他们来自于被压迫的群体，不得不为了更少的工资而工作。

《资本论》中大量其他段落显示，相比大部分女性主义者所认知的，马克思对于女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有一个更微妙的看法。例如，他写道，当女人加入劳动力大军，她们潜在地在其私人生活中获得了权力，因为她们现在从财政上有助于家庭的福利了，并且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再处于丈夫或父亲的直接控制之下。这对家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这种发展的两面性：一方面，长时间工作和夜间工作趋向于暗中破坏了传统家庭的结构，因为女人将由于她们的工作一定程度上“男性化”，常常不能像以前那样照顾她们的孩子。另一方面，在后面的一段中，马克思指出，这个表面上的“角色退化”引入了相反的方向——朝向“一个更高级的家庭形式”，在那里女人将真正与男性平等。^①

尽管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女工受压迫的讨论仍是有限。第一卷和较早的为《资本论》写的手稿中，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概念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在这里，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概念和生产劳动概念本身做了很大的区分。第一个概念是对生产力的片面理解，其唯一相关的因素是为了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而生产劳动的第二个概念聚焦于使用价值的生产。在这里，如果劳动可生产个人和社会广泛使用之物，劳动就其自身而言便是有价值的。这至少为重估女人劳动的价值提供了某些基础，即使马克思在这方面讨论甚少。

马克思的政治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示出一定的发展。马克思的理论见解常常融入其政治活动中。在关于 1853—1854 年的英国普雷斯顿罢工的一些早期作品中，针对工人对男性家庭薪资的需求，他提出相对不加批评的评价。虽然马克思从未直接否定这种论证，但他后来的立场似乎的确改变了，因为他在 19 世纪 60 年代便致力于女人在与男人享有平等的基础上加入第一国际的工作。

^① Karl Marx, *Capital*, vol.1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 , 621; originally 1867-75.

在巴黎公社期间及以后，马克思的后期作品显示了对职业妇女需求的进一步关注。这在1880年由马克思、保罗·拉法格和朱尔斯·盖德（Jules Guesde）共同撰写的《勒阿弗尔纲领》（Programme of the Parti Ouvrier）（工人党纲领——译者注）中尤为明显。总纲部分由马克思单独撰写，其明确指出，“无产者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解放。”^① 在法国这是尤其有力的声明，因为当时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中更多由性别歧视的蒲鲁东主义的传统占支配地位。

1858年，在马克思为“纽约论坛报”撰写的作品中，他回到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上层阶级妇女地位的讨论。在为该报写的两篇文章中，马克思详述了一个贵族妇女布尔渥利顿夫人（Lady Bulwer-Lytton）的故事。为了让她保持沉默，阻止她使其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的丈夫陷入尴尬，她被监禁在精神病院里。在这里，马克思批判了所有卷入监禁行为的人，他论辩说她绝没有精神失常。尽管马克思没有讨论作为一种控制的手段，女人尤其经常被错误地监禁，但他的确指明了，如果那些要求监禁别人的人足够有权有钱以引诱专业医疗人员给出他们的签字，那么人们容易被无视其实际精神状态而遭监禁。此外，他对布尔渥利顿夫人表示了巨大的同情，她因一个协议而被有效地保持了沉默，即只要她同意绝口不提那个事件，她就能重获自由。

从1879—1883年，马克思的晚年是马克思生命中理论上最有趣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尤其关注性别和家庭问题。在他的研究笔记、书信和已出版的作品中，他开始表达一种更少决定论（less-deterministic）的社会发展模式，其中，欠发达的社会可以成为首先开展革命之地，只要其他的革命发达国家紧随其后。马克思将新的历史主体融入了他的理论。不仅仅工人阶级作为能够革命的纯粹主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农民，特别是妇女，也成为寻求改变的重要力量。虽然以一种支离破碎的方式，这些笔记本仍给出马克思如何看待历史进程中女人作为主体的某些迹象。

马克思关于摩尔根的笔记提供了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进行直接比较的文本，因此其尤为重要。虽然恩格斯自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马克思阅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较为相似，但事实上二者有着

① Karl Marx in David Fernbach, e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Political Writings*, vol. 3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376.

重要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理解更少决定论色彩，而对较平等部落中矛盾的把握则更加辩证（more-dialectical）。

恩格斯趋向于将社会发展的因素几乎单一和片面地集中在经济和科技的变化上。相比之下，马克思采取了一种更辩证的方式，在那里社会组织不不仅是主观的因素，而且在特定情况下，还可能变为客观的因素。理解这一点对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性别压迫问题上的观念区别特别有意义。恩格斯争论说，农业技术、私有财产的发展及随后部落从母权到男权的转变导致了“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自此女人将一直处于从属的姿态，直到私有财产被摧毁。与之相对照，马克思在其关于希腊女神的讨论中，不是指明女人的从属位置，而且指出了即使是在私有财产制下也存在变革的潜在可能。纵然古代希腊社会对女人来说是很具压迫性的，她们被限制在家里的狭小范围内，马克思仍论争说，希腊女神的描述为女人潜在地提供了备选模型。马克思在其笔记中亦表明与同地位的希腊妇女相比罗马上层阶级妇女的进步。此外，对于早期平等社会的发展的矛盾，马克思趋向于运用一种微妙的和辩证的方式来看待，恩格斯趋向于认为，较平等的公社社会特别是在其性别关系上不存在重大的矛盾，^①但马克思则指出了公有制的易洛魁人（北美印第安人——译者著）社会中女人权利的限制性。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只讨论了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笔记，马克思关于人类学的笔记则涉及大量的其他来源。马克思关于亨利·萨姆奈·梅因（Henry Sumner Maine）的《早期制度史演讲》和亨利·兰格（Henry Lange）的《古代罗马》的笔记还提供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爱尔兰、印度和罗马）家庭和性别的重要讨论。^②在有关梅因和兰格两个作者的笔记中，马克思似乎挪用了摩尔根关于部落发展的许多理论。虽然对梅因笔记趋向于比朗格笔记更为挑剔，但两种情况下马克思对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父权制作为（家庭的——译者注）第一种形式的做法都进行了批判。

① 这在 Heather Brown, *Marx on Gender and the Family: A Critical Study*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3), chapter 5. 中进行了阐述。

② 马克思关于梅因的笔记在 Karl Marx (Lawrence Krader, ed.),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 (Studies of Morgan, Phear, Maine, Lubbock) (Assen, Netherlands: Van Gorcum & Co., 1972) 可以找到。马克思关于 Lange 的笔记尚未出版；英文翻译由那些与 MEGA 项目合作的人士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马克思以上的批判特别重要，因为其倾向于指出对家庭的历史性理解。如同摩尔根所记录的，马克思也记述了出现在每个形式的家庭中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如何尖锐化并导致家庭结构的重大改变。在这里，马克思似乎认为家庭与社会中的其他领域一样，受相似辩证法的制约。

对马克思关于性别和家庭研究成果之当代意义的评价

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联系的研究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这通常是由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性别和传统女性的问题缺乏讨论，而且，即使在论及性别和家庭的地方，这些研究也倾向于追随恩格斯那种不那么细致入微的而又更多经济取向的论证。可是，我认为马克思关于性别和家庭的研究与恩格斯的那些研究相比表现出值得注意的差异。考虑到马克思有关性别和家庭的见解的可能价值，重要的问题仍然存在：马克思为当代女性主义论争提供些什么？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有没有可能不陷入经济决定论或重阶级而轻性别？

的确，马克思关于性别和家庭的描述偶尔表现出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但正如我所论争的，这未必是他研究中的致命弱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在许多方面提供了将女性主义的洞察融入马克思主义，建立性别和阶级压迫的统一理论而不从根本上给予其中任何一个以特权的可能性。

马克思理解性别和家庭的成果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马克思的辩证方法。马克思的哲学范畴来自于其关于经验世界的分析，是动态的，建立于社会关系之上的，而非静态的、非历史的构想。由此，这些哲学范畴将随着社会的改变而发生改变。

这将对女性主义的分析具有潜在的价值。马克思从未直接提出性别化的二元论和范畴，但在其理论中为在这些范畴内进行改变留下了空间。就自然/文化二元论和生产/生殖二元论这两种二元论来说这是特别真实的。马克思指出了这两种情况的历史和暂时性质。自然和文化不是绝对的对立面：相反，它们是整体的环节。劳动，作为生存的必要活动，在相关的特殊生产模式基础上用特定的方式中介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依照生产和生殖的二元论，马克思通常小心地指明这二者对人类都是必要的，但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这些不同的形式是建立在相关社会的技术和社会发展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指向这些范畴的两个不同方面——历史的特定元素和每个社会都存在的比较抽象的特征，从而根据对女人与这些二元论之间关系的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将指出，生物学的特征的确是有意義的，但不能认为生物特征是外在于特定社会的社会关系的。明确这一点，既可以潜在地帮助避免一些激进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生物学主义和决定论的论点，她们将“女人本性”本质化；同时也可以避免相对主义，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世界不是完全由社会建构的。更确切的说，从一个社会作为中介的体系来看，生物学和自然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马克思关于性别和家庭的研究从另外的原因来看也是很重要的。马克思为性别作为理解资本主义的重要方面提供了一定的解释，不过，这仍是不够充分的。然而，当父权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证明自身时，马克思的范畴引向了对于父权制进行系统批判的方向，因为他能够从女人受压迫的更普遍形式中区分出父权制的历史的、具体的因素，虽然它存在于人类历史的许多时间里。在这个意义上，当马克思对资本的批评再次引人注目之际，他的范畴将为女性主义的理论提供资源，或至少提供了新的对话空间。

当马克思集中讨论研究社会中介并强调对特定社会系统的理解时，他如同当代学术研究所证明的，避免了经济决定论。固然，经济因素在他的思想中仍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制约着其他的社会行为，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不过，马克思通常小心地指出经济和社会因素之间交互的辩证的联系。就像自然和文化、生产和生殖一样，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在特定的生产模式中是整体中的环节。在最终的分析中，这两者不能被完全分离开来。正如马克思在其关于“自杀”的论文和纽约论坛报上的文章里所阐明的，经济和父权制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形式之间相互作用以压迫妇女。由此，马克思在这些以及其他作品中，至少尝试性地开始了探讨阶级和性别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其分析中，两者谁也不起根本决定作用。

尽管马克思作品中不是所有层面对今天都有价值，一些还带有 19 世纪思想的局限，但它们仍在性别和政治思想上提出了具有巨大价值的洞见。即使马克思关于性别并没有写作很多，没有发展有关性别和家庭的系统理论，但是，对他来说，这仍是一种从总体上理解劳动分工、生产和社会的必要范畴。马克思关于性别和家庭的探讨远不仅仅包含作为工厂工人的妇女，马克思特别提到在资产阶级家庭中对女性压迫的持续，并提出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家庭形式。另

外，随着他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并见证了女人在诸如 1871 年巴黎公社这样重大事件中的作用，马克思越来越支持了女人在工作场所、在工会、在第一国际中对平等的诉求。马克思通过选择研究摩尔根、梅因和兰格的作品，非常直接地指出了家庭的历史特性，因而尽管马克思关于人类学的笔记略显粗陋，但它仍旧特别重要。此外，大体而论，马克思似乎将性别视为变革和发展的主体，而非将其看作一个静态的概念，他对辩证法的运用对于女性主义和社会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贡献。

译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

学派研究

作为革命武器的哲学

——马克思穿越阿尔都塞^①

西蒙·乔特^② / 文 洪燕妮 孙亮 / 译

[摘要] 要理解阿尔都塞思想的复杂性，并对其作恰当的理论定位是极其艰难的，但回避这种难处又不可能对其作出合理的理论评价。在学术界对阿尔都塞“多重面相”进行揣度的过程中，必须首先面对如下一些基本难题：到底该如何定位阿尔都塞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逗留”？如何在哲学与政治之间理解马克思？反对黑格尔之于阿尔都塞的重要性又在何处？阿尔都塞如何界定唯心主义以及其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思想关联等。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慎思明辨，才能真正地切进阿尔都塞的思想深处。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后结构主义 阿尔都塞 哲学

作为法国和国际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之间的一个链接点，阿尔都塞在我转向后结构主义之前已经备受关注了。他对马克思的研究工

① 基金项目：译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ZX00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720029）的阶段性和成果。

② 本文译自 Simon Choat: *Marx Through Post-Structuralism* □ Lyotard, Derrida, Foucault, Deleuze; Continuum, London, 2010, P17-29. 西蒙·乔特，现任教于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政治学系。

作与后结构主义有着许多共同之处。然而，我在这儿提起他，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表明他的研究方法与后结构主义有着重大的差别。尽管后结构主义是建立在阿尔都塞的工作之上，但是后结构主义在对待马克思的问题上并没有简单地采用“阿尔都塞式”的立场。这样，将研究视野集中于阿尔都塞在建立后结构主义之上阅读马克思的独特性方面，将是一个重要的步骤。独一无二的后结构主义立场反过来影响了阿尔都塞的晚期创作。然而，在我阅读阿尔都塞的著作之前，有几个潜在的困境必须提出来。

一、定位阿尔都塞

一定意义上讲，在 20 世纪法国哲学发展历程中，去寻找阿尔都塞的“地位”看起来相对容易，因为他似乎促成了两种主导思潮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这样，首先存在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次存在稍微有所不同的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我想要采取的方法，也不是我想要采取的对阿尔都塞著作细微差别的评价。这一评价将引起对这种难以恰当分类的挑战。他享有反人道主义的时代特性：阿尔都塞在 1964 年称：“除非在绝对的前提下，即在哲学的（理论的）人的神话沦为骨灰的前提下”，否则，“不可能熟知人的一切”。^① 他高度赞扬拉康，阿尔都塞回到马克思，而拉康则回到弗洛伊德，他们之间能划上一道平行线。然而，阿尔都塞也草率地轻视了结构主义的工作。尽管斯特劳斯谦虚地称赞过马克思，但他同样嘲笑其忽略了马克思。^② 在 1966 年致拉康的信中，阿尔都塞声明“人们能够足以清晰地弄清……在没有任何可能的困惑的情况下，以何种方式去将马克思主义结构概念区别于斯特劳斯的结构概念”。^③（甚至区别于结构主义的唯心偏离）在其他地方，阿尔都塞表达了对这个词的愤慨，他坦言“我们从不是结构主义者”，这表明“我们在《阅读〈资本论〉》里与结构主义者‘调情’的术语显然超出

①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NLB, 1969, P229.

② Althusser, Louis, *The Humanist Controversy and Other writings (1966-67)*, ed. Francois Matheron, trans. G. M. Goshgarian. London: Verso. 2003, P31, P21.

③ Althusser, Louis, *Writings on Psychoanalysis: Freud and Lacan*, ed. Oliver corpet and francois Matheron, trans. Jeffrey, Mehl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71.

了可接受的限度，因为我们批判理论家，有几个是例外的，没有看到反语或故意打油诗”。^① 但是，当一个人竟然确定避免给阿尔都塞贴上结构主义者的标签或让其处于那样的情况时，他对结构主义的调情不能简单地沦为反语，即无论在阿尔都塞和诸如斯特劳斯的学者之间存在多么大的差异，前者在一种叫结构主义的东西那里都清楚地看到很有趣的方面。甚至，在马克思那里看到一些类似结构主义的方面。如阿尔都塞在1984年的一封信中所说的：“一旦我们与结构主义调情，不单单是因为它正在流行；还因为有人在《资本论》中发现教条，发展良好的教条，它接近于授予结构主义的用法，或者至少，与其相调情。”^②

阿尔都塞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可能看起来较为直接，但其内在关系比表露出来的更为复杂。他通常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结盟，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些共性（关注哲学，受非马克思主义影响，反对并不复杂的经济决定论，批判斯大林主义）。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大多特性全部异质于阿尔都塞。（事实上，以至于一些解释者不把他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行列（比如雅各比）。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反苏维埃的马克思主义的身份出场，它怀疑科学主义，对黑格尔抱以同情，注重青年马克思，热衷于重建主体和人道主义。另一方面，阿尔都塞嘲讽人道主义，拒绝青年马克思，试图在马克思内将所有黑格尔主义清除出去，寻找建立使马克思成为一门科学的可能性，罕见地褒扬了列宁。阿尔都塞的工作是独一无二的，它不能被轻易地归类。然而，如果他是独一无二的，那么这就不是因为他孤立于他同时代的学者，以及切断了所有存在的理论兴趣和问题。而是相反，因为他独自被置于许多显著思潮的纷争的交汇处。为了现在的目的，在阿尔都塞的大多重要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随后发生的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交战的一个“预案”。阿尔都塞用他自己的“3Hs”去论战，他为反人道主义、反历史主义和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辩护，他预想了许多后来被利奥塔、德里达、福柯和德勒兹等人提起的问题。

这并不意味着有可能去建构一个完整的叙事，其中包括马克思首次被结构主义过滤，然后进一步被后结构主义所提炼。虽然生于1918的阿尔都塞比

① Althusser, Louis, *Essays in Self-Criticism*, trans. Grahame Lock. London: NLB. 1976, P131, P127.

② Althusser Louis, *Philosophy of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1987*, ed. Olivier Corpet and Francois Matheron, trans. G.M. Goshgarian. London: Verso. 2006, P210-211.

后结构主义者稍微年长一些，由于他的哲学发展被纳粹分子囚禁在监狱所打断，因此他最具影响的巨作是在 60 年代早期到 70 年代中期完成的，这使得他既是后结构主义同时代的人又是后结构主义的先驱。德勒兹的《尼采和哲学》和福柯的《疯癫的文明》在日期上都先于《阅读〈资本论〉》；阿尔都塞的《自我批评的材料》在德里达《语法学》和利奥塔《话语、图像》之后出现。更有甚者，不存在“一个”阿尔都塞：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讽刺手法背后，他的多个文本存在极大的不同。他着手于一个近乎持久的自我批评过程，经过无数次修订和重写。比如，格雷戈里·艾略特认为，阿尔都塞的著作从早期评论黑格尔到 80 年代评论“偶然的唯物主义”（至少）可以被分成五个方面。^① 这些方面并没有遵循完整的革命谋划：阿尔都塞著作中的张力和差距与他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现的张力和差距一样多。阿尔都塞写于 80 年代的大部分材料，在他死后——即在他正式的学术生涯结束后——出版，这重新引起学界对它的兴趣，这一兴趣在过去的十年蓬勃发展。这些著作延续了阿尔都塞的早期著作，并标志了一个转向：以后（指第六章——译者注），我将讨论在他的后期著作中有可能找到后结构主义影响阿尔都塞的证据。80 年代的阿尔都塞更像是后结构主义的后继者而不是先驱者。

然而，在他引用他们的著作之前，至少在他开始解读马克思时，阿尔都塞首先作为后结构主义的先驱者而从事研究工作。至少存在两种方式，在这两种方式中，以此种称呼（例如，先驱者的称呼）去看待阿尔都塞是正当的。第一，存在一种强烈的意识，其中他属于不同的较早的理性派（不错，在结构主义的名义下把他归到理性派是可能的）：尤其是，超出几个（虽然值得称赞的）陈述，他在 80 年代以前的著作并没有与尼采论战。第二，在这些思想家当中，阿尔都塞是马克思的早期理论家，具有双重意义：他既是第一个认真研读马克思著作的思想家，又是一个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研究马克思方面的人。后结构主义的趣味性巨著大部分是紧随阿尔都塞之后出现的。我想进一步勘定阿尔都塞著作的不同特点，包括他对黑格尔的文本策略和态度以及对唯心主义的批判。现在，我将从阿尔都塞阅读马克思的意图开始。

^① Elliott, Gregory, Althusser: The Devour of Theory.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2006, P365-366

二、政治的马克思

将阿尔都塞的著作置放在时代背景中是必要的。作为法国共产党的一员，他希望在党内工作是为了将他导向一个不同的方向，试图与他一度忠诚的斯大林主义，以及与以人道主义来批判斯大林的路线做斗争。人道主义式的批判路线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盛行，现在提起它仅供参考。阿尔都塞解读马克思不是作为一种干瘪的学术操练，而是为了政治需要，为研究一种“回到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不被神圣的教条所硬化和歪曲，它是清晰的、批判的和严谨的”。^① 这旨在恢复一种激进政治的马克思并摆脱教条，符合阿尔都塞对哲学的定义，他将哲学定义为“阶级斗争的理论”。阿尔都塞的要点不是去建立马克思的逻辑命题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以及由此给予他在哲学史中的位置；其要点在于重新恢复实现政治目的的“政治的马克思”。对阿尔都塞来说，哲学“不是一个由屈从去定论的同质命题所构成的整体：真理或谬误。它是一个位置（命题）系统，通过这些位置，它自身在理论的阶级斗争中占据位置”。^② 哲学从来不是“纯粹的沉思，纯粹的无私欲的推测……更不是推测的意识形态和满足于‘解释世界’的哲学”，^③ 实际上，它是主动的和实践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阿尔都塞才公开坚持政治本质和哲学的功能。并批判早期著作中“纯理论”的《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因为这些著作高估了哲学的理论功能，低估了其政治功能。^④ 对政治哲学的吁求以含蓄的方式在阿尔都塞的早期著作中潜在地表现出来。借用阿尔都塞早期著作中用过的一个词来表达就是“哲学政治化”，它是一个阿尔都塞实践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提出的问题。

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原因，阿尔都塞首次经历了回到马克思。然而，这次返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回到不是一个单纯地收集资料的问题，作为沉默的

① Althusser, Louis, 'What Must Change in the Party', trans. Patrick Camiller, *New Left Review* 109: 19-45. 1978, P45.

② Althusser, Louis, *Essays in Self-Criticism*, trans. Grahame Lock. London: NLB. 1976, P131, P143.

③ Althusser, Louis, *Essays in Self-Criticism*, trans. Grahame Lock. London: NLB. 1976, P131, P57.

④ Althusser, Louis, *Essays in Self-Criticism*, trans. Grahame Lock. London: NLB. 1976, P131, P150.

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我们还是最好来听听他到底说了些什么。首先，对阿尔都塞来说，没有一个单一的马克思。至少，马克思的思想可以分为两个重要的时期，即1845年以前和1845年以后。阿尔都塞一再坚持1845年断裂期的重要性，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有意地与黑格尔和唯心主义的哲学传统决裂并确立一种新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或被阿尔都塞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然而，此时，阿尔都塞反复地使这一清晰的分期复杂化。甚至在阿尔都塞的早期著作中，这项计划并不简单。在他1965年收录在《保卫马克思》的一篇介绍性论文中，阿尔都塞进一步将马克思的著作分为四个阶段：1840-1844年的早期著作（它们自身又可分为“自由—理性主义时期”和“共产主义—理性主义时期”）；1845年断裂阶段的著作主要有《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57年过渡阶段的著作；1857年之后的成熟阶段的著作。^①在阿尔都塞后期作品中这一计划变得尤为复杂。阿尔都塞一边捍卫马克思与黑格尔断裂的意义，一边假设马克思文本中存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差异。

这并没有导致他主张一种理论上的折中主义，折中主义会把马克思分解成不同的因素，从这些因素中，人们能随心所欲地挑选。而阿尔都塞思索的是在马克思的问题框架中突出的问题、对象、概念。此一过程中，阿尔都塞在探索马克思新的东西，其突出的贡献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的特殊性”。^②有时阿尔都塞暗示这只意味着需要非常认真地阅读马克思，但是他也主张这种特殊性“在马克思的作品中不能被直接地理解到”。^③当然，必须阅读马克思，但绝非无辜的阅读。^④故而，阿尔都塞吁求一种文本的“症候式阅读”，人们应该把注意力既放在马克思说过的话又放在马克思没有说的话；既把注意力放在马克思的概念和陈述，也把它放在马克思的失语处、遗漏处和沉默处。只有症候式阅读才能识别问题框架——马克思正是在问题框架的深处进行写作的，才能区别马克思自己的观念革新与萦绕在他往后著作中的消失了了的表达方式。为了充分地理解马克思，为了去聆听“他的沉默和未说的话”^⑤也为了领悟其

①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LB, 1969, P34-37.

②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LB, 1969, P38.

③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LB, 1969, P38.

④ Althusser, Louis and E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LB, 1970, P14.

⑤ Althusser, Louis and E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LB, 1970, P143.

空白处的意义，阿尔都塞认为需要建构马克思。

然而，随之而来，马克思需要被建构和补充。马克思新科学的确立为新哲学提供了去精心策划在马克思那里尚未完善的哲学的机会。这种新哲学落后于其科学，这便是阿尔都塞所倡导的策略。“马克思的后继者大部分除了重复（例如，整合或解释）马克思自身的理论以外并没有对它作出什么成绩，他们盲目地陷入午夜的黑暗”。^① 为了照明黑夜，我们有必要走出单纯的解释。在部分上，阿尔都塞通过展示出不同且相互对立的马克思来完成澄明的工作。确实，毫不夸张地说，如艾略特所认为的，阿尔都塞只是抑制马克思与其计划不相符的那部分。比如，阿尔都塞的早期著作忽略了很多《大纲》^②，在他的死后出版的自传中，阿尔都塞乐意承认：

我抑制了【在马克思中】的一切，它看起来与他的唯物主义原则和残留的意识形态痕迹并不协调……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会遭到来自那些意于研究马克思书信内容的学者们不计其数的攻击原因。我的理论研究试图提供改变对马克思在许多问题上表面思想的方法。^③

但是，除了采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同的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的用法外，阿尔都塞还从不同的非马克思主义那里索取资源以补充马克思。由此其体现在《阅读〈资本论〉》一书中的马克思哲学观，用艾略特的话来说，大概就是“一个转变了的马克思主义之贝克莱的怀疑主义，它与某种斯宾诺莎的和结构主义的论点相结合，以及与马克思自身思考因素相结合”。^④ 阿尔都塞晚年情愿把他称为“一门贝克莱和结构主义的灵感哲学”，在他的最后的著作中，补充马克思的努力变得更为明显：他的“邂逅哲学”，或偶然的唯物主义，“将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将成为保卫马克思主义的一门哲学”。^⑤ 因此，一方面，阿尔都塞试图通过回到马克思来重新激活马克思；另一方面，他意识到马克思

① Althusser, Louis, *Philosophy and Spontaneous Philosophy of the Scientists and Other Essays*, ed. Gregory Elliott, trans. Ben Brewster et al. London: Verso. 1990, P276.

② Elliott, Gregory, *Althusser: The Devour of Theory*.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2006, P115.

③ Althusser, Louis, *The Future Lasts a Long Time and The Facts*, ed. Olivier Corpet and Yann Moulrier Boutang, trans. Richard Vease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93, P221.

④ Elliott, Gregory, *Althusser: The Devour of Theory*.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2006, P49.

⑤ Althusser Louis, *Philosophy of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1987*, ed. Olivier Corpet and Francois Matheron, trans. G.M. Goshgarian. London: Verso. 2006, P257-258.

文本中的差异，甚至，他指出这一差异需要某种重建，一种善于创造的劳动并不是简单地尝试去重新激活本源的、真实的马克思，而是必须以非马克思主义的资源来补充它。我们从来都不是哲学上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

三、反黑格尔

阿尔都塞认为重新激活马克思以及使法国共产党发生转向，必须与对黑格尔及黑格尔影响的批判同时进行理论处理。对阿尔都塞来说，斯大林主义的决定论及其人道主义批判是黑格尔主义有力的形式。由斯大林提出的经济—革命论不过是转化了的黑格尔主义，它以物质“代替了”黑格尔主义的“精神”或“绝对观念。”^①另一方面，其人道主义对手不过将马克思的总体置于科耶夫对黑格尔的人类学解读之上，仅是重述了人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过程。这样，由科莱蒂提出的反斯大林的人道主义—历史主义就不只是僵化的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颠倒。虽然斯大林可能已经将黑格尔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清除出去，但是其理论教条有效地抑制了黑格尔主义的计谋，虽然它可能在政治上反对斯大林主义，由法国共产党内部发起的批判基本上没有促使事情向前发展：“从其理论问题框架的观点而不是其政治类型和政治意图，这一人道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已重新发现第二国际的经济和机械的解释的基本理论原则。”^②

斯大林主义和人道主义迫使马克思主义陷入一个严酷的黑格尔主义框架中，由此，历史被看成是朝着预先决定的终点阶段发展的一个进步。对阿尔都塞来说，这曲解了马克思的贡献：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采取黑格尔的历史概念并把它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他以一种独一无二的方式将历史引入政治经济学，建构非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和社会概念。对于黑格尔来讲（据阿尔都塞所说），历史时间是连续的、同质的、并且与它自身是同时期的：每一个历史时期代表了其他的历史时期和包括它们的社会整体性。另一方面，阿尔都塞眼中的马克思认为，社会不能沦落为一种存在于单一共同的本质或中心的整体性之中，而是一个复杂的、不同结构（经济、政治、法律、科学、哲学等等）的统一体，

① Althusser Louis, *Philosophy of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1987*, ed. Olivier Corpet and Francois Matheron, trans. G.M. Goshgarian. London: Verso.2006,P254.

② Althusser, Louis and E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LB.1970,P138.

并且每一个结构有其自身的规律、自身的时间和历史，它不能被直接认识而必须被建构，它在关系中不是生产出连续的同质的时间，而是生产出总体决定的结构。马克思的社会的重新概念化意味着“以同一个历史时间去思想总体的不同结构的发展过程显得不再可能”。^①

接着，阿尔都塞对黑格尔展开进攻，同时对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也展开进攻。在马克思那里，既不存在人类学的黑格尔，也不存在颠倒的黑格尔；既没有人也没有目的：对马克思来说，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或目的的过程。然而，此阐述带来了一些问题，因为阿尔都塞主张马克思采取黑格尔的方法将历史观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这是他所称赞的“精髓”。在他1968年的《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一文中，阿尔都塞表示黑格尔的“人”绝不是历史主体。事实上，如果我们审视黑格尔的主体，我们将陷入自相矛盾，即倘若主体只是一个过程，那么便不存在主体之说，过程自身在目的论中。“抽走目的论，只剩下哲学范畴，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遗传了：没有主体的过程范畴。”^②而后，删除目的论，一个没有主体或目的的过程。黑格尔给马克思的“重要的礼物”，即“辩证法”^③这样一来，阿尔都塞对黑格尔的态度就显得多少有点模棱两可了。尽管在他的成熟的著作中表现出明显的反黑格尔主义，但是这也仅仅是年轻时期稍微具有一些黑格尔主义倾向。甚至，因为阿尔都塞需要一个辩证的马克思，他常常被黑格尔的幽灵所缠绕，不管他多么努力地驱除它。阿尔都塞一方面想使马克思摆脱黑格尔；另一方面也想保留黑格尔：他一贯强调马克思非黑格尔和反黑格尔的一面，而同时他意识到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的一些方面。在《保卫马克思》中，他声称“严格意义上，青年的马克思过去一直没有成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青年时期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求助于黑格尔的著作”。在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以前，最后一刻陷入黑格尔主义的底层，这是处于起跑线上的一刻，这一起跑线反映了“一个自相矛盾，即从理论上讲，文本离黑夜结束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而这一文本又离黎明前

① Althusser, Louis and E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LB. 1970, P99.

② Althusser, Louis, Politics and Histoty: Montesquieu, Rousseau, Hegel and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LB. 1972, P184-185.

③ Althusser, Louis, Politics and Histoty: Montesquieu, Rousseau, Hegel and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LB. 1972, P174.

的白昼最远。”^①然而，它看起来像黑夜的阴影一直延伸到次日天明，甚至与黄昏一般遥远。在其他地方，阿尔都塞主张在马克思的成熟的著作中，只有“哥达纲领批判”和“关于瓦格纳的‘笔记’”（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十年所写的两部著作）“才完全确定地摆脱了黑格尔影响的印迹”^②。阿尔都塞似乎不确定他想要哪种马克思，承接黑格尔的马克思抑或不承接黑格尔任何东西的马克思。

四、界定唯心主义

这一不确定性的意识始终贯穿于阿尔都塞对唯心主义的态度之中，他对黑格尔的态度可以看做是它的派生物，而他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比对黑格尔的批判更猛烈。然而，阿尔都塞有时又表现出积极地保留黑格尔的意愿，保留在阿尔都塞自己著作中的唯心主义的描绘似乎违背了他的这一意愿。阿尔都塞如此热切地维护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以至于他重新掀起马克思概念界定的潮流，在这些界定里，他认为马克思与其唯物主义的承诺不符。比方说，他坚持认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必须是从事某种物质实践和宗教仪式的主体的物质行动，他主张虽然马克思自己接近这一状态，但他还是没能恰当地思考其新的概念：“马克思没有跨过意识形态和在阶级斗争实体中的物质存在的‘绝对限度’。”^③

对阿尔都塞希望破坏的唯心主义概念最清晰的表达体现在其晚期著作中。在这里，他同意：唯心主义已成为“全部西方哲学的主流”，它不以“思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之类的信念为特点。^④而且，唯心主义哲学是追问世界起源和终极的哲学以及以新秩序取代旧秩序的社会哲学：

根据这一原则，世界上的一切存在，包括意识和物质，都从属于存在原因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开启了隐匿的世界（尼采），即一个在事物背后

①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LB, 1969, P35-36.

② Althusser, Loui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LB. 1971, P90.

③ Althusser Louis, Philosophy of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1987, ed. Olivier Corpet and Francois Matheron, trans. G.M. Goshgarian. London: Verso. 2006, P138.

④ Althusser Louis, Philosophy of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1987, ed. Olivier Corpet and Francois Matheron, trans. G.M. Goshgarian. London: Verso. 2006, P272, P224.

的隐藏物，一个直观和经验的表象背后的原因，这个问题无处不在。^①

之所以吁求某种本质是因为任何事物都必须关系到某种核心。因此，如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中所指出的，黑格尔的社会整体的概念化本质上是唯心的：黑格尔预设了“正在讨论的整体应该还原为一个内在的本质，整体的部分至多是现象的表达形式”。^②

唯心主义寻找秩序，给一切事物一个本源和目的：每个事物在出生时就被刻上一个位置和教条。

在唯心主义那里，本源问题是在目的问题的基础上出现的。预先占有它自身，目的（世界和历史的意义，世界和历史的终极目的）设计自身又回溯到本源的问题。无论任何东西的本源问题往往作为有其自身目的的观念的一种功能被提出来。^③

而后，唯心主义寻求一个共同的本体论和目的论：考量事物的存在就是思考事物的目的。另一方面，唯物主义不仅仅是唯心主义的反面，如阿尔都塞在他的很多早期文章中所说，一门相反的哲学并没有改变其结构、问题或者意义；它们保留了一样的问题框架。^④ 这样一门哲学将是“一个必然性和目的论的唯物主义，也就是，一个转化了的，伪装了的唯心主义的形式”。^⑤ 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必须逃离唯心主义的问题框架；它必须“否定所有本质哲学”，（实体、要素、性质）即理性哲学（逻各斯、原因、理性），以及本源和目的哲学。这里，本源无非是在理性或原始秩序中的目的之预见而已。^⑥

这些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特点，虽然在阿尔都塞研究生涯即将结束的时候出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他的职业生涯和生命的正式结束之间的衔接阶段），再次肯定了他早期对黑格尔的批判和对马克思解读的最初目的在于

① Althusser Louis, *Philosophy of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1987*, ed. Olivier Corpet and Francois Matheron, trans. G.M. Goshgarian. London: Verso.2006,P216-217.

② Althusser, Louis and E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LB.1970,P186

③ Althusser Louis, *Philosophy of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1987*, ed. Olivier Corpet and Francois Matheron, trans. G.M. Goshgarian. London: Verso.2006,P217-218.

④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London:NLB,1969,P73.

⑤ Althusser Louis, *Philosophy of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1987*, ed. Olivier Corpet and Francois Matheron, trans. G.M. Goshgarian. London: Verso.2006,P168.

⑥ Althusser Louis, *Philosophy of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1987*, ed. Olivier Corpet and Francois Matheron, trans. G.M. Goshgarian. London: Verso.2006,P188.

废黜“上帝的起源和目的”^①这一目的，这可追溯到阿尔都塞在50年代对孟德斯鸠的研究。阿尔都塞的马克思是没有历史目的的，无必然的终结是它的起源的精华。这种马克思没有历史主体：历史的目的不是实现人的复归。阿尔都塞早在60年代发展了多元决定论是为了与唯心主义论战。其中，黑格尔（据阿尔都塞所说）将复杂的社会总体演变为简单的中心矛盾，作为被马克思所意识到的多元决定论，它表征了复杂而具有差异的因素所构成的社会整体结构。这里，不再有一个唯心主义的整体观，即所有的因素是一个内在本质的表现。假如阿尔都塞可以被称为一个结构主义者，这不是因为他把所有现象都看作内在的规律和一个单一的深层原因，而是因为他颠覆了主体的权威，并根据社会结构的关系来分析社会结构。它不需要我们去统一普遍的规律（踱步于斯特劳斯），而是需要我们小心翼翼地将一套复杂的关系连贯起来，这种关系不是由预先存在的结构所决定的。唯物主义拒绝预先设定的秩序，这一秩序放弃了对“到处是被设定好的事物”的尊重。这就是阿尔都塞所描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一点，阿尔都塞喜欢引用列宁的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②

继而，对阿尔都塞来说，马克思处在与黑格尔的斗争中而不只是反对黑格尔，总体说来，他更为反对的是唯心主义。然而，在阿尔都塞的晚期著作中，就如他更乐意去认为马克思没有确定地与黑格尔主义决裂那样，他更乐意去承认马克思不必使他自己摆脱唯心主义。马克思的著作存在多种张力，甚至不可协调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他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囚徒”。我们已经看到阿尔都塞谈论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的观念被唯心主义所纠缠。关于此，他同样指向《资本论》中拜物教一节的某些段落，其中包括“我们发现…一个潜藏于共产主义下的完全透明的社会关系的意识”。阿尔都塞说，马克思从来没有摆脱“整个唯心论的神话，这直接来自他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③当阿尔都塞正确地发现《资本论》某些章节具有一定的唯心主义时，他同时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实质上与他自己非常接近——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对唯心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理论所表达的拜物教不是一个需要被更

①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LB, 1969, P71.

②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LB, 1969, P206.

③ Althusser Louis, Philosophy of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1987, ed. Olivier Corpet and Francois Matheron, trans. G.M. Goshgarian. London: Verso. 2006, P36-37.

正的神话式的虚幻，而是一种分析方法，其中不管信念和观念如何被歪曲，个体必须行动。

与此同时，阿尔都塞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了与唯心主义关系紧张的唯物主义的元素。譬如，他声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两个“完全无关联的生产方式的概念”。^① 另一方面，存在一个目的论的本质主义的概念，即认为在推动其内在要素向前发展的本质结构方面的生产方式是根据必然性被提出来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要素体现为财产所有者和与生产目的相分离的劳动者，好像它们是注定一块到来的。但是，也存在另一种生产方式的概念：一种历史偶然性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这一概念在《资本论》的最后部分原始积累的章节中可以看到，阿尔都塞称这一章是“全书中的核心部分”。^② 这里存在着两个同样的元素，即财产所有者和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自由劳动者”，他们作为独立的、流动的因素存在于其自身孤立的历史中，他们在未曾发生的一次偶遇后一起到来。一旦偶遇发生，这些贫困的被剥削的大众继而被资本主义再生产出来，但他们第一次不是由资本主义所生产的，它们不是在观念上被资本主义所创造，而是通过它们的与财产所有者的偶遇才形成资本的一个要素。

生产方式的第二个概念是被阿尔都塞称为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例子。这些词条在阿尔都塞 80 年代后的著作中有所发展，它们作为新的意图的一部分，用以说明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反面，唯物主义能够逃离所有的原因、本源和目的问题。他们提供了一种不以目的论去思考单一性的方式，目的论的历史思考承认“每一个历史连接点、历史个体和一切存在都是被看做一个单一的事件”。^③ 如沃伦·蒙塔格所指出的，强调单一事件是对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完成了的工作的继续。较早的多元决定论批判的对象与偶然的唯物主义相一致：本质主义的、目的论的整体观，处在整体的因素只是预设的内在本质和深层统一体的表现。安东尼奥·奈格里表明，阿尔都塞致力于偶

① Althusser Louis, *Philosophy of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1987*, ed. Olivier Corpet and Francois Matheron, trans. G.M. Goshgarian. London: Verso.2006,P197.

② Althusser Louis, *Philosophy of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1987*, ed. Olivier Corpet and Francois Matheron, trans. G.M. Goshgarian. London: Verso.2006,P199.

③ Althusser Louis, *Philosophy of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1987*, ed. Olivier Corpet and Francois Matheron, trans. G.M. Goshgarian. London: Verso.2006,P264.

然的唯物主义的意图是“破坏每一个目的论的视域，因此，积极主张事件的逻辑”。^① 阿尔都塞自身坚持这一观点，反唯心主义目的论，偶然的唯物主义需要“面向事件，包括至今仍难以想象的且所有活生生的实践和政治在内的事件，去思考世界的开放性”。^②

上述这些就是阿尔都塞唯物主义的性质。此后，我们应该注意直接状况的具体单一性，它拒绝依赖于一个较深入的现实概念、一个匿藏在现象背后的内在世界和一些真实的存在——虽然它目前受约束、被异化、被丢失，但总有一天它将会回归本真。唯物主义哲学家“通常乘着一辆动车，他们在美国西部就是这么干的。不清楚他来自哪里（本源）也不知道他将往哪儿去（目的）。”^③ 唯物主义放弃本源和目的，它并不赞同去揭示世界的真理，而是认识它自身的条件以及积极地干预政治斗争。这就是阿尔都塞渴望从马克思那提取出来的唯物主义。

五、阿尔都塞和后结构主义

阿尔都塞为其后的内容设定了“出场语境”，尤其是通过他对唯心主义的定义，以及他澄清了一种新的马克思的背景，粉碎了占主导地位的人道主义模式。这一模式是作为学生的后结构主义者所面临的，这样他就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阿尔都塞重新思考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的内涵和贡献。然而，阿尔都塞的著作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张力，他提出两种马克思，坚持 1845 年断裂的重要性；而他也意识到在马克思思想中存在一个较为易变的和复杂的差异，他想回到这样一种不为党的教条所吓倒的马克思，而这么做的时候，他发现马克思理论与他自身的思想相悖，由此用其他的思想家的思想来补充马克思理论。他希望将黑格尔主义从马克思那清除出去，而他认识到马克思在辩证法上还背负黑格尔的债务。他使得借来的多元决定论变得尤为复杂，而在最后一刻，他尝试着将

① Negri, Antonio, *Reclaiming Truth: Contribution to a Critique of Cultural Relativism*.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1996, P61.

② Althusser Louis, *Philosophy of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1987*, ed. Olivier Corpet and Francois Matheron, trans. G.M. Goshgarian. London: Verso.2006,P264.

③ Althusser Louis, *Philosophy of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1987*, ed. Olivier Corpet and Francois Matheron, trans. G.M. Goshgarian. London: Verso.2006,P290.

这种多元决定论演变为经济决定论。他坚信马克思认可大量不同的历史规律，而他并没有分析马克思具体的历史研究或生产其自身的历史。他强调对实践和制度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物质性，而他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马克思自身拜物教理论的物质性。更为广泛地说，阿尔都塞在唯心主义立场上存在一种张力。另一方面，诸如“最后一刻的决定论”的观念稍微有点像德里达在《斯特劳斯》中所认同的对中心和本源的怀念。确实，正是通过这种怀念，阿尔都塞被限制在他试图去克服的唯心主义里，它最清楚地证明了把阿尔都塞归为结构主义的行列的有效性。另一方面，阿尔都塞的晚期著作在另一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了，它屈服于一个偶然优先理论的教唆。因此它不能在混乱中辨别模式，也不能为那些貌似随机事件的东西提供解释。在这样的情况下，阿尔都塞不像是结构主义，而是面临着后结构主义所遭遇的一些困境。在一定意义上，阿尔都塞处于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这使他陷入一方面怀念逝去的東西，一方面又不能确定任何批判形势的困境中。蒙塔格提及过这一点，他是近年来最敏锐的阿尔都塞注释者，他主张试图提出一个知识在其效应中表现出来的结构概念，这概念在没有减少和统一的情况下各种差异都可被理解。阿尔都塞徘徊于两个选择之间：在一个严密结构统一体和连贯性与一个偶然的和非决定的混乱之间。继而提出两种可能的阿尔都塞者：“历史正常顺序的阿尔都塞者”^①和“赞成差异和混乱的阿尔都塞者”。^②我会说这一徘徊是阿尔都塞试图在摒弃唯心主义的情况下讨论一门哲学的结果。摒弃发挥着为哲学奠定基础和命名的功能的本源论和目的论往往会引起一定的危险。即一切事物将陷入不确定性，批判工作也不可能开展的危险。唯物主义哲学家必须代表“无铁”的规律的历史和保障的“无终结”的历史。但是，历史如何才能够仅成为随机事件的收藏品呢？存在一个陷入不确定性的危险，这种不确定性只是反映了一个严密的决定论。

这些就是阿尔都塞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后结构主义将面对的困境。阿尔都塞将理论背景设置得很好，尤其是对唯心主义的特征描述，瞄准唯心主义就是瞄准那些假设世界表象背后本质、目的、原因，以历史宿命的顶点将被激活的约定俗成的存在的哲学。广泛地讲，这些是后结构主义将批判马克思的方

① Montag, Warren 'Althusser's Nominalism: Structure and Singularity (1962-6)', *Rethinking Marxism* 10 (3):64-73, 1998, P72-73.

② Montag, Warren 'Louis Althusser.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14.

面。尽管我首次利用阿尔都塞设定索引词条，让所涉及的问题生动化，这并不意味着阿尔都塞对唯心主义的公开的批判在谱系学上优先于后结构主义。虽然阿尔都塞的大多数著作作为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研究工作扫清了道路，但是大多其晚期的著作反映了后结构主义著作对他的影响。审视完后结构主义解读马克思的更多细节之后，我们就有可能弄明白为何阿尔都塞将唯心主义的特点定义为本源和终点，并且沿着后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批判继续开展对马克思的讨伐。

然而，阿尔都塞在许多方面仍然是后结构主义的一位重要的先驱，其著作中的张力具有与后结构主义一样的困境。后结构主义所描述的马克思在很多方面类似于阿尔都塞所描述的马克思，即一个脱离了人道主义、历史主义和黑格尔的马克思、脱离了他在战后法国与之纠缠不清的传统和运动的倾向。但是，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的变体。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比阿尔都塞走得更远，他们推动了一个更为严谨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引进了一些新的因素，比如，将马克思带入尼采。但在我审查每个后结构主义者处理马克思的细节之前，我想再次强调由马克思发起的对后结构主义的批判。这将使我们圆满地完成对上下文背景的考察研究。

译者：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当代激进政治理论中的阿尔都塞因素

林青

[摘要] 作为巴黎高师几代激进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阿尔都塞的思想以不同的方式对当代激进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不同的方式”包括直接的继承、批判性对话以及公开的批评。当代激进政治理论的许多思想都是通过阿尔都塞的思想中介形成的。阿尔都塞思想的棱镜效应既与其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多重维度有关，也与时代发展对理论产生了新的需要有关。本文主要围绕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与空间理论来展示当代激进政治理论中的阿尔都塞因素。

[关键词] 阿尔都塞 后结构主义 激进政治 空间理论

作为巴黎高师几代激进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阿尔都塞的思想以不同的方式对当代激进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不同的方式”包括直接的继承、坦诚的对话以及公开的批评，但这些毫无疑问都构成了阿尔都塞与当代激进政治理论关系图式的基本框架。当代激进政治理论所借助的诸多思想资源都是通过中介阿尔都塞思想才得以完成的，这表现在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思想的解读，对拉康精神分析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甚至后结构主义方法的引入以及对斯宾诺莎的关注，所有这些都成为当代激进政治的理论起点。虽然当代激进政治理论在某些理论判断上与阿尔都塞思想有重合、出入甚至是

相左，但这并不妨碍阿尔都塞对当代激进政治哲学产生广泛的影响。正如德里达在阿尔都塞葬礼上的致辞所言：“路易·阿尔都塞穿越了那么多生活——我们的生活，首先是穿越了那么多个人的、历史的、哲学的和政治的冒险，以他的思想和他的生存方式、言说方式、教学方式所具有的辐射力和挑战力，改变和影响了那么多话语、行动和存在，给它们打上了印记，以至于就连形形色色和最矛盾的见证也永远不可能穷竭它们的这个源泉。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与路易·阿尔都塞有着不同的关系（我说的不光是哲学或政治）……事实上，无论在当代还是在别的时代，在学术圈内还圈外，在尤里姆街还是法国的其他地方，在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内还是超越于所有党派，在欧洲还是欧洲以外，路易对于他人而言都是完全不同的。”^① 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德里达还说：“实际上，《马克思的幽灵》可以被看作是为悼念路易·阿尔都塞而写的，虽然是间接的致意，但是充满了友情、怀念以及略微的伤感。”^② 阿尔都塞思想的棱镜效应应在于其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多重维度，这并不是说其思想的无原则性，而是表明阿尔都塞正是以一种开放、对话的方式推进其理论实践的。这同时也意味着阿尔都塞时代的思想特征，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思想作为一种渗透到历史现实中的思想资源而与当代激进政治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本文主要围绕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与空间理论来展示当代激进政治理论中的阿尔都塞因素。

阿尔都塞与后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与阿尔都塞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关系复杂且隐晦的话题。这当然与阿尔都塞本人的思想有关，纵观阿尔都塞的理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其思想前后期的不同，这样一种转变发生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从整体取向来看，阿尔都塞本人的理论旨趣是与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规划不相符合的，但从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来看，墨菲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其受阿尔都塞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拉克劳1979年出版的《马克思理论中的政治与

^① 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0页。

^② [法]德里达、卢迪内斯库：《明天会怎样》，苏旭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意识形态》也是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启发下完成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早期在初入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时，都受到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思想振耳发聩式解读的影响，但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由于法共的软弱无力及其和平议会路线，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加之1968年五月风暴所催生的各种新社会运动，其倡导的对性别、身体、生态等问题的关注，日益成为批判资本主义最切近的方式。在这种背景中，马克思主义所信奉的那套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模式便处于理论的危机中。而左派政党的蜕变，更是加剧了此种状况。“真实的状况是，左派政党已经演变成关注中产阶级的政党了，而这是对工人阶级来说是不利的”。^①而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大抵就是在这种背景中产生的。中产阶级因为在物质生活上有了可靠的保障，这使得其取向更加偏向政治领域，而其手段则是对抗，而非革命。因此，后马克思主义才声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政治不是上层建筑，而具有社会本体论的地位。”^②所以，当政治承担起了对抗的主要任务时，策略便成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词，其指向便是所谓的霸权问题。

在此，需要探讨的问题在于，后马克思主义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描述在何种程度上受阿尔都塞的影响？因为阿尔都塞在经历了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已经逐渐开始意识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并撰写了具有开创性的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的努力与创新所得出的理论结果即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多元决定、无主体的过程、偶然唯物论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为后马克思主义对主体的匮乏、反历史决定论、霸权与偶然性逻辑的论述做了清理清场工作，而且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背景。

就阿尔都塞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笔者将主要围绕意识形态与霸权的关系问题展开，论述从意识形态到霸权的演变如何构成了一种从科学到策略的转变。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述中，意识形态与霸权所履行的功能基本一致，阿尔都塞就曾经指出，无产阶级之所以要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就在于获得一种霸权或领导权。“这种意识形态围绕着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被统一起

①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1: xviii.

②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1: xiv.

来，其目的在于保障葛兰西所说的那种统治阶级的领导权”。^①在此，阿尔都塞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在与资产阶级斗争时，赋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科学的内容，也就是说，相较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阿尔都塞旨在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为意识形态寻找一种具有真实内容的存在。而阿尔都塞通过阶级意识的统一性问题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问题，为意识形态寻找真实的内容。

依据阿尔都塞晚期的自我批评，意识形态本身也是一个具有现实内容的科学概念，但这不排除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策略性使用。因为意识形态概念毕竟不是一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而是一个被阿尔都塞拯救出来的概念。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与霸权概念便都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述之外寻求解释和理解社会现实的新概念。拉克劳和墨菲（后面简称“拉墨”）指出：“霸权概念并不能表现为在其自身的特殊性质中来定义的一种新的关系类型，而是为了填补在历史必然性链条中被打开的虚空。‘霸权’将暗示着总体性的缺席，以及为了克服这种原初的缺席而诉诸重组和重新链接的各种尝试，这将可能使斗争获得一种意义，使历史力量得到一种充分的积极性。”^②

显而易见，在拉墨的解释中，霸权概念本身并不具有自在的属性，而是对历史必然性断裂的一种重新填补；这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整体性的坍塌，在这种碎片化的社会关系中寻找霸权的链接点。而霸权概念所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没有覆盖的领域，后马克思主义希望霸权概念能够为这些没有被马克思主义覆盖到的领域中的社会运动提供合理的解释。由此可见，霸权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自葛兰西以来，霸权描述了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如何能够更巧妙地宣传它的理想而不是使用武力来遏制革命反对派的发展。因此，在阿尔都塞的著作中，我们拥有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或文化概念（例如教育体系或媒体）——它们传递出公认的资产阶级行为模式，即那些旨在限制异议发展的行为模式。武装力量仍然在背后作为最后的手段（压迫性国家机器）。然而，在拉墨对其经典地位的解释中，霸权是一个旨在掩盖马克思

① 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②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1: 7.

主义理论的裂缝的概念”。^①毫无疑问的是，葛兰西与阿尔都塞对霸权和意识形态的论述，极大地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斗争的议题，而这也成为拉墨从经济转向政治领域的重要理论前提，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旨趣就在于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领域的描述所追求的社会同一性以及由此催生出来的无产阶级的同一性问题已然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中破产了。所以，拉墨在霸权的谱系探讨中，直接对卢森堡、考茨基、伯恩斯坦进行论述，其目的就在于说明政治的自主介入对于无产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当然，其前提是驳斥历史决定论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经济决定论对经济领域的重视。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早就做了大量的动作。

从后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来看，霸权本身只是一个策略性概念，因为其只有在总体性与同一性实践出现断裂时才能发挥功能。“霸权出现的一般领域是链接诸种实践的领域，‘要素’还未明确化为‘因素’的领域。在一个关系同一性的封闭体系中，每一个因素的意义是被完全确定的，因而不存在霸权实践的空间……正是因为霸权假定了社会系统的不完整性与开放性，所以霸权实践才能在只有链接实践所主宰的领域中发生”。^②在此，霸权概念便与链接实践联系在一起。链接实践的前提是社会本身是碎片化的存在，这是后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基本判断。由社会碎片化存在所带来的虚空的社会空间，正是霸权的链接实践的用武之地。但问题在于，既然后马克思主义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同一性及其社会同一性的论述，为何却又中意于链接呢？因为说到底，链接的最终结果也是要形成同一性的论断，要不然链接的意义何在？如果说社会存在本身是碎片化的且不能被同一性所覆盖，那链接本身也是徒劳的，因为异质性存在本身是不可能被链接的。那么，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强调霸权链接实践呢？原因在于提高政治在分析社会存在中的作用。因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述中，政治对抗要被还原到阶级对抗之中，这是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的产物。

政治分析重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是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倒逼”的产物。所以后马克思主义指出，“我们将试图证明，经济的空间将自身建构

① [英] 斯图亚特·西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吕增奎、陈红译，凤凰出版集团 2011 年版，第 22 页。

②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1: 143.

为一种政治空间，正如在其他社会‘层面’中一样，在政治空间中，我们将其特征化为霸权的实践是完全可行的”。^① 而阿尔都塞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所以才有意意识形态理论的面世。阿尔都塞对政治因素的重视还表现在对列宁理论的解读。后马克思主义认为霸权在列宁主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列宁主义，霸权概念成了由偶然的‘具体情况’所要求的新的政治思考形式中的拱心石，因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便发生在此情形中”。^② 列宁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为政治介入无产阶级斗争开了先河，因为单就经济情形而言，俄国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但就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现状以及俄国内外政治形势而言，无产阶级可以在经济、阶级同一性之外寻得政治链接的可能性，从而促使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而阿尔都塞对列宁的关注，主要表现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阿尔都塞认为，理论必须具有政治性，也就是说，在由理论所指向的革命实践中必须要有政治分析的维度。因为阿尔都塞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归根到底是多元决定的产物，这其中就包括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的因素。阿尔都塞通过将政治与意识形态引入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从而对经济决定论形成了尖锐的对抗，这也是之后的理论家们能够跳出第二国家经济决定论的重要因素。

就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以及赋予政治与意识形态地位以相对自主性而言，阿尔都塞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存在的，并且实质地表现为对经济决定论的拒斥。但是，差异在于，虽然阿尔都塞提升了政治与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构成要素的重要性，但其前提是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致性与纯洁性，而这是后马克思主义霸权理论所不能接受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无论是在葛兰西那里还是在阿尔都塞那里，对霸权概念的进一步阐述所寻求的仍然是理论的纯洁性”。^③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的维护是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实现的，“（在阿尔都塞那里）它却是阅读或重新阅读马

①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1: 77.

②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1: 7.

③ [英] 斯图亚特·西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吕增奎、陈红译，凤凰出版集团 2011 年版，第 26 页。

克思著作的结果”^①，且阿尔都塞是在理论上为拒绝诸种决定论的解读模式提供了马克思本人的理论资源。可见，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护是一种理论内部的反思和重构的结果，而在此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则是一种理论外部反思的结果。“阿尔都塞的尝试就处在马克思主义这个历史点上：在去斯大林化和新资本主义的相对成功之后，如何能重建这种完整主义”。^②而拉墨“他们关心的不是理论的纯洁性，而是结合，即‘某种在各种因素之间建立一种关系，从而把这些因素的同—性修改为结合实践的的结果的实践’”。^③前者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来重塑这种同—性，而后者则试图将这种同—性转换为“结合实践”的产物，也就是说，这种同—性是由霸权链接实践填补马克思主义同—性断裂而实现的。

由此可见，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霸权理论的转换是由科学概念向策略概念的转换。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之所以能被称为一个科学概念，在于无论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还是在阶级斗争中，其都具有真实的内容，而且阿尔都塞通过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人与其生存条件的关系的方式将意识形态做实为人类生存的必然因素，其是人与周围世界发生关系的必然产物。通过这种方式，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理论塞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言无疑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因为它在不断地扩充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空间。而后马克思主义对同—性与本质主义的拒斥，使得其霸权理论成为一种策略性概念。这种策略性表现为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所无法触及的地方或其所认为无法触及的地方，开展其霸权实践活动。这种在社会分析模式框架之外寻求由偶然性引起的霸权链接实践，是否存在机会主义之嫌？“摆脱本质主义不必然能解决所有的社会政治问题：脱离了任何理论依据的局部战略可能与纯粹的机会主义难以区分，并且左翼政治的传统的要求并不只是如此”。^④这就是作为策略性概念的霸权所要面临的挑战。

① [法] 雷蒙·阿隆：《想象的马克思主义》，姜志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年版，第 103 页。

② [法] 雷蒙·阿隆：《想象的马克思主义》，姜志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年版，第 103 页。

③ [英] 斯图亚特·西姆：吕增奎、陈红译，《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凤凰出版集团 2011 年版，第 30 页。

④ [英] 斯图亚特·西姆：吕增奎、陈红译，《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凤凰出版集团 2011 年版，第 45 页。

由此可见，阿尔都塞与后马克思主义关系之隐晦所在，即“阿尔都塞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因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计划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反而为后马克思主义规划开辟了一些非常有希望的探究路线。”^①，这其中折射出如下四个问题：

第一，阿尔都塞与后马克思主义所共同面对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是一个现实的真问题。同时，这也意味着阿尔都塞与后马克思主义都是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示之中，都在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事业进行理论实践。就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与重塑而言，二者都属于麦克莱伦称之为“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在此，关键的问题还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质。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为了维持、巩固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我们必须求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诺曼·莱文坚持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在以一种发展形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后马克思主义涉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续发展。它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历史的另一个阶段……后马克思主义在后工业世界的任务是工业劳动背景中对于民主的分析。后马克思主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种方法的信念上，意识到历史是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必须按照它发现自身所处的不同历史时刻而重新定义自己”。^②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项事业得以不断向前推进的必然认识，阿尔都塞也是在此意义上来论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那种一味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行为并不是在理论上积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而是对危机的逃避。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与其所处历史时刻的规定性之间的关系中寻求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应对与解答，才是在理论上站得住脚的辩护。

第二，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塑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规划的相遇，表明二者在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时，都诉诸了相应的理论策略。不同之处在于，阿尔都塞仍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进行理论实践，其主要贡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多元决定以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则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断裂处寻找霸权实践的可能性。阿尔都塞对经

① [英] 斯图亚特·西姆：吕增奎、陈红译，《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凤凰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29页。

② [美] 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的对话》，张翼星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济决定论的驳斥是诉诸马克思辩证法的特殊性及其多元决定理论。与以拉墨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不同，阿尔都塞的意图在于驳斥经济决定论并且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的多元置换中来提升社会各存在领域在社会分析模式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其仍然不放弃经济因素作为一种主导因素。拉墨首先直接否定经济的主导地位，进而在批驳经济决定论及其必然性的过程中，强化政治的主导作用，因为他们认为社会本身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整体，是各领域相链接而成，而政治在这种链接中扮演着主导角色。在二者的论述中，政治自主性的提升意味着政治实践领域的扩充，也意味着斗争形式的多样化。

第三，后马克思主义与阿尔都塞的理论规划的最终指向及其实践途径的差异。阿尔都塞的理论规划在于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认识和目的论解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各社会存在维度开放，从而摆脱经济—阶级利益分析模式，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对社会各存在领域有清晰的把握，其最终方式仍然是寄希望于以革命的形式来建立新社会。而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规划的最终目的在于倡导一种激进民主，其使命在于“深化民主革命并连接多种多样的民主斗争”。^① 后马克思主义认为，激进民主能够为新社会运动提供一种“共同性表述”，墨菲将此称为“共识”（common sense）^②，这种共识“能够转换不同群体的身份，从而使每一个群体的要求都能够遵照民主等值性原则而与其他群体的要求相连接”。^③ 墨菲之所以有这种考虑是因为其认为存在一种“民主等值性原则”，笔者认为，“民主等值性原则”只具有形式上的普遍性而不具有内容上的普遍性，也就是说，社会之所以要求民主，其主要原因是有不同的诉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但都是通过共同的形式即民主的方式参与斗争，那么，内容上的普遍性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按照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规划，这种内容上的普遍性只能在统一的形式上（民主）达成暂时的和解，而无法根本实现，因为这是与其前提相矛盾的即对同一性的拒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规划只具有策略上的意义，而无纲领上的意义。

① [英] 尚塔尔·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 页。

② 这里涉及与哈贝马斯的区分，墨菲认为其与哈贝马斯的区别在于其自身拒绝作为现代性基础的启蒙规划（政治规划与认识论保障），即“不像哈贝马斯，我们认为在这种规划中启蒙的认识论视角不再会有任何作用”，参见《政治的回归》第 13 页。

③ [英] 尚塔尔·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 页。

第四，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策略是否具有普遍性？拉墨不以经济分析作为粘合剂，其本身是有区域限制的，正如西蒙·托梅（Simon Tormey）和朱丽丝·汤森（Jules Townshend）指出的，后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是后福特主义、后工业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被确立为‘工人阶级已死’的产物，但是，最近发生于发展中国家的事件提醒我们，世界人口的绝大部分都还生活在类似于《资本论》所描述的状况之中”。^①也就是说，拉墨的理论论断仍然可以被视为西方中心主义，其本身就不具有多元化的内在旨趣。莱文的在《辩证法内部的对话》中亦提到，“后马克思主义……是对后工业化、后贫穷和全球第一世界成员的规划。它也许并没有对世界上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成员的需要进行呼吁”，并且指认“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一般的术语，而是一个适用于大西洋世界的概念”。^②这充分显示出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本身是非多元化的。拉墨以政治领域为起点的分析模式本身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之外打开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视野，但其置经济分析于不顾的态度，本身缺乏合理性的依据。在此，我们能否这样理解，政治领域的多元诉求本身可以被理解为经济利益多元的表象。在此需要澄清的只是，经济利益本身不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经济—阶级利益，而是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可见，需要抛弃的不是经济利益的分析模式，而是在还原论意义上的单一经济—阶级利益分析模式。

阿尔都塞与后结构主义

阿尔都塞思想与后结构主义相遇的契机在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诸多代表（利奥塔、福柯、德里达、德勒兹）都是经由马克思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这些代表早年都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寻找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但法国独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却使得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日趋合流。正是在日趋合流的时代里，阿尔都塞作为独自将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决裂的思想家，其理论实践正好契合了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规划。正是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成为了“规定马克思与后结构主义之间遭遇的问题式框架的

① Simon Tormey and Jules Townshend. *Key Thinkers from Critical Theory to Post-Marxism*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217.

② [美] 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的对话》，张翼星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先驱者”。^①

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与后结构主义独特的遭遇方式及其理论交集，首先应该回溯到法国独特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20世纪20年代以前，法国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以马克思本人的学说为主要思想，因为它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传统以及蒲鲁东主义的传统。在此意义上，“对于法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后来者”。^②这意味着马克思的经典思想还并没有真正进入法国知识界和工人运动中，“其他的名字——布朗基、蒲鲁东、索列尔——统治着法国的工人运动，并且法国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以一种敌意和轻蔑的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③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时法国的现状，这种现状的改变直到马克思早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并被翻译成法语才得到彻底的扭转。这样的一种“扭转”意味着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才真正开始进入法国的知识界和工人运动中，同时也意味着黑格尔元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突起。这样一项工作首先得益于科耶夫与伊波利特在法国传播黑格尔哲学。在这股风潮的影响下，“列斐伏尔、戈德曼、萨特以及梅洛-庞蒂都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推进了主体性的、人道主义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④从此，马克思主义便以黑格尔主义的方式占据了法国战后的整个理论舞台。而这也构成阿尔都塞与后结构主义面对马克思主义时的理论背景，阿尔都塞与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兴起也意味着对传统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抛弃。而这种实质的转换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1960年以后，马克思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吸收新的思潮并且参与新的主题”。^⑤这些新的思潮与主题便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和规划息息相关。

阿尔都塞与后结构主义的关系主要是围绕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展开的。后结构主义正是通过阅读马克思的文本寻找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而这种“阅读”是借助阿尔都塞实现的。“对阿尔都塞的关注将会成为确立后结构主义对马克思阅读的独特性的一个重要步骤”。^⑥阿尔都塞在《自我批判论文集》

①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1》，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26页。

② Simon Choat. Marx through Post-Structuralism [M]. London: Continuum, 2010:10.

③ Simon Choat. Marx through Post-Structuralism [M]. London: Continuum, 2010:10.

④ Simon Choat. Marx through Post-Structuralism [M]. London: Continuum, 2010:10.

⑤ Simon Choat. Marx through Post-Structuralism [M]. London: Continuum, 2010:9.

⑥ Simon Choat. Marx through Post-Structuralism [M]. London: Continuum, 2010:17.

中提到他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澄清而诉诸的“三大批判”即对人道主义、历史主义和黑格尔的批判。正是在这“三大批判”中，后结构主义与阿尔都塞分享了共同的主题，“在阿尔都塞的工作中，我们发现了后来的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结合的先驱。阿尔都塞对‘3H’有着自己的斗争，并且在将马克思定位为反人道主义、反历史主义和反黑格尔主义的论述中，阿尔都塞预测到了后来被利奥塔和德里达、福柯和德勒兹所提出的诸多主题”。^① 后结构主义借助阿尔都塞的论述，主要表现在对马克思哲学的定位及其与黑格尔的关系，其在很大程度是循着阿尔都塞敞开的主题向前走，而不是在实质的内容上受阿尔都塞的影响。因为后结构主义以其自身的方式推进了由阿尔都塞所暗示的相关主题的研究。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对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理论框架上，表现在后结构主义接近马克思的方式及其反对黑格尔的方式上。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阿尔都塞如何以将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拯救出来的方式影响了后结构主义。与阿尔都塞的理论规划一样，后结构主义对黑格尔的社会总体论持批判态度，因为二者都对本质主义的论述加以批判。阿尔都塞批判黑格尔的“总体”范畴在于其具有双重的本质主义诱惑：“因为在所谓的总体里面总会出现双重的诱惑，一方面使我们把它看做一种将一切表现形式饱览无余的、无所不在的本质，另一方面（其实是一回事）又使我们把它看做一个圆圈或者球体（这个隐喻使我们再次想起黑格尔），并在那里发现一个可以作为它的本质的中心。”^② 对本质主义的反对是后结构主义理论规划的主要内容之一，阿尔都塞对黑格尔本质主义的批判正好符合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旨趣，“像阿尔都塞一样，德勒兹并不希望依靠黑格尔主义本质与现象二分以及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总体或固定统一性的方式来思考社会”。^③ 德勒兹以“社会机器”概念表达各社会内部差异化的且流动性的连接，以此来对抗黑格尔的总体范畴。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无疑是后结构主义的先驱，因此，“德勒兹认为，阿尔都塞因为他的‘使马克思从黑格尔中解放出来’的工作而值得被赞扬”。^④ 也就是说，阿尔都塞通过批判黑格尔本质主义的方式使得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能够获得一种新的理论效应，而后结构主义正是以这种方式接近马克思。为了

① Simon Choat. *Marx through Post-Structuralism* [M]. London: Continuum, 2010:18.

② 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③ Simon Choat. *Marx through Post-Structuralism* [M]. London: Continuum, 2010:135.

④ Simon Choat. *Marx through Post-Structuralism* [M]. London: Continuum, 2010:131.

实现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决裂，阿尔都塞通过多元决定、结构因果性来阐述马克思的辩证法之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从而在多元和差异存在的社会中实现与黑格尔哲学的决裂。最后，阿尔都塞以偶然唯物论的方式达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彻底批判，即对观念论的批判。阿尔都塞晚期对观念论的定义及其批判，更是与后结构主义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在《相遇的哲学》中，阿尔都塞指出：“我想，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事实来指认观念论，即观念论被一个分为两方面的单一问题所萦绕，因为理性的原则既与起源有关，又与目的有关：事实上，起源非常自然地一直与目的相关。进一步说，在观念论中，起源的问题是一个源于目的的问题。通过预测自身，目的（世界的意义、历史的意义、世界和历史的终极目的）将自身回投到并且回投进起源的问题中。任何事物的起源问题一直表现为一种观念的功能即它拥有它的目的。”^① 乔特在《马克思穿越后结构主义》一书中认为，阿尔都塞对观念论的定义为后结构主义真正阅读马克思、阅读唯物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我将使用的观念论观念是借助于另外一个思想家：路易·阿尔都塞。对于阿尔都塞来说，观念论是关于起源和目的的哲学，它依靠于一种本体论——在此用世界的本质属性概念来定义——和一种目的论——将所有事件与预先建立的目的相联系。为了寻求颠覆马克思的本体论和目的论，后结构主义推进了阿尔都塞的观念论批判，揭示了一种不同的马克思并且帮助我们思考唯物主义是什么样的”。^② 在这个意义上，后结构主义的观念论批判源于阿尔都塞对观念论的界定与批判。当然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在于阿尔都塞对观念论的批判是为了批判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粗俗理解，这主要表达为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经济决定论认为只要颠倒黑格尔便成了马克思，即用物质、经济取代黑格尔的精神，而这在阿尔都塞看来仍然是观念论的变种。可见，阿尔都塞对观念论的批判不仅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而且也是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而这是后结构主义能够真正阅读马克思的理论前提。

其次，阿尔都塞的理论反人道主义及其对主体性概念的批判，是后结构主义对主体解构的理论先声。为了解构主体概念，阿尔都塞一方面批判主体概念是伴随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兴起的，只是时代的产物。更加彻底的做法

① 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M]; edited by François Matheron and Oliver Corpet.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6:217-218.

② Simon Choat. *Marx Through Post-Structuralism* [M]. London: Continuum, 2010: 3.

是，为了打破主体概念的假象，阿尔都塞批评黑格尔哲学并非以主体为中心概念，因为在“自然哲学”阶段，主体根本就不存在。最后，阿尔都塞诉诸于意识形态理论的质询功能而将主体予以解构，并用意识形态取代了主体概念，“通过归纳，意识形态的功能导致了主体的创造，但这里的主体绝对服从他们被指定的位置。就像被神秘化的神秘力量客体一样，这些客体是由新的历史主体（意识形态）呈现出来的”。^① 基于此，阿尔都塞以意识形态的功能来解构主体所具有的独立存在，而将其打发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主体的功能只能通过意识形态和结构的安排才能实现，于是结构便成为了规定主体地位及其角色功能的基本要素。这便是结构主义对主体的解构，这样一种由意识所建构的主体到由意识形态和结构所塑造的主体的转变，被视为从现象学到结构主义的转变。德里达和福柯早年都在结构主义的思潮中汲取养分，“德里达一开始就是一位结构主义思想家，尽管他站在洁身自好的立场上：‘因为我们还要依靠结构主义的丰富多产养家糊口，所以摧毁我们的梦想有些为时尚早’。当然，这只是在1963年，那时这个前程似锦的纲要依然容光焕发；德里达热情洋溢地赞美结构主义，在他看来，结构主义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方法或新的思想形式。那时候，结构主义是一种全新‘观测探险，是关于质疑任何对象的方式的改变’”。^② 而早年的福柯所撰写的《规训与惩罚》就通过规训与身体的维度而不是主体的维度，来描述历史，而后来的《词与物》、《知识考古学》更是在一种是结构主义历史化的操作中反对主体，“无论如何，《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是血肉相连的。它们同是由结构主义遗产支撑的，还一同抨击主体论；因为即使福柯走向了历史化，问题的焦点依然是主体，如同它在结构主义最初的日子里那样”。^③ 可见，福柯对知识类型的探索形成于结构主义范式转变的时期，这使反人道主义、反主体、历史化的描述应用于新的知识类型。在福柯看来，传统的知识类型是以主体自觉的理性建构为主的知识，其中最核心的环节就是主体建构。“《知识考古学》的主题包含着肯定和否定的两个方面：肯定方

① [法] 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0页。

② [法] 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卷），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③ [法] 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卷），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页。

面是阐述以话语构成理论为基本内容的考古学，否定方面是清除认识论的障碍——人类中心主义或人本主义”。^① 前一个主题在《作者是什么》这篇文章中，福柯就通过“话语”的形式而避开“主体”。因为福柯认为，话语本身是被置放在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系统中，这就使得话语本身不是出于主体的独特创作，而是被社会制度、社会结构所支配的。在这一点上，福柯与阿尔都塞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这是为什么有人评论认为“福柯的‘话语构成’实际上是‘关于意识形态关系和意识形态对象构成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这里暗示了福柯与阿尔都塞在理论上的同盟关系”。^② 而后一个主题对人类中心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清除更是阿尔都塞反人道主义的主要内容。无论是德里达还是福柯，其理论实践一直沿用了脱胎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反人道主义，其中心环节就是使作者、主体和言说者非中心化。晚期阿尔都塞在《相遇的哲学》中更是放弃了主体概念而走向了“无主体的过程”，而这与福柯反对主体而诉诸于历史化的叙事异曲同工，而此时的阿尔都塞与后结构主义的关系更是相互影响的因素多于早期后结构主义直接受阿尔都塞的影响。

最后，阿尔都塞晚期的《相遇的哲学》中关于偶然、相遇及其“历史无主体的过程”等论述，与后结构主义对历史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互为犄角。阿尔都塞的晚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后结构主义的论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甚至是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阿尔都塞的后期著作提供了证据显示他反过来受后结构主义影响”。^③ 阿尔都塞在《相遇的哲学》中径直就将德里达、德勒兹归类为偶然唯物主义的思想家之列，可见阿尔都塞后期是阅读过他们的著作的。在此，笔者不求细究阿尔都塞晚期思想与后结构主义之决定关系，而是尽力呈现二者在某些概念和基本判断上的一致性，以显示其学术关系。

在《相遇的哲学》中，阿尔都塞将“虚空”作为偶然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在论述斯宾诺莎的虚空思想时，阿尔都塞认为，“虚空是哲学本身”，这来源于一种“批判的劳作”，“正如德里达所说的，源于海德格尔的‘解构’的劳作”。^④ 德里达将海德格尔的工作视为一种对传统哲学的解构，其自身亦

① 刘北成编著：《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7 页。

② 刘北成编著：《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9 页。

③ Simon Choat. Marx through Post-Structuralism [M]. London: Continuum, 2010:8.

④ 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M]; edited by François Matheron and Olivier Corpet.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6:178.

是在“解构”的主题上展开其理论论述。阿尔都塞认为，这种解构清除了传统哲学的偏见，而将一种事实呈现出来。在阿尔都塞看来，这种解构便是偶然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步骤，因为这体现了相遇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相遇的唯物主义就包含在如下的命题中……‘撒播’（dissemination）对于假定（postulate）——每个能指（signifier）都有一种意义——的首要性（德里达）。”^① 阿尔都塞认为，德里达的“延异”对于传统理论中的“假定”、“能指”而言，其都是一种否定性的论述，说到底就是一种虚空。所以，阿尔都塞在后面进一步强调指出否定、缺席对于在场的首要性时，便指出“换言之，这就是缺席对于在场的首要性（德里达）”。^② 德里达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正好契合了阿尔都塞相遇哲学的理论规划，这也意味着阿尔都塞本人对德里达著作的阅读并持认同态度。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上，阿尔都塞通过偶然唯物论来解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集中表现在“货币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相遇”。阿尔都塞说，“马克思解释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源于‘货币所有者’与被剥夺到只剩下劳动力的无产阶级的‘相遇’”。^③ 阿尔都塞指出，正是这种“相遇”产生了并且得到持续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得以继续，而阿尔都塞对“相遇”的发生与否所做的注释表明这个观点是源于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④ 这表明了阿尔都塞在此问题上与德勒兹的相似性。但毫无疑问，“相遇”概念是由阿尔都塞率先提出并运用于资本主义分析的，“德勒兹思考由阿尔都塞提出的相遇：自由工人与自由货币的相遇：‘当没有规定性（unqualified）的财富与没有规定性的工人合流时，资本主义便诞生了’，准确说来，这是马克思所言说的，而德勒兹则是以阿尔都塞式的方式来阅读马克思：结合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前定的，而是偶然，偶然相遇；相遇也可能不发生”。^⑤ 在这个论

① 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M]; edited by François Matheron and Oliver Corpet.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6:189.

② 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M]; edited by François Matheron and Oliver Corpet.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6:191.

③ 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M]; edited by François Matheron and Oliver Corpet.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6:197.

④ 详见 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M]; edited by François Matheron and Oliver Corpet.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6:197 以及第 207 的注释 65.

⑤ Simon Choat. *Marx Through Post-Structuralism* [M]. London: Continuum, 2010:133.

述上，阿尔都塞与德勒兹的论述基本一致。这也是后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理论遗产的继承，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拥抱，“这种拥抱简单地再次证明：用德里达的话来说，我们都是马克思的继承人，不管我们是否知道：如果不持续重申马克思的洞见，我们不可能谈论资本主义，不可能开始批判社会，甚至不可能叙写历史”。^①而后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则是中介阿尔都塞而实现的，这也是阿尔都塞被后结构主义赞扬的原因，“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阅读被后结构主义赞扬是有充足的原因：后结构主义是建立在阿尔都塞工作的基础上，并且利用了阿尔都塞的洞见”。^②

对后结构主义的历史理论的影响还在于阿尔都塞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就历史理论的对象问题，阿尔都塞对历史主义进行了两项考察。第一，历史主义对马克思的误解，并且指出马克思关于历史理论的论述是历史主义。阿尔都塞将其论点概括如下：“关于历史对象的任何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都涉及到既与的历史对象，现实存在，已经成为过去历史的结果的对象。全部认识活动从现实存在出发，涉及到已经生成的对象，因而只是现实存在对这个对象的过去的反映”。^③阿尔都塞认为，历史主义所诉诸的方法是一种隐蔽的经验主义方法，其自身无法在诸多对象中发现能够真正表现现实存在的对象。这便涉及到第二项考察，即“现实存在的‘自我批判的特定条件’”。阿尔都塞说，“为了使现实存在的自我意识的回溯不再成为主观的，这个现实存在必须能进行自我批判，以便达到科学自身”。^④这就要求历史本身如何能够跳出现实存在的范围，从而跳出经验主义的直接性。而对马克思主义做历史主义的解读，就是囿于时间逻辑的直接呈现，从而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视为一种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一方面在于指明此种解释重新复活黑格尔的本质，一方面在于拯救辩证唯物主义，既保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又保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

因此，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便不再是以概念和人的本质的表现为依托

① Simon Choat. *Marx Through Post-Structuralism* [M]. London: Continuum, 2010:156.

② Simon Choat. *Marx Through Post-Structuralism* [M]. London: Continuum, 2010:156.

③ [法] 阿尔都塞、巴里巴尔：李其庆、冯文光译，《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④ [法] 阿尔都塞、巴里巴尔：李其庆、冯文光译，《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

的意识形态历史。这种对历史研究的差异化关注，也是后结构主义所关注的，尤其是福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就在于为研究历史提供一种有关差异意识的方法论，“福柯认为，就历史研究而言，认识论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不连续性观念（包括不连续、断裂、临界点、界限、系列和转型等观念）在历史学中变得重要了。这种变化可以追溯到马克思，至今尚未完成”。^①同时，“福柯还主张放弃‘整体历史’意义上的‘历史’概念。他认为，历史学正在从‘整体历史’向‘综合历史’转变。其差别在于，整体历史要重构整个文明，确立一个同质关系系统，而综合历史关注的是系列、区分、界限、层次的差异、变异、历时性具体事物，重复的特殊形式，各种可能的关系”。^②不同的在于，阿尔都塞是在与黑格尔的总体范畴以及人道主义斗争的理论批判中描述了历史主义的基本论述并加以批判，而福柯则是将这种对历史主义批判的历史研究方法运用到具体的专门史的研究中。“阿尔都塞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尤其是早期的《读〈资本论〉》中，与福柯对历史方法的声明有诸多平行之处。二者的不同可能在于阿尔都塞从事的是稍微有点抽象的，对传统历史的理论批判，而福柯在他的工作中实践了这种批判，通过将这种替代方法运用于研究真实的事件，而实践了这种批判”。^③可见，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在阿尔都塞的思想中还只是一个理论框架，而在福柯的工作中则已然成为研究历史的具体方法。

而阿尔都塞通过偶然唯物论论述世界由于原子偏斜相遇产生，来描述历史并非如黑格尔所描述的那样，具有起点和终点，阿尔都塞晚期信奉一种偶然性的历史。阿尔都塞认为，历史是在形势与相遇中造就的，并且指出“我们必须将必然性思考为一种正在成为必然性的偶然相遇”。^④尤其是后期阿尔都塞对尼采思想的关注，使得阿尔都塞对历史的论述更加倾向于后结构主义的论述，德勒兹在《反俄狄浦斯》中便提及：“普遍历史就是偶然性历史，而不是必然性的历史。断裂、界限与非连续性。因为伟大的偶然是必然的，那么令人惊奇的相遇便在某个地方发生了，或在之前发生了，或者根本没发生”。^⑤可

① 刘北成编著：《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② 刘北成编著：《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③ Simon Choat. *Marx through Post-Structuralism* [M]. London: Continuum, 2010:105.

④ 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M]; edited by François Matheron and Olivier Corpet.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6:194.

⑤ 转引自 Simon Choat. *Marx through Post-Structuralism* [M]. London: Continuum, 2010:133.

见，就历史研究而言，晚期阿尔都塞与德勒兹基本是走在了同一个方向上了。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空间理论

地理学和空间理论之所以能够进入当代激进理论，原因在于其中介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一种辩证的思维看待自然、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者将地理从濒危的、不相关的，或者更糟的是成了区域科学穷亲戚的领域中拯救了回来。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和空间的社会生产的中心观点〔伴随着被辩证理解的生产过程，尽管有所夸张（社会改变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词语），但它将地理学与社会学联系起来〕将地理学的两个传统学派融合成一个可统一理解的不同方面。人文地理学最终融入了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科学更有批评性的组成部分，它利用了所有社会科学的概念，同时又给它们增加了复杂的环境空间的概念”。^①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人类实践（改造自然）和意识形态理论（塑造空间）的方式，将地理学纳入到激进的社会科学中。这种促使地理学进入当代激进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具体说来，主要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论内涵，在于其所坚持的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及其空间隐喻。阿尔都塞借助于结构主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空间隐喻的描述，为空间理论打开了思路。“结构主义也开启了上层建筑领域，那里蕴藏着太多的地理学者们所关注的东西。假若扩大结构主义对历史决定论及其对具有强吸引力的空间隐喻的偏爱的纲领性批判，那么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结构主义情有独钟也就更容易理解了。”^②正是这种借助于结构主义的上层建筑理论，尤其是阿尔都塞学派的意识形态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研究空间理论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工具。“结构主义的‘解读’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具有超乎寻常的吸引力，原因在于它为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空间结果），揭示存在于业已构建和正在构建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的解释性

① [美] 理查德·皮特：周尚意等译，《现代地理学思想》，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27页。

② [美] 爱德华·W·苏贾：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82页。

根源，提供了极其严格而明显的认识论上的理性化。”^①也就是说，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进行空间理论的批判提供了理性化的论述，它揭示了空间生产在当代社会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空间理论视为空间理论的前奏，在于其对斯大林主义经济决定论的驳斥，并在结构主义和多元决定的范畴中谈论社会存在及其发展形态。“阿尔都塞批评斯大林的经济主义和技术决定论观点，并认为自己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于斯大林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第三条道路。”^②这是此时代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共享的理论背景。正是在这种极端单一决定论的背景中，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在以一种批判的思维来重新思考辩证法的问题并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空间理论。

面对如此的理论背景，阿尔都塞诉诸的是意识形态批判和多元决定的观点。至于意识形态批判被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空间理论描述为一种空间的意识形态结构，其主要表现就是被阿尔都塞称之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教堂、剧院等。这种被意识形态再生产出来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空间生产的雏形，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空间的生产。进一步来说，在阿尔都塞看来，诸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再生产的功能所建构的便是社会生产、生活空间的全部，而且这种空间履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也是当今空间理论作为一种批判理论所开启的重要维度。可见，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功能以及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仍然是空间理论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理论资源。因为它一方面能够解释空间生产得以可能的条件，这源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保障，因为空间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空间生产，而不是纯物理空间的生产；另一方面能够解释空间生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性，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延续的需要。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对于空间理论来说仍然有重大的理论启示和指导意义。

而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思想则在于驳斥经济决定论，借助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交互作用而重塑社会。“甚至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作为总体统治)也不强调经济有直接决定意义，而重新将重点放在国家、意

① [美] 爱德华·W·苏贾：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81-82页。

② [美] 理查德·皮特：《现代地理学思想》，周尚意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38页。

识形态和文化上，将它们作为再生产中的积极组成力量。这里，空间和环境作为实践（政治的、文化的再现）的系统的标记而被理论化，最后才由经济组织起来。为从弗洛伊德观点借鉴来，并由辩证术语重新思考过的过度决定的观点提供了理论可能性，分析在权力和统治地位多种条件下，组织起来的积极力量的变化复合体。扩展而言，这个方法论使改变空间和自然的社会再生力量得到概念化。或者，这些力量不是作用于独立的自然环境，也不是由实践引起差异的空间，这些力量在组织上就是空间的，是有环境意义的物质性的”。^① 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并不是直接否定经济的作用，而是要将其放到社会结构的内部，在结构功能体系中发挥作用。而阿尔都塞多元决定便是在辩证法的术语中重新定位结构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论化的工作被视为空间理论概念化的先声。而这种与权力、政治和意识形态发生联系的空间理论，正是福柯的理论所集中讨论的问题。在此，被空间理论家所热衷的是阿尔都塞在多元决定因素之间所形成的对社会空间的结构表达，“把空间作为空间结构的表达来分析，就要考虑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系统，它们的联系，以及由它们所产生的社会实践对其所产生的塑造作用。实际上，我们可以根据由空间产生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系统‘解读’空间”。^② 显而易见，在此分析中起决定作用的便是由阿尔都塞多元决定和意识形态理论所开启的社会分析模式，它一方面描述了社会空间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另一方面描述了由这些要素所形成的社会实践对空间的塑造，同时还指出了这些要素对空间理论进行社会批判所起的作用。所有这一切都不难看出，阿尔都塞对空间理论在理论切入点和分析模式上都具有重要的开拓和启示意义。这是社会批判理论实现空间转向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其重要性将会随着空间理论的深化而不断地展现出来。

阿尔都塞对空间理论有重要的开拓意义还在于其思想对列斐伏尔和卡斯特尔斯理论的影响。就列斐伏尔而言，他基本上和阿尔都塞分享了相同的时代理论背景，即对斯大林主义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的批判，二者都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框架中重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阿尔都塞以结构主义为方法论，

① [美] 理查德·皮特：周尚意等译，《现代地理学思想》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334 页。

② [美] 理查德·皮特：周尚意等译，《现代地理学思想》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143 页。

而列斐伏尔则偏向于人道主义。列斐伏尔通过《辩证唯物主义》中对黑格尔、斯大林的批判，进而在《巴黎手稿》的思想资源中探讨“异化”和“整全人”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其所关注的日常生活批判和空间理论批判。但是，空间问题和空间塑造问题则直接是与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多元决定的思想相联系。在此意义上，列斐伏尔便与阿尔都塞有了交集，“从辩证法角度探求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生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客观性与主观性这些关系矛盾结合点的，并非只有勒菲弗一人。但是，将这种重新得到系统阐述的辩证逻辑应用于荟萃存在主义现象学和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精华并去其糟粕的，勒菲弗却是开先河者。在本世纪的这两大主流哲学运动中，他看到了完善并强化马克思主义（同时扬弃其约束性的理论僵化）的这一创造性机遇。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勒菲弗有选择地吸纳了这两大运动中的养分，坚持不懈地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试图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重新的语境化，而且正是在这样的重新语境化中，我们才可以发现对空间性进行唯物主义解读的许多直接根源，以及由此产生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许多直接的源头。”^①在此，阿尔都塞的理论已经内化为列斐伏尔空间理论语境化的内在“因素”了，当然，这些“因素”在空间理论中被激活，得益于列斐伏尔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新语境化中敏锐地察觉到阿尔都塞“因素”的存在及其空间理论转化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融合，从而开出有望重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模式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而阿尔都塞对卡斯特尔斯的影响，则在于卡斯特尔斯借用了阿尔都塞的社会分析模式（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在 20 实际 50 年代至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结构思潮和结构马克思主义思潮席卷法国，但是直到 70 年代中晚期，这些思潮才对盎格鲁美洲的地理学产生显著影响……最为重要的是，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annel Castells）的‘城市问题’（The Urban Question）关于城市的结构主义著作。该书的译本对地理学，特别是城市地理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强调确定的分析范畴，如生产方式和社会构成；强调各个重要链条中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②显然，卡斯特尔

① [美] 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75 页。

② [美] 理查德·皮特：《现代地理学思想》，周尚意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128 页。

斯对城市问题的分析是得益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分析模式的启示，在社会生产的结构内部及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中来分析城市问题出现的原因及其批判的切入点。而其直接的启示在于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系统来解读城市空间。卡斯特尔斯“在形式上运用阿尔都塞的推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城市范围的概念……社会的（城市）空间形式的社会生产过程是怎样的；相反，城市空间与社会中的机构转化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① 这些问题的分析都将在阿尔都塞的分析框架中得到有效的展开。“在卡斯泰尔看来，一般而言，空间的社会组织可以根据空间形式的决定而得到理解，这种形式是三个方面（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的每一个元素决定的，由三者结构上的联合（其中经济的决定在塑造空间中占据主要地位）决定的；它也是由空间形式的经验性的持续决定的，这种空间形式由先前的社会结构创造，并在更特殊、更具体的条件下与新形式密切相关；它还是由个体和社会组织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的具体活动决定的。”^② 可见，卡斯特尔斯对城市空间和网络空间问题的探讨基本沿袭了阿尔都塞的分析模式。

作者：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① [美] 理查德·皮特：《现代地理学思想》，周尚意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142 页。

② [美] 理查德·皮特：《现代地理学思想》，周尚意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143 页。

马克思主义面前的社会无政府主义

——一个哲学的视角

张 冀

[内容摘要]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富有批判性的、却很容易遭到埋没的思想。长期以来，这个思想传统本身的探索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往往没有得到准确的理解。事实上，不仅无政府主义者和当代的后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许多值得马克思主义者反思的观点，而且马克思本人也从无政府主义那里吸收了一些重要的想法。本文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整理无政府主义和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并说明其中哪些学说已经为马克思所吸收，哪些学说在马克思那里受到了正确的批判，哪些学说是值得我们今天严肃对待的。

关键词：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主义 后无政府主义 统治 资本 反抗

万物崩散；中心难再维系；世界上散布着一片狼藉 [anarchy]

——叶芝，《再度降临》，1921年^①

有价值的思想决不会单纯为现状辩护，而会提出强有力的、甚至破坏性的质疑；这些质疑要么使现状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要么遭到长期的、广泛的误解，要么兼而有之。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个共同点：它

^① 叶芝：《叶芝诗集》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50页。

们都是力图改变世界、同时又饱受误解的思想。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近两百年的激烈论战——以及相互学习——与其说加深了双方的鸿沟，不如说拉近了双方的距离，证明了双方的密切关联。本文试图从哲学的角度证明：倘若脱离了其中一方，我们对另一方的理解就可能会受到损害。这个角度无疑并不全面，因为这两种思想在现实中的经历都是伟大而曲折的，双方的主要人物之间也有许多有趣的个人恩怨。

不过，本文的立场并不是“中立的”，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本文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面前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在我看来，无政府主义虽然有许多值得严肃对待的思想，却始终未能准确地把握“资本的文明面”^①，因而没有在根本上批判资本的统治。这一点将逐步得到证明。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主角是“经典的”无政府主义者，主要包括英国的威廉·葛德文（1756—1836）、德国的麦克斯·施蒂纳（1806—1856）、法国的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俄国的米哈伊尔·巴枯宁（1817—1876）和彼得·克鲁泡特金（1842—1921），以及美国的埃玛·戈德曼（1869—1940）；第二部分将讨论马克思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交锋；第三部分将概述当代的后无政府主义（post-anarchism）——有人更愿意称之为后结构主义的无政府主义（post-structuralist anarchism）——在思想上的进展。显然，后无政府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经典的无政府主义。此外，本文所说的无政府主义一般指的是社会无政府主义（social anarchism）——也可以叫作集体无政府主义（collective anarchism），甚至像克鲁泡特金那样叫作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communist anarchism）——而不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individualist anarchism）。这个重大差别在第一部分第一节就会得到解释[顺带一提，费耶阿本德所主张的知识论的无政府主义（epistemological anarchism）也在本文的范围之外；他本人在政治上处于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还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也有诸多分歧，其中一人的看法未必适用于其他人；本文的目的并不是专门介绍他们各自的观点，所以有时会忽略这个问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7页。

1. 对经典无政府主义的主要误解

鉴于前面所说的理由，我将通过澄清误解的方式来阐述经典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哲学上的探索。

无政府

很不幸，就连“无政府”这个名称都不完全准确。我们不能以为“无政府主义”仅仅试图消灭“国家”、仅仅“主张在社会中废除政治的控制”^①。虽然“无政府主义(an-arch-ism)”这个说法出自19世纪的蒲鲁东，但这个概念的起源在古希腊：“希腊词 *archein* 表示‘创始’、‘引导’，最终意味着‘统治’”^②。在哲学中，前苏格拉底哲人所探讨的“本原”——水、无定形等——也是“*arche*”，尽管最早的泰勒斯似乎没有使用这个词。这个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有三种用法：1. 他“把四因中的每一种都称作 *arche*”；2. “他还把科学推理的基本前提称作 *archai*”；3. “伦理学中的目的——即有待追求的善——也被称作 *arche*”^③。总之，即使这些不同的用法并不必然具有统治的意味，从统治的视角来理解它们也是可行的。

因此，抽象地讲，无政府主义是对一切统治的否定和拒绝。如蒲鲁东所说，“无政府状态就是没有主人，没有元首 [*souverain/sovereign*]”^④，即没有主权者。叶芝的诗作《再度降临》则把无政府状态描述为“万物崩散；中心难再维系”。在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组织”中，“公民们生活在一起，丝毫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别”^⑤。这种状况有时也被看作所有人自己对自己的统治，即自治或自律。具体地讲，经典的无政府主义同时针对三个目标：“宗教，人类心智的支配者；所有权，人类需要的支配者；政府，人类行为的支配者”——这三者“代表了一座堡垒，即人类所受的奴役和由此导致的所有恐怖”^⑥。下面

① D. D. Runes, ed., *Th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N. Y.: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42, p. 11

② 阿伦特：《人的境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③ N. Bunnin and J. Yu,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p. 44

④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8页。

⑤ R. Fine, *Political Investig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127.

⑥ Goldman, *Anarchism*, online: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1910.

我将分析无政府主义对宗教和所有权的批判，关于政府的问题则主要留到下一节（第三部分会谈论国家与政府的差别）。

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很少提到费尔巴哈，但他们眼中的宗教似乎与费尔巴哈的版本如出一辙（下面谈到施蒂纳的时候会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戈德曼写道：有神论是“思辨的理论”，无神论则是“证明的科学”；前者“悬挂在彼岸的形而上学云层中”，后者则“牢固地植根于大地”^①。这似乎只是稍许修改了费尔巴哈的基本论断：“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思辨哲学的秘密则是神学——思辨神学”。费尔巴哈对神学和思辨哲学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是单纯的彼岸，后者是“移置到此岸世界中”的彼岸^②，戈德曼则把它们合并起来了。她所说的“科学”也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十分相似。在她看来，“科学”意味着“无神论否定了诸神，同时最有力地肯定了人，并借此对生命、目的和美表示了永恒的拥护”^③。总之，正如一名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最流行的地方就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所断言的那样，“唯一能照亮人间的教会就是正在燃烧的教会”^④。

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还注意到了宗教与国家的共谋。1871年，巴枯宁在称赞巴黎公社时指出：只有推翻了“一切天上和地上的偶像”，才能在“所有教会和所有国家的废墟”上面建立新的世界^⑤。更确切地说，

关于一个更加优越的存在者的观念——即使它远在天边——必须被根除，关于地上的优越性的观念才有可能不被鼓动起来。不仅如此，教会（它体现了宗教和上帝的观念）和国家起源于相同的原因。它们都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类进行奴役的工具。^⑥

巧合的是，尼采——他虽然自称反对无政府主义，却对20世纪以来的无政府主义有重大影响——在十几年后（1883年）也看到，国家正在成为“新的偶像”^⑦。不过，巴枯宁倾向于认为偶像崇拜是国家的存在条件（这并不是说国家在历史上是从偶像崇拜中演化出来的），尼采则倾向于认为国家是偶像崇

① Goldman, *The Philosophy of Atheism*, online: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1916.

② 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页。

③ Goldman, *The Philosophy of Atheism*, online: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1916.

④ S. Zizek, “Soul of the Party,” *New Statesman*, 2010.4.1

⑤ R. J. F. Day, *Gramsci is Dead*,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 113

⑥ A. Gray,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Colchester: The Ballantyne Press, 1946, p. 355

⑦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9页以下。

拜的替代品，是在宗教的偶像衰败之后才树立起来的新偶像。但他们都未能像1845年的马克思那样准确地辨认出国家与宗教的差别：

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①

在马克思眼里，世俗的国家（以及资产阶级社会和家庭）本身就面临无法化解的对抗，而世俗与神圣的对立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化解方式。宗教提供了一种超越的权威和空洞的许诺，让国家等“世俗基础”勉强显得有理有据——巴枯宁也看到了这一点——但若不能使“世俗基础”从根本上发生变革，那么无论怎样打破偶像都不会有长远的效果。

无政府主义对待所有权的态度是很有名的：“所有权就是盗窃！”^②。从这个角度可以清晰地吧社会无政府主义同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区别开来。后一种思想通常也叫作自由主义右翼、市场原教旨主义等，它的基本主张是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应当尽可能地小——从汉语的角度来看，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无政府主义”。但与社会无政府主义不同，这种“真正的无政府主义”不仅没有批判所有权，而且将所有权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出于同样的理由，宗教信仰有时也被看作不容干涉的个人权利）。于是，与市场 and 契约相关的一切都成了“无政府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用黑格尔的话说，这种“无政府主义”想要的是没有国家和家庭的资产阶级社会。可是我们不难发现，为了保障市场的运行和契约的落实，国家的强制力无论如何都不能完全取消，否则这种“无政府主义”所憧憬的“自由”市场就会变成暴力和欺诈的场所。因此，比较折中的观点是设想一种“最弱意义的国家”或“守夜人式的国家”^③，并把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当作一种可以对国家权力施加压力、却不能完全实现的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准确地描述了这一点：

无政府状态是摆脱了使社会解体的各种特权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的规律，而市民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则是现代公共状况的基础，正像公共状况本身又是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保障一样。它们彼此既十分对立，同样又完全互相制约。^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

②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8页。

③ 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页。

这里的“无政府状态”和“公共状况”显然分别对应于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两者构成对立面的统一。

由此可见，当日常用语将“无政府”与混乱无序等同起来时，这个词恰好指的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完全实现的情形。正如葛德文所说，“财产积累一经建立起最高统治权，从此一切都成了力量和诡计对付力量和诡计的一场公开斗争”^①。因此，许多政治思想都把“无政府”与暴政关联起来，比如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约翰·亚当斯认为，“一旦社会接受了一种观点，即所有权不像上帝的律法那样神圣，而且没有一种法律的力量和公共的正义可以保护所有权，那么无政府状态和暴政就开始了”^②。的确，假如既存在所有权、又不存在可以保护所有权的国家权力，那么暴力和欺诈肯定会横行无忌；但这一切同社会无政府主义的想法相去甚远。

社会无政府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分享了同一个观点：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不得不通过“合法的”契约在市场上“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换句话说，他们的经济地位极有可能使他们的自由变成一纸空文。葛德文很早就注意到，

在欧洲最文明的国家里，财产的不均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大量的居民被剥夺了足以保证小康或者安定生活的几乎一切便利条件。他们最辛勤的劳动，仅能勉强维持温饱。^③

在蒲鲁东看来，这种状况正是所有权的真正后果：“富人的所有权……必须不断地采取防卫措施来对付穷人对于财产的本能上的爱好”^④，以便巩固贫富差距、巩固富人的优越地位，从而实际上导致了所有权对穷人的统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权才被他等同于盗窃，国家则被他看作所有权的同谋：军队、监狱、税收等往往变成了富人针对穷人的“防卫措施”。按照克鲁泡特金，“从来就没有自由放任的国家；国家一直自觉地站在资本家和垄断者一边，从来不会让工人获得反对剥削的自由”^⑤。这个观点对于近几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

① 葛德文：《政治正义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16—617页。

② M. Hardt and A. Negri, *Commonwealth*, Cambridge, M. A.: The Belknap Press, 2009, p. 10.

③ 葛德文：《政治正义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页。

④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3页。

⑤ A. Gray,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Colchester: The Ballantyne Press, 1946, p. 364.

仍然适用。标榜“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政府不仅积极地在本国压制工会等社会组织，削弱工人在资本家面前的谈判能力，而且不断加剧全球的两极分化，试图在国家和区域之间建立坚固的“防卫措施”。不过，无政府主义者似乎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探讨现代贫富差距的起源——资本的原始积累（后面还会简要地涉及到这个相当关键的问题）。

因此，无政府主义决不是单纯关于自由的学说，而且是关于平等的学说——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更确切地说，这种自由和平等指的是“个人自由和经济平等，人的身上高尚、真实的东西都是从这双重力量中诞生的”^①。克鲁泡特金的说法更加激进：

我们既然宣布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首先就要宣布我们拒绝以任何方式将己所不欲之事施于他人；我们将不再容忍不平等，因为它让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得以滥用他们的力量、狡猾或才干，这些品质如果以那种方式被用到我们自己身上，就会让我们不安。一切事情的平等——这与公正同义——才是原原本本的无政府主义。^②

自由与平等在这里的关联不同于它们在自由主义传统中的关联。后者大致包含了两个要点。第一，赫伯特·斯宾塞提出，“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做任何事情的自由，只要不侵犯其他任何人的同等的自由”。这种平等意味着不受干涉的自由意志本身的平等，却排除了“社会的和经济的平等”^③，因而如前所述，它实质上会对自由造成威胁。第二，自由与经济平等据说处于相互取舍的关系：增进经济平等仿佛必定会妨碍自由，反之亦然。但这是无政府主义不能接受的，因为经济平等只会损害富人剥削穷人和穷人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此外，无政府主义对平等的强调还表明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的判断是不成立的：“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基础，认为解放个人是解放群众、解放集体的主要条件。”^④这显然与事实相反。

最后有必要集中考察一下施蒂纳。乍一看，“唯我论者”施蒂纳肯定是个

① Goldman, *Anarchism*, online: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1910.

② T. May,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acques Ranciè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83.

③ S. Newman, *The Politics of Post-Anarch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1–22.

④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页。

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但这是对他的低估（实际上也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低估）。他在宗教、所有权和政府这三个问题上都符合社会无政府主义的特征。这里先讨论前两个方面。

其一，施蒂纳的宗教批判在概念上比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更加深刻。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末尾提出，基督教把人与上帝结合成了“神人 [Gottmensch]”，而人本学——这是“基督教的真理”——需要进一步把人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即把人“当作实体”^①。这个观点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一定影响。按照施蒂纳的表述，费尔巴哈的主张是“神必须让出位置，当然并非是为我们 [uns]，而是为人 [Menschen]”。这个观点被施蒂纳视为“启蒙主义者的创举”的“完成”。但他针对性地问道：在启蒙之后，“唯有神人 [Gottmenschen] 中的神才会消逝吗”^②？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人”必须与“神”一道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上面所说的“我们”——而不是单独的“我”。就整体而言，施蒂纳认为“我们全都是完善的”^③，并没有背负原罪；同时就每个个体而言，他又相信“我的需要是独一无二的、我的行动是独一无二的”^④。因此，他已经不再像费尔巴哈那样把人的本质当成“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以众多不同的“我们”为立脚点，只是还未能最终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⑤。简言之，无神论对人的理解可以分为三步：从“人”的类存在到“我们”，再到“社会关系”。遗憾的是，经典无政府主义的无神论似乎停留在费尔巴哈的水平上，没有注意到施蒂纳（以及马克思）的贡献。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局限的理论后果。

其二，施蒂纳的“唯我论”与“自由”市场上的唯我论（其中包括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相去甚远。在它看来，通常“所谓的唯我论者在严格意义上不是唯我论者，因为他们是被自己的欲望和利益所支配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自己的所有物”^⑥。真正的“唯我论者”不仅要撇开宗法和道德，而且要抛下功利和情欲。在这个意义上，施蒂纳“拒绝任何固定的社会原则——比如所

① 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9-20页。

②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65页。

③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00页。

④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0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⑥ K. Karatani, *Transcritique*, Cambridge, M. A.: The M. I. T. Press, 2003, p. 170.

有权——并谴责自由市场中的竞争”^①。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两种唯我论的差别归结到了对自由本身的批判：“对某种特定的自由的热望总包含有对新的统治的向往”^②，因而仍旧会使自己和他人遭到外来的支配。换句话说，真正的自由决不是“特定的自由”——例如通常所谓的唯我论者通过所有权来获得经济自由、通过另一些权利来获得言论、出版的自由等——而是完整的自由，尽管他对后者的阐述不无神秘。

原始或野蛮

政府毕竟是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批判对象之一；同时，政府与文明仿佛又是无法分割的。一些论者由此认为，“现代无政府主义很可能以间接的方式受到了让·雅克·卢梭的很大影响——他的思想具有原始主义的气息”^③。有些人或许会对这股原始的气息抱有浪漫的想法，例如《启蒙辩证法》认为：“大地的果实并不需要依靠法律体系来保证，倘若我们用文明的方式来控告这种随意混乱的状态 [Anarchie]，反而会将这种多姿多彩的生活断送掉”^④。不过一般来说，人们往往觉得没有政府只会导致无法容忍的野蛮。但实际上，如果说无政府主义在关于政府的问题上有什么弱点，那恰好不是它过于野蛮、过度依赖自然，而是它过于文明、过度相信人力。原因很简单：无神论和经济平等——前面已经提到了国家对这两者的妨碍——决不是原始的东西，而是高度文明的产物。这一节将概述经典的无政府主义对现代文明的想法，并进一步说明它试图如何取代政府、或者说建立自由的政府。

经典的无政府主义者十分推崇科学，这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完全一致。年代最早的葛德文——他虽然没有以无政府主义者自居，却向来被看作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在他的代表作《政治正义论》中写道：

暴力来自垄断。在野蛮人中间，由于食量大于供应，或者由于一见到渴望的对象情欲就炽烈起来，也可能偶然出现暴力；但是，随着理性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种暴力会逐渐消失。^⑤

① B. Franks, “Postanarchism and Meta-Ethics,” *Anarchist Studies*, vol. 16, no. 2, 2008, p. 141.

②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72页。

③ D. D. Runes, ed., *Th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N. Y.: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42, p. 11.

④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⑤ 葛德文：《政治正义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16页。

这里的“食量大于供应”大致相当于后代所说的“马尔萨斯陷阱”，即食物等生活资料的增长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显著地慢于人口的增长。任何人一旦认识到了这一点，就决不会怀有原始主义的幻想，也不会相信任何前资本主义社会可以保持长期的富足和稳定——因为“多余的”人口无论如何都必须周期性地通过战乱、灾害、殖民等方式被消灭掉。“合理的”社会秩序必须有利于这种过程的反复进行，这就让政府有了发挥的空间：“由于集体的力量的集中，政权给造成灾难的疯狂企图，给压迫、专制、战争和征服提供了机会”^①。相反，普遍的平等、广泛的团结、权威的缺乏等等很可能使对外战争、对内镇压等消灭人口的常用手段受到阻碍。不过，葛德文并没有具体阐述“理性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如何能使人类社会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只是一般地宣称“政治是一门科学。人性的一般特点是能够了解的，可以设计出一种方式，就其本身来看是最符合于人类社会生活情况的”^②。

蒲鲁东和巴枯宁也没有实质性地推进这方面的思想。前者的名作《什么是所有权》十分乐观地提出，既然人类终于凭借科学——即“与事物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并从观察中推论出来的智识体系”——在许多领域取得了伟大的进展，就同样“应该也去找寻社会的体系”，由此就会发现，“政治的真理或政治学是一种完全不受君主的意志、多数的意见和群众的信仰所支配的东西”^③。这是青年黑格尔派、包括青年马克思经常强调的观点，例如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引用伊壁鸠鲁的话说：“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④简言之，科学地看，政治的真理与任何人的意志无关。巴枯宁在同样的意义上写道：无政府主义

要观察各种事实的一般关联，包括瞬间的事实和实际的事实；要建立内在于现象发展的一般规律，包括物理世界的现象和社会世界的现象；这就是说，无政府主义要指出人类必须严格遵循的一般条件——尽管它们总是遭到致命的忽视或遗忘——由此确定人类进步的道路上不可改变的地标。^⑤

在经典的无政府主义者当中，似乎只有克鲁泡特金——他原本是一位出

① 葛德文：《政治正义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页。

② 葛德文：《政治正义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3页。

③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⑤ R. J. F. Day, *Gramsci is Dead*,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 115.

色的地理学家——比较生动地阐述了现代科学的巨大成就对政治的决定性影响。他的主要看法与马克思关于工作日的论述十分接近。马克思把“工作日的缩短”看作社会解放的“根本条件”^①，克鲁泡特金的名作《面包与自由》也仔细地探讨了这一点。按照他的计算，“要是人们依照合理的科学方法来耕种……一个人还用不到做六十个半天的工便可以获得他的全家所需要的面包、肉类、蔬菜以及奢侈的水果”^②（我们今天可以忽略克鲁泡特金在这里关于性别分工的预设）。就工业而言，他也举了一些例子来证明“现在的机械的力量”强大得令人“几乎不可相信”^③，并讥讽地说，英国有几座军工厂就“卫生及智能方面的组织而论……实在是很完善的”^④。最终他断定，“凡是成年的人，从二十岁或二十二岁起，到四十五岁或五十岁止”，只要每天花费五小时从事某种“必需的职业”，就足以过上“安乐”的生活，并把充裕的闲暇时间用于“科学、艺术”和其他非必需的活动^⑤。

用今天的话说，克鲁泡特金描绘了一个已经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社会——一个生活资料十分丰富的社会。这有可能使政治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国家在根本上是为了消灭“多余的”人口——他们的主要成分当然不太可能是上流阶级——而存在的；用克鲁泡特金的话说，国家是“地主、军阀、法官、牧师和后来的资本家之间相互保障的团体，目的是互相支持对方在人民之上的权威，并利用群众的贫困来增加自己的财富”^⑥。需要注意的是，“群众的贫困”在人口“过多”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一种道德现象，而且是一种“自然”现象；因此，国家“在人民之上的权威”同样曾经具有“自然”基础。由此可见，克鲁泡特金看待社会发展的方式是辩证的：他既为先前的社会秩序找到了合理的根据——进一步讲，这个根据并不是前人自己已经认识到的，而是后人在突破旧有的秩序时才认识到的，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9页

② 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见：《巴金译文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4页。

③ 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见：《巴金译文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5页。

④ 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见：《巴金译文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9页。

⑤ 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见：《巴金译文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8页。

⑥ A. Gray,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Colchester: The Ballantyne Press, 1946, p. 364.

一把钥匙……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①——同时又凭借同样的理由否认了这种秩序在当今的合理性。

科学的社会组织——通常称作“联合 (Verein/association)”——与这种国家截然不同。蒲鲁东写道：在无政府状态下，“政治的职能被还原成了产业的职能，而社会秩序无非是从交易和交换中产生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可以说是自己的绝对统治者”^②。因此，经典的无政府主义有时也被看作一种“反政治”^③；换句话说，它与其说代表了一种新的政治力量，仿佛想要在现有的政治领域中同已有的政治力量一较长短，不如说代表了政治的终结，至少是一种常见的政治概念的终结。列宁曾经攻击无政府主义说：

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对那些甚至连这点都不了解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至少半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不值得多费唇舌的。^④

我们不难发现，除了“国家”一词之外，这里对社会主义的描述同经典的无政府主义是相当吻合的。下一部分将讨论马克思与这一切的关联——马克思对“自由人联合体” (Verein freier Menschen)^⑤、“集体的理性” (assozierten Verstand)^⑥ 等术语的使用决不是未经斟酌的。

为了建立这种科学的社会组织、摆脱政治权威的统治，经典的无政府主义者想到的并不是革命，而是科学的教育。葛德文提出：

人类思想向一种完美境界的发展，要靠三个主要原因：著述即通过书面或者口头讨论作为媒介来传播知识；教育，即在早期对于并无先入之见的人灌输正确原则的做法；政治正义，即在社会实践中采用某种道德或真理的原则。^⑦

对于革命，葛德文则告诫说，“除去有革命就有流血之外，我们还有一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② R. J. F. Day, *Gramsci is Dead*,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 112.

③ S. Newman, *The Politics of Post-Anarch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4.

④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6页。

⑦ 葛德文：《政治正义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81-82页。

看法，那就是它们必然是粗糙和不成熟的”^①，而著述、教育和政治正义显然不仅不会流血，而且是以传播和推行成熟的思想为宗旨的。

巴枯宁似乎以一种独有的方式吸收了这种观点：他也不主张马克思式的革命，却积极参与了针对统治者个人的恐怖活动。这种巴枯宁式的革命尽管会流血，却不是大范围的武装斗争，而且或许可以说是“成熟的”，因为统治者当然不是“并无先入之见的人”，而是仿佛罪大恶极的人。在社会层面上，巴枯宁同样支持科学的教育，但他更加强调教育的自发性：

人的自由仅仅在于：他之所以遵循自然规律，是因为他本人如实地认识到了这些规律，而不是因为它们从外面被某种外来的意志强加到了他们身上，不论这种意志是神圣的还是人类的，是集体的还是个体的……再说一次，创造生活的是生活，而不是科学；只有人民自身的自发行动才能创造自由。^②

巴枯宁甚至对 20 世纪（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做出了预言般的判断：“科学的政府和科学的人必定是无能的、荒唐的、无人性的、残忍的、压迫性的、剥削性的、罪恶的”^③。因此，尽管高度发达的科学始终是解放的必要条件，但若不能推翻政府、不能把科学变成人们身上自发的东西，那么科学反倒有可能变成统治的有效手段。

这一切意味着“经典的无政府主义立场立足于一种目的论的世界观”^④：民众会自发地倾向于科学，而不是倾向于迷信和奴性；更确切地说，资本主义社会必须有利于“个人在理智上的进步”，必须有可能促使人们“更好地觉察到自己作为人所拥有的尊严，并向自己的同志展现出自己的忠诚”^⑤。如我们今天所见，这种目的论显然是无法成立的。例如在克鲁泡特金的想象中，未来的“读者都受了良好的教育，更富于判断力，书籍的价值读者自己会判定，无谓的书也不会出版了”^⑥。这与 20 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事实都是完全相反的。本

① 葛德文：《政治正义论》，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83 页。

② A. Robertson,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the Marx-Bakunin Conflict*, online: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2003.

③ T. May,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acques Ranciè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95.

④ T. May,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acques Ranciè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86.

⑤ G. Sorel, *Reflections on Viol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22.

⑥ 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见：《巴金译文全集》第 9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05 页

文第三部分将处理这个问题。

最后还是简短地谈一下施蒂纳。他或许是最早将“联合”(Verein)当作哲学概念的人。前面提到,他用众多的“我们”来反对“人”的类存在;联合与国家也体现了同样的区分:“国家是一个人的社会[Gesellschaft der Menschen],而并非是眼中只有自己的自我的联合[Verein von Ichen]……我消灭国家并代之以利己主义者的联合[Verein von Egoisten]”^①。国家会把不服从统治的人当作非人排斥到国家之外——这是一切人本学的必然归宿——联合起来的个人则不屈服于任何统治,因为他们是之前所说的真正的唯我论者。他们会“把实际处在我们面前的其他个人当作自由的人,而不以任何更高的存在者——比如家庭、共同体、族群、国家、或社会——为中介”^②。下一部分将讨论这种观点对马克思的影响。但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施蒂纳对科学的巨大进展似乎没有什么兴趣,因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遭到了嘲笑。

2. 马克思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和相互吸收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马克思毕生都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尽管蒲鲁东和巴枯宁都与他颇有私交(此外,克鲁泡特金在十月革命之后也被列宁视为贵客,虽然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不过,蒲鲁东和巴枯宁在19世纪的总体影响远远超过了马克思,1871年巴黎公社的大多数参与者也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巴黎公社失败后,由于巴枯宁主义者声势太大,马克思甚至被迫解散了自己创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当时真正能与无政府主义者分庭抗礼的是马克思的另一位朋友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及其追随者。他们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1875年在哥达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后改名为社会民主党,至今仍然是德国最主要的政党之一——致力于在政党政治的框架内开展斗争,试图利用国家机器来改造社会。不仅无政府主义完全不能接受这一点,而且马克思也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严厉谴责了拉萨尔派在国家问题上的软弱。由此可见,马克思仿佛处在无政府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参见下表^③)。这个部分将从三个方面由浅入深地论述马克思与经典无政府主义者

①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92页。

② K. Karatani, *Transcritique*, Cambridge, M. A.: The M. I. T. Press, 2003, p. 171.

③ E. O. Wright,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London: Verso, 2010, p. 214.

的复杂关系。

三种转化模式：断裂的、缝隙中的和共生的

关于超出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的转化路线的设想	与转化的逻辑联系最紧密的政治传统	转化中最关键的集体参与者	针对国家的战略性逻辑	针对资本家阶级的战略性逻辑	成功的象征
断裂	革命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具有政党组织的阶级	攻击国家	与资产阶级对峙	战争（胜利和失败）
缝隙中的变换	无政府主义	社会运动	在国家之外建立替代方案	忽略资产阶级	生态竞争
共生的变换	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力量和劳工的联盟	利用国家：在国家的领地上斗争	与资产阶级合作	渐进的改造

顺带一提，虽然马克思经常指责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但这既不同于社会无政府主义，也不同于前面所说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在马克思那里，这种“无政府主义”是与资本对整个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控制相对立的：一方面，资本能够控制的领域——比如企业内部、某些政策的制定过程、某些充满了广告的消费场所等——不仅是有秩序的、合理化的，而且往往有严格的等级和强大的权威；另一方面，这些领域之外却有难以置信的混乱无序和不合理性，由此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尽管国家也许一直为市场和契约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无政府”状态恰好是市场和契约“正常”运作的结果。这里的关键在于：“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并不会由于资本主义控制的加强而消失或减弱；相反，资本主义控制的每一次改进或转变都会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更大的“无政府”状态。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在资本主义当中具有结构上的必然性。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准确地总结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①。这是马克思最伟大的创见之一，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手段上的纯粹主义

从前文可以看出，无政府主义既不赞同马克思式的革命，也不赞同在国家和企业的领地上进行斗争。这里的基本原则十分简单：“既然目标是自由，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3页。

它就只有通过自由的手段才能实现”^①，而革命前后的紧急状态和常规的政治活动（包括政党政治和官僚事务）都以各自的方式妨碍了自由。这种手段上的纯粹主义倾向在早期尤其明显。当蒲鲁东还在法国的时候（他在1849年之后遭到了路易·波拿巴的监禁和驱逐），他

相当反对政治活动，而是倡导工人的合伙关系——其中不再会有“盗窃”——并主张通过协同工作来提高生产率。他相信，这样一种伦理的、经济的交换体系的扩展将取代资本和国家。^②

这里的“政治活动”意味着正面抗衡资本和国家，意味着或许十分漫长而艰苦的拉锯和搏斗；蒲鲁东对此不感兴趣，想要另起炉灶建立一种自由的、至少是没有所有权（“盗窃”）的组织，并证明它比资本和国家更加符合伦理。同样，“众所周知，巴枯宁不喜欢任何种类的局部措施”^③，而是力求直接使社会得到完全的解放。这种想法实际上与施蒂纳是一致的：本文第一节提到，施蒂纳也把不完整的、“特定的自由”看作一种统治的形式。

巴枯宁甚至提出，反抗的主体也应该是纯粹的。他把“人民的伟大的混杂（弱势者、‘社会渣滓’）”称作“无产阶级之花”，并明确承认他们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当然巴枯宁并不赞同这个贬低的说法。在他看来，这个群体“几乎没有受到资产阶级文明的污染”^④，因而“在它当下的身份中就体现了一种实际存在的无政府主义”^⑤。本文第三部分会从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再次谈论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马克思自始至终都反对这种手段上的纯粹主义；他既认为暴力革命经常是必要的，又相信在国家和企业内部的局部斗争是有益的。前一个方面也许不必多说。后一个方面则包含了一定的讽刺：尽管无政府主义讲究“自由的手段”，但是现实的工人可以理解、可以认同的自由恰好不是某种完整的自由，而是某种具有妥协性的自由。诚然，它可能范围较小，从而把剥削和压迫转移到了其他地区、其他国家的劳动者身上；它可能包含了某种民族的、种

① G. T. Kurian, ed., *The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 Washington, D. C.: CQ Press, 2011, p. 53.

② K. Karatani, *Transcritique*, Cambridge, M. A.: The M. I. T. Press, 2003, p. 167.

③ R. J. F. Day, *Gramsci is Dead*,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 113.

④ A. Robertson,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the Marx-Bakunin Conflict*, online: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2003.

⑤ N. Thoburn, *Deleuze, Marx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60.

族的、宗教的、文化的、性别的偏见；它还可能只有短暂的效果，长远来看只会造成损害。但它是发动工人的唯一现实的手段。因此，尽管马克思反复告诫工人“不应夸大……日常斗争的最终效果”，也“不应当只局限于……不可避免的、因资本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不断引起的游击式的搏斗”，而应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①，但他从来不会轻视这种具有妥协性的自由。

从根本上讲，马克思的观点具有存在论上的真理性：任何目标（自由）都不是在主体（工人）的行动之外预先设计好的（比如某种完整的自由），而是在或许十分局限的、充满曲折的行动中逐步展现出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有一段不朽的文字：

无产阶级革命……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②

简言之，没有在行动中得到认识的东西根本不具有充实的存在。倘若工人未能认识到在国家和企业内部的斗争是不彻底的，这种斗争就是唯一“自由的手段”，尽管它在未来也许会受到批判。

经典的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或多或少承认了这一点。蒲鲁东在1863年悲伤地写道：“群众几乎总是把自由的政府形式看作贵族制，但他们更喜欢绝对君主制……人民不信任或不关心民主的形式，所以他们一直在阻碍自由的道路”^③。巴枯宁似乎也改变了看法，认为人民比较“无知”，因而“需要帮手”才能从现有的“体系”中摆脱出来，这些帮手既要“呼唤、统一并组织民众的自发力量”，又必须“自愿在得不到承认的情况下工作”^④。于是，无政府主义逐渐放弃了一蹴而就的企图，转而与工团主义（syndicalism）结合起来。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重要代表乔治·索雷尔略显讽刺地说：

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到头来厌倦了一直朗读同样的猛烈谴责资本主义体系的大话，并促使自己寻找一条可以将自己引向真正的革命行动的道路；他们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4页。

③ K. Karatani, *Transcritique*, Cambridge, M. A.: The M. I. T. Press, 2003, p. 175.

④ R. J. F. Day, *Gramsci is Dead*,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 116.

入了工团，而工团通过暴力的罢工总算实现了他们频频谈论的社会战争。^①

至于暴力革命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巴枯宁主张对统治者个人采取恐怖活动；克鲁泡特金则进一步承认了系统性的暴力的必要性：“没收”不合理的财产“不可能借助和平的手段。倘若不经过斗争，中产阶级就不会放弃它的权力”^②。既然社会改造的障碍是中产阶级，而不是极少数反动分子，革命暴力就必定是系统性的、有组织的。

无产阶级的政权

这种纯粹主义的突出表现是反对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因为前面说过，科学的社会组织在无政府主义看来应该是“联合”，而不是国家。蒲鲁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仍然有经济主义的倾向：取代国家的将是“产业组织”，或者说“我们将用经济的集中来替代政治的集中”。但是后来的经验表明，这种替代“未必能解决合理性和官僚主义统治的问题”^③。事实上，如果说“政治的集中”意味着权威的、意志的统治，那么“经济的集中”就意味着官僚的、理性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这两种统治形式相当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描述的从“自我意识”到“理性”的过渡，它们分别支配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蒲鲁东的这种经济主义不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是对资本主义的完善，尽管这与他本人的愿望相反。

巴枯宁则清楚地指出了“经济的集中”对自由的危害：国家将变成“唯一的银行家”，它的诸多统治手段

将要求这个政府中有无穷的知识 and 许多“塞满了大脑的头颅”。这个政府将由科学智能来主宰，这是一切政权中最贵族式的、最专制的、最狂妄的、最傲慢的。真实的和伪装的科学家和学者将构成一个新的阶级、一种新的等级制，世界则将被划分成以知识的名义来统治的少数人和数不清的、无知的多数人。^④

从这个角度来看，无产阶级的政权不过是一种“绝对主义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在“压迫的体系内部”给资本主义的统治造成了一些“竞争”^⑤，但是两

① G. Sorel, *Reflections on Viol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5.

② R. J. F. Day, *Gramsci is Dead*,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 120.

③ R. J. F. Day, *Gramsci is Dead*,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 111.

④ J. V. Femia, *Marxism and Democrac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 147.

⑤ G. Claeys, ed., *Encyclopedia of Nineteenth-Century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2005, p. 45.

者都是“由科学智能来主宰”的。克鲁泡特金也在同样的意义上认为，“把经济生活的一切主要来源都托付给国家……就意味着给暴政创造了一种新的工具”^①。本文第三部分将结合当代的后无政府主义来详细探讨这个问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 无政府主义者似乎未能严肃对待马克思为无产阶级政权所规定的独特的历史使命；2. 马克思最终设想的一切国家的消亡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建立同无政府主义有相当密切的关联。

其一，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须逐步“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②。前面说过，无政府主义也非常倚重发达的科学，也希望“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以便使“个人自由和经济平等”成为可能，只是对国家的形式十分反感。因此，它如果要与马克思主义抗衡，就必须找出另一种促进物质生产的方案。正是在这个方面，无政府主义向来都是相当薄弱的。按照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的说法，巴枯宁曾经试图“简单地把大地产分给农民”，结果巩固了“小块土地所有制”^③，长远来看反倒不利于农民的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分别记载说，巴枯宁等人在1870年的里昂一度“占领了市政厅，颁布了愚蠢透顶的关于废除国家的法令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④，却没有处理“国民自卫军中的一切资产者”，结果“不到一小时的工夫”就被赶走了^⑤。这一切当然不足以证明马克思所设想的无产阶级政权是毫无问题的，但至少可以表明经典的无政府主义缺乏同等可行的方案。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责巴枯宁的实际主张是“无产阶级最好什么也别干，而只等待……普遍清算的日子——末日审判的到来”^⑥。

其二，马克思当然不想要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永远维持下去；相反，“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的各个阶层实行的阶级统治只能持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⑦，随后国家就必须退出历史，由“自由人联合体”

① W. Price, *An Anarchist Response to a Trotskyist Attack*, online: Anarkismo.net, 2011.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8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8页。

(Verein freier Menschen) 来取代。这个关键概念不仅包含了来自无政府主义传统的“联合”(Verein/association)一词,而且它与无政府主义之间还有一处更加明确的联系,可惜很难辨认。按照《资本论》第3卷,

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而不是作为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 [assozierten Verstand] 所把握、从而受这种理性支配的规律 [Gesetz] 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①

后半句显然是对“自由人联合体”的一种描述。但是日本学者田 稔发现,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原稿进行了重大的修改。马克思的说法是:

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而不是作为他们的集体的理性 [assozierten Verstand] 来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②

也就是说,马克思只讲了“集体的理性”,却没有提到它所“支配的规律 [Gesetz]”。这在结构上是非常紧要的:倘若“集体的理性”与它所“支配的规律”形成一种双层的结构,它们的实际表现显然就是民众与国家的对立——因为“规律”意味着一种集中,意味着“集体的理性”可以汇集成一种单一的理智对象,从而可以由单一的主体(国家)来把握和运用;但如果马克思所设想的是一种单层的结构,那么“集体的理性”就只存在于众多主体(自由人)彼此关联的活动当中,不可能作为单一的、集中的对象而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巴枯宁怀疑马克思要用“所谓人民意志”来掩盖“进行统治的少数人的专制”时,马克思的回答是:“在集体所有制下,所谓的人民意志消失了,而让位给合作社的真正意志”^③。可见,马克思在这一点上与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最终并不主张以国家为代表的“人民意志”。

总的来看,经典的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分享了比较类似的目标,却在达到目标的手段问题上、特别是在国家的作用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相当同情无政府主义的居伊·德波指出:“无政府主义还是对国家和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否定……它是一种纯粹自由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将每一件事情都放在同一水平上并丧失了任何‘历史的邪恶’的概念”,所以在现实的运动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6页。

② K. Karatani, *Transcritique*, Cambridge, M. A.: The M. I. T. Press, 2003, pp. 178ff.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6-407页。

它只能“重做和重播同样简单的事情及其全部结论”^①。

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

从马克思的立场来看，无政府主义在理论中的致命弱点是未能理解“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却以为在“一切经济形式下，彻底的革命同样都是可能的”^②。经济学家熊彼特后来以同样的方式批评说，无政府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一样，“没有土壤供给玫瑰花生长。让它们饱餐人们对它们美丽的称赞吧”。他还嘲笑说，之所以蒲鲁东有“明显”的“经济学错误”，是因为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完全“轻视经济学论证”^③。但是前面讲过，无政府主义并没有原始主义的幻想（空想社会主义则相反），而是强调现代文明的积极意义；它在什么意义上忽视了“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呢？

克鲁泡特金批评马克思说：

“剩余价值”本身是一种更深的原因的结果。真正的弊害与其说是一般人民没有消费着剩余，不如说是使剩余价值有存在的可能这件事……当生产机关仍被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的时候，这种弊害是不会消灭的。^④

表面上，马克思也完全明白这一点。在马克思看来，分配不只是“产品的分配”，而且首先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⑤。这个观点显然涵盖了克鲁泡特金所说的少数人对生产机关的掌控。于是，两位学者的看法仿佛是很接近的：只要某些更加根本的分配——这是“一种更深的原因”——是不公正的，产品（包括剩余产品）的分配就肯定是不公正的。

然而，马克思实际上不只看到了这个问题。尽管剩余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和之前的社会都“具有对抗的形式”，但是

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⑥

① 德波：《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405页。

③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44-445页。

④ 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见：《巴金译文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2-59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7-928页。

因此，就一般历史而言，少数人对生产机关的掌控的确是人类解放的根本障碍之一。可是我们无法由此直接推论出解放的可能性和途径。只有资本主义这个特殊的时代——更确切地说，只有以榨取剩余劳动为前提的无休止的资本积累——才使得新的、自由的社会形态首次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

但是资本积累本身决不是清白的。从剥夺农民的土地、迫使他们变成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到规训工人、利用国家机器对工人进行限制或镇压，再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短暂而可怕的历史——这一切的核心都是无休止的资本积累：资本需要劳动力、需要土地等资源、还需要有效需求，否则产品（包括剩余产品）的价值就无法得到实现。例如，殖民主义的行径的确有可能为相对落后的地区迅速带来一定的文明，但从资本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的主要意义无非是这个地区成了有效需求的来源。

由此可见，马克思与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上是相互对立的。如前所述，无政府主义是对一切统治的否定和拒绝。资本的统治不过是诸多统治形式之一，是普遍性中的一种特殊性；对资本的批判也相应地从属于对形形色色统治的批判。但对马克思来说，对资本的批判是唯一真正有效的对统治的批判：只有通过批判资本，我们才有可能使它的“文明面”对人类解放起到推动的作用，而对其他任何统治形式的批判都无法直接做到这一点。马克思的立场是与直觉相反的：对资本主义这个不同寻常的特殊性来说，不是普遍性比特异性更加根本，而是特殊性比普遍性更加根本。为了推翻一种普遍性（推翻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这是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者共同的宗旨），我们既不能逐个打破它的种种特殊形式（尽管这可能是有益的），也不能单纯否定这种普遍性“本身”（这只会产生许多大致正确的空话），而要做到并消灭这种普遍性中的某种不同寻常的特殊性，因为只有这种特殊性才将这种普遍性本身的存在条件（这也相当于灭亡的条件）实际展现出来了。

3. 后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思想

与马克思主义不同，无政府主义并没有经历十月革命那样的重大事件，因而它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重大转折和突破并不是由它自身发起的——俄国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主动创造——而是由 20 世纪的思想发展、特别是由后结构主义所推动的。因此，经典的无政府主义在很大程

度上转变成了“后无政府主义”，或者可以叫作“后结构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我将分析后无政府主义在它自己看来是如何批判经典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并大致说明它的局限。可以预先指出的是，后无政府主义虽然反对资本主义，却始终没有理会前面所说的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

对新的国家形式的反抗

如前所述，巴枯宁预见性地对科学的统治发出了警告，尤其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可能导致知识精英的巨大权威。同时，资产阶级社会在20世纪的发展使得国家机器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宽泛、更加“日常”了，不再仅仅表现为集中的政府权力。下面将从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分别考察这两个问题，然后从总体上探讨后无政府主义对政治的理解。

20世纪的哲学往往非常强调科学的语言性：科学决不会原原本本地反映客观对象，而是通过一种语言的构造和组织来表达客观对象的；科学与神话、律法、小说等语言形式的差别也是语言内部的差别，而不是语言之外的客观实在与人为构造的语言之间的差别。因此，科学必须服从一切语言共有的规定和局限。较早的现象学还只是把语言规定为人的“住所”，后来的结构主义则把这间“住所”视为“牢房”^①——人不只是居住在语言中，而且是被迫居住在语言中，因而可以说遭到了语言的囚禁。这种囚禁未必是压迫性的，反倒有可能得到“囚徒”的认同和维护；但是压迫和强制决不会因此消失，也不会毫无表现。这正是后结构主义的主要问题之一：在语言所建立的错综复杂的“牢房”中把形形色色的压迫和强制揭示出来，向人们展现出脱离现有的“住所”、创造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尽管后者归根到底不过是另一间“牢房”）。可见，后结构主义在语言问题上延续了激进的传统。

这一切既与无政府主义有紧密的关联，也要求经典的无政府主义做出一些改变。克里斯蒂娃指出：“不存在写作中的无政府状态，因为写作会带来秩序，会进行调节和立法”^②。换句话说，当后结构主义试图反抗语言的秩序时，它所要求的正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虽然经典的无政府主义并没有明确地将语言的“牢房”看作统治的一种形式，只攻击了宗教、所有权和政府，但它既然与一切统治为敌，就可以同后结构主义相容。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德

① S. Žižek, *Less Than Nothing*, London: Verso, 2012, p. 871.

② J. Kristeva, *Powers of Horror*, New York, N. 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36.

勒兹、福柯、德里达、朗西埃等人都是比较同情无政府主义——后无政府主义者有时喜欢夸大这一点，但实际上这些后结构主义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联要远远强于他们与无政府主义传统的关联”^①。

同时，语言却不是一种可以被彻底抛弃、被完全逾越的统治形式，因为它无论如何都是人的“住所”。因此，后无政府主义不再描绘一种没有任何统治的无政府状态，而是把自身理解为一种不断突破现有统治关系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后无政府主义者刘易斯·考尔 (Lewis Call) 批评了巴枯宁：“与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巴枯宁也力求“实现一种乌托邦的设想，即人类的完全解放”^②。后无政府主义的这个立场与后马克思主义者墨菲对“政治”(politics) 与“政治存在”(the political) 的区分十分近似：前者指的是“一组实践、话语和制度，它们试图建立一定的秩序、组织人类的共同生存”，而后者指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中内在的对抗维度，这种对抗可以采取许多形式，并出现在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中”^③。显然，如果说经典的无政府主义还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前面说过，它有“反政治”的倾向，但仍然想要塑造一种新的、自由的社会秩序——那么后无政府主义就成了一种“政治存在”：对抗的维度永远存在，它在社会中的表现也会不断变化。

从这个新的立场出发，后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更加有力的质疑。无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权虽然要求在资本主义之外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却没有把这个新的世界同样当成语言的“牢房”，而是以科学的名义、以“历史必然性”的名义把它视为对“客观实在”的“真正”把握。由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权径直越出了人类仅有的“住所”，而这必定会在现实中造成不良的后果。针对这个显而易见的弊病，后无政府主义者索尔·纽曼 (Saul Newman) 阐述了一种列维纳斯式的开放的政治伦理：

伦理……意味着超出现存秩序……伦理……要求现有的政治身份、政治实践、政治制度和政治话语向他者开放，而这个他者是无法以它们的方式来理解的。伦理不只是对道德规范和理性规范的应用——毋宁说它要不断扰乱这些

① S. Choat, "Postanarchism from a Marxist Perspective," *Anarchist Developments in Cultural Studies*, no. 1, 2010, p. 60.

② R. J. F. Day, *Gramsci is Dead*,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 223.

③ S. Newman, "Post-Anarchism and Radical Politics Today", in *Post-Anarchism* (D. Rousseau and S. Evren, eds.), London: Pluto Press, 2011, p. 8.

规范的统治权，不断扰乱从它们那里获取合法性的身份和制度；但它所凭借的名义超出了它们的掌握。^①

简言之，唯一可以完全确定的不是任何现实的（包括过去的和未来的）对象——这种对象始终是语言的构造——而是向他者的开放本身。这种开放性当然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种姿态和行动。

因此，后无政府主义试图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对立起来。政治革命似乎总是需要把某些现实的、语言性的对象抬高为一种不容置疑的“真实”存在（通过科学、神话等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这种抬高必定意味着一种封闭和保守，意味着对上述开放性的拒绝。于是，政治革命总是“要求少数有魅力的个人作为干部来引导群众”，从而导致“新的秩序、新的国家、新的统治”。相反，社会革命是“一种自发的起义，既没有领导，也没有预先形成的目标”^②。在社会革命中，没有领导的诸多革命者彼此之间直接表现为他者，表现为对现有规范的动摇。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最后恰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③。显然，马克思也认为社会的变化可以不用诉诸政治革命，但他一如既往地加上了一个约束条件，即一切阶级的消亡。

不过，后无政府主义对 20 世纪社会主义的批判并不是毫无问题的。整个无政府主义传统从来没有构造出一种比较详尽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也就是能与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当然，原始积累也可以在一国内部进行）、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和许多更加晚近的探索相抗衡的理论。要充分理解 20 世纪的无产阶级政权（以及其他所有政权），无疑不能脱离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总体形势及其巨大变化。进一步讲，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似乎也从来没有设想过全球性的斗争。在“二战”之前，“无数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的起义”就未能免于“在地方性水平上被遏制和粉碎”^④。就当今的后无政府主义而言，尽管它据说“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在 1960 年代的社会运动中一度占

① S. Newman, “Post-Anarchism and Radical Politics Today”, in *Post-Anarchism* (D. Rousseau and S. Evren, eds.), London: Pluto Press, 2011, p. 7.

② R. J. F. Day, *Gramsci is Dead*,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 113.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55 页。

④ 德波：《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0 页。

据的位置”，却也只是集中于“欧洲和美洲”^①，或者不如说是分散在欧洲和美洲各处。针对这个缺陷，德勒兹批评说：“很明显……革命的机器不能用本地的、按时的斗争来满足自己”^②。

20 世纪的一个重大的社会现象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发展（代价是全球的贫富差距也在持续扩大，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国家机器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不再是单纯的强制权力，而是延伸到了“教会、学校、大学、私人结社、科学话语以及文化的和道德的价值”当中，从而有可能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建立资产阶级的领导权”^③。既然国家企图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统治的工具也就从政府变成了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包括人们自发的意识形态。虽然最早考察这个问题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葛兰西，但是后无政府主义也以自己的方式吸收了这些思想。

其一，对葛兰西和后来的拉克劳、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重新理解国家是为了以更加恰当的方式来夺取领导权；后无政府主义的目的则是在当代的国家机器中更加有效地反对领导权。双方都发现，由于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本质的差别，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也无法简单地合并成一个整体，所以诸多不同的反抗与其说具有共同的内容、提出了共同的要求和目标，不如说采取了共同的政治形式和政治过程。（后）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这些反抗如何能在同样的政治过程中联合为一种集体的力量：“民主的话语”需要“结合不同形式的对屈从的反抗”^④，把这些反抗变成一种等价连环（chain of equivalence）。当然，这种联合是语言性的，它不会永久持续下去，而是临时的、或然的。后无政府主义关注的则是一种平等的政治参与：“每个参与者都可以在政治决断和政治运动的语境中让人们听见自己的声音。”^⑤对任何一种已经确立的领导权或追求领导权的运动来说，也许总有一些人的声音会遭到埋没，例如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联合有可能就经济地位而言仅仅反映了城市中

① S. James, *Review of The Anarchist Turn*, online: Marx and Philosophy Review of Books, 2014.

② N. Thoburn, *Deleuze, Marx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37.

③ S. Newman, “Post-Anarchism and Radical Politics Today,” in *Post-Anarchism* (D. Rousseau and S. Evren, eds.) , London: Pluto Press, 2011, p. 92.

④ E.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ondon: Verso, 2001, p. 154.

⑤ T. May, “Rancière and Anarchism,” in *Jacques Rancière and the Contemporary Scene* (J.-P. Deranty and A. Ross, eds.) , London: Continuum, 2012, p. 124.

产阶级的观点，却排斥了底层劳动者。后无政府主义想要的不是短暂的联合，而是持久的“喧闹”，是让政治“之外”的人有可能进行政治的表达，并由此对一切领导权构成无休止的挑战。此外，这种平等的政治参与也超出了经典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经济平等，因为经济领域缺乏异质性，是一种同质的整体。

其二，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领域既有可能遭到国家机器的渗透、从而成为反抗的对象，也有可能成为人们认同的对象：一个人并不是抽象的公民，而是从属于特殊的教会、学校、私人结社等等，这种从属关系对于他的身份或许是必不可少的。反之，某种较大规模的空间——比如大型企业、国家、超国家的区域、乃至全球——似乎不太容易得到直接的、切身的认同。在现实中，政治共同体往往属于后一种情况，往往不能为其中的公民提供一种在生活中时常与他们相伴随的身份。因此，对后无政府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都颇有影响的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提倡构造一种“规模合乎人情的……自治区”，它们是一种“分散的共同体”，相互之间只有“自由的、邦联式的联合”^①。这样一来，人们就更有可能是认同自己所属的、自己选择的政治共同体了。不难发现，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无政府主义（同经典的无政府主义一样）缺乏全球性的学说，偏爱地方性的政治行动。此外，这也可以解释许多后无政府主义者对尼采的重视：“他们发现，尼采对普遍主义政治伦理的攻击是极其有用的。”^②这种普遍主义显然指的是前面所说的内容和目标上的普遍性，而不是政治参与形式上的普遍性。

总之，资产阶级社会在 20 世纪的重大转变意味着政治的场所从集中的政府权力变成了分散的、异质的社会领域，而无政府主义所反对的国家虽然想要在这些领域中建立领导权，却未必能成功，所以反抗和认同都有可能在这里发生。关于这种模棱两可，福柯曾经说过：

我并不是说一切形式的权力都是不可接受的，而是说没有一种权力必然是可接受的或不可接受的。这就是无政府主义。但由于无政府主义在这个年代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我将称之为反考古学 [anarcheology]，这种方法不认为任

① D. Harvey,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 New York, N. 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99–200.

② B. Franks, “Postanarchism and Meta-Ethics,” *Anarchist Studies*, vol. 16, no. 2, 2008, p. 140.

何权力必然是可接受的。^①

由此可见，尽管错综复杂的社会领域在政治上的模棱两可是后无政府主义所面对的问题，但也许无政府主义从根本上就是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只不过这一点到了当代才充分显露出来。

综上所述，后无政府主义眼中的政治具有“无中生有”的性质——政治行动的发生既不受“客观真理”的规定（20世纪社会主义倾向于否认这一点），也不服从任何日常的、具体的意识形态（这是20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统治手段）。换句话说，政治“没有原始的基础”；朗西埃更加明确地说：“政治在严格意义上是无政府的”^②。让-吕克·南希也提出，如果说政治组织总要以某种立法为前提，那么我们同样必须“‘公正地对待’……一种可以叫作‘初始的无政府状态’的东西，它是法律的起源本身，是‘没有法律的合法性’[de droit sans droit]：即毫无理由的实存本身”^③。尽管现实社会决不可能单纯由这种无政府状态所构成——这是后无政府主义不同于经典无政府主义的地方——但对它的忽视或拒绝仍然是错误的、有害的。

按照这种看法，一个自由的社会应该可以比较有效地促使人们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必要性。在朗西埃看来，真正的民主就是如此，因为“民主首先意味着无政府的‘政府’，它的基础无非是一切统治头衔的缺席”^④；民主是“对统治的终极非法性的确认”，因而人民的力量“永远无法被制度化”^⑤，也就是无法获得一种稳固的根据。他还结合柏拉图的《法律篇》更加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法律篇》列出了统治的7种头衔、资格或依据：前4种是柏拉图所认为的具体的自然的差别，即“父母对儿童、老年人对年轻人、主人对奴隶和贵族对仆役的权力”；第5种是一种抽象的自然的差别，即“强者对弱者”的权力，它实际上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在了前4种统治头衔当中；柏拉图赞同的是第6种，即“有知识的人对没有知识的人的统治”（前文已经分析过这种统治

① R. J. F. Day, *Gramsci is Dead*,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 137.

② D. Bensaïd, “Permanent Scandal,” in *Democracy in What State?*, New York, N. 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6.

③ S. Critchley, *Ethics-Politics-Subjectivity*, London: Verso, 1999, p. 69.

④ T. May,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acques Ranciè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97.

⑤ T. May, “Rancière and Anarchism,” in *Jacques Rancière and the Contemporary Scene* (J.-P. Deranty and A. Ross, eds.), London: Continuum, 2012, p. 123.

形式)；最后，柏拉图终于提到了民主，并讽刺性地把它称为“神的选择”^①，因为民主的领导人往往是由抽签决定的，也就是由运气决定的（在雅典，只有挑选将领是不抽签的，但是将领必须经常更换）。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似乎是民主的缺点，是一种荒诞不经的做法；但对朗西埃和后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托德·梅 (Todd May)，他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解释了朗西埃的思想)来说，这意味着民主是唯一一种丢弃了统治头衔的政治形式，而其他政治形式、包括许多流行的“民主”都无法做到、甚至无法理解政治的“无中生有”。

对反抗意识的重新理解

前面已经提到，经典的无政府主义有一种目的论的倾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众会自发地肯定科学，否定欺骗和压迫；或者更一般地讲，民众会自发地具备反抗的立场，不论科学是否被看作反抗统治的主要手段或唯一手段。后来的历史表明，这种富有启蒙主义特色的想法是不能成立的。于是，人们如何才能具有反抗意识就成了后无政府主义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这显然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困境是类似的：原先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不认为革命意识是自发的，而是认为它出自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但在工人阶级、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逐渐失去了革命的主动性之后，如何培养革命意识也成了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这一节将考察后无政府主义如何走出了目的论，又如何试图在当前的局面下推动民众的反抗意识。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后无政府主义在这里也经常援引精神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想要借此来“解释无意识的力比多机制，这些机制印刻在工人阶级的存在本身或社会处境中，并阻碍了阶级意识的产生”。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寻找可以代替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第三世界的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被排斥者”^②。后无政府主义的意图则略有不同：

一切形式的激进政治——尤其是无政府主义，它宣称权力和权威是不自然的、不人道的——必须要对付一种可能性，即主体对权力的精神依附，也就是从弗洛伊德到赖希的精神分析所揭示的对权威和自我统治的欲望。^③

可见，后无政府主义并不认为对权力的屈服和向往是工人阶级退化的一

① J. Rancière, *Dissensus*, London: Continuum, 2010, p. 31.

② S. Žižek, “How to Begin from the Beginning,” *New Left Review*, no. 57, 2009, p. 52.

③ S. Newman, “Post-Anarchism and Radical Politics Today,” in *Post-Anarchism* (D. Rouselle and S. Evren, eds.), London: Pluto Press, 2011, p. 6.

种表现，而是把它看作一般主体的一种可能性。因此，寻找一个特殊的革命阶级是徒劳的。这意味着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然属于人道主义传统：人的本性是可以被确定的（如前所述，葛德文也持同样的观点），因而最能体现这种本性的群体尽管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却享有普遍的地位。托德·梅则指出，“后结构主义政治思想”的关键就在于“激进的政治理论如果想要做到任何事情，就必须抛弃一切形式的人道主义”。进一步讲，倘若为“特殊的革命角色”赋予特权，就很有可能“支持权威主义的政党、主张无产阶级专政”^①。无政府主义向来都不能接受这些实践，后无政府主义则最终在理论上确认了对人道主义的拒绝：人的“本性”就自由与统治而言是极其暧昧的，既不存在某种原本的状态，也不通向任何预定的目的。

这种学说会产生两个后果。第一，既然精神上的“比较有攻击性、比较权威主义的驱动”始终有可能表现出来，那么单纯“转变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就是不够的；反抗“必须‘一路到底’，直至精神深处”^②。关于这一点，桑德拉·杰普森（Sandra Jeppesen）有一段简练的总结：

无政府主义要求的是舍弃……我们都已经把一些统治的模式内化了，在相互之间的日常交往中不经意地加以使用，因为我们成长在一个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性别歧视的、异性恋主义的、残障歧视的社会，它教会了我们如何互相行使权力，以便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舍弃是一种终身的过程。^③

理查德·戴（Richard J. F. Day）则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国家所需要的主体不仅会欲求对他人的压抑，而且会欲求对自己的压抑，这些主体愿意为了国家对安全的许诺而出卖自己的自律”^④。在这里，精神上的退化与对安全的需要紧密相关，甚至不如说与对死亡的恐惧紧密相关——这些问题似乎不仅无法单纯通过社会解放来消除，而且它们在“微观”层面的解决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反复的、“终身的”。

然而，这种无休止的改造过程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的核心要点与其说是

① S. Choat, “Postanarchism from a Marxist Perspective,” *Anarchist Developments in Cultural Studies*, no. 1, 2010, p. 57.

② S. Newman, “Post-Anarchism and Radical Politics Today,” in *Post-Anarchism* (D. Roussele and S. Evren, eds.), London: Pluto Press, 2011, p. 61.

③ S. Jeppesen, “Things to Do with Post-Structuralism in a Life of Anarchy,” in *Post-Anarchism* (D. Roussele and S. Evren, eds.), London: Pluto Press, 2011, p. 157.

④ R. J. F. Day, *Gramsci is Dead*,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 141.

对平等或公正的热爱，不如说是对任何一种权威、任何一种命令、任何一种约束的恐惧”^①，因为平等和公正归根到底是无法实现的，权威、压迫和欺骗却始终在人的精神中占有一席之地，尽管扮演了不好的角色。用黑格尔的话说，后无政府主义不承认对否定者的否定，只相信无穷无尽的否定——事实上，这一点（来自阿尔都塞）对于各种后结构主义都是成立的。但是精神分析恰好批判了这种看法：不断地否定一个对象实际上等同于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肯定了这个对象，所以倘若单纯认为它是不好的、是需要受到挑战的，就未能彻底地、真诚地理解或表达自己的立场。从彻底的角度来看，我们要么给这样的对象找出某种合理的根据——也就是说明它的存在形式和运作机制，而不是把它视为仿佛“自然的”、来历不明的邪恶——要么把它作为不合理的或不再合理的东西完全消灭掉，从而不用继续对它进行否定。不难发现，这与前文所说的辩证的历史观是一致的，而且是马克思所持有的观点。

第二，既然后无政府主义取消了可以代表普遍性的特殊群体，那么反抗意识就有可能在任何群体、任何个人身上出现。这与前面提到的平等的政治参与是一致的，是一种形式上的普遍性，而不是内容或目标的等同，不是一种“普遍主义政治伦理”。它的表现形式又可以归结为两种。

一种形式是比较戏剧性的：为了显示出反抗意识的普遍存在，恰好有必要凸显出某些从别的立场来看最不可能具有反抗意识的群体或个人是如何进行反抗的。这种想法当然可以追溯到巴枯宁对流氓无产阶级的重视——我在这里仍然使用马克思的术语。但很明显，假如这种纯粹主义的、未经污染的力量真的存在，反抗意识就根本不会成为问题了。在我看来，后无政府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比较无力的。一方面，一些学者提出了一种历史的辩护，认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主要推动者并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工人阶级——当时的俄国和中国也没有发达的、有组织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阶级——而是马克思所轻视的流氓无产阶级，特别是农民。事实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将法国的农民与流氓无产阶级等同起来，指责他们造成了路易·波拿巴这个无能之辈的掌权和称帝（以及最后在普鲁士面前的惨败）。然而，法国的农民之所以被视为流氓无产阶级，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是农民，而是因为他们十分可笑地对拿破仑的血统抱有迷信。换句话说，马克思在这里对流

^① A. Gray,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Colchester: The Ballantyne Press, 1946, p. 380.

氓无产阶级的界定是具体的，未必适用于其他情境。就俄国和中国的农民而言，前面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也有可能成立：他们在各自的局面下都是代表了普遍性的特殊性，是可以代替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本文无法详细讨论这一点，但这至少可以表明后无政府主义为巴枯宁所做的历史的辩护是过于简单的。

另一方面，尼古拉斯·索伯恩(Nicholas Thoburn)从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思想出发，认为“马克思用流氓无产阶级来描述的构成方式……不是以差别和生成为导向的，而是以同一性为导向的”，因而在政治上“撇开了广泛的社会关系”。但“对无产阶级构成方式的实践的阐发”必须联系到“它的政治技艺、风格、文化、知识”，马克思却很少涉足这些复杂的、缺乏同一性的方面^①。然而如前所述，这种异质的丰富性更多地表现在20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当中，用流氓无产阶级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社会形态似乎是不妥当的。总之，用这种戏剧性的方式来表现反抗意识的普遍性或许仍然有很多疑点。

另一种表现形式恰好立足于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我在前面已经分析了它在政治上的模棱两可，现在将从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来概述反抗意识如何可能在任何需要发动反抗的社会领域中迅速产生。简言之，关键在于“欲望”。布克金批评马克思与恩格斯说：

法国的象征主义者们关于人形成了一种具体的形象，它是由玩耍、性和感官的细节来界定的……而在英国流亡的两位伟人却找到了人的一种抽象的形象，它是由阶级、商品和所有权的共相来界定的。^②

只要民众有能力发现、培养并坚持自己的欲望，就很有可能在一个社会领域出现压迫或欺骗的时候自觉地发起反抗。同时，以欲望为基础的政治也特别适合在这种情境中运作，因为前面说过，分散的、规模较小的社会领域往往更加直接地与人们的身份相关，因而可以更加直接地使人们感受到统治对自己的欲望的压抑。事实上，这种政治形式在今天的地位是相当突出的。

不过，这种高度本地化的欲望恰好也是精神分析的批判对象：当欲望遭到严重的压抑时，人们既有可能把矛头对准某种统治形式——这是后无政府主义想要的结果——也有可能相信是其他地方的、外来的民众“偷走”了自己的欲

① N. Thoburn, *Deleuze, Marx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67.

② B. J. Macdonald, *Performing Marx*, Albany, N. Y.: S. U. N. Y. Press, 2006, p. 31.

望，仿佛只要（在自己的领地上）消除了外来的民众、断绝了与他们的来往、或者对他们进行某种镇压和管制，自己的欲望就可以得到完全的满足。在后一种情况下，布克金等人所设想的“规模合乎人情的”社会组织很容易演变成排外的、沙文主义的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情况在今天表现为世界范围内愈发兴盛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等。这当然不是说后无政府主义没有能力回应这些问题——毕竟它还不具有“经典”的地位。

作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批判理论视域中的协商民主



[摘要] 批判理论家在协商民主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由协商民主的内在反思性决定的。汉娜·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论为当代协商民主提供了规范基础，此后的协商民主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第一代的代表是尤尔根·哈贝马斯，第二代的代表是塞拉·本哈比和詹姆斯·博曼，第三代的代表是瓦尔特·巴伯、罗伯特·巴莱特和黛拉·波尔塔。他们既是批判理论家，又是协商民主理论家，他们的协商民主研究以反思和重构为主，带有浓重的批判理论色彩。这种反思不仅是对协商民主之外的民主模式的反思，而且也是对现有协商民主模式的反思。具体而言，借用哈贝马斯对事实性与规范性的评论，第一代协商民主理论偏重规范构建，重视协商民主的规范性；第二代则持开放态度，兼顾规范性与事实性，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同时回应来自不同领域的挑战；第三代以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规范研究为基础，更偏重事实性，提出了国际环境保护和由全球正义运动推动的公共协商的新模式。

[关键词] 协商民主 公共性 共识 规范 事实

协商民主是 20 世纪以来出现的一种新的民主形态，它是在反思代议制民主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对代议制民主所遭遇的新时代挑战的应答。对协商民主理论进行跟踪研究和反思有其必要性，它不仅是当代批判理论的核心内容之

一，也是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话题。大体上说，汉娜·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论可视为当代协商民主理论的源头，自此以后，这一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本文将以此为线索对协商民主理论的重要发展做系统的介绍。

一、当代协商民主理论的规范奠基

阿伦特是当今世界公众的一位学识渊博、见解独到的政治哲学家，尽管她自己并不认同“政治哲学家”这一称谓，但是，她的思想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哲学无法绕过的里程碑。阿伦特的理论体系有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对极权主义进行反思和对抗。围绕这个主题，她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观点，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政治理论，尤其是当代民主理论的走向。在反思极权主义的过程中，阿伦特发现了“公共空间”（public space）的重要性，因为公共空间培育和保存了人的行动能力和思考能力，人们因为葆有这样的能力和意愿，才能以类似于希腊城邦式的协商方式处理政务。这些协商政治的意义不仅在于结果，更在于协商的过程，民主协商本身就代表了一种至高的政治自由。虽然公共空间是开放的，我们无法确定协商民主会把政治导向何种方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方向绝对不会是僵死的体制，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体制。在这一意义上，公共空间是政治活力的源泉。阿伦特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协商民主”这一术语，但她的政治构思与协商民主是一致的。正是基于对协商民主的信念，阿伦特总是不遗余力地参与各种公民运动，“从1956年短命的匈牙利革命中出现的、草根性质的公民‘委员会’，到美国反越战示威游行，她都是这些突然爆发的公民活动的热情观察者。”^①

在某种意义上，阿伦特的思想可视为协商民主的理论源头，也是这一理论的规范奠基者。协商民主的核心是公共领域及其参与者的话语。阿伦特提倡一种参与式民主制度，此处的“参与”不是直接参与，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协商系统——“委员会制”（council system）。它以公共空间为基点，进入公共空间是一个人获得政治自由的前提，她把自由定义为“开端启新”（begin）的能力，公共空间就是这种能力的守护者。阿伦特认为，公民参与的方式主要有行动和

① [美]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导言”第2页。

言语两种，而行动归根到底也是一种言语形式：“所谓行动就是在恰当的时刻找到恰当的言辞，……只有单纯的暴力才是无言的。”^① 言谈是人在世间存在的根本方式，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的本体论基础。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群体来说，失去言说的机会和能力就意味着丧失了一种生活方式，正是通过言谈，人的行为、认识和经验才获得意义。

阿伦特区分了人的三种基本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它们分别对应三种普遍的、基本的人类境况。劳动的境况来自人的“必然性”（necessity），人需要通过劳动满足自身最基本的生物所需，因而劳动领域是必然的领域。工作的境况来自人的“世界性”（worldliness），人的生活需要栖身地和生活场所，比如农场、定居点、村落、城镇或国家等。行动的境况来自于人的“复数性”（plurality），不同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之间必然会产生联系，因此需要寻找一种能够共存的方式，一起交流观点、磨合差异、创建政治机制。在阿伦特看来，劳动是可以独立进行的，但行动则完全依赖他人的持续在场，“正是在言说和行动的领域，即从活动上讲的政治场域内，一个人的人格特质才公开展现出来；‘一个人是谁’（而非他可能拥有的个人品质或才能）才变得清晰可见。”^② 在阿伦特看来，劳动、工作和行动分属不同的领域，前两者是社会领域的基本活动，只有行动才是公共空间的基本活动，它们应该互不干扰。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劳动和工作的空间与重要性日益扩大，而言谈和行动的空间却在缩小。技术进步使劳动者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却没有使他们摆脱劳动的惯性。他们自视为劳动者或雇员，从工资中赚取所谓的“生活必需品”，即使这些物品根本不是生活所必需的。这种心态使他们没有动力超越大众社会，只能从事类似于制造活动那样的重复计算。无论在劳动还是工作中，人们都不需要行使行动的自由能力，也无法判断和理解自己及他人的行动。正是劳动、工作和行动三者之间关系的改变，才使人们已远离了行动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希腊世界。

在希腊世界中，由于劳动和工作受到必然性的支配，因而是不被重视的，相反，行动由于其创造性和公共性倍受推崇。只有自由人可以行动，劳动者或

① [美] 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载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60 页。

② [美] 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07 页。

工匠由于自身的工作性质本质上是不自由的，与奴隶无异。关于自由人的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娱乐、行动和思考三种形式，其中思考是最高的、最纯粹的活动。阿伦特不赞同亚氏的观点，原因在于思考是私密的活动，不能被所有人共享，因此不具有政治意义。但是，当希腊和罗马城市国家灭亡后，行动落入了必然性的领域，思考成了唯一真正的自由活动。即使在政治层面，行动也经常排挤。阿伦特认为，看待政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政治等同于统治”^①，另一种是把政治当作通过交谈和行动建构权力的方式。在前者中，哲学与政治、真理与治国才能、行动能力与思考能力是相互分离的，公共空间中的一切人类活动，包括讨论、说服、决策、执行等等，不过是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策略。即使某些革命者也没有摆脱这种错误的政治观念的束缚，他们不是把行动从必然性的约束中释放出来，而是要建立另一种统治。革命的目标往往不是通过言谈和行动建构共同的世界，而是通过新的机制平等地分配劳动成果。他们的关注点仍然处于必然性领域的劳动和工作，而不是处在自由领域的行动。

行动的退隐部分地解释了当代政治的另一种倾向，即审美救赎主义。有些知识分子由于对行动失望或持有偏见，他们自愿地退缩到艺术创作的自我隔绝状态。阿伦特在学生时代就发现，有些现代思想家对现实持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自恋”态度，虽然这可以使“灵魂的权力和自主得到保护，但保护的代价是真理。必须承认一点，缺少了与其他人类共享的现实，真理将失去所有的意义。”^②海德格尔是这种审美精英主义的典型。纳粹战败后，海德格尔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他瞧不起公共空间，在他眼中，“公众的光辉模糊了一切”。阿伦特谴责这种逃避行为是对世界的不负责任。与海德格尔截然相反的是雅斯贝尔斯，早在1933年他就表明了对纳粹的反对态度，并且带着一股“蛮劲”投入到公共生活中，始终理性地评论公共事件，因此获得了阿伦特的高度尊敬。

公共空间是光明的空间，而罪恶总是惧怕光明的。“历史上的许多黑暗时代都遮蔽了公共空间，这个世界变得晦暗不明，人们不再过问政治，不再表现出对切身利益和个人自由的应有的关心。”^③那些在公共空间之外，不能在公共

① Elisabeth Young-Bruehl, *Why Arendt Matte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83.

② Hannah Arendt, *Rahel Varnhagen: The Life of a Jewes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8.

③ Hannah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 Mariner Books, 1970, p. 4.

空间中表达自己意见的人是不会理解什么是切身利益和个人自由的，处于亲密关系或独居的人也不会对他人有真正的关切。没有公共生活的“孤立”状态造就了极权主义的大众心理，退出公共空间的现代社会的大众在资本主义扩展和积累原则面前感到自己是“多余的”和“无力的”，他们对公共事务提不起兴趣，渐渐从共同生活的世界中“孤立”出来，“不但丧失了现实感，也丧失了合理健全地判断经验的能力”，因此“极易被任何势力所鼓动”^①。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空间是抵抗极权主义的堡垒。反过来，公共空间也是最容易受极权主义威胁和侵害的场所，极权主义是一种力图把所有现实基础破坏殆尽的力量，它极力抹杀人们之间的共通感或“常识”，使人们在现实中失去方向，易于操纵。公共空间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场所，多元性在这里得到滋长，而“极权主义的本质乃是抹平人间世界的所有界线，以及把人多元压缩成单调如一的集体同一性”^②。

为了防止极权主义，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公共空间中的行动者。行动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它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不管人们的差异有多大，行动并不要求人具备特殊才能，除了需要与生俱来的勇气外。行动是内在的、不可预知的，它反映了一个人的个性和内在本质。除此之外，行动还塑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方面，行动不同于“行为”(behavior)，后者是既定的、重复性的、习惯性的，而行动则是自发的、可塑的、灵活的。行为可以使人成为“某类人”，无法使人变成“某个人”。人们“可以用正确或错误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一个行为；但是不能用动机或目的去评判行动，评判行动的唯一标准是‘伟大’(greatness)。”^③行动也不同于制造，制造和暴力是同属性的。人们通常把暴力当作政治的必要手段，把行动跟制造相混淆，似乎政治就是一种工艺。事实上，暴力和政治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政治的主题是权力，行动者凝聚在一起就会产生权力。跟大多数政治理论家不同，阿伦特不认为权力依赖暴力，相反，那些诉诸暴力的人恰恰是失去权力(失去行动者支持)的人，他们“不愿或不能找到一种非暴力的手段去面对敌人”^④。也就是说，权力与暴力

① [美]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时报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xiii页。

② [美]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时报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x页。

③ Elisabeth Young-Bruehl, *Why Arendt Matte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87.

④ Elisabeth Young-Bruehl, *Why Arendt Matte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91.

是相对立的，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面对世界的方式，权力需要持续的讨论和交流，暴力则压制和消灭对手；权力会随着意见的变更而不断更新，因此也更加持久，暴力则十分脆弱，为了自我维持只能诉诸更多的暴力。

也许有人会对行动概念提出质疑，似乎不可控的和无法预料的行动是危险的，阿伦特承认这一点。行动不像制造那样，它往往是在发生一段时间之后，人们才能命名并理解它。这一点与悲剧相似。在所有艺术表现中，悲剧最能揭示行动的特殊性质。在悲剧中，剧中人物的行动被串联在一起，他们的动机、行动原则和结果只是在最后才作为一个整体得到理解。行动的不可预知性的确会给人带来焦虑，但行动是一个人内在本质的体现，不能用压制或消灭行动的方法来缓解焦虑。针对这个困境，阿伦特引入了原谅和承诺两个范畴，作为一种与行动概念相符合的修复和重启公共空间的方式。

在阿伦特看来，“原谅是人类撤销（扭转）已经做过的行为和已经说出的言语的能力。或者说，原谅是‘对行动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破坏的必要纠正’。”^①原谅不是针对个体的行为，任何行为如果一旦被判定是错误的，不管如何都是不可原谅的。原谅的对象是人，被谅解的不是错误的行为，而是宽恕行为的实施者，即作为行动者的“那个人”。行为的责任，不论是道德责任还是法律责任，严格意义上其承受者都是可分离的个体，而“在阿伦特看来，作为一种行动的原谅是一种关系，一种关于人类复数性境况的表达。”^②原谅是相互的，它可以使人们从未知的行为中解脱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成为自由的行动者，只有持续的改变想法和重新开始的意愿，人们才能被委以开端启新的强大力量”^③。阿伦特还进一步提出，原谅在政治语境下的表达是“和解”（reconciliation），而和解对政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通过修复已经造成的破坏和扫清公共交往的障碍，使人从已逝的过去中解放出来。

如果说原谅旨在过去，那么承诺旨在未来，它为行动的不可预测性提供了某种保证。政治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承诺与原谅一样都依赖公共空间。承诺的重要性在于政治本质上是创制而不是制作，没有现成的知识，也不存在现成的规则。“政治需要法律或宪法为人们提供行动的空间，但是，当开始

① Elisabeth Young-Bruehl, *Why Arendt Matte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96.

② Elisabeth Young-Bruehl, *Why Arendt Matte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97.

③ Elisabeth Young-Bruehl, *Why Arendt Matte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00.

行动时，就需要相互承诺的力量把他们联结起来。”^① 相互承诺不同于“同意”（consent），以“同意”为基础的政治体制是政党制和选举制，而以相互承诺为基础的政治体制是参与式的或协商性的，人们愿意为了“公共福祉”（public happiness）承诺“共同行动”（acting in concert）和平等交流。阿伦特推崇的政府形式是“委员会制”。按照她的构想，委员会制是市镇一级的政府组织形式，公民可以随时随地地表达诉求，虽然它不排斥选举制或代议制，但它首先必须是一个真正共和的联邦结构，而不是一个代议制的等级体制。委员会制在大多数欧洲革命中都出现过，但是在革命结束后它们却被取消了，原因在于对任何追求自上而下的统治的政权来说它总是一种妨碍。阿伦特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她意识到，在行动的权利没有得到制度保障之前，真正的政治自由是不存在的，而若要行动成为政治自由的常态来源，那么就必需制度化的力量，尤其是法律的保证。一旦行动进入规范体制，整个公共空间会被引导成为新的权力建构的基础。

阿伦特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协商民主概念，但是她对公共空间、言语、行动以及委员会制等一些概念的分析，实际上已经触及到协商民主理论所涉及的规范和制度问题。只是她的过于强烈的共和主义信念使她更多把协商民主的典范置于古希腊时代，没有阐明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协商民主政治如何实现。哈贝马斯的双轨制协商民主在一定意义上既是阿伦特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它的批判。

二、哈贝马斯的双轨制协商民主

哈贝马斯是第一代协商民主理论家的主要代表，他致力于协商民主理论的规范构建，为协商民主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继承了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行动和判断的观点，发展出了一套更加成熟的理论体系。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有两大理论支柱——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用一句话来概括，哈贝马斯所谓的协商民主就是在人们公共领域中进行理性地交往。如果说阿伦特勾勒了公共领域理论的框架，那么填充它的人就是哈贝马斯。他把阿伦特的“公共空间”

^① Elisabeth Young-Bruehl, *Why Arendt Matte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22.

术语变成了“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①，并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以下简称《转型》)中论述了由代表型公共领域到公共权力领域(即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转型。

该书出版时，德国的民主制度还很脆弱，哈贝马斯注意到民主重建中的一些困境，而这是他的同代人(尤其是相对保守的那些人)所忽略的。他认为，德国民主的灾难应该归咎于以国家为主导的国家与社会^②的融合，这种融合摧毁了基于私人自由或非强制讨论之上的公共领域。当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已经走向了一种全新的威权主义，混合了公私权力的“新封建”制度操控了投票和选举，即以多数为基础的投票制度使组织化的利益群体结盟，以维护它们在政治和社会中的统治地位。由于被操纵的公共领域取代了18、19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商业媒体和政党组织成了公共领域的主角，“公共性不仅在公众面前呈现了统治的合法性，还操纵了公众。批判的公共性遭到操纵的公共性的排挤。”^③事实上，阿伦特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这种趋势，并将其概括为“社

① 除了对“公共空间”的借鉴，哈贝马斯关于劳动和交往的区分也源于阿伦特对马克思的批判，她在《人类的境况》中区分了工作、劳动和行动。此外，阿伦特发现了人类行动的语言结构，这一点也影响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参见 Seyla Benhabib, *The Reluctant Modernism of Hannah Arendt*.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199.

② 关于“社会”的用法，哈贝马斯与阿伦特略有不同，阿伦特所谓的“社会”主要指以劳动和工作为主的市民社会，“在现代自然法观念和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的社会学说中，市民社会总的说来一直是私人领域，因而与公共权力或政府是相对立的。现代早期的市民社会依照职业来划分社会地位，根据其自我理解，商品流通和社会劳动领域以及不再具有生产功能的庄园和家庭，均可以不加区分地划归‘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社会领域与公共领域应该是彼此独立、严格区分的。虽然哈贝马斯也用“社会”指代市民社会，但它不同于狭义上的市民社会，“狭义上的市民社会，亦即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家庭以及其中的私生活”都被划归到私人领域中了。现代市民社会作为私人领域从公权力领域解放出来后，又从私人领域中独立出来，“它不再包括控制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经济领域”，“无论如何，‘市民社会’的核心机制是由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这样的组织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它有时直接产生代表交往权力的公共领域，与代表行政权力的国家相对立。参见[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12、30、35页。

③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页。

会领域对公共领域的侵犯”。为了保障民众的政治自由、公共领域的效能，哈贝马斯主张以民主的方式阻断国家对公共领域的干预，只有在“国家消解成为社会自我组织的媒介”时，“公共领域才获得了政治功能”^①。

关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学界有很多介绍和评论，在此无需过多地进行分析。这里只需指出两点。第一，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讨论明显受到阿伦特的影响，阿伦特把哈贝马斯带到一个新的理论领域，他与阿伦特的区别只在于他把公共领域的典范形态放在 17、18 世纪早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而阿伦特把它放在希腊城邦时代。第二，公共领域理论是哈贝马斯一生思想发展的起点，正是出于对公共领域规范理想重建的需要，哈贝马斯才使批判理论传统获得突破，建立起自己的交往理论与话语民主理论。与此同时，哈贝马斯对现代社会的研究表明，阿伦特所说的劳动和工作领域就是与生活世界相并列的系统领域，它是不会轻易地被公共领域的民主意志驯服的，因而协商民主既需要考虑自己的规范要求，也要面对无法回避的现实条件。基于这样的考虑，哈贝马斯对自己早期的公共领域理论做了部分的修正。

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的核心文本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在该著作中，作者对其早期的公共领域理论进行了以下修正：第一，他承认《转型》忽略了“庶民反公共领域”（subaltern counterpublics）。事实上，在公共领域产生之初就存在两种并行的类型：一种是传统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它由统治阶级、贵族、教会显贵等成员组成；另一种是遭到排挤的下层阶级成员的庶民反公共领域；当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取代代表型公共领域之后，庶民反公共领域依然存在，它由那些被资产阶级排斥的民众构成。第二，借鉴南希·弗雷泽的“强公共领域”（strong public）与“弱公共领域”（weak public）的区分^②，哈贝马斯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公共领域概念。所谓弱公共领域是指那些与国家相对分离的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在这种公共领域中，话语实践往往以多元的、分散的“意见”形式存在，与决策没有直接的关系。所谓强公共领域是指像议会这

① [德]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序言”第 11 页。

② 弗雷泽在《重新思考公共领域》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强公共领域”与“弱公共领域”的概念，并论述了两者的关系。这是她的重要理论创见之一。参见 Nancy Fraser,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in *Social Text*, 1990 (25/26), pp. 74-77.

样的既有意见形成又有决策功能的公共领域。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双轨制协商民主理论，这一理论既立足于弱公共领域中舆论的形成，也立足于强公共领域（即政治系统）中的意志的形成。他认为，当代社会只有这样的双轨制才能既满足公共辩论的需要，又满足公共决策的需要。

哈贝马斯赞同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三分法。在古希腊，“如果说生的欲望和生活必需品的获得发生在私人领域范围内，那么，公共领域则为个性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如果说前者还使人有些羞涩，那么后者则让人引以为豪。公民之间平等交往，但每个人都力图突出自己。”^①但是，不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公共领域与社会领域之间的界限都容易被打破，在谈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领域的特征时，哈贝马斯说：“一个再政治化的社会领域，不论从社会学的角度，还是从法学的角度出发，它都无法归于公共领域或者私人领域的范畴之下。在这个交叉区域，国家化的社会领域和社会化的国家领域相互渗透，无需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私人作为中介。公众的这一使命逐渐地为其他机制所取代：一方面是社团组织，其中，有组织的私人利益寻求直接的政治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是政党，政党曾是公共领域的工具，如今却建立在公共领域之上，与公共权力机关紧密相连。具有政治意义的权力实施和权力均衡过程，直接在私人管理、社团组织、政党和公共管理机关之间展开。公众本身只是偶尔被纳入这一权力的循环运动之中，而且目的只是为了附和。”^②

公共领域与公权力领域之间、交往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张力。以话语为媒介的交往理性能产生一种交往权力，但是，“交往权力不能取缔公共官僚体系的独特性，而是‘以围攻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③从理论上说，交往权力与行政权力是相互独立的两个领域，然而，它们的实际关系却是错综复杂的。首先，所有政治权力归根到底都来自交往权力。行政权力即使非直接地来自于交往权力，也必须借助公民社会中的话语过程使自身合法

① [德]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② [德]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

③ [德]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28页。

化。在民主理论中，这是一个权力转化过程：市民社会中产生的交往权力必须首先转化成具有约束力的法律，然后再转化成行政权力。在这个意义上，交往权力拥有对行政权力的优先性。但从交往权力的特征来说，它面对行政权力时又往往是软弱的。因为交往权力来自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是“匿名的”、“无主体的”，它只是以多元的、分散的舆论形式存在。交往权力的困境在于，如果它表现为实体化的人民的集体意志，它就不是通过公民社会的广泛的交往形成的；如果它是由分散多元的交往形成的，它又难以抵御行政权力的威力。

其次，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交往权力只有通过行政主体并依赖策略和工具理性的行动形式的决策形式才能被有效运用。行政权力存在于行政人员采取的那些对实现特定结果有工具价值的行动。然而，这些行动与交往权力的逻辑相冲突，因为后者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承认关系之上的。现代民主需要行政权力形式，但这种权力在结构上与作为民主协商的前提的交往权力不一致。对于哈贝马斯而言，这是有效性与事实性之间最明显的张力之一。他试图借助处于交往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中间地带的法律来调和这一矛盾，强调法律在交往权力向行政权力的转换中起关键作用。这也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一个重要观念。交往权力与行政权力都应该围绕组成公民社会的协商网络的多样性进行有效合作。为此，哈贝马斯提出交往权力连结了多种独特的协商形式，如道德的、伦理的、实用主义的形式：政治学关心道德公平问题，它采用严格的新康德主义普遍化标准；文化价值和认同问题涉及“真实的自我理解”，它在合法性上不受道德话语的严苛标准的束缚；实用主义则试图达到给予所有相关利益平等地位的实际妥协。政治协商力图达到一种对规范问题和谈判、妥协过程的非强制的、理性的共同理解。不管怎样，利益相关者应该具有平等的、有效的机会去追求他们的利益。其中一项明确的假设是应该在充足信息和理性的基础上形成民意。

在发现法律的潜在协调功能之后，哈贝马斯把立法权力引入交往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角逐场。在他看来，立法权力是政治系统中解决问题的最后一环，立法应该拥有干预行政管理的具体权限。例如，当行政官员在抉择两种不兼容的集体目标，需要打破行政行为传统观念的边界时，就需要由立法权力来裁决。但是为了防止立法权力过于强大，它最终要服从协商民主的程序，它必须以交往权力为基础才能发布规则，而后由现代国家的强制机关赋予强制力。这种安排既保护了交往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约束力，又保持了行政权力的自主性。

然而，这里的交往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模糊的：一方面议会被认为是立法的主体，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又接受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议会权威只不过是陈腐的自由主义神话；有时议会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延伸，有时又被认为是提高议会的实用效能的必要之举；有时哈贝马斯强调公民社会的协商品质，有时又承认在“一般”民主政治中，公民社会对国家行为的实际影响很小。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并没有说明强公共领域与弱公共领域之间以及它们和行政权力之间具体是如何互动的。

总之，哈贝马斯虽然想通过话语理论建立一种协商民主理论，以取替西方主流的代议制民主理论。但是，他并没有解决协商民主制在规范上的合法性与制度上的现实性之间的矛盾。

三、本哈比对协商民主的规范反思

塞拉·本哈比 (Seyla Benhabib) 的协商民主理论与哈贝马斯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在她看来，“民主是一种在社会的主要制度中权力的集体和公共运用的模式，它的基本原则是影响集体福祉的决策可以被视为在道德和政治上平等的个体之间的自由的、理性的协商的结果”^①。从这个界定可以看出，协商在本哈比的民主理论中是一个关键因素。然而，这不意味着经济福利、制度有效性和文化稳定在民主的规范理解中不重要。民主必须满足经济福利和集体认同的要求，但是它们并不是组织集体生活的民主的规范基础，因为在专制政体下也可以达到某种经济福利，或者比民主政体更成功地确保集体认同意识。民主来自于自由，而且最终要保障自由。民主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它平等地代表了所有人的利益，它只有在自由的、平等的公民进行公共协商并做出决策时才能实现。在全球化背景下，既有体制中的公民往往是不平等的、不自由的，他们因文化、性别、种族、民族等差异而遭到各种歧视，这使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尤其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给它带来了巨大压力。多元文化主义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西方世界引起共鸣，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第一，颠倒的全球化进程，即非西方国家的移民社群在西方国家定居；第二，1989 年共产主

^① Seyla Benhabib, *The Claims of Culture: Equal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Global Er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09.

义在东中欧的失败和新的地缘政治的出现；第三，欧洲联盟和新权利体制的出现；第四，资本主义民主中再分配政治的始料未及的后果；第五，在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中变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文化整合模式。

本哈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应对挑战的路径只有哈贝马斯的双轨制协商民主模式。因为它既强调制度构建（如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中的立法和司法），又重视公民社会中的政治活动、社会运动、联盟和群体的斗争，多元文化主义斗争也可以在其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通过公民社会的意见形成就可以解决多元文化主义的困境。协商民主与多元文化主义不仅可以兼容，而且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协商民主模式中，多元文化主义争论中的直接和间接陈述既可接受法律的规制和干预，同时又通过公共领域中的规范对话和争论体现协商民主的实质。协商民主制并不意味着总能够从公共领域的对话中产生出规范共识，而是强调即使不能产生规范共识时，人们也可以诉诸法律重新划定共存的界线。公开说理的过程不仅决定了规范的合法性，而且可以通过培养公共推理和对话的思维习惯，提高民主的公民素质。本哈比为了说明自身的观点，举了印度穆斯林的 Shah Bano 离婚案和头巾事件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的女主角 Shah Bano 十分不满她的丈夫，要求离婚并让他支付生活费，这里有争议的问题不是生活费的量，而是单方面的一夫多妻制、离婚女性对男性亲属的依赖和女性缺乏独立的信念。一般来说，穆斯林女性处于这种境地中，除了害怕受到惩罚或放逐外，最常见的理由是她们认为这是她们的传统和生活方式，显然她们缺乏一种民主意志。Shah Bano 是个例外，她有意识地求助于法律，当穆斯林的性别传统在悄悄改变时，女性的自主意识就成了决定她们地位的关键。如果参与者的民主意志存在的话，当发生道德和政治冲突时，当日常的规范确定性失去规制力量时，人们会进行对话，这种话语实践在现时代下通常是社会变革的动力。结果，穆斯林社群发现有必要变革《婚姻和离婚法案》。女性群体、政府代理和国际发展组织参与了这一过程。女性经济独立的问题在当代印度也被提上日程。

在头巾案中，法国政府禁止穆斯林女孩在学校戴头巾，因为头巾被视为歧视和过于“招摇”的宗教挑衅。显然，这种理解是公共领域的平等主义，它与文化的多样性和边缘人群的自主性之间是存在冲突的。在法国的公共领域中，尽管存在真正的公众对话和对多元文化主义社会中的民主和差异问题的思考，但是，戴头巾女孩们自己的想法却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她们的行为到底意

意味着什么？她是出于自恋、为了引人注目还是在进行文化反抗？她们行为的意义自始至终处在晦暗不明的状态。按照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规范，禁止戴头巾的法令是积极的，它把女孩从家庭的父权制结构中解放出来，使她们进入公共领域，给予她们自信和表达自我观点的能力。然而，就是在这种标榜自由和平等的开明社会中，边缘人群依然缺乏表达观点的机会，协商对话也没有真正出现过。本哈比解释说，她不是建议在任何讨论中都要由对话过程产生合法规范。在这个例子中，法律的合法性没有受到威胁，但是法律决定的民主合法性却受到威胁。校方应该更加民主、公正，而不是简单地向这些女孩传达他们行为的意义，女孩应该拥有公开表达对自己行为的理解的权利。也许这不会改变禁止戴头巾的决定，但是人们会重新审视决定中的“‘招摇地’展示宗教符号”之类语词的意义，从而更好地尊重少数群体。事实上，民主协商是一个双向学习的过程。法国社会的大多数人需要学会不能把所有戴头巾的人诬蔑或刻板地印象化为落后的、受压迫的生物，这些戴头巾的女孩以及支持她们的穆斯林社群需要学会在公共领域中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在要求尊重和平等对待她们的宗教信仰时，她们也需要明确该如何对待其他的宗教信仰。她们是否想要把宗教和国家、政治区分开？在这方面，有些穆斯林的作法的的确过火了。土耳其的伊斯兰宗教党派最大限度地逼迫国家的世俗宪法，试图通过选举颠覆宪法。本哈比呼吁人们要认识这些斗争，她提醒人们这些问题都已经超出意识和宗教自由的个体范畴，变成了关于国家和主权的政治争论，这些问题也许只能在民主协商中才能得到合理地解决。

然而许多批评者指出，双轨制协商民主并不能产生“假想”的愉快结果。公民社会的不同群体的参与经常产生相反的结果，特别是在高度两极化的社会中，不同的文化、伦理和语言群体之间的遭遇往往引发仇恨，所以应该减少他们相遇的次数。如果不同群体之间的仇恨过于强烈，法律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仇恨的爆发。因此，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社会的普通公民而言，不同族群在公民社会中的遭遇既有教育意义，又令人不安。这里的问题不是如何想方设法地把不同群体的成员强制推进一种对话的框架中，而是如何在一个统一的宪法范畴中调和特定的种族、宗教和文化差异。对这个问题的建议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要捍卫公共领域的语言或文化的多样性；另一种要求承认源于不同群体经验的司法的多样性。

前一种建议是多元自由主义的普遍观点，值得讨论是第二种建议，它不

仅是一种新颖的提议，而且挑战了一般的法律体系。具体来说，它建议创造多重的司法层级来解决文化和宗教的冲突。以婚姻家庭关系为例，主要有以下做法^①：1. 暂时的包容。可以在不同的生活阶段对国家和特定群体权威的司法进行划分。结婚可以由宗教认可，但离婚和分居只能由国家来规定。2. 双重体系。当事人保留诉诸世俗或宗教权威来裁决离婚和分居的选择权。3. 联合治理路径。例如，通过多元文化主义法庭，不同群体的成员可以借助翻译、理解和商定解决不同法律传统的争端，使相关的问题得到更好的澄清，使相关的解决方式更有针对性。

这种多重司法模式抓住了多元文化主义的难题，它把权威区分为习俗的权威和国家的司法权威，认为诸如婚姻可由持特定风俗的群体承认，但儿童抚养费、家庭财产分配只能由国家来规定。沿着这个思路可以在赋予女性和儿童完全的、平等的公民资格的同时，也承认她们的亚群体的成员资格。在这里，司法权威不再是单一的固定不变的权威，而是一种更加流动的、动态的权力和司法观念，并且可以根据需要对司法体系做进一步地区分，以适应调节差异和矛盾的需要。

但是，在本哈比看来，这个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司法制度的多元化可能会损害法治的核心品质，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外，这种模式可能会由于动态的、不可控的政治对话遮蔽法律的程序性特征。她没有提出解决前一个问题的方法，但她对政治对话进行了约束，主张政治对话应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1. 平等主义的互惠原则。在这里，文化、宗教、语言和其他少数者应该具有与多数者同等的公民、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2. 自愿的自我归属。任何个体不能自动地根据出生归属于某个文化、宗教或语言群体，个体的群体成员身份应该具有最大限度的自我归属和自我认同，当这种自我认同受到质疑时，国家不应该以牺牲个体为代价而拥有定义、控制群体和个体成员身份的权利。3. 退出和联合的自由。个体退出以前归属的群体的自由必须是无限制的，尽管这种退出可能伴随着失去某些特定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特权。^② 从根

① 参见 Ayelet Shachar, “The Puzzle of Interlocking Power Hierarchies: Sharing the Pieces of Jurisdictional Authority”, in *Harvard Civil Rights—Civil Liberties Law Review*, 2000 (35), p. 405.

② 参见 Seyla Benhabib, *The Claims of Culture: Equal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Global Er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31-132.

本上说，这些原则要求在保证司法权威的前提下，给予少数群体最大的选择自由，也就是说，政治对话必须是规范的协商式的。

然而，协商民主仍然受到各种批评，本哈比把这些批评总结为两种：一种是协商共识模式的认知和情感偏见，一种是协商政治的制度偏见。协商民主不像主流民主制度那样立足于利益群体的分化和合法竞争，它的意图是要恢复民主作为平等和自由的道德存在的公民之间的合作事业的意识。协商民主不仅承诺包容，而且承诺赋权，它坚持民主合法性只有通过所有受影响者的合意才能获得。至少在规范层面，规范的达成不能以牺牲最劣势和最不满的人为代价。然而，这些包容和赋权的规范条件既让协商民主有吸引力，也让它变得可疑。首先人们可以指出，现有的协商民主理论缺乏规范与经验之间的一致，它是否可以为人们分析和提取现存实践和制度的理性原则提供支撑仍然是不确定的。其次，协商规范模式假定人具有说理的动机和意愿，然而，现实中的人可能持有某些深层的认识和情感偏见，这些偏见可能会使一些“不受主流欢迎的”参与者无法表达他们的观点，或不愿意参与到民主协商的对话中。按照这种观点，1. 协商民主模式只能应对浅层次的差异，无法真正包容深层的差异。只有人们进入谈话中，他们才会发现不同人的信念分歧到底有多深。更为糟糕的是，有些协商理论家还不能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往往假定分歧首先是由社会观点或社会立场的差异导致的，而没有认识到这些差异来自性别、种族、阶级、语言、性倾向等更深的层面；2. 基于“给出理由的公共本质”的协商模式可能会因为空洞的、无情感的言语规范而变得有偏见；3. 达到“理性共识”的条件，特别是哈贝马斯所主张的条件，把共识的门槛抬得过高，有些要求是不现实的，甚至是排斥性的。

作为对上述批判的回应，本哈比特别指出了协商民主理论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协商民主不能从一种单一的公共领域模式出发。公共领域应该是一种多元模式，它承认并支持公民社会的多种机构、联盟和运动。在社会学中，公共领域被视为多种联盟和组织形式通过一种匿名的公共商谈所产生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连锁机制。去中心化的公共领域由相互重叠的意见形成网络和联盟、决策实体所组成。在这些多样的、重叠的公共性网络中，不同的理性逻辑都可以得到发展。第二，协商民主不能假定政治和文化上处于边缘的群体代表了“理性的他者”，是异质的物种。人类存在不同的叙事风格和说理传统，不能假定理性总是居于统治地位，也不能在理性和身体之间设置形而上学

的二分法。第三，反对公共性的规制原则。因为公共性是确保行动的原则、法则或原因的可接受的规范要件，所以必须从所有受影响者的立场出发对它进行判断。参与公共领域意味着对立双方应该彼此负责，每个人都应该准备从相关他者的立场出发进行考虑。本哈比相信，上述几点完全可以使协商民主应对来自不同领域的挑战。当然，也存在一些通过协商难以达成的目标，比如所有参与者的共识。哈贝马斯在《合法性危机》（1975）中也承认协商民主及其合法性话语理论对参与者之间的共识的要求过高。他希望“说理的力量”永远获胜。然而不管怎样，协商参与者可能出于不同的理由达成一致意见，但这些理由有一个共性，即它们都是“可识别的”、有一定依据的理由，这是协商对话的最起码的要求。政治话语是一种混合模式，它包含了普遍的正义诉求、主体和群体相关的策略理由、文化领域的伦理考虑等。通常在民主话语的各种规范说理和论证之间也存在张力，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似乎只剩下不断地学习这一条了。

四、博曼的完全自由主义的协商民主

与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不同，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试图使协商民主在复杂的、规范碎片化的社会中更加具有可行性。博曼所构想的协商政治的特征是手段和结果的平等、诚信磋商、在少数人接受过程公正性的基础上实行多数原则，这种模式可以说是代议制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结合，甚至更加偏向于代议制民主。瓦尔特·巴伯（Walter F. Baber）和罗伯特·巴莱特（Robert V. Bartlett）将这一理论路径称为完全自由主义的协商民主，在这种理论路径之外，还有另外两条协商民主路径：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和哈贝马斯的理想对话理论。罗尔斯所谓的秩序良好的社会是一个由平等、自利和理性的人组成的，他们拥有社会合作能力。社会被当作一个公平的合作体系，人们在技术上和更宽泛的政治意义上都是理性的，因为只有理性的行动者才能追求自身狭隘利益之外的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而进行公平的合作。但是，由于理性的行动者都关心自己的利益，因而缺乏自发的正义意识，所以政策制定者应该模拟无知之幕，让人们在没有自己的相关信息条件下达成正义原则。罗尔斯的路径受到许多批评，无知之幕的假设对协商民主来说过于狭窄，没有考虑到在政治互动之前人们的偏好往往就已经形成了，公共领域的互动不可能改变这些偏好。

除非讨论那些遥不可及的未来的事情，否则很难不牵涉到与个人和群体相关的信息。哈贝马斯的理想对话路径也受到批评：他主张协商民主依赖于共享的政治文化，它植根于市民社会而不是政治机构；协商是一个检验公民为了寻找普遍共识而提出的竞争式的有效性诉求的过程，这种共识是基于理性之上的，应该为公民所共有。哈贝马斯主张协商的参与者必须具有共享的政治文化这一假设使协商民主局限在更为狭窄的范围内。

哈贝马斯的理想对话模式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路径有很多相近之处，他们都没有脱离均衡观念与利益的抽象正义原则。但是，他们的理论有一个优点，就是把公民的规范有效性诉求视为类似于真理的诉求，服从于经验的评判，他们试图在规范性与事实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这种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博曼的理论态度。

在博曼的完全自由主义路径中，个人利益是个体偏好和动机的主要来源，参与民主过程的公民不可避免地被深层的规范差异所区分，但是一个公民在论证自己的政策立场时，必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个人利益。论证必须基于一种公共理性，对某种观点的接受不能只依赖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由此可以看出，博曼对公共理性或理想对话的要求不高，民主协商的说理可以是工具性的或策略性的。他还质疑在现代复杂的民主中存在任何公共理性或共同善的可能性，更不用说在它们基础上达成的共识了。在他看来，“某种‘社群偏见’以及许多人不能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①。在一个复杂社会中，知识和信息一直是一种稀缺资源，能力或知识永远不可能被公平地或广泛地分配。因此，多元主义民主中的公民不可避免地要放弃自主，求助于专家、代表以及其他劳动分工形式。

这不意味着协商民主者应该屈服于当前民主生活中的明显的不正义。博曼像其他协商民主者一样支持民主资源和能力的平等化。然而，这种平等化不是将在公共协商背景下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与其他有影响力的利益群体的地位拉平，而是确保他们可以“有效地运用他们的政治自由”^②。严格的平等对协商民主来说既无必要，也不利于保持一种批判性立场。完全自由主义下的协商不要

① James Bohman, *Public Deliberation: Pluralism, Complexity, and Democracy*. MIT Press, 1996, p. 238.

② Amy Gutmann and Dennis Thompson, *Democracy and Disagreement*.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96, p. 277.

求得到一种所谓的“正确”的方案，这一观点决定了博曼拒绝单一形式的公共理性，而倡导一种复数的公共理性形式。在这一方面，他与多数代议制民主者是一致的，后者把政治当作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和不可避免的矛盾。在协商有关特定人的利益的过程中，相关参与者有权界定这些利益。协商民主最重要的产品不是公正原则或理性政策，而是公民自身的批判能力。博曼阐释了民主制度如何通过讨论、辩论和说理方法的进步变得更加民主。从杜威和密尔到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他们都把民主制度的改革与协商的进步联系起来，其原因是协商对话关系着具有实践理性的行动者进入政治决策的方式。对更多协商的要求实际上是对更加理性的政治秩序的吁求，它至少能够在决策过程中运用公共理性。决策的合法性必须取决于自由、平等的公民的批判性判断。但与哈贝马斯不同，博曼不认为公民是由于共同的理由聚集在一起作决策，相反，他们往往是为了各自的理由而赞同一系列行动。公民的聚集与其说是一种民主的公民身份的理想，不如说是一种公共理性的实际需要。哈贝马斯的理性观念使他得出了全体一致的强原则，最终使他的理论在复杂的、道德多元的社会中不切实际。这似乎是既有协商民主理论的通病，它们的立足点是某种理想而不是现实的社会条件。

现实中的民主协商受到文化多元、贫富差距、社会复杂性与教条主义偏见和意识形态的限制。^①有些批评者认为，多元主义制造了许多不可调和的冲突，破坏了协商。协商只能存在于共享基本价值和理念的、范围较小的同质群体中。在博曼看来，这些指责只适用于对协商民主过分理想化的理论家，并不适用于他自己的理论。因为协商民主能否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取决于这个社会的自由程度，而不是公民意见的一致程度。博曼坚持“自由比民主重要”，民主首先要自由，自由则由权利来规定和保证。一种充分发展的宪法权利体系是成功协商的必要条件，因为它能够防止偏见和不平等最坏的滥用。在完全自由主义中，成功的公共对话产生了“所有多元的参与者都可以接受的共同意图”。评价协商成功与否的标准应该在民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来发现，而不是一些事先确定的评判标准。这些都成为源于公共协商的集体决策的合法性的要件。只有在公平、开放的决策过程中做出的决策才具有合法性。此外，协商也使公民

① 参见 James Bohman, *Public Deliberation: Pluralism, Complexity, and Democracy*. MIT Press, 1996, p. 20.

能够自愿地遵守决策。决策应该反映多数人的意见，但协商过程应该给予少数者继续进行协商合作的理由，而不是仅仅迎合前者的意志。少数者是作为协商参与者出现的，多数者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一个成功的公共协商应该既体现多元主义，又尊重个体的权利。公民有权运用公共对话来追求自己的利益，每个人对集体决策的影响力都是相等的。在此意义上，协商应该是“公共的”，而不是“集体的”。博曼十分强调文化多元，他主张政策立场的公共理性应该充分考虑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公共性既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太强会排除掉许多公民，太弱则不能解决当代民主的困境。

社会理论中一直存在一种政治怀疑主义，如马克斯·韦伯和尼古拉斯·卢曼，他们把公民之间的协商视为“制度的虚构”，把公众视为“幽灵”，主张政治只能是专家的事业。这种论调是政治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思考失衡的结果。通常应对民主问题上的政治怀疑主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马克思一样，主张如果社会事实不能与民主理想调和，那就通过对事实的改变以达到规范的要求。这种方式在有些情况下是有效的，但是当规范本身就是不现实、不可能的时候，如果要求完全参与、平等尊重和一致同意等，这个方法也是无效的。第二种是改变原则以使其在当前的条件下具有可行性，这是罗尔斯的立场。但是这种方法往往事与愿违，过多的迎合社会事实可能产生较为实用的原则和稳定的制度，但其代价很可能是牺牲掉民主。因此，协商民主理论应该兼顾事实与规范，在复杂的多元主义社会中重新理解协商民主的理想。

公共协商总是在特定文化、特定背景下展开的。在没有相应的理性制度时，公民只有通过公共行动来影响政治决策，这是纯粹策略性的，而不是为了达成共识。这极大地限制了公民参与公民社会的范围和质量。为了克服策略行动，创造一个真正的民主公共领域，博曼提出以下要求：首先创造一个“言说者向别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别人能够回应他们并提出自己的观点”^①的平台。其次，这个平台必须保证交流互动的自由和平等，目的是创造“影响政治的机会和途径，以及在国际社会中广泛分配有效的社会自由的决策环境”^②。最后，公共领域的交流必须是公共的、开放的、没有门槛的。此外，协商程序本身也

① James Bohman, "Expanding Dialogue: The Internet, the Public Sphere, and Prospects for Transnational Democracy", i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4 (52), p. 133.

② James Bohman, "International Regimes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Political Equality and Influence in Global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9 (75), pp. 512-513.

很重要，它不仅应该具有深刻的伦理维度和更高的公共性，让每个人都具有对他人负责的态度，把交往的不平等降至最低。博曼把公共协商程序称为“关于交谈的交谈”（talk about talk），它是关于“公共性规范和交往互动开启的社会空间的规范轮廓”^①的协商，或者是“元协商”，这种元协商对处理国际公共领域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它让人注意到国际社会中的不平等结构的存在。

这种被重新理解的协商民主不需要罗尔斯意义上的公共理性，也不像哈贝马斯那样要求公民具有共同的政治文化，它只要求一种手段和结果平等的对话，强调程序诚信磋商，而不是根本观点的真正一致。博曼提倡的是一种更加温和的协商理论，其基本精神在于调和，以此避免对文化多样性及其冲突的不敏感。他既强调对话过程应该尊重地方文化的价值，同时又允许新的全球意识的发展，沟通两者的桥梁是交往平等。在交往能力对称的情况下，相对无限制的交往可以给予公民根据自己的利益影响决策的合理期待。交往平等是没有边界限制的，它不局限于特定的人群，也不以特定的地域为前提。它至少对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融入民主协商提供了初步的解答，如此说来，协商民主更能适应全球“无政府”的趋势，为不同种族、民族、阶层的人们的相互理解提供“共享的规范背景”，为决策者提供自我限制的动机，同时也为人们提供参与而不是屈服的动力。出于这种由平等交往带来的共同利益的意识，协商民主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也会被削弱。

五、协商民主理论的实际运用

与前两代协商民主理论家相比，崛起中的第三代理论家更重视协商民主在现实中的运用，他们更倾向于把协商民主当作一种社会运动。巴伯和巴莱特特别关注协商民主对国际环境保护的意义，他们指出，目前的国际法中的民主成份是不足的，尤其是环保方面的法律。他们选取环境问题作为切入点，因为环境问题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他们试图探讨一种通过协商民主推动国际环境保护的可行方法。为此，他们分析了现实主义和协商民主理论中的法律体系，并且最终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协商模式。

^① James Bohman, “Expanding Dialogue: The Internet, the Public Sphere, and Prospects for Transnational Democracy”, i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4 (52), p. 136.

在认知基础方面，作为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术语的现实主义很少被置于广泛的背景下进行检视。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具有艺术、法律和哲学的现实主义的理論假设。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理论视角。把现实主义定义为一种视角就说明它是处理现实的，它的支持者就是现实主义者。当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视角出现在“真实世界”的意见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冲突中时，它就事先占领了所有语言学的制高点。它的支持者暗示所有其他视角都是非现实的，不足以处理现实问题。在面对这种语言霸权时，任何可能的新秩序，不管是激进的还是缓和的，都必须包含旧秩序的现实主义术语。不管是实质性的还是策略性的，国际环境法体系都必须建立在一种现实主义立场上，这也决定了它们必须依赖于现代科学的经验主义。然而，现代科学与环境保护在逻辑上是相背的。所有科学都把观测放在首要位置，而观测受到以往认知的限制。长期以来，人类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自己的有限能力。科学归根到底是人类的，它永远不可能完全从环境、自然的立场出发去思考。所以，包括环保问题在内的决策都应该是跨越学科的，环境科学应该与政治学协同合作。

在行动主体方面，对国际事务的“现实主义”分析强调国家是唯一的重要行动者。它们总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民主话语似乎不能有效地运用于国际事务。“民主在国内取得了实质性成果，但在更宽的领域（在国内和国际问题的关系上）却很少取得这样的成果。”^①就全球环境问题而言，质疑国际共识的可能性也有其合理之处，但反过来讲，国际共识的不确定性也为民主协商的介入提供了敲门砖。

首先，早期的民族国家的边界是以某种自然标志划分的，这使人们在生态知识和社群团结基础上形成了真正的、有时是流动和间接的家乡意识，这方便了集体行动。然而在当代的全球化潮流中，国家被迫卷入一种零和游戏，即为了实现经济目的就必须以社会和政治目标为代价。许多国际经济行为都是不计环境代价的。许多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经济贸易模式。然而，这不等于对环境问题的全球共识就没有希望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国家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它们有共同的利益，这使它们有可能相互合作。在全球化时代，政治、道德和文化边界是不稳定的。国家没有不变的特征，社群也依赖于历史叙事、习

① Bruce Ackerman and James Fishkin, “Deliberation Day”, in J. Fishkin and P. Laslett (eds.), *Debat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Blackwell, 2003, p. 3.

俗和制度结构创造和强化的共同身份意识。所有的环境动机都必须是民主的、参与的。

其次，环境价值和民主在原则层面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政治越来越围绕着危机展开。危机是众多的，所以政治动员的能力也应该与其相匹配，这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经济权力结构的合法性。公众广泛参与生态保护运动说明现有制度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因此，生态危机与民主合法性危机是纠缠在一起的。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但是要统一意见、协调异议却很复杂，这使得全球环境共识充满了不确定因素。人们要认识环境危机不能脱离大量的科学和技术信息。然而，目前的环保主义内部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它批评现代科学破坏了环境，另一方面又向后者寻求支持和解决措施。事实上，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仍然是缺乏民主的表现。

从地方到全球行动，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协商民主是一种能够为更牢靠的生态政策提供更多公共支持的政治实践。国际层面的人口参与、环境知识构建、制度合适性比国内层面更尖锐。协商民主有助于应对这些挑战。国际环保法的知识基础必须是“民主化”的，它必须在政治过程中产生。国际环保协定需要围绕变换的共识知识观念的持续妥协。共识的重要性在于下述事实：根据国际环保主义协定的性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强制的。国家或亚国家层面的集体决策的共识可能只是一种调整性规范或仅仅是一种愿望。但是当涉及国际层面时，共识就成为一种实践必需。国际层面的有效的环境立法只需要执行与民主政府相同的基本职能，如立法、行政和审判职能，由环保主义者和草根组织推动的跨国机构的发展最终可以适应这些功能的要求。在巴伯和巴莱特看来，也许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协商模式更能够促进国际环境保护的发展。

实用主义与协商民主的结合是可能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当代协商理论家承认一定水平的不可知论对人类事务是有益的。不管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还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他们都认为，真理观念是交流的产物，而不是交流的来源。这就是为什么哈贝马斯倾向于用“共识”来指称“真理”的原因。第二，实用主义和协商民主在语言及其运用方面的观点相同。对于杜威等实用主义者而言，人们的语言应用和表达的含义都是一个工具性问题。发现事实的含义是所有研究的目标。哈贝马斯对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他认为人们对语言的运用显示出许多不同的意图，他不仅通过语言对外部世界的事实进行

断定，而且用它来构建人际关系和自我表达。这种语言的工具主义应用被罗蒂称为反表现主义，它强调“语境重构”的持续过程，而不是要求它无限接近现实。最后，实用主义与协商民主对待法律及其目的的观点一致。实用主义认为，当国家法律被当作命令时，它就会被误解。法律不是权威的产物，而是广泛分配的结果，它产生了共同的利益和特定行动者关心它的需要。正如霍布斯所言，法律不是一种正式的逻辑系统，而是我们共同经历的有机产物。哈贝马斯则认为法律既有事实特征，也有规范特征。协商的目的是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识。

基于现实主义的协商考虑，有三类群体在环境保护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一类是环保方面的专家。1985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设立了环境法专家团，负责为布鲁特兰委员会提供一份关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原则的报告，同时提议加快国际环境法的发展。第二类是国际机构，典型例子是联合国安理会于1972年设立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现在它发展成联合国框架内最具创意也最有效率的机构之一。1974年它启动了控制地中海地区海洋污染的区域海洋计划，该计划成了类似计划的模板，涵盖了一百四十多个沿海国家。1985年它提出了保护海洋环境免遭污染的蒙特利尔方针。第三类是金融家。通常认为，金融专家对全球生态平衡产生了巨大威胁。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完全没有把环境考虑在内，致使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多年来被忽视。考虑到当今世界的自由贸易和私有资本的霸权特征，更有必要重新审视国际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在环保方面作用的变化。环保主义者批评不断增长的贸易促进了没有环保措施的经济增长，结果导致污染、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应对这些问题的监管主权的缺失。主要的国际金融组织已经逐渐认识到环境和生态破坏对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采取了一些举措。比如，世界银行在创建全球环境基金（GEF）方面起了领导作用。现在这个机构由32个成员组织，其中16个代表发展中国家。当达不成共识时，决策需要成员国和投票国的多数达到总数的百分之六十才能通过。在这种新的结构中，全球环境基金在十年内向140个国家资助45亿美元，支持1300个项目。现在它成为世界可持续发展运动的关键一员。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已经不能很好地应付环境保护中存在的诸多挑战了，多种民主力量的加入可能会带来某些转机。然而，尽管存在许多多边环保协定，全球环境状况却仍在恶化。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原因是利益群体在国内的

游说成本要高于国际的游说成本。这使得环保主义者在与国际资本做斗争中处于劣势。科技进步、大众交流、经济整合、人口增长和流动都给跨越国家边界的基本生态责任施加了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多边环境协定不能保护环境，主要不是因为它们的签字方不遵守协定，而是源于包含弱义务的协议。进行谈判的国家首先考虑对主权的保护，而忽略了环境保护的坚实基础是责任明确。国际环境保护的最后落脚点是制定权责明确的国际法，并保证它能够以一种权威的方式解决环境争端。在这一方面，国家主权观念一直是国际法的一个障碍，也许真正有效的国际环境保护行动只能从改变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和司法传统开始。

除了巴里和巴莱特结合了实用主义与协商民主的国际环保外，还存在许多不同的民主实验。最引人注意的是在世纪之交发展起来的、吁求全球正义的社会运动，它推动了一种基于参与的协商模式。全球正义运动表现在1999年反对世贸组织（WTO）的西雅图动员中，在这场运动中，网络组织结构、多元认同等情状与一种跨国维度纠缠在一起。新的交流技术（首当其冲的是因特网）不仅节省了动员的成本，使流动的、灵活的结构成为可能，而且促进了不同地区和运动之间的互惠合作。这种社会论坛试图为不同个体和群体的会聚创造一个开放空间。^①虽然以前的社会运动一般也具有一种网络结构，但是全球正义运动比以前的运动更强调它的网状特征，展现为“网络的网络”。跨领域的主题与跨国的网络“在行动中”形成，同时抗议名目也得到扩展。运动的跨主题和跨国本质在其专注于某个单一主题（从女性到环境、从和平到艾滋病）的情境中构造了一种新颖性。在跨国抗议中，对环境、女性权利、和平和社会不平等的忧虑仍然是卷入全球动员的亚群体或网络的特征。“运动之运动”（movement of movements）的定义强调了特定诉求的存在，以及一种冲突对于另一种冲突的非从属性。阶级、性别、世代、种族和宗教等方面的基质的多样性导致了（完全）身份的明显复合。在各种运动、对抗峰会和社会论坛中，各种文化断片——新旧世代的世俗的与宗教的、激进的与改革主义的——交织在一起，它们把反对社会（和全球）的不正义作为自己的粘合剂，同时为其他主题之间的讨论留下了大量空间。

讲台、论坛、联盟、网络都是共享知识的地方，有时可以达成相互理解。

① 参见 Donatella della Porta *Social Movements and Europeanization*. Palgrave, 2009, p. 3.

即使过分强调多元主义和差异，运动话语中的主导框架还是围绕全球正义和另一种民主诉求发展起来了。与之相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敌人也被确定了，它们不仅是国际金融机构（WB、IMF、WTO）的政策，而且也包括发达国家的右翼政党甚或左翼政府的政治选择。这些行动者被认为应对不断增长的社会非正义负责。除了社会非正义外，全球正义运动的另一个共同基础是寻求新型民主的元话语。基于选举问责的传统民主合法性受到两方面的挑战：全球治理的发展，以及作为全球经济结果之一的国家干预能力的明显减弱。民众对政党的不信任反映出某些参与者的想法：“来自底层的政治”可以与政党政治并驾齐驱。^①

正是这种后国家和后政党的社会运动刺激了对另一种民主观念的探求。关于新的民主观念的讨论沿着两个主要维度展开：第一，强调平等包容的参与观念与那种基于权力授予代表的观念形成对比；第二个维度反过来涉及多数主义者的对抗协商愿景，分歧在于决策的方法不同。黛拉·波尔塔（Donatella della Porta Social）在“欧洲民主与社会动员”（Demos）研究中，运用了一种横跨（根据赋权、包容和平等的程度的）参与和（涉及决策模型和交流质量的）协商维度的类型学。为了识别运动内外的民主愿景，她把它们压缩成四个内在的民主的基本观念（或模型）：社团模型、协商代表、集会模型和协商参与。在“社团模型”（associational model）中，由代表组成的集会或由所有成员构成的集会做出决策，日常政治事务由一个委员会来管理，决策由多数人做出。当代表在共识的基础上进行表决时，就是“协商代表”（deliberative representation）。当不存在执行委员会，决策由一个包含所有成员的集会做出时，决策由多数人做出，这种模式就是“集会模型”（assembly model）；如果基于理性的共识和交流过程与参与被当作重要价值时，那就是“协商参与”（deliberative participation），民间组织对这四个模型的支持度见下表^②：

		参 与	
		高	低
共识	低	社团模型 (%)	集会模型 (%)
		愿景：59.0	愿景：14.6

① 参见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M. Diani,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Blackwell, 2006, p. 47.

② Donatella della Porta (ed.) , *Another Europe*. Routledge, 2009, p. 72.

		实践: 35.6	实践: 2.5
		规范: 19.1	规范: 35.9
	高	协商代表 (%)	协商参与 (%)
		愿景: 15.6	愿景: 10.8
		实践: 32.7	实践: 29.2
		规范: 8.2	规范: 36.7
		愿景 (212 例), 实践 (184 例), 规范 (1055 例)。	

通过这个表可以看出，在抽样的 212 个组织中有半数支持内在决策的社团观念。所有样本的三分之一都属于共识原则与授权原则相混合的协商代表范畴。另外 36% 采用基于多数投票和授权的社团模型，大约 30% 结合了共识决策方法和参与原则（拒绝授权给执行委员会）；样本组织中只有 2.5% 结合了参与原则与多数决策原则（集会模型）。受访者可能对强调共识这一点有不同的解释，但不管怎样，运动组织显得对共识规范推崇备至。参与和代表被认为是“另一种民主”的主要价值。较小规模、较少预算、无偿服务、更依赖集会的组织尤其关注共识。共识方法在较新的和跨国的组织中更为流行。在寻求共识与横向组织形式之间也存在某些一致性，如拒绝执行委员会、对集会的高度评价和对授权的明确批评等。在其他对民主的规范模型的分析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在与全球正义运动相关的许多群体中，对共识决策（经常体现在组织原则中）的积极提及是非常有创新意义的。许多组织宣称想达成最大共识的决策，并尝试“一条支持参与、获得共识和达成广泛赞同的决策的组织路径”^①。把共识方法当作一种促进交流的手段来强调，这与认为运动是为了构建公共对话空间的普遍观念是一致的。共识的目标是拓展辩论，不是限制空间。共识应该向所有批判导致剥削、压迫或排除的全球化的人开放，致力于建立一种反映社会和民间转型并为之奋斗的空间。这种共识方法的基本做法是，如果一项提议没有获得全体参与者的共识，那么就会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以此与那些持异议者达成和解。如果后者不让步并且牵扯了相当数量的少数派，那么这项计划就不

① 参见 Torino Social Forum, Proposta di struttura organizzativa, www.lacaverna.it, 2008-12-11.

能通过。在这些积极尝试共识方法的群体中，发展出了促进横向交流和冲突管理的特定规则。共识工具包括“良好的引导、各种手势、激烈的争论和分成大小不等的群体。引导者应该在每次讨论之初对它们进行解释”。^① 为了把所有观点都纳入讨论并落实有效交流的规则，从分配（有限）时间给每个发言者到保持建设性的氛围，这些事务都需要引导者或仲裁人。^② 然而，不同组织达成的共识也不一样。在一种通过高质量对话实现的多重共识观念中，共识的主要作用被视作保障运动的多重本质和成员对个体倡导者的需求。共识方法应该与实现社会变革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在可预见的组织生活中，它们的含义和作用才能确定下来，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政治决策，而且需要日常生活和个体态度的深层转变。

从阿伦特开始，协商民主理论家一直讨论在复杂的多元社会中如何使决策更合理、使公民得到更加公正的对待。他们提出了许多协商模式，它们侧重点各不相同，有的强调公共理性，有的强调普遍共识，有的强调能力和权利，但它们的规范基础是一致的，即自由的、平等的对话。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是这方面的典范，他构建了以交往权力为核心的双轨制民主模式，同时也为批判理论提供了新的规范资源。他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协商民主的走向，大部分理论家都是在反思、批判其观点的基础上构筑自己的理论，第三代批判理论家更是把作为一种规范理论的协商民主与现实的社会进步运动紧密联系起来，用观察、访谈、民调等实证方法反馈协商民主的实际应用效果。协商民主也由理想向现实迈进了一大步，这一点值得所有致力于“善治”的国家、组织和学者所借鉴。

作者：中央编译局博士后

① 参见 Dissent! A Network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G8, Introduction to the Dissent! Network, www.dissent.org.uk, 2008-12-11..

②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H. Reite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Practices of Democracy in the Global Justice Movement. WP4 Report, Democracy in Movement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the Society – DEMOS,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21 世纪资本论》 讨论

《21 世纪资本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汪行福

[摘要] 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是对主流经济学界的直接挑战。它对过去 300 年间资本主义世界的收入结构变化、当今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和“遗产型资本主义”回归做了生动而又系统的阐述。学界往往只关注《21 世纪资本论》中对不平等的实质性讨论，没有关注他在方法论上的思考和对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主义的批判。其实，无论是对储蓄和投资，还是增长和分配，主流经济学都已形成了自己的标准解释，如“库兹涅斯曲线”、“人力资本假说”、“时间偏好理论”、“叠代周期储蓄模型”、“平衡增长理论”等等，正是这些理论模型使得分配问题边缘化，或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做出过于乐观的推测。《21 世纪资本论》主张经济理论应该回归历史，并与社会学、政治学、文学和哲学等社会科学结合，走出自我封闭的数理象牙塔和自我膨胀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既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也对主流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它是 21 世纪的《资本论》。

[关键词] 皮凯蒂 《21 世纪资本论》不平等 新古典经济学

犹如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揭示，也是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一样，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一书的内容也有两个方面，它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平等规律的揭示，也是对主流的新古典经

济学的批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皮凯蒂将其著作命名为《21世纪资本论》，这简直就是向知识界发起直接的挑战。书名如此令人震惊，不仅仅在于它是对马克思巨著的明显引用，更在于皮凯蒂一开始就通过让人们想起《资本论》的方法，把自己的分析同当代大多数有关不平等的讨论划清了界限，以此表明他是在回归一个更古老的传统。”^①关于皮凯蒂对社会不平等趋势和特征的讨论，国内学界讨论得已经很多了，但有关他的思想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批判关系的讨论尚付阙如。

皮凯蒂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涉及到“库兹涅斯曲线”、“人力资本假说”、“时间偏好理论”、“叠代周期储蓄模型”、“平衡增长理论”等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理论。在皮凯蒂看来，“财富分配总是深受政治影响，是无法通过纯经济运行机制解释的。”^②而“目前的经济学科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33）因而是片面的。皮凯蒂不仅在研究方法上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相区别，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和趋势的解释也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皮凯蒂认为，不平等世界的形成有两个途径：一是资本收益的不平等，二是收入的不平等。“未来的世界可能会糅合了过去世界的两大弊端：一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由继承财富造成的不公，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以能力与效率为理由的薪酬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其实这种说法并无道理）。因此走向极端的精英主义就很容易产生高管和食利者之家的赛跑，最终受损的是在旁边观赛的普通大众。”（430）因而，不平等的发展最终将危及启蒙理想和民主政治的命运。应该承认，皮凯蒂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私人产权和市场经济不仅仅是让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者为资本所统治，它们在协调亿万个体行动方面也扮演着有用的角色，没有它们就不会如此容易地进行。”（548）但是，他相信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也无法产生出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分配关系。皮凯蒂的理论可以称为双重逻辑理论，收入分配受到经济力量的决定，也受到政治力量的影响。劳动工资制度、税收制度、遗产税乃至一个时代主导的意识形态都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同时他也相信，决定人的命运和幸福不应

① 保罗·克鲁格曼：《为什么说我们正处在新“镀金时代”——评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的资本〉》，《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9期。

②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除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扬铎铎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下引此书文中括号内插入页码。

该只有资产的占有权，同时还应该有人权和社会政治逻辑。皮凯蒂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应该消灭的，但他认为，资本主义应该受到控制，而这种控制的力量和机制不应该是市场，而是民主政治和国家。皮凯蒂说：“经济和科技在许多时候都与民主理性无关。前者发源于启蒙运动，而大多数人想当然地认为，经济和科技理性必然会形成民主理性，仿佛中间存在着某种天注定般的魔力。然而现实情况证明，民主和社会公正需要其本身的社会机制，而不是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甚至不能仅仅通过议会和其他民主机构来实现。”（437）就此而言，皮凯蒂的立场既与主流资产阶级经济学相区别，也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区别。

从方法上说，皮凯蒂的理论可视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批判”和超越，这种批判和超越的方式就是两个“嵌入”。有的学者注意到，皮凯蒂的理论不仅继承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传统，关心财富在不同阶级和群体间的分配，而且继承了卡尔·波兰尼的传统。波兰尼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得合理生活依赖的资源，如土地、货币和劳动力全面“脱域化”了，而人类生活的重建需要把脱域的东西再嵌入社会生活的有机脉络之中。皮凯蒂做的工作与此相似。为了使新古典经济学走出理论的象牙塔，摆脱自身道德和政治麻痹症，皮凯蒂不仅力图把分配问题“嵌入”到历史之中，而且还试图把经济学理论“嵌入”到生活世界之中，不仅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上的片面性，而且指出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化。在本文中，我们将梳理皮凯蒂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八个方面批判。

一、超越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又称倒 U 曲线（inverted U curve），它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于 1955 年所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在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不平等上升，而当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完成后，收入分配将处在相对稳定的时期，当到达经济充分发展阶段时，由于资本的充足和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收入分配将趋于向对劳动者有利的平等方向发展。因此，经济增长对分配的影响一般规律是“先恶化、后改进”。库兹涅茨曲线本来是一个统计学的规律，但后来越来越被绝对化，成为为市场经济辩护的意识形态核心。在库兹涅茨曲

线提出之前，资产阶级辩护的主要理论是类似于“涓滴经济学”的观点。“涓滴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是里根时代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提出的。在他看来，把钱给上层富人对社会是有利，只要富人在消费，它就会给穷人创造机会，因而，富人财富所带来的利益会一点一滴流到穷人手里。显然，这种理论对资本主义辩护还是消极的，“库兹涅茨曲线”的辩护则更为积极，因为它认为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时点，就会向平等的方向发展。

皮凯蒂看到“库兹涅茨曲线”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功能。“经济学家已经从末日预言的过度阐述逐渐转变到对理想主义或至少是对圆满结局的过度偏好。”（11）把库兹涅茨与马克思的理论对置，可以看到对资本主义命运的两种不同的诊断。皮凯蒂承认库兹涅茨是他的思想先驱，因为他最早对收入分配进行大数据处理。但在他看来，库兹涅茨曲线不论数据的采集还是结论都是片面的。如果这一曲线有意义，它也只适用于1945-1975年资本主义的特殊“辉煌时期”，不具有普遍意义。更重要的是，皮凯蒂看到这一理论正在越出自己的边界，成为东西方冷战的意识形态工具。库兹涅茨1975年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此理论的主要意图是推动非西方国家进入“自由发展的轨道”。库兹涅茨曲线的提出对西方经济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出现以及“‘辉煌30年’培养了一定程度的乐观主义情绪，而19世纪关于财富分配的末日预言则变得无人问津了。”（15）如果说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主要从效率方面、从自由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合法性辩护，在库兹涅茨之后，它还可以从平等和公平方面进行辩护了。

皮凯蒂对待库兹涅茨曲线没有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通过历史的嵌入，指出这一理论只适用于20世纪1945-1975年的“辉煌30年”，而这“辉煌30年”并非资本主义的必经阶段，它不过是一系列偶然因素“幸运”地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在皮凯蒂看来，经济增长和发展不存在一个命定的必然结局，任何分配都是所有可能结果中的一种，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不存在单一的方向性的必然趋势。为破除库兹涅茨曲线的意识形态化，皮凯蒂给出的方案是“回到事物本身”：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我们很早起就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并提出19世纪就已经出现的类似问题。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忽视了财富分配，部分是由于库兹涅茨的乐观结论，部分是由于对所谓‘代表性行为人’为基础的简单数学模型的过度热情。如果不

平等问题重新成为中心议题，那我们就必须开始收集足够广的历史数据，以便更好地理解过去和现在的趋势。(16-17)

显然，皮凯蒂并非否定库兹涅茨的研究方法，但是，他强调库兹涅茨曲线依赖于特殊背景，因而是不可靠的。在他看来，西方社会曾经向着库兹涅茨曲线预测的乐观主义一极摆动，今天它又重新向马克思预测的悲观主义一极摆动，历史的真理可能在马克思手中。因为：

在财富积累和分配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将社会推向两极分化或至少是不平等的强大力量。同样，存在趋同的力量，并且在某些国家、某段时间，这些力量可能会占优势，但是分化的力量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重新占据上风，正如现在 21 世纪初似乎正在发生的一样。(28)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只要市场经济完善，不存在干扰市场机制的外部力量，所有经济要素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经济增长将沿着库兹涅茨预示的方向发展。而皮凯蒂认为，与收入趋同化即平等化力量相比，收入分化的力量更为强大。因为资本收益率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大于经济增长率 ($r>g$)，且这种分化的力量与任何形式的市场缺陷无关，市场越是完善， $r>g$ 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与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在马克思看来，剩余价值的产生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完善，恰恰相反，即使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完善的公正条件下，劳动者仍然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因此，剥削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之中的。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皮凯蒂对库兹涅茨曲线的批判一方面是历史的批判，他指出，库兹涅茨曲线只有在“辉煌 30 年”才有实证意义上的可信性，而马克思在 19 世纪对资本主义不平等趋势的判断却能在更大的历史范围内得到证明。另一方面又是意识形态批判，指出我们不能把特定历史时期适用的理论夸大为普遍的规律。

二、超越“边际贡献论”

库兹涅茨曲线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分配周期效应来为资本主义辩护，而边际贡献论则是通过强调生产要素与收入分配的自然联系来实现这一目的的。大体上说，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是从阶级分配论到要素分配论的转变，从收入来源的所有权理论向生产要素边际贡献论转变。皮凯蒂

对要素分配论持一种内在批判的观点。在他看来，这种理论是见物不见人，具有拜物教倾向。“财富分配包含着两个维度：一是‘要素’分配；这里劳动力与资本被当作‘生产要素’，他们被抽象成两个均匀的实体；二是‘个体’分配，这会考虑到个体层面上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40）前一方面可以称为“系统还原”，即把纷纭复杂的分配还原为在生产中起作用的不同要素，正是边际贡献论中的生产要素分配论所做的工作，后一方面是“生活世界还原”，用马克思的话说，物与物的关系归根到底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皮凯蒂看来，“现实中这两个维度都非常重要。如果不同时分析这两个维度，是不可能完全理解分配问题的。”（40）

新古典经济学分配理论的核心是边际贡献论，这种理论的意识形态含义在于，一个社会收入的分配完全可以从生产要素的边际贡献中导出。皮凯蒂并不完全否认边际生产率概念，但反对脱离了具体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把这一理论到处套用。皮凯蒂说：

按照最简单的经济模型，假设资本与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那么资本收益率应该完全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即增加一个单位劳动要素所增加的产量）。在更复杂也更现实的模型中，资本收益率还取决于有关各方的相对议价能力。（216）

这一观点再次体现了皮凯蒂对待新古典主义的方式，即新古典主义只是一种纯粹理想状态的假设，无法真正地用于对现实社会的分配结构的分析。在谈到超级经理人的高薪时，皮凯蒂说：

从个体“生产率”角度为这部分的高薪寻求客观依据是十分天真的。当工作是重复性劳动时（比如生产线上的工人或快餐店的服务生），我们可以估计每增加一个工人或服务生带来的‘边际产出’的增加（尽管我们的估计会有一些的误差）。当个体的工作职能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或接近于独一无二）时，这一误差幅度将大得多。实际上，一旦我们在标准经济模式中引入信息不对称假设（在这里显然是正当的），则“个人边际生产率”这一概念将变得很难定义。事实上，这也就接近纯粹意识形态的概念架构了，人们可以据此为较高的社会地位做正当辩护。（338）

皮凯蒂没有提出自己的价值理论来取代边际贡献论，他所做的工作是给这一理论附加更多的限制，在分配中增加更多的要素，使我们更清楚地认清分配关系形成的根源。他注意到，不论是在为资本收益的辩护中，还是为超级经

理人、超级明星等高收入者的辩护中，边际贡献理论都已经变成了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化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把理论上虚构的完全竞争环境当作现实，二是无视要素边际贡献率之外的政治讨价还价能力的影响。

三、超越“基尼系数”和“帕累托准则”

对不平等研究既离不开对它的性质的判断，也离不开对它的衡量。皮凯蒂用来讨论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理论工具不是基尼、帕累托的统计方法，而是更为古老的“社会图表”法。关于基尼系数，皮凯蒂指出，“在20世纪的广泛使用，常常弱化财富分配的差距。人们测度不平等的方法从来不是不偏不倚的。”（274）他对基尼系数的批评是：“虽然基尼系数旨在用一个数字来概括不平等的程度，但实际上是针对现实情况绘制了一幅简化的、过于乐观的又难以解释的画面。”（376）关于帕累托规则，他的批评更为尖锐。帕累托认为，不论什么样的社会，收入和地位的分配总是存在着“20/80法则”，即最富有的20%的人占有80%的财富，而80%的穷人只能占20%的财富。该法则被约瑟夫·朱兰等人概括为“帕累托法则”。基于这一法则，帕累托还提出了他的精英理论，即不平等是无法消除的，社会分层结构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帕累托准则也是一个统计学规律，但后来越来越被自然化和绝对化。帕累托准则与库兹涅茨曲线的指向正相反。如果库兹涅茨曲线的意识形态化是通过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分配关系改善的乐观主义结论，那么，帕累托准则则是强加给我们一个宿命论的悲观主义结论。这一准则的意识形态化正如皮凯蒂所指出的：“即使在今天，仍有很多人像帕累托一样，认为财富的分配状态稳如磐石，好像这是自然规律一般。然而，这与事实相去甚远。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视角来研究不平等，那需要作出解释的不是分配状况的稳定性而恰恰是时不时发生的变化。”（378）分配关系的变化不能理解为神秘的自然规律，它是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带来的，因而是历史的。

为了克服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局限性，皮凯蒂主张回到更多传统的“社会表格”来描述真实的社会世界中不同群体的财富状态。社会表格是由17世纪末的英国和法国思想家提出的，在启蒙时期被广泛运用。社会表格的最初版本是由格雷戈里·金于1688年创立，被许多人运用。皮凯蒂说：“他们的目标一直是提供全面的社会结构视角：他们列出贵族、资产阶级、绅士、工匠、农民

的数量及收入评估。……社会表格强调不同层级（尤其是不同的精英阶层）的国民财富比重，试图描绘不平等的生动一面。在这方面，它们和我使用的方法显然非常相似。”（273-274）

众所周知，皮凯蒂通过自己的大数据生动地描绘了极其不平等的“两个世界”，一极是 10% 的富豪和 40% 富裕的中产阶级，另一极是 50% 贫困的低收入阶层。其中超级富豪中又分为 1% 的超级富豪和 9% 的富豪。这种以人际间、群体间的分配关系为中心的研究体现了他对新古典主义的抽象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超越。

四、超越人才资本理论

在对收入不平等的辩护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人才资本理论，这种理论把边际生产率理论运用于对知识经济时代劳动收入差距的辩护。与新古典经济学把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同等看待不同，皮凯蒂拒绝承认人才资本概念。在他对资本的定义中，“资本指的是能够划分所有权、可在市场中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和。”（46）其理由是人的劳动力和技能始终只能由劳动者所有，不能像股票、债券、不动产等那样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地转让于他人。同时，劳动工资不能像其他资产那样有明确的市场价格，并非总能以边际生产率来衡量每个人的贡献和创造的价值。皮凯蒂认为，能够用边际生产率进行衡量的劳动只是简单的重复劳动，劳动越复杂，特殊性越大，就越不可能用边际生产率来衡量。

皮凯蒂强调，不平等世界的形成有两个途径：一是资本收益的不平等，二是收入的不平等。在收入不平等中，超级经理人的兴起是最重要的现象。为什么某些社会和历史时期的工资收入的不平等会大于另一社会和历史时期，主流经济学的解释是教育和技术赛跑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从业者的工资等于其边际生产率和技能的市场供求。皮凯蒂明确说：“恕我直言，它无法对 1980 年美国超级经理人的兴起和工资不平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312）这一理论的局限性有多个方面：第一，该理论在某些方面是天真和简单化的。虽然我们承认技术和教育对工资不平等起作用，但是，试图用边际生产率来解释收入差别是不可能的。第二，这个模型的局限在于它忽视了制度的作用。“为了理解工资不平等的演变，我们必须引入其他因素，诸如支配不同社会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制度和规则。与其他市场相比，劳动力市场在更大程度上不是一个全部由自

然不变的机制和生硬的技术力量决定的数学概念，而是建立在具体规则和妥协基础上的社会性架构。”（315）。正因为这种理论在其基础层面和现实层面的局限性，皮凯蒂认为边际生产率和人才资本理论有两大失败：（1）无法充分解释1980年以来美国超高劳动收入激增的现象。（2）不能解释有相似生产率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收入分配格局。皮凯蒂认为，不论是经济要素还是技术和知识都不可能单独地起作用，“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是，无论传播知识和技能的力量多么强大，特别是在促进国家之间的趋同过程中，它都可能被强大的敌对力量阻挠和击溃，从而导致更大的不平等。”（23）

总之，解释20世纪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的因素不仅仅是经济的和技术的因素，而且还有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对收入分配的研究需要把边际生产率理论、技术和教育赛跑理论纳入到更广泛的社会历史框架内，更全面地分析导致收入分配的同化和分化的因素，而不是用仅仅在理想的预设状态下才有效的理论来为现实中的不平等进行辩护。皮凯蒂总的结论是：“基于生产率增长和知识扩散的现代增长，有可能避免马克思预言的世界末日，并使资本积累保持相对平等。但它没有改变资本的深层结构，也没有真正降低资本（相对于劳动）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238）因此，需要限制人才资本理论、教育和技能扩散理论的使用范围是正确的，其影响也是有限的。

五、超越柯布 - 道格拉斯函数

“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是经济学的新古典重要概念，它是指一定时期，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与可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在生产函数中，柯布 - 道格拉斯函数影响最大。柯布 - 道格拉斯函数是1928年由美国数学家柯布（C.W.Cobb）和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共同提出的。经他们研究，1899—1922年间，资本的边际产出为 $1/4P/C$ ；而劳动的边际产出为 $3/4P/L$ ，将这些边际产出乘以相应的生产要素量，得到资本的总产出为 $1/4P$ ，劳动的总产出为 $3/4P$ 。在这里，资本收入比重 α 是一个固定系数。柯布 - 道格拉斯函数原是一个统计学规律，它强调资本与劳动之间没有替代关系，无论资本与劳动的数量多少，它们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是始终不变。显然，这个函数与前面所说的帕累托准则在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把特殊时期出现的数量关系规律化，但是，从内容

来说又给我们一种不平等的温和形象。因为不论资本数量有多大，其平均贡献率只占总产出的 1/4，而劳动在国民收入中占 3/4。显然，这一生产函数显得对劳动者非常有利。

皮凯蒂对柯布 - 道格拉斯函数的批判有两个方面。第一，这个生产函数不是一个与社会历史变化无关的技术参数，相反，他认为，生产函数之所以呈现相对稳定的特征首先是社会历史现象。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资本与劳动划分的稳定性使社会秩序看起来相当和平、和谐。”（222）第二，把国民收入的分配视为与社会历史条件无关的技术参数，必然带来意识形态的扭曲。“保守派和自由派经济学家热衷于说明增长让所有人受益，因此钟情于资本 - 劳动非常稳定的想法，即便这有时意味着无视数据或忽视资本收入比重日益增加的时期。”（223）皮凯蒂主张把资本 - 收入比问题放在一个更宽阔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按照他的考察，“无疑，随着 β 增大，资本收益率 r 很可能会下降。但是根据历史经验，最可能的结果是数量效应会超过价格效应，也就是积累效应会超越资本收益率的下降。”（225）因此，即使资本收益率下降，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是上升的。这就颠覆了柯布 - 道格拉斯函数的结论。

六、超越“时间偏好”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

皮凯蒂指出，通向社会不平等有两种方式：一是资本收益的不平等，二是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资本的来源或者是储蓄，或者是继承。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令人堪忧的是这两种不平等相互交织、相互加强。关于资本的形成以及资本所有权的合法性从洛克时代开始就有各种理论，最经典的理论是劳动所有权理论，即人通过自己劳动的任何财产都有权利拥有，另外还有西尼尔的节俭论，即储蓄是通过节俭形成的。新古典经济学又提出了其他关于资本和储蓄的理论，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时间偏好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这两种理论试图对资本的收益和人的储蓄动机进行解释。

关于储蓄动机的解释，我们可以假想一个社会，其中资本没有任何用处，不带有额外的收入。即使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也会进行储蓄，为未来可能的灾难做准备，为节日做准备，或为后代留下一笔遗产，等等。在这样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出现 $g > r$ 的情况。但是，现实社会为什么资本的收益率总是高

于经济增长率？对这样的问题，主流经济学家往往用时间偏好来解释，把资本的利息解释为推迟消费的时间贴现。按照时间偏好理论，人们总是为延期消费支付一定的时间贴现，假定经济增长率为 0，资本收益率等于时间偏好率 θ ，资本收益率等于时间偏好率，如果经济率为 n ，时间贴现率为 θ ，且为正数，那么，资本的收益率就等于 $\theta+n$ 。这就是现实中的资本收益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原因。

关于时间偏好理论，皮凯蒂并不认为这个理论本身是错误的，而是认为它无法用于现实情况的分析。在他看来，时间偏好理论面临着两方面的困境：第一，它太过简单和武断。“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储蓄行为和对未来的态度都压缩到一个无法改变的心理参数上。”（369）如果资本的收益率是由人们的时间偏好决定的，而时间偏好又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参数，那么，资本的收益率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其实，虽然资本的收益率相对来说变化不大，但仍然是变化的。第二，如果时间偏好理论是正确的，它意味着为了维持经济的均衡，资本收益率 r 必须伴随着经济增长率 g 快速上升，那么，快速增长的经济体的 r 和 g 之间的差距一定会大于没有增长的经济体。这一预测与现实也是不符合的。皮凯蒂的结论是：

储蓄行为和对未来的态度不能以单一的参数来表达。这些选择需要放在一个更复杂的模型中进行分析，不仅包括时间偏好，也包括预防式储蓄、生命周期效应、财富自身的重要性以及其他因素。除个人心理和文化因素外，这些选择取决于社会和制度环境。（370）

对储蓄动机的解释还有一种有影响的理论，这就是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理论。按照这一理论，财富的积累或储蓄的主要动机是保障退休后的生活，因此，人们的储蓄比例总是根据预期寿命进行调整的。在理想模型中，长寿者应该在老年阶段花光大部分储蓄，离世时资产不多或完全没有。照此说法，逝者离世时平均财富与在世者平均财富的比值 μ 应该是 0 或接近于 0。“这种关于老龄化社会中资本及其演变的说法尽管在逻辑上完全说得通，但却无法解释现实中观察到事实，至少事实不是如此。”（402）按照他的统计，历史上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内接近于莫迪利亚尼三角，在此之前和之后都非如此。资本是如何积累并不断扩大的，皮凯蒂的观点是：“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不等规律 $r>g$ ，大部分财富的集中可用该规律来解释。”（406）虽然家族遗传动机、流动性偏好、谨慎动机等等解释一部分

储蓄现象，但资本相对于国民收入比例（ β 值）的提高主要应归功于财富的高度集中度，而不是其他原因。《21 世纪资本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世袭资本主义”概念，即超级富豪的资产不是通过节俭或养老而形成的，今天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不可能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储蓄理论加以解释。一方面超级经理人的收入完全超过其消费的需要，即使无任何流动性偏好和谨慎安全动机，也会积累下大量的资本；另一方面超级富豪的继承者即使拼命消费，由于 $r > g$ ，他的财富也在不断增长。因此，对讨论当前社会不平等来说，探讨其财富的来源，或者给富豪排一个道德排行榜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同的收入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论财富的来源如何，只要钱生钱的逻辑存在，最终结局是一样的：“当盖茨在退休之后其财富也同样保持高速增长。一旦财富形成，那么资本就会按照自身规律增长，而且只要规模足够大，那么财富可能会高速增长数十年。”（454）

西方经济学的边际贡献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储蓄理论表面上是对收入和资本差距的中立的客观的科学解释，其实都是把现行分配状态合法化。虽然这些理论在一定条件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客观上起着掩盖社会矛盾和扭曲现实的意识形态作用。

七、对新古典增长经济学的批判

在对经济增长（ g ）的解释上，皮凯蒂部分地认同新古典增长理论，特别上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于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结构性增长理论。索洛模型（Solow growth model）新古典经济学中最有影响的增长模型，他本人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索洛模型是 1956 年首次提出的，其意义在于解释储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该模型核心观点是：

1. 该模型假设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即储蓄 - 投资转化率假设为 1；
2. 该模型假设投资的边际收益率递减，即投资的规模收益是常数；
3. 依据科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劳动数量既定，随资本存量的增加，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确保经济增长稳定在一个特定值上。

索洛模型又称均衡增长理论，它既想解释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也想解释增长与分配之间的良性关系。这两点都受到皮凯蒂的质疑。在皮凯蒂看来，首先宏观经济结构中资本存量、收入和产出流的长期同步变化是难以实现的；其

次，即使新古典增长理论期待的均衡结构增长能够实现，“这种平衡增长不能保证和谐分配财富，也绝不意味着资本所有权中不平等的消失或减少。”（236）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错误在于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过于和谐的图景，水涨船高，只要经济增长，劳动与资本会同样受益。按照皮凯蒂的看法，“基于生产率增长和知识扩散的现代增长，有可能避免马克思预言的世界末日，并使资本积累保持相对平等。但它没有改变资本的深层结构，也没有真正降低资本（相对于劳动）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238）因此，资本主义即使沿着索洛-萨 尔森的均衡增长理论发展，社会不平等也不会消失。

在增长理论上，皮凯蒂特别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英美道路。新自由主义不仅把平等，而且把公有制本身视为效率低下的根源。在比较盎格鲁-撒克逊式市场资本主义（Anglo-Saxon market capitalism）或股权模式（shareholder model）与“莱茵资本主义”（Rhenish capitalism）或“利益相关者模式”（shareholder model）时，皮凯蒂指出，“利益相关者模式”虽然不可避免地造成企业的市场价值被低估，但其社会价值却未必。同时，就经济增长的表现来说，也没有证明前者优于后者。美国是新的经济危机的发源地，而德国在经济上却表现得相当稳健。因此，关于什么是最好的市场经济体系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另外，针对盎格鲁-撒克逊式市场资本主义偏好私有化、自由化，皮凯蒂指出：“在整个‘辉煌 30 年’期间，国家得到了重建，经济增长强劲，超越法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当时的法国实行混合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或者至产可以说是规模最大的一些企业不再受私人资本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138）

因此，皮凯蒂既质疑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也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增长模式，前者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现实，后者明显站在偏爱资本和私人利益立场。

八、公共债务危机是私人利益挤出公共利益

发达资本主义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公共债务危机，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这种危机是由政府包办过多的社会事务造成的。在主流经济学中，公共债务被认为有害的和消极的。如果政府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政府债券来为其支出筹资，假定货币供给不变，政府出售债券相当于收回流通中的部分资金，则市场上资金

减少，从而利率升高，贷款利率上升减少了私人投资，引起了挤出效应。在这个意义上，公共债务与私人储蓄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按照这一推论，欧洲国家庞大的公共债务应该极大地减少了私人资本的增长。但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并非如此。皮凯蒂虽然没有明确否定公共债务的“挤出效应”。他认为公共债务问题是一个财富分配问题，尤其是公共领域与私人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而不是一个绝对财富问题。

一般来说，解决公共债务有三种方式：资本税、通货膨胀和财政紧缩。新自由主义总是偏好第三种方式，即通过压缩公共支出，通过财政紧缩逐渐消化债务赤字。但是，从公平和效率出发，最坏的方式就是财政紧缩，因为公共债务大部分用于公共物品的支出和支持公共养老、健康和教育的社会服务项目。财政紧缩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这两个方面，这也是欧洲国家陷入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原因。皮凯蒂也讨论了其他两种削减公共债务的措施。其中之一是私有化所有的公共资产，让私人持有公共建筑、大学、医院和基础设施。这种解决办法是彻底放弃福利国家和混合经济，退回到完全私有制的状态。但是，这种办法在皮凯蒂看来是治标不治本，它不是控制私人资本权力，反而是强化资本的权力，不仅没有阻止精英寡头制，反而强化精英寡头制。另一种办法是通货膨胀政策。然而，通货膨胀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再分配结果是确定的。除此之外，通货膨胀政策还面临两个困难：第一，它很难控制；第二，通货膨胀一旦变成持久的预期，其政策就会失效。

皮凯蒂认为，当今西方国家的公共债务不是由公共财富对私人财富造成的，而是由私人财富对公共财富的“挤出”造成的。这种“挤出”效应表现为，西方国家的债务积累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私人财富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基于这样的前提，皮凯蒂主张通过

征收私人资本特别税来消化巨额的债务，而不是采取财政紧缩的方式。按照他的计算，在现有的私人资产规模下，一个针对私人资本的15%税率的统一税其收入就接近于一年的国民收入，立即可以偿还所有未清偿的债务。因此，公共债务危机问题的解决不是一个绝对财富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意愿和民主问题。

虽然皮凯蒂认为自己并不喜欢公共债务，但是，他反对欧盟的债务政策。欧盟在公共赤字和债务问题上持有类似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宪法经济学思想，即通过具有宪法效力的法律来规定政论赤字和公共债务的上限。根据1992年《马

斯特里赫特条约》，条约成员国应该确保其预算赤字小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3%，公共债务总额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60%。超出此范围就违反了欧盟的财政纪律。皮凯蒂认为，这种以法定的目标来控制赤字和债务的方式既没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也没有政治上的合理性。首先，历史经验表明，在严重危机时需要做出紧急的赤字预算，其规模在危机前是无法预料的。预先规定一个在任何情况下不可突破的预算赤字和债务的上限是不明智的；其次，将公共预算的决定权交给法院是危险的。西方国家的宪法法院的法官往往持有一种司法保守主义，在他们那里，私有财产权和贸易自由权高于其成员国提高其人民普遍利益的权利。

欧洲今天的公共债务问题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私人财富从来没有达到如此高的程度，而净公共资产几乎为零，甚至为负数。一方面我们把耻辱的债务留给子孙，另一方面又可耻地允许巨大的财富分配不公。结果，“私人财富建立在公众贫困的基础上，一个特别不幸的结果是我们现在在债务利息上的支出远超过我们投资于高等教育的费用。”（584）按照皮凯蒂的观点，公共债务危机不可能通过财政紧缩或通货膨胀来解决，否则就会损害民主的社会基础。唯一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在全球层面通过累进所得税和资本税，减轻社会不平等程度，减少公共债务，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完善福利国家。

皮凯蒂与主流经济学之间的批判性对话还有其他内容，但从我们讨论的这些内容已经可以看出皮凯蒂的特殊立场和他用于超越新古典主义的方法。这种立场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又不是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就是意识形态，而按照皮凯蒂的立场，新古典经济学脱离实际，扭曲了现实，它一方面美化了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现实，如边际贡献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人力资本理论以及索洛的均衡增长理论，而“帕累托规则”则把不平等关系绝对化、神秘化为不可超越的“铁律”，就如马尔萨斯对人类历史的悲观主义预言一样。皮凯蒂主张经济学回到真实的世界，而不是停留在纯粹理论的象牙塔之中，主张从现实的经验出发，改善当前的不平等状态，使我们在享受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让每个人都能享受更加平等和富裕的生活。

对皮凯蒂理论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讨论，但是，他的立场和方法对新自由主义教条盛器其上的时代是有积极意义的。皮凯蒂事业的成功不是出于侥幸，而是他的理论切合了当今人们既对“1%”的世界不满，又不愿意选择传

统社会主义的人的需要。

作者：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历史起源、 分配调节和未来展望^①

——评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

王 丰 薛俊强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阵痛还未缓解，欧洲债务危机的“并发症”就突然爆发，并快速蔓延至资本主义其他“有机体”，西方世界经历着经济、社会、政治恢复与重建的煎熬。资本主义国家努力创造的经济复苏局面，本质上是富人财富的恢复和财富的集中。“1%的富人拥有99%的财富”^②，正是2011年美国纽约曼哈顿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缘由。社会财富向少数富有的社会精英阶层高度集中的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重新成为舆论的焦点。而法国经济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的出版更将这一焦点问题推向公共辩论的中心。《21世纪资本论》放弃了当代主流经济学运用计量与模型分析经济问题的技术处理工具，回归到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脉络，注重经济思想的发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社会理想观当代境遇及其价值意蕴研究”（12CZX013）阶段性成果。

② 《我们厌倦了华尔街的贪婪》，新华网，2011年9月20日，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1-09/20/c_131148583.htm

现，运用历史分析工具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历史数据，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铁律”：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存在着“收入与财富分配将愈加不平等”的内在倾向。

一、对传统财富分配观的质疑与分歧

自由主义学派的传统，强调的是“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市场的自发调节总能解决一切问题，包括财富分配问题。因此，在他们看来，政府无需干涉市场，只需做好再分配，就能实现经济公平。而现实是，作为西方经济学主流的自由经济理论，通过重税和高福利实现的物质幸福，被欧债危机的风暴一卷而空，理论实践终究归于失败。

与此同时，沿着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财富分配问题的研究思路，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自亚当·斯密以来，关于社会分配的讨论，成为了解18世纪以来财富和收入分配演变的思想素材和数据来源。托马斯·马尔萨斯认为，人口过剩是影响财富合理分配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当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大卫·李嘉图则进一步指出，人口和产出的增加，相应地，土地会愈加稀缺，土地价格和租金上涨，土地所有者收入份额越来越大，其他阶层收入份额减少。在19世纪初，李嘉图很难洞察到技术进步的作用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不可避免的犯了和马尔萨斯同样的错误，未曾想到人类会从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来。半个世纪后，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农田价格下降、食物供养问题缓解，而迅猛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成为典型特征。马克思认为，工业产出与规模的不断扩大，源于资本逐利性的推动。工业发展与资本本性进一步衍生出信用资本，并不断扩张。最终，资本将不可逆转地通过积聚和集中而被一小部分人所掌握。另一方面，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趋于降低也导致资本积累，使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会逐渐增长。因此，政治稳定和经济均衡终将打破，没有限制的资本积累，必然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边界，资本主义必将灭亡。

现代资产经济学家常常质疑马克思的研究和理论，尽管他们并没有理解马克思。和过去的结论一样，他们仍旧指望依靠纯粹的经济力量来实现普遍的和谐或公正；在资料佐证上，他们缺乏收集足够广的历史数据，不能较好地理解“收入分配”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趋势。只有通过收集、比较各区域历史事

实和样本，才能对影响分配的机制和趋势有更清晰的认识。

怀着对马克思理论的质疑，以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局限性与狭隘，皮凯蒂更加重视通过历史分析来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经济规律。同时，他还从不同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对社会的描述中还原出不同时代财富分配的方式和状况。^①皮凯蒂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与马克思主义、自由经济学派的观点完全不同。他认为：“资本收益率可能永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这是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候的情况，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来还会是这样。”^②

二、财富分配的“核心矛盾”与资本主义经济“铁律”

20世纪4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描绘出一条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它反映了贫富差距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贫富差距不断增加；当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点时，贫富差距达到最大；人均收入越过这一水平，贫富差距便逐渐缩小。这就是劳资双赢的“良性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自身就能解决收入不平等。皮凯蒂颠覆了“库兹涅茨曲线”，强调收入不平等并非倒U型，而是U型曲线，收入不平等随着经济增长，在经历了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稳定后又开始恶化。

皮凯蒂通过分析一战以后的经济数据，证实了自己的结论。1914年之前，各类经济体是非常不平等的。1910年，占总人口10%的上层阶级^③攫取了超过总收入45%的份额，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平等局面未曾衰退。1914年到1950年之间的战争给资本、税收、国有化和通胀带来了物理性毁灭；这期间又经历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它通过资本损失和破产消灭了财富。然而资本随时随地都能重建，资本所有者也接二连三的成功。从20世纪70年代起，财富与收入之比的增长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增加，资本集中程度又回到战前水平。

到21世纪，这一趋势将会强化，资本主义具有导致财富和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的倾向。皮凯蒂在其著作中运用了大量历史数据来支持他的上述结论，他认为，资本回报率（ r ）往往高于经济的增长率（ g ）。在大多数时间，

①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 Belknap Press, 2014, p2.

②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 Belknap Press, 2014, p463.

③ 皮凯蒂将人口分为三个阶层，10%的上层阶级，40%的中产阶级，50%的下层阶级。

大多数国家里，最富有的 10% 的人拥有绝大多数资本，由于资本所有权的集中，结果便是日益增长的收入不平等。他称 $r > g$ 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财富分配的长期动态结果正潜伏着危机。”^① 据皮凯蒂测算，当前资本年均回报率为 4%—5%，而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1.5%，^② 不平等已然加快了脚步。

近半个世纪，全球化潮流风起云涌。全球化也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全球一体化，这有益于资本主义基因里的“所得差异化”在全球范围内固化和强化。因此，资本本性，不论是社会内部，还是全球范围，收入不平等现象都在不断扩散。（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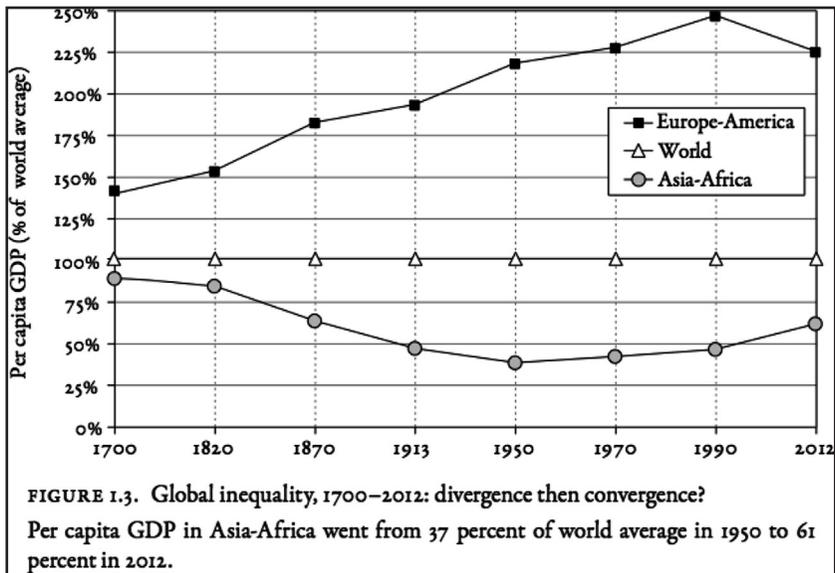


图 1 1700—2012 年收入不平等状况^③

注释：图中坐标，纵轴表示人均 GDP（各地区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占比），横轴表示时间。坐标轴中，上、中、下三条曲线分别代表欧洲—美国、世界平均、亚洲—非洲的人均 GDP 水平。曲线表明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两大区域间的收入不平衡有所收敛，但皮凯蒂认为，“这种追赶还远未结束”，“预测何时会结束也会言之过早”。

①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 Belknap Press, 2014, p571.

②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 Belknap Press, 2014, p54.

③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 Belknap Press, 2014, p61

1. 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铁律”

正如《21世纪资本论》的书名，皮凯蒂的主要论点是关于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中资本所带来的恶性影响。他提供了一个解释资本积累导致不平等日益增长的分析框架，涉及两大定律。资本主义的第一定律通过解释资本收入份额的变动来解释资本积累及其不平等结果，其内容是，资本收入份额（ α ）等于资本回报率（ γ ）乘以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 β ），用公式表示为： $\alpha = \gamma \times \beta$ 。其中，资本回报率总体上是稳定的；而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则出现了规律性变化。1700年到1910年，这一比例高达600%—700%；1914—1945年，因为战争和大萧条，其下降到200%—300%；而近30年，欧美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该比例又上升到500%—600%，且还在不断上升。按照资本回报率稳定在4%—5%计算，资本收入份额从1975年的大约20%增加到2012年的25%—30%。研究皮凯蒂的第一定律，结合他所要阐述的观点，可以得到更准确的表达式，即 $\beta = \alpha / \gamma$ 。数学上，两个表达式是等价的，但是它们表示不同的函数关系。第二个式子，可以说明资本价值由它的产出决定。皮凯蒂在书中举例说明，如果巴黎一套价值100万欧元的公寓，每年的租金为3万欧元，而公寓所有权的长期回报率（资本回报率）为4%，应用第二个表达式所计的公寓市场价值只有75万欧元（ $3/4\% = 75$ ）。因此，可以预期，这套公寓的年租金会上涨至4万欧元。“巴黎一套公寓价值100万……每月租金略高于2500欧元，或者每年租金30000欧元，资本回报率只有3%/年……这种类型的租金往往回上涨，直到资本回报率达到4%左右……因此，这个租户的租金在未来可能会上升”。^①

这里，之所以强调经过变换的表达式 $\beta = \alpha / \gamma$ ，在于 $\alpha = \gamma \times \beta$ 引出的三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首先， β 隐含有国民收入或总财富的货币价值概念。皮凯蒂所指的资本包括了各种形式的财富，如土地。事实上，资本和货币财富是不同的概念。资本是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商品的异化集合。而这种“资本”根本不会出现在经济学的生产模型中。财富和资本概念的混淆，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资本所有者必须决定投资于何类资本，然后决定如何最好的利用资本来获取报酬。只有这样，才能使资本具有价值。其次，皮凯蒂所说的资本回报率，是总体回报率；然而，不同地区的不同资本具有不同的回报率。

^①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 Belknap Press, 2014, p54

即使以总体的形式出现，较大的资本也能赚得更多，这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运用何种类型资本的个人决策，是否能决定资本的生产力和回报，现在并不清楚。这反过来指向第三个问题。按照皮凯蒂的说法，较高的资本回报率不是由于各种不同的资本商品的生产效率提供的，而是资本家本身的富有。资本家越富有，他拥有的资本回报率越高。换句话说，因为资本家有 β ，所以他们得到 α 。但是，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所能赚取的或者产生的收入，以及资本所有者的有效利用程度。

2. 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铁律”

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提供了大量数据和多种解释来说明20世纪的经济增长率出奇的高，以及21世纪的经济增长率会相对降低。最后，他强调，21世纪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经济增长率的放缓。皮凯蒂提出的第二个基本定律是，长期看，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趋于接近国民储蓄率 (s) 和经济增长率 (g) 之比。

更具经验性的第二定律，用公式表示为 $\beta = s/g$ 。假设储蓄率（即国民总收入减去包括政府支出在内的国民消费，再去除折旧）为8%（大致为美国的水平），经济增长率2%。那么，财富将提高到年产出的400%；如果经济增长率降为1%，预期的财富将拉升至GDP的800%。无论这个定律成立与否，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增长率下降会推动财富集中度的提高，资本所有权进一步集中。皮凯蒂指出，近30年，美国人口中最富裕的1%的人所有资本量从占总资本的10%上升到20%；同时，遗产继承强化了这一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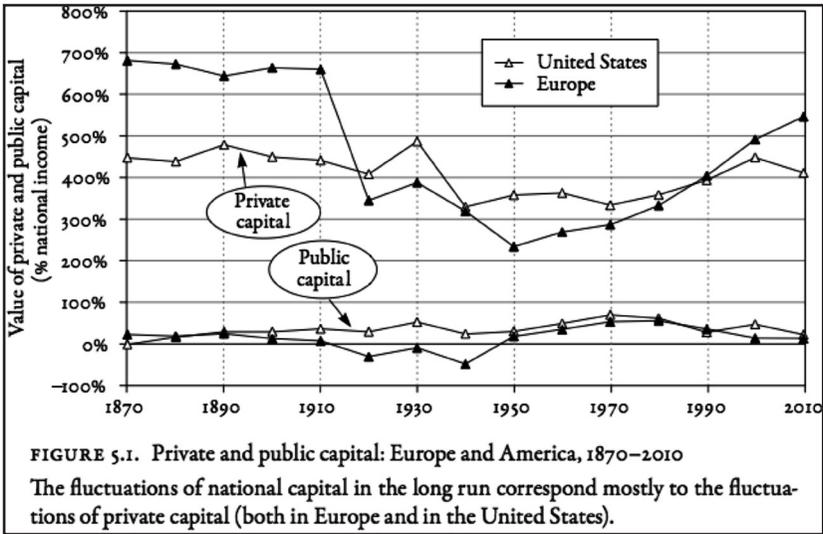


图2 欧美私人资本、公共资本与国民收入占比情况^①

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提及资本与收入比（ β ）会上升。对于上升的原因，皮凯蒂运用第二个定律，说明 s/g 数值越大，资本与收入之比越高。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技术进步和创新脚步在放缓，经济增长率（ g ）会下降，储蓄率（ s ）又不改变，因此，资本与收入之比不断提高。不过这一状况仅仅在短期稳态情形下才能成立，即储蓄率不变。长期看，由于第一定律提出资本收入份额有上升趋势，这意味着储蓄率在下降，因为折旧与资本存量存在正比例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资本的逐利性促进投资增加，资本存量必然上涨，当上涨到一定程度，折旧便会吞噬储蓄毛额，甚至使储蓄率降为零。

基于资本主义内生的两大基本定律，皮凯蒂推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将出现严重问题，资本存量不断提高，资本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在提高，而财富分配不公平日趋严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食利阶层正在重构，其财富比例已回归至“一战”前水平，一个符合民主、公平理念的政治结构与市场经济渐行渐远，因此，必须采取极端的措施加以解决。

① 图中可见，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私人资本再次出现集中趋势，参见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 Belknap Press, 2014, p165

三、重建财富平等分配的措施

皮凯蒂声称，两大基本定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铁律”，应当采取一些制度性改革的手段才能抑制两大定律所驱动的不平等。就长远来看，应当构建“社会国家”，形成一整套、一系列改革措施，变革和完善资本主义；就当前来看，应进行税制改革。

1. 构建社会国家

社会国家是将整个社会纳入资本与国家的控制体系，工厂、组织与社会合而为一，也就是以国家为主导全面性规训社会的形成。皮凯蒂建议增加他所谓的涉及“社会国家”方面的支出，包括医疗保险、教育和养老保险支出。这有助于“社会国家”的形成与扩展，有助于提高每个人的福利。这个支出建议在逻辑上，与其税收政策是相分割的，并非是对资本分析的一种衍生探讨，只是皮凯蒂希望国家在这些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治理不平等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除了激进的财税政策和附带谈及的民生支出，应采取一些渐进的、积极的和更有效的措施。如国家对整体公共资源更公平合理的配置、经济组织有关利润分配机制的检讨完善等都有助于收入分配整体性改革的措施。

2. 改革税收制度

在皮凯蒂看来，财富的日益集中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问题确实至关重要。他开出的药方就是在全全球范围内征收资本累进税（对最大的财富，每年的征税标准，在开始时是其价值的0.1%，最高可达到10%）加上高额累进所得税。皮凯蒂所建议的税收制度，针对的是处于收入顶层的富裕阶级，目的是为了降低他们的收入。他设计了一个对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50%—60%超额累进所得税。另外，他还建议对收入超过50万美元（包括50万美元）的收入实施80%的惩罚性税率。“80%的税率适用于每年50—100万美元的收入，这样就会很快实现大幅度减少这个阶层收入的目标，同时并不会大量增加政府的收入”。^① 执行全面的、高额的、超额累进税，“主要目的不是给社会国家提供资

^① 皮凯蒂认为政府的效率是低下的，因此，他不赞成过多增加政府的收入。引自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 Belknap Press, 2014, p513.

金，而是调节资本主义”。^①皮凯蒂认为，财富和收入税将不会降低经济增长。政府应当在监督和税收方面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资本税应当是在全球范围征收，至少也必须是欧盟地区，以防止资本外逃至低税率区域。

皮凯蒂提出的补救措施，源于他认为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根植于资本主义，而不是政府政策的过失。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则从公共选择理论出发，强调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政策、技术和市场力量直接作用的结果。寻租、规制俘虏和其他错误的政府政策会导致不平等。因此，有学者认为，皮凯蒂的税制设计难以有效避免政府寻租和企业规制俘虏所产生的不平等。^②

四、托马斯·皮凯蒂的学术贡献与商榷之处

《21世纪资本论》这部有关收入和分配的著作，其英文版自2014年3月出版以来，在美国获得了空前的关注。多年来，美国人并未将贫富差距当作一个重要问题，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华尔街的穷奢极欲让美国人陷入了贫富悬殊和收入再分配的激辩之中。这部著作因其主要观点——财富的日益集中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属性；作为接近此问题的回应，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征税——吸引了美国人的注意。该书在学术上有诸多贡献，堪称杰作。但是，如果把它当作行动指南，则又有缺陷。

1. 该书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深度上的特色

第一，经济现象的综合分析和研究视角的独特性。该书打破了经济学中的模型化和数理化崇拜的误区，试图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多学科分析方法来分析财富不平等这一经济现象的发生及其本质。同时，该书关于历史数据的运用也颇具特色。该书首次利用税务数据（如利用房地产税收收入来分析财富继承问题）来衡量不平等，皮凯蒂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了收入和财富在过去300年间的演变，特别是在欧美的演变，并推导出以下结论：从1914年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一历史异常期，资本收入份额、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以及收入不平等程度，都出现了大幅下降。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财富差距、收入差距和由此导致的不平等，又返回到“一战”前的水平。

^①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 Belknap Press, 2014, p518.

^② Randall G. Holcombe.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J]. *Public Choice*, 2014 (160), p551-557.

可以预见，这些统计数据中可能存在着混乱之处，但这项工作已经改变了人们对资本历史的理解，观点新颖、结论发人深思。例如，在皮凯蒂的这项研究之前，法国人知晓他们的遗产价值占年均国民收入的比例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不到 5% 上升到了如今的 15% 左右，接近 19 世纪巅峰值 25% 吗？可见，无论是在经济思想上，还是在经验研究方面，该著作的经济学贡献都是值得称赞的。

第二，关于资本主义理论分析的机制。皮凯蒂关于资本主义内在运行机制的剖析，为财富收入的分配及其流向，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他的核心观点是：资本回报率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趋势，即资本所有权和财富将日益集中。一个例外是，发生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遏制了这一趋势，降低了资本回报、阻止了资本集中。随后，资本很快得以恢复，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力再次迅速提高、人口快速增加，从而推动了不平等的增长。最后，皮凯蒂强调，如果没有这两个相反的作用力，资本集中的趋势将更加明显，并更容易固化和强化，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为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放缓。

第三，关于全球资本累进税的提出。因为资本和财富的集中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为了遏制这个趋势，皮凯蒂首次提出了在增加国内超额累进所得税的基础上，再征收全球资本累进税。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提高资本和收入的税收会影响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皮凯蒂则坚持自己的观点，并重点关注对富人的征税。但这是否是确保社会和谐、繁荣的主要方式，有待商榷。

2. 理论上的商榷

皮凯蒂的著作，在发达资本主义阵营里引起的争辩是不容忽视的。左派为之推崇，保守派为之恼怒。可见，其观点本身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第一，关于财富与资本的概念。该书缺乏对财富和资本概念的区分。财富的概念是广泛的，既包括财产性的资本，如房屋、股票，也包括消费性的使用价值，如各类商品。资本一般是参与生产和分配过程各类生产要素。贫富差距的扩大，其表现形式是财产性资本（股权、房屋等）差距过大，内在原因是个体掌握资本的多少和有效使用资本的能力大小。因此在解决不平等的措施上，应当培育每个个体运用资本的能力，减小个体能力的差异，同时遏制财产性资本差距过大。按照这一思路，征收全球资本累进税就过于简单了。

第二，关于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作为该书的核心观点， $r > g$ 这一论点遭到多方质疑，质疑的理由来自传统理论的解释。如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是

趋于下降的，或者是因为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资本的回报应当随着集中而下降。有学者研究指出，随着财富的累积，回报出现快速的下降，其下降速度足以让资本所有者的资本收入份额不会再有增加。我们暂且抛开用传统理论来论证该观点的正确性，仅仅从这一论点本身出发，也会发现这只是一种预期。这种预期是建立在过去基础上的一种推断，是否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固有模式，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根据他的假设，在财富量增加的情况下，资本回报率也不会下降，这种假设当然有可能是正确的，但它未必能称之为“铁律”。

第三，关于税收政策。皮凯蒂赞成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征税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而这一措施遭到广泛的批评。在经济上，如前所说，他未考虑到财富和资本的区别，而事实上，应重点对消费性财富资本征税，培育底层个体的资本利用能力。同时，他在书里也没有分析该措施对技术进步和企业生产的负面影响及应对策略。他把注意力放在了增加富人税负、降低富人收入之上。而富人收入减少，并不意味着穷人收入的增加，皮凯蒂恰恰忽视了增加穷人的收入。在政治上，这一措施过于简单，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实施的。

皮凯蒂将书名取为《21世纪资本论》，意在向马克思的《资本论》致敬。正如他所说的：“他（马克思）以一个重要问题开始（关于工业革命期间空前的资本积累），然后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现代经济学家都应该以他为榜样并从中获得启发。”^①但是其理论结论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方面，他不承认资本利润率下降的结论；另一方面，他又挑战主流自由经济学派的观点，不相信财富增加、资本回报减少。他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自身滋生着不平等。因此，皮凯蒂被定义为“左派”，他的观点被看作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或许也是该著作成为畅销书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该著作的成功及其所引发的广泛讨论很快就会引导大家转向收入不平等研究。在中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加剧、追求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历史条件下，《21世纪资本论》所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作者：经济学博士，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哲学博士，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① [法]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访 谈

黑格尔、马克思、斯特劳斯主义与现代性问题

——罗伯特·皮平教授访谈录^①

张双利

一、黑格尔哲学与现代性问题

(一) 黑格尔哲学与理性自由

1989年您推出了力作《黑格尔的观念论：自我意识的满足》(Hegel's Idealism: the Satisfactions of Self-Consciousness)，该著一出版即在国际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为你在其中提出了一种对黑格尔哲学的全新解读，它与学界长期流行的对黑格尔哲学的传统解读颇为不同。此次您作为复旦光华人

^① 2013年，美国著名哲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哲学系教授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应邀到复旦大学做光华人文基金高端讲座，讲座共5场，主题分别为：“黑格尔论‘在思想中把握时代’”、“黑格尔与批判理论——论霍耐特的黑格尔主义”、“麦金太尔的现代性：论第三种选择”、“海德格尔论尼采关于虚无主义的思想”、“美丽之后：黑格尔与视觉现代主义哲学”。

在讲座期间，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张双利副教授对他进行了深度访谈，此访谈对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思想背景以及当代西方思想变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刊载此文。文中的黑体字段落为张双利副教授的提问，其他为罗伯特·皮平教授的回答。

文杰出学者访问复旦，特地以“德国哲学和现代性问题”为题做了一系列演讲。透过该系列演讲我们更可以清楚地看到，长期以来您的核心关注是：在当今晚期现代性的条件之下，我们为什么依然要采取黑格尔主义的立场以及怎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对您对黑格尔哲学的独特解读有基本的了解。我知道，您在对黑格尔哲学进行解读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它与康德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它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维度，以及行动的逻辑（the action of logic）在其中的核心地位。您能否借此机会跟大家简单地勾勒一下您心目中的黑格尔哲学？

这个问题刚好与我本人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历程的早期、中期和晚期相对应。在早期阶段，我写作了《黑格尔的观念论：自我意识的满足》，着重阐发了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我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是自柏拉图以来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他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极端重要，这是一个以往所有的哲学家们都未曾提出过的问题：为什么迄今为止，我们在哲学的领域未曾有任何重大的进展？康德清醒地看到，与科学相比较，哲学的状况令人尴尬，自伽利略、笛卡尔、莱布尼兹、牛顿等伟大科学家以来，近代科学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式的进步，但哲学的状况却刚好相反。在哲学史上曾有如此众多的天才在努力，但他们却都没能使我们在哲学的领域内取得类似的“进步”。针对这一问题，康德提出要对我们进行哲学思考的那种能力本身进行批判，即对我们的理性进行考察和批判。康德于1781年推出了《纯粹理性批判》。该著在哲学史上是一部具有分水岭意义的经典著作，以它为界，之前的哲学和之后的哲学有了根本的改变。在该著中康德明确指出，我们的理性认识能力在无任何外在帮助的情况下无法达到对事情的本性的认识。这也就是说，我们的认识总是需要有来自于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以外的内容。没有这些内容，我们实际上无法达到认识。更进一步说，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凭借自己的理性认识能力来把握那超越了人的感性经验的“真正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哲学带来了之前的整个形而上学传统的终结。它终结了以笛卡尔、莱布尼兹、斯宾诺莎等人为代表的近代形而上学。笛卡尔认为，理性可以达到对实体的充分认识（思想的实体、广延的实体和神圣的实体）；莱布尼兹认为，理性可以达到对由单子所构成的现实的充分认识；斯宾诺莎认为，理性可以达到对内在于那一个无限的实体中的所有现实的认识。

回到黑格尔的哲学，当时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些对黑格尔哲学的权威的、

传统的解读都彻底忽视了康德所做出的这一重要贡献。他们在对黑格尔哲学进行解读的时候，就好像黑格尔根本不顾或根本不懂康德所做的努力，直接又重新回到了笛卡尔、莱布尼兹、斯宾诺莎等人所代表的形而上学传统。当时有很多人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所关注的依然是那个无限的实体，只是这个实体是非物质性的。与斯宾诺莎所说的那个保持永恒同一的实体不同，黑格尔所说的这个非物质性的实体是在时间中不断变化的，它在人的自我意识中获得关于自己的表达。但我认为这种解读显然是错误的，这样的一种解读要想能够成立，其前提只能是黑格尔是一位拙劣的哲学家，他根本就不懂康德对理性批判的真正意义。但这显然不是事实，我们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能够找到许多段落，这些段落表明黑格尔完全领会了康德的意图，他是一位后康德的哲学家。例如：黑格尔曾经这样说过：康德使我们彻底走出了那种观念，该观念把精神（mind）、灵魂（soul）等看作是某种东西（a thing）。

我的这种观点极容易引起争论，人们会认为我忽视了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重要区别。实际上我同时强调在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差别。康德认为我们只能认识到现实是如何通过我们的感官向我们显现的，我们永远都无法达到对现实本身（reality in itself）的认识。黑格尔则认为，为我们所认识到的现实就是所有的现实，康德实际上没有理由进一步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所谓的现实本身。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黑格尔那里现实本身不是所谓的非物质性的灵魂和永恒的上帝。人们也许还会说，你把黑格尔完全解读成了康德，你认为我们只能达到那些精神的范畴（categories），这些范畴赋予现实以结构，但我们却无法达到现实本身，只能达到精神（mind）。实际上，我要强调的是，黑格尔认为这些范畴就是关于现实的范畴（the categories of the real）。概括地说，我早期阶段的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黑格尔是一位后康德的哲学家，他的哲学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他虽然有理论哲学，但这已经根本不是像笛卡尔、莱布尼兹、斯宾诺莎等人那样的形而上学。

如果这种理解是正确的，它就必然会影响到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即我们究竟该怎样理解人的行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经典的哲学问题，它所涉及到的是人的行为（human act）与纯粹的事件（event）之间的根本区别。借用维特根斯坦所举的例子，即，“我举起胳膊”（我的一个行为）和“我的胳膊举起来了”（一个纯粹的事件）之间的区别。用眼前的例子来说，就是“我举起杯子喝酒”（我的一个行为）和“我感冒了”（只是一个事件，我并没有做什

么)之间的区别。根据传统的解释,人的行为是由一个内在的精神的原因(我的意图)所导致的我的身体的运动。但如果我上述的对于黑格尔的理解是对的,这种解释就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黑格尔认为我们根本无法达到那些所谓的内在的精神的事件,它作为原因决定着人的外在的行动。为了把这一思想阐述清楚,我在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方面推出了另一本专著,即《黑格尔的实践哲学》,主要论述黑格尔的实践哲学。在这本著作中,我着力阐发黑格尔关于人的行动的思想。最概括地说,黑格尔认为在人的行动中,没有所谓的内在的意图与外在的行动上的表现之间的二分,或者说,我们不可能把内在的意图与外在的行动上的表现真正区分开来。具体来说就是,你的确可以构想出各种行动意图,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人说他一定要怎样,或一定不会怎样。但实际上在真正被实现为人的行动之前,你并不知道这些所谓的意图是否真的就是你的行动的意图。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看到,行动实际上与人们所构想的那些行动的意图完全不相一致。所以,黑格尔认为意图与人的行动之间不是所谓的内在与外在、原因与结果的关系,而是一种辩证的关联。这就是我在对黑格尔的研究历程中所达到的第三步,它的关注重心在于黑格尔的行动理论。

在这两部著作之间,还有一个中间的阶段。在这一中间阶段,我关注的是黑格尔哲学的另一个方面。我一直认为,在近代哲学史上,黑格尔是第一个对近代哲学传统本身的原则进行理论化的哲学家。这个原则就是人的自由。我在这一阶段的研究集中地体现在《唯心主义作为现代主义:黑格尔主义的变体》一书中。该著是一本论文集,共20余篇文章,通过这些文章我试图把黑格尔的哲学置于整个近代思想的学术地理中来进行考察。我们知道,康德认为他发现了德国哲学所说的“绝对”(“不可估量的价值”),即,人的自由。这就是说,没有任何其他的价值会高于人的自由。

对于黑格尔来说,现代性是关于自由和自由的实现的故事。他指出,人在行动的时候总是同时隐约知道自己为什么现在会在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人总是同时隐约地知道自己的行动是有理由的,是可以解释的。解释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的理性。但在通常情况下,人的理由总是很快就会穷尽,往往是在真正达到对自己的行动的充分解释之前就已经穷尽了理由。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很像苏格拉底,他使自由与我们真正理解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的能力内在相关。在这种内在的关联中,我们要达到的不是导致人的行动的内在原因,因为真正理解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意味着对于你自己的反思、呈现和表达。

我认为德国观念论的唯一贡献就在于它在理性（rationality）和自由之间建立起了这种关联。落实到对人的自由的理解，这一关联意味着自由的三方面规定性。首先，自由意味着不受外在的阻碍；其次，自由还意味着你的决定没有受到外在的宣传、意识形态等等的影响和扭曲，即，人的决定是建立在未受扭曲的反思的基础上的；最后，即使上述的两个条件都已经满足，自由也还要求有一个社会的世界为它提供客观的基础，即，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世界中，还要有那些社会机制，它们事实上允许我们去我们自由决定要做的事情。我认为黑格尔的这些关于自由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型，让我们去理解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在《唯心主义作为现代主义》这本书中，我力图说明我们怎样可以利用黑格尔的这个模型一方面去理解和评判一系列当代哲学家的思想（从尼采到斯特劳森等），另一方面去理解各种社会制度和社会实践（如艺术）。它也为我的下一步研究，即对黑格尔实践哲学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在《黑格尔的实践哲学》一书中，我进一步阐发了黑格尔对人的行动的不同模型的思考。

先简单地总结一下：黑格尔不认为哲学是关于某种特殊的对象（灵魂、精神、观念、宇宙、无限等等）的。相反，他认为哲学所思考的是这个普通的世界和它的可理解性。它所涉及到的问题是，为了能够弄懂在生活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使之对于我们来说有意义），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原则。比如说，我们怎样才能读懂人的行动、读懂政治，甚至是弄懂人的思想本身？

这些问题又都涉及到我现在正在进行的一项新的研究，或许这也是我关于黑格尔哲学的最后一项大的研究，它主要集中于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处理的问题恰好就是关于我们怎样才能弄懂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它涉及到在一定的语境中（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一定的历史时期）我们能够给出的关于我们的生活的最根本的理由是什么等许多层次的问题。黑格尔认为，要真正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需要解释我们在生活中是怎样给出所有那些不同层次的解释的，即需要对这些解释本身进行解释。为此他在《逻辑学》中建立起了所有这些不同解释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些解释是相互关联的，并不是互不协调的，它们最终可以在同一个体系中得到理解。我本人并不认为它们最终是可以在一个体系中得到说明的。

所以，我眼中的黑格尔总结起来一共是三点：首先，他不是“神学家”，他所关心的对象不是上帝而是我们。其次，他是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家，他对现

代性的最本质的价值（即，自由）进行了充分地阐发。最后，他的哲学还能更进一步地帮助我们理解究竟何所谓理解一件事情。最后这一点使他能够很好地证明自己前两方面立场的合理性。所以，我眼中的黑格尔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是一位伟大的现代思想家。他既不是一个关于实体的形而上学家，也不相信历史是命定的。

关于历史，人们一直对黑格尔的哲学有一种重要的误解，以为黑格尔相信历史必须以某种方式展开，因为上帝必然地要以这种方式在历史中启示自身。我坚决反对这种观点，我认为黑格尔真正要说明的是，历史对于我们所具有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当我们回首迄今为止的所有历史过程时，能够从这一过程中领会出来的那些意义。最简单地讲，黑格尔的历史叙事是，在最初，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即国王是自由的，后来有一些人是自由的，即贵族们也是自由的，最后，在现代所有人都是自由的。怎样理解这个历史叙事？黑格尔并不是说有某种背后的东西在决定着历史只能这样展开。他的意思是，站在历史的今天，当我们回溯整个历史过程，我们体会到历史是可以这样被理解的。再比如说，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持续了一万年之久的劳动分工方式，即以性别为基础的分工的终结。对于黑格尔来说，这绝对不可能是因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现了某种关于劳动分工的隐秘真理，而是说，此时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以性别为基础的劳动分工已经无法再被证明为是合理的。我们不可能在另一个历史条件之下，去“发现”这个真理。

很多人认为，黑格尔把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一切都证明为合理的。这种观点并不正确，黑格尔没有为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一切辩护。真正重要的是，他对于历史的最基本的进步性有很好的领会。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历史已经是世界历史，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实际上已很难再有严格的东方和西方之分，坐在上海的这家咖啡馆内，你完全有可能感觉自己就好像是身处在纽约或南法国的某个城市。所以，黑格尔所说的那些在现代性条件下得到实现的价值现在要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被实现。历史的这个过程与艺术的发展史内在相关，我最近的一本著作将集中研究黑格尔关于艺术的思想。整本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艺术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从古埃及艺术到古希腊艺术、中世纪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再到浪漫主义的艺术）如何是具有意义的。也就是说，艺术史不简单地只是一种艺术形式接着另一种艺术形式相继出现，在艺术史中人们所经历的是那同一个实现和认识自由的过程。该过程在艺术作品中得到了本质性

的展开，这种展开对于人们达到关于自由的自我意识是必不可少的。

（二）黑格尔的法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

非常感谢您能用如此精炼的语言为我们勾勒出了您心中的黑格尔的思想形象。您刚才系，第二本着重阐发黑格尔关于自由的思想，第三本则集中地论述黑格尔关于行动的理论。我想再请您特别地谈一谈您的第二本代表作，在该著中您明确提出黑格尔是关于现代（modern time）的哲学家，他在哲学上对现代世界的原则（自由的原则）进行了充分的阐发。也正因如此，学界一直认为您特别注重黑格尔的实践哲学。但与此同时，我也知道您对于黑格尔实践哲学的具体内容持明确的批判态度，尤其是对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于现代伦理世界的内在结构的思考。您总是强调，黑格尔对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判断是错误的，它们之间实际上无法保持一种内在的平衡关系。那么，如何才能把您对黑格尔实践哲学的这两方面判断内在地统一起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关于黑格尔的实践哲学，我要强调的是，他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即关于人的自由的问题，但他所给出的关于这个最根本的问题的答案却是仓促的。他对于现代社会中的各个不同维度持过于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些不同的维度能够给出关于人的自由问题的答案。比如，我刚才提到了黑格尔对于自由的三方面内涵的区分：自由首先意味着不遭受外在的阻碍；自由同时还意味着反思自由，即你能够自主地做出自己的决定，你的决定不受到大众媒体、意识形态宣传等的扭曲；最后，自由还意味着客观的社会自由，即实际存在着那些现实的可能性，使你的决定能够得到具体的实现。关于自由的实现，黑格尔从这些角度所提出来问题都是正确的。黑格尔正确地看到，第一重意义上的自由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中被落实为“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即以权利为基础的关于正义的主张。每个人都声称拥有受法律保护的、在自己的特定的领域之内的行动自由。黑格尔认为，这样的一种关于自由的观念并不是错误的，但却是抽象的、有限的。美国的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就是该意义上的自由，这种关于自由的概念是极其有限的。在这个传统中，人们只强调每个人在法定的自己的领域之内有行动的自由，但却不追问人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才会注重那些自己现在所特别注重的价值。所以，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中紧接着还有第2个部分，他称之为“道德”。这个部分所关注的是内在的反思自由。反思自由强调你的决定是在真正的自主的意义上做出的，不受到外界的有害的影响，没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对你的决定施加影

响。在这之后是第三个部分，即伦理生活。这部分所关注的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之下，有哪些机制（institutions）能够使前两重意义上的自由被具体实现。比如，你必须能够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你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必须有公共领域，有出版社等各种重要的机构，必须有国家等等。正是在这个部分，黑格尔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判断。

首先是关于“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的错误判断。黑格尔当时看到“民族国家”正在形成，但他实际上对“民族国家”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对于“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持过于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国家最终可以不再需要通过人们对民族的忠诚来维系，这一判断显然有问题，在整个 20 世纪我们看到的是“民族国家”持续存在。当然，你可以说美国是一个例外，美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我们有拉美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等等。但美国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她经历了严重的南北战争，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问题。所以，很难说美国已经成功地建构起了一个“非民族国家”（non-nation-state）。但即使承认美国是一个例外，“民族国家”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也还持续存在。

其次是对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持一种实在是过于乐观的态度。黑格尔认为，国家只是一个内在于市民社会中的、对市民社会进行规范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经济发展进行规范和控制。如果没有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这种关系，结果就会是灾难性的：市民社会中的人们会因为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而分化，在市民社会中就永远不会形成那样一个视角，沿着这个视角人们可以作为共同体中的公民来想问题。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又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没能同时守住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两个领域。

第三是对性别的实际涵义的错误理解。黑格尔认为，在核心家庭的内部应该有以性别为基础的角色划分。他认为男性的任务是参与公共的事物，女性的任务是照顾家庭。他在这一点上是完全错误的。

最后是对一些现在已经不再存在的社会机制的错误判断，例如“职业团体”（corporation）。黑格尔主张，人们不是以单个的公民的身份来进行选举，而是以团体的方式来进行选举，选票分别分配给不同的职业团体，如农民、工人、教师、公务员等。这一点又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是继续追问黑格尔所提出来的那些问题。我认为，他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他没有错误地把自由的不同领域分离开来，认为自由只是在这个或那个领域中就能实现，而是强调它们是互为补充

的。我们不仅要继续追问这些问题，还要能够给出关于现代社会中那些机制的历史性的、和现象学意义上的说明，以分析哪些机制对于实现这种自由的概念是极其必要的。当今实际上已有很多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例如霍耐特，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学者在做同样的努力。但问题是，他们目前所给出的说明都太过抽象，不能令人满意。

举个例子来说，自柏拉图一直到黑格尔，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一直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它也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问题。但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具体问题却未能提出什么新的想法，未能真正回应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新的挑战。自19世纪以来，我们的公共教育体制就没再经历过什么真正的变化，但在教育中我们却不断遭遇新问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我们立即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色情图片和色情网站的问题。在互联网上，孩子们每天都在遇到这些图片，它对于孩子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会对以后的两性关系产生怎样的重要影响？我们应该怎样来应对这个问题？法兰克福学派有一批学者正在沿着这个方向进行努力，他们试图对社会上所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方面进行分析和考察。但直到现在，我们对于这些具体的问题所能够贡献的思想还是极其有限。在关于互联网的这个问题上，最直接的回答就是尽量地避免，尽量杜绝孩子们接触这些图片和网站。但对于互联网所提出的这些新问题，不是简单地“控制”或“杜绝”就能够解决的。

在今天，我们如果要做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就必须重新思考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之下，市民社会的首要含义是全球化了金融资本主义经济。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是经济的“自律”，它似乎完全由自身所决定，彻底不受政治力量的控制和管理。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政治结构，但无论你具有怎样的政治结构，其结果依然是经济发展一定不受政治的控制。例如在美国，2007年就是因为有一批人无力偿还房贷，就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一步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所有这些都说明，经济似乎已经完全超出了政治的控制，它成为了不受人们控制的“怪兽”。可以说，这是一个“非政治化”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对于公共问题的共同思考、对于共同做出的决策的执行）在今天似乎都已经不再可能。无论那些政治精英们对于经济发展持怎样的批判态度，他们对于它都无能为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经济化”的现实，经济方面的考虑已经介入和主导了所有的公共话语。在今天当你去讨论大学教育的问题时，你绝不

可能排除掉对学生的就业市场的考虑。面对着这样的现实，我们还有没有进行抵抗的可能？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抵抗形式？我本人还没有看到。

关于市民社会和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您刚才提出了一种相当悲观的看法。那么，您对这种悲观的观点是否还是有些保留的呢？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在现代伦理生活的建构方面实际上面临着更加困难、更加复杂的局面。如果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已经彻底陷入了悲观主义的局面，那么中国的问题就更难解决了。

关于美国的情况，的确它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金融危机之后，你可以提出很多解决办法，如对金融市场进行理性的监管，改变收入的不公正，完善合理的税收制度等等。但这样一些想法实际上根本无法得到落实。危机导致了恐慌，带来了一种社会病症（social pathology），在这种社会病症之下人们对未来充满了焦虑，总觉得必须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来改变现状。结果就有一批持疯狂想法的人被成功地选进国会（在2010年的选举中，大概有50—60位这样的候选人被选进国会）。它直接导致美国的政府体系的正常运行被彻底阻挡，现在的美国政府没有办法做任何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事情。当然，你可以自我宽慰地说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本来就是周期性的，每30至50年会有一次经济大崩溃，中国也会像美国一样面临这样的问题，一般来说经过了3至5年危机之后，经济就会重新恢复增长。但是，现在的局面是经济危机已经持续了近10年，我们却还丝毫没有看到它得到解决希望。所以，美国实际上也是一样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刚才所提到的那些在思想上对现代社会的规范性秩序进行重构的努力，它们之所以最终都还停留在很抽象的水平上，是否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就没有出现什么新的可能性？或者说，他们在理论上的困境并不是由于理论本身，而是由于现代性条件下现实生活本身已经陷入了困境？

对，实际情况的确是这样。或者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问，即这样的一些理论在对资本主义的把握方面，究竟忽视了资本主义哪些方面的深刻内容？我们也可以同样的方式来反思马克思的理论贡献。在黑格尔之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直至20世纪20年代，他的这些批判被证明都是正确的，当时的资本主义的确正在面临着彻底崩溃的危险。但重要的是，面临崩溃的资本主义并没有由于危机而走向社会主义，而是直接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产生。这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时候，忽视了其中

某个重要的方面。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们试图揭示出这个环节。他们的主要想法是，无产阶级之所以没有成为革命阶级，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了心理的层次，它通过制造消费者的心理而阻断了无产者们上升为革命阶级的可能。因此，他们要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改变，用心理分析等环节来代替阶级分析。但他们自身也陷入了类似的错误。在关于反抗的可能性方面，阿多诺最终所给出的是一条极度抽象的道路：现代主义的艺术。他把艺术看作是我们可以进行抵抗的唯一领域。这显然是抽象的。马尔库塞把希望寄托在那些边缘群体（失业者、黑人、女性等等）之上，这些边缘性群体还没有被吸收进生产消费的循环中。但是，这些边缘群体同样也无法成为革命的主体，他们最终只能陷入分裂，无法实现真正的团结。所以，回头来看我们发现，在对现代伦理世界具体出路的把握上，黑格尔、马克思、阿多诺、马尔库塞都错了。至于正确的出路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现在依然处于黑格尔马克思的环节上。一方面是黑格尔对现代伦理社会内在结构的正面阐发和积极肯定；另一方面是马克思对它的尖锐批判，指出这样的结构最终必将崩溃。我们现在就停留在这样的两极之间？

关于马克思，我认为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些伦理批判是依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例如他对于异化的批判，对于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和对于物化的批判。至于“科学的”马克思，我并不认为其还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走向未来的趋势的那些科学的分析，现在看来都已经失去了预见的能力。

（三）现代性危机与黑格尔主义的艺术哲学

如果我们沿着这个方向进行思考，就会自然地关联到您的另一个研究领域，即艺术哲学。透过对于市民社会和现代国家之间关系的考察，您一方面对现代伦理世界的前景持相当悲观的态度。另一方面您又一直坚持认为现代性依然是我们应当坚守的事业。在您的系列演讲中，您明确地指出我们依然应当对于现代艺术和文学等葆有浓厚的哲学兴趣，因为正是在这些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直面现代世界的问题，可以去进一步反思这些问题的真实涵义和可能的解决道路。

的确像你所说的这样。在我本人对黑格尔的研究过程中，我一般每连续研究5至10年以后，就会暂时停一停，转而去研究尼采和海德格尔。之所以

要这样做是因为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哲学刚好是对黑格尔哲学的直接批判和否定，它们代表着否定的、批判的和悲观主义的方面。但我一直认为，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批判并不能使人们在根本上不再认同理性社会的目标，不再认同自由、公正、平等的理念。我是从罗蒂那里学到这一点的。罗蒂告诉我们，你可以像那些后现代主义者持悲观主义的态度，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为无意义的任意流动，但你却不能否认一些最基本的信条，比如人要能满足温饱，不能为了一些人的利益而使另一些人遭受痛苦等等。我认为学生们之所以会被那些极端的批判彻底吸引，是因为他们忽视了蕴含在现代事业中的一些最简单的伦理渴望。尼采认为这些最简单的伦理渴望只是资产阶级的奴隶的道德，但人们渴望能够过上安全的和平的生活，这并不卑鄙，也不丑陋。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与一些斯特劳斯主义者有分歧，同样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会去研究好莱坞电影。

最近，我正在做很多关于 NICOLAS RAY 的电影的研究。这些电影讲述的往往都是关于美国家庭的故事，它们涉及到家庭和移民等很多问题。透过这些电影，我们会看到人们关于现代生活的那些最基本的渴望（家庭起初建立在父母之间的浪漫爱情的基础上，家庭的成员之间有浓浓的亲情，这样的家庭在社会中能够有不错的前景等等）是真实的、无可厚非的。也就是说，黑格尔所提到的那些最基本的现代价值依然值得我们去追求，追求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关于这一点，我在德国时曾与一位德国学生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我有过多年在德国生活的经历，我对德国生活所留下的最重要的印象是，德国人真的有关于“共同的善”（common good）的概念。这也就是说，德国人真的能够从他们纳税中得到回报。他们能够得到很好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免费的教育、便利的公共交通设施等等。在这一点上，德国与美国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很认真地跟这位德国学生说，我很赞赏你们德国人在这方面的传统。没想到这位德国学生给我的回答竟是，这只是一种“顺从主义”（conformism）。我对这位德国学生说，你现在 30 多岁，从小到大你一直免费享受着世界先进水平的教育，你从来不需为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担忧，你享受着最便利的公共交通设施，你的孩子们也会和你一样享受免费教育，你丝毫不需为所有这些担忧，如果你认为这意味着“顺从主义”，我倒是很愿意能把这样的“顺从主义”带一点回美国。回到主题，我要强调的是黑格尔渴望人的自由的实现，这一点直到现在依然值得肯定，他所提出的那些现代性的基本价值依然需要我们

坚守。

是否正是因为上述的这个原因，您才主张我们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之下依然可以做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虽然您曾经直接受到斯特劳斯主义者们的影响，也对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充满兴趣，但在根本立场上您与他们都还保持着距离。

确实如此。我认为，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些概念，他所阐发的那些范畴，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生活，分析今天的政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关于自由的复杂概念。黑格尔关于自由的概念远比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要复杂，比康德的自由概念要更加富有内容，比20世纪社会主义的自由概念要更加辩证、更加注意内在的平衡。它为我们去思考那些最高的集体价值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去思考艺术、政治、大众文化等很多重要的问题。

您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还有一个突出的亮点，那就是特别重视对艺术哲学的研究。在此次的系列演讲中，您从黑格尔哲学出发对现代主义艺术进行了精彩的分析，这样的研究恰恰是在当今中国学界少有的。我还注意到，您不仅对绘画艺术有专门研究，而且对于文学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在您看来，这样的研究（艺术哲学、哲学与文学）具有怎样的独特意义？如果说，您要回答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今天怎样做一个黑格尔主义者，那么对艺术和文学的研究对于我们具体回答这个问题会有怎样的帮助？

关于艺术，黑格尔的最核心范畴是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不是美、快感、对理念的表象、对神圣的表象等。艺术是我们达到自我知识的一种集体性努力。因此，通过艺术作品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这是从黑格尔哲学角度给出的一个最简单回答。具体来说，我们对生活中的那些规范（我们在生活中真实地把它们认作价值，认为值得为之做出牺牲）无法直接给出定义。这些规范包括正直、勇敢、诚实等等，我们无法对它们以下判断的方式进行直接的定义。它们是所谓的“厚概念”（thick conceptions），既不能直接定义，也不是不可定义的。我们必须通过观看它们如何活生生地发挥作用，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我们要在小说、戏剧、电影、绘画等艺术中才能直接看到这些规范是怎样鲜活地存在于我们生活之中。在哲学命题中，我们则无法看到这些。比如，我曾经专门写过一本关于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小说的著作（《亨利·詹姆斯与现代道德生活》）。詹姆斯笔下的人物都是世故的、聪明的，他们

生活于一个古典道德结构正在瓦解的世界。在欧洲，传统的贵族等级制及其所代表的价值正在衰落，被来自美国的金钱所瓦解；在美国，金钱又带来了新的危机，人们试图从金钱中得出更多的东西，试图用金钱来“买”威望、“买”人与人之间的新的等级关系。詹姆斯笔下最好的人物都试图在这种传统的评价体系已经崩溃的条件之下来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所有这些都极富启发意义，它能够生动地向我们呈现现代道德生活是怎样实际展开的，而这是哲学所不能做到的。

如果说詹姆斯的小说所刻画的是现代道德价值如何在生活中以活生生的方式被实现，那么现代主义绘画所表达的似乎更多的是它们的崩溃。您怎样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詹姆斯小说中也有道德价值的崩溃。但从黑格尔主义的角度看，崩溃并不仅仅是崩溃，它意味着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正在失去，意味着它正在力求以新的形式达到自己的真理。所以，在这里也还存在着一个肯定的环节。在现代主义绘画中，我们看到的是对现代性条件下的艺术作品的可理解性的挑战，但这种挑战本身同时也是对其可理解性的渴望。在这一点上，我的见解与福柯不同。福柯在论及马奈（Manet）等人的绘画时，指出在马奈的画作中我们所看到的是正在消退的关于主体性的证据。这种见解太过片面，因为我们可以体会到问题的存在，这本身就表明实际的情况要更加辩证。这些画作并不仅仅是关于“不在场”，因为“不在场”总是指向“在场”的“不在场”。在这些艺术作品中会有更多的内涵，不仅仅是“崩溃”。

根据您的对现代主义艺术的解读，其中不仅包含着否定的环节，而且也同时包含着肯定的环节。那么，我们又该怎样理解那些当代的艺术呢？这些艺术试图打破传统的关于艺术和非艺术的划分。

我的回答是同样的。那就是，虽然这些当代艺术家们试图打破艺术和非艺术之间的区分，但他们实际上并没能成功做到这一点。也许听起来显得有些教条主义，但我认为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区分并没有被取消。这里所涉及到的一个深刻问题是，有没有所谓的“坏的艺术”（bad art）？我认为只有非艺术（non-art），没有所谓的“坏的艺术”。就好像我不认为纳粹的法律是一种“坏的法律”一样，那根本就不是法律。要成为艺术，就必须要达到一定程度的成就。在我看来，当代艺术家的那些作品（包括概念艺术）还不是艺术。

关于现代的艺术，为什么您会把关注重心放在视觉艺术（绘画、电影等）

上，而不是在音乐上？音乐在现代是一种最重要的艺术形式，您这样做是否有什么特殊的考虑？

原因很简单，就是我本人在音乐方面没有什么天赋。另外，音乐也是一个最难研究的领域，大多数的音乐评论都只停留于技术性的分析，很少有关于音乐的人文主义评论。如果要论及现代主义音乐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与诗歌、绘画、建筑等其他形式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轨迹十分类似。也就是说，它也经历了一个朝向“绝对的音乐”（absolute music）的发展过程。正像在现代主义绘画中，人们越来越强调绘画的意义不在于是关于什么的表象，而是绘画本身，在音乐中也有类似的倾向。此时，重要的不是关于什么的表达，旋律、和弦等等都不再重要，人们所关注的是声音本身。

二、斯特劳斯主义与现代性问题

（一）两种斯特劳斯主义

还有一个问题，它与斯特劳斯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关。我们注意到，现在互联网上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刘小枫，他是最早把斯特劳斯的思想介绍到中国学界的学者。争论的另一方是邓晓芒，他是康德的三大批判的中文译者。争论由刘小枫关于“新国父论”（毛泽东是真正的国父）的演讲引起。在这场争论中，一方代表着自由主义立场，另一方代表着斯特劳斯主义立场。自由主义一方指责斯特劳斯主义一方保守，斯特劳斯主义则指责自由主义一方迷信启蒙，缺乏对启蒙的内在困境的自觉。因为您本人与斯特劳斯思想传统之间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所以我们想听听您对于这样的争论的看法。

问题是一直有两种不同的斯特劳斯主义，在美国它们分别被称为东海岸的斯特劳斯主义和西海岸的斯特劳斯主义。据我的有限了解，中国所接受的斯特劳斯主义更像西海岸的斯特劳斯主义。东海岸的斯特劳斯主义认为，斯特劳斯关于现代化过程的真正焦虑在于，现代消费社会和自由民主制使我们更难继续和守护哲学的生活，而哲学的生活在他看来是一种最重要的人的生活。对于东海岸的斯特劳斯主义者来说，斯特劳斯所真正关注的政治问题只有一个，他并不关注传统的政治问题，如权利、正义等等，他只关注哲学的处境。他的政治哲学的重点只在于考虑为了让哲学（或哲学的生活）在这个现代社会

中依然是可能的，政治生活中究竟有哪些方面是极其重要的？斯特劳斯所关注的问题是，在这个现代消费社会（晚期现代理性社会）中，人们是如此执迷于用理性的能力来控制一切的可能性，以至于最终把这当作是唯一的价值，彻底去除掉了对其他方式的生活的考虑，最终只限于科学理性所看重的那种生活。西海岸的斯特劳斯主义者则主张，斯特劳斯所关注的是一种特定形式的制度（regime），这种制度不仅使哲学的生活成为可能，而且它还能够促进生活于其中的所有人在性格上的提升。他们主张，斯特劳斯已经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那就是现代社会中人变得越来越粗俗、平庸，越来越满足于对低级欲望，甚至除了这些低级的欲望之外已经不再知道还有什么高级的生命。我认为这一点只与斯特劳斯对幸福的理解有关，并不就是他的哲学的核心。实际上，斯特劳斯也没法在哲学上找到关于这一趋势的解决办法。所以对于斯特劳斯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怎样使哲学的生活在现代社会依然可能。

当你主张必须展开对启蒙本身的批判，必须重新赋予古典意义上的德性以生命的时候，你只是在谈一种非常肤浅的斯特劳斯主义。斯特劳斯远比这要更加复杂、更加智慧。当他在谈宗教等问题的时候，他真正关注的是关于哲学的政治，他关注的是怎样使一种真正的人的卓越（human excellence）在社会中得到支撑、得到培育等等。而那种强调要对现代性本身展开彻底批判的斯特劳斯主义则更加是电视版本（或大众媒体版本）的斯特劳斯主义，他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声称来表明自己是德性的，与他们相比，普通的民众只是“末人”。我们如果回溯历史就可以看到，这实际上是19世纪晚期贵族的天主教右翼经常使用的说法。而且，在贵族天主教右翼对启蒙的批判和激进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它们的批判实际上是沿着同一个方向展开的。所以如果激进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曾经在中国产生过影响，那么来自于右翼的对启蒙的批判自然也就很容易被接受。根据激进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启蒙的真正实现工具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结果是对人的贬低、物化，人则被下降为物。所有这些都和右翼对启蒙的批判都正相呼应。

这里还需要提到一点，那就是斯特劳斯本人的思想实际上是与基督教立场不相融的。你如果去读他关于马基雅维里的著作（《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就会发现，他常常以肯定的态度来引用马基雅维里的相关论述，在这些论述中马基雅维里表达了他对于正在转变为基督教性质的社会的担心。马基雅维里认为，任何社会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确保自己的命运。具体来说，对当时的

佛罗伦萨来讲，就是要避免其被他国（法国）侵略、占领，或在经济上被操纵。这是任何一个社会的首要关注。而基督徒们所关注的则是来世、或上帝。因此，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有大量的基督徒公民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你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斯特劳斯同意马基雅维里的观点。他对马基雅维里的那些引用都明确地表明，他认为政治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基督教。

要避免对斯特劳斯思想做肤浅理解（即以西海岸的斯特劳斯主义者为代表的理解），我们就必须去更进一步地体会斯特劳斯对待古典世界的态度的复杂性。与激进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比较，我们看到斯特劳斯在对现代性危机进行批判的同时，的确还提到关于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的古典理解对于我们在今天所遇到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相关性。也正因如此，随着斯特劳斯思想被介绍进中国学界并逐渐产生影响，很多中国学者都反复强调，古今之争是摆在现代人面前的最根本的哲学问题。针对这一思想状况，如果我们顺着东海岸斯特劳斯主义者的思路，认为斯特劳斯所真正关注的只是在晚期现代理性社会中“哲学的生活”所遇到的困难，那么他为什么要强调关于自然正当的古典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来回应这一现实困境呢？

斯特劳斯所说的对自然正当的古典理解是指，存在着这样一种生活，根据自然本性，它对于人类来说是最好的生活。这就像我们可以说有一种生活对狼来说是最好的生活（成群地捕猎、生活在适宜的领域、有合适的猎物等等）。对于人来说，这种生活是哲学生活。所有其他形式的生活都不如哲学生活那么好。但说其他形式的生活不是“最好”的生活，并不意味着它们“根本不是好的”生活。斯特劳斯在《自然权利和历史》（或译作《自然正当和历史》）中，以两段来自《旧约》的文字开篇，这两段文字都不涉及到哲学。通过对这两段文字的引用，斯特劳斯是要表明，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地方也存在着一些其他形式的生活，它们按照自然本性来说就是坏的。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被人们最广泛地接受的一种立场是否认这个关于有一种最好的生活和存在着那些按照自然本性来说是错误的行为和实践的主张。这就是“价值多元主义”的立场，它主张没有一种最好的生活，而是存在着很多不同种类的分别适合于各种不同的人的生活，这些人应该自己来决定究竟确立什么样的人生目标。同时也还有很多人相信，哲学的思考根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anything）在自然本性上就是有价值的或好的。价值多元主义和这种相对主义都完全有可能是错误的。斯特劳斯对于它们的挑战是我们开始去质疑这

两种假定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您在前面的访谈中曾经提到，在对待现代性事业的根本态度上，您与斯特劳斯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尽管您非常看重他对现代性危机的思考。您能否借此机会简单地谈谈你们两人的立场在这一点上的主要差别？

斯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批判以他对自然的诉求为基础，他诉诸于什么在自然本性上是正确的。与斯特劳斯不同，我不认为我们能够形成一种对自然的融贯一致的站得住脚的解释，这种解释可以承担起斯特劳斯想让它承担的那个重要功能。在我看来，斯特劳斯有些时候好像是在说：如果我们不能以自然正当为基础，那么我们会遇到危机，一场价值的危机，甚至是虚无主义。因此，我们必须以自然正当为基础。但这个结论并不能被必然得出。我们能够得出的所有结论只是，这样一种标准可能会是（would be）解决危机的道路。该结论不是说它就是（is）解决危机的道路。而且，斯特劳斯也从来没有认真地处理和反驳过康德的哲学，我认为，恰恰是康德在哲学上做出了最多的努力，表明我们根本不可能回到古代的关于自然的观念。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斯特劳斯所提出的挑战可以被简单地置之不理。它可以激发起我们对那些基本预设（比如，“文化多元主义”）的思考，这些预设经常被人们非反思地、简单地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二）知识分子与公共领域

透过这场争论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专业的学者一旦越出学术领域，开始就公共领域的话题发表意见时，他们的观点就会有某种扭曲。您是否可以结合着美国和欧洲的情况，谈一谈专业学者是否可以越界进入公共领域？以及这样的学者进入公共领域一般会引发哪些问题？

这里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当你在公共领域中发表意见的时候，你只能作为公共领域中的一个成员来发表自己的见解，你不能诉诸自己在学术上的权威来进行讨论。那实际上是一个计谋，最终是为了赢取你在公共领域中的话语主导权。举例来说，在公共领域中进行对话时，你不能简单地批判对方不了解相关的学术背景，根本就不理解这件事情。这样的说法只有在学术领域中才有效。这里还涉及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学者们又总是试图在公共领域内产生影响。之所以这样原因主要有两个：名声和金钱。谁都想能够写出一本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能在社会上畅销的著作。一旦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学者就会成为社会名流。也可以说，很多学者更想进入的不是公共领域，而是社会名流

圈。目前最成功的哲学名流可能要数齐泽克了，他当然也想做一个严肃的学者，但他更在乎娱乐受众。

但是，如果是在德国、法国、北欧，你完全有可能同时既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又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这方面的最好的例子当然是哈贝马斯。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是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但与此同时，他也不断地撰写文章，就很多公共领域的问题（如欧盟、德国的过去等等）发表意见。他是德国社会的良知，现在依然是德国社会中最重要声音。在法国也完全有这样的可能。在法国社会中，哲学文化已经很好地融进了它的公共领域，你完全能够在电视等大众媒体上直接地诉诸哲学资源来讨论一些现实问题。

我不知道中国社会将朝哪个方向发展，如果是朝哈贝马斯所代表的方向发展，那当然是极好的。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学者，一方面能够在学术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做出很好的区分，另一方面又绝没有通过进入公共领域来获得名声的考虑。德国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法国、挪威和丹麦等国家也有类似的环境。但美国社会的情况却不尽如此。美国社会的公共领域中所展开的讨论往往是水平很低的，就好像是中西部报纸的编者按。在整个公共领域中，大概只有《纽约书评》是水平较高的，但《纽约书评》在公众中的影响非常有限，远远不像德国的 DIE ZEIT 等报纸。欧洲的这些报纸都是一流的城市报纸，水平很高，在公众中的影响很大。在美国也有一些学者为《纽约书评》撰写文章，但《纽约书评》所影响的人群实在是太过小众，它甚至不能算真正属于公共领域，而只是学术领域中的一个独特领域。回过头来看中国社会，我只能说中国社会可能朝着这两个方向中任何一个发展，当然最好是朝着德国社会的方向发展。它意味着你们会有一批受人尊敬的学者，他们不仅深深地理解学术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区分，而且能够极出色地同时承担起在这两个领域中的责任。

书 评

新社会的曙光

——读胡迪斯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概念》

孙秀丽

[摘要] 彼得·胡迪斯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概念》是在资本主义面临严重危机的背景下重思马克思思想资源的佳作。他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以马克思的整体思想发展为根据，系统探讨马克思对非资本主义的社会替代形式的分析，展现马克思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解放理论及其意义。在作者看来，新社会并非乌托邦的想象，而是一种现实，这种现实并非自发地出现的，而是内含在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现实中。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是一种批判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解放理论。该书出版后引起广泛注意，2013年《国际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电子期刊发表三篇书评，从不同方面讨论了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本文试图从该专题讨论入手，结合原著对胡迪斯著作中涉及的辩证法理论基础、资本主义异化批判以及新社会具体特征三个核心问题进行分析，挖掘其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内涵。

[关键词] 马克思 资本主义 替代概念 专题讨论会 新社会

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

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①

—马克思

面对全球化背景下日益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及全球正义运动的出现，越来越多的思想家试图重新挖掘马克思思想，以理解和批判这个资本已然肆虐的时代。但是，以往人们对马克思思想的关注往往重视其对资本主义的具体批判，相对忽视其对未来新社会的探讨，这不仅给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带来理论的困境，而且也为社会主义实践带来严重的现实灾难。彼得·胡迪斯（Peter Hudis）的新书《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概念》主张从总体上考察马克思的著作，而他的切入点即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替代概念。在他看来，由于MEGA2的出版，这样一种整体研究不仅已经成为可能，而且在当前现实条件下也是一项紧迫且有意义的任务。

胡迪斯是美国欧克顿社区学院人文与哲学教授，已经出版了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而且是《罗莎·卢森堡全集》的总编。他曾担任由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创者杜娜叶夫斯卡娅^②创办的报纸《新闻与通信》的负责人^③，并与凯文·安德森共同编辑出版《否定的力量：杜娜叶夫斯卡娅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选集》等著作^④，一直致力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胡迪斯说：“我有一个更谦虚的目的，即带着它去考察马克思的著作，去考察其所包含的关于未来非异化社会的潜在或明显的分析。”^⑤如书名所示，胡迪斯致力于探究马克思关于一种可能的新社会的讨论，从总体上分析马克思的著作，试图揭示出马克思关于该问题的整体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② 杜娜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 1910—1987）：俄裔美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曾担任托洛斯基的秘书，后与之决裂，著有“革命三书”：《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8）、《哲学与革命》（1973）以及《罗莎·卢森堡，妇女解放和马克思的革命哲学》（1982）。

③ 参见【美】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傅小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文序。

④ Raya Dunayevskaya, *The Power of Negativity: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Dialectic in Hegel and Marx*,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Peter Hudis and Kevin B. Anderson, Lexington Books, 2002.

⑤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2, p.5.

络，系统阐述人类的解放思想。

关于马克思是否有一个后资本主义的社会替代概念以及他是如何讨论的，一个流行的看法是，由于马克思批判乌托邦主义者并谴责对某种未来的蓝图的创造，所以他不仅不愿意沉浸在对未来的预测之中，而且由于马克思相信，新的社会是从资本社会内在矛盾中自发的产生出来，对此问题的探讨也就成了多余的了。但在胡迪斯看来，无论是历史的现实情境还是对马克思著作的整体而言，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讨论都十分必要。首先，就总体性而言，探究未来社会的旨趣贯穿了马克思的整个思想脉络，并且是讨论其他问题的基础；其次，未来社会并非自发出现的，这种规范性的探讨作为一种思想的精神劳作隐含着新社会的现实可能性。作者在“导言”指出，本书的研究是由四条思想线索构成的：首先系统地考察了贯穿马克思著作的关于超越价值生产和后资本主义未来轮廓的诸多评论和建议；其次是基于对替代概念的潜在理解来考察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内容分析；第三是讨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最后是对符合马克思解放理想的具体的社会形式的考察。

此书出版后引起较大关注，2013年，国际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协会为此召开了专题讨论会，卢登赫弗（Karel Ludenhoff）、科托尼卡（Marija Krtolica）和帕森斯（Dale Parsons）提供了三篇论文^①，从不同角度阐述胡迪斯著作的核心内容及其意义。笔者在本文中以上述论文为基础，将从作为其理论基础和方法的辩证法、基于替代概念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特征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以呈现胡迪斯论著的思想贡献。



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并且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关键，尤其是对辩证法问题进行探讨的关键。胡迪斯继承了杜娜叶夫斯卡娅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她不仅强调辩证法的否定的革命意义，而且认为它也是讨论资本主义替代概念的重要理论基础。在“导论”中，胡迪斯

^① <http://www.internationalmarxisthumanist.org/articles/marx-alternative-capitalism-review-symposium-karel-ludenhoff-marija-krtolica-dale-parsons>. 三篇文章分别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替代形式的长途冒险》、《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概念〉》和《评彼得·胡迪斯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概念〉》。

提到，马克思终其一生受惠于黑格尔的辩证哲学，而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绝对”（absolute）是最重要的概念，它指向的是消除矛盾和对立的社会和解状态，离开了“绝对”概念就不能完全把握和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同样，资本主义的替代概念也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内容，离开了马克思对后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设想，也不能把握他的辩证法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如果资本主义的替代概念对理解马克思辩证法是如此重要，反过来也意味着辩证法对思考资本主义的替代概念同样重要。实际上，两者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

但是，并非所有马克思的研究者都意识到这一点，胡迪斯在著作中批判性地分析了两种错误的观念，一种是客观主义，一种是主观主义。客观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将资本理解为一股自发的以其自身形式存在的力量，其完全同化了人类主体的意志和行为”；主观主义或自治主义（autonomist）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最重要的贡献是其对与资本霸权做斗争的人类主观力量的理解。他们强调的不是资本的自我决定和自动的特征而是它重复遭遇的局限和障碍”^①。在胡迪斯看来，这两种马克思主义都无法对马克思的替代概念做出合理的解释。前者注重黑格尔《逻辑学》与马克思《资本论》的内在关联，并将资本仅仅视为知识的对象。他们区分资本的逻辑与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并认为在资本的辩证法中，故事的讲述者是资本而非人类。这在胡迪斯看来，无论将资本逻辑的核心看作市场和私有财产，还是看作劳动的社会形式，是把辩证法理解为历史辩证法，还是理解为系统辩证法，都会对马克思思想产生误解，因为它取消了现代社会中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后者致力于描述反抗资本逻辑的主体反抗形式，它主要从政治而非单纯经济的视角看待马克思，并将资本看作是一种回应性而非自发的力量，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就是如此，它拒绝接受资本逻辑学派对经济范畴的客观主义阐释，强调任何经济范畴本质都是政治范畴，经济关系都是阶级斗争关系。但是，在胡迪斯看来，此学派与其批判的对立面一样陷入资本自我扩张的自主性，因为它将未来的非异化社会的到来看作产生于自发的主体反抗之中，而没有试图设想未来社会组织模式的劳动中介，没有很好地把握资本主义的替代概念。

①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2, p.9.

为了克服上述两者的片面性，胡迪斯回到杜娜叶夫斯卡娅那里寻求一种总体的辩证法。在胡迪斯看来，杜氏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有着独特理解：首先，她不接受将黑格尔假定为唯心主义者而将马克思认作唯物主义者的简单化看法，而是认为黑格尔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的维度，而在马克思那里也有唯心主义的成分；其次，她认为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概念并没有取消特殊性和偶然性，因此，黑格尔的概念逻辑不能还原为资本的抽象逻辑；第三，她认为，黑格尔《逻辑学》最后一章的“绝对理念”对阐明马克思的新社会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杜氏认为，辩证法的核心是“否定之否定”，而这一原则构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阐述资本的超越及其替代的方法论基础。基于上述思考，杜氏认为，我们时代的现实需要直接回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以谋划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她否认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代表了为现实进行辩护的历史终结论，而是指向尚未到来的未来。这些都构成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积极联系的条件。

当然，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存在着重要的区别。黑格尔辩证法的主体是思想，而《资本论》的主体是抵抗资本吸入过程（process of suction）的劳动着的人；黑格尔没有将劳动者看作辩证过程的积极主体，他是通过绝对精神解决其辩证过程的矛盾的，正因为如此，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因诉诸超历史的力量而违背了自己的原则，而马克思解决黑格尔理论矛盾的努力使其将工人作为辩证过程的实际主体。

那么，马克思与黑格尔对辩证法的理解是否也影响到他们对资本主义替代概念的分析呢？答案是肯定的。胡迪斯除在文中论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运用黑格尔的范畴批判资本的逻辑，但关键在于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否定辩证法的继承已经蕴含着资本主义的替代概念：“对资本的分析 and 批判并非意味着一种纯粹的否定，其亦包含了关于积极的替代方案的潜在（有时是明显）的观念。”在胡迪斯看来，否定在黑格尔那里并非导致虚无，“否定之否定”蕴涵着积极的因素，包含着对异化的超越。而这种思想资源在胡迪斯看来，“给马克思任何一个严肃的学生提供了进一步的理由，以试图区别和分析伴随资本批判和定义现代社会其他社会形式的未来迹象。”^①与杜氏相

①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2, p.5.

同，胡迪斯也认为黑格尔的“绝对”并非意味着一种终结，它是一种历史可能性的展开。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看似是一种否定，但是其中蕴含着一种未来新社会的可能。

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关于辩证法的对话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绝对知识”一章的笔记，在这里，马克思“指出《精神现象学》结构的一个致命的缺陷在于辩证运动的主体包含在自我意识而非活着的男男女女中。”^① 马克思正是从这里超越黑格尔辩证法，并把它与自己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替代概念相关联。卢登赫弗在题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替代形式的长途冒险》的评论中开篇也提及胡迪斯在这一点上对杜娜叶夫斯卡娅关于辩证法的观点的继承：“马克思可以超越黑格尔辩证法不是通过否认后者是‘所有辩证法的来源’，而是主要因为他从这个来源处就开始跳到活着的主体（杜氏将其概念化为人类，大众），并将其视为变革现实的主体。”^② 作为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杜娜叶夫斯卡娅像以卢卡奇、科尔施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关注黑格尔与马克思思想之间深刻的、内在的关联。按照她的理解：“黑格尔所谓的‘绝对’，如果去除了包裹在上面的抽象，在一切时代都有适用性和意义，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尤其如此。尽管黑格尔追溯的是‘纯思想’的辩证法，但是‘绝对知识’‘绝对观念’‘绝对精神’的辩证法，并不仅限于思想过程，黑格尔也没有把他的哲学与现实的历史分割开来。思想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与之相应的现实世界的发展阶段。”^③ 杜娜叶夫斯卡娅把黑格尔的“绝对”看作是对未来的展望，而马克思则将黑格尔的“绝对”的辩证运动理解为现实主体的历史运动，而这种将哲学与革命连接的辩证法也是理解胡迪斯所述的马克思替代概念的关键，如杜所言：“当我们进入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分析时，我们会看到他的‘绝对’，即建立新社会的‘新激情和新力量。’”^④

①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2, p.66.

② See, Raya Dunayevskaya, *Luxemburg, Women's Liberation, and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 Champaign-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1, p.143.

③ 【美】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傅小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④ 【美】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傅小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卢登赫弗认为，胡迪斯的巨大成绩在于他将马克思核心概念的发展和存在与资本主义替代概念联系起。胡迪斯对杜氏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就其哲学方法而言，主要是从总体性的视角将马克思的著作用资本主义替代概念贯穿其中，而这一工作的基石正是黑格尔主义的否定辩证法。回到胡迪斯的主旨，马克思所探讨的未来新社会不是一种虚无飘渺的幻象，而是现实的创造性的历史进程本身。对一个真正的新社会而言，重要的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等客观因素，而且要求个体的发展等主观因素，这就需要一种革命的理论，需要从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中发现“新激情和新力量”。这一点也契合杜娜叶夫斯卡娅在《哲学与革命》中的理论目标。遗憾的是，胡迪斯在此书中对此并没有做出详尽阐述，而是将这种辩证方法置于对马克思著作的具体分析之上。

二

如上文所示，胡迪斯继承了杜娜叶夫斯卡娅的哲学传统，认为黑格尔曲解了把握现实的方式。这一点与卢卡奇的理解相似，即都认为黑格尔只是在理念层面把握了思想与现实的关系，而尚未寻找到真正的出路。同时他同意杜氏的观点，认为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隐藏着新社会潜在的激情和力量，接下来的问题是：马克思是如何基于资本主义的替代概念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

首先，这个问题涉及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规范前提。就一种批判的规范性思考而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替代概念基于他对自由概念的独特理解，这一视角乃是胡迪斯所说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在胡迪斯看来，通过对德国观念论的哲学发现来重新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把它纳入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形成和与之对抗的激进的工人阶级形成的时代背景之下，马克思对自由概念的理解是：“如果人类实践及其产品采取了一种自发的力量的形式，并且限制个体在其中表达其自然和后天习得的天赋和能力的范围，那么自由的发展是不可能的。”^① 基于对自由的革命人道主义理解，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人们不是在对象化中感到主体性力量的自我确证，而是感到受到物的控制和支配。基于同样的立场，马克思对

①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2, p.208.

价值、交换价值、金钱、商品生产和流通以及资本本身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异化的人类关系，所以，他将黑格尔的分析看作是一种“颠倒”。黑格尔虽然在理念层面对生活的各种精神样态进行了细致分析，但却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可以扬弃市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矛盾和对立。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分析的着眼点不同，他不是在意行秩序中寻找克服市民社会的力量，而是着眼于对物对人的统治所导致的人之自由的丧失进行批判，并主张对现实秩序进行改变。如果从人存在的总体性而言，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是异化的且尚未提供展现和发展其能力的条件，这代表着新社会出现的必要。这种对自由的理解在胡迪斯看来直接影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替代概念的分析。

其次，这个问题涉及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的批判性分析。如同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胡迪斯也认为要政治地解读马克思的经济学而非仅仅描述资本的逻辑，与自治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他将资本主义的替代概念作为其批判的规范基础，以此来确定自己的批判路径。胡迪斯认为：“未来的部分包含在马克思所仔细努力批判考察的现存的结构中”^①。基于对辩证法理解以及一种人道主义的基本立场，胡迪斯对马克思的整体著作进行了考察，并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细致地分析。理解资本主义替代概念离不开对资本主义本身的理解，而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因此，探讨如何超越价值生产对理解一个新的自由社会就显得至关重要。

卢登赫弗认为，马克思批判资本的重要方面是对抽象劳动的批判。无论是《巴黎手稿》还是《资本论》都提及资本主义条件下抽象劳动的异化，在这种劳动下，人和人的关系打上了物的烙印。在马克思那里，抽象劳动是商品生产的前提，商品的价值是由抽象劳动创造的，抽象劳动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事物的价值形态的基础，以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所有其他社会领域。胡迪斯指出，马克思首要的批判目标是异化的社会关系，只有超越这种异化劳动人类才能够实现自由。在胡迪斯看来，在资本主义批判领域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也存在着对话关系。黑格尔已经积极地把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特征之一，在黑格尔那里，劳动是在外化和超越外

①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2, p.211.

化的同一辩证过程中展开的人类创造性的自我表达，劳动不仅仅创造了满足人的自然需要的物品，而且也是人作为主体的自我塑造的“精神的”活动。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了黑格尔对劳动的积极理解，但是马克思也发现黑格尔只发现了异化劳动中的精神层面，没有发现异化劳动的真正主体。正因为如此，黑格尔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设想出对异化劳动的真正超越。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替代概念与抽象劳动概念相关联，这有助于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主体，并且将危机与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联系起来。

科托尼克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概念》的评论关注的核心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他在评论中对胡迪斯的思想进行了解释，也点明了他的思想所存在的不足。在他看来，胡迪斯正确地看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关注的不是交换过程而是生产过程。胡迪斯的重要创见是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黑格尔对知性思维的抽象性批判结合起来，使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具有丰富的哲学意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是批判以金钱为社会纽带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胡迪斯强调，正是在这个核心之点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为马克思提供了批判现实的哲学表达，即金钱的抽象价值反映的是更为根本的劳动的抽象过程，因此，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表达了居于资本主义核心的抽象经济过程。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不是其唯心主义的批判，而是对黑格尔忽视真正的经验主体的批判。在胡迪斯看来，在马克思那里，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的独有特征，其中价值和物质财富不同，它是以金钱形式计算的财富。价值表达的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关系，即一种物质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社会关系为价值增值的冲动所掌控，而无关乎人们的需要和能力。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当商品交换通过劳动力的商品化成为社会关系的首要且确实的普遍中介时，价值就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定义性法则。”^① 所以，分析生产劳动中的价值生产对批判资本主义来说尤为重要。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难以发现的，只有以资本主义的替代概念为批判的基础，才能帮助我们发现生产领域中的真正主体以及深入理解后资本主义社会。如杜娜叶夫斯卡娅所言，黑格尔在客观历史那里看到了世界精神的持续展现，而马克思将客观运动置于生产的过程

①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2, p.7.

之中。

如胡迪斯所强调的，取消私有财产和市场并非意味着取消价值生产，关键在于消除异化的人类关系。前面提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涉及到两次否定，就第一次否定而言，仅仅废除私人财产并不能充分地保障人的自由，重要的是需要在劳动本身中结束异化，结束这种以物的关系的形式存在的社会关系。而胡迪斯认为马克思的洞见在于“其从否定之否定的运动中发现了一个实际形成的免于异化的世界”^①，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概念的可能性不仅仅存在于集体所有权的实现，而其可能性更加体现在生产过程的否定中”。同样对待异化，黑格尔的解决方案是在绝对知识那里，而对马克思来说，黑格尔的“精神”只能是人类主体本身。马克思没有批判黑格尔的理念主义，他评估的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关系，并借助其辩证法分析新社会的可能。他对黑格尔的批判之处不在其理念主义而是其忽略了现实的经验主体。马克思意识到，在现代社会中人类活动的产品使得个体处于被奴役状态且限制了他的自由意志。自由不再是一个实现了的人类经验的主要特征。与卢卡奇将无产阶级的特殊的阶级立场作为其分析作为革命性主体的合理性不同，胡迪斯将重点放在以辩证法对资本的具体分析批判上。胡迪斯强调，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其替代社会并非一蹴而就，而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在后资本主义的替代社会，在取消了价值生产之后，劳动时间与劳动产品之间交换才失去异化的特征，获得透明性。但是，由于主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抽象统治，这就需要对这个颠倒的世界进行再颠倒，所以就需人类主体的意识介入。胡迪斯指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到，即使革命主体已经出现，对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全面理解也不会从群众中自发产生，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是艰苦的思想工作，这种思想工作虽然必须植根于压迫者的意识，但不能还原为受压迫者的意识。

科托尼卡认为，胡迪斯的研究弥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些被忽略的主题，尤其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起源和具体特征问题。胡迪斯提供了一种有助于探究资本的逻辑以及把握产生于其中的代替现存生产关系和交换方式的潜力的哲学。按上文所述，这种思想劳作是以资本主义的替代概念为规范性

^①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2, p.73.

基础的，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实的批判与马克思关注人类自由解放的人道主义立场紧密相连。一旦我们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是对其价值生产的批判，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清楚了，这就是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以及产生这种异化根源的抽象劳动和商品价值形式。如此一来，革命的工人阶级的任务首先就是在生产层面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为未来的非异化生活提供基础。

三

胡迪斯在导言中提及此书的第四条线索是马克思关于人类未来的解放理想，也即关于未来新社会的可能性。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呈现出什么样的解放理想及其具体的社会形式？未来的非异化社会与资本主义相比较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在杜娜叶夫斯卡娅那里，新的人类社会“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自由的个人发展着他们的全部先天的和后天的才智”^①。面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日益糟糕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作为国际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网站的主编，胡迪斯致力于探究新社会的解放内涵以指引现代的自由斗争。关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概念，胡迪斯在国际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组织（IMHO）的《宣言》中明确做了界定：“资本主义替代概念意味着结束价值生产、建立人道的生产模式，建立新的非国家形式的治理以及自由联合的人类关系。打破价值规律对真正的新社会的形成可能性而言是必要的条件，因为价值生产使得人类隶属于物并扭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②

在文中，胡迪斯不仅指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所暗示的新社会的可能性，也有明确提及马克思无论在《资本论》还是后期著作中对未来社会的潜在分析。相比其他两者，戴尔·帕森斯侧重针对马克思文本中几个重要概念去分析未来新社会的具体形式，并认为胡迪斯的著作很好地体现了杜娜叶夫斯卡娅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哲学遗产。

为分析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戴尔·帕森斯指出贯穿胡迪斯文本的关于新社会的规范理想立足于三个规范性原则：首先对早期马克思来说，其致力于一

① 【美】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傅小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② 参见 <http://www.internationalmarxisthumanist.org/about>。

种“人道主义”的康德式规范原则，“可能的情况下，对待你的同胞还有自己绝不是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①。这一点通过胡迪斯对自由观的分析很容易看到；原则之二是：“哲学地致力于发掘真实世界的内在理想，有助于预先决定和塑造马克思对一系列不同问题的方法”。^②在胡迪斯看来，马克思虽然未具体提出对未来社会的推测，但马克思的批判是与其资本主义替代概念为规范性原则的。只是与对资本主义的道德主义批判不同，马克思认为这种“理想”是内在于真实世界之中的，哲学的作用就在于揭示出这种真实的理念并有助于它的实现；第三个规范原则是“主客颠倒”原则，因为现代世界是一个主客颠倒的异化世界，它要求我们把颠倒的关系再颠倒过来，让人们重新占有自己实践的活动和成果，消除物对人的统治。胡迪斯的著作基于这样的信念，即哲学或者对真理的综合探究是政治行动的前提，如果我们不去把握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我们将会犯错，甚至产生有致命后果的灾难性错误。

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未来新社会的潜在分析。关于马克思对未来真正自由社会的设想，科托尼卡提到胡迪斯对时间的重新思考。胡迪斯认为，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不会被致力于物质生产的劳动时间所决定，而是受用来表达一个人情感和智力能力总体性的自由时间所控制”^③；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时间被理解为快速生产有用产品而被最有效的方式利用的物。讽刺的是，为节省时间，资本主义也复制和销售所谓的理想娱乐放松方式和舒缓方式，于是时间被商品化了。在新社会里，劳动时间长度会急剧下降，同时由于阶级区分以及社会统治的取消，其特征将会在质上有重大的改变。为抵制资本日益扩张的渴求，需要一种新的劳动类型以及人类活动。此时“时间实际上是人类的积极存在，其不仅仅衡量人类生活。它是人类发展的空间”^④。这是《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新社会的时间与自由关系的分析。

戴尔·帕森斯也明确分析这一点，即“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他援引

①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2, p.51.

②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2, p.39.

③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2, p.145.

④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2, p.146.

《哥达纲领批判》关于新社会的分析，这个文本被胡迪斯称为是马克思“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持久、最具体和最详细的讨论”^①。他指出，新社会的关键特征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标志的价值生产的取消，而非某种革命愿望的实现，人类时间将不会浪费在价值增值上面，而是放在提高自我发展上面。延续之前关于新社会的探讨，《哥达纲领批判》第一次明确提及马克思对新社会两个阶段的叙述。按胡迪斯的分析，新社会并非一蹴而就，而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且两者不是两个截然区分的阶段。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尚有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残余，某种程度的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此时价值生产以及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区分被取消，抽象统治的时间被替代了，为人类发展空间的时间成为新的劳动类型的基础，生产者在这里是受基于自己的实际能力而自由地组织活动的样式、形式以及内容支配，而非再受抽象标准的时间统治，而且劳动成为社会劳动总量的直接组成部分，不再存在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分离；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社会解放有了新的特征，人们不再受劳动时间衡量，劳动也不再成为生活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它成了人的自由的创造和活动本身。此时，人的劳动不仅克服了它与社会生产的矛盾，而且克服了劳动与个体的自我发展的分离，完全成为一种自足的目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和分配是基于个体需要和能力发展的总体而非平等的交换。在胡迪斯看来，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既是人类物质劳动及其组织形式的改变，也是社会关系和人自身的主体性的改变，它要求人们在物质活动和智力活动方面的重大转变，需要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需要新的个体性和“主观”上的发展。胡迪斯对马克思新社会的具体理解也离不开黑格尔辩证法的哲学基础。正如前所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隐含着马克思未来社会的潜能，在历史展开的时间向度里，劳动不再扮演一种异化的角色，人类越来越朝着一条自由解放的道路迈进。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思想有自己的特征，他并未给出关于未来社会具体的制度设计或一种规范模型，而将新社会的分析重点放在资本主义批判的具体讨论以及新社会的可能性分析上。综观全文，胡迪斯特别强调马克思思想的特殊重要之点是：“新社会产生于旧社会的孕育中”^②，这体现了马克思的人道

①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2, p.187.

②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2, p.213.

主义是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强调从旧世界的批判中发现新世界，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胡迪斯看来，“新社会内在地产生于由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提供的现存条件以及反对它们的社会斗争中”^①，他继承杜娜叶夫斯卡娅将自由的斗争与解放的哲学相统一的做法，强调“是”与“应当”并非对立的两端，而是后者寓于前者之中，也就是说，马克思不是外在于社会条件和关系来谈论一个超越的乌托邦式的新社会，而是将对新社会的理解放在对象的观察路径中，即通过这种理解，未来的部分就内在地包含在经由批判性考察的现实结构之中了。

戴尔·帕森斯坦言自己对马克思最初的吸引不是来自任何对哲学的热爱或者任何把握复杂概念的欲望，而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他认为鉴于现代的种种危机，我们“需要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其中人类激情、欲望和努力的多样性能够繁荣，其中每个个体可以发展他们所有的人的潜力，而非局限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允许的很少的部分”^②。而胡迪斯所提供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旨在探究马克思新社会解放旨趣的精神劳作。

小 结

通过上述三个视角对胡迪斯文本的评析，我们可以看到，站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胡迪斯以资本主义替代概念为核心对马克思文本进行了总体性的研究。在这里，卢登赫弗、科托尼卡和戴尔·帕森斯的三篇评论对理解胡迪斯的著作有重要的价值，它们提示我们关注胡迪斯思想所立足的杜娜叶夫斯卡娅的人道主义传统，尤其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继承，重视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的规范前提和原则的研究，把握其对马克思思想逻辑的“总体性”以及对新社会的可能性的思考。综观全文，胡迪斯指出马克思一方面将这种关于未来的替代性概念作为一种规范性原则来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同时又进一步挖掘一种未来社会的理想性形态的可能性和潜在性。他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是基于这样一种辩证的新社会理念，其不是虚幻的

①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2, p.211.

② <http://www.internationalmarxisthumanist.org/articles/marx-alternative-capitalism-review-symposium-karel-ludenhoff-marija-krtolica-dale-parsons>.

乌托邦想象，而是一种现实，是要在历史空间里展开的可能性。

和杜娜叶夫斯卡娅一样，胡迪斯的研究不仅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也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自身传统的自我扭曲和异化的批判以及当前左翼政治的困境的诊断。在他看来，斯大林主义是打着马克思的旗号进行专制独裁的国家资本主义，当代社会左翼政治已经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在这个背景下，重新探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概念比起杜娜叶夫斯卡娅时代显得更加必要和紧迫。这一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展现马克思的解放理想的丰富内涵，而且要重新确立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的目标。

胡迪斯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马克思的全新视角，他坚持一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在这里，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理论的修正以及在理论指导下政治实践的修正，本身就是理论传统的一部分。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中的矛盾可以在思想中得到解决，但现实的变化不能缺乏思想的维度。基于马克思思想深刻的理论基础——人道主义，胡迪斯将马克思思想看作整体，看作是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统一，如马尔库塞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序言所写：“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在描述和分析‘自在自为’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以另一个社会为参照来描述和分析，即以—种已成为行动的现实目标的历史可能性为参照来描述和分析。作为一种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双向度的：它以现存社会自身的各种客观历史可能性和潜能，来测度这个社会。这种双向度性表现在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统一之中：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每一个经济范畴同时就是哲学范畴。”^① 胡迪斯的研究试图再现马克思这一独特的思想逻辑，重新弥合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之间的对立，因而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思想努力。

但是，从更高的要求来看，胡迪斯的著作也存在着理论的盲点和不足。对于任何一个致力于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的革命理论而言，关键是如何建立观念与现实的连接。胡迪斯意识到，关于人类解放理想的精神劳作植根于，但不能自发地产生于受剥削者的意识，问题是，作者没有考察被剥削阶级的现有意识状态，也没有考察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群众的自发意识通过理论

①【美】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傅小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赫伯特·马尔库塞“序”。

的中介转变为自觉的革命意识。杜娜叶夫斯卡娅认为，群众自己将会把握辩证法的原则，使为保证自由的斗争与解放的哲学达成统一。在她生活的时代，由于群众性的斗争和社会运动的高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还不突出。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很大程度上工人阶级运动已经衰落，新社会运动虽然层出不穷，但追求的价值和理想已经多元和分散化了，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斗争之间如何结合成了一个理论和实践难题。

更重要的难题是一个哲学的难题，这就是人类解放的历史的内在展开与革命阶级的斗争实践之间的关系。胡迪斯试图在新的时代情境下重新思索马克思的解放理论，既避免道德主义的乌托邦立场，又避免对历史客观主义的宿命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他依赖的是杜娜叶夫斯卡娅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立场。一方面接受黑格尔的哲学立场，“绝对”并非意味着终结，而是一种对人类精神的肯定，否定也非虚无，而是一种历史过程的展开。另一方面又接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强调新的社会不会自发产生，它需要哲学的精神劳作和阶级主体的反抗。正如胡迪斯所援引的杜娜叶夫斯卡娅论述：“不是生产方式创造出新的人的类型，而是新的人会创造出生产方式，并且新的活动方式创造出新的人类，新的社会主义的人。”^①但是，历史的逻辑与政治的逻辑之间始终是充满张力的，偏向任何一方都会陷入片面性，不是倒向历史的客观主义就是倒向主观的意志主义。胡迪斯强调未来就包含在我们批判的现实之中，这在可能性意义上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如何把它转变为现实性。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总的来说，胡迪斯的著作作为对马克思思想本身的资本主义替代理论的分析是成功的，他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揭示出马克思思想中被人们忽视的人类解放向度及其规范意义，但是，如何把这样一种解放的理论转化为革命斗争的纲领和策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类解放之路上充满着荆棘，胡迪斯给我们展现的只是马克思理论中新社会的曙光，但这一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如何实现仍然是困难而又艰巨的任务。

作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①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2, p.210.

《认识资本主义》：对资本“修辞学之翼”的考察

闫婧

内容提要：奈格尔·思瑞夫特的《认识资本主义》一书，从激进政治地理学及其文化分析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新的逐利方式进行了全面考察。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通过对资本文化回路的运行机制、商品形式和商品关系的变化以及新的时空秩序等三方面关系的进一步梳理，揭示出资本凭借知识的修辞学力量来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并在无形中重构日常生活的过程。本著的局限在于，其有关探讨过于局限于文化分析的范畴，而没有把这样的研究同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关联起来，尤其没有将有关的探讨提升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批判。

关键词：柔性资本主义 资本文化回路 新经济 修辞学

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一个总体性的把握是必要的，比如，哈特和奈格里就将之看成是伴随着全球化的市场和秩序出现的一种全新意义上的主权形式——帝国。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个信息技术已经全方面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大数据”概念风靡全球的时代，我们能够对资本主义在现阶段展开自身、并获得新动力的具体方式，有更为丰富的了解。在这一方面，或许少不了一种激进政治地理学及其文化分析的分析视域，英国著名激进左翼理论家、华威大学前校长奈格尔·思瑞夫特（Nigel Thrift）所著《认识资本主义》

一书呈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视域。该著通过对资本文化回路及其运行机制的考察，解开了资本是如何凭借知识及其所具有的修辞学的力量来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并获取巨额收益的秘密，从而完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之“修辞学之翼”的精彩分析。

思瑞夫特的分析包括三个方面：资本文化回路及其发散性的力量、商品的新形式及关系和新时空秩序。这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资本文化回路以一种新的方式将全球的知识聚集起来，并对这些知识进行创造性地再生产，再将新知识传播出去；巨额金融资本凭借文化回路的发散性力量，催生出以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并引起了商品形式以及商品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产生了一种以空间的标准化为基础的新时空秩序。在卡里尔和米勒看来，这种“将现代欧美社会理论逐渐改变世界以适应它们的想象的过程”^①，即按照概念的本质内涵来塑造世界的过程，正是所谓的“虚拟主义”，其最重要的动力无疑正是“资本文化回路”的修辞学力量。

资本文化回路

思瑞夫特将当代资本主义概括为“柔性资本主义”，认为它是经历了席卷社会和人文学科的文化转向之后的知识型资本主义。柔性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知识已经成为了关键的经济资源，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比较优势的主要来源”^②。思瑞夫特认为其形成主要归因于两种因素：一是几乎同时发生于学界和商界的话语系统转变，二是资本文化回路对知识的聚集、生产和传播作用。“柔性资本主义”就是这两者相互作用并对制度和主体进行塑造的结果。

思瑞夫特观察到，从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学界和商界共同关注点和共享词汇越来越多、知识不断商品化，以及知识空间在商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等现象，学术和商业越来越交织在一起。与此同时，两个领域几乎同时出现了从“约书亚话语”（Joshua Discourse）系统到“创世纪话语”（Genesis Discourse）系统的转变。

“约书亚话语”系统是一种“以单一的、无误的、神目的（God's-eye）理

① Nigel Thrift, *Knowing Capitalism*,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5, p.198.

② Nigel Thrift, *Knowing Capitalism*,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5, p.43.

性观为基础”^①的话语系统，它强调总体性、同时性以及个体的被设定性，对于现代性神话的形成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从20世纪40、50年代开始，在奥斯丁、梅洛-庞蒂和维特根斯坦哲学以及随后来自于另外一些知识性的实践团体和社会理论家带来的更致命的打击下，约书亚话语开始走向衰落。新的话语系统强调差异性、世界的混乱状态以及个体被社会塑造的特性，强调理性与身体以及情感的关联，强调认知能力对于表象的基础作用以及科学范畴的隐喻性质。

发生于学术领域的话语系统转变给全球商业组织带来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在管理文化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苏联和东欧解体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资本主义在交通和媒体方面的迅猛发展，都使得世界处于一种瞬息万变的混沌状态之中，亟需一种用于描述这种状态的新的话语系统。“新的话语系统已经产生，并塑造和促进着这些变化的发生。这一话语系统以一些新的隐喻为基础，它们试图描述这个更加混乱不堪、不确定和缺乏安全感的世界。”^②于是，新的话语系统在商业领域迅速传播开来。

而创世纪话语系统从商业领域传播至其他领域，从其发生地传播至全球，并不断地更新，从而对世界的整体面貌进行重塑的过程，则有赖于资本文化回路的发散性力量。资本文化回路可以看成是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网络及各种类型的知识聚集的结果。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在管理学领域的小范围内被广为接受的、以各种形式来探讨‘如何’在新的社会网络的聚集中，去展开实践的、雄心勃勃的管理理论。”^③从构成上来说，商学院、管理咨询公司、管理学专家和媒体是其最基本设施。

具体而言，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世界顶尖商学院广泛开设的MBA课程在培养大批学生的同时，也肩负着生产和传播知识的使命。商学院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生产新的知识：首先，它将现有的知识系统化并生产出新知识，哈佛商学院的案例学习法就深受追捧；其次，对现存的知识进行合成并吸纳入商业贸易中，商业杂志是主要渠道；最后，通过吸纳不同的交易模式生产新的知识，有经验的MBA学员对此有着重要的贡献。与商学院相比，快速增长的管理咨询机构更像一个商业知识的交换场所，它们“吸取客户的经验对之进行整

① Nigel Thrift, *Knowing Capitalism*,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5, p.24.

② Nigel Thrift, *Knowing Capitalism*,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5, p.31.

③ Nigel Thrift, *Knowing Capitalism*,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5, p.6.

合，并以其他形式重新销售给别的客户（有时并不进行深度包装）来获得巨大的利润”。^① 管理学专家不同于以上两者之处在于，他们通过将某种理念包装成自身的特点来推动商业潮流的兴起，并通过有效的方式启发读者来传播这些潮流。他们往往从实践中提取观念并将之转译至实践中，管理学研讨班是最常见的形式，比如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的“讨厌鬼训练营”（skunk camp）就通过宗教静思的方式来对学员进行启发。

商学院、商业咨询机构和管理学专家三者并非完全相互独立的机构，相反，它们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同一个主体可能以不同身份在三者之间穿梭，知识也因此在三者之间快速流动。此外，媒体也是资本文化回路不可缺少的环节。除了书籍、杂志、网络和电视等标准媒体外，专业化的商业媒体也在迅速崛起，如《英文虎报》（The Standard）和《快速公司》（Fast Company），后者已经成为与《财务》和《商业周刊》齐名的美国最富影响力的商业杂志之一。广告咨询师、广告代理商等媒介的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接下来，思瑞夫特以复杂性理论为例，对新的话语系统是如何在各个领域进行传播，并对欧美社会乃至整个世界进行重构，进行了详尽又极富启发性的分析。他首先指出，科学都具有隐喻性质，而隐喻的丰富内涵只有在最大程度的传播中才能得到呈现。复杂性理论源于科学内部，它是一种反还原论的、关于在复杂的环境中“突显的”秩序的知识。复杂性理论能够在除了科学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迅速传播并逐渐取代进化论，他认为有三方面原因：首先，在柔性资本主义时期，科学成为了通用的文化货币，在进化论流行的时代情况远非如此。其次，知识生产者以及知识在数量上的膨胀，导致一些知识生产性的行动者网络的出现，这些网络对复杂性理论进行转译，并以变化了的形式进行传播。再次，复杂性理论传播借助了完全媒体化的网络。其在科学内部的传播主要依靠的是该理论的创建者创办的圣达菲机构，该机构既是一个研究机构，也是一个传播中心，每年有无数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来该机构访问。同时它依靠一种促进该领域的研究者进行快速流动以建立全球“大家庭”的策略，将该理论传播至除自然科学以外的其他领域之中。在商业内部的传播则依靠资本文化回路的全球性网络。复杂性理论的传播同时推动着管理范式从强调还原论、控制式和从上至下的管理模式到强调突显情境性、试验性和从下至上的管

^① Nigel Thrift, *Knowing Capitalism*,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5, p. 85.

理模式的转变，并成为 90 年代管理学理论丰富的来源。

然而，思瑞夫特对该理论的态度却充满讽刺意味，他提醒我们，复杂性理论本身也许仅仅意味着一种新的商业机会，在对它的反复售卖中，资本主义不仅不断地发掘着一个又一个利润增长点，同时通过赋予商品新的形式来影响整个生活世界。

那么，资本文化回路又是如何通过兜售新的观念来改变全球地理格局的呢？思瑞夫特认为，这一过程主要通过商学院、管理咨询机构以及管理学专家等三者，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它们的实践活动并设立分支机构来完成的。他以新加坡为例，再现了新加坡在该国政府的推动下，逐渐成为一个国际性校舍的过程。他的分析对于想要尽快加入到全球知识生产的自创生系统的中国而言，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商品形式及关系的改变

在厘清了资本文化回路的运行和传播机制之后，思瑞夫特进一步指出，文化回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对于整个商品世界，乃至我们整个生活世界的影响。虽然有批评者认为，这一部分所关涉的三章是一种跑题的表现^①。然而，在笔者看来，正如作者自己指出的，商品形式的变化不仅是资本的文化回路所催生出来的新经济的重要成果，也是日常生活新的时空秩序形成的原因和前提。缺少了对于商品环节的考察，我们无法将柔性资本主义同我们自身关联起来，也无法理解生活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诸多变化。

对于商品形式和关系的变化的研究，要从对于“新经济”的探讨入手，因为后者是前者变化的根源。思瑞夫特指出，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新经济”，正是巨额金融资本凭借着文化回路的传播机制成功助推的结果，同时它也展现了文化回路在世界范围的首次协商性扩散。“新经济”并没有构成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定的阶段，只是资本主义的极端版本，其概念是一些利益相关者用建构“资本文化回路”概念的同样方式，把它“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运算建构出来了”^②。在作者看来，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无疑是资本文化

① Andrew Sayer, *Review "Knowing Capitalism"*, <http://www.jstor.org/stable/30033101>.

② Nigel Thrift, *Knowing Capitalism*,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5.p.113.

回路。在这个回路中，旧的叙事不断聚集并生成新的叙事，再在这个回路之中传播，并通过媒体传播到生活的其他领域之中。于是，“新经济已经成为了一种标志，它凝聚了一种新的版本的资本主义所能拥有的吸引力和奖赏”^①。然而，今天，当与“新经济”有关的所有激情已经褪去的时候，作为其核心及其重要遗赠的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正以超乎人们想象的力量改变着整个商品世界。

在思瑞夫特看来，商品是专业的科学知识、新的组织技术及新的媒体表现手段三者相结合的产物，科学知识所蕴含的话语系统的转变、通信技术和媒体表现方式的发展大大地改变着柔性资本主义商品的面貌以及商品与人之间的关系。通信技术的发展具体表现在，“软件”已经成为了一系列商品的内核，并且与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各方面交融在一起形成一种复杂的生态系统。就其本质而言，软件可以看成是企业的价值、观念和修辞被以编码的形式进行商品化的结果。与先前依照明确的指令的程序不同，承载着新的修辞的信息化话语的软件更强调互动性和应激特性，并产生出一种强调模糊性、不确定性的、以人脑为模版的“柔性计算”方式。

首先，商品互动性的不断增强导致了智能环境的崛起，对这一点的研究集中体现在玩具上。这不仅因为在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商品化过程之后，玩具产业已经形成了全球玩具商品的供应链，还因为玩具已经从需要在大人监督下使用的固定的物体，变成了集各种场景和角色于一身的集合体。因为“玩具通常是我们试图了解商品世界时首先形成的经验”^②，所以通过玩具体现出来的游戏规则对塑造这个世界的新的主体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早出现的是需要喂养的电子宠物，后来出现了能够对环境进行简单的识别，并通过日益丰富的词汇与玩具的使用者进行互动的虚拟电动宠物，再到由肩负不同任务的微型玩具组成的超级玩具社区；从拥有上千种表情和极强表达能力的“机器娃娃”和以神经形态芯片为基础的，与环境高度互动的生物力学机器人的诞生，到其硬件和软件都可以由玩家不断更新的可程序化机器人以及能够表现狗所有的表情状态的犬语翻译机。软件的发展已经使“玩具”这样一种原本简单而单纯的商品发展成为一种复杂的智能系统，电子玩具的发展史

① Nigel Thrift, *Knowing Capitalism*,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5, p.114.

② Nigel Thrift, *Knowing Capitalism*,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5, p.118.

为我们揭示了在互动性修辞的指引下，资本如何为自己开辟出一个巨大的市场。同时，它也在无形中对生活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今天，玩具不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它同时也成为一种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使得玩具的使用者能够按自己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对世界的建构之中。新的话语通过玩具所承载的软件在与使用者的互动之中对其进行行为、认知甚至情感上的塑造，这就是商品形式的改变带给我们影响的其中一面。

不仅如此，思瑞夫特还指出，软件在商品上的应用也在持续地产生着一种日常生活的人工生态学。“从现代计算机诞生的那一刻起，新的机器就被以生物学的术语进行架构”^①。随着软件的复杂化，许多不同版本的软件交融在一起，软件越来越类似于一种生态系统，与此同时，遗传算法、进化算法等模仿生物学的算法被引入软件程序之中，软件逐渐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之中的过程，也是生物学的隐喻深入生活的过程。因此，各种载有软件的商品越来越具有生物学特征，尤其是电动动物。思瑞夫特认为，无论是电脑上虚拟的人工生命，还是人造生物、移动机器人，甚至将活体动物肢体移植到机器人身上造成一个“机器人变种”，所有相关的努力都显示了想要设计一个靠“生物”驱动的机械自然的野心。因此，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生活形态中，人与机器、人类与非人类的区分逐渐发生了变化，人们与这些机器之间的关系与越来越类似人类与宠物之间的关系。而新的时空秩序也随着日常生活的不断智能化和生态学化逐渐成形。

时空秩序的改变

最后，思瑞夫特为读者勾勒出知识是如何以日常生活的智能化和人工生态学化为基础来改变作为生活的基础结构的时空秩序的。他首先指出，宇宙秩序的建立依靠的是对于各种类型的行动者的定位和排序，“它需要承担着具体功能的特殊空间通过不断的重复来实现”^②。而这些关于定位和排序的知识则要通过形成一种“原子结构”，使得在没有认知概念参与的情况下对个体进行定位并使之与环境融为一体成为可能，这一过程也是他所谓的“技术性的无意

① Nigel Thrift, *Knowing Capitalism*,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5.p.198.

② Nigel Thrift, *Knowing Capitalism*,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5.p.212.

识”的过程。旧的“技术性的无意识”，即以时间为序列的知识，比如各种时间表、日记及关于物流的知识等，通过对于空间的离析和纯化，产生了一种可计算的整体布局。而新的关于“跟踪和追踪”的技术的发展，则导致了一种以空间的标准化为基础的新的“技术性的无意识”。

新的关于定位和排序的知识主要包括一系列可以持续追踪定位的技术的普遍应用，各领域的物流知识的形成，以及带来新的计算的可能性的新的可数性方式（countability）。时空秩序的剧变集中地体现在三个方面：以固定的计算中心为基础的地图正在改变，智能设备变得可以随时移动起来；地址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条形码、SIM卡、无线射频技术等使地址随着软件的使用者位置的变化而随时变化，与环境的互动性的增强使得它们能够主动对环境进行识别并进行反馈；以不断的接触和调整为特征的微协调或超协调技术的增长为经济、生活领域的相遇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一切都是以日常生活不断的智能化和生态学化为基础，同时定位和排序知识的发展又促进其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入。尽管在旧的时空秩序下，资本主义已经开始了其全球化的进程，然而，新的时空秩序的形成无疑使资本主义能够在一种全新的意义上拓展其获利空间。

贡献极其局限

在《认识资本主义》一书中，作为地理学家的思瑞夫特以激进政治地理学及其文化分析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当代资本主义是如何凭借知识的修辞学力量来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并在无形中重构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激进政治地理学成功强化了空间想象，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思瑞夫特的地理学并非单纯的量化地理学，它包含了一种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当代的资本主义不再仅仅把空间当成一种尺度，而且当成一种资源来加以利用。正如大卫·哈维在一篇相关评论中所说的，这种地理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倾向对于我们建构一个用来理解这个世界的智慧大厦是非常有帮助的^①。然而，本书依然存在着一一些明显的局限。

首先，正如其批评者所言，该书“最大的缺点在于缺乏反思的维度”^②。

① David Harvey, Review “New Models in Geography: The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http://www.jstor.org/stable/622679>.

② Andrew Sayer, Review “Knowing Capitalism”, <http://www.jstor.org/stable/30033101>.

尽管思瑞夫特也曾对柔性资本主义的消极面进行过探讨，比如他认为新的管理学话语由于一味地强调企业简化、扁平化而给企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它所强调的新的主体观念也因为过于狭隘而造成了对于管理者和劳动者双方的过度剥削等等。然而，这样一种简单的涉及并不足以反思当代资本主义有关的重要问题。比如，在柔性资本主义下资本新的逐利方式对管理者之外的普通劳动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商品形式的变化在对于主体重塑究竟起着怎样的影响？

其次，与第一点相关联的是，反思性的缺乏也表现在思瑞夫特对于当今知识的态度上。学界与商界的互动无疑正在增强，这也是知识关注现实的一种表现。然而，除了工具性的知识之外，反思性的知识是否依然能够保持着其独立的姿态，以冷峻的眼睛观察资本主义？这是任何一个批判地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首先要讨论的问题。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对这个方面进行深入思考。

再次，正如思瑞夫特意识到，被资本的文化回路影响的主要是精英管理层，柔性资本主义的反思性话语主要展开在一些全球性的组织中，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地区和组织可能依然处于旧的话语系统之中。显然，在全球层面讨论柔性资本主义及其话语模式需要处理这种脱节的现象。如果缺少这一理论环节，就容易造成对资本文化回路力量的夸大。

最后，该著一方面没有跳出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的传统，而在应对当代激进理论的回应时，还是缺乏应有的历史感。著作引入了激进政治经济学资源，但却没有能够将问题有机地引入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本著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其没有能够做到将有关探讨提升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批判。

作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会议综述

为一个正义的世界而奋斗

——2014 年全球“左翼论坛”简介

林进平

2014 年全球“左翼论坛”于 5 月 29 日至 6 月 1 日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举行。^① 此次论坛围绕“改革及 / 或革命——构想一个有变革能力的正义世界”（Reform And/Or Revolution: Imagining a World With Transformative Justice）的主题，设立了 394 个专题会场，来自北美、欧洲、中国、拉美、土耳其等世界各地的左翼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运动组织者、左翼团体代表、媒介代言人和机构代表等近 4500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其中包括理查德·沃尔夫

^① 往届一般在佩斯大学举办。

(Richard Wolff)^①、戴维·施威卡特(David Schweickart)^②、彼得·胡迪斯(Peter Hudis)^③、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大卫·哈维(David Harvey)^④等左翼理论旗手。像往届一样,中央编译局也派员参加了本届论坛。

本次论坛延续了左翼论坛的一贯论题,着重探讨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欧洲、拉美、加勒比地区、中国和印度、东南亚等地区)的不平等。论坛指出,不平等已经渗透到生态环境、媒体、家庭、性别、劳作、教育和卫生等诸多领域,世界已由大集团和富人所支配,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资源、财富掌握在百分之一的人手中,而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则仅拥有全球资源、财富的百分之一;不仅如此,上层社会还凭借其不正当的优势将过去

① 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是美国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的经济学系教授,曾为美国康乃迪克州纽黑文市的绿党的创始人,并于1985年成为该市的市长候选人。在2011年,他呼吁在美国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左翼群众性政党,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他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做公开演讲,是纽约布莱希特论坛(Brecht Forum)的常客,并常常做客于美国各种电视和广播节目,主讲“经济学与社会”(economics and society)和“经济前沿”(Economic Update)的节目。他新近的著作有:《民主在运作:治愈资本主义》(Democracy at Work: A Cure for Capitalism.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2),以及与斯蒂芬·雷斯尼克(Stephen A. Resnick)合著的《互竞的经济学理论:新古典主义的、凯恩斯式的、马克思式的》(Contending Economic Theories: Neoclassical, Keynesian, and Marxia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2)。

② 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是美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现为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著名左翼马克思主义学者,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还是工人管理?——一种伦理学和经济学的评判》(1980, 1982)、《反对资本主义》(英文版, 1993, 1996。中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合著,英文版, 1998。中文版, 新华出版社, 2000)、《资本主义之后》(英文版 2002, 中文版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等。

③ 彼得·胡迪斯现为伊利诺斯州欧克顿社区学院的教授和《罗莎卢森堡全集》英文版主编。他近期的一部力作是《马克思关于取替资本主义的观念》(“Marx’s Concept of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by Peter Hudis.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3)。

④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1935年10月31日生于英格兰吉灵厄姆),纽约市立大学(CUNY)研究院人类学和地理学特聘教授,国际前沿社会理论家。哈维于1961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地理学的博士学位。大卫·哈维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是人文科学领域中成果被引频次最高的20位作者之一。此外,他是世界上被引频次最多的地理学者,并著有大量专著和论文,推动了现代地理学的学科化发展。他的成果拓宽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讨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批判中重构了社会阶级和马克思主义方法,并将其作为完整的方法论。他是权利城市思想的主要提倡者,也是国际“参与型社会”组织筹备临时委员会成员。

7年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败、生态恶化转嫁给社会下层，使社会下层挣扎在失业、贫困、疾病、灾难的漩涡之中难以自拔。人性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浪费和滥用已经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惨痛代价，社会已经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为此，一个充满平等、正义的世界正为时势之所需，但为了实现这个正义世界，我们该如何行动？是改革，还是革命？抑或是二者的结合？此外，当正义的变革条件不再采用哀怨地诉求缓解的形式，什么样的体系、制度和社会条件是可能的？简而言之，本届论坛试图以左翼的各种理论资源分析、诊断当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诸多症候和病根，并试图探讨走出当下资本主义困境，谋求一个充满活力与正义的世界。不过，由于本届论坛涉及的论题过多，本文无法一一介绍，在此笔者就本届论坛对马克思主义、美国和中国的理解做点汇报，并结合自己的理解对本届论坛的特点做一简述。

一、被寄予正义之思的马克思主义

与往届一样，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本届论坛用以分析当今社会，指导社会运动的一个理论武器，也是本届论坛重点研讨的一个理论对象。

在本届论坛中，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的强调。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荣誉退休的英文教授里奇·丹尼尔斯（Rich Daniels）在“转型型变革：马克思的必要性”（Transformative Change: The Necessity of Marx）的会场中指出，马克思的著作对于理解当今资本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打造一个尊重差异、人人平等的美好世界来说依然是不可超越的。他认为，只要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而事实我们的确如此），马克思的著作就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社会和分析社会的最基本的视角；正因此，那种试图超越马克思主义和纯属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性变革，而只能是前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或者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也只能是一种自我欺骗。丹尼尔斯的观点在小组讨论中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会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对于当今时代的重要性，不仅可以比照马克思的著作与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得到验证，而且还可以通过考察“占领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的实践来得到说明。

彼得·胡迪斯则通过“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的哲学视角”（Philosophical Per-

spectives on Marx's Critique of Capital) 的论题与伊利诺斯州欧克顿社区学院的四个学生一起探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对于当下社会运动的意义,他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占领运动、阿拉伯之春、哲吉公园 (Gezi Park) 的抗议中都有积极的影响,为左翼积极分子和思想家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世界所产生的经济危机、社会不平等、异化和环境破坏等提供了理论视角,也为女性主义、全球正义和环境运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此外,就其近作《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概念》(2013),胡迪斯还在“马克思与资本主义的替代”(Marx and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的论题中与戴维·施威卡特展开了讨论。胡迪斯认为马克思的工作并不限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包括探索替代资本主义的诸多构想,即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想。胡迪斯认为,通过马克思已经发表和未发表的著作,透过马克思对价值生产、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积累的批判,对工人合作社、对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局限性的思考,能够看出马克思存在着一个关于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详细而连贯的观念。

在这一论坛中,不仅卢森堡、列宁的思想得到重申,卢卡奇、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人的思想也得到重释,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都以各自的理论视角表达了对这一时代的忧思。

由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发起的“重新思考罗莎·卢森堡:从资本主义通往社会主义的路径”(Rethinking Rosa Luxemburg: Pathways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和“资本积累和罗莎·卢森堡的再现”(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Reemergence of Rosa Luxemburg) 的论题,探讨了卢森堡的理论对于理解全球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以及唤起社会革命的重要性。前者试图展现卢森堡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丰富性和作为资本主义替代的社会主义的多样性思考;后者则试图以卢森堡的理论资源来理解当前的资本主义转型、理解资本积累和全球的资本流动和现代资本主义与代议制民主、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

《工人世界》刊物发起的“资本主义的‘迷惘一代’,青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将如何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Capitalism's "Lost Generation", How Young Marxist-Leninists Will Be the Gravediggers of Capitalism) 的讨论认为,在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尤其在美国),年轻人每天都面对着危机、失业,如山的学生债务和低工资都是大多数人必须面对的现实,持续的资本主义危机已经使年轻人如同置身于帝国主义战争之中,被压抑得难以生存下去。因此,年

轻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在当前时局下，要探讨如何激励年轻人，特别是那些遭受失业、种族歧视、债务、压迫和剥削的年轻人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并讨论为何及如何振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如何组织运动。

由《批判社会学》刊物资助发起的“霸权再思考：卢卡奇、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Hegemony Reconsidered: Lukacs, Gramsci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的论题组认为，在过去的几年中，右翼政治反映出一种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控制，并试图制造一种“非同意的同意”^①。为此，论题组的发言者分别从卢卡奇、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视角探讨了霸权的诸多表现和意识形态的各种扭曲，剖析“同意”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主张通过揭开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外衣来推进社会运动与社会革命。

由《情势：激进想象的计划》（*Situations: Project of the Radical Imagination*）的出版社资助发起的《论资本主义再生产：重读阿尔都塞》（*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Rereading Althusser*）论题组则以此书英文版的发行（2014年3月）为契机，探讨了阿尔都塞的核心概念和核心问题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形成的针对性和重要性。

在凯文·安德森^②主持的“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来自左翼的批判”

① 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的“第二章没有同意的同意：主宰民众的思想”有一个清晰的论述。

② 凯文·安德森是美国加州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当代著名的列宁哲学研究专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专家。长期以来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是国际马克思恩格斯著作MEGA2版考证版研究人员，主要承担《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马克思晚年著作的考证工作。编有《罗莎卢森堡读本》（2004）、《否定的力量：黑格尔与马克思辩证法作品选》（2002）、《埃里希弗洛姆与批判的犯罪学》（2000），著有《福柯与伊朗革命》（2005）、《列宁、黑格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1995）。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Critiques from the Left) 的会场中,^① 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思潮的作用受到了质疑。会场的发言者认为,这两种思潮对左翼知识分子批判资本主义和思考达致一个较好社会的方法的能力已经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同时指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这些思潮由于沉浸于差异政治的诱惑,已经难以建构起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解放的理论视角。这一小组成员以各自的学科背景、哲学素养和政治信念讨论了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及其遗产、萨义德对人道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矛盾立场的论述以及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等问题。

大卫·哈维在其主持的“指南针与地图:反资本主义、策略和政治想象”(The Compass and the Map: Anti-Capitalism, Strategy and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的论题中以其独特的、充满激情的方式表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忠诚,并借费尔南多·科罗尼尔(Fernando Coronil)最近的一篇文章,即《不确定的未来》(*The Future in Question*)指出:“如果说在过去,左派能够对未来做出独断的断言,而现在它对未来只能提供不确定的影像。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有开辟空间的想象力和实验。未来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已经提供了开口。虽然最终目的地可能不是清晰的,但我们已有着这样的方向感:走向正义、平等、自由、多样性、社会与生态和谐。左翼虽然没有地图,但它有一个指南针。”在大卫·哈维看来,马克思主义者所开辟的事业无疑已经昭示了人类社会走出资本主义困境,走向未来的方向。

① 参与这一论题发言的有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和普拉纳夫·贾尼(Pranav Jani)。爱泼斯坦是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的研究教授,是《1941—1943年的明斯克犹太人居住区:犹太人的抵抗与苏联的国际主义》(*The Minsk Ghetto, 1941-1943: Jewish Resistance and Soviet Internation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一书的作者,目前正在致力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上升、下降及与左翼的持续相关性》(*socialist humanism: its rise, decline, and continuing relevance for the left*)一书的写作与研究。贾尼是从事后殖民研究发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英文副教授,专门研究后殖民研究。他是《去中心的拉什迪:世界主义和英语的印度小说》(*Decentering Rushdie: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Indian Novel in English*.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一书的作者。他下一本书是《英属印度的1857年起义及其在印度政治意识中的意义流变》(*1857 Revolt in British India and its changing meanings in Indian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二、受正义质疑的美国

左翼论坛自成立以来，以批判和反思资本主义为宗旨，以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危机的分析为论坛的主题，而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和左翼论坛的大本营（论坛的参加者有接近一半来自美国，他们对美国问题也有着切身的感受），一直是论坛讨论的主要对象。因而，透过左翼对美国的分析和批判，不仅可以看到左翼如何看待美国，而且可以感受左翼眼中的资本主义世界。

像往届论坛一样，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教育、劳工、移民、种族和性别等问题也是本届论坛质疑、批判的对象，而耐人寻味的是，以往不太受关注的美国移民、教育和文化政策也受到了深度的质疑与批判。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在美国，乃至在全球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这次由《国际社会主义评论》发起的“资本主义、移民及迁入或迁出的正义斗争”（Capitalism, Immigration and Immigrant/Migrant Justice Struggles）的论题和新闻记者米歇尔·陈（Michelle Chen）主持的“在恐惧中工作：奥巴马时代的驱逐出境和劳动剥削”（Working in Fear: Deportation and Labor Exploitation in the Obama Age）的论题都探讨了这一有争议的论题。据前者介绍，世界移民的人口总数已经由1991年的0.36亿增加到现在的2亿（其中包括在美国的0.11亿非法移民），认为在美国的资本主义体制中，虽然移民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發展，但来自美国的主流政党和组织却未能正视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受压迫的人们所遭受的气候变化、隔离墙、全球衰退和经济落后等难题，未能正视不合理移民正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物。米歇尔·陈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她认为，奥巴马时代的驱逐出境和劳动剥削比布什时代还要严重，正是驱逐出境的压力增加了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的受剥削程度。

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研究小组的论题“教育改革可能吗？”（Is Education Reform Possible?）^①透露出美国教育的一些实质与困境。该论题组认为，教育在美国一直充当着补救社会弊病、推进民主、减缓资本主义危机和引领社会进

^① 该会场由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主持，他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社会学的知名教授，也是一位资深的政治活动家和文化批评家，已在中国出版的著作有《控诉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步的作用。然而，在今天，由于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危机的深化和政治多元主义的后退，教育已经不堪重负，其积极作用正在削弱，甚至在推进平等和民主中起着反作用。在论坛中，发言者对美国教育提出了这样的批评：从表面来看，美国的教育似乎充当了一种传播世界文明的作用，但实质上，美国的教育也充当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既充当了一种在世俗社会进行价值改造、补救、整合的作用，也充当了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实现美国在全球利益的作用。因而，如何弱化教育的意识形态色彩，重新激活教育的使命和作用，使教育契合人性、呵护人性，使学校不致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而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成为这一小组一直激辩的话题。

“从当下等级和支配文化走向伙伴文化”（Moving to Partnership Culture-From the Current Culture of Hierarchy and Domination）的论题则让人看到，一向自诩为民主、平等的美国文化在深层上竟是处在等级的“主从”文化之中。像艾斯乐（Riane Eisler）所说的，“这里真正的战争是支配体制和伙伴体制之间的斗争。这对于我们的孩子从这一世界所要继承的来说，是事关根本的”。与会者认为，社会中存在的巨大不平等、剥削、各种形形色色的生命商品化、父权制、群体性灾难、生态危机和毁灭性的杀伤性武器（如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等）都与这种等级制的、主从的支配文化有关系，因而应该在美国乃至世界推行一种和睦相处的伙伴文化。

三、被赋予正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

在西方左翼的愿景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一直是他们的关注和希望所在。特别是在今天，思考世界的发展和前景已经不可能忽略中国，中国的发展已经牵系着世界的发展，中国的未来也寄予着世界的希望，因而，中国问题也“自然”地成为左翼论坛上热论的一个话题。

从总体上，西方左翼学者对中国是持肯定的态度，肯定中国自1949年以来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的解放，在克服妇女压迫，铲除少数民族的压迫和打破脑体分工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肯定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迅猛发展，肯定中国在当今世界乃至未来的地位与影响力。如，乔尔·科威尔在“今日世界中的生态社会主义视域：聚焦夏威夷、中国和委内瑞拉”（The Eco-Socialist Horizon in Today's World with a Focus on Hawaii, China

and Venezuela) 的论题中就指出, 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使得她无论是在当前的资本积累和生态危机中, 还是未来对危机的解决中, 都处于核心的地位。也许是希望越多, 忧虑也多的缘故, 西方左翼对中国的发展也表现出一种担忧: 担忧中国是否会走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 甚至是帝国主义的道路。

在“新的‘大博弈’: ‘资源战争’时代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与合作”(The New “Great Game”: Inter-Imperialist Rivalry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ge of “Resource Wars”) 论题中, 论题组认为中国参与了世界的能源竞争, 所以必须考察中国在全球资源竞争中的角色和对全球环境的影响。

在 2013 年, 曾有一个由美籍华人组成的清洁能源与环境项目 (CEEP) 代表团前往中国大陆进行调研, 调研中国的社会组织在劳工、环境正义、女性权利等问题上的努力。这一代表团在论坛上以“前往中国的清洁能源与环境项目 (CEEP) 代表团的归来报告”(CEEP Delegation to China Report Back) 为题对调查结果做了报告指出, 认为在过去 10 年中, 作为全球经济体的中国的崛起, 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 是与对穷民的剥削以及底层大众的抗议相伴随的, 希望左翼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环境问题要高度重视并加以分析。

激进左翼作家雷蒙德·罗塔 (Raymond Lotta) 对中国是否会走向资本主义更是充满担忧, 在其新电子书《关于共产主义革命, 你不知道你认为你“知道”的》(You Don't Know What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中, 他已经表露了这种担忧。在本次论坛中, 他在“《关于共产主义革命, 你不知道你认为你“知道”的》——对雷蒙德·罗塔新电子书的回应”的论题中再次表述了这种担忧。他认为, 1949—1976 年的中国革命与 1871 年的巴黎公社和 1917—1956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一样, 都促进了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的解放, 它们在克服妇女压迫, 铲除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打破脑体分工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但之后的改革开放则偏离了这一道路, 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显然, 对于雷蒙德·罗塔的这种观点, 我们无法认同, 笔者在与其辩论的过程中, 曾指出他这种理解过多地从资本主义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的共性中去考察中国, 未能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是扎根于马克思主义: 没有经济上的解放与平等发展, 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解放和平等发展是难以确保的; 另外, 雷蒙德·罗塔对于他所认为“知道”的, 也并不是他“真正知道”的, 因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道路与 1949—1976 年的中国革命道路并不是断裂的, 而是延续的。需要注意的是, 雷蒙德·罗塔的这种观点, 在西方左翼界, 并不

少见。这种观点，我们在萨米尔·阿明、热拉尔·杜梅尼尔等学者身上都能看到^①。

不过，比起“马列毛主义革命研究者”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观点来说，上述观点还是相对温和的。在这届论坛中，“马列毛主义革命研究小组 (MLMRSG)”和“马列毛主义研究中心 (CMLMS)”以“中国的帝国主义：对革命的启示” (Chinese Imperialism: Implications for Revolution) 为论题^② 展开了关于“中国是个帝国主义国家吗？”的讨论。在 N.B. 特纳看来，中国现在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的资产阶级正在向全球（特别是非洲的投资）进行资本和殖民性扩张，并以其经济和军事实力重塑世界。他认为，如果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来看，不仅美国和俄罗斯都是帝国主义国家，而且中国也是帝国主义国家。特纳的观点自然引来了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参会人员的反驳。在场的一位国外学者向他质疑：将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理论运用于今日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是否恰当。在场的一位华人学者也对他用以立论的那些“事实材料”的可信度提出质疑。笔者在会场和会后也向他指出他对中国的诸多误解：中国并不存在他所说的以军事实力作为后盾来实现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文化上的渗透与控制，并且将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视为一种殖民性扩张更是对中国海外投资的一种误解。他之所以断言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因为他将市场排斥于社会主义之外，未能以发展的、现实的视角看待今日的社会主义；而之所以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则在于他以一种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支配的、主从关系的文化视角来看待今日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应该说，西方左翼学者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国的担忧与批评是属于寄希望于中国的一种误解与批评。这种误解与批评或者源于考察中国的不合理视角，或者源于未曾确证的“事实”，或者兼而有之。但不论是何种缘由，西方左翼对中国的这种误解与批评，已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中国与西方左翼之间存在着某些沟通的障碍，这种沟通的障碍已经影响到中国在西方左翼心目中的形象。由于西方左翼在西方的影响力，也相应地影响到中国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形象和

① 参见《加强同西方左翼学者的沟通，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访中央编译局李其庆研究员》。

② 这一论题组的材料在 <http://www.mlmsrg.com/> 与 <http://www.red-path.net/> 网站可以看到。

地位，因此，如何做好与西方左翼的沟通工作，就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工作。

四、左翼论坛的特点与思考

本届左翼论坛不仅具有往届左翼论坛的一些共同特点，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首先，本届论坛具有往届论坛的一般特点：

左翼论坛称得上是“后政治”时代的“政治”。如果说当今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意识形态冲突已被消解或被宣称为终结的时代，即齐泽克所说的政治已经被去政治化的“后政治”时代，那左翼论坛就是这个暗淡的“后政治”时代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左翼论坛不是要求“把旧的意识形态分歧抛在脑后”^①，而是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旗帜：“反资本主义”和“批判自由主义”。因此，把左翼论坛视为“后政治”时代的“政治”是恰当的。

“不一样的宣告，一样的诉求”。尽管自2005年以来，左翼论坛的会议主题一直都在改变，^②但左翼论坛的基本价值诉求未曾改变：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追求自由、平等与正义一直是左翼论坛的内在精神。可以说，时代在变化，主题在切换，风格展示在变化，但价值诉求却未曾改变。

“带有浓厚的美国印记”。这从左翼论坛的参会人员的构成、讨论的主题和会场的组织方式就可以看出。左翼论坛虽然是“全球的”，参会人员也来自世界各地，但来自美国的人员却几乎占参会人员总数的一半。基于此，论坛分组所探讨的问题也多数与美国有关，或者本身就是美国问题。

“思想、观点的超市或发布会”。左翼论坛虽然规模庞大，但与一般的学术会议有所不同，其主要不是一种有学术存疑的理论商讨，而更多的是观点、意见的表述和宣告、对策与行动建议。由于论坛所涵盖的论题过于杂多，同一

① 齐泽克：《神经质主体》，万毓译，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80页。

② 2005-2013年左翼论坛的主题：“美国、世界和未来四年”（2005）、“危险时代：全球的抵抗和帝国的衰落”（2006）、“锻造激进政治的未来”（2007）、“大厦将倾”（2008）、“转折点”（2009）、“中心无法把持：重燃激进想象”（2010）、“迈向团结的政治”（2011）、“占领制度：对抗全球资本主义”（2012）、“生态的、经济的转型总动员”（2013）。

时间段的会场又有 50 场之多等原因，参会人员被过多的会场所分流，^①只能是有选择地参与一些会场，这也使一些会场的参会者寥寥无几，甚至出现两三个计划发言者参加，无法引来其他参会人员的有效对话与深度交流。

其次，本次论坛具有往届并不特别强调的一些特点，最突出的表现是更加激进和具有反思性。激进性表现为试图肯定革命的作用和寻求通过革命改变界的主张。反思性既体现在本届论题的主题上，也体现为本届论坛的很多主题都带有一定的回顾性、反思性，比如对占领运动的思考，甚至是对左翼本身的思考。

最后，不论我们对左翼论坛持什么样的认识或成见，左翼论坛都是中国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民情、舆情的一个快速窗口，也是中国了解自身在左翼心目中的形象乃至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的一个必要的窗口。基于这样的窗口，中国要善于运用这样的平台来澄清认识，宣传中国，扩大影响，树立正面形象。此外，重视这一平台的意义还在于西方左翼毕竟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必须争取的战略“伙伴”，或团结的对象。毕竟我们与西方左翼有着类似的信仰与追求：追求公平正义，信仰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着一些分歧，但很多分歧是可以通过对话、沟通来达成共识或相互理解与尊重的。无论如何，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虎视眈眈的这个时代，中国不应该失去这一关爱中国也指贬中国的“诤友”。

作者：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① 以本届论坛为例，参会人员近 4500 人，会场 394 个，同一时间段的会场有 50 场，每个会场平均参会人数约 11—12 人，而计划发言者约 3—6 人（以 4 人居多）。

国外文献索引

英 文

1.《忧郁的科学：阿多诺思想导论》，*The Melancholy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 of Theodor W. Adorno/ Gillian Ros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2.《2014年社会主义纪事：阶级纪事》，*Socialist Register 2014: Registering Class / eds.Leo Panitch, Greg Albo and Vivek Chibb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13.

3.《在旅馆的深渊：阿多诺的黑格尔 - 马克思主义批判》，*In the Hotel Abyss: An Hegelian-Marxist Critique of Adorno/ Robert Lanning*. Leiden and Boston: Brill,2013.

4.《阿多诺与哲学的终结》，*Adorno and the Ends of Philosophy/ Andrew Bowie*. Cambridge: Polity,2013.

5.《现在的齐泽克：齐泽克研究的流行视角》，*Zizek Now: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Zizek Studies/ Jamil Khader, Molly Anne Rothenberg*. Cambridge: Polity,2013.

6.《马克思主义、东方主义和世界主义》，*Marxism, Orientalism, Cosmopolitanism/ Gilbert Achcar*. Chicago: Haymarket Books,2013.

7.《论改变世界：从卡尔·马克思到瓦尔特·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文集》，*On Changing the World: Essays in Marx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Karl Marx to Walter Benjamin/ Michael Löwy*. Chicago: Haymarket Books,2013.

8.《激进的工会主义：革命工团主义的兴衰》，*Radical Unionism: The Rise and Fall of 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 Ralph Darlington*. Chicago: Haymarket Books,2013.

9.《作为社会主义人类发展的古巴革命》，*The Cuban Revolution as Socialist Human Development/ Henry Veltmeyer and Mark Rushton*. Chicago: Haymarket

Books,2013.

10.《列夫·托洛斯基：阐释性导论》，*Leon Trotsky: An Illustrated Introduction/ Tariq Ali*. Chicago: Haymarket Books,2013.

11.《批判理论与政治参与：从1968年五月到阿拉伯之春》，*Criti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From May 1968 to the Arab Spring/ Chris Pawlin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3.

12.《工作的意义：关于工作确证和否定的论文集》，*Meanings of Work: Essays on the Affirmation and Negation of Work/ Ricardo Antunes*. Chicago: Haymarket Books,2013.

13.《后殖民理论与资本的幽灵》，*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Specter of Capital/ Vivek Chibbe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14.《资本世界内部：朝向一种哲学的全球化理论》，*In the World Interior of Capital: Towards a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Globalization/ Peter Sloterdijk*. Cambridge: Polity,2013.

15.《同情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Compassion/ eds.Michael Ure, Mervyn Frost*. New York: Routledge,2013.

16.《重构人权的跨文化对话：一种哲学方法》，*Reframing the Intercultural Dialogue on Human Rights:A Philosophical Approach/ Jeffrey Flynn*. New York: Routledge,2013.

17.《全球公民身份与帝国遗产：市场的发展》，*Global Citizenship and the Legacy of Empire:Marketing Development/ April Biccum*. New York: Routledge,2013.

18.《合理性政治：贯穿西方历史的理性》，*The Politics of Rationality: Reason through Occidental History/ Charles P. Webel*. New York: Routledge,2013.

19.《康德理论和人权》，*Kantian Theory and Human Rights/ eds. Andreas Follesdal, Reidar Maliks*. New York: Routledge,2013.

20.《吉奥乔·阿甘本：法律、政治与哲学视角》，*Giorgio Agamben: Legal,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ed.Tom Frost*. New York: Routledge,2013.

21.《安东尼奥·葛兰西与B.R.安贝德卡的政治哲学：贱民和下等人的行动指南》，*The Political Philosophies of Antonio Gramsci and B. R. Ambedkar: Itineraries of Dalits and Subalterns/ ed. Cosimo Zene*. New York: Routledge,2013.

- 22.《群众专政和现代性》，*Mass Dictatorship and Modernity*/eds.Michael Kim, Michael Schoenhals and Yong-Woo Ki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13.
- 23.《自治与自由主义》，*Autonomy and Liberalism*/ Ben Colburn. New York: Routledge,2013.
- 24.《经济正义和自由：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功利主义中的社会哲学》，*Economic Justice and Liberty:The Social Philosophy in John Stuart Mill's Utilitarianism*/ Huei-chun Su. New York: Routledge,2013.
- 25.《宗教、世俗化和政治思想：从托马斯·霍布斯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Religion, Secularization and Political Thought: Thomas Hobbes to J. S. Mill* ed.James E. Crimmins. New York: Routledge,2013.
- 26.《托马斯·霍布斯与关于自然法和宗教的论争》，*Thomas Hobbes and the Debate over Natural Law and Religion*/ Stephen A. State. New York: Routledge,2013.
- 27.《约翰·洛克》，*John Locke*/ Geraint Parry. New York: Routledge,2013.
- 28.《多元文化论：导论》，*Theories of Multiculturalism: An Introduction*/ George Crowder.Cambridge: Polity,2013.
- 29.《多元主义与自由政治》，*Pluralism and Liberal Politics*/ Robert Talisse. New York: Routledge,2013.
- 30.《论黑格尔的社会政治哲学原理》，*On Mechanism in Hegel's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Nathan Ross. New York: Routledge,2013.
- 31.《什么是启蒙?》，*What is Enlightenment?*/ Samuel Fleischacker. New York: Routledge,2013.
- 32.《阅读沃尔泽》，*Reading Walzer*/ eds.Yitzhak Benbaji, Naomi Sussmann. New York: Routledge,2013.
- 33.《历史、记忆以及国家支持的暴力：时间和正义》，*History, Memory, and State-Sponsored Violence:Time and Justice*/ Berber Bevernage. New York: Routledge,2013.
- 34.《哈贝马斯与罗尔斯：政治论争》，*Habermas and Rawls:Disputing the Political*/ eds.James Gordon Finlayson, Fabian Freyenhagen. New York: Routledge,2013.
- 35.《代际公平：代际政体的权利与责任》，*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an Intergenerational Polity/ Janna Thompson. New York: Routledge,2013.

36.《个性化社会的团结：承认、正义与善的判断》，*Solidarity in Individualized Societies:Recognition, Justice and Good Judgement/* Søren Juul. New York: Routledge,2013.

37.《黑格尔与精神分析：〈精神现象学〉新释》，*Hegel and Psychoanalysis:A New Interpretation of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Molly Macdonald. New York: Routledge,2013.

38.《当代资本主义的内爆》，*The Implos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Samir Ami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13.

39.《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三篇文章》，*Three Essays on Marx’s Value Theory/* Samir Ami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13.

40.《绿色资本主义：为何行不通》，*Green Capitalism: Why It Can’t Work/* Daniel Tanuro,tran.Jane Ennis. Balbriggan: The Merlin Press Ltd,2013.

41.《经济哲学：一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路径》，*Philosophy of the economy: an Aristotelian Approach/* Ricardo F. Crespo.Cham. New York: Springer,2013.

42.《罗尔斯读本》，*A Companion to Rawls/* eds. Jon Mandle and David A. Reidy. NJ: John Wiley & Sons,2013.

43.《萨尔瓦多·阿连德：革命民主主义者》，*Salvador Allende: Revolutionary Democrat/* Victor Figueroa Clark. London: Pluto Press,2013.

44.《经济危机和政治经济学：塔德乌什·柯沃里克纪念文集卷二》，*Economic Crisis and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2 of Essays in Honour of Tadeusz Kowalik/* ed. Riccardo Bellofiore, Ewa Karwowski, and Jan Toporowski.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13.

45.《罗莎·卢森堡、奥斯卡·兰格以及米哈尔·卡莱斯基的遗产：塔德乌什·柯沃里克纪念文集卷一》，*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 Oskar Lange and Michal Kalecki: volume 1 of essays in Honour of Tadeusz Kowalik/* ed. Riccardo Bellofiore, Ewa Karwowski, and Jan Toporowski.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2013.

46.《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 John M. Pafford. London;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2013.

- 47.《宗教的胜利》, *The Triumph of Religion*/ Jacques Lacan. Cambridge: Polity,2013. Ranciere Now/ Oliver Davis. Cambridge: Polity,2013.
- 48.《托马斯·霍布斯哲学中的德性: 自然法的例子》, *Morality in the philosophy of Thomas Hobbes: Cases in the Law of Nature*/ S. A. Lloyd.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 49.《自然、历史和国家: 1933-1934》, *Nature, History, State: 1933-1934*/ Martin Heidegger,trans.and ed. Gregory Fried and Richard Polt. London;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2013.
- 50.《尼采和政治思想》, *Nietzsche and Political Thought*/ ed. Keith Ansell-Pearson. London;New York: Bloomsbury,2013.
- 51.《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Alberto Mingardi.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2013.
- 52.《没有德里达的解构》, *Deconstruction without Derrida*/ Martin McQuillan. London;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2013
- 53.《协商行为: 民主、修辞和权利》, *Deliberative Acts: Democracy, Rhetoric, and Rights*/ Arabella Lyon.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3.
- 54.《恩典的消隐: 黑格尔思想中神圣行动和人类行动》, *Eclipse of Grace: Divine and Human action in Hegel*/ Nicholas Adams. Hoboken: Wiley-Blackwell,2013.
- 55.《马克思、甘地与社会主义》, *Marx, Gandhi and Socialism*/ Amitabh Bhatt. New Delhi: Centrum Press,2013.
- 56.《更新马克思主义艺术史》, *Re new Marxist Art History*/ ed. Warren Carter, Barnaby Haran, and Frederic J. Schwartz. London: Art/Books,2013.
- 57.《教育马克思: 社会主义的挑战》, *Teaching Marx : the Socialist Challenge*/ ed. Curry Stephenson Malott, Mike Cole and John M. Elmore.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Inc.,2013.
- 58.《马克思与活劳动》, *Marx and Living Labour*/ Laurent Baronian. New York: Routledge,2013.
- 59.《希望的私有化: 恩斯特·布洛赫和乌托邦未来》, *The Privatization of Hope: Ernst Bloch and the Future of Utopia*/ eds. Peter Thompson and Slavoj Žižek,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3.

60.《反资本主义：初学者指南》，*Anti-capitalism : A Beginner's Guide*/ Simon Torney. rev. ed. London: Oneworld Publications,2013.

61.《阶级、政治和经济》，*Class, Politics and the Economy*/ Stewart Clegg, Paul Boreham, and Geoff Dow. New York: Routledge,2013.

62.《符号的历险：后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民主》，*Adventures of the Symbolic: Post-marxism and Radical Democracy*/ Warren Breck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63.《民主文化：历史哲学文集》，*Democratic Cultur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ed. Akeel Bilgrami. London;New York;New Dehli: Routledge,2013.

64.《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伊恩·斯蒂德曼纪念文集》，*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Thought: Essays in Honour of Ian Steedman*/ ed. John Vint et al.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2013.

65.《民主能否被拯救？参与、协商和社会运动》，*Can Democracy Be Saved?: Participation, Deliber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Donatella della Porta.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3.

66.《卢曼观察：激进理论的相遇》，*Luhmann Observed: Radical Theoretical Encounters*/ eds. Anders La Cour and Andreas Philippopoulos-Mihalopoulo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3.

67.《平等派：英国革命中的激进政治思想》，*The Levellers : Radical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Rachel Foxle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3.

68.《神话、记忆与精神创伤：重思苏联时期斯大林主义的过去，1953-70》，*Myth, Memory, Trauma: Rethinking the Stalinist Past in the Soviet Union, 1953-70*/ Polly Jon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

69.《尼采牛津读本》，*The Oxford Handbook of Nietzsche*/ ed. Ken Gemes and John Richard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70.《资本主义精神的病理学：关于贪婪、希望和失败的文集》，*Pathology of the Capitalist Spirit: an Essay on Greed, Hope, and Loss*/ David Levin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3.

71.《安德烈·高兹的政治思想》，*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André Gorz*/ Adrian Littl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2013.

72.《美国梦的政治：当代美国政治文化的民主幻象》，*The Politics of the American Dream: Democratic Inclusion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Cyril Ghos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3.

73.《社会加速：现代性新理论》，*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 Hartmut Ros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74.《残酷的现代性》，*Cruel Modernity*/ Jean Franco.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3.

75.《断裂的时代：20 世纪的文化与社会》，*Fractured Time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 J Hobsbawm. London ; Little, Brown, 2013.

76.《我们的身体，谁的财产？》，*Our Bodies, Whose Property?*/ Anne Phillip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

77.《星丛：历史原像中的尼采和本雅明》，*Constellation: Friedrich Nietzsche and Walter Benjamin in the Now-Time of History*/ James McFarland.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13.

78.《黑格尔的暴民：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探究》，*Hegel's Rabble: An Investigation into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Frank Ruda. Preface by Slavoj Žižek.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2013.

79.《弗洛姆的人生：爱的使者》，*The Lives of Erich Fromm: Love's Prophet*/ Lawrence J. Friedman, assisted by Anke M. Schreib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80.《社会主义和宗教：通往共同富裕之路》，*Socialism and Religion: Roads to Common Wealth*/ Vincent Geogheg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13.

81.《阿多诺与电影理论：精神的指纹》，*Theodor Adorno and Film Theory: The Fingerprint of Spirit*/ Brian Wall.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13.

82.《马克思思想中的价值理论：在不只是资本主义的世界里价值的延续》，*Value in Marx: The Persistence of Value in a More-Than-Capitalist World*/ George Henders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3.

83.《卡尔·马克思：19 世纪的生活》，*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 Jonathan Sperber. New York: W.W. Norton,2013.

84.《剥夺：政治的述行方面》，*Dispossession: The Performative in the Political*/ Judith Butler and Athena Athanasiou. New York: Polity,2013.

85.《希特勒的哲学家》，*Hitler's Philosophers*/ Yvonne Sherrat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

86.《种族：哲学导论》，*Race: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Paul C. Taylor. Cambridge: Polity,2nd edition,2013.

87.《巨大的大学冒险：金钱、市场与高等教育的未来》，*The Great University Gamble: Money, Markets and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rew McGettigan. London: Pluto Press,2013.

88.《民主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解读》，*The History of Democracy: A Marxist Interpretation*/ Brian S Roper. London: Pluto Press,2013.

89.《世俗的批判：论马克思、黑格尔和神学》，*Criticism of Earth: On Marx, Engels and Theology*/ Roland Boer. Chicago: Haymarket,2013.

90.《教育能改变社会吗？》，*Can Education Change Society?*/ Michael W Apple. New York: Routledge,2013.

91.《知识、权力和教育：迈克尔·W·艾波选集》，*Knowledge, Power, and Education: The Selected Works of Michael W. Apple*/ Michael W Apple. New York: Routledge,2013.

92.《哲学气质：从柏拉图到福柯》，*Philosophical Temperaments: From Plato to Foucault*/ Peter Sloterdij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93.《反抗的谱系：中东的当代资本主义议题》，*Lineages of Revolt: Issue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Adam Hanieh. Chicago: Haymarket Books,2013.

94.《人民希望：阿拉伯起义的激进探索》，*The People Want: A Radical Exploration of the Arab Uprising*/ Gilbert Achcar. Trans. G.M. Goshgari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

95.《永远不浪费一场严重的危机：新自由主义如何在金融危机中幸存下来？》，*Never Let a Serious Crisis Go to Waste: How Neoliberalism Survived the Financial Meltdown*/ Philip Mirowski.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96.《论抵抗：反抗的哲学》，*On Resistance: A Philosophy of Defiance*/ Howard Caygill.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2013.

97.《巴迪欧和柏拉图：真理教育》，*Badiou and Plato: An Education by Truths*/ A.J. Bartlet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3.

98.《批判的精神：在辩证法的传统中政治地思考》，*In the Spirit of Critique: Thinking Politically in the Dialectical Tradition*/ Andrew J Dougla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3.

99.《阶级、国家和国际关系：罗伯特·考克斯和新葛兰西理论的批判性解读》，*Class,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Robert Cox and Neo-Gramscian Theory*/ Adrian Budd. Abingdon: Routledge,2013.

100.《1%的经济学：主流经济如何服务富人、掩盖现实和歪曲政策》，*Economics of the 1%: How Mainstream Economics Serves the Rich, Obscures Reality and Distorts Policy*/ John Weeks. London: Anthem Press,2013.

101.《作为方法的乌托邦：社会的虚构重建》，*Utopia as Method: The Imaginary Reconstitution of Society*/ Ruth Levita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13.

102.《哲学和事件》，*Philosophy and the Event*/ Alain Badiou and Fabien Tarby.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3.

103.《反资本主义的哲学根源：历史、文化和辩证思想文集》，*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Anti-Capitalism: Essays on History, Culture, and Dialectical Thought*/ David Black.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2013.

104.《世界马克思主义史：从尼安德特人到新自由主义者》，*A Marxist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Neanderthals to Neoliberals*/ Neil Faulkner. London: Pluto Press,2013.

105.《危险联系：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联姻与分离》，*Dangerous Liaisons: The Marriages and Divorces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Cinzia Arruzza. Trans. Marie Lagatta and Dave Kelly,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Ltd,2013.

106.《学习幅度下跌与新自由主义残局》，*The Falling Rate of Learning and the Neoliberal Endgame*/ David J Blacker. Winchester and Washington DC: Zero Books,2013.

107.《让·保罗·萨特：关键词》，*Jean-Paul Sartre: Key Concepts*/ eds. Steven Churchill and Jack Reynolds. Durham: Acumen, 2013.

108.《葛兰西和语言：统一、多样性和霸权》，*Gramsci and Languages: Uni-*

fication, Diversity, Hegemony/ Alessandro Carlucci. Leiden: Brill,2013.

109.《新自由主义的亡灵：当代艺术和政治文集》，*The Neoliberal Undead: Essays on Contemporary Art and Politics/* Marc James Léger. Winchester and Washington DC: Zero Books,2013.

110.《解体的景象》，*The Spectacle of Disintegration/* McKenzie Wark.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3.

111.《意识形态理论：异化和征服的权力》，*Theories of Ideology: The Powers of Alienation and Subjection/* Jan Rehmann. Leiden: Brill,2013.

112.《感性：艺术审美制度的场景》，*Aisthesis: Scenes from the Aesthetic Regime of Art/* Jacques Rancière. Trans.Zakir Paul.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113.《马克思·韦伯的人格理论：宗教社会学中的个性化、政治和东方主义》，*Max Weber's Theory of Personality: Individuation, Politics and Orientalism in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Sara R. Farris. Leiden: Brill,2013.

114.《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指南》，*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Volume 2/* David Harve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115.《最终的解决方案：人性、资本主义和大屠杀》，*Final Solutions: Human Nature, Capitalism and Genocide/* Sabby Sagall. London: Pluto,2013.

116.《莫里斯·多布：政治经济学》，*Maurice Dobb: Political Economist/* Timothy Shenk.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3.

117.《无政府主义转向》，*The Anarchist Turn/* eds. Jacob Blumenfeld, Chiara Bottici, and Simon Critchley. London: Pluto,2013.

118.《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妇女参政，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Sylvia Pankhurst: Suffragett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t/* Katherine Connelly. London: Pluto Press,2013.

119.《眼泪之谷：论马克思主义与神学，卷五》，*In the Vale of Tears: On Marxism and Theology, Volume V/* Roland Boer. Leiden and Boston: Brill,2013.

120.《地缘政治经济学：美国霸权之后、全球化和帝国》，*Geopolitical Economy: After Us Hegemony, Globalization and Empire/* Radhika Desai. London: Pluto Press,2013.

121.《卡尔·马克思：革命的教育家》，*Karl Marx: The Revolutionary as Educator/* Robin Small. New York: Springer,2013.

121.《晦涩的无神论：阿兰·巴迪欧、让·吕克·南希和昆汀·梅拉苏的后神学思想》，*Difficult Atheism: Post-Theological Thinking in Alain Badiou, Jean-Luc Nancy and Quentin Meillassoux*/ Christopher Watki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3.

122.《马克思与自然界普遍新陈代谢中的裂口》，*Marx and the Rift in the Universal Metabolism of Nature*/ John Bellamy Fo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13.

123.《海德格尔和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语言富有成果的对话》，*Heidegger and Marx: A Productive Dialogue over the Language of Humanism*/ Laurence Paul Hemming.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13.

124.《电影》，*Cinema*/ Alain Badiou. Cambridge: Polity,2013.

125.《获利而不生产：金融如何剥削我们所有》，*Profiting without Producing: How Finance Exploits Us All*/ Costas Lapavista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126.《马克思的实验室：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批判性阐释》，*In Marx's Laboratory: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rundrisse*/ eds.Riccardo Bellofiore, Guido Starosta, and Peter D. Thomas. Leiden: Brill,2013.

127.《阿多诺的实践哲学：少错地生存》，*Adorno's Practical Philosophy: Living Less Wrongly*/ Fabian Freyenhage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128.《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揭秘金融》，*A Political Economy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is: Demystifying Finance*/ Dimitris Sotiropoulos, John Milios and Spyros Lapatsiora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13.

129.《艺术建筑的复杂性》，*The Art-Architecture Complex*/ Hal Foste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130.《发明市场：史密斯、黑格尔和政治理论》，*Inventing the Market: Smith, Hegel, and Political Theory*/ Lisa Herzo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131.《共产主义的理念 2：纽约会议》，*The Idea of Communism 2: The New York Conference*/ ed.Slavoj Žižek.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132.《女性主义的命运：从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For-*

tunes of Feminism: From State-Managed Capitalism to Neoliberal Crisis/ Nancy Frase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3.

134.《解放伦理：在全球化和排斥的时代》，*Ethics of Liber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Exclusion/* Enrique Dussel, ed. Alejandro A. Valleg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35.《阿尔都塞及其同代人：哲学的永恒战争》，*Althusser and His Contemporaries: Philosophy's Perpetual War/* Warren Montag.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36.《后结构主义爱丁堡指南》，*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Poststructuralism/* eds. Benoît Dillet, Iain Mackenzie, and Porter Rober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137.《自由恐怖》，*Liberal Terror/* Brad Evans. Cambridge: Polity, 2013.

138.《资本主义全球化：后果，抵抗以及替代方案》，*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Consequences, Resistance, and Alternatives/* Martin Hart-Landsberg.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2013.

139.《面向所有美国人的自由预算：在争取经济正义的今天夺回公民权运动的承诺》，*A Freedom Budget for All Americans: Recapturing the Promise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the Struggle for Economic Justice Today/* Paul Le Blanc and Michael D. Yat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3.

140.《古巴种族：革命和种族不平等文集》，*Race in Cuba: Essays on the Revolution and Racial Inequality/* Esteban Morales Dominguez.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3.

141.《十二月的一天：西莉亚·桑切斯与古巴革命》，*One Day in December: Celia Sánchez and the Cuban Revolution/* Nancy Stou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3.

142.《地狱厨房和争取城市空间：纽约 1894-1914 的阶级斗争与渐进式改革》，*Hell's Kitchen and the Battle for Urban Space: Class Struggle and Progressive Reform in New York City 1894-1914/* Joseph J. Varg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3.

143.《论资本主义再生产：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ouis Althusser.

London: Verso,2013.

144.《安提阿事件：三幕悲剧》，*The Incident at Antioch: A Tragedy in Three Acts*/ Alain Badiou.Trans.Susan Spitz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145 《柏拉图理想国：16 章的对话》，*Plato's Republic: A Dialogue in 16 Chapters*/ Alain Badiou.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146.《剧院狂想曲》，*Rhapsody for the Theatre*/ Alain Badiou.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147.《什么是马克思主义》，*What Is Marxism?*/ Douglas Bell.kindle edition,2013.

148.《列宁、宗教和神学》，*Lenin, Religion, and Theology*/ Roland Bo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13.

149.《当代文化中的伦理主体》，*Ethical Subjects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Dave Boothroyd.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3

150.《21 世纪劳动体制的变化》，*Labor Regime Chang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om Brass. Chicago: Haymarket,2013.

151.《平民经验：不连续的政治自由历史》，*The Plebeian Experience: A Discontinuous History of Political Freedom*/ Martin Breug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152.《存在—绘图学：机械和媒体的本体论》，*Onto-Cartography: An Ontology of Machines and Media*/ Levi R Bryan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3.

153.《全球团结》，*Global Solidarity*/ Lawrence Wild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3.

154.《解放神学的重新崛起：21 世纪模型》，*The Reemergence of Liberation Theologies: Model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 Thia Coop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13.

155.《24/7：终端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24/7: Terminal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 Jonathan Crar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156.《超越巴迪欧的德勒兹：本体论、多样性和事件》，*Deleuze Beyond Badiou: Ontology, Multiplicity, and Event*/ Clayton Crocket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157.《权力的签名：治理、主权和生命政治》，*Signature of Power: Governmentality, Sovereignty and Biopolitics*/ Mitchell M. Dean.Sage Publications,2013.

158.《自由支配的神话：从大萧条到大萧条的企业统治》，*The Myth of Liberal Ascendancy: Corporate Dominance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to the Great Recession*/ G. William Domhoff. London: Pluto Press,2013.

159.《危机中的哲学和抵抗》，*Philosophy and Resistance in the Crisis*/ Costas Douzinas. Cambridge: Polity,2013.

160.《知识时代：大学的动态，知识与社会》，*The Age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Universities, Knowledge & Society*/ James Dziash and Henry Etkowitz. Chicago: Haymarket Books,2013.

161.《理性如何几乎丧失头脑：冷战理性的奇怪职业》，*How Reason Almost Lost Its Mind: The Strange Career of Cold War Rationality*/ Paul Erickson, Judy L. Klein, Lorraine Daston, Rebecca Lemov, Thomas Sturm, and Michael D. Gordi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

162.《封闭式商业国家》，*Closed Commercial State*/ J. G. Ficht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3.

163.《超越发展型国家：进入 21 世纪产业政策》，*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dustrial Policy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s. Ben Fine, Jyoti Saraswati, and Daniela Tavasci. London: Pluto Press,2013.

164.《1970-1972 年法兰西学院讲座：关于知识的意愿与恋母情结》，*Lectures on the Will to Know ; and Oedipal Knowledge: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0-1971*/ Michel Foucaul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13.

165.《身份、政治与小说：美学时刻》，*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Novel: The Aesthetic Moment*/ Ian Fraser. Cardiff: Univ of Wales Press,2013.

166.《弗朗索瓦的差异哲学：批判性介绍和指南》，*Francois Laruelle's Philosophies of Differenc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and Guide*/ Rocco Gangl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3.

167.《为马克思辩护：马克思主义哲学新阐释》，*Defence for Marx: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Yang Geng. Berlin: Canut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2013.

168.《一个世纪的战争如何改变了女性的生活》，*How a Century of War*

Changed the Lives of Women/ Lindsey German. London: Pluto,2013.

169.《全球资本主义的形成：美利坚帝国的政治经济学》，*The Making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Empire*/ Sam Gindin and Leo Panitch.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170.《后结构主义及其以后：结构、主体性和权力》，*Poststructuralism and After: Structure, Subjectivity and Power*/ David R. Howart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3.

171.《斯蒂格勒和工艺》，*Stiegler and Technics*/ eds. Christina Howells and Gerald Moo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 Press,2013.

172.《现代政治》，*Modern Politics*/ C. L. R. James. Oakland, CA: PM Press,2013.

173.《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The Antinomies of Realism*/ Fredric Jameson. London: Verso,2013.

174.《美国左派：自 1900 年以来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American Left: Its Impact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since 1900*/ Rhodri Jeffreys-Jon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3.

175.《革命的希望：威廉·麦克布莱德纪念文集》，*Revolutionary Hope: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L. McBride*/ eds. Nathan J. Jun and Shane Wahl. Lanham: Lexington Books,2013.

176.《卢卡奇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 of Georg Lukacs*/ Inos Kelemen.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Pivot,2013.

177.《左半球：勾勒今天的批判理论》，*The Left Hemisphere: Mapping Critical Theory Today*/ Razmig Keucheyan.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2013.

178.《危机中的金融化》，*Financialisation in Crisis*/ ed. Costas Lapavistas. Chicago: Haymarket,2013.

179.《反巴迪欧：论将毛泽东主义引入哲学》，*Anti-Badiou: On the Introduction of Maoism into Philosophy*/ Francois Laruelle. New York and London: Bloomsbury,2013.

180.《非哲学原理》，*Principles of Non-Philosophy*/ François Laruelle. New York and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2013.

181.《抵抗的考验：希腊、欧元区 and 世界经济危机》，*Crucible of Resistance*:

Greece, the Eurozone and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Christos Laskos and Euclid Tsakalotos. London: Pluto Press,2013.

182.《超越资本主义：激进政治的未来》，*Beyond Capitalism?: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Luke Cooper and Simon Hardy, Winchester and Washington: Zero Books,2013.

183.《失败的解剖：哲学和政治行动》，*Anatomy of Failure: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Action*/ Oliver Feltham.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2013.

184.《资本主义的癌症阶段：从危机到治愈》，*Cancer Stage of Capitalism: From Crisis to Cure*/ John McMurtry. London: Pluto Press,new edn,2013.

185.《底层、对抗和自主：构建政治议题》，*Subalternity, Antagonism, Autonomy: 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Subject*/ Massimo Modonesi. London: Pluto,2013.

186.《资产阶级：文学和历史之间》，*The Bourgeoi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Franco Moretti.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187.《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经济正义》，*Exploitation and Economic Justice in the Liberal Capitalist State*/ Mark R. Reiff.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188.《我们时代的斯宾诺莎：政治与后现代性》，*Spinoza for Our Time: Politics and Postmodernity*/ Antonio Negr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189.《20世纪道德哲学发生了什么：麦金泰尔纪念哲学文集》，*What Happened in and to Moral 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hilosophical Essays in Honor of Alasdair Macintyre*/ ed. Fran O'Rourke.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2013.

190.《随处皆有或一无所有：当代艺术哲学》，*Anywhere or Not at All: Philosophy of Contemporary Art*/ Peter Osborn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191.《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辩证研究方法》，*Dialectical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Classical Marxist Tradition*/ Faith Agostinone-Wilson. Bern, Switzerland: Peter La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2013

192.《资本之怒：新自由主义与气候变化政治学》，*The Wrath of Capital: Neoliberalism and Climate Change Politics*/ Adrian Par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 193.《阿克塞尔·霍耐特的批判理论》，*The Critical Theory of Axel Honneth*/ Danielle Petherbridge. Lanham: Lexington Books,2013.
- 194.《无政府状态、地理与现代性：雷克吕选集》，*Anarchy, Geography, Modern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Elisée Reclus*/ Elisée Reclus.Ed.John P. Clark and Martin Camille. Oakland CA: PM Press,2013.
- 195.《误入歧途的绿色：生态资本主义的前线报道》，*Green Gone Wrong: Dispatche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Eco-Capitalism*/ Heather Roger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 196.《超越碎片：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形成》，*Beyond the Fragments: Feminism and the Making of Socialism*/ Sheila Rowbotham, Lynne Segal, and Hilary Wainwright.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Ltd,3rd edn,2013.
- 197.《饥饿的资本：食品金融化》，*Hungry Capital: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Food*/ Luigi Russi. Winchester: Zero Books,2013.
- 198.《矛盾的活力：黑格尔、政治学和自由资本主义辩证法》，*The Vitality of Contradiction: Hegel, Politics, and the Dialectic of Liberal-Capitalism*/ Bruce Gilbert, Quebec: McGill Queens Univ Pr,2013.
- 199.《罗莎·卢森堡：她的生活和遗产》，*Rosa Luxemburg: Her Life and Legacy*/ ed.Jason Schulman (ed.)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3.
- 200.《朝向一种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托马斯·T·关根文集》，*Towards a Critique of Bourgeois Economics: Essays of Thomas T. Sekine*/ Thomas T. Sekine. ed.John R. Bell. Berlin: Owl of Minerva Press,2013.
- 201.《新劳动哲学：工作和社会关系》，*New Philosophies of Labour: Work and the Social Bond*/ eds.Nicholas H. Smith and Jean-Philippe Deranty. Leiden ; Boston: Brill,2013.
- 202.《要求民主：美国激进者寻求新政治》，*Demanding Democracy: American Radicals in Search of a New Politics*/ Marc Ste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
- 203.《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辩证法，卷一》，*Dialectic in Hegel's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1*/ Mehmet Tabak. New York: Pranga Inc.,2013.
- 204.《消极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犬儒主义》，*Negative Capitalism: Cynicism in the Neoliberal Era*/ J. D. Taylor. Winchester: Zero Books,2013.

205.《现代性与恐怖主义：从反现代性到现代全球恐怖》，*Modernity and Terrorism: From Anti-Modernity to Modern Global Terror*/ Milan Zafirovski and Daniel G. Rodeheaver, Leiden: Brill,2013.

206.《马克思主义和女性压迫：朝向一种统一理论》，*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Lise Vogel. Chicago: Haymarket Press,2013.

207.《资本主义有未来么？》，*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 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 Randall Collins, Michael Mann, Georgi Derluguian, and Craig Calhoun. US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208.《资本主义背水一战：紧缩时代的去全球化》，*Capitalism's Last Stand?: Deglobalization in the Age of Austerity*/ Walden Bello, London: Zed Books,2013.

209.《灾难和救赎：乔治·阿甘本的政治思想》，*Catastrophe and Redempti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Giorgio Agamben*/ Jessica Whyt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3.

210.《悲剧、承认与上帝之死：黑格尔和尼采研究》，*Tragedy, Recognition, and the Death of God: Studies in Hegel and Nietzsche*/ Robert R. Willia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211.《身份与差异：约翰·洛克和意识的发明》，*Identity and Difference: John Locke and the Invention of Consciousness*/ Etienne Baliba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212.《艾伦·伍德读本》，*The Ellen Meiksens Wood Reader*/ Ellen Meiksens Wood.Ed. Larry Patriquin. Chicago: Haymarket Books,2013.

213.《世界哲学家：阿尔伯特·赫斯曼的长途冒险》，*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n*/ Jeremy Adelm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

214.《民主的仇恨》，*Hatred of Democracy*/ Jacques Ranciè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215.《马克思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arx*/ Etienne Baliba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216.《黑格尔的幽灵：早期著作》，*The Spectre of Hegel: Early Writings*/ Louis Althusse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 217.《重思能动性：发展主义、性别和权利》，*Rethinking Agency: Developmentalism, Gender and Rights*/ Sumi Madhok. New Delhi : Routledge India,2013.
- 218.《女性、反抗和革命：现代世界的女性和革命的历史》，*Women,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Women and Revolu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Sheila Rowbotha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 219.《虚假的信仰：政治神学的实验》，*The Faith of the Faithless: Experiments in Political Theology*/ Simon Critchle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 220.《伦理学：恶的理解随笔》，*Ethics: An Essay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vil*/ Alain Badiou.trans.Peter Hallward.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 221.《热情的业余者：剧院、共产主义和爱情》，*Passionate Amateurs: Theatre, Communism, and Love*/ Nicholas Ridout,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3.
- 222.《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批判》，*Freudianism: A Marxist Critique*/ Valentin Voloshinov,trans.I.R. Titunik.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 223.《无限的需求：承诺伦理学、反抗政治》，*Infinitely Demanding: Ethics of Commitment, Politics of Resistance*/ Simon Critchle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3.
- 224.《民主第四波：数字媒体与阿拉伯之春》，*Democracy's Fourth Wave?: Digital Media and the Arab Spring*/ Philip N. Howard and Muzammil M. Huss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 225.《没有权力的秩序：无政府主义导论：历史与当前的挑战》，*Order Without Power: An Introduction to Anarchism: History and Current Challenges*/ Normand Baillargeon.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2013.
- 226.《阶级、过剩与劳动分工：后马克思主义探索》，*Class, Surplu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A Post-Marxian Exploration*/ Michal Polák,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13.
- 227.《美丽之后：黑格尔与图像现代主义哲学》，*After the Beautiful: Hegel and the Philosophy of Pictorial Modernism*/ Robert B. Pipp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
- 228.《存在、时间和生命：资本主义和本体论》，*Being, Time, Bios: Capitalism and Ontology*/ A. Kiarina Kordela. Albany, NY: SUNY Press,2013.

229.《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The Failure of Anglo-liberal Capitalism*/ Colin Hay. London: Palgrave Pivot,2013.

230.《全球化时代的乌托邦：空间、表征和世界体系》，*Utopia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Space, Represent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Robert T. Tally Jr. London: Palgrave Pivot,2013.

231.《晚期现代性、个性化和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联合批判》，*Late Modernity, Individualization and Socialism: An Associational Critique of Neoliberalism*/ Matt Daws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13.

232.《后理性主义：战后法国的精神分析、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Post-Rationalism: Psychoanalysis, Epistemology, and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 Tom Eyer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2013.

233.《独裁》，*Dictatorship*/ Carl Schmitt.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3.

234.《给卡尔·施密特：书信和反思》，*To Carl Schmitt: Letters and Reflections*/ Jacob Taub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法 文

1.《向马克思学习哲学思考》*Apprendre à Philosopher avec Marx* / Olivier Dekens / Ellipses Marketing (5 novembre 2013)

2.《一个关于欧盟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Une analyse marxiste de la crise de l'Union européenne* / Nowak Dominique/Publibook (28 octobre 2013)

3.《马克思与共产主义假设：改变世界》*Marx et l'hypothèse communiste : transformer le monde*/Luc Ferry/Le Figaro Editions (26 septembre 2013)

4.《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和黑非洲问题》*Hegel, Marx, Engels et les problèmes de l'Afrique noire*/Amady Aly Dieng/L'Harmattan (14 mai 2013)

5.《威廉姆·赖希：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之间的性革命》*Wilhelm Reich. La révolution sexuelle entre Marx et Freud*/ Jean-Michel Palmier/Esprit Du Temps (29 mars 2013)

6.《回到马克思：为了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Retour à Marx : Pour une société post-capitaliste*/Yvon Quiniou/Buchet Chastel (7 mars 2013)

7.《从斯密到马克思：两种资本主义研究路径》*De Smith à Marx : Deux ap-*

proches du capitalisme/André Mesin/Éditions L'Harmattan (1 mars 2013)

8.《马克思与拉康：革命行为与分析行为——塞里希会议论文集》*Marx, Lacan : l'acte révolutionnaire et l'acte analytique : Colloque de Cerisy*/Silvia Lippi, Patrick Landman (Collectif)/ Erès (21 février 2013)

9.《卡尔·马克思：我是谁》*Karl Marx - Qui suis-je?*/ Nicolas Tandler/Pardès (21 janvier 2013)

10.《德勒兹与伽塔里思想中的政治与国家》*Politique et Etat chez Deleuze et Guattari*/Guillaume Sibertin-Blanc/PUF (7 janvier 2013)

11.《对新资本主义的思考：生活、资本与异化》*Penser le néo-capitalisme : vie, capital et aliénation*/Stéphane Haber/Les Prairies Ordinaires (15 mai 2013)

12.《法国马克思主义引论》L'introduction du marxisme en France : Philoso-viétisme et sciences humaines (1920-1939) / Isabelle Gouarné I/ PU Rennes (31 octobre 2013)

13.《生态主义的生态乌托邦：从恩斯特·布洛赫的具体乌托邦到社会主义生态学》*Utopie Écologie Ecosocialisme de l'Utopie Concrete d'Ernst Bloch a l'Écologie Socialiste*/Arno Münster/L'Harmattan (24 juin 2013)

14.《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拉康、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和索莱尔斯语境中的主体的声音》*Analyse du discours poststructuraliste : Les voix du sujet dans le langage chez Lacan, Althusser, Foucault, Derrida, Sollers/Johannes Angermüller* (Auteur), Rosine Inspektor (Traduction)/ Lambert-Lucas (Éditions) (11 octobre 2013)

15.《论晚期卢卡奇思想》*L'oeuvre-monde : Essai sur la pensée du dernier Lukacs*/Pierre Rusch/Klincksieck (21 octobre 2013)

16.《格奥尔格·卢卡奇的现实性》*L'actualité de Georges Lukacs*/Rusch Pierre & Takacs Adam/Archives Karéline (29 mars 2013)

17.《铁笼：马克斯·韦伯与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La cage d'acier: Max Weber et le marxisme wébérien*/Michael Lowy/Stock (20 mars 2013)

18.《德勒兹：存在的喧嚣》*Deleuze: La clameur de l'Être*/Alain Badiou/Fayard (19 juillet 2013)

19.《阿兰·巴迪乌，或形而上学的模糊的回归》*Alain Badiou, Ou l'Obscur Retour de la Métaphysique*/Serge Druon/Édilivre-Aparis (13 juin 2013)

20. 《何谓人民?》*Qu'est-ce qu'un peuple?*/ Alain Badiou (Auteur), Pierre Bourdieu (Auteur), Judith Butler (Auteur), Georges Didi-Huberman (Auteur)/ La Fabrique Editions (14 mars 2013)
21. 《社会哲学的历史与概念》*Histoires et définitions de la philosophie sociale*/Éric Dufour (Sous la direction de), Franck Fischbach (Sous la direction de) / Vrin (7 janvier 2013)
22. 《人的解放》第二卷 *La Libération de l'Homme - Tome II*/Jezeouquel Jean -Yves/Publilbook (11 juillet 2013)
23. 《新自由主义与教育》*Le néolibéralisme et l'éducation*/ Nelson Casimiro Zavale/Presses Académiques Francophones (9 janvier 2013)
24. 《今日马克思》第 53 期 (“世界历史”) *Actuel Marx* 2013- n° 53 Histoire globale/PUF (19 avril 2013)
25. 《今日马克思》第 54 期 (“民粹主义与反民粹主义”) *Actuel Marx* 2013- n° 54 Populisme, contre-populisme/PUF (16 octobre 2013)
26. 《政治理性》第 52 期 (“米歇尔·福柯与新自由主义”) *Raisons politiques*, N° 52, Novembre 2013 : Les néolibéralismes de Michel Foucault/Le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16 décembre 2013)
27. 《戏剧 / 大众》第 207 期 (“戏剧与新自由主义”) *Théâtre/Public*, N° 207, Janvier-mars : Théâtre et néo-libéralisme/Éditions Théâtrales (21 mars 2013)
28. 《反潮流》第 16 期 (“法国左翼：危机与挑战”) *ContreTemps*, N° 16: La gauche en France : Crises et défis/Éditions Syllepse (24 janvier 2013)
29. 《反潮流》第 17 期 (“2013 年：什么样的左翼?”) *ContreTemps*, N° 17: Quelle (s) gauche (s) en 2013 ?/ Éditions Syllepse (15 mai 2013)
30. 《生态与政治》第 46 期 (“今日的政治生态学”) *Ecologie et Politique*, N° 46/2013: Les écologies politiques aujourd'hui: Tome 4, Amérique latine/Le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1 mars 2013)

(吴猛 整理)

德 文

《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 93-96, 2013. Herausgegeben vom Forum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e.V. (Frankfurt/M.) und dem IMSF e.V.

《马克思主义杂志》

Marxistische Blätter Heft 1-6, 2013. Neue Impuls Verlag GmbH.

《批判理论杂志》

Zeitschrift für kritische Theorie, 2013. zu Klampen.

《德国哲学杂志》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1-6/2013. Akademie Verlag.

《社会主义杂志》

Zeitschrift „Sozialismus“, 2013. VSA-Verlag Hamburg.

《WestEnd : 社会研究新杂志》

WestEnd. Neu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Stroemfeld Verlag, Frankfurt/M. 2013.

《德国政治与国际政治杂志》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5/2013.

《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辞典》

Wolfgang Fritz Haug (Hg.), *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 ARGUMENT.

《不平等的代价：社会分裂如何威胁我们的未来》

Joseph E. Stiglitz, *Preis der Ungleichheit. Wie die Spaltung der Gesellschaft unsere Zukunft bedroht*, München 2012.

《资本主义中的矛盾性正义：哲学—经济学批判》

Elmar Treptow, *Die widersprüchliche Gerechtigkeit im Kapitalismus. Eine philosophisch-ökonomische Kritik*, Weidler-Verlag, Berlin 2012.

《联邦德国社会报告 2011》

Datenreport 2011. Ein Sozialbericht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onn.

《阅读〈资本论〉，但如何阅读?》

Wolfgang F. Haug, *Das "Kaptial" lesen. Aber wie? Materialien zur Philosophie und Epistemologie der marxischen Kapitalismuskritik*, Berliner Beiträge zur kritischen Theorie, Bd.16, Hamburg 2013.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导论、文本、C. 戴维斯的英文注释》

Garethe Stedman Jones,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Einführung, Text, Kommentar aus dem Englischen von Catherine Davies*, Verlag C.H.Beck, München 2012.

《“缺乏什么”? : 乌托邦、批判与幸福承诺》

Jour Fixe Initiative Berlin (Hrsg.), „etwas fehlt“, *Utopie, Kritik und Glücksversprechen, edition assemblage*, Münster 2013.

《共产主义运动的结构问题：歧途、批判、创新》

Theodor Bergmann, *Strukturprobleme der kommunistischen Bewegung. Irrwege-Kritik-Erneuerung*, VSA: Verlag, Hamburg 2012.

《被购买的时间：民主资本主义被延缓了的危机》

Wolfgang Streeck, *Gekaufte Zeit. Die vertagte Krise des demokratischen Kapitalismus*, Suhrkamp, 2013.

《马克思—新读物：社会科学逻辑批判》

Helmut Reichelt, *Neue Marx-Lektüre. Zur Kritik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Logik*, Hamburg 2008.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

Michael Heinrich,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 Eine Einführung*, Schmetterling Verlag, 3. Auflage 2005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Friedrich Engels, *Karl Marx. "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in: MEW Bd.13.

《K. 马克思》

A. W.Wood, *Karl Marx*, Routledge, 200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Frankfurt a.M. 1927ff.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1 部分）

Karl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stes Heft.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ster Band. Hamburg 1867.

《经济与社会》

Mar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n Max Weber-Studienausgabe: Band I/22,1-5 + I/23, Mohr Siebeck Tuebingen, 2009.

《国家与革命》

Lenin, *Staat und Revolution*, Dietz Verlag Berlin 1972.

《唯物主义国家分析导论》

Josef Esser: *Einführung in die materialistische Staatsanalyse*, Frankfurt/New York, 1975.

<http://www.marxforschung.de/verein.htm>

<http://www.marxforschung.de/mega.htm>

<http://www.bbaw.de/bbaw/Forschung/Forschungsprojekte/mega/de/Startseite>

<http://www.bbaw.de/bbaw/Forschung/Forschungsprojekte/mega/de/Überblick>.

<http://www.marxismuskonferenz.de/>

<http://www.das-kapital-lesen.de/>

（周爱民 王凤才 整理）

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2013）

1《三浦勉论集：20世纪马克思主义使人们失去的东西》；『三浦つとむ意志論集：20世紀マルクス主義が欠落させたもの』，三浦つとむ著、津田道夫編集・解題，績文堂出版，2013年1月。

2《马克思主义学派经济稳定增长论》；『マルクス派最適成長論』，金江亮著，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3年2月。

3《“国家无用论”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局限》；『「国家無用」論：資本主義民主制の限界』，亀田寿夫著，中央書林新社，2013年2月。

4《现代经济的解读：全球化资本主义与日本经济》；『現代經濟の解説：グ

ローバル資本主義と日本経済』, SGCIME 編, 御茶の水書房, 2013年3月。

5《国富倍增——日本国富基金: 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政治経済学》;『国富倍增日本国富フ

アンド: グローバル金融資本主義の政治経済学』, 大井幸子著, 志學社, 2013年3月。

6《探知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マルクスに立ちマイクロ経済学を知る』, 浅尾大輔著, 新日本出版社, 2013年4月。

7《嘿! 读一读马克思主义吧! 经典著作对你的款待》;『そうだ! マルクス読もう: 古典への招待』小島恒久著, 労働大学出版センター, 2013年4月。

8《全球金融資本主義の走向: 当代社会経済学解读入门》;『グローバル金融資本主義のゆくえ: 現代社会を理解する経済学入門』, 鳥谷一生、松浦一悦編著, ミネルヴァ書房, 2013年4月。

9《21世紀式的世界經濟危機与金融政策》;『21世紀型世界經濟危機と金融政策』, 建部正義著, 新日本出版社, 2013年5月。

10《当代美国經濟論: 美国資本主義的精神》;『現代アメリカ經濟論: アメリカにおける資本主義の精神』, 中臣久著, 日本評論社, 2013年5月。

11《马克思异化論諸形态》;『マルクス疎外論の諸相』, 田上孝一著, 新日本出版社, 2013年06月。

12《貨幣与欲望: 資本主義精神解剖学》;『貨幣と欲望: 資本主義の精神解剖学』, 佐伯啓思著, 筑摩書房, 2013年6月。

13《世界史中的資本主義》;『世界史の中の資本主義』, 水野和夫、川島博之編著, 東洋經濟新報社, 2013年6月。

14《大家的社会主义》;『人びとの社会主義』, 南塚信吾、古田元夫、加納格、奥村哲著, 有志舎, 2013年6月。

15《年轻人啊! 读读马克思主义吧! 20—30岁阶段的摸索与热情》;『若者よ、マルクスを読もう: 20歳代の摸索と情熱』, 内田樹、石川康宏著, 角川学芸出版, 2013年7月。

16《要是马克思出生在日本》;『マルクスが日本に生まれていたら』, 出光佐三著, 春秋社, 2013年7月。

17《国家資本主義的中国: 是市場还是政府?》;『ステート・キャピタリズムとしての中国: 市場か政府か』, 渡辺利夫著, 21世紀政策研究所/監修、

大橋英夫 / 編，勁草書房，2013 年 7 月。

18.《日本崩潰的劇場：日本式資本主義的終結》；『日本：崩壊するシナリオ：日本型資本主義の終焉』，清宮孝治著，中央公論事業出版，2013 年 7 月。

19.《意大利版〈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论争》；『イタリア版「マルクス主義の危機」論争』，上村忠男監修、イタリア思想史の会編訳，未來社，2013 年 8 月。

20.《马克思的三个侧面》；『マルクスの三つの顔』，四方田犬彦著，亜紀書房，2013 年 8 月。

21.《重新解读马克思的语言》；『新解マルクスの言葉』，浅尾大輔著，バジリコ，2013 年 9 月。

22.《马克思〈资本论〉的思考》；『マルクス資本論の思考』，熊野純彦著，せりか書房，2013 年 9 月。

23.《经典著作教室第 1 卷》；『古典教室第 1 卷』，不破哲三著，新日本出版社，2013 年 9 月。

24.《经典著作教室第 2 卷》；『古典教室第 2 卷』，不破哲三著，新日本出版社，2013 年 9 月。

25.《经典著作教室第 3 卷》；『古典教室第 3 卷』，不破哲三著，新日本出版社，2013 年 10 月。

26.《“暧昧的制度”：中国式资本主义》；『「曖昧な制度」としての中国型資本主義』，加藤弘之著，NTT 出版，2013 年 9 月。

27.《新资本主义与企业经营》；『新しい資本主義と企業経営』，日本経営学会編，千倉書房，2013 年 9 月。

28.《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史》；『科学的社会主義の哲学史』，広島県労働者学習協議会編，一粒の麦社，2013 年 9 月。

29.《以环境与人类为目的的经济学：转折时期资本主义的解读》；『環境と人間のための経済学：転換期の資本主義を読む』，相沢幸悦著，ミネルヴァ書房，2013 年 9 月。

30.《世界资本主义景气循环》；『世界資本主義の景気循環』，岩田佳久著，日本経済評論社，2013 年 10 月。

31.《从马克思手稿的精华部分解读马克思：MEGA 第四部分的编辑与所收录的手稿》；『マルクス抜粋ノートからマルクスを読む：MEGA 第 4 部門の編

集と所収ノートの研究』, 大谷禎之介、平子友長編, 桜井書店, 2013年10月。

32《资本主义的结构: 立足于〈资本论〉思考现代资本主义》;『資本主義のしくみ:『資本論』を基礎に現代資本主義を考える』, 上瀧真生著, 京都労働者学習協議会, 2013年10月。

33《资本主义的危机与日本经济的未来: 安倍经济学将塑造一个怎样的日本》;『資本主義

の危機と日本の未来: アベノミクスでどうなる日本』, 富田和夫著, 創英社/三省堂書店, 2013年10月。

34《早期的马克思》;『はじめてのマルクス』, 鎌倉孝夫、佐藤優著, 金曜日, 2013年11月。

35《〈资本论〉——经济学的批判——未完成的理论与体系的补充》;『資本論——経済学の批判』その理論的・体系的未完成の解明とその完成のために』, 田中菊次著, 創風社, 2013年。

36《二战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戦後マルクス主義の思想』, 石井穰著, 青木書店, 2013年11月。

37《资本主义财富与知识的经营史》;『資本主義の富と知の経営史』, 大場四千男、女澤史恵著, 柏艚舎, 2013年11月。

38《新自由主义与战后资本主义: 欧美的历史经验》;『新自由主義と戦後資本主義: 欧米における歴史的経験』, 権上康男編著, 日本経済評論社, 新潮社, 2013年11月。

39《朝鲜经济体制的变化 1945—2012: 社会主义圈的盛衰与改革开放》;『北朝鮮経済体制の変化 1945—2012: 社会主義圏の盛衰と改革・開放』, 朴鍾碩著, 北海道大学出版会, 2013年11月。

40《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現代資本主義とマルクス経済学』, 高田太久吉編著, 新日本出版社, 2013年12月。

41《日本社会主义: 反对核电站推进的论理》;『日本の社会主義: 原爆反対・原発推進の論理』, 加藤哲郎著, 岩波書店, 2013年12月。

42《国家资本主义的光与影》;『国家資本主義の光と影』, 加藤弘之、渡邊真理子、大橋英夫著, 朝日新聞出版, 2013年。

43《资本主义之谜》;『資本主義という謎』, 水野和夫、大澤真幸著, NHK出版, 2013年。

(张利军 整理)

俄 文

一、再版 19 世纪—20 世纪的著作

1. Ленин В.И.Империализм, как высшая стадия капитализма. 2013.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2. Туган-Барановский М.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основы кооперации. Изд. стереотип. 2013.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合作社的社会基础》

3. Аксельрод Л.И. (Ортодокс). В защиту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 Против схоластики. Изд. 2 2013.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阿克塞里罗《为辩证唯物主义辩护：反对经院哲学》

4. Каутский 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 положениям Эрфуртского съезда. Пер. с нем. №94. Изд. 2

考茨基《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爱尔福特大会纲领的解读》

5. Хазанов В.Е. Основы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оптимизма: Миры Ивана ЕФРЕМОВА И ПУТ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В БУДУЩЕЕ. Изд. 3

6. В. Е. 哈扎诺夫《社会乐观主义的基础：伊万·叶甫列莫夫的世界和人类通往未来的道路》

7. Борхардт Ю. Накопление капитала. Пер. с нем. Изд. 2. 2013.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波哈特《资本的积累》

二、哲学研究

1. Мархинин В.В. О специфике социально-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 Опыт философии наук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огос, 2013 г.

В.В. 马西尼《人文社会科学特征：哲学的经验》

2. Ширшов, И. Г. , Наука о грядущем счастье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Политехника-сервис 2013г.

И. Г. 施硕夫《关于人类未来幸福的科学》

3. Трудная судьба философии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 (конец XIX - начало XXI в.) 2013г.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艰难命运（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

4. Яо Ин. Философия гуманизма И.Т.Фролова: Взгляд из Китая. 2013 г.

姚颖:《弗罗洛夫的人道主义哲学:中国的观点》

三、政治经济学研究

1. Ковалев, Аристарх Алексеевич, Марксизм. Очерки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Москва Канон 2013г.

А. А. 科瓦列夫《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征》

2. Мареев, 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Маркса и ее критики, Москва Изд-во СГУ 2013г.

С. Н. 马列耶夫《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及其对它的批判》

3. Улитина, Еле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Цен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марксизм, Москва Спутник+ 2013г.

Е.Н. 乌利金娜《价格制定与马克思主义》

4. Гловели, Георгий Джемалович, Политэкономика СССР: крит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Москва Ин-т экономики РАН 2013г.

Г.Д. 戈洛夫列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性》

5. Воейков, Михаил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Есть ли место политэконом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нау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Института экономики РАН и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Москва ИЭ РАН 2013г.

М.И. 沃耶伊科夫《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是否有位置?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所和新经济协会学术大会材料)》

6. Бударин, Виктор Антонович, Опыт СССР и социализм XXI века полит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Москва Граница 2013г.

В.А. 布达林《苏联经验和21世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征》

7. 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Курс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эпоха торгов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Москва URSS 2013г.

И.И. 斯克瓦索夫 - 斯捷潘诺夫《商业资本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教程》

四、马克思主义研究

1. Аттали, Жак, Карл Маркс мировой дух,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3г.

- 让克·阿达利《卡尔·马克思：世界精神》
- 2.Рудаков, 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Молодежи - о марксизме (для тех, кто хочет быть умным) Воронеж Цифровая полиграфия 2013г.
- С.И. 卢达科夫《青年——关于马克思主义（致那些想变得聪明的人）》
- 3.Герасимов, Е. Н. , Марксизм и вызовы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по-американск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Киев [б. и.] 2013г.
- Е. Н. 戈拉斯莫夫《马克思主义和美国式全球化在现代世界的挑战》
- 4.Бузгал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Русский марксизм.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 (Ленин),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13г.
- А.В. 布兹加林《俄国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和列宁》
- 5.Дудник, 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Маркс против СССР критические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в неомарксизме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аука 2013г.
- С.И. 杜尼克《马克思反对苏联：新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历史经验的批判解释》
- 6.Григорьев, 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арксизм: испытание временем попытка системного анализа теории марксизма, ее понимания и практики реализации, Москва URSS cop. 2013г.
- Н.К. 戈利戈里耶夫《马克思主义：系统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实践的尝试》
- 7.Филиппов, Лазарь Степанович, Ленинизм-марксизм XXI века и дальнего будущего, Москва Вече 2013г.
- Л.С. 费利波夫《21世纪和遥远未来的列宁主义 - 马克思主义》
- 8.Мельник, Е. Ф. ,Маркс. Энгельс. Ленин, Москва Сибирская благовонница 2013г.
- Е. Ф. 米利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
- 9.Григорьев Н.К.Марксизм: испытание временем: Попытка системного анализа теории марксизма, ее понимания и практики реализации. №91 2013г.
- Н.К. 戈利戈里耶夫《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尝试，系统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观点和实践的尝试》
- 10.Славин Б.Ф. (Ред.).Дорога к свободе: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МАРКСИЗМ о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е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2013г..
- Б.Ф. 斯拉文编《通往自由之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解放的理论和

实践》

11. Дологов В. Что делать?: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ситуация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марксизм. 2013г.

В. 达洛达夫《怎么办? 当代社会状况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12. Славин Б.Ф. О социальном идеале Маркса. Изд. 2. 2013г.

Б. Ф. 斯拉文《马克思的社会理想》

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研究

1. Кремлёв, Сергей., Мировой социализм. 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гарантия сохран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Москва URSS cop. 2013г.

С. 科列姆廖夫《世界社会主义: 人类发展的唯一保障》

2. Ацюков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Акимович, Костин. 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Тягунов. Феликс. Федорович, Исход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Москва Галлея-Принт 2013г.

В.А. 阿秋科夫斯基, Г. В. 科斯基, Ф. Ф. 佳古诺夫《现代共产主义理论的最初状态》

3. Абрамсон, Иосиф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таврация 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Москва Культу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2013г.

И.Г. 阿布拉姆索《资本主义修复和社会主义改造》

4. Корабельн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Тимофеевич, Паразитизм -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ая стадия капитализма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й, Московская обл. [б. и.] 2013г.

А.Т. 卡拉别利尼科夫《寄生性——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论文集)

5. Субетто,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Теория социализма XXI века: начала и проблем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стерион 2013г.

А.И. 苏别达《21 世纪社会主义理论: 形成的源头和问题》

6. Джонсон, Хьюлетт,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 коммунизм, Москва Фонд "Неопалимая Купина" 2013г.

Х.Х. 乔森《基督教和共产主义》

7. Воейков, Михаил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Либерализм и социализм: Запад и Россия к 2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А. И. Герцена, Москва ЛЕНАНД 2013г.

М.И. 沃耶伊科夫《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 西方和俄国——纪念赫尔岑诞辰

200 周年》

8. Булавка Л.А. (Ред.). Культура. Власть. Социализм: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И ВЫЗОВЫ КУЛЬТУРНЫХ ПРАКТИК СССР: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и не только. 2013г.

Л.А. 布拉夫卡编《文化、权利和社会主义：苏联文化实践的矛盾和挑战：卢那察尔斯基等》

六、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

1. Крупская, 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Мой муж Владимир Ленин,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2013г.

Н. К. 克鲁普斯卡娅《我的丈夫——列宁》

2. Волкогонов, Дмитрий Антонович, Ленин. Жрец террора,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13г.

Д. А. 沃科戈诺夫《列宁：恐怖的献身者》

3. Хлопина, Людмила Федоровна, Усадьб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ой. Дом-музей В. И. Ленина в Ульяновске, Ульяновск Корпорация технологий продвижения 2013г.

Л.Ф. 赫洛彼娜《列宁的莫斯科故居在乌里扬诺夫斯基的庄园》

4. Сидоров, Валентин Митрофанович, Рерих и Ленин, Москва Неопалимая Купина 2013г.

В.М. 西达洛夫《Рерих 和列宁》

5. Штейн, Михаил Гиршевич, Ульяновы и Ленины тайны родословной вождя,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2013г.

М.Г. 施杰因《乌里扬诺夫和列宁的家族领袖秘密》

6. Логинов, Владлен Терентьевич, Владимир Ленин. На грани возможного,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2013г.

В.Т. 洛戈诺夫《弗拉基米尔·列宁：在可能的边缘》

7. Сайтанов, 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Обоснование анархо-реформизма П. А. Кропоткина, Москва ОнтоПринт 2013г.

С.В. 萨达诺夫《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改良主义》

8. Ульрих, Юрг (Ред.). Лев Каменев --- умеренный большевик: Судьба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 Пер. с нем. 2013г.

尤克·乌里利赫编《列夫·卡米涅夫——温和的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者的命运》

9. Солано В. Против Франко, против Сталина: Рабочая партия марксистского единства (ПОУМ) в испан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1936-1939). Пер. с фр. 2013г.

В. 萨拉诺《反对弗兰克，反对斯大林：在西班牙革命和卫国战争（1936-1939）中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10. Лысков.Д.Ю. Велик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05--1922. 2013г.

Д.Ю. 雷茨科夫《伟大的俄国革命：1905-1922》（第二版）

七、学术会议的材料汇编

1. Ковалев, А. А. Марксизм.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и классовая борьба материал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форума политэкономов-марксистов, 27-28 апреля 2013 г. ,Москва ИТРК 2013г.

А.А. 科瓦列夫编，《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2013年4月27-28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国际大会材料》

2. Попов,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В. И. Ленин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2013 материал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22 апреля 2013 года, Разли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во Поли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ун-та 2013г.

М.В. 波波夫《列宁与当代世界：2013年4月22日国际科学实践大会的材料》

（张静 户晓坤整理）